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主编　刘硕良

局外人·鼠疫

〔法国〕阿尔贝·加缪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郭宏安　顾方济　徐志仁译

漓江出版社

本书简介

与萨特齐名而分道扬镳的存在主义大师，法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阿尔贝特·加缪(1913—1960)，“以其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而荣获195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

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郭宏安主持译选的这部加缪作品集，收入他的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二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文学随笔一部、散文三篇。这些不同风貌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加缪所追求的高贵风格：给予最大程度的反抗以适当的形式；通过纠正现实而获得真实；含蓄、适度，恰到好处。成名作、中篇小说《局外人》独具慧眼地描写了裸露在荒诞面前的人，既是现代古典主义的典范，又是一个诸多含混、难以把握的世界，给各种历史条件下的读者都带来探索的兴趣。长篇小说《鼠疫》通过北非一座城市鼠疫流行后的种种情景，表现人们所感到的“窒息”与人们所经历过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成功地创造出一个人抵抗恶的伟大神话。

郭宏安的长篇译序对加缪卓越高超的小说艺术做了独到而深刻的剖析。书后收录有关加缪的重要资料。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 三 辑

局外人·鼠疫

〔法国〕阿尔贝·加缪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郭宏安　顾方济　徐志仁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文　希

·译本前言·

加缪与小说艺术

郭宏安

在本世纪的著名小说家中，有些人的名字是与某种“新技巧”、“新手法”或“新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普鲁斯特与意识流，卡夫卡与荒诞，赫胥黎与对位，福克纳与时空倒错，萨洛特与潜对话，西蒙与新小说，马尔克斯与魔幻，海勒与黑色幽默，等等。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并无此类显赫的联系，但是这丝毫也不曾妨碍人们将其视为杰出的小说家，例如加缪。

当然，加缪也有“荒诞”，然而创始者的光荣不属于他；他也有“怀疑”，但其渊源更为久远；他也曾被人归入海明威一派，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也曾被人拉入新小说家一伙，但是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的荣耀。其实，他从未想过发明什么，他也的确不曾发明什么，他只是不时趋，不媚俗，不以艰深文浅陋。在某些批评家看来，与二十世纪所崇尚的“晦涩”、“繁复”相比，“简洁、明晰、纯净”的加缪简直就是

"没有什么艺术性"。

然而加缪毕竟是有艺术性的，假使所谓"艺术性"不等于雕琢、华丽、标新立异或追逐时髦之类。加缪的艺术性在于"有度"。

"风格乃是人本身"

加缪是本世纪少有的自觉追求风格的作家。

说到风格，布封的名言尽人皆知，然其恒遭曲解却是知者寡。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吾国论者言及'文如其人'，辄引Buffon语（Le style, c'est l'homme）为比附，亦不免耳食途说。Buffon初无是意，其Discours仅谓学问乃身外物（hors de l'homme），遣词成章，炉锤各具，则本诸其人（〔de〕l'homme même）。'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本诸己以成文。"①考布封初衷，确谓知识、事实、发现等皆身外物，唯风格乃是人本身（Ces choses sont hors de l'hemme，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因此，风格乃是作者在其思想的表达上打上自己的印记，故"风格不会消失，不会转移，也不会变质"。② 简言之，文以风格传世，而风格则以人为本。

加缪所追求的风格正是布封所论述的风格，然而又不止于

①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

② 布封：《论风格》。

此，他对“文本诸人”（即“风格乃是人本身”）之“人”作了深入的探索和全新的解释。他指出：“艺术家对取之于现实的因素重新进行分配，并且通过言语手段，作出了修正，这种修正就叫作风格，它使再创造的世界具有统一性和一定限度。”①所谓“修正”，就是艺术家根据人的内在的愿望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纠正”，其表现之一就是艺术家所运用的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而人的内在愿望则是反抗世界的荒诞和寻求现时的幸福。因此，“这种修正是一切反抗者都具有的”。② 这样，加缪就把风格和反抗联系了起来，使之摆脱了纯形式的品格，浸透了人的天然的深刻要求。布封的名言在加缪的笔下，获得了更深厚的现实基础，同时也获得了更超绝的哲学层次。

加缪追求一种“高贵的风格”，一种蕴含着人的尊严和骄傲的风格。他指出：“最高贵的艺术风格就在于表现最大程度的反抗。”③ 这种高贵的风格并不是纯粹形式的，倘若因一味讲究风格而损害了真实，则高贵的风格将不复存在。同时，“高贵的风格就是不露痕迹，血肉丰满的风格化”，④ 而风格化是既要求真实又要求适当的形式的。据此，加缪所谓“高贵的风格”可以归结为互为依存的三种要素：一，给予最大程度的反抗以适当的形式；二，通过纠正现实而获得真实；三，适度而含蓄的风格化。加缪不是那种盲目追求形式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单纯注重思想的作家，他始终要求内容与形式“保持经常不断的紧密联系”。无论是内容溢出形式，还是形式淹没内容，在他看来都会破坏艺术所创造的世界的统一性。而艺术，恰恰是“一种要把一切纳入某种形式的难以实现的苛求”。⑤ 因此，加缪说：“工作

①②③④⑤ 加缪：《反抗者》。

和创作了二十年之后，我仍然认为我的作品尚未开始。”①他一直把“真理和反映真理的艺术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当然，加缪对于“真理”（或“真实”）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申明，“现实主义是不可能的”，② 他反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前者是一种“黑暗的”文学，后者是一种“教诲的”文学，这两种文学实际上都背离了真实。然而同时，他也不止一次地申明，“现实主义的抱负是合理的”，③ 艺术不能“服从现实”，也不能“脱离现实”，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对世界中流逝和未完成的东西的一种反抗：它只是想要给予一种现实以另一种形式，而它又必须保持这种现实，因为这种现实是它的激动的源泉”。④ 这种矛盾其实是一种表面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分歧。例如，他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准确复制现实”，就是“无止境地描写事物”、“无穷尽地列举事物”，等等。而我们知道，现实主义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定义。因此，以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歧义或误解来探讨加缪对现实的态度，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只须指出，加缪的小说绝不缺少现实的内容，恰恰相反，真实是他的小说的生命，只不过如他所说，他的小说同时“给现实加上某种东西，使现实稍有变化”，也就是：“小说的本质就在于永远纠正现实世界。”⑤ 无论是《局外人》对现实的承受，《鼠疫》对现实的解释，还是《堕落》对现实的逃避，都不曾离开人的现实，都是在人的世界中展示人对荒诞的觉醒和反抗。现实经过艺术家的“纠正”成为真实，而“纠正”就是风格化，它“包含了人的干预和艺

① 转引自莫旺·勒白斯克：《加缪》，1976年。

②③④ 加缪：《艺术家及其时代》。

⑤ 加缪：《反抗者》。

术家在复制现实时进行纠正的意志”。①加缪认为,“风格化最好是含而不露”,其本质在于“适度”。加缪的写作艺术的根本在于“恰到好处”,甚至是宁不及而勿过。他在谈及自己的写作时,经常见诸笔端的是“限制”、“堤坝”、“秩序”、“适度”、“栅栏”等表示“不过分”的词。例如,他说:“我知道我本性中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我需要在艺术上为自己树起一道栅栏。”② 或者:“为了写作,在表达上宁不及而勿过。总之是勿饶舌。”③ 这种对于“度”的自觉,使加缪为文有一种挺拔瘦硬的风采。

总之,加缪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其风格可以称为“高贵的风格”。

《局外人》与“含混”

《局外人》1942年出版后,很快就得到萨特的好评。根据他的解释,《局外人》是对“荒诞”的证明和对资产阶级司法的讽刺。然而,后来的批评家纷纷越过了萨特的解释,他们发现了《局外人》的“含混”。

现代批评家普遍认为,“含混”是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之一。作家有意识地运用“含混”,读者不固执地追求唯一的理解,则作品将变成一个含义深远的多面体。加缪曾经写道:“至少要为使沉默和创造都臻于极致而努力。”④ 沉默不是虚无,而是富于

① 加缪:《反抗者》.
② 加缪答加布里埃尔·多巴莱德问.
③ 加缪:《手记》第一卷.
④ 加缪:《手记》第一卷.

蕴含的情状，仿佛“此处无声胜有声”，创造当然也不是基于虚无的创造，而是打开沉默的硬壳。沉默与创造之间的桥梁将由“含混”来架设。《局外人》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侧面的“含混”，其中沉默和创造都已臻于极致。

加缪自己谈到《局外人》时说：“局外人描写的是人裸露在荒诞面前。”①他也曾这样概括《局外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凡在母亲下葬时不哭者皆有被判处死刑之危险。”② 看来，萨特的评论与作家的自述相去不远。但是，此后四十年间，局外人探索《局外人》的含义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有的批评家从政治角度考察作者对阿拉伯人和法国殖民政策的态度，认为这部小说更应叫作《一个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而阿拉伯人被杀则表明法国人“对一种历史负罪感的令人惶惑的供认”；有的批评家从精神分析的理论出发，把默而索看作是现代的俄狄甫斯；还有的批评家把默而索的经历看作是一种想象的心理历程，等等。这种主题的多义性来源于作者置于情节中的许多空白和人物行为的机械性。

人物行为的机械性很容易使浅尝的读者得出这样的印象：默而索是一个满足于基本生理需要的人，他对外界的反应是直接的、感性的、机械的，他的推理能力低于常人，他是一个不好不坏的化外之人，是一个希望远离社会而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然而事情似乎不这么简单。假使读者仔细阅读并且不放过作者似乎不经意的若干提示的话，他会发现默而索并不是一个生活在世外桃源中的人。他受过高等教育，推理的能力显然优于周围的人，而且当他“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之后，立刻

① 加缪：《手记》第二卷。

② 加缪：《局外人》美国版序。

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的寡言，他的冷漠，直到他的愤怒，原来都是他对环境的自觉的反应。他不想装假，不想撒谎，不想言过其实，不想用社会的惯例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他是个“局外人”，然而何谓“局内”？何谓“局外”？这内与外以何为参照？批评家们曾经把他看作自然人、野蛮人、荒诞的人、精神低能的人，或者是理性的人、清醒的人、现代的人，等等。就每一种人来说，默而索作为小说人物都是清晰的，然而就总体来说，这位小说主人公却又是含混的。不同的批评家都有充分的证据勾划出一个活生生的默而索来。因此，默而索的面目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这中间的矛盾正说明这一文学形象的丰富性。

这种蕴含丰富的矛盾不难表现在人物性格上，小说的叙述角度更使批评家感到既惶惑又兴奋。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谁在说话？是默而索还是作者？如果是默而索，那么他在何时何地说话？如果是作者，那么他是同情还是谴责默而索？或者，作者与默而索合一还是与叙述者合一？这些问题使《局外人》这部小说表面上极为清晰的语言变得模糊而含混。

小说的开始是这样一段话：“今天，妈妈死了。”小说的结尾，则是默而索在狱中等待着处决的“那一天”，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数日以后。小说从开始到结束，粗粗算起来，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矛盾就出现在这里。如果确认是“今天”说的话，此后的事情皆属想象；如果确认默而索是在临刑的前夜回忆往事，那就不能说“今天，妈妈死了”一类的话。于是有的批评家根据小说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文体的区别，认为第一部乃是日记，第二部才是完整的逻辑的叙述。也就是说，捕前的经历是逐日记载的，事件既无动机，彼此间也没有联系，直到“我”杀了人，才突然意识到叩开了“苦难之门”。捕后的经历则不同，“我”已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所述之事井然有序，推理过程也十分

清晰。然而，这仅仅是对小说的时序颠倒的一种解释，批评家们还有其它多种解释，例如有论者以为默而索的独白乃是一种“伪独白”，不可以正常的逻辑绳之；有的论者认为说话的并不是默而索，而是某个自称“我”的人在讲述一个叫默而索的人的故事；还有的论者认为，作者要使读者有亲睹亲历之感，于是扭曲时序而在所不惜，等等。无论如何，这种时序的扭曲使这部小说呈现出一种言简意深的风貌，仿佛冰山，所露甚小，所藏却极大。

《局外人》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是含混的，具有两重性，例如太阳。太阳这一形象如同大海、土地、鲜花等，在加缪的作品中象征着生命和幸福，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财富，取之不费分文。总之，太阳是一种善的象征。然而在《局外人》中，太阳的象征意义却非此一端。的确，太阳依然是美的、善的，当“天空是蓝色的、泛着金色”的时候，它可以让人感到舒适；它也可以把女友的脸“晒成棕色，好象朵花”，让默而索看着喜欢；它也可以适度地炎热，让游泳的人“一心只去享受太阳晒在身上的舒服劲儿”。然而太阳有它的反面，不是阴影，而是超过了某种限度。它可以使“天空亮得晃眼”，把默而索“弄得昏昏沉沉的”；它可以是“火辣辣的”，晒得土地“直打颤”，既冷酷无情，又令人疲惫不堪；由于阳光过分地强烈，人“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真是进退两难，没有“出路”；它也可以“象一把把利剑劈过来”，让人觉得刹那间“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的气息”，默而索抵抗不了这气息的力量，他失去了平衡，他也用枪声“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于是，“一切都开始了”，开始的首先是“苦难”，其根源正是默而索酷爱的太阳，那使他感到幸福的太阳。

此外，默而索被捕前后呈现出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特点恰恰是含混和表里不一。捕前，默而索作为一名小职员生活在流水般的日常世界，他周围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各自的工作。他们的忙禄和烦恼，他们的很少变化的单调生活，他们的许多毫无意义的言谈，无论如何总是构成了一个活跃的、真实的人的世界。人们有小小的痛苦，也有小小的幸福，至少有感官的愉悦。捕后，默而索却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里的人只有职务而没有名姓，例如预审推事、检察官、律师、记者、神甫等等，这些人似乎并不是作为人而存在，他们是某种职务的代表，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扮演某种角色。这个表面上有条理，合乎逻辑的世界实际上是虚假的、做作的，是一个非人的世界。这时的默而索是个有逻辑的人，却又同时是个置身局外的人。

总之，上述种种含混，即主题、人物、象征、叙述方式和小说世界诸方面的含混，使《局外人》成为一个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的整体，似乎有不可穷尽的意义，给各种历史条件下的读者都带来了探索的乐趣。

《局外人》曾经被认为是清晰的、简洁的、透明的，是现代古典主义的典范，然而它的有意的单调、枯燥和冷静却打破了这种直接的印象，随着阅读的深入而逐渐剥露出深刻而复杂的内涵，出人意料地展示出含混作为艺术手段所具有的功能。可以说，《局外人》的艺术集中地体现为含混。

《鼠疫》与“神话”

《鼠疫》不称“小说”，而曰“记事”，从构思到成书，历时八

年，1947年出版后一周，即获批评奖，两年内就再版八次，印行十六万册，迄今已有四百多万册书落入各阶层各年龄的读者手中。一部没有女主角的小说会有这样广大而持久的读者群，在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非有震撼人们灵魂的力量才行。这种力量的产生，不能只靠触及时代的热点，还需要有某种更深刻、更久远的原因，这也许只有在神话中才能找到。

加缪在构思写作《鼠疫》时所悬的目标，正是神话。他要创造一个神话，他也要通过神话来表达他的思想。在这里，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他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一些不说谎的人，也就是非现实的人。他们并不在这世界上。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迄今仍非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小说家，而是依据其激情和焦虑创造神话的艺术家。”①创造神话不是讲述故事，神话追求的是普遍性和超越性，不怕单调和重复，而故事追求的是曲折性和生动性，最忌枯燥和抽象，然而对于人的灵魂具有震撼力的却是神话而不是故事。加缪所赞赏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就是一位神话的创造者，埃哈追捕白鲸莫比·迪克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人与恶搏斗”、关于“促使人先是反抗造物及造物主、继而反抗同类和自己的那个不可抗拒的逻辑”的神话②。《鼠疫》亦可作如是观。加缪在写作伊始就做了如下的表述：“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时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③一语破的，创造神话的意图朗然若揭：鼠疫已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传染病了，它成为象征，而且

① 加缪：《手记》。

② 加缪：《赫尔曼·梅尔维尔》。

③ 加缪：《手记》。

是多层面的象征，举凡纳粹、战争、人生的苦难（疾患、孤独、离别等等）、死亡、恶都可以在这巨大的象征中占一层面。正如作者为这本书选择的题辞所言："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丹尼尔·笛福）加缪取了两种，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人抵抗恶的神话。

既然是人抵抗恶，那就离不开人及其生存的世界。加缪十分注意耕耘神话的土壤，让象征在现实中扎根。他指出："象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一样，梅尔维尔把他的象征建立在具体之上，而不是在梦的质料之中。神话的创造者具有天才的特性，仅仅是因为他将神话置于厚实的现实之中，而不是置于想象的流云之中。"①于是，加缪也如同《白鲸》的作者一样，让他的《鼠疫》充满现实世界的无数准确逼真的细节，让日常生活的平淡的风在其间吹拂，从而更见出与恶相搏之惊心动魄：这是寻常百姓的英勇和尊严，有顶天立地之慨，而无叱咤风云之态。在加缪的笔下，病鼠的垂死挣扎，患者的痛苦煎熬，医生们的努力，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以及封城之后市民的种种反应，咖啡馆、电影院、商店等场所的反常的热闹，黑市的猖獗，等等，这一切都被以一种无可挑剔的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准确地呈现出来。有些场面，例如里厄医生与妻子在车站告别、格朗望着橱窗中的木刻玩具泪流满面等，都具有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的确是平淡之中涌动其激情，是日常生活中时时可以见到的。正是在这种厚重的现实的基础上，加缪构筑了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这是某种抽象，某种升华。没有女人的世界是无法呼吸的世界，是恶肆虐的世界，是必须激励人们奋起抗争的世界。加缪就这

① 加缪：《赫尔曼·梅尔维尔》。

样进入了神话世界，把对于鼠疫的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即人生本相。在《鼠疫》中，现实与神话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现实是神话笼罩下的现实，神话是现实支撑着的神话，其结合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加缪说：“艺术拒绝日常的真实，就失去生命。然而这生命虽属必要，却并不充分。艺术家不能拒绝现实，是因为他必须给予现实以一种更高的证明。”①神话的创造不就是对于现实人生的一种更高的证明吗？

《鼠疫》被称为“记事”，其人物塑造也很少求助于想象，然而这也许正是神话人物的特点：真实但不求细腻，鲜明但不求独特，生动但不求丰满。批评家也许可以指责作者多少把人物当成了某种观念的载体，但他绝没有理由说这些人物是些苍白的概念和没有生气的木偶。加缪原本无意于塑造单个的典型，把人物搞得血肉丰富栩栩如生，因此也极少施笔墨于人物形体的刻划和音容笑貌的复制，然而他决不放过人物精神活动曲线的每一个起伏或转折。这使他笔下的人物虽面目不清却跃然纸上，虽线条粗略却真实可信，并没有传声筒的毛病。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使这些人物很自然地进入读者的生活，只要人还需要与恶抗争，而这种抗争看来是永远需要的。这正是神话人物的特殊的魅力：人们只是相信其存在，而不必知其头发为棕色还是金黄，其眼睛是灰色抑或蓝色。例如医生里厄，他既能思想，又能行动，他以清醒的头脑和果决的毅力参加一场必须的战斗。他并不抱有任何幻想，也不自诩“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他只是履行医生的职责：“对人的健康感兴趣”，做好“本分工作”。他的勇气是一个普通人的勇气，但我们知道，普通人的勇气在为了生命和正义而斗争的时候可以产生

① 加缪：《艺术家在狱中》。

出多么惊人的力量。塔鲁则不同，他为了躲避精神上的鼠疫和追求“内心安宁”来到这座丑陋的城市，他的目标高得吓人，他要做一个“不信上帝的圣人”，他需要某种非常的事件来显示和保持他精神上的卓越，因此他感到“做一个真正的人”更为困难。作者对他有着很深的敬意，然而并不把他推荐为可以仿效的榜样。格朗这位事业上和爱情上都未获成功的小职员，却以其正直甚至平凡赢得作者的同情甚至敬重，他那近乎可笑的对于完美的追求终于因意识到限度而未演化为愚蠢的虚妄，使他能够“一本正经地再不去想他的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作者把“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推荐为“英雄的榜样或模范”，这绝不是无谓的调侃，而是“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还有那位新闻记者朗贝尔，他因采访而滞留病城，一心想着的是出城与情人相会，并不认为鼠疫与他有什么相干。他追求的是幸福，然而他终于认识到：“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他加入了抵抗鼠疫的战斗。帕纳卢神甫开始时将鼠疫看作上帝对人类的“集体惩罚”，号召信徒们谦卑地接受，因为他不相信“徒劳无功的人类科学”，但是无辜的儿童的死使他受到震动，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他因拒绝治疗而死于鼠疫，这无谓的死告诉人们，以顺从代替斗争会导致什么。然而，在这场人与鼠疫的殊死搏斗中，真正应该受到蔑视的只有那个形迹可疑的科塔尔，因为只有他是与鼠疫“合作”的。总之，《鼠疫》中的这些有名有姓有言语行为的人物代表了人在恶的面前所可能有的种种表现，他们使人抵抗恶这一古老的神话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其中注入了人们经历过的或可以想象的生活真实。

《鼠疫》的语言朴素明快，从容不迫地记述了这一场灾难的兴衰起伏。口吻的平淡与事件的巨大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这

是加缪向斯丹达尔等古典作家学习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切神话都具有的明显特征。没有故意制造的效果，没有耸人听闻的夸张，也没有精心编织的悬念，有的只是老老实实的见证和平平常常的思考，然而深刻的哲理恰恰蕴藏在这里。真理不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上，也不在玄奥难解的说教里，真理就在人们生活的大地上，就在人们每日的烦恼和欢乐中。这也是那些伟大的神话早已告诉人们的东西。

《堕落》与象征

加缪似乎对文类有着特殊的敏感，《局外人》被称为“小说”，《鼠疫》不称小说而称“记事”，《堕落》也不称小说，它被称为“叙述”。法国批评家让-约瑟·马尔尚参照纪德的说法，对“叙述”和“小说”的区别做了如下的界定：“叙述依照陈述的规则再现事件，小说则依事件本身的顺序向我们展示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借助于这种说法大致将纯小说和纯叙述区分开来；小说正在发生，叙述已然发生；小说逐渐地向我们提供一种性格，叙述则解释之；小说眼看着事件发生，叙述则使人认识之；小说是由活跃的下文组成的，叙述则由原因组成；小说展开于现时，叙述则阐明过去。这些看法的第一个后果是，如果主人公是人，叙述更注重研究一种危机（它并加以解释），小说则没有非此不可的主题，其主人公总是人。萨特认为纪德完全有理由指出：小说是‘一种不断的涌现，每一章都应提出新问题，都应是出口，是方向，是激励，是读者的精神的一段向前延伸的堤’。”①简

① 转引自米谢尔·莱蒙，《大革命以来的小说》，

言之，小说偏于呈现，叙述偏于解释。但是文学的事实证明，小说与叙述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有时甚至并不是清晰的。《堕落》名为叙述，说明加缪有解释的意图，他要让读者理解什么事情；但是《堕落》也有不少小说的因素，如人物的心理分析、环境描写等等。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堕落》的小说因素通过象征的运用而融进了叙述，并使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复杂的象征。

与《局外人》和《鼠疫》相比，《堕落》呈现出一种令熟悉加缪的读者感到惊讶的新面目：一种加缪从未有过的尖刻与痛苦交织的嘲讽的口吻，一种心灵受过创伤的、遏制不住报复心理的人的怨毒的口吻。然而，加缪对语言的苛求和对人性的挖掘却一仍其旧，并且由于广泛地运用象征而在《堕落》中强化了《局外人》所具有的含混和《鼠疫》所具有的神话意识，并且因此而使《堕落》摆脱了因纠缠个人恩怨而可能产生的偏颇。象征使《堕落》避免了狭隘性，获得了普遍性。

地域作为象征，在《堕落》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加缪是一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其创作基本上以北非为背景，阳光和大海是他最喜欢的地域景观，几乎成为他的作品主题的永久的伴随物。但是，《堕落》的背景却是荷兰，这个“黄金和烟雾的梦”一样的地方，“被雾、冰冷的土地以及洗衣盆一样冒着气的大海包围着”的国度；是玛尔肯岛，这个“了无生气的地狱”；是阿姆斯特丹，它那“同心的运河好象地狱之圈”，而且是“最后一圈”，但丁留给叛徒的那一圈。这正是北非的明媚的阳光和清凉的大海的反面，是“否定之景”。在加缪的笔下，这种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景观正是现代世界的象征。与之相对，加缪没有忘记还有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是爪哇，“遥远的岛屿”，“在那些岛屿上，人们死的时候疯狂而幸福”；那是希腊，“那儿

的空气是贞洁的，大海和娱乐是明朗的”；那是“太阳、海滩、信风吹拂的岛屿，回忆为之绝望的青春”。这种种美好的所在象征着人们的追求和向往。两种地域的对立为《堕落》提供了总体的框架，展示出人类的生存环境：苦难是他每日的伴侣，幸福只存在于怀念和向往之中。

《堕落》中的象征又以具体的形象为载体，有时取自《圣经》或传说，如“鸽子”之类，有时则取自与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日常景物，如桥、水，等等。前者意境幽邃，发人深省，后者则自然生动，并且饶有讽刺意味。例如桥。克拉芒斯第一次失去心理平衡是因为在塞纳河上的艺术大桥上听见身后升起一阵“笑声”，后来又回忆起二年前曾在塞纳河上的王家大桥上见死不救。两件事都发生在桥上，他因此而发誓夜里永不过桥。桥在这里成为某种自觉意识的触媒剂。有趣的是，克拉芒斯逃离巴黎，选择了阿姆斯丹作为隐居地，然而阿姆斯特丹却是个运河之城，拥有一千一百座大大小小的桥。一个人除非不动，动则必须过桥。克拉芒斯躲开了两座桥，却陷入更多的桥的包围之中。他纵使可以永世不再过桥，却断然不能不谈到桥，不想到桥，桥于是而成为一种顽念，时时压迫着他，折磨着他，使他谈桥色变而不能不处于永恒的自责之中。桥之为象征，明矣。有桥则有水，神秘的笑声与溺水的女人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克拉芒斯既已陷入桥的重重包围之中，就必然要受到流水的无休止的追逐。果然，我们听到了他的惴惴不安的告白：“几年前，在我背后，在塞纳河上回响着的喊声，被河水带着奔向海峡，不断地在世界上前进，越过大洋无边的水面，正在这儿等着我，直到这一天我碰到它。我也明白了，它将继续在所有的海上、河上等着我，总之在我苦涩的洗礼水所在的任何一处等着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负罪之人逃脱不了惩罚，而惩罚

总能等到负罪之人自投罗网。水之为象征，亦明矣。

精神的错觉或幻觉如果成为象征，可以具有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的作用，一倒俱倒，连锁反应。例如克拉芒斯某夜在艺术大桥上听到的那一阵“背后的笑声”。这笑声先是从水里发出，继而又在他身体的某处响起，这当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实际存在的笑声，只不过是克拉芒斯的双重人格得以暴露的某种契机而已。加缪论荒诞时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可笑的开端。伟大的作品常常诞生在一条街的拐角或一家饭馆的小门厅里。荒诞也如此。”①我们说：觉醒也如此。那种笑声可能随时随地都存在，只是人们往往不注意、听不见罢了，正如克拉芒斯所说：“这声音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是一种善意的、自然的、几乎是友好的笑声……”然而，正当一个人感到满足、精神放松戒备的时候，这笑声就能乘虚而入，或从外面某个地方冒出，或在自己身上某个地方响起，实际上，这是精神感到的笑声，并不是耳朵听到的笑声。波德莱尔指出，“在人来说，笑是意识到他自己的优越的产物”，“是包含在象征苹果中的许多籽仁之一”。② 克拉芒斯听见了笑声，这意味着他已失去了优越，成为别人讪笑的对象。这笑声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威力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自信，或者撕去一个人的假面。

人物行为的象征性是《堕落》的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举凡克拉芒斯的乐善好施、攀登高峰、喜欢岛屿、试图中止审判、当法官、忏悔者、隐匿《神秘的羔羊》，等等，都具有可以向多方面延伸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克拉芒斯的对话，更具独特的风采。这是一篇对话，但对话者并无缘置喙，只剩下克拉芒斯一

①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② 夏尔·波莱尔德：《论笑的本质并泛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

个人喋喋不休，然而又并非一篇独白，克拉芒斯想尽一切手段诱使那不出声的对话者落入圈套，读者因此感到分明有一对话者在。主人公与一个无言的对话者对话，这种手法早已见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但加缪别出心裁，令对话者于篇末暴露身份，原来也是一位巴黎的律师，与克拉芒斯同操"这一美妙的职业"。有论者认为，所谓对话其实并不存在，是克拉芒斯在顾影自言。准此，则克拉芒斯的"虚假对话"立刻显出其象征性：克拉芒斯在努力解脱自身的梦魇，并在其失败中显露出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当代英雄"——的堕落。他原本希望对方是警察，或可将他逮捕乃至斩首，以便结束"在荒原中呼喊而拒绝走出去的伪预言家的生涯"。他失败了，他还将继续充当那什么也不能预言的伪预言家的角色。克拉芒斯的"虚假对话"象征着某种结束堕落状态的徒劳无功的努力。

《堕落》的象征，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人类世界的某种总体象征。

《流放与王国》与技巧作为工具

加缪在为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1957年）写的一则出版说明中指出："这个集子包括六个短篇：《不贞的妻子》、《叛教者》、《沉默的人们》、《来客》、《约拿》和《生长的石头》。不过主题只有一个，即流放，然而处理的方式却有六种，从内心独白到现实主义的叙述。"这里，他实际上是说，他运用了六种小说技巧处理了六种流放的方式。

"不贞的妻子"雅妮娜在一次不情愿的旅行中，偶然地发现游牧民族的生活具有一种粗犷自由的美，与自己的平庸猥琐的

市民生活相比，一个是“王国”，一个是“流放”，形同霄壤。她于是有所悟，深夜中只身遁入旷野，让“整个天宇在她的身上展开”，与大自然达成神秘而短暂的默契。这是一种奇特的“不贞”。加缪运用了严格遵守时序的叙述，以众多而真实的细节——景物以及过去极少见的有关人的形貌的描写——为支撑，从容不迫地渐次透露出种种信息，使读者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他又不失时机地推出富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或动作，使高潮出现之前布满“富于包孕的时刻”，例如：“雅妮娜觉得，整个天空响彻一个洪亮、短促的乐音，其回声渐渐充满她头上的空间，然后嘎然而止，留下她和这无边的原野默默相对。”我们可以想象，在这“默然”之中，雅妮娜已打定了主意。她此时已铸成了自己的“不贞”，那星夜旷野中的一幕实际上成为弦上之箭，只是待时而发罢了。雅妮娜的故事是个极平凡的故事，加缪写来却极有感情，却又出之以极冷静的笔触，反差中呈现出一种“令人不能自持”的神秘美，有寓言的风致。

《叛教者》中，读者所见唯有一片光怪陆离的意识的流动，通篇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的无声的独白，只最后一句是客观的描述，如天外飞来，除了点明这奴隶杀了传教士之后仍旧是个奴隶之外，又留下一个难解的疑团。这是一个改宗者的故事，他不愿徘徊在善与恶之间，他怀着扬善的目的来到崇拜恶的地方。他的善不敌异邦的恶，他于是叛教而投入新主人的怀抱。然而，他又面临着再次改宗的屈辱。他没有被杀死，没有成为殉教者的幸运，他始终是个奴隶，他被割去舌头，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但他头脑中又生出另一个“舌头”，他还有意识能够流动。外部的事件，内心的活动，在一系列热得烫人的形象中交织成闪烁的一片，暴露出一个倾向于极端思想的人的可怕的精神世界。这篇小说结构严谨，于混乱中见出秩序，颇能表现出

“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的情状。其实他们精神并没有错乱，只是趋向极端，进入了绝境。他的无声的独白无异于忏悔，这忏悔因借用了大量极富象征意味的形象而具有多向的启发性。“叛教者”处于流放之中，他的王国看来极为渺茫。

“沉默的人们”，正是加缪最熟悉也最感亲切的那些人，具体地说，那些制桶工人。他们因罢工失败而心怀怨恨，他们在大工业的挤压下面临改变职业（然而他们是多么珍爱他们的手艺啊！）的威胁，他们与老板的关系因利害的冲突而遭受扭曲，然而他们最终在老板的女儿的病痛面前打破了沉默，这一切都被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这篇小说写的是复工的第一天，从伊瓦尔上班到下班，整整一天，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呈现出途中的景色、工厂里的气氛、劳动的场面以及工人们对老板的女儿生病这一事件所作的反应，其间很自然地插入伊瓦尔的心理活动，使经过精心选择的大量细节具有活跃而浓郁的生活气息，并且折射出更为广阔的生活场景。加缪对人物着墨不多，但有名有姓的人有七、八个之多，都各有性情，颇为鲜明，从主人公伊瓦尔的眼中看去，都显得有血有肉，颇为生动。通篇小说用语朴实无华，对话直截了当，与劳动世界十分相合。小说的结尾透露出某种愿望：“到大海的那一边去。”似乎是对王国的朦胧的追求。《沉默的人们》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尽管它的作者反对现实主义。

《来客》的特点是具体、丰富、细腻的环境描写，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和深化主人公的孤独感。这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学教师达吕对于这环境始终处于不断的选择之中。就自然环境而言，他选择了这片荒凉贫瘠的高原，并且曾经“觉得自己象个大老爷”，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到了别的地方，他就有流放之感”。加缪在其它作品中从未对景物用过如此多的

笔墨，荒原、石头、雪、酷烈的太阳，众多的形象组成这个与人极不友善的世界，从而也更衬托出主人公的选择的严肃性：这里就是他的“王国”。然而，社会环境却使他的选择成为一个泡影：他被迫要在把犯人交往当局和放犯人逃走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然而他遭到误解，因此，他又失去了他的“王国”：“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的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社会环境描写之细腻，在加缪来说，也不曾出现在别的作品中，例如小学教师达吕和阿拉伯犯人共居一室时的表现，被描写得极有曲折感。环境是具体的，人物也是具体的，其心理活动也有具体的历史背景，然而，加缪通过具有象征性的细节和情境而淡化了政治的色彩，突出了普遍的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难。“沙漠的门户”、“通往监狱的道路”、“穿过高原的路”、“曲曲弯弯的法国河流之间”、主客共居一室，犯人自投罗网，等等，都有深广的象征意义。《来客》这篇小说节奏虽然徐缓，但内涵却相当丰富，有一种致密感，这使它有别于《沉默的人们》那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尽管它们细节描绘显然是现实主义的。

初读，《约拿》讲的是一个“身为名累”的故事，一个画家的艺术生命如何断送于盛名之下。但是，作者在调侃中流露出的愤懑提醒我们：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笑话，它所寄托的思考是极为严肃的。“孤独还是团结？”这个困扰着约拿的问题也同样地困扰着所有的人。小说的口吻是调侃的，渐渐地转向严肃，仿佛一束可调的灯光，于不知不觉中突然照亮了主人公心中的疑团。读者的疑问生于阅读的结束，不由他不于讽刺和幽默中寻求更深刻的含义。于是，他很自然地看出：“不应该再说某人坏或丑，而应该说他想坏或想丑。”这样一句随口说出的话原来是暗指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作者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约

拿的结婚，找房子，电话，朋友的来访或邀请，在各种宣言上签名，最后被逼上自搭的阁楼，等等，这些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无一不间接或直接地与那个问题相联系，作者的忧虑实际上也在逐步深重。叙述口吻与所述事件之间的不协调，这是加缪从斯丹达尔那里学到的技巧，在这里又一次得到充分的运用。《约拿》这篇小说中没有多少细节，也没有多少对话，一切都在大跨度的时空变化中被叙述出来，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更注重的是形象或事件的象征性。这是一篇现代寓言。形象的血肉和鲜明，情节的曲折和完整，细节的丰富和真实，都不是作者所追求的，而调侃的笔调，幽默的口吻，真真假假的格言警句，虚虚实实的环境氛围，却明显透出作者的苦心。

《生长的石头》也许是集中最精采的一篇，开头即以有限的环境描写，使读者自然地站在主人公的位置上，用他的眼睛看世界；结尾又出人意料，顿时使主题凝聚升华，读者甚至可以暗自惊讶：怎么不知不觉地跟着主人公走到那茅屋里去，并且和他一样感到“心头充满了纷乱的幸福之感”。作者在叙述中虽取第三人称，但并非置身于读者和主人公之上，而是以主人公的视角与视界为准，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能够尽可能地贴近主人公，并因此而尽可能地贴近作者。实际上，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主人公和读者是渐渐地趋向融合的，他们的近乎一致的视角使小说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同时也使那些富有质感的形象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例如，“蒙上了水气的星星在黑色的天空中颤动”，“几只毛色发黄的黑秃鹫热得一动不动”，“沉重的河水”，等等。这种带有抒情性的形象描绘真实而生动地传达出主人公内心中的骚动，他似乎在躲避和追寻着什么。在加缪的全部小说中，唯有《生长的石头》和《不贞的妻子》这两篇对于景物给予了如此丰富而饱满的笔墨，此种对

于大自然的追求意味着对另一个世界的追求，即对“王国”的追求，因此这两篇小说中那些经过精心选择的形象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然而，就主人公的态度而言，却有主动与被动，进取与退却的区别。在《生长的石头》中，形象更丰富，更具体，象征性更深远，更复杂，因此，所呈现出的“王国”的氛围也更浓重，更实在。《生长的石头》更具有神话色彩。

总之，《流放与王国》并不是人们通常习见的那种汇集，若干不相连属的作品的小说集，而是一个有联系、有不同侧面的整体。加缪所采用的不同的小说技巧都是为这个整体服务的，并在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上各有侧重，有时又有交替重合。《流放与王国》因篇幅短小，不大为论者所重视，但平心而论，就艺术技巧而言，的确称得上“纯熟”。

就小说艺术，曾有人向加缪提过这样的问题：“《堕落》与‘新小说’的探索有什么关系？”加缪的回答可以被视为他的小说观，也可以作为“加缪与小说艺术”这一论题的结论。他是这样说的：“对故事的兴趣与人本身共存亡，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总是寻求新的方式来讲述，您提到的那些小说家①有理由开辟新的道路。就我个人来说，所有的技巧都使我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不是技巧本身。比方说，如果我想写的作品需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您所说的这种或那种技巧，或者兼而用之。现代艺术的错误几乎总是使手段先于目的、形式先于内容、技巧先于主题。如果说我酷爱艺术技巧，如果说我试图掌握所有的艺术技巧，那是因为我想自由地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工具。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堕落》与您所说的那些探索有联系。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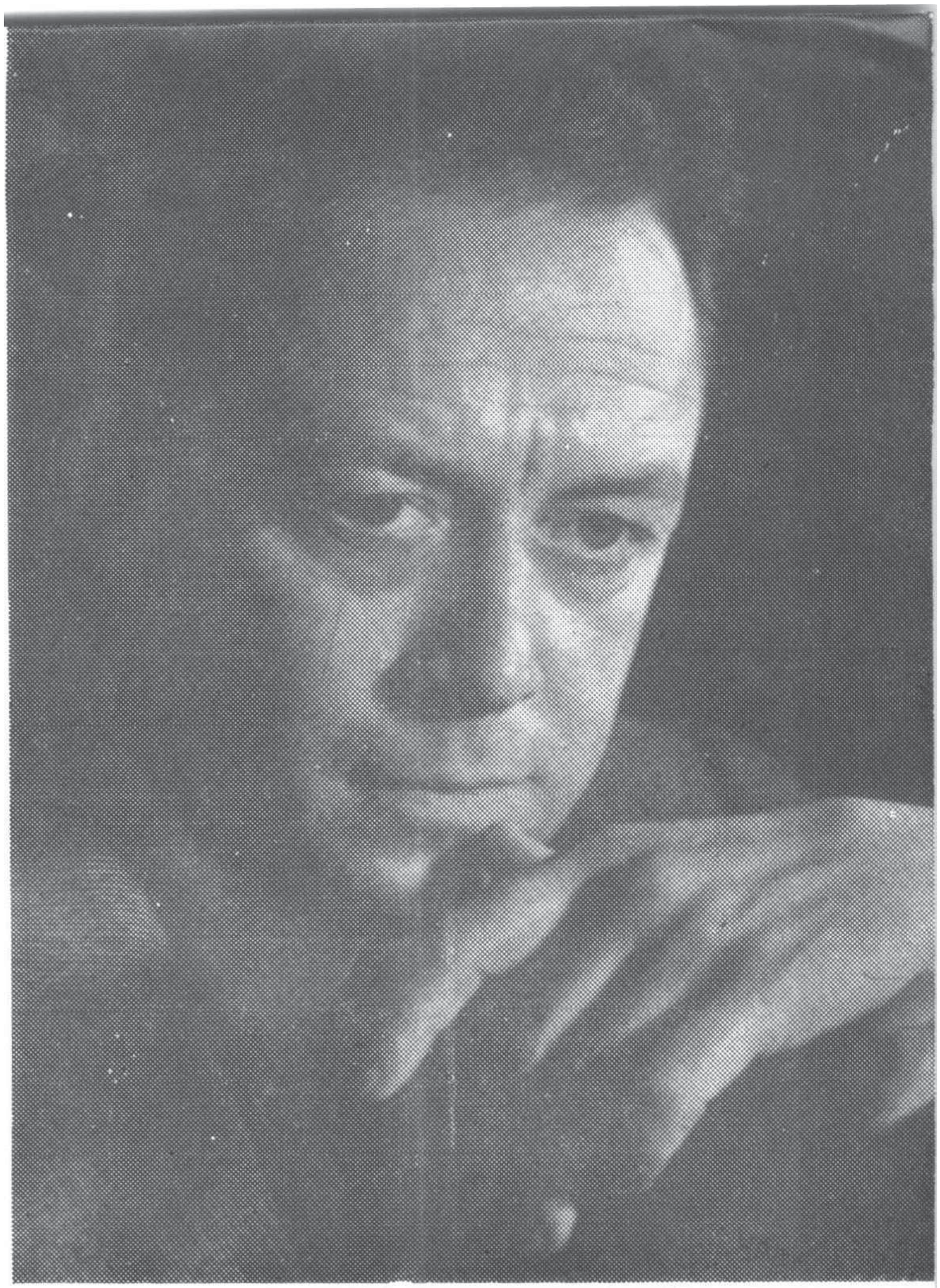
① 指萨洛特、西蒙、罗伯-葛利叶等所谓“新小说家”。

简单得多。我运用了一种戏剧技巧（戏剧化的独白和潜在的对话）来描绘一个悲剧性的喜剧演员。一句话，我使形式适应主题。”

一语破的，“加缪与小说艺术”可以变成“加缪的小说艺术”了。

1988年7月

北 京



〔法国〕阿尔贝·加缪（1913—1960）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目 录

译本前言·

加缪与小说艺术……郭宏安

西绪福斯神话（随笔）……郭宏安译（1）

附录：弗朗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99）

散文三题……郭宏安译(111)

反与正……(112)

蒂巴萨的婚礼……(116)

重返蒂巴萨……(123)

局外人（中篇小说）……郭宏安译(131)

鼠 疫（长篇小说）……顾方济 徐志仁译(207)

堕 落（中篇小说）……郭宏安译(471)

流放与王国（短篇小说集）……郭宏安译(549)

不贞的妻子（550）

叛教者（567）
——或一个精神错乱的人
沉默的人们（583）
来客（595）
约拿（609）
——或工作中的艺术家
生长的石头（634）

附　录·
授奖词……安德斯·奥斯特林（665）
受奖演说……阿尔贝·加缪（668）
艺术家及其时代
——1957年12月14日的演说……阿尔贝·加缪（673）
加缪年表……郭宏安编(692)

西绪福斯神话

郭宏安　译

献　　给

帕斯卡尔·皮亚[1]

---

[1] 帕斯卡尔·皮亚，法国当代作家。

我的灵魂啊，勿求永生，
耗尽一切可能的领域吧。
——品达罗斯①
（特尔悲竞技会颂歌之三）

荒诞的推理

本书论述的是一种散见于本世纪的荒诞感，严格地说，并非我们时代尚不熟悉的荒诞哲学。我首先要指出它在哪些地方得力于当代的某些思想，这是一种起码的诚实。我不想掩饰这一点，人们会看到我在整个作品中对此加以引述和评论。

到目前为止一直被当作结论的荒诞，在本文中它却被看作是出发点了，同时指出这一点是有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我的评论中有着暂时的东西，人们不能预料到它所采取的立场。这里，人们只会看到对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思想病所进行的描述。此刻还不曾有任何玄想、任何信仰混入。这是本书的界限和唯一的主张。

① 品达罗斯（约公元前518—442或438），旧译品达，古希腊诗人。

荒诞与自杀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余的，如世界是否是三维的，精神是否有九个或十二个等级，都在其次。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事。但首先必须回答。假使果然如尼采所愿，一个哲学家为了受人尊敬应该以身作则①，那么，人们就理解了这一回答的重要性，因为它后面就是决定性的行动了。这是心灵容易感觉到的明显的事情，但是还应加以深化，使之在人们的思想里清晰起来。

假如有人问，根据什么判断某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为紧迫，我的回答是，根据它所采取的行动。我从未见过一个人为了本体论的理由而死。伽利略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这个真理使他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他就最轻松不过地放弃了它。在某种意义上，他做对了。这个真理能值几文，连火刑使用的柴堆都不如。地球和太阳谁围绕着谁转，从根本上说是无关紧要的。说到底，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相反，我看见许多人死了；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生不值得活下去。我也看到另外一些人为了那些本应使他活下去的思想或幻想而反常地自杀了（人们称之为生的理由同时也是绝好的死的理由）。我由此断定，人生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我指的是驱人去死的问题或者十倍的增强生

① 参见尼采《非现实的考虑》中的《教育者叔本华》第3章。——原编者

之激情的问题，大概只有两种思想的方式，一种是拉帕利斯①的，一种是堂吉诃德的。唯有事实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我们同时得到感动和明晰。在一个既平常又哀婉动人的主题中，可以想象，深奥的、古典的论证应该让位于一种同时出自常理和同情的更为谦逊的精神姿态。

人们从来只是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处理。这里正相反，问题首先在于个人的思想和自杀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行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的沉寂中酝酿着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一天晚上，他开枪了，或者投水了。一个房屋管理人自杀了，一天有人对我说，他失去女儿已有五年，从那以后他变得厉害，此事“毁了他”。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对如此开始的阶段，社会是没有多大干系的。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应该到那儿去寻找它。这是一次死亡游戏，从清醒地面对生存发展到逃避光明，都应该跟随它，理解它。

一宗自杀有多种原因，一般说来，最明显的原因并不是最起作用的原因。人很少（但不排除假设）经过考虑而自杀。触发危机的东西几乎总是无法核实的。报纸常说“隐忧”或“不治之症”。这些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应该知道自杀者的朋友那天跟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否无动于衷。此君正是罪人。因为这足以加速还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的一切怨恨和厌倦② 而走上绝路。

但是，如果说确定准确的时间、确定精神把赌注押在死亡上的细微动作是困难的话，那么，看到行动本身所意味着的后

---

① 法国名将(1470—1525)。他的部下歌颂他的英勇，“死前一刻钟，他依然活着。”

② 我们要借此机会指出本文的相对性。自杀的确可以跟更多赢得尊敬的考虑相联系。例如，在中国革命中，有所谓表示抗议的政治自杀。——作者原注

果就不那么难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在情节剧中一样，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让我们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常用的词上来吧。那只是招认“不值得活下去了”。当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人们不断地做出存在所要求的举动，这是为了许多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习惯。自愿的死亡意味着承认，甚至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可笑性，承认活着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承认每日的骚动之无理性和痛苦之无益。

究竟是什么难以估量的情感使精神失去了其生存所必需的睡眠呢？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所有健康的人都想过他们的自杀，无须更多的解释，人们便可承认，在这种感情和对虚无的向往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

本文的主题正是荒诞和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自杀作为荒诞的一种解决的确切手段。原则上可以确定，对一个遵守常规的人来说，他信以为真的东西应该支配他的行动。因而相信生存荒诞的人就应该以此来左右他的行为了。明确地、不动虚假的悲怆感情地自问这一现实问题的结果是否要求人们尽快摆脱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好奇心。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打算和自己取得一致的人。

这个问题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来，可以显得既简单而又难以解决。但是，简单的问题带来同样简单的回答，明显导致明显，这样的假设却是错误的。首先并且把问题的措辞颠倒一下，如同人自杀或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的解决办法，一种是“是”，一

种是“否”。那就太妙了。但是还应考虑到那个总提问、却没有结论的人。这里我只略带点讥讽味道，因为他们是大多数。我也看见有些人嘴上说“否”，行动起来却好象心里想的是“是”一样。事实上，如果我接受尼采的标准①，他们这样想也好，那样想也好，想的的确是“是”。相反，自杀者却常常是确信生活意义的人。这种矛盾是经常的。甚至可以说，矛盾从来也没有象在相反的逻辑看来如此令人想望的时候那样尖锐。比较哲学的理论和宣扬这些理论者的行为，这是老一套了。但是必须指出，在所有拒绝给予人生一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②、出自传说③的波勒格里诺④、处于假说范围之中的儒勒·勒基埃⑤之外，没有人同意他的逻辑直至否定人生。人们常常为了取笑而提到叔本华在丰盛的餐桌前赞颂自杀。此举毫无可笑之处。这种不把悲剧当回事的方式不那么严肃，但是它最终对当事人作出了判断。

面对这些矛盾和难解之处，难道应该认为在人对生活可能具有的看法和他为离弃生活所做出的举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吗？在这方面我们不要有任何夸张。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更强大的东西。肉体的判断并不亚于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在毁灭面前是要后退的。我们先得到活着的习惯，然后才获得思想的习惯。在我们朝着死亡的一日快似

---

① 参见尼采《反基督者》，第1章；《权力意志》第463页，第476页。——原编者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一个人物。

③ 我听说波勒格里诺的一位竞争者，一位战后的作家，写了第一本书之后便自杀，以求引起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注意。的确引起了注意。但书却被认为低劣。——作者原注

④ 波勒格里诺是犬儒派哲学家，公元165年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后自焚。

⑤ 勒基埃(1814—1862)，法国哲学家，于海上神秘地失踪。

一日的奔跑中，肉体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总之，这个矛盾的本质存在于我称之为躲闪的东西之中，因为这种躲闪既比帕斯卡所说的移开少点什么，又比他所说的移开多点什么。致命的躲闪形成本文的第三个主题，即希望。对另一种“值得生存”的生活的希望，或对那些活着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以致超越生活并使之理想化的人的弄虚作假，它们都给予了生活一种意义，并且也背叛了生活。

这样，什么都把问题弄得复杂了。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在玩弄词藻，装作相信拒绝赋予人生一种意义势必导致宣布人生不值得过，而且这也并非徒劳。事实上，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尺度。只是应该不要被上述的混乱、不一致和不合逻辑引入歧途。必须排除一切，直奔真正的问题。人自杀，因为人生不值得过，这无疑是一个真理，不过这真理是贫乏的，因为它是一种自明之理。然而，这种加于存在的凌辱，这种存在被投入其中的失望，是否来自存在的毫无意义呢？它的荒诞一定要求人们通过希望或者自杀来逃避它吗？这是在排除其余的一切的同时需要揭示、探究和阐明的。荒诞是否要求死亡，应该在一切思想方法和一切无私精神的作用之外，给予这个问题以优先权。差异、矛盾、“客观的”精神总是善于引入各种问题之中的心理，在这种探索和这种激情中都没有位置。其中只需要一种没有理由的思想，即逻辑。这并不容易。合乎逻辑是轻而易举的。但把逻辑贯彻到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死于自己之手的人就是这样沿着他们感情的斜坡一直滚到底的。关于自杀的思考使我有机会提出我感兴趣的唯一问题：有一个一直到死亡的逻辑吗？只是在不带混乱的激情而单凭明显的事实的引导来继续我在这里指明其根源的推理的时候，我才能够知道。这就是我所谓的荒诞的推理。许多人已经开始了。我还不

知道他们是否在坚持。

当卡尔·雅斯贝尔斯①揭示了使世界成为统一体之不可能时，喊道："这种限制把我引向自我，在那里，我不再躲在一种我只会表现的客观的观点之后，在那里，自我和他人的存在都不再能成为我的对象了。"② 他在许多人之后又让人想起思想已达其边缘的那些荒凉干涸的地方。在许多人之后，大概是这样吧，但有多少急于摆脱困境的人！许多人，而且还是最卑微的人中的许多人都到达过这个思想摇摆的最后的拐弯处。他们于是放弃了他们曾经最为珍贵的生命。另一些人，他们是精神的王子，他们也放弃，但他们进行的却是他们的思想在其最纯粹的反抗中的自杀。相反，真正的努力在于尽可能地坚持，在于仔细考察这遥远国度的怪异的草木。持久性和洞察力是这场荒诞、希望和死亡相互辩驳的不合人情的游戏中享有特权的观众。这个舞蹈既是基本的，又是细腻的，精神可以先分析其形象，然后再阐明之，并且再次亲身体验之。

荒 诞 的 墙

象伟大的作品一样，深刻的感情总是包含着比它有意识表达的更多的意义。在行动和思想的习惯中，到处都存在着心灵中的运动或排斥的恒定，它并在心灵自己也不知道的后果之中

① 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② 语出海德格尔《存在的哲学》，转引自雅娜·海尔什《哲学的幻象》，阿尔康版，1963年，第157页。——原编者注

继续进行下去。伟大的感情到处都带着自己的宇宙，辉煌的或悲惨的宇宙。它用激情照亮了一个排外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到了合适的气候。有一个妒忌的、有野心的、自私的或慷慨的宇宙。一个宇宙，就是一种玄想和一种精神姿态。对于已经专门化的感情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对于作为其基础的不明确的激动来说就更是真实的了，这种激动如同美给予我们的或者荒诞所引起的一样，既模糊又“确定”，既遥远又“现实”。

荒诞感可以在随便哪条街的拐弯处打在随便哪个人的脸上。它就是这样，赤裸得令人懊恼，明亮却没有光芒，它是难得有把握的。然而，这种困难本身就值得思索。这很可能是真的：一个人对我们来说永远是陌生的，他身上总是有某种我们抓不住的不可制服的东西。但实际上，我认识一些人，我从他们的行为、他们全部的行动、他们在生活中走过时所引起的后果认出他们。同样，所有那些分析无从下手的非理性的感觉，我实际上能够加以确定，加以评价，方式是将其后果纳入智力的范围、抓住并记下其面貌、勾勒其天地等等。当然，我可能见过一位演员一百次，却并未因此而对他本人有更好的了解。但是，如果我把他扮演的角色集中起来，如果我说我在他演第一百个人物时对他有了稍微进一步的了解，人们可以感到这里面有部分的真理。因为表面上的反常现象也是一种寓言。它有一种教训。其教训是，一个人可以通过真诚的冲动显示其本色，也同样可以通过演戏显示其本色。一种更低的口吻，一些无动于衷的感情（这些感情可以由它们激起的行动部分地、不忠实地表现出来）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精神姿态，也同样是如此。人们感到我这样确定了的一种方法。但是，人们也感到这是分析的而不是认识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包含着玄想，这些玄想不自觉地暴露出它们有时声称还不知道的一些结论。这样，一本

书的最后几页就已经出现在它的最初几页中了。这种纽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确定的方法公开表明这种感觉，即全真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只有外表是可以计数的，其环境是可以感觉到的。

这种不可把握的荒诞感，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在智力的、生活艺术的或简单地说艺术的不同的、然而是友爱的世界中触及到。荒诞的气氛存在于开始。结局是荒诞的宇宙和那种用自己的光照亮世界的精神姿态，它照亮这世界是为了使享有特权的、无情的面目放出光辉，而它知道如何辨认这些面目。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可笑的开端。伟大的作品常常诞生在一条街的拐角或一家饭馆的小门厅里。荒诞也如此。荒诞的世界比起其他的来更是从这种悲惨的诞生中获得它的高贵。对一个人来说，在某些场合对有关他的思想的本质的问题回答“无”可能成为一种欺骗。被爱的人很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一回答是真诚的，如果它形象地表现出这种奇特的精神状态：虚无变得雄辩，日常行动的链条被打断，心灵徒劳地寻找连接链条的环节，那么，这一回答就成了荒诞的第一个标志。

有时候布景倒塌了。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里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仅仅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开始”，这是重要的。厌倦出现于一种机械的生活的各种行动的结尾，但它也同时开始了意识的运动。它唤醒这运动，激起下文。而下文正是无意识地回到链条中去，或是最后的觉醒。随着时间而来的，

是觉醒之余的后果：自杀或者恢复常态。厌倦本身具有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我应该说在这里它是好的。因为一切都以意识开始，一切都因意识而有价值。这些看法并无任何独特之处。它们都是不言自明的：要粗略地认识荒诞的根源，眼下这也足够了。简单的忧虑乃一切之始①。

同样，时间支配我们，对于一种暗淡无光的生活来说，更是天天如此。但是总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支配时间。我们是靠未来生活的："明天"，"以后"，"等你混出来的时候"，"长大了你会明白的"。这些自相矛盾的事情是值得钦佩的，因为终于说到了死。总有那么一天，人发现或者说他已三十岁了。他就这样确认了他的青春。但是同时，他也确定了他对时间的位置。他有了自己的位置。他承认他处于一条曲线的某一点上，而这条曲线他已表明是要跑完的，他自身归属于时间，从这种攫住他的恐惧中，他认出了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明天，他希望着明天，可他本该是拒绝的。肉体的这种反抗，就是荒诞②。

再低一级就到了陌生性：觉察到世界是"厚的"，瞥见一块石头可以陌生到何种程度，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大自然，例如一片风景是可以多么强烈地否定我们啊。在任何美的深处，都潜藏着某种非人的东西，这些山丘，天空的柔情，树木的图画，转眼间就失去了我们赋予它们的幻想的含义，从此比失去的天堂更远了。世界最初的敌意越过数千年，又朝我们追来。我们片刻对它不再理解了，因为若干世纪中，我们只把它理解为我们事先赋予它的那些形象和图画，因为此后我们

---

①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和时间》，转引自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弗兰版，1930年，第210页。——原编者注

② 但这并不是就本来意义说的。问题不在于定义，而在于列举一些能够包含荒诞的感觉。列举已毕，但是荒诞并未穷尽。——作者原注

已无力再使用这种人为的方法了。我们把握不住世界了，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这些由习惯蒙上假面的布景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它们离开了我们。同样，有些时候，在一个女人的熟悉的面目下面，人们会把他几个月或几年以前爱过的女人当作陌生人，也许我们竟会渴望得到突然使我们感到如此孤独的那种东西。然而时候还未到。唯一的一件事：世界的这种厚度和这种陌生性，就是荒诞。

人也散发出非人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的举动的机械的面貌，他们的没有意义的矫揉造作都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蠢。一个人在玻璃隔墙后面打电话，人们听不见他说话，但看得见他的无意义的手势：于是就想他为什么活着。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无法估量的堕落，这种如当代一位作者①所说的“恶心”，也是荒诞。同样，某些时候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的陌生人，我们在自己的照片中看见的那个亲切然而令人不安的兄弟，仍然是荒诞。

我终于要说到死以及我们对它的感觉了。对此话已说尽，避免悲天悯人还是审慎的。人人都活着，好象谁也“不知道”似的，对此人们的惊讶总是不够。实际上，这是因为没有死亡的经验。就本义说，只有活过并且有了意识的东西才是被经验过的。这里恰恰说的是谈论别人的死是否可能。这是一种代用品，一种精神的所见，我们对此永远是不很有把握的。那种悲悲切切的习见不可能有说服力。恐惧实际上来自事件的数学方面。如果时间使我们害怕，那是因为它做了演示，解决随后才来。关于灵魂的漂亮演说在这里将接受九验法对其反面的检

① 指萨特。他的小说《恶心》发表于1938年。

验，至少是一时。这无活力的躯体上耳光再留不下痕迹，灵魂从中消失了。历险的这个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成为荒诞感的内容。在这种命运的致命的照耀之下，无用出现了。在支配我们的状况的血腥的数学面前，任何道德、任何努力都不是先验地可辩护的。

再说一遍，这一切都已被反复地说过了。我这里仅限于迅速地加以整理和指出这些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穿在一切文学和一切哲学之中，充斥在每天的谈话之中。没有必要重新发现它们。但是，应该掌握这些明显的事实，以便探讨首要的问题我想。再重复一遍，我感兴趣的不是荒诞的发现，而是其后果。如果人们对这些事实确信无疑，那么，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到什么程度才能一点不遗漏呢？应该自愿地死去还是无论如何也要存有希望呢？必须预先在智力方面进行同样迅速的清点。

精神的第一个活动是区别真伪。但是，一旦思想反映自身，它首先发现的，就是一个矛盾。在这里竭力要具有说服力是没有用的。数百年以来，没有人对此事比亚里士多德论证得更清晰、更简洁："这些观点经常受人嘲笑的后果就是它们不攻自破。因为肯定一切皆真，我们就肯定了相反的肯定之真，因此也就肯定了我们自己的论点之伪（因为相反的肯定不容许我们的论点是真的）。而如果一个人说一切皆伪，那么这一肯定也是伪的。如果一个人宣布说只有与我们的肯定相反的肯定才是伪的，或者只有我们的肯定才不是伪的，那么，他就不得不接受无限数量的真或伪的判断。因为一个人提出一个真的肯定，他就同时也宣布这一肯定是真的，如是者至于无穷。"①

① 这段话出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8章。可参阅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中译本81—82页。

这只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个，其中转向自身的精神在一种令人眩晕的旋转中迷失方向。这些悖论本身的简单使得它们不可克服。无论文字的游戏和逻辑的杂技如何，理解首先是统一。精神本身的最深刻的愿望在其最发达的手段中与人在他的世界面前的无意识的感觉连为一体，而人在其世界面前要求亲切，渴望着明确。对一个人来说，理解世界，就是把世界归结为人，打上他的印记。猫的世界不是食蚁兽的世界。“一切思想都是人格化的”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这是自明之理。同样，精神试图理解现实，也只能在把现实化为思想的用语时才能认为得到了满足。如果人认识到世界也能爱和痛苦，他的态度就会变得和顺了。如果思想在现象变化不定的镜子里发现能把现象和自身概括为一种唯一的原则的永恒联系，人们就能谈精神的幸福了，而真正幸福者的神话也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造品。这种对统一的怀念，这种对绝对的渴望，说明了人类悲剧的基本运动。然而，这种怀念是一个事实，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立刻得到缓和。因为如果我们跨越愿望和获取之间的深渊，和帕墨尼德斯① 一起肯定单一之真实（不管这单一是什么），我们就会跌进一种精神的可笑的矛盾之中，这种精神肯定完全的统一，并用它的肯定本身来证明它自己的差别和它声称要消除的分歧。这另一个恶性循环足以扼杀我们的希望。

这仍然是一些明显的事实。我再次重复，它们之令人感兴趣，不在其本身，而在人们可以从中引出的后果。我知道另一个明显的事实，它告诉我人皆有死。但我们可以数得出那些从中引出极端结论的才智之士。在本论文中，应被视为永久的参考的是我们以为知道的和我们实际知道的之间的不变的距离，

① 帕墨尼德斯(约公元前445—450)，古希腊哲学家。

是实际的赞同和假装的无知之间的不变的距离，这种无知使我们怀着一些观念生活着，这些观念我们若真正体验到的话，是会震动我们整个生命的。面对精神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恰恰可以完全把握使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创造分开的那种分裂。只要精神在其希望的不动的世界中沉默，一切就在它的怀念的统一中反映出来并排列有序。但是，这世界在其最初的运动中就开裂了，倒塌了；无数闪光的碎片呈现在认识的面前。对于重建那种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安宁的亲切平静的信用，必须不抱希望。在那么多世纪的探索之后，在思想家们那么多的认输之后，我们清楚地知道，对我们的全部认识来说，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除了职业的唯理论者之外，今天人们已对真实的知识感到绝望。如果要写关于人类思想的唯一有意义的历史，应该写他的不断的悔恨和他的无能为力的历史。

的确，关于谁、关于什么，我能说："我知道！"我自己的心，我能体验到，我断定它存在。这个世界，我能摸到，我也断定它存在。我的全部学问到此为止，其余都须构筑。因为如果我试图抓住我有把握的这个我，如果我试图加以确定和概括，它就成了在我指间流走的水了。我可以一个一个地画出它会呈现出的各种面貌，人们给予它的各种面貌，它的教育，出身，热情或沉默，高尚或卑劣。但是，人们并不将各种面貌相加。属于我的这颗心，我永远是确定不了的。在我对我之存在的确信和我试图给予这种确信的内容之间，鸿沟永远也填不平。我对我自己将永远是陌生的。在心理学上和在逻辑学上，有各种各样的真理，但又并无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我们忏悔室内的"要有道德"具有同等的价值。它们流露出一种怀念，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知。这是关于一些巨大的主题的一些没有结果的游戏。这些游戏只在近似确切的情况下

才是合乎情理的。

这里是一些树，我知道它们的粗糙，水分，我闻到它们的气味。夜，心情轻松的某些晚上，草的香味，星的香味，我怎么能否认这个我体验到生机和力量的世界呢？但是，关于这片土地的全部知识并没有给我什么东西，能够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们为我描绘这世界，教我如何安排它。你们历数它的法则，我由于渴求知识而同意这些法则是真实的。你们分解它的机制，我的希望增加了。最后，你们告诉我这神奇多彩的宇宙归结为原子，而原子又归结为电子。这一切都很好，我等着你们继续下去。但是，你们跟我谈到一个看不见的行星般的系统，其中电子围绕一个核运动。你们用一种形象对我解释这个世界。我于是承认你们达到了诗的高度：我永远也认识不到。难道我来得及生气吗？你们已经改变了理论。这样，这种应该教会我一切的科学就在假说中结束了，这种清醒在隐喻中沉没了，这种不确实变化为艺术作品了。我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吗？这些山丘的柔和的轮廓，放在这颗不平静的心上的夜的手，教给我多得多的东西。我又回到了我开始的地方。我知道了，如果我能够通过科学把握现象并一一列举出来，我却并不能因此而理解这个世界。我若能用手指摸遍它所有的凸起，我也并不能知道得更多。你们让我在一种描写和一些假说之间进行选择，描写是可靠的，但它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假说声称教育我，却一点儿也不可靠。我对我自己和这个世界是陌生的，我唯一的帮助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一旦肯定什么就否定了自己。我只有拒绝知道和生存才能得到平静，获取的渴望碰到窥视它进攻的墙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抱有希望，就是激起反常的现象。一切都安排妥当，以便产生出一种被毒化的平静，这种平静是无忧无虑、心灵的睡眠或致命的放

弃带来的。

智力也以它的方式告诉我这世界是荒诞的。它的反面是盲目的理性，徒劳地声称一切都是明确的，我一直等待着证据，并希望它有道理。尽管有那么多自命不凡的时代，那么多雄辩而有说服力的人，我知道这是错误的。至少在这方面，是绝没有幸福的，除非我不知道。这种普遍的理性，实践的或精神的理性，这种决定论，这些解释一切的范畴，都有令正直的人发笑的东西。它们与精神毫无关系。它们否认它的深刻的真理，这真理就是受束缚。在这个难以理解的、有限的世界中，人的命运从此获得了它的意义。一大群非理性的人站了起来，包围了它，直到终了。在他们恢复了的、现在又相互协调了的明智中，荒诞感清晰了，明确了。我刚才说世界是荒诞的，我是操之过急了。世界本身是不可理喻的，这就是人们所能说的。然而荒诞的东西，却是这种非理性和这种明确的强烈愿望之间的对立，强烈愿望的呼唤则响彻人的最深处。荒诞既取决于人，也取决于世界。目前它是二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它把它们连在一起，正如只有仇恨才能把人连在一起一样。在这个我进行冒险的没有尺度的世界中，我能够清楚地辨认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了。这里我们且停一停。如果我把这种支配着我和生活的关系的荒诞当作是真实的，如果我充满了这种在世界面前攫住我的情感，充满了对于一种知识的追求使我必须具备的这种明智，那么，我就应为了这些确实的东西而牺牲一切，我就应该正视它们，以便掌握它们。我尤其应该据此调整我的行为，并且在其全部后果中跟随着它们。我这里说的是实话。但是，我想事先知道思想能否在这些荒漠中生存。

我已经知道思想至少已进入这些荒漠。它在那儿找到了它的面包。它明白了它在此之前一直以幻想为主。它向人类思索

的几个最紧迫的主题提供了机会。

自从荒诞被承认以来，它就是一种激情，最令人心碎的激情。但是，全部问题在于知道人能否以激情为生，人能否接受其深刻的法则，这法则是焚毁这颗同时被激情激励着的心。不过，这还不是我们将要提出的法则。它处于这种经验的中心。我们有时间再谈。我们还是先承认生自荒漠的这些主题和冲动吧。一一列举出来就够了。这些东西今天也是尽人皆知的了。总是有人来保卫非理性的权利。有一种东西人们可以称为谦卑思想，其传统一直存在着。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已进行过多次，以至于似乎不必再进行了。但是，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那些反常的体系，它们千方百计地要绊倒理性，好象它果真一直在往前走似的。不过，理性的效能的证明和它的希望的强烈不可同日而语。就历史方面而言，两种态度的这种永存说明了人的基本的激情，而这人是介于他对统一的呼唤和他对包围他的墙所能有的清晰视象之间被撕扯着的。

但是，也许没有哪一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对理性的攻击更为猛烈。查拉图斯特拉①大声呐喊："偶然，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没有任何永恒的意志愿意高踞其上的时候，我就把它还给了万事万物"，克尔凯郭尔② 身罹致命的疾病，"这病通向死亡，死亡之后一无所有"，③ 此后，荒诞思想方面的意味深长的、令人痛苦的主题就层出不穷。至少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的主题是如此，而这"至少"二字是至关重要

① 查拉图斯特拉是公元前六世纪伊朗的预言家和宗教改革者。下面这段话出自尼采所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略有删节。

② 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

③ 见克尔凯郭尔《论绝望》，加利玛版，1932年、第70页。——原编者注

的。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①，从克尔凯郭尔到谢斯托夫②，从现象学家到舍勒③，在逻辑学和伦理学方面，整整一派的思想家，他们因其怀念而相近，因其方法或目的而相反，但都奋力切断理性的康庄大道，重新发现真理的正确道路。我这里假定这些思想是已知的，真实的。无论他们各自的野心如何，他们都是从这个矛盾、二律背反、焦虑或无能统治着的无法描述的世界出发的。他们共同的东西，恰恰是迄今人们揭示出来的那些主题。对他们也是，应该明确指出首要的是他们能够从这些发现中引出的结论。这一点重要到应该进行单独研究的程度。但眼下问题仅在于他们的发现和他们的最初的经验，在于确认他们的一致。如果想论述他们的哲学是狂妄自大的话，使人们感到他们有共同的气氛则是可能的，反正这也足够了。

海德格尔冷静地察看人类的状况，宣布这种存在是屈辱的④。唯一的真实，是存在于人类各阶层中的“忧愁”。对于迷失在世界上的人和他的消遣来说，这忧愁是一种短暂的、不可捉摸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一旦意识到自身，就变成焦虑，焦虑是清醒的人的永恒环境，“存在即在其中”。这位哲学教授毫不颤抖地、用最抽象的语言写道：“人类存在的完美的、限定的性格比人本身更重要。”他对康德感兴趣，但这是为了确认他的“纯粹理性”的局限性，是为了在他的分析结束时得出“世界再不能给予焦虑的人任何东西”这样的结论。他觉得这忧愁实际上超越推理的范畴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

①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② 谢斯托夫(1866—1938)，俄国作家、哲学家。
③ 舍勒(1847—1928)，德国哲学家。
④ 以下所引述的海德格尔的言论皆转引自法国人居尔维奇所著《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1930年)一书。

只考虑它，只谈论它。他列举其面目：普通人试图在自己身上铲平它、减轻它，就产生厌倦；精神沉思死亡时，就产生恐惧。他也不把意识和荒诞分开。死亡意识，这是忧愁的呼唤，“存在于是通过意识向自己发出呼唤”。它就是焦虑的声音，它要求存在“自己从毁灭中回到无名无姓的芸芸众生之中”。对他来说，也是不应该睡觉，应该守夜直到世界末日。他坚持在这荒诞的世界中，他揭露它的可消亡性。他在瓦砾中寻找自己的路。

雅斯贝尔斯对任何本体论都感到绝望，因为他希望我们已经失去了“天真”①。他知道我们做不出什么超越表象的致命把戏的事情。他知道精神的结局就是失败。他滞留在历史披露给我们的精神冒险之中，无情地暴露出每一种体系的失败、拯救一切的幻想、毫无隐瞒的预言。在这个荒芜的世界中，认识之不可能被显示出来了，虚无看起来是唯一的真实，无可救援的绝望，唯一的态度，他企图找到阿里阿德涅之线②，把他引向神圣的秘密。

而谢斯托夫，其作品贯穿着一种令人赞叹的单调，他不断地倾向着同样的真理，无休止地论证着最严密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最终总是要绊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没有一个贬低理性的讽刺性的明显事实或可笑的矛盾逃过他的眼睛。他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例外，不管它是心灵史方面的，还是精神史方面的。通过死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经验、尼采精神的被激化的冒险、哈姆莱特的诅咒或者易卜生的苦涩的高贵，他的现、阐明、颂扬了人对不可补救之事的反抗。他拒绝了理性向理由，只是在这没有颜色的荒漠的中央才略有决心地迈开步

---

① 语出《存在的哲学》第3章。转引自雅娜·海尔什《哲学的幻想》，第190页。——原编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用小线团帮助忒修斯走出迷宫。

子，在这荒漠中，一切确实的东西都变成了石头①。

这些人中最吸引人的也许是克尔凯郭尔，他至少在其存在的一部分中比发现荒诞还要进一步，他还体验了荒诞。一个人写过这样的话："最可靠的缄默不是不说话，而是说话"②，他首先要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都不能使一种本身即不可能的存在变得令人满意。他是认识的堂璜③，用过不少笔名，制造不少矛盾，同时写过《布道词》和《诱惑者的日记》这本犬儒主义唯灵论的教科书。他拒绝安慰、道德、一切安宁的原则。他感觉到心中有的那根刺④，他不是注意平复其痛苦。相反，他唤醒那痛苦，还在一种愿意受难的受难者的绝望的快乐中，一点一点地制造清醒、拒绝、喜剧等一系列魔鬼附身者⑤。这张既温柔又冷笑的面孔，这些伴随着发自灵魂深处的喊叫的旋转，就是和超越它的现实交锋的荒诞精神本身。导致克尔凯郭尔做出那些代价高昂的丑事的精神冒险也是在一种失去了布景、回到最初的无条理的乱七八糟的经验中开始的。

在另一方面，即在方法方面，胡塞尔⑥和现象学家们以其夸张在多样性中重建了世界，否认了理性的超验的能力。由于他们，精神世界无法估量地丰富了。玫瑰花瓣、公里里程碑或人的手和爱情、欲望或万有引力定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思想，不再是统一了，不再是用一种伟大原则的面貌使表象变得亲切

---

①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法译本，七星版，1928年。——原编者注

② 转引自克尔凯郭尔《论绝望》法译本译者序。第34页。——原编者注

③ 见尼采《黎明》，第327页。——原编者注

④ 典出《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2章："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⑤ 参见《论绝望》译者前言，第45页。——原编者注

⑥ 胡塞尔(1859—1938)，德国现象学哲学家。

了。思想，是重新学习看，学习注意，是引导自己的意识，是象普鲁斯特那样把每一个观念、每一个形象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中心。不合常情的是，一切都享有特权了。为思想辩解的是极端的意识。为了比克尔凯郭尔或谢斯托夫的方法更实际，胡塞尔的方法则一开始就否认理性的古典方法，打消希望，给予直觉和心灵以层出不穷的现象，其丰富性具有某种非人的东西。这些道路通向所有的科学，或不通向任何科学。这就是说，这里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问题只在于“一种认识的态度”①，而不在于安慰。再说一遍，至少开始是如此的。

如何能不感到这些人的深刻的联系！如何能不看到他们聚集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苦涩的地方② 的周围？而在这个地方，希望是没有位置的。我要求要么一切为我解释清楚，要么什么都没有。而理性在心灵的叫喊前面是无能为力的。被这种要求唤醒的精神寻找着，只找到了矛盾和胡说八道。我不懂的东西是没有理性的。世界充满了这些非理性的东西。我不理解它的唯一的含义，就它自己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巨大的非理性而已。只要能说一次：“这是明确的”，一切就都得救了。然而这些人竟相宣布，什么都不明确，一切都乱七八糟，人只是对包围着他的墙具有明智和确切的认识。

所有这些经验都相互一致，彼此相交。走到边缘的精神应该作出判断，选择结论。自杀和回答就在这里。但是，我想颠倒探索的顺序，从智力的冒险出发，再回到日常的举动。这里提到的经验产生在应该须臾不离的荒漠之中。至少应该知道这些经验到达了何种田地。人努力到这种程度，就来到了非理性

① 见胡塞尔《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原编者注

② 参见胡塞尔《笛卡儿式的沉思》，高兰版，1931年，第4页。——原编者注

面前。他在自己身上感到对幸福和理性的渴望。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这是不应忘记的。应该紧紧抓住这一点，因为人生的全部后果可能从中产生。非理性、人类的怀念和从它们的会面中冒出来的荒诞，这就是一出悲剧的三个人物，而这出悲剧必然和一种存在所能够具有的全部逻辑共同结束。

哲学上的自杀

荒诞感并未因此就成了荒诞概念。荒诞感建立了荒诞概念，仅此而已。前者并非归结为后者，除非在前者对宇宙提出自己的判断那个短暂的时刻。然后它还须更进一步。它是有生命的，这就是说它应该消逝或者应该更早地引起反响。我们汇集的主题也是如此。这里仍然是，我所感兴趣的绝非那些需要以另一种形式或在另一个地方对其进行批评的作品或思想，而是发现它们的结论中的共同之处。思想也许从未如此分歧过。但是，我们承认它们在其中受到震动的那种精神景物是相同的。同样，结束了它们的旅途的喊叫也以相同的方式回响在彼此不相象的科学中间。人们感到，刚刚提到的那些思想具有一种共同的气候环境。说这种气候环境是致命的，那不啻是玩弄词藻。在这令人窒息的天空下生活要求人们或是走出去，或是留下来。问题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去，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什么留下来。我就这样确定自杀问题和人们可以对存在哲学的结论所感到的兴趣。

我想先离开正路片刻工夫。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从外部

划出荒诞的范围。但是，人们可以考虑这个概念包含着什么明确的东西，可以试图通过直接的分析发现其含义，以及它带来的后果。

如果我指控一个无辜者犯有滔天之罪，如果我断言一个有德行的人觊觎他的亲姐妹，他会回答说这是荒诞的。这种愤慨有其滑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其深刻的理由。有德行的人通过这种驳斥说明了存在于我指控他的行动和他整个一生的原则之间的决定性的二律背反。“这是荒诞的”，其意谓：“这是不可能的。”但也是：“这是矛盾的。”如果我看见一个人以白刃攻击一群持机关枪的人，我将断定他的行动是荒诞的。然而，只是从存在于他的意图和等待着他的现实之间的不成比例来看，从我可以抓住的、存在于他的实际力量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的矛盾来看，他才是荒诞的。同样，我们认为一个判决是荒诞的，是因为我们把它和看起来事实所要求的判决作了对比。同样，通过荒诞进行的论证是在这种推理的后果和人们想要建立的逻辑真实的比较中完成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我们比较的诸项间的距离越大，荒诞也就越大。有荒诞的婚姻，挑战，怨恨，沉默，战争，也有和平。对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荒诞都产生于一种比较。因此我有理由说荒诞感不产生于对一个事实或一种印象的简单考察，它从一种事实状况和某种真实、一个行动和超越它的世界之间的比较中显露出来。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

从智力方面看，我可以说荒诞不在人（如果这样的比喻可以有一种意义的话），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它暂时是联结两者的唯一纽带。假如我愿意停留在明显的事实上的话，那么我就知道人要的是什么，世界给他的是什么，而现在

我可以说我知道联结他们的是什么。我无须挖掘得更深。对于探索的人来说，一件确实的东西也就足够了。问题仅在于找出一切后果。

直接的后果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准则。奇异的三位一体①已被阐明，它绝非突然被发现的美洲新大陆。但是，它具有和经验材料共同的东西，即它同时极其简单又极其复杂。在这方面，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不可分割。破坏其中的一项，就破坏了全部。在人类精神之外，不能有荒诞。因此，象一切事物一样，荒诞也结束于死亡。然而，这个世界之外，也不能有荒诞。根据这一基本标准，我断定荒诞的概念是本质的，可以说明我的第一个真理。上面提到的方法准则在这里显露出来了。如果我断定一件事情是真的，我就应该保存它。如果我要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至少我不应该用这种解决本身去掩盖问题的某一项。对我来说，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问题是如何走出去以及应否从荒诞中推论出自杀。我的探索的第一个、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条件是保存压倒我的那种东西并因此尊重它所具有的我认为是本质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刚才定义为一种对立和一种无休止的斗争。

把这一荒诞的逻辑推到底，我应该承认这一斗争意味着完全没有希望（它与绝望毫无干系）、不断的拒绝（不应将它和放弃混为一谈）和意识到的不满足（不应将其当作青春的不安）。一切消除、掩盖或缩小这些要求的东西（首先是消除分裂的赞同）都破坏了荒诞并使人们可能建议的态度贬值。只有在人们不赞同荒诞的情况下，荒诞才有意义。

① 基督教中指圣父、圣子和圣灵合成一位神，谓之三位一体。

有一个纯属道德的明显事实，即一个人永远是他的真相的牺牲品。这些真相一经承认，他就摆脱不掉了。总要付出些代价。一个人意识到了荒诞，便永世与荒诞连在一起。一个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的人就不再属于未来了。这是正常的。但是，他努力摆脱他所创造的那个世界，这也同样是正常的。在此之前的一切唯有在考虑到这种反常现象的情况才是有意义的。在这方面，最有教益的莫过于现在来研究从批评唯理主义出发而已经承认了荒诞的环境的人借以推行其后果的方式。

而我若坚持存在哲学，我就看到一切存在哲学无一例外地劝我逃避。通过一种奇特的推论，在理性的瓦砾堆上从荒诞出发，在一个对人是封闭的、有限的世界中，他们神化压倒他们的东西，在剥夺他们的东西中发现了希望的理由。这种勉强的希望在一切具有宗教本性的人当中都存在。它值得一谈。

我在这里仅仅并且作为例证分析一下谢斯托夫和克尔凯郭尔特别喜欢的几个主题。但是，达到了漫画化程度的雅斯贝尔斯将向我们提供一个这种态度的例证。其余的就将变得更清楚。人们使他无力实现超验性，不能探测经验的深度并意识到这被失败震动了的世界。他将前进或者至少将从这失败中引出后果吗？他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他在经验中只发现了对他的无能的承认，而没有找到任何机会来引出某个令人满意的原则。然而，他不经证明就自己说了出来，他一下子同时肯定了超验性、经验的存在和人生的超人的意义，写道："在一切解释和一切可能的说明之外，失败没有显示的不是虚无，而是超验性的存在。"①这种存在突然地、通过人类信念的一个盲目行动解释了一切，他把它定义为"一般和特殊的难以想象的统一"。② 这样，

① 见雅娜·海尔什《哲学的幻想》，第179页。——原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175页。——原编者注

荒诞就变成了神（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理解的无能就变成了启示一切的存在。在逻辑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引出这种推论。我可以称它为跳跃。反常的是，人们理解雅斯贝尔斯为使超验的经验不能实现所具有的坚持性和无限的耐心。因为这种近似越是不可捉摸，这种定义就越是无用，而这种超验性在他看来就越真实，因为他肯定这一点时的激情恰恰跟存在于他的解释能力和世界及经验的非理性之间的距离成正比。这样看来，雅斯贝尔斯越是要更彻底地解释世界，就越是激烈地打破理性的偏见。这个谦卑思想的使徒将在谦卑的极端发现使存在在其全部深刻性上再生的东西。

神秘思想使我们很熟悉这些过程。它们是和任何一种精神姿态同样合乎情理的。但是眼下，我的所作所为就只当我认真地对待某些问题。我并不预断这种态度的一般价值及其教诲的能力，我只想看看它是否满足了我提出的条件，它是否和我感兴趣的冲突相称。这样，我就要谈到谢斯托夫。一位评论者引述了他的一段值得注意的话："唯一真正的出路恰恰是在那个对人类的判断来说没有出路的地方。否则，我们要上帝干什么？人们转向上帝只是为了获得不可能之物。至于可能之物，有人就够了。"①如果说存在一个谢斯托夫哲学的话，我很可以说它尽在其中矣。因为当谢斯托夫经过充满激情的分析发现了全部存在的根本的荒诞性时，他不说："这就是荒诞"，而说："这就是上帝：还是以信赖他为好，即便他不符合我们的任何理性范畴。"为了不可能产生混淆，这位俄国哲学家甚至暗示上帝可能是记恨的和可憎的，不可理解的和自相矛盾的，但是，正是在他面目最丑恶的时候，他最充分地显示了他的威力。他的伟大

① 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原编者注

在于他的前后不一致。他的证据，就是他的非人性。应该扑向他，通过这一跳跃来摆脱理性的幻想。这样，对于谢斯托夫来说，接受荒诞是和荒诞本身同时的。确认荒诞，就是接受荒诞，而他的思想的一切逻辑的努力都是暴露荒诞，以便同时使它所带来的巨大希望涌现出来①。这种态度也仍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我在这里坚持要考虑一个问题及其全部后果。我无须研究一种思想或一种信仰行为的动人之处。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做。我知道理性主义者认为谢斯托夫的态度令人生气。但是我也感到谢斯托夫有理由反对理性主义者，而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一直忠于荒诞的戒律。

如果人们承认荒诞是希望的反面，人们就看到，对谢斯托夫来说，存在的思想必须以荒诞为前提，但是它论证荒诞只是为了消除荒诞。这种思想的微妙是要把戏者的一个动人的花招。当谢斯托夫以他的荒诞来与流行的道德和理性相对立的时候，他把它称为真理和救世。因此，在荒诞的基础和定义中是有谢斯托夫的赞同的。如果人们承认这个概念的全部力量存在于它冲撞我们的希望的方式中，如果人们感到荒诞只是要求人们不赞同它，那么，人们就清楚地看到，它失去了它的真实面目、它的人的、相对的性质，而进入一种既不可理解又令人满意的永恒之中。如果有荒诞的话，那是在人的世界中。从它的概念变成永恒的跳板那一刻起，这个概念就不与人的清醒相连了。荒诞不再是人确认但并不赞同的那个明显的事实了。斗争被回避了。人被纳入荒诞，并在这种一致中使其本质特性消失，这本质特性就是对立、破碎和分裂。这一跃是一种逃避。谢斯托夫很愿意引述哈姆莱特的这句话，The time is out of

① 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121页。——原编者注

joint，①他也这样怀着一种强烈的希望写下来了，说来奇怪，是可以把这种希望赋予他的。因为哈姆莱特并非这样来说这句话的，或者莎士比亚并非这样来写的。非理性的陶醉和狂喜的使命使一种有洞察力的精神脱离荒诞。对谢斯托夫来说，理性是徒劳的，但是理性之外还有某种东西。对一种荒诞的精神来说，理性是徒劳的，而在理性之外则一无所有。

这个跳跃起码多少更清楚地为我们阐明了荒诞的真正本质。我们知道了它只在一种平衡中才有价值，它首先在比较之中而绝不在这种比较的诸项之中。但是，谢斯托夫恰恰是把全部重量压在诸项之一上，因此破坏了平衡。我们对理解的渴望、对绝对的怀念只有在我们恰恰是能够理解和解释许多东西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解释的。绝对地否认理性是徒劳的。理性有它的范围，在这范围中它是有效的。这恰恰是人类经验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什么都弄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如果荒诞生于此时，那恰恰是碰上了有效但又有限的理性和不断再生的非理性。当谢斯托夫恼怒于这一类的黑格尔式命题："太阳系的运动按照一些不变的法则来进行，这些法则是它的原因"②，当他怀着全部激情打破斯宾诺莎的唯理论的时候，他正是断定了全部理性的虚荣。通过一种自然的、不合情理的反向，取得了非理性的优越性③。但是过渡不明显。因为这里可以有限制的概念和方面的概念介入。自然的法则在某种限度内可以是有效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反转来对着自己而产生荒诞。或者，它们可以在描述的方面被证明合理，但并不因此而在解释的方面是真实的。

---

① 英文，时代脱节了。

② 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原编者注

③ 这里主要说的是反亚里士多德的特别概念。——作者原注

这里一切都为非理性而牺牲了，由于掩盖了对明确的要求，荒诞就随着它的比较的诸项之一消失了。相反，荒诞的人并不进行这种平等化。他承认斗争，并不绝对地蔑视理性，接受非理性。这样，他的目光遍及经验的全部已知材料，他不打算在知道之前就跳跃。他只知道，在这个聚精会神的意识中，再也没有希望的位置了。

在谢斯托夫那里是明显的，也许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就更明显了。当然，在一个如此不可捉摸的作者那里勾勒出明确的命题是困难的。但是，尽管有些作品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的，人们仍然在化名、花招、微笑上面感到他的全部作品中出现了对一个真理的预感（同时也是恐惧），这个真理终于在他的最后几部作品中显露出来：克尔凯郭尔也进行了跳跃。他童年时是那样地害怕基督教，他最后又朝着它的最严峻的面目走去。对他也是，二律背反和反常现象成了宗教的标准。这样，对这人生的意义和深刻性产生绝望这件事本身现在把真理和明确呈现在他面前。基督教是坏表率，克尔凯郭尔坦率地要求的，是依纳爵·罗耀拉①要求的第三种牺牲，即上帝最喜欢者："智力的牺牲"②。"跳跃"的这种结果是古怪的，但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他把荒诞当成另一个世界的标准，而它仅仅是这个世界的经验的一种残留物。克尔凯郭尔说："信教者在他的失败中发现了他的胜利。"③

---

①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

② 人们可以想到，我这里忽略了基本的问题，即信仰问题。但是我并不研究克尔凯郭尔或谢斯托夫、甚至胡塞尔的哲学(这需要在另外的地方，采取另外的精神姿态)，我向他们借用一个主题，我研究其后果是否适合已经确定的规则。这里说的只是一种迷恋。——作者原注

③ 参见克尔凯郭尔《祈祷词及祈祷词片断》，法文版，1937年。原编者注

我无须考虑这种态度和哪一个动人的预言相联系，我只须想想荒诞的景象及其特性是否为它辩护。在这一点上，我知道并非如此。再看一看荒诞的内容，人们就更理解启发了克尔凯郭尔的方法了。在世界的非理性和荒诞的反抗的怀念之间，他没有保持平衡。他不尊重确切地说产生了荒诞感的那种关系。他确信不能摆脱非理性，但他至少想逃避这种他觉得没有结果、没有意义的绝望的怀念。不过，如果说在这一点上，他在他的判断中可能会有道理，那他在他的否定中就不会有道理了。如果他用一种狂热的赞同取代他的反抗的呼声，这就导致他无视于一直启发着他的荒诞并神化他此后所持的唯一态度，即非理性。加里亚尼①神父对艾比奈夫人说，重要的不是治好病，而是带着病痛活着②。克尔凯郭尔想治好病。治好病，这是他的狂热的意愿，一直贯穿着他的全部日记。他的智力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逃避人类状况的二律背反。他越是突然间瞥见了虚荣，他的努力就越是绝望。例如，当他谈到自己时，就好象害怕上帝，虔诚都不能给他带来平静。就这样，他通过一种被歪曲的借口，赋予非理性以形象，而把不公正的、不一致的、不可理解的荒诞所具有的特性给予他的上帝。在他身上，唯有智力试图压制人心的深切要求。既然什么都未被证实，那就什么都可以被证实了。

正是克尔凯郭尔自己向我们泄露了他所遵循的道路。我这里丝毫也不想暗示，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如何能不看到几乎有意识的灵魂上的残缺迹象呢？这种残缺是面向着荒诞所允许的残缺的。这是《日记》中的主导主题。“我所缺少的是那野兽；

---

① 加里亚尼(1728—1787)，意大利外交家、经济学家和 作家。他与法国贵妇艾比奈夫人互通大量信件。

② 见加里亚尼神父1777年2月8日信。——原编者注

它也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①……但是，给我一个躯体吧②。”下文说：“啊！尤其是在我幼年的时候，为了成为一个人，哪怕是六个月③，我什么没有做啊……实际上，我缺的正是一个躯体和存在的肉体条件④。”然而在别的地方，这个人把那希望的呼喊当成了自己的呼喊，那呼喊曾经穿越过多少世纪，激动过多少颗心，只是不曾激动过荒诞的人的心。“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死亡绝不是一切的结束，它意味着比生活对我们来说所包含着的希望更多得多的希望，哪怕这是一种洋溢着健康和力量的生活。”⑤ 通过坏表率获得的复归仍然是复归。人们看到，它也许可以使人从其反面即死亡中引出希望。但是，即使同情使人偏向这种态度，也应该指出过分证明不了什么。有人说这超过了人类的尺度，因此这是超人的。但是“因此”二字是多余的。这里绝没有逻辑的可靠性。也绝没有实验的盖然性。我所能说的，就是这实际上超过了我的尺度。如果我不从中引出一种否定，至少我也不愿在不可理解之上建立什么。我想知道我能否依靠并仅仅依靠我之所知活着。人们还对我说，在这里智力应该牺牲它的骄傲，理性应该低头。但是，如果我承认理性的局限，我也并不因此而否认它，我承认它的相对的力量。我只想站在这条中间的道路上，其中智力可以是清楚的。如果这就是它的骄傲，我看不出有足够的理由放弃它，例如，克尔凯郭尔的眼光再深刻不过，据他看，绝望不是一件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孽的状态本身⑥。因为罪孽就是离开上帝。荒诞是有意

① 见《日记》，加利玛版，1850年5月，卷四，第42页。——原编者注
② 同上书，1850年5月，卷四，第43页。——原编者注
③ 同上书，1849年9月，卷三，第217页。——原编者注
④ 同上书，1847年6月，卷二，第131页。——原编者注
⑤ 见克尔凯郭尔《论绝望》，第55页。——原编者注
⑥ 见《论绝望》序言，第31页。——原编者注

识的人的形而上状态，不通向上帝①。也许这个概念可以被阐明，如果我贸然说出这一骇人听闻的话：荒诞，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

这种荒诞的状态，问题在于生活在其中。我知道它们是建立在什么之上，这种精神和这个世界，它们互相用力支撑着却不能拥抱。我要求生活的准则，人们建议我的却忽略了它的根据，否认了痛苦的对立的诸项中的一项，迫使我放弃。我要求我所承认的条件带来的东西，我知道这条件意味着黑暗和无知。而人们向我保证说这无知解释一切，这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但是，人们这里并未满足我的意向，这种激动人心的抒情也不能在我面前掩盖住反常现象。所以应该改变方向。克尔凯郭尔可以大喊，警告："如果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如果在任何事物的深处只有一种野蛮混乱的力量在黑暗的情欲的旋风中产生着万事万物，伟大的和渺小的，如果事物背后隐藏着用什么也不能填满的无底的虚无，那么人生如若不是绝望又能是什么？"这喊叫并不能阻挡荒诞的人。寻找真实的东西并不就是寻找所希望的东西。如果为了摆脱这一苦恼的问题："人生究竟是什么？"应该象驴子以幻想的玫瑰花为生，而不是屈从于谎言，那么荒诞的精神更愿意毫不颤抖地接受克尔凯郭尔的回答："绝望"。一切都细加斟酌，一个下定决心的灵魂总会想出办法的。

我随意在这里把哲学上的自杀称为存在的态度。然而这并不包含一种判断。要指明一种思想借以自我否定并在导致其否定的东西中趋向自我超越的那种运动，这是一个便当的方式。对于存在者来说，否定是他们的上帝。这上帝恰恰只是靠人类

① 我没有说"排除上帝"，这仍然是肯定。——作者原注

理性的否定支持下去①。但如同自杀一样，神也随着人而变化。有好几种跳跃的方式，本质是跳跃。这些救世的否定，这些否认人们尚未跳过的障碍的最终的矛盾既可以产生于理性的范围，也同样可以产生于（这一推论对准的正是反常现象）某种宗教的启示。它们总是追求永恒，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采取断然行动。

还应指出，本文所进行的论证完全撇开我们这个有教养的时代流布最广的精神态度，这种态度依据的原则是一切都是理性并力求解释世界。当人们承认世界应该是明确的，那就要给予一个明确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这甚至是合乎情理的，但我们这里进行的论证对它不感兴趣。实际上，它的目的在于启示精神上的手段，这种精神从一种关于世界的无意义的哲学出发，最后发现世界的某种意义和深度。这些方法中最动人的一种是具有宗教的本质；它在非理性的主题中得到阐明。但是最反常、最意味深长的却是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把它的爱说理的理由给予一个它首先想象为没有主导原则的世界。无论如何，不对新获得的怀念思想提出一个概念，人们是不能得到我们感兴趣的后果的。

我将只研究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使之成为时髦的“意向”这一主题。在此之前已有过暗示。首先胡塞尔的方法否认理性的传统手段。我们且重复一下。思想，不是统一，不是用一种伟大原则的面貌使表象变得亲切。思想，这是重新学习看，重新学习引导自己的意识，把每一个形象变成特权的场所。换句话说，现象学拒绝解释世界，它愿意只成为实际经验的一种描

① 再次明确一下：这不是对上帝的肯定在这里成了问题，这是逻辑使然。——作者原注

述。它首先肯定没有真理，只有一些真理，它在这里与荒诞思想相通。从晚风到我肩上的这只手，每一种东西都有自己的真理。那是意识通过给予真理的注意阐明了它。意识并不形成它的认识对象，它只是固定，它是注意的行为，用柏格森的形象①来说，它就象放映机，一下子就固定在一个形象上。所不同的是它没有脚本，但有相接却不连贯的画面。在这神灯的照耀下，所有的形象都享有特权。意识使它的注意对象在经验中处于中止状态。它通过它的奇迹使它们分离出来。它们从此处于一切判断之外。正是这种"意向"确定了意识的特点。但是词并不意味着任何必然的概念；它是在它的"方向"这种意义上被使用的：它只具有地形学的价值。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与荒诞的精神背道而驰。这种只限于描述它拒绝解释东西的思想上的表面谦逊，这种反常地产生了经验的极大丰富和世界在其繁琐中的再生的坚决的纪律，都是荒诞的手段。至少乍看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和其它情况下，思想的方法总是具有两种面貌，一种是心理的，一种是形而上的②。这些方法因此而包含着两种真理。如果意向性这一主题只是想阐明一种心理的态度，而现实不是被这种态度解释，而是被它耗尽，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把这主题和荒诞的精神分开。它试图列举出它不能超越的东西。它只是肯定，在缺乏任何统一的原则的情况下，思想仍然能够在描述和理解经验的每一种面貌之中发现快乐。对于每一种面貌来说，这里所说的真理是属于心理的范围的。这真理只是证实真实可

---

① 见柏格森《物质与记忆》，第1章。——原编者注

② 甚至最严格的认识论也以玄想为前提。而且到了这种程度，当代大部分思想家的玄学在于只有一种认识论。——作者原注

能提供的“利益”。这是一种唤醒一个沉睡的世界并使它在精神上活跃起来的方式。但是，如果人们想扩大并合理地建立这种真理的概念，如果人们企图这样来发现每一认识对象的“本质”，人们就恢复了经验的深刻性。对于荒诞的精神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在有意向的态度中明显的是由谦逊转向自信的摆动，而现象学思想的这种闪烁将比任何其它东西都更好地阐明荒诞的论证。

因为胡塞尔也谈论由意向逐日注意的“超时间的本质”，而人们以为是在听柏拉图说话。人们不是用一件事物解释所有的事物，而是用所有的事物解释所有的事物。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些观念或本质是意识在其描述结束时“实现”的，但人们还不愿意它们成为完美的样板。然而，人们肯定它们直接地呈现在知性的全部材料中①。再也没有解释一切的一种唯一的观念了，但是有给予无限的对象一种意义的无限的本质。世界静止了，但是也被阐明了。柏拉图的现实主义变成了直觉的，然而仍然是现实主义。克尔凯郭尔沉浸在他的上帝之中，帕墨尼德斯把思想推入单一之中。但在这里，思想投入一种抽象的多神论之中。更有甚者，幻觉和想象也成了“超时间的本质”的一部分。在观念的新世界中，肯陶洛斯② 们和更为谦逊的大主教们合作了。

对于荒诞的人来说，在世界的各种面目都是享有特权的这种纯粹心理学的看法中，是同时有一种真理和一种辛酸的。一切都享有特权就等于说一切都是相同的。但是这种真理的形而上的面貌使他感到也许更接近柏拉图。的确，人们教导他说，

① 参见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第19页。——原编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物，有些与神和人为敌，有些则与神和人为友。

任何形象都以一种同样地享有特权的本质为前提。在这个没有等级的理想世界中，形式的军队只由将军组成。超验性大概是被取消了。但是，思想的一个急转弯又把某种不完全的内在性再度引进世界中，这种内在性恢复了宇宙的深刻性。

我应该害怕把一个其创造者更谨慎地处理的主题推进得太远了吗？我只是读过胡塞尔的这些断言："真者本身是绝对地真；真理是单一的；与其本身是一致的，不管感知者是什么，人，怪物，天使或神祇。"①这看起来是悖论，但如果人们接受如上所述，就会感到它的严密的逻辑。理性通过这个声音四处张扬，受到喝采，我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他的断言在荒诞的世界中能够意味着什么？一位天使或一位神的感知对我没有意义。在这个轨迹上，神的理性认可了我的理性，而我始终不能理解这个轨迹。这里我发现了一次跳跃，由于这跳跃是在抽象中进行的，对我来说，它就更加意味着我要忘掉我恰恰不愿忘掉的东西。胡塞尔又喊道："即使受制于引力的全部质量都消失了，引力定律也并未被推翻，只不过是它不可能被应用罢了。"② 这时，我知道我面对着的是一种慰藉的玄学。而如果我想发现思想在何处转弯离开了明显的事实这条道路，我只须重读胡塞尔谈及精神时所进行的那个平行的论证："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观照精神过程的确切法则，这些法则将同样显得是永恒的，不变的，如同理论自然科学的法则一样。所以，如果没有任何精神过程的话，它们仍然是有效的。"③ 即便精神不存

① 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原编者注

② 同上书，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46页。——原编者注

③ 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92页。——原编者注

在，其法则仍然存在！于是我明白了，胡塞尔企图把一种心理的真实作为一种理性的准则：他在否认了人类理性的容纳能力之后，通过这一渠道跃入永恒的理性之中。

因此，“具体宇宙”①这一胡塞尔的主题就不能使我感到惊讶了。对我来说本质不都是形式的，其中有物质的，第一种是逻辑的对象，第二种是科学的对象，这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有人向我保证，抽象仅仅指明了一个具体宇宙的一个其本身是非稳定的部分。但是，已被揭示的摆动使我能够说明这些用语的含糊。因为这可以说我的注意的具体对象，这天空，这水在这大衣角上的反光，它们为自己保留着我的兴趣从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现实的幻象。这我不否认。但这也可以说这大衣本身就是一般的，有其特殊的、充分的本质，属于形式世界。于是我知道人们只是改变了队伍的顺序。这世界在一个更高的宇宙中不再有它的映象了，但是形式的天空出现在这片土地的形象群中。对我来说，这丝毫也没有改变什么。我这里发现的绝不是对具体的爱好和人类状况的意义，而是一种放纵到足以使具体本身普遍化的理智主义。

这种表面的反常现象使思想经由谦卑的理性和得意的理性这两条相反的道路走向各自的否定，对此感到惊讶是徒劳无益的。从胡塞尔的抽象的上帝到克尔凯郭尔的闪光的上帝，距离并没有如此之大。理性和非理性通向同一个说教。实际上，道路并不重要，有到达的意志就什么都够了。抽象的哲学家和宗教的哲学家从同一种不安中出发，在同一种焦虑中相互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解释。在这里怀念比科学更强大。意味深长的

① 参见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第25页和第28页。——原编者注

是，当代的思想最相信主张世界的无意义这种哲学，同时又在其结论中最感到痛苦。它不断地摇摆在现实的极端理性化和极端非理性化之间，这种理性化使现实分割成理性典范，而这种非理性化又使之神化。然而这种分裂只是表面的。问题在于和解，在这两种情况下，跳跃也都足够了。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理性的概念是单向的。事实上，不管它在其野心中是多么严格，这种观念并不因此而不和别的观念同样灵活。理性有着完全人类的面目，但它也是朝着神的。普洛丁第一个知道如何把它与永恒的环境调和一致，从此它就学会了离开它的最珍贵的原则，即矛盾，以便容纳介入这个最奇特、也是十分神奇的原则。它成了一种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了。一个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怀念①。

理性能够平复普洛丁的忧郁，它也给予现代的焦虑以在永恒的熟悉的背景中得到平息的手段。荒诞的精神运气不那么好。对它来说，世界不是这样合理，也没有非理性到这种程度。它是不可理喻的，仅此而已。在胡塞尔那里，理性变得毫无限制。相反，荒诞却确定了它的界限，因为它无力平复它的焦虑。克尔凯郭尔从另一个方面肯定，只要有一个界限就足以否认理性。但是荒诞走不了这么远。对它来说，这个界限只对准着理性的野心。存在哲学家们设想的非理性主题就是变得混乱和自我解脱并自我否定的理性。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

---

① A.当时，理性要么适应，要么死亡。它适应了。普洛丁使它从逻辑的变为美学的。比喻取代了三段论。
B.不过，这并不是普洛丁对现象学的唯一贡献。整个这种态度已包含在亚历山大的思想家十分珍爱的观念之中了，以至于不但有一种人的观念，而且有一种苏格拉底的观念。——作者原注

正是在这条艰难的道路的尽头，荒诞的人认出了他的真正的理性。通过比较他的深刻的要求和人们建议给他的东西，他突然感到他要改变方向了。在胡塞尔的宇宙中，世界变得清楚了，人耿耿于怀的那种对熟悉的渴望变得没有用了。在克尔凯郭尔的论末世的著作中不得不放弃这种对于清楚的愿望，假如它想得到满足的话。知道（据此，人人都是无辜的）和想知道，其罪孽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荒诞的人可以感觉到的唯一罪孽，他将它当作他的罪过，同时也当作他的无辜。人们建议给他一种解决，即以往的一切矛盾都不过是些论战的把戏罢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感觉过。应该保留它们的真实性，即永远得不到满足。他不愿接受说教。

我的论证想要忠于由此而受启发的那一明显的事实。这明显的事实就是荒诞。就是希望着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那种分裂，就是我的对统一的怀念，就是那个分散的宇宙以及连结上述一切的矛盾。克尔凯郭尔取消了我的怀念，而胡塞尔则聚拢了这宇宙。我等待的并不是这些。问题在于和这些分裂共同活着和思想，在于知道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拒绝。不可能掩盖明显的事实，不可能通过否定荒诞的方程中的某一项来取消荒诞。应该知道人能否经验荒诞或者逻辑是否要求人因荒诞而死。我对哲学上的自杀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自杀。我只想从自杀的感情内容中把它清除出去，认识它的逻辑和它的诚实。对于荒诞的精神来说，任何别的态度都意味着回避和精神在其逐日理清的东西面前的退却。胡塞尔说要摆脱“在某种已为人熟知的、方便的条件下生活和思想的积习”，但是，最后的跳跃在他那里为我们恢复了永恒及其舒适。跳跃并未如克尔凯郭尔所愿地那样表示出一种极大的危险。相反，危险存在于跳

跃之前的那个微妙的时刻。能够站立在这令人眩晕的山脊上①，这就是诚实，其余的都是托辞。我也知道无能力从未足以引起过如克尔凯郭尔那样动人的和谐。但是，如果说无能力在历史的无动于衷的景物中有它的位置，它却不能在一种论证中找到，人们现在知道了这种推论的要价。

荒诞的自由

现在主要的事已定。我掌握着几个我不能松手的明显的事实。我知道的，可靠的，我不能否认的，我不能丢弃的，这些才算数。我完全可以否定我那靠不明确的怀念为生的自我的部分，但对统一的愿望、对解决的渴望、对明确和一致的要求除外。在这个包围着我、冲撞着我、激动着我的世界中，我可以驳斥一切，除了混沌、偶然之王和产生于混乱的神圣的等值。我不知道这世界是否有一种超越它的意义。但是我知道我不认识这意义，目前我也不可能认识它。对我来说，一种超越我的环境的含义意味着什么？我只能以人的术语来理解。我捉摸到的，抵抗着我的，我理解的就是这些。这两种可靠的东西，即我对绝对和统一的渴望及这个世界对一种理性的、合理的原则的不可还原性，我还知道我不能使二者和解。除了让一种我并没有而且在我的环境条件下也毫无意义的希望起作用外，我能承认什么其它的真理呢？

假如我是树中的一棵树，动物中的一只猫，这人生可能会

① 参见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引言部分。——原编者注

有一种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意义，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可能会属于这个世界，而现在我以我全部的意识和我对熟识的全部要求来和这个世界相对立。正是这个如此可笑的理性使我和任何创造相对立。我不能把它一笔抹煞。我相信凡是真实的东西，我就应该坚持。我觉得如此明显的东西，即便是反对我的，我也应该支持。是什么造成了这冲突的内容以及世界和我的精神之间的这种分裂，如果不是我对此所具有的意识的话？如果我想保持这种状况，那是通过一种不断的、总在更新、总是紧张的意识。这就是我眼下应该记住的东西。这时，荒诞既是如此明显又是如此难以征服，它进入一个人的生活之中，并找到了它的故乡。也是在这个时候，精神可以离开清醒的努力的那条荒凉干燥的道路。这条道路现在伸进了日常生活。它又找到了无名氏的世界，而人也带着他的反抗和远见从此以后回到这世界中去。他不再会希望了。这个现实的地狱，终于成了他的王国。所有的问题重又露出锋芒。抽象的事实在形式和色彩的抒情面前退却了。精神的冲突具体化了，又找到了人心的悲惨而出色的隐蔽处。什么也没有解决。但是一切又都改观了。人们将死去、以跳跃来逃避、重新盖起一座适合他的观念和形式的房子吗？还是相反，人们将接受荒诞的令人痛苦却又奇妙无比的挑战？让我们为此做出最后的努力并得出我们的一切后果吧。躯体，温情，创造，行为，人类的高贵，让我们在这疯狂的世界中重新获得它们的位置吧。人将终于在那里获得他的伟大赖以为生的荒诞之酒和冷漠之粮。

让我再次强调方法：问题在于坚持。在他的道路的某一点上，荒诞的人受到吸引。历史不乏宗教和预言家，但没有神。人们要求他跳跃。他所能够回答的，就是他不太理解，事情不

明显。而他恰恰只想做他理解的事情。人们向他肯定这是骄傲之罪，但是他不懂罪孽的概念；人们向他肯定也许地狱就在尽头，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无法给自己描绘出这种奇怪的前途；人们还向他肯定他要失去永恒的生命，但是他觉得这微不足道。人们想要让他承认他的罪过，他却觉得自己是清白的。说真的，他只感觉到这一点：他那无法挽回的清白。正是这清白使他为所欲为。这样，他要求于自己的，就是单单靠着他所知道的东西生活，与存在的东西取得一致以及不使任何不可靠的东西介入。人们对他回答说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但是，至少这就是一种可靠的东西。他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东西：他想知道是否可能义无反顾地生活。

现在我来谈自杀的概念。人们已经感觉到可能给予它什么样的解决。在这一点上，问题被颠倒过来了。先前的问题是知道人生要值得过是否就得有一种意义。这里正相反，看来是人生越没有意义就越值得过。体验一种经验、一种命运，就是完全地接受。然而，假如人们不是千方百计地在自己面前保持这种经过意识逐日整理过的荒诞的话，他既知道这命运是荒诞的，那就不会体验这命运。否定他赖以生活的对立的某一项，就是逃避这种对立。取消意识的反抗，就是回避问题。不断革命这一主题就这样转移到个人的经验中去了。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使荒诞活着，首先就是正视它。与欧律迪刻①相反，荒诞只是在人离开它时才死去。因此，协调一致的哲学立场之一，就是反抗。反抗就是人和他自己的阴暗面之间的永恒对抗。它要求一种不可能的透明。它时时刻刻都对世界提出疑问。正如

① 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之妻欧律迪刻受到阿里斯塔俄斯的追逐，被蛇咬死。

危险向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把握世界的机会，形而上的反抗把意识贯穿于经验的始终。它就是人对他自己的那种不变的存在。它不是向往，它没有希望。这种反抗只是一个不可抵抗的命运的保证，却没有本应伴同这保证的那种顺从。

正是在这里，人们看到荒诞的经验距离自杀有多么远。人们可能认为自杀紧跟着反抗。但是不对。因为自杀表现不出反抗的逻辑的结局。因为根据它所提出的允诺，它正是反抗的反面。如同跳跃一样，自杀是尽其所能的接受。一切都至善至美了，人又回到他的本质的历史中了。他的未来，唯一的、可怕的未来，他已分辨出来，并投入其中。自杀以它的方式解决了荒诞。它把它拖入同一种死亡中去。但是我知道，荒诞是坚持不懈的，不能解决。荒诞逃脱了自杀，因为它同时是对死亡的意识和拒绝。在一个死刑犯的临终的思想的最前沿，荒诞就是那根鞋带，他就在令人眩晕的沉沦的边缘，一无所见，单单看见了几米外的那根鞋带。自杀者的反面，正好是死刑犯。

这反抗把它的价值给了人生。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对于一个目光开阔的人来说，最美的景象莫过于智力和一种超越他的现实之间的搏斗①。人类骄傲的景象是无与伦比的。任何贬值都莫奈它何。精神给自己规定的这种纪律，这种锻造得无懈可击的意志，这种面对面，是有着某种强大而奇异的东西的。非人性用这种现实造就了人的伟大，使这种现实贫乏，就是使自己贫乏。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对我解释一切的那些理论也同时使我衰弱。它们把我自己的生活的重负从我身上卸下，而我是应该独力承担的。在这转折处，我只能设想，一种怀疑主义的玄学将要和一种弃世的道德结成联盟。

---

① 参见塞内卡《论神意》第2章第7节。——原编者注

意识和反抗，这些拒绝是出世的反面。人心中一切不可克服、充满激情的东西都向着他的生活的反面激励着它们。要未曾和解地死，不能心甘情愿地死。自杀是个未知数。荒诞的人只能穷尽一切，并且穷尽自己。荒诞是他的最极端的张力，是他以一种孤独的努力不断保持着的张力，因为他知道，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意识和反抗中，他显示出他的唯一的真理，即挑战。这是一个重要的后果。

这种经过协商的立场在于引出由一种明显的概念带来的全部后果（也仅此而已），我若坚持这种立场，就面临着第二个反常现象。为了忠于这个方法，我毫不理会形而上的自由这个问题。知道人是否是自由的，这我没有兴趣。我只能体验到我自己的自由。对于这种自由，我不能获得一般的概念，但有一些明确的估计。“自在的自由”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上帝的问题相连。知道人是否是自由的，这要求人们知道他能否有一个主人。这个问题的特殊的荒诞性来源于概念本身使自由问题成为可能，同时又取消它的全部意义。因为在上帝面前，恶的问题更甚于自由的问题。人们知道这种抉择：或者我们不是自由的，或者万能的上帝对恶负有责任。或者我们是自由的，负有责任的，而上帝不是万能的。经院式的钻牛角尖对这个反常现象的不容置辩并没有增加或减少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迷失在对一种概念的颂扬或简单定义之中，这种概念从超出我的个人经验那一刻起就逃脱了我的把握并失去了意义。我不能理解一种由某个更高一级的存在给予我的自由能是什么东西。我已经失去了等级感。我对自由只能有囚徒或国家中的现代个人的理解。我所认识的唯一自由，是

精神和行动的自由。如果说荒诞取消了我对永恒自由的一切机会，它却还给我并激发了我的行动的自由。这种对希望和未来的剥夺意味着增加人的不受约束性。

在与荒诞相遇之前，平常的人是带着若干目的、对未来或对辩解（问题不在于对什么人或什么事）的关心来生活的。他估量他的运气，把希望寄托在来日、退休或儿子的工作上。他还相信他生活中的某种东西能有所发展。实际上，他行动起来就象他是自由的一样，尽管所有的事实都使这种自由充满了矛盾。在遇到荒诞之后，一切都被震动了。这种"我在"的想法，我的仿佛一切都有一种意义(尽管我说过并非有什么意义)的那种行动方式，这一切都被一种可能的死亡所具有的荒诞性以一种令人眩晕的方式推翻了。想到来日，确立一种目的、有所偏好，这一切都以相信自由为前提，尽管人们有时也确信并没有感受到自由。但是在这个时候，这种高级的自由，这种唯独它能够建立一种真理的存有的自由，我知道得很清楚，是并不存在的。作为唯一的现实，死亡就在那儿。死亡之后，一切就都完了。我也没有永存的自由，我是奴隶，尤其是一个没有永恒革命希望的、不求助于蔑视的奴隶。而谁没有革命、没有蔑视却能始终是一个奴隶？什么样的自由没有永恒的保证能够在充分的意义上存在？

但是同时，荒诞的人也明白，到目前为止，他一直与建立在他赖以为生的幻想之上的那个关于自由的公设连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束缚着他。在他为他的生活想象出一个目的的情况下，他是符合一种需要达到的目的的要求的，并且成了他的自由的奴隶。这样，我就只能象我准备成为的家长（或工程师，或群众的领导者，或邮电部门的临时雇员）那样行事了。我相信我可以选择成为什么人，不成为什么人。我相信这

一点是无意识的，这倒是真的。但是同时我也坚持我对周围的人的信仰、对我的人文的环境的偏见（其他人是那样地确信他们是自由的，这种愉快的心情是那样地具有传染性！）所作的公设。不管人们能够多么远地避开任何道德的或社会的偏见，人们总要部分地受其影响，甚至还让生活去适应其中最好的（偏见有好有坏）。这样，荒诞的人明白了他实际上并不自由。说得明确些，在我有所希望的情况下，在我为一种以存有或创造的方式属于我的真理感到不安的情况下，总之，在我安排我的生活并因此而证明我承认生活有一种意义的情况下，我为自己设置了栅栏，并把我的生活圈在其中。我象许多精神和心灵的公务员一样行事，他们只是引起我的厌恶，而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他们除了认真对待人的自由以外，什么事也不干。

荒诞在这一点上启发了我：来日是没有的。从此，这就是我的深刻的自由的原因。我这里进行两种比较。神秘主义者首先发现要给自己一种自由。由于沉溺在他们的神之中，服从他的规则，他们也就秘密地成为自由的了。他们是在一种自发地赞同的奴隶状态中发现一种深刻的独立的。然而，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人们尤其可以说他们是针对自身而感到自由的，特别是感到不如被解放那样自由。同样，荒诞的人整个地转向死亡（这里被看作是最明显的荒诞），他就感到摆脱了那种在他身上结晶的热情的关切之外的一切东西。针对通行的规则，他体味到一种自由。这里人们看到存在哲学的出发主题保持着它们的全部价值。回到意识，逃避日常的沉睡，形象地说明了荒诞的自由的最初活动。但是，它对准的是存在的说教，同时也是实际上逃脱了意识的那种精神的跳跃①。同样（这是我的第

① 这里说的是一种事实的比较，而不是对顺从的赞美。荒诞的人是和解的人的反面。——作者原注

二个比较），古代的奴隶并不属于自己。但是，他们知道那种根本感觉不到负有责任的自由。死亡也有一双贵族的手，既镇压，也解放。

沉浸在这种无底的可靠之中，从此感到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是陌生的，足以使人不象情人那样近视地增加并过完这种生活，这里面就有一种解放的原则。这种新的独立结束了，如同任何行动的自由一样。它不对永恒开支票。但是它代替了自由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在死亡时全部停止。清晨，监狱的门在死刑犯面前打开，他的神圣的不受约束性，这种除了生活的纯粹的火焰之外对一切事物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感兴趣，死亡和荒诞，人们清楚地感到，这些东西是唯一的理性的自由的原则，这种自由是一颗人心可以体验和经历的。这是第二个后果。荒诞的人就这样隐约看见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宇宙，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的，但是一切又应有尽有，过了这个宇宙，就是崩溃和虚无。这时他可以决定同意生活在这样的宇宙中，并从中汲取他的力量、他对希望的拒绝以及对一种没有慰藉的生活的固执的见证。

然而，这样一个宇宙中的生活意味着什么？目前这只意味着对未来的冷漠和穷尽现存的一切的激情。相信生活的意义，这总是意味着一种价值等级，一种选择以及我们的偏好。相信荒诞，根据我们的定义，告诉我们的却是相反。不过，这值得再谈一谈。

知道人能否义无反顾地生活，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一切。我丝毫也不想走出这个范围。生活的这种面貌既已给了我，我能够将就吗？况且，面对着这特殊的挂虑，对荒诞的信仰又来用经验的数量取代其质量。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有荒诞的面

目，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系于我的有意识的反抗和它挣扎其中的黑暗之间的永恒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就其有限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那么我应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我无须去想这是庸俗的还是令人恶心的，是高雅的还是令人遗憾的。在这里，为了事实的判断，价值的判断被一劳永逸地排除了。我只须从我能看见的一切中得出结论，不贸然提出任何还是假设的东西。假设说这样生活不是诚实的，那么，真正的诚实将迫使我不诚实。

生活得最多，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一生活准则毫无意义。必须加以明确。首先，似乎人们对数量这个概念挖掘得不够。因为这个概念可以触及人类经验的很大一部分。一个人的道德，他的价值等级只是从他积聚起来的经验的数量和种类来看才有意义。然而，现代生活的条件强加给大多数人同样数量的经验，因此，也是同样深刻的经验。当然，还应该充分估计个人的自发的贡献，即他身上“已知的”东西。但是，我对此不能判断，我再说一遍，这里我的准则是处理直接的明显事物。于是我看到，一种通行的道德的特点，比诸激励着它的那些原则的理想的重要性，更存在于可以按大小分类的一种经验的标准之中。说得勉强一点，希腊人有他们的娱乐的道德，正如我们有我们的八小时工作制的道德。但是许多人，以及其中最悲惨的人，已经使我们预感到一种更长久的经验将改变这张价值表。他们使我们想到那个日常生活的冒险者，他仅仅用经验的数量打破了一切记录（我有意使用这一运动术语），从而赢得了他的道德①。不过，我们还是离开浪漫主义吧，我们只来

① 数量有时产生质量。如果我相信科学理论的最近的成果的话，一切物质都是由若干能量中心构成的。它们的或大或小的数量形成了它们的或大或小的特殊性。十亿个离子和一个离子的区别不仅在数量，而且也在质量。在人类的经验中，类似之处很容易找到。——作者原注

问，对一个决心接受打赌并严格遵守他所认可的赌博规则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

打破一切记录，这首先并且也仅仅是尽可能经常地正视世界。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又没有矛盾和文字游戏呢？因为，一方面，荒诞告诉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无关紧要的，另一方面，它又导致最大量的经验。那么，如何能不象我上面谈到的那些人那样行事，如何选择给我们带来尽可能多的人文材料的生活形式，如何因此而引入一种有人从另一个方面声称要加以抛弃的价值等级呢？

然而，教导我们的仍然是荒诞和他的矛盾的生活。因为错误在于认为经验的数量取决于我们的生活，而实际上它只取决于我们自己。这里需要简单化。对于两个寿命相同的人，世界总是提供同样数量的经验。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感觉到他的生活、他的反抗、他的自由，而且要尽其可能，这就是生活，而且是尽其可能地生活。清醒统治的地方，价值等级就没有用了。让我们再简单化一些。我们说唯一的障碍，唯一的“错过的机会”，是由过早的死亡组成的。这里暗示出的宇宙只是因为和死亡这个恒定的例外相对立才得以生存的。所以，在荒诞的人眼中，没有任何深刻性、任何感情、任何激情、任何牺牲可以在四十年的有意识的生活和六十年的清醒二者相等①（哪怕他愿意也不行）。疯狂和死亡，这是他的不可补救的事情。人并不选择。他所具有的荒诞和增加的生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① 对虚无这个如此不同的概念亦可作同样的思考。它对真实不增。也不在虚无的心理经验中，考虑到二千年以后的事情，我们自己的虚无才真正地有了意义。从它的一种面貌看，虚无正是由未来的生活的总和造成的，而那些生活将不会是我们的生活了。——作者原注

移，而是取决于他的反面，即死亡①。仔细掂量一下用词，这里只是一个机会的问题。应该善于赞同。二十年的生活和经验是绝对不可替代的。

由于一种对一个如此富有经验的民族来说是很奇怪的不一致，希腊人希望早夭的人是神所庞爱的。如果人们愿意承认：进入神的可笑的世界，就是丧失最纯洁的快乐，即感觉并且是在人世间感觉，唯其如此，那才是真的。一个不断地有意识的灵魂面前的现存以及现存的连续，这就是荒诞的人的理想。然而，理想一词在这里保留着一种虚假的声音。这甚至并不是他的使命，而仅仅是他的推理的第三个后果。从非人的一种焦虑的意识出发，关于荒诞的沉思又回到了它的旅程的终点，这旅程就在人的反抗的热烈的火焰之中②。

这样，我就从荒诞中引出三种后果，即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仅仅通过意识的作用，我把死亡的邀请变成了生活的准则——而且我拒绝自杀。我当然知道贯穿在那些岁月之中的沉重的回声。然而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因为那是必要的。当尼采写道："很明显，天上和地上的主要事情就是长期地、在一个方向地服从：慢慢地就产生出某种值得为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东西，例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某

① 意志在这里只是代理人，它倾向于保持意志。它提供一种生活纪律，这是值得重视的。——作者原注

② 重要的是要一致。人们在这里是从一种对世界的赞同出发的。但是，东方思想教导说，人们在选择反对世界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同样的逻辑努力。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并给本文画出了前景和界限。但是，当否定世界是以同样的严格性进行着的时候，人们在有关事业的无所谓方面常常达到相似的结果(在某些吠檀多派中)。在一部叫作《选择》的重要著作中，让·格勒尼埃以此种方式建立了一种真正的《无所谓哲学》。——作者原注

种使事物改观的东西、某种文雅的、疯狂的或神圣的东西”①，他就说明了一种具有伟大气派的道德的准则。然而，他也指出了荒诞的人的道路。服从激情，这同时既是容易的又是困难的。不过，人有时应该在与困难的较量中显出自己的本色。唯有他能够做到。

阿兰②说：“祈祷，就是夜来到了思想上。”神秘主义者和存在哲学家回答说③：“但是精神必须与夜相遇。”当然，但不是那种在闭合的双眼之下、仅仅由人的意志而产生的夜，不是那昏暗的、精神激起并在其中迷失的夜。如果它应该遇上夜，那应该是绝望之夜，总是清醒的，应该是极地之夜，精神的不眠之夜，从中可能会升起白色的、纯洁的光，使每一种东西都在智慧的光明中轮廓分明。在这个程度上，等值就与充满激情的理解相遇了。这时甚至不再有评断存在的跳跃的问题了。它在人类态度的古老画卷中重获它的位置。对于观者来说，如果他是有意识的，这跳跃仍然是荒诞的。他以为消除了这个反常现象，其实，他是完全恢复了这个反常现象。在这种名义下，他是动人的。在这种名义下，一切重归原位，荒诞的世界在其壮丽和杂多之中获得再生。

然而，中途停止是不对的，满足于一种观察的方式、放弃矛盾这种也许是全部精神力量中最微妙的力量也是困难的。以上所述只是确定了一种思想的方式。现在，问题是生活了。

---

① 见尼采《超乎善恶》，第183页。——原编者注

② 阿兰(1863—1951)，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下面这句话见于他的《观念和时代》，加利玛版，1927年，第1卷，第15页。——原编者注

③ 见谢斯托夫《死亡的启示》，第183页。——原编者注

荒诞的人

倘若斯塔夫罗金有宗教信仰，那他也并不相信他有宗教信仰。倘若他没有宗教信仰，那他也并不相信他没有宗教信仰。

——《群魔》①

歌德说："我的场地就是时间。"这真是一句荒诞的警句。那么荒诞的人到底是什么呢？是那个不否认永恒，但也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并非怀念对他是陌生的。但是他更喜欢他的勇气和推理。前者教他义无反顾地生活和满足于现有的东西，后者让他知道他的局限。他确信他的自由到了尽头，他的反抗没有前途，他的意识可以消亡，然而他在他的生活的时间中继续他的冒险。这就是他的场地，这就是他的行动，他使之避免除自己的判断以外的任何判断。对他来说，一种更伟大的生活并不能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否则就是不诚实的。我在这里甚至不谈人们称为后世的那种可笑的永恒。罗兰夫人② 相信它。这种轻率得到了教训。后世很愿意记下这个词，但是忘了加以评断。罗兰夫人引不起后世的兴趣。

这里谈不上道德问题。我见过一些人很有道德地干着坏

① 见《群魔》第2部第6章《忙碌不堪的一夜》。——原编者注。译者按此章在中译本第3部。

② 罗兰夫人(1754—1793)是法国资阶级革命中吉伦特派的代表人物。后被革命法庭处以绞刑。她在狱中写有《回忆录》。

事，我每天都看见诚实并不需要准则。只有一种道德是荒诞的人可以接受的，即那种不脱离上帝的道德，因为它是自律的。然而，荒诞的人恰恰是生活于这个上帝之外的。至于其它道德（也包括非道德主义），荒诞的人从中只看见辩白，而他是没什么可辩白的。我这里是从他的无辜这一原则出发的。

这种无辜是可怕的。“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伊凡·卡拉玛佐夫①喊道。这也发出了荒诞的气味，但条件是不是庸俗地理解。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了：这不是一种解脱的、快乐的叫喊，而是一种辛酸的确认。确信有一个可以给生活以意义的上帝，其诱惑力远远超过了不受惩罚的作恶的能力。选择不会是困难的。但却无可选择，辛酸于是开始了。荒诞并不解脱，而是连结。它并不允许一切行动。一切都可允许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被禁止。荒诞仅仅是把一切行动的等值还给这些行动的后果。它并不劝人犯罪，否则就是幼稚的，但是它为悔恨恢复其无益。同样，如果所有的经验都是无关紧要的，那么，义务的经验就和另一种经验一样地合乎情理。人们可以因任性而有德行。

一切道德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即一个行动具有使之合乎情理或使之磨灭无效的后果。一种浸透了荒诞的精神只是判断这些结果应被心平气和地加以估量。它随时准备付出代价。换句话说，对于它，假使说有负责的，却没有犯罪的。至多，它认可利用过去的经验来缔造它未来的行动。时间将使时间生存，而生活将为生活服务。在这个既局限又充满可能的场地中，一切本身，除了它的清醒之外，它都觉得是不可预料的。从这个不可理喻的秩序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准则呢？它觉得可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的主人公。

以是有教益的唯一真理丝毫也不是形式的：这真理活跃起来，并在人中间展开。因此，荒诞在其推理的终结时能够寻找的不是伦理的准则，而是形象的说明是人类生活的气息。此后的一些形象即属此类。它们一边继续荒诞的推理，一边把它的态度和它们的热力赋予它。

一个例子不一定就是一个值得仿效的例子（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更非如此），这些形象的说明并不因此就成为典范，这种观念我还需要展开吗？除了有使命之外，比较起来，人们要从卢梭那里认为应该爬着走路、从尼采那里认为虐待母亲是合适的，那就会使自己变得可笑。一位现代的作者写道："应该是荒诞的，但不应该受骗。"这里涉及的态度只有考虑到其反面才能具有全部意义。一个邮局的临时雇员和一位征服者是平等的，如果他们的意识是一样的话。在这方面，一切经验都是无关紧要的。有的帮助人，有的妨害人。如果他是有意识的，经验就帮助他。不然的话，也没有关系：一个人的失败并不是对环境下判断，而是对其本人下判断。

我选择的只是那些试图穷尽自身的人，或者我意识到他们是在穷尽自身的人。到此为止。眼下，我只想谈论一个世界，其思想和生活都被剥夺了未来的世界。一切使人工作或骚动的东西都利用希望。因此，唯一不说谎的思想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思想。在荒诞的世界中，一个概念或生命的价值是以其贫乏来衡量的。

堂璜作风

如果爱就够了，事情就太简单了。人们越是爱，荒诞就越是牢固。堂璜拈花惹草绝不是因为缺乏爱情。把他表现为一个

寻求完全的爱情的有幻象的人是可笑的。然而，那的确是因为他怀着同等的激动、每次都全心全意地爱她们，他才必须重复那种天赋和那种感情的深化。因此，每一个女人都希望带给他从未有人给予过他的那种东西。每一次她们都大错特错，而仅仅使他感到重复的必要。其中有一位喊道："反正我给了你爱情。"他笑了，说道："反正？不，不过是多了一次。"人们会对此感到惊奇吗？为什么要爱得深就得爱得少呢？

堂璜是忧郁的吗？不大象。我几乎不必求助于故事。那笑，那胜利的放肆，那跳跃，那对演戏的爱好，都是清晰的，快乐的。任何健康的人都倾向于繁殖。堂璜也是如此。再者，忧郁的人有两个忧郁的原因，或者是他们无知，或者是他们希望。堂璜知道，而且不抱希望。他使人想到那些艺术家，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并且从不超越，在他们的精神稳定下来的不牢靠的间歇中，他们又有着大师的一切奇妙的舒适。而这就是天才：知道其边界的智力。直到肉体死亡的边缘，堂璜都不知道忧郁为何物。从他知道的那一刻起，他就爆发出大笑，而这就原谅了一切。在他希望的时候，他是忧郁的。今天，在这个女人的嘴唇上，他重新发现了唯一科学的苦涩而慰藉的滋味。苦涩？不尽然：那是使幸福变得敏感的必要的缺陷！

试图在堂璜身上看见一个饱读传道书的人，那可是上了大当。因为对他来说，如果希望另一种生活不是虚荣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是虚荣了。既然他对上天本身玩弄虚荣，他就证明了这一点。悔恨把欲望消磨在享乐之中，这种无能的老一套与他无缘。这种事情对浮士德是很合适的，他相信上帝到把自己出

卖给魔鬼的程度。对堂璜来说，事情就更简单了。莫利纳①的“骗子”对地狱的威胁总是回答说：“请你为我延期吧！”死后的事情毫无意义，而会生活的人有着多么漫长的岁月啊！浮士德要求这个世界的财富：不幸的人只须伸出手来干。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灵魂快乐，就已经是把它出卖了。相反，堂璜要求的是满足。如果他离开一个女人，并非绝对地因为他对她没有欲望了。美丽的女人总是能激起情欲的。但是，他是否想望另一个女人，这不是一回事。

今世的生活使他满足，最坏的莫过于失掉它。这疯子是一位大智者。然而，靠希望生活的人却与这个世界合不上拍，在这个世界中，善良让位于慷慨，温情让位于男性的沉默，一致让位于孤独的勇敢。而且人人都在说：“这是一个弱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或一个圣人。”必须吞下使人感到屈辱的伟大。

人们对堂璜的话语和那句对任何女人都有用的话（或者对那种贬低了他所欣赏的东西的同谋的笑）感到相当愤慨。然而，对于寻求快乐的数量的人来说，唯有效率才算数。口令已经显示出效力，使之复化又有何益？女人，男人，都不听，只是听发出口令的声音罢了。这些口令就是准则，协议和礼貌。人们发出了口令，然后，最重要的还有待去做呢。堂璜已准备就绪。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提出道德问题呢？他不是象米洛兹②笔下的玛纳拉那样想要超凡入圣才受入狱之罚的。对他来说，地狱是一个人们挑动起来的东西。面对神的愤怒，他只有一个回

① 莫利纳(约1583—1648)，西班牙著名剧作家，其作品《塞维勒的骗子》是一出著名的性格喜剧，其中首次出现了堂璜的形象。

② 米洛兹(1877—1939)，法国作家，原籍立陶宛。他的剧本《米盖尔·玛纳拉》塑造了一个孤独而痛苦的堂璜。

荅，而那正是人的荣誉。他对骑士说："我有名誉，我履行诺言，因为我是骑士。"但是，把他看成一个非道德主义者也是大错。他在这方面"与常人无异"：他的道德就是他的同情或厌恶。只有参照他通常所象征的人，人们才能很好地理解堂璜，即普通的诱惑者和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他是一个普通的诱惑者①。区别只有一点，即他是有意识的，因此他是荒诞的。一个诱惑者变得清醒，这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诱惑就是他的常态。只有在小说中人才改变常态或者变得更好。但是人们也可以说，什么也不曾改变，同时一切又都变化了。堂璜付诸行动的，是一种数量的伦理，与倾向于质量的圣人相反。不相信事物的深层的意义，这是荒诞的人的本色。那些热烈的或惊奇的面孔，他都一一看过，储存起来，并付之一炬。时间与他一起前进。荒诞的人就是那种不脱离时间的人。堂璜并不想"收集"女人。他穷尽其数量，并且同她们一起穷尽生活的机会。收集，就是有能力以过去为生。但是他拒绝悔恨，这希望的另一种形式。他不会看肖像。

他因此就是自私的吗？他无疑是个独特的利已主义者。但是，问题仍在于理解。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活的，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爱的。堂璜至少愿意说出来。但是，他说得简略，他可以进行选择。因为人们这里说的爱情是由对永恒的幻想装饰起来的。激情的所有专家都告诉我们，只有不愉快的永恒爱情。几乎没有不包含斗争的激情。一种这样的爱情只有在死亡这最后的矛盾中才会结束。要么是维特②，要么什么也不是。

① 在充分的意义上，并且连带他的缺点，一种健康的态度也是包含着缺点的。——作者原注

② 歌德小说中的人物。

这里也有好几种自杀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完全的献身和对自身的遗忘。堂璜象另一个人一样，知道这可以是很动人的。但是，他是少数人之一，他们知道那并不重要。他知道得同样清楚：被一种伟大的爱情引动得脱离个人的全部生活的人也许会变得丰富起来，但是，他们的爱情适中的那些人肯定要变得贫乏。一位母亲，一个热情的女人，必然有一颗干枯的心，因为这颗心脱离了世界。只有一种感情，一个人，一张面孔，但一切都已被吞噬。震动了堂璜的是另一种爱情，这种爱情是解放者。它随身带来了世界上的所有面孔，它的颤抖来自于它知道自己是可以消亡的。堂璜选择了成为无。

对他来说，问题在于看得清楚。我们只是考虑到一种来自书本和传说的集体的看事物的方式时，才把那种把我们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叫作爱情。然而，关于爱情，我只知道那种欲望、温情和智力的混合，这种混合把我同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它又因人而异。我没有权利用同一个名称称呼所有这些经验。这使人们不必从同样的行为中得到这些经验。荒诞的人在这里更增加了他不能够统一的东西。这样他就发现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至少象解放了接近他的那些人一样地也解放了他。唯有那种知道自己既是暂时的又是独特的爱情才是慷慨的爱情。对于堂璜来说，全部这些死亡和这些再生造就了他的生命之束。这是他的奉献以及使生命活跃起来的方式。我让别人去判断这是否谈得上利己。

我这里想到了所有那些绝对地希望堂璜受到惩罚的人们。不仅在来世，而且也在今世。我想到了所有那些关于晚年的堂璜的故事、传说和嘲笑。不过，堂璜早有准备。对于一个有意识的人来说，衰老以及它们所预兆的东西并不是一件使人惊讶的

事情。他之有意识，恰恰是因为他不向自己隐瞒其可怖之状。在雅典，有一座神庙是奉献给衰老的。人们把孩子们带到那儿去。对堂璜来说，人们越是笑他，他的形象越是分明。因此，他拒绝浪漫派赋予他的形象。那个痛苦万状的、可怜的堂璜，是无人想取笑的。人们可怜他，上天拯救他吗？并非如此。在堂璜隐约看见的那个宇宙中，可笑也是被理解的。他认为被惩罚是正常的。这是赌规。他接受了全部赌规，这正是他的慷慨。但是，他知道他有道理，谈不上惩罚。一种命运并不是一种惩罚。

这就是他的罪孽，而人们知道，永恒的人把这称作对他的惩罚。他达到了一种不存幻想的科学，这种科学否定他们所宣扬的一切。爱以及占有，征服以及穷尽，这就是他的认识的方式。（在这个《圣经》喜欢的字眼中有深意存焉，它将爱的行为称为“认识”。）他是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不理睬他们。一位专栏编辑转述道，真正的“骗子”是被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谋害而死的，后者想“结束堂璜的放纵和不信宗教，而堂璜的出生保证了他的不受惩罚”。他们随后就宣布上天以雷劈死了他。没有人检验过这种奇怪的结局。也没有人作出相反的证明。然而，无需考虑这是否象真的，我就可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我这里只是想记住“出生”一词，并借题发挥一下：这说的是生活保证了他的无辜。他只是从死亡中得到了现在成为传奇式的罪过。

那位石头骑士，为了惩罚敢于思想的鲜血和勇气而震动起来的那个冰冷的塑象，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吗？它的身上概括了永恒理性、秩序、普遍道德的全部权力以及一个易怒的上帝的全部奇怪的威严。这块巨大的、没有灵魂的石头只是象征着堂璜永远否定的那些力量。但是骑士的使命到此为止。霹雳可以

再回到人造的天上，而它正是从那儿被呼唤来的。真正的悲剧是在他们之外演出的。不，堂璜并非死于一只石头的手。我宁愿相信传说中的对抗，相信那个健全的人的疯狂的笑声，他向一个并不存在的神挑战。但是，我尤其相信堂璜在安娜处等候的那天夜里，骑士没有来，半夜之后，这不信宗教的人应该感到那些有道理的人们的可怕的辛酸。我更愿意接受关于他的一生的那种叙述，即他最后进了修道院。这并非故事的有教育意义的一面能够被认为是象真的。向上帝能求得什么栖身之处？更确切地说，这说明了一个浸透了荒诞的人生的合乎逻辑的结局以及一种转向没有来日的快乐的存在的粗暴解决。事乐在此以苦行结束。应该明白，这两者可以成为同一种解决的两副面孔。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形象：一个为肉体所叛的人的形象，他不能适时而死，就一边等着结束，一边演完喜剧，面对着他并不崇拜、却象侍奉生活一样地侍奉着的神，他跪在虚无面前，双臂伸向天空，他知道这天空既没有话语也没有深度。

我看见堂璜在一座西班牙修道院的一间小室中，那修道院藏在一座小山上。如果他看着什么东西的话，那不是逝去的爱情的幽灵，而可能是透过一个灼人的小孔望着西班牙的某个平原，壮丽的、没有灵魂的、他在其中认出自己的一片土地。是的，应该停止在这个忧郁而光辉的形象上。最后的结局，被等待然而并不被期望的结局，这最后的结局是可以忽略的。

喜　剧

哈姆莱特说："演戏，这就是我抓住国王的意识的陷阱。""抓住"一词用得好。因为意识要么走得很快，要么就缩回去。必须在那个它向自己匆匆一瞥的千载难逢的时刻凌空抓住它。普

通人不大喜欢耽搁。相反，什么都在催着他。然而同时，使他感到兴趣的又莫过于他自己，尤其是他可能成为的那种东西。他对于剧场和戏剧的爱好即由此而来，在那里，有那么多命运呈现在他面前，他接受其诗意而不必忍受其苦涩。人们至少可以在那里认出无意识的人，而他继续匆匆奔向无以名之的希望，荒诞的人开始于此人结束的地方。那里，精神不再旁观，而想自己参加进去。深入到所有那些生活中去，体验其多样性，就正是演出那些生活。我不是说演员们普遍地听从这种召唤，也不是说他们是荒诞的人，我是说他们的命运是一种荒诞的命运，可能诱惑或吸引一颗敏锐的心。为了不误解下文，以上所述是必要的。

演员在可以消亡的东西中为王。人们知道，在一切光荣之中，他的光荣是最为短暂的。至少在闲谈中人们可以这么说。然而，一切光荣都是短暂的。根据天狼星，歌德的作品在一万年之后将化为灰尘，其名也将被遗忘。也许会有几个考古学家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证据”。这种念头总是富有教益的。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念头将我们的骚动化为人们在冷漠中发现的那种深刻的高尚。它特别把我们的忧虑引向最可靠的东西，即最现实的东西。在一切光荣中，最不骗人的是那种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光荣。

因此，演员选择了不可计数的光荣，即那种自己使自己长久、自己感受自己的光荣。万物终有一死，正是演员从中得出了最好的结论。演员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作家即便被埋没，也怀着希望。他假设他的作品将证明他是何等样人。演员至多留给我们一幅照片，他的行动和沉默，他的短促的呼吸或爱情的喘息，他自己的任何东西都到不了我们跟前。对他来说，不出名就是不演戏，而不演戏，就是和他本来可以使之活

跃或使之再生的那些人一起死了一百次。

看到一种建筑在最短暂的创造之上的可以消亡的光荣，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一个演员可以有三个小时成为伊阿古或阿尔塞斯特，费德尔或格罗塞斯特①。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在五十平方米的舞台上使这些人物诞生与死亡。荒诞从未被表现得这样好，这样长久。这些奇妙的生活，这些独特而完整的命运，生长与衰亡在几堵墙、几小时之内，还能希望什么更说明问题的缩影呢？过了高原，希吉斯蒙② 就什么也不是了。两个小时之后，人们就看见演员在城里吃饭。也许此时就是人生如梦吧。然而，希吉斯蒙之后还有别人。犹豫不定的主人公代替了复仇之后大喊大叫的人。历经各个时代和各种精神，按照可能和实际的样子模仿一个人，演员就与另一个人物，即旅行者会合了。他和这旅行者一样，也是耗尽某种东西，不停地奔波。他是时间的旅游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又是灵魂的被追捕的旅行者。如果数量的道德果真能找到食粮，那就正是在这个奇特的舞台上找到的。演员能从那些人物身上得到多少好处，这是很难说的。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他进入这些不可替代的生活到了何种程度。实际上，有时候他随时带着这些人物，他们也稍许越出他们诞生的时间和空间。他们陪伴着演员，演员要离开他过去的样子也不很容易了。有时候，他要端起一个杯子，会露出哈姆莱特举起酒杯的动作。不，他和他赋予生命的人物之间的距离并不是那么大。每个月或每一天，他都在充分地表明着这一含义丰富的真理，即一个人希望是什么和他现在是什么之间并没有界线。表象在何种程度上成

① 以上四人分别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莫里哀的《恨世者》、拉辛的《费德尔》和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中的人物。

② 卡尔德隆的《人生如梦》一剧中的人物。

为存在，这就是他所表现的，而他总是力图演得更好的。因为这就是他的艺术，他的艺术就是绝对地假装，就是尽可能地深入不是他本人的那些生活中去。经过努力，他的使命也清楚了：刻意做到什么人也不是，或者是好几个人。他为创造他的人物所受的局限越是狭窄，他的才能就越是必要。他过三小时要死，其面貌就是他今天的面貌。他在三小时内必须体验和表达整个的一种非凡的命运。这叫作为了重新发现自己先失掉自己。在这三小时内，他要把一条走不通的路走到底，而这条路观众席上的人要走整整一生。

演员模仿可以消亡的东西，只是在表面上得到表现和改善。戏剧的惯例是心灵仅仅通过动作和在肉体中或通过既是灵魂的也是肉体的声音得到表达和被人理解。这门艺术的规律是一切都要夸张和得到形体的表现。如果在舞台上要象真的那样去爱，运用那种不可替代的心灵的声音，象人们凝视时那样的去看，那我们的语言就始终是一种密码了。在这里，沉默应当被人听见。爱情要提高调门，而静止本身要变得壮观。肉体至高无上。“演戏似的”并非随意而为，这个被错误地贬低的词包含着一种完整的美学和完整的伦理。人的一生有一半是在暗示、掉头不看和沉默中度过的。演员在这里是一个不速之客。他为被束缚的灵魂解除魔法，于是激情就冲向它们的舞台了。它们通过各种动作说话，它们的活动离不开喊叫。演员就这样构成他的人物，然后展示出来。他或画或雕，把自己塑进他们的想象出来的形式之中，在他们的幽灵中注入自己的血液。不用说，我谈的是伟大的戏剧，它是给演员以机会来充实它那完全具体的命运的戏剧。请看莎士比亚。在第一场，是肉体的疯狂驱动着舞蹈。它们解释了一切。没有它们，一切都将崩溃。

如果没有那个驱逐考德莉娅和谴责爱德加的狂暴的举动，李尔王是决不会赴疯狂给予他的约会的。这出悲剧在精神错乱的气氛中展开是很恰当的。灵魂听命于魔鬼和它们的狂舞乱跳。疯子不少于四个，一个出于职业，一个出于意愿，另外两个则出于折磨：四个乱了套的肉体，这是同一种状况的四种无法形容的面目。

人的肉体本身的系统是不够的。面具和厚底靴，在其最基本的成分中简化并突出脸部的化装，既夸张又简单化的服装，一切都为了外表而牺牲了，而这仅仅是为了眼睛。由于一种荒诞的奇迹，肉体还带来了认识。如果我演伊阿古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很好地理解他。我听他说话是没有用的，我只是在看见他时才抓住了他。从荒诞的人物那里，演员获得了单调，那个他贯穿在他的各种主人公身上的独特的、迷人的、既奇怪又熟悉的轮廓。这里仍是伟大的戏剧作品有助于情调的统一①。演员自我矛盾之处正在这里：他既单一又多样，如此多的灵魂通过一个肉体概括出来。然而，这就是荒诞的矛盾本身，就是那个想达到和体验一切的人，就是那个徒劳的企图，就是那种没有意义的固执。永远自相矛盾的东西却在他身上统一起来了。他正处在这个地方，这里肉体和精神会合并紧抱在一起，这里因失败而厌倦的精神转向它最忠实的盟友。哈姆莱特说："祝福他们吧，他们的鲜血和判断是那样奇怪地混为一体，他们不再是命运的手指随意开合的笛子了。"

① 这里我想到了莫里哀的阿尔塞斯特。一切都是那样的简单，明显，粗俗。阿塞斯特对菲林特，赛利麦纳对艾利昂特，整个主题存在于一个被推向结局的性格的荒诞的后果之中，诗句本身也是一种"歪诗"，差不多和性格的单调一样的节奏。——作者原注

教会怎么没有谴责演员的这种活动呢？它反对这种艺术中异端灵魂的增长、感情的泛滥、一种精神上的骇人听闻的企图，这种精神拒绝只经历一种命运，反而加速投入各种放纵之中。它在他们当中禁止对现时的兴趣和普洛透斯① 式的胜利，这些都是对它的教导的否定。永恒不是一场赌博。一种精神喜欢喜剧到了胜过喜欢永恒的程度就得不到拯救。在“到处”和“永远”之间没有妥协。因此，这种如此被贬低的职业就可能产生一种过分的精神冲突。尼采说：“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实际上，整个悲剧就在这种选择之中。

阿德里安·勒古弗勒② 临终时很想忏悔，领受圣体，但是拒绝放弃她的职业。她因此而没有得到忏悔的好处。实际上，这不是在上帝面前维护她的深刻的激情又是什么呢？这个垂死的女人含着眼泪拒绝否定她称之为她的艺术的东西，她因此而表现出一种她在脚灯前未曾达到的伟大。这是她的最美的角色，是最难扮演的角色。在上天和一种可笑的忠诚之间进行选择，喜欢自己甚于喜欢永恒或者投入上帝的怀抱，这就是她必须在其中坚持的古老的悲剧。

当时的演员们是自知已被革出教门的。加入这一行列，就是选择了地狱。教会看出它最凶恶的敌人就在他们中间。有几个文人发怒了：“怎么！拒绝给莫里哀最后的帮助！”然而，那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对一个死在舞台上、在粉墨之下结束了整个地奉献给娱乐的一生的人。人们说到他时提到天才原谅一切。然而天才什么也原谅不了，恰恰是因为天才不允许这样。

那时演员知道什么惩罚在等着他。但是，以生活本身给他

① 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又名“海中老人”。

② 法国著名女演员(1692—1730)。

留着的最后惩罚为代价的如此模糊的威胁能有什么意义呢？他事先体验到并全部接受的正是这一点。演员和荒诞的人一样，过早的死对他们来说都是无可挽回的。什么也补偿不了他可能经历过的那些面貌和时代的总和。然而，无论如何，问题是死亡。因为演员无疑是无处不在，但是，时间也在拖着他，并在他身上发生作用。

有一点儿想象力就足以感觉到演员的命运意味着什么。他是在时间中一个一个地创造他的人物。他是在时间中学会控制他们。他越是体验过不同的生活，他就越能和它们分得开。必须死在台上和世界上的时间到了。他体验过的东西面对着他。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感到这场冒险所具有的令人痛苦的、不可替代的东西。他知道，他现在可以死了。老演员们是有隐退的居所的。

征　服

征服者说："不，不要以为我为了喜欢行动就得忘记思想。相反，我可以完美地确定我所相信的东西。因为我是竭尽全力地相信，我观察的目光既可靠又明确。不要相信那些人说的：'这一点我是太知道了，所以我说不出来。'因为如果他们说不出来，那是他们不知道，或是由于懒惰，他们浅尝辄止。"

我没有很多看法。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人意识到，他过了许多年才核实了一个真理。然而一个真理，如果是一目了然的话，对于指导一种存在也就足够了。至于我，我关于个人的确有某种东西要说。应该不客气地说，如果必要的话，应该带着适当的轻蔑来说。

一个人应该是沉默多于说话的。有许多东西我将是不说

的。然而我坚信，所有那些对个人进行过判断的人，他们寻求立论的根据的经验要比我们少得多。智力，动力的智力，它也许已经预感到应该确认东西的了。然而时代，它的废墟和鲜血已经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显而易见的东西了。古代的民族，甚至晚些的，直至我们这个机械时代的民族，都有可能衡量社会的美德和个人的美德，并且研究是哪一个应为另一个服务。这首先是根据人心的根深蒂固的错乱，这种错乱认为人来到世上是为了服务或者被服务。其次是因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还没有显示出各自的全部本领。

我见过一些善良的人，他们赞叹荷兰画家那些产生于血腥的弗朗德勒战争的杰作，为西里西亚的神秘主义者在可怕的三十年战争中所作的祷告所感动。在他们惊奇的眼中，现世的动乱之上浮动着永恒的价值。然而时间前进了。今天的画家失去了那种宁静。尽管他们实际上还有为创造者所必需的心，我是说一颗干枯的心，那也丝毫用不上了，因为人人以及圣人自己都被动员起来了。也许这就是我最深刻地感觉到的东西。战壕中每有一次失败，每有一个行动，比喻或祈祷，被钢铁碾碎，永恒就丢失了一部分。我意识到我不能离开我的时间，我就决定与它结为一体。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个人是可笑的，屈辱的，所以我才那么重视他。我知道没有胜利的事业，就对失败的事业感兴趣：它需要一颗全心全意的灵魂，对它的失败和对它的短暂的胜利一视同仁。对于感到自己和这个世界共命运的人来说，文明的冲击是有着某种令人苦恼的东西的。我把这种苦恼做成我的苦恼，同时我也想碰碰我的运气。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了历史，因为我喜欢可靠的东西。至少我觉得历史是可靠的，而且如何能否认这种压倒我的力量呢？

总是有这样的时候，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进行选择。这

叫作长大成人。这种痛苦是可怕的。然而对一颗骄傲的心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有的是上帝或时间，十字架或刀①。这个世界有一种更高的意义，超越了它的骚动，或者除了这些骚动外没有什么是真的。必须和时间共生死或者为了一种更伟大的生活而摆脱它。我知道人们是可以妥协的，可以生活在时代中而相信永恒。这叫作接受。但是我厌恶这个词，我要么什么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如果我选择了行动，请不要以为静观对我就成了一块陌生的土地。但是它不能什么都给我，我失去了永恒，我就想和时间结盟。我既不愿把怀念也不愿把苦涩记在我的账上，我只想看得清楚。我对你们说，明天你们就要被征入伍了。对于你们，对于我，这都是一种解放。个人什么也做不了，然而他又什么都做得了。在这种奇妙的预备役当中，你们懂得我为什么既颂扬他，同时又压倒他。碾碎他的是世界，而解放他的是我。我把他的全部权利给了他。

征服者知道行动本身是没有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彻底改变人和大地。我永远也彻底改造不了人们。然而，必须做得“仿佛如此”。因为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了肉体。肉体即便受到屈辱，它也是我唯一可靠的东西。我只能靠它来活着。造物是我的祖国。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这种荒诞的、无意义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斗争一边，时代正适合于此，这我说过了。到目前为止，一个征服者的伟大还是地理性的。它是可以通过征服的土地的大小来衡量的。词改变了意义，不再指胜利的将军了，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伟大变换了营垒。它在抗议和没有前途的牺牲之中了。这绝不是因为喜欢

① 见《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2章。

失败。胜利是所希望的。然而胜利只有一种，永恒的胜利。这种胜利我却永远也不会有。这就是我被绊倒并紧紧抓住的地方。一场革命总是以反对神而告完成，总是以普罗米修斯的革命为开始，他是现代征服者中的第一个。这是人对抗命运而提出的要求：穷人的要求只是一个借口。但是我只能在其历史的行动中抓住这种精神，也正是在那里我与它连在一起了。然而请不要以为我热衷此道：面对着本质的矛盾，我坚持我的人的矛盾。我把我的清醒安置在否定它的东西中间。我颂扬面临着压倒他的东西的人，而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于是汇合在这种张力、这种敏锐和这种过分的重复之中了。

是的，人是他自己的目的。而且他是他唯一的目的。如果他想成为什么，也是在这个生活中成为什么。现在，我深知这一点。征服者有时候谈论战胜和克服。但是他们指的总是“克服自我”。你们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任何人都在某一时刻感到自己等同于一个神。至少人们是这样说的。然而，这来自他在一瞬间感到了人的精神的伟大。征服者只不过是人中间的那些人，他们感到了他们的力量，足以有把握地不断生活在此种高度上和对这种伟大的充分的意识中。这或多或少是一个算术问题。征服者可能最伟大，但是他们超不过人的本身，只要后者愿意如此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永远也离不开人类的熔炉，而是投入到革命的灵魂最炽热的地方中去。

他们在那面发现了残废的造物，但他们也碰到了他们热爱和欣赏的唯一的价值，即人及其沉默。这既是他们的匮乏又是他们的财富。他们只有一种奢侈，那就是人的关系。在这个脆弱的宇宙中，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一切只与人有关的东西，获得了一种更灼人的意义，对此如何能够不理解呢？拉长了的面孔，受到威胁的博爱，如此强大又如此腼腆的友谊，这是真

正的财富，因为它们是可以消亡的。正是在这些东西中间，精神最能感到它的力量和它的局限。也就是说它的效力。有些人谈到了天才。然而天才一词用得太草率了，我更喜欢智力。应该说，它此时可以是很卓越的。它照亮了这片荒漠，并且控制了它。它知道它的奴隶地位，并为它增光。它将和这肉体一同死去。然而知道这一点，这正是它的自由。

所有的教会都反对我们，我们并非不知道。一颗如此紧张的心回避永恒，而所有的教会，神圣的或政治的，都追求永恒，幸福和勇气，报答或正义，对它们来说都是次要的目的。这是它们提出的一种教条，而且还必须赞同。然而，我和观念或永恒没什么关系。适合我的真理，手就可以摸到。我不能离开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指望我什么；征服者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是长久的，甚至他的教条也不长久。

无论如何，这一切的终了是死亡。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死亡结束一切。这就是为什么遍布欧洲的、纠缠着我们当中某些人的那些墓地是丑恶的。人们只美化心爱的东西，而死亡使我们反感和厌倦。它也是需要被征服的。被威尼斯人包围的帕多瓦，又因鼠疫而成了一座空城，被困在里面的最后一个卡拉拉①人一边喊一边跑遍他的荒凉的宫殿的厅室：他呼唤魔鬼，请求一死。这是一种克服死亡的方式。让死亡自以为受到尊崇的那些地方变得如此可怕，这仍然是西方特有的一种勇敢的标志。在反抗者的宇宙中，死亡颂扬不公正。它是最高的夸大。

其他一些人也没有妥协，他们选择了永恒，揭露了这个世界的幻想。他们的公墓在花香鸟语中微笑。这对征服者是合适

① 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望族。

的，并向他展示了他曾经反对的东西的清晰的形象。相反，他选择了黑铁的围栏或无名的壕沟。面对着能够带着它们的死亡的这种形象生活的精神，永恒的人中最优秀者有时感到被一种充满敬意和怜悯的恐惧抓住了。然而，这些精神却从中汲取了它们的力量，得到了它们的证明。我们的命运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挑衅的正是我们的命运。与其说是出于骄傲，更是出于对我们的无意义的状况的意识。我们有时也怜悯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唯一的同情：也许你们不大理解的一种感情，你们觉得没有魄力的一种感情。然而，体验到这种感情的正是我们当中最大胆的人。不过，我们把清醒的人称作有魄力的人，我们不想要那种脱离了洞察力的力量。

再说一遍，这些形象提出的并非一些道德，也不牵涉到判断的问题：那是些画面。它们只是表明了一种生活方式。情人，演员或冒险家充作了荒诞。但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充作贞洁的人、官吏或共和国总统也一样地好。知道并且毫不掩饰就够了。在意大利的博物馆中，人们有时会看到一些彩绘的小布幕，那是过去教士在死囚面前拿来遮挡绞刑架的。各种形式的跳跃，向神圣或永恒之中猛跳，沉溺于日常的或观念的幻想，所有这些屏幕都在遮挡荒诞。然而，有些官吏是没有屏幕的，我要谈的就是他们。

我选择了最极端的人。在这种程度上，荒诞赋予他们一种国王的权力。当然，这是一些无国之君。但是他们比别人优越的是，他们知道一切王国都是虚幻的。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全部伟大，有人在说到他们时谈论暗中的不幸和幻灭的灰烬，这是没有用的。失去了希望，这并不就是绝望。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我们谁也不能判断他们。他们并不试图

变得更好，他们想成为征服者。如果智者一词可以用于那种靠已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已之所无来生活的人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智者。他们其中有一个人知道得最为清楚，征服者是由于精神，堂璜是由于认识，演员是由于智力："当一个人使他所珍爱的绵羊般的脉脉温柔臻于完善的时候，在地上和天上都不会获得特权；他在最好的情况下仍然是一个长着犄角的可笑的小绵羊，仅此而已——他还得不因虚荣而死，不以他那法官的态度引起愤慨。"

无论如何，应该为荒诞的推理恢复更为热情的面貌。想象力还可以增加许多被时间和流亡束缚着的人，他们也善于根据一个没有前途没有弱点的宇宙的尺度来生活。于是，这个荒诞，没有神的世界就住满了思想清晰并且不再怀有希望的人。不过，我还没有说到最荒诞的人，即创造者。

荒诞的创造

哲学和小说

所有这些在荒诞的稀薄空气中维持着的生活，如果不受到某种深刻而确实的思想的力量的激励，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那只能是一种奇特的忠实的感情。人们见到过一些有意识的人在最愚蠢的战争中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并不以为有什么矛盾。那是因为什么也不能回避。因此，在坚持世界的荒诞之中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幸福的。征服或游戏，无数的爱情，荒诞的反抗，这些都是人在一次他事先已经失败的战役中对他的尊严所表示

的敬意。

问题仅仅在于恪守战斗的规矩。这种思想足以培养一种精神：它支持了并且还在支持着完整的文明。人们并不否认战争。因之而死，或因之而生，二者必居其一。荒诞也是如此：要与它共呼吸，承认它的教诲并寻出其血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荒诞的快乐，就是创造。尼采说："艺术，唯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才不因真理而死亡。"

在我试图描述并以不同的方式让人感觉到的经验中，一种苦恼在另一种苦恼消失的地方冒出来，这是可以肯定的。对遗忘的幼稚追求，对满足的呼唤，现在都没有反应。然而，使人正视世界的那种恒定的张力，驱使他欢迎一切的那种井然有序的疯狂，又给他留下了另一种狂热。在这个宇宙中，作品就成了维持他的意识并确定他的冒险的唯一机会了。创造，就是生活两次。普鲁斯特的摸索的、焦急的探求，他对鲜花、地毯和焦虑的细心收集，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同时，这种创造也不比演员、征服者和一切荒诞的人一生中每日都孜孜以求的那种持续的、不可估量的创造有更多的意义。他们都试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他们的现实。我们最后总会看见我们的真理的面目。对于一个脱离了永恒的人来说，全部的存在只不过是荒诞掩盖下的一种过分的模仿而已。创造就是最大的善于模仿者。

这些人首先是知道，其次，他们的一切努力在于跑遍、扩大、丰富他们刚刚登上的没有前途的小岛。然而，首先是应该知道。因为荒诞的发现是和未来的激情产生并合法化的那个时间停顿同时发生的。即便是没有福音的人也有他们的橄榄。①

① 耶路撒冷东面的一座山。《圣经》说耶稣来到这里向门徒讲道，并不让他们睡觉，免得受到迷惑。次日，耶稣于此地被犹大出卖。

而且在他们的橄榄山上，也是不应该睡觉的。对荒诞的人来说，问题不再是解释和解决了，而是体验和描述。一切都从有洞察力的冷漠开始。

描述，这是一种荒诞的思想的最后野心。科学到了它的悖论的终点也停止了建议，停下来静观和描绘现象的永远是新鲜的景物。心灵就这样知道了那种使我们在世界的面貌前激动的感情不是来自世界的深刻性而是来自其面貌的多样性。解释是没有用的，但感觉留下了，与之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数量上取之不尽的宇宙的不断呼唤。人们从这里知道了艺术品的地位。

它标志着一种经验的死亡，同时也标志着这种经验的增加。它好象是对一些已经由世界组织好的主题的单调而热情的重复：形体，这宙宇的三角楣上的不可穷尽的形象，形式或色彩，和谐或苦恼。因此，在创造者的壮丽而幼稚的宇宙中重见本文的重要主题，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把艺术品看作一种象征，以为艺术品可以被看作是对荒诞的逃避，都是错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现象，事情只关系到它的描述。它并不能给精神的疾病以出路。相反，它正是这种在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中回荡的疾病的一种征象。然而，是它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并把它放在别人的面前，不是为了使他迷失方向，而是向他明确地指出那条人人都在其上的没有出口的道路。在荒诞的推论的时间里，创造跟随着冷漠和发现。它标明荒诞的激情从哪里冲出，推论在哪里停止。它在本文中的地位就这样得到了解释。

只要摆出创造者和思想家共有的几个主题，就足以使我们在艺术品中重新发现进入荒诞的思想所具有的全部矛盾。实际上，他们共有的矛盾超过使他们智力相互亲近的一致的结论。思想和创造也是如此。我几乎不需要指出，是同一种苦恼驱使人采取这些态度。它们从那出发时是一致的。然而，在所有从

荒诞出发的思想中，我看到很少有坚持住的。我是从它们的距离和不忠之中最准确地衡量了只属于荒诞的东西。同时，我也应自问：一件荒诞的作品是可能的吗？

人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艺术和哲学之间古老对立的专断性。如果从一种过于确切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对立肯定是虚假的。如果只是说这两个门类各有其独特的环境，那无疑是真实的，不过说起来也是很模糊的。唯一可以接受的理由在于产生在封闭在自己的体系之中的哲学家和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的艺术家之间的矛盾。不过，这适合于我们在这里视为次要的某些艺术和哲学的形式。关于脱离创造者的艺术的这种观念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也是错误的。人们注意到没有一个哲学家是创立了好几个体系的，这与艺术家大相径庭。然而，只有在任何艺术家都是以不同的面貌表达同一事物这种情况下，那才是真实的。艺术的瞬间的完美，其更新的必要性，这些东西只是因为偏见才是真实的。因为艺术品也是一种构造，而谁都知道伟大的艺术家是可以多少地单调。艺术家和思想家一样地介入，在作品中变成自己。这种相互影响提出了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此外，对于确信精神的目的的一致性的人来说，最无谓的莫过于基于方法和对象的那些区别了。人为了理解和喜爱而提出的那些门类之间是没有界线的。它们互相渗透，同一种焦虑使之混为一体。

开始的时候必须指出这一点。为了使一件荒诞的作品成为可能，以其最清醒的形式出现的思想必须参予其事。然而，它同时也必须不显露出来，除非是作为一种起支配作用的智力。这种反常现象是可以用荒诞来解释的。艺术品产生于智力放弃谈论具体事物。它标志着物质方面的胜利。是清醒的思想激发

了它，但是它又在这一行动中忘掉了自己。它不会屈服于这种诱惑，即在描述中另外加上一种它知道是不合情理的更为深刻的意义。艺术品体现了一种智力的悲剧，但是它只是间接地提出证据。荒诞的作品要求的是意识到这些局限的艺术家和具体的事物只意味着自身的艺术。它不能成为一种生活的目的、意义和慰藉。创造或不创造，这并改变不了什么。荒诞的创造者并不珍惜他的作品。他可以放弃，他有时候也放弃了。有一个阿比西尼亚就够了①。

人们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一个美学的规则。真正的艺术品总是与人相称的。它本质上是那种说得"少"的作品。在一个艺术家的全部经验和反映这些经验的作品之间，在《威廉·迈斯特》② 和歌德的成熟之间，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当作品企图把全部经验都放进一种解释文学的花边纸上时，这种联系是不好的。当作品只是经验中的经过打磨的一小块，是内在的光芒凝聚而又无所限制的钻石的一个小面时，这种联系是好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有着过重的负荷和对永恒的追求。在第二种情况下，作品因具有一种人们猜得出其丰富性的经验的言外之意而变得富有成果。荒诞的艺术家的问题在于获得这种胜过本领的处世之道。一句话，在这种环境中的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享受人生的人，知道在这里活着既是体验又是思考。因此，作品体现着一种智力的悲剧。荒诞的作品说明了思想放弃了它的威望，甘心只成为智力，这种智力使用表象，并在一切没有理性的东西上面布满形象。如果世界是清晰的，艺术却

① 阿比西尼亚即今之埃塞俄比亚，这里暗指死亡，取典于诗人兰波之死。实际上兰波并非死于埃塞俄比亚，而是死于法国。

② 歌德的小说。

不是清晰的。

我这里说的不是形式和色彩的艺术，在那些艺术中占支配地位的只是辉煌而有节制的描绘。表达开始于思想结束之处。那些两眼空空的年轻人①挤满了寺庙和博物馆，他们的哲学被人们变成了姿态[illegible]。对于一个荒诞的人来说，这种哲学是比所有的图书馆都更有教益的。从另一个方面看，音乐也是如此。如果说一种艺术被剥夺了教诲，那肯定就是这种艺术了。它太象数学了，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不从它那里吸取其无理性。精神根据约定的、适度的规则和自己进行的这种游戏是在我们这个有声空间展开的，在这个空间之外，振动汇合了，变成一个非人的宇宙。没有比这更纯粹的感觉了。这些例子太容易了。荒诞的人承认这些和谐和这些形式是自己的。

但是，我这里想谈一种作品，其中解释的诱惑一直是最大的，幻想自告奋勇，结论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我指的是小说的创造。我自问荒诞能否在其中坚持住。

思想，首先就是想要创造一个世界（或是为他自己的世界划定界限，这是一码事）。也是从一种把人和他的经验分开的根本的不协调出发，以便根据他的怀念找到一个共同点，一个被理性框住的或被类似理性说明的宇宙，这宇宙可以消除不堪忍受的分裂。哲学家，即便是康德，也是个创造者。他有他的人物，他的象征和他的隐秘的行动。他有他的结局。相反，小说走到了诗和随笔的前面，不管表面上如何，这只是说明了

① 指雕像。

② 人们好奇地看到，最理智的绘画是那种试图把现实归结为基本元素的绘画，它到最后就只是使眼睛感到愉快。对于世界，它只留下了色彩。——作者原注

艺术的更广泛的理智化。我们得理解，这指的尤其是最伟大的作家。一种体裁的丰富和崇高常常可以从它所含有的渣滓度量出来。坏小说的数量不应使人忘记最好的小说的崇高。这种最好的小说恰恰是具有它们自己的宇宙。小说有它的逻辑、它的推理、它的直觉和它的公设。它也有它对于清晰的要求①。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上面谈到的传统的对立就更不那么合乎情理了。在容易把哲学和它的作者分开的那个时代，这种对立是起作用的。今天，思想不再追求永恒了，它的最好的历史将是它的悔恨的历史，这时候我们知道体系若是适用，就与它的作者不可分开。从一个方面来看，《伦理学》②不过是长而严峻的自白罢了。抽象的思想终于和它的物质基础连在一起了。同样，肉体和激情的小说化也多少是更加根据一种世界观的要求来安排的。人们不再讲"故事"了，人们创造自己的宇宙。伟大的小说家是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就是如此，姑且只举这些吧。

他们选择了用形象而不是用推理来写作，这种选择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某个共同的思想，即确信一切解释原则的无用，坚信感性的表象所具有的教育信息。他们既把作品看作是一个结局，又把它看作是一个开端。作品是一种常在不言中的哲学的

---

① 请思考一下：这使最坏的小说得到了解释。几乎人人都自认能够思想，实际上，人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或好或坏地思想着。相反，很少有人自以为是诗人或要笔杆的。但是，从思想胜过风格那个时候起，大群的人就侵占了小说。

这并不是象人们说的那么大的一个灾难。最好的小说家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至于那些屈服了的人，他们是不值得继续存在下去的。——作者原注

② 斯宾诺莎的代表作。

结果，是它的说明和它的完成。然而，只有这种哲学的言外之意才能使它完整，它终于使一个古老的主题的这种说法合乎情理了，即少许的思想使人远离生活，许多的思想使人靠近生活。思想不能使真实升华，就止于模仿。这里说的小说是这种既相对又不可穷尽、与爱情的思想又如此相似的一种认识工具：对于爱情，小说的创造是有着最初的惊叹并进行着富有成果的反刍的。

这至少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承认的它所具有的魅力。但是我也承认屈辱的思想的那些王子们也具有这样的魅力，而我是能够凝视他们的自杀的。我感兴趣的正是了解和描写那种使他们回到幻想的共同道路上去的力量。这里我还将使用同样的方法。因为我已用过这种方法，所以我可以缩短我的推理，并且不必在一个确切的例子里耽搁就概括出来。我想知道人们在接受了义无反顾的生活之后是否也能同意义无反顾地劳动和创造以及通向这些自由的道路是什么。我想把我的宇宙从它的幽灵中解放出来，使之仅仅充满着我不能否认其存在的有血有肉的真理。我可以产生出荒诞的作品，选择创造的态度，而不选择另一种态度。然而，一种荒诞的态度要保持荒诞就必须对其无理性始终具有意识。作品就是这样。如果荒诞的要求没有得到尊重，如果作品没有阐明分裂和反抗，如果它迎合幻想并激起希望，那么它就不是无理性的了。我再也不能离开它。我的生活可以从中找到一种意义：这是可笑的。它不再是结束了人生的壮丽和无用的一种解脱和激情的演练了。

在解释的诱惑最为强烈的那种创造中，人们能够克服这种诱惑吗？在对真实的意识最为强烈的那个虚假的世界里，我能够忠于荒诞而不迎合做结论的欲望吗？在最后的努力中面临着

同样多的问题。人们已经知道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害怕为了最后的幻想而抛弃最初的、困难的教训的意识的最后顾虑。对于作为意识到荒诞的人可能采取的态度之一的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提供给他的任何生活方式也同样具有价值。征服者或演员，创造者或堂璜，可以忘记他们的生命的演练，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无理性。人们习惯得如此之快。人们为活得幸福而想赚钱，于是全部的努力和生命中最好的东西都集中在赚钱上面。幸福被遗忘了，手段被当成了目的。同样，这位征服者的全部努力偏向了野心，而野心不过是通向一种更高尚的生活的道路。堂璜也将顺从他的命运，满足于这种存在，其高尚只是因反抗才有价值。对前者来说，这是意识；对后者来说，这是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荒诞都消失了。在人心中有那么多执着的希望。一无所有的人有时也会赞同幻想。这种受和平需要支配的赞同是存在的赞同的内在的兄弟。这样就有了光明的神祇和泥土的偶象。然而，这是通向需要找到的那种人的面目的一条平常道路。

到目前为止，对于荒诞的要求是什么，还是它的失败告诉给我们的最多。同样，我们要想警觉起来，看到小说的创造可以跟某些哲学提供同样的混含也就够了。因此，我为说明问题可以选择一部作品，其中汇集了一切标志着荒诞的意识的东西，而其开端又是明确的，环境又是清醒的。它的后果会给我们教益。如果荒诞没有受到尊重，我们也会知道幻想是通过什么渠道溜进来的。一个明确的例子。一个主题，一种创造者的忠实就够了。问题在于同样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已经更为细致地做过了。

我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的一个主题。我也可以同样

好地研究其它作品①。但在其作品中，问题是在崇高和激动的方面得到直接的论述的，如同对所谈的存在的思想一样。这种平行对我的目标有帮助。

基 里 洛 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的主人公都对生命的意义发出了疑问。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现代的：他们不惧怕可笑。区别现代感应性和古典感应性的，正是后者充满着道德问题，而前者充满着形而上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问题是以一种如此激烈的方式提出的，以至于它需要一种极端的解决。存在要么是骗人的，要么是永恒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满足于这种考虑，他就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阐明了在人的生活中精神的这种活动所能产生的后果，因此他成了艺术家。在这些后果中，他注意的是最终的后果，即他在《作家日记》中所说的逻辑的自杀。果然，在1876年12月出版的那一册中②，他设想出“逻辑的自杀的推理”。绝望者确信对一个不相信永生的人来说，人的存在是一种完全的荒诞，于是就作出下列结论：

“既然对于我的关于幸福的问题，通过我的意识，我被回答说：除非在与宇宙万物的和谐之中我是不能幸福的，我设想不出，也永远不能设想出，这是显然的……

① 例如马尔罗的作品。但是那就必须同时触及社会问题，实际上，社会问题也不能用荒谬的思想来回避(况且，它也可以提出好几个不同的解决办法)。不过，还是应该有个范围。——作者原注

② 《作家日记》陆续发表于1873—1881年间。

“……最后，既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时充当着起诉人和担保人的角色，充当着被告和法官的角色，既然我觉得自然所演出的这出喜剧是完全愚蠢的，甚至我认为我接受演出是受了侮辱……

“我以无可争议的起诉人、担保人、法官和被告的身份，谴责这个自然，它以一种厚颜无耻的随便让我生出来受苦——我判处它和我一同归于虚无。”①

在这一立场中还有些幽默。这个自杀者自己结果了自己，是因为在形而上的方面他受到了侮辱。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复仇。这是他的表明别人“治不了他”的方式。人们知道这一主题以最令人赞叹的广阔性体现在基里洛夫身上，他是《群魔》中的一个人物，也主张逻辑的自杀。工程师基里洛夫在某处宣布他愿意离开生活是因为“这是他的观念”②。人们很清楚，应该按字面意义来理解。他是为了一种观念，一种思想而准备去死的。这是高级的自杀。渐渐地，随着场面的更替，基里洛夫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激励着他的那个致命的思想也展现在我们面前。工程师实际上是袭用了《日记》的推理。他感觉到上帝是必要的，它的确应该存在。但是他也知道它不存在，也不能存在。他喊道：“你怎么不明白，这正是自杀的充分理由呀？”③这种态度同样也在他身上带来几个荒诞的后果，他无动于衷地同意让别人把他的自杀用于一个他鄙视的事业上。“我今夜决定此事对我无所谓。”他终于在一种混杂着反抗和自由的感情中准备他的行动了。“我自杀是为了证实我的违抗，

① 见《作家日记》，1876年10月，第359页。——原编者注
② 《群魔》法译本第2部，第332页。
③ 《群魔》法译本第2部、第336页。——原编者注

我的新的、可怕的自由。”① 问题不再是复仇了，而是反抗了。因此，基里洛夫是一个荒诞的人物——当然从根本上说他不应自杀。然而，他自己解释了这个矛盾，并同时揭示出最纯粹的荒诞的秘密。他实际上给他的致命的逻辑增加了一种不寻常的野心，这野心给了人物全部远景：他想自杀以便成为上帝。

推理具有古典的清晰。如果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应自杀，因此，基里洛夫自杀是为了成为上帝。这逻辑是荒诞的，但是需要的就是这个。不过，有趣的是赋予这个回到地上的神明一种意义。这就等于阐明这一前提：“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上帝”，这前提仍旧是相当模糊的。重要的是注意到，表明这一无理性的意图的人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每天早晨都做体操以保持健康。他因沙托夫重见妻子的喜悦而感动。在一张人们在他死后发现的纸上，他想画一个向“他们”伸出舌头的鬼脸② 。他是幼稚的而易怒的，热情的，有条理的，敏感的。他只有超人的逻辑和固定观念，却有普通人的一切。然而正是他平静地谈论着他的神圣性。他不是疯子，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疯子。所以，使他激动的并非一种自大狂的幻觉。而这一次，按本意来理解就将是可笑的了。

基里洛夫本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于斯塔夫罗金的一个问题，他明确了他说的不是神-人④ 。人们可以认为那是出于一种与基督区别开来的考虑。但实际上却是想合并后者。基里洛

① 《群魔》法译本第二部，第339页——原编者注
② 《群魔》中的人物.
③ 《群魔》法译本第2部，第340页.——原编者注
④ 同上书，法译本第1部，第259页.——原编者注

夫的确想象过死去的耶稣不曾回到天堂。他于是知道了他所受的折磨都是没有用的。工程师说："自然的法则使基督在谎言中生活，并为了一个谎言而死去。"①仅仅在这种意义上，耶稣体现了人类的全部悲剧。他是完人，是那个实现了最荒诞的条件的人。他不是神-人，而是人-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象他一样被钉上十字架，被欺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神。

这里所说的神性完全是人间的。基里洛夫说："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寻找我的神性的标志，这标志就是独立。"② 人们从此看出基里洛夫的前提的意义："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上帝。"成为上帝，只不过是在这个地球上自由，不为一种永生的东西服务。当然，这首先是从这种痛苦的独立中得出一切结论。如果上帝存在，一切就都取决于他，而我们就丝毫也不能违抗他的意志。如果他不存在，一切就都取决于我们③。对基里洛夫和对尼采来说都一样，杀死上帝，就是自己成为上帝——这是在这个地球上实现福音书所说的永恒的生活④。

但是，如果这种形而上的罪孽足以使人完善，那为什么还要加上自杀呢？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在获得自由之后还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知道得很清楚，他补充说："倘若你感觉到这一点，你就是沙皇。那你绝不会自杀，而要享受荣华富贵。"⑤ 但是人们不知道，他们感觉不到"这一点"。

---

① 《群魔》第2部，第388页。——原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2部，第339页。——原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2部第334页——原编者注

④ "斯塔夫罗金：'您相信另一个世界的永恒的生活吗？'基里洛夫：'不，但我相信这个世界的永恒的生活。"——作者原注

⑤ 《群魔》法译本第2部，第338页。——原编者注

正如在普罗米修斯的时代，他们满怀着盲目的希望①。他们需要有人指路，他们离不开说教。因此，基里洛夫出于对人类的爱必须自杀。他应该为他的兄弟们指出一条正大而困难的道路，而他是第一个走上这条道路的。这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自杀。因此，基里洛夫是自我牺牲。但是，如果他被钉上十字架，他却并未受骗。他仍是一个人-神，他确信一种没有前途的死亡，心中充满了福音的忧郁。他说："我是不幸的，因为我被迫证实我的自由。"②但是他死了，而人们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将住满沙皇，并被人类的荣光照亮。基里洛夫的手枪声将是最后革命的信号。这样，不是绝望驱使他去死，而是邻人对他的爱。在把一种无法形容的精神冒险结束在血泊中之前，基里洛夫有一句和人的痛苦一样古老的话："一切皆善。"③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自杀的主题是一个荒诞的主题。在进一步深入之前，让我们仅仅指出，基里洛夫也活跃在其他人物身上，他们又提出了新的荒诞的主题。斯塔夫罗金和伊凡·卡拉玛佐夫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荒诞的真理。基里洛夫的死解放的正是他们。他们试图成为沙皇。斯塔夫罗金过着一种"反讽的"生活，人们对此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周围引起仇恨。然而，这个人物的最重要的话却存在于他的告别信中："我什么也恨不起来。"他在冷漠中成了沙皇。伊凡因拒绝放弃精神的王权而成了沙皇。他兄弟那样的一些人用他们的生活证明要信仰就必须卑躬屈膝，他可以回答他们说这条件是可鄙的。他们最重要的话是："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带着一种得

① "'人只是为了不自杀才发明了一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全部世界历史。'"——作者原注

② 《群魔》法译本第2部，第339页。——原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1部，第257页。——原编者注

体的忧伤色彩。当然，他象尼采这位最著名的上帝的谋杀者一样，最后也以疯狂告终。然而，这是一种值得一冒的风险，而在这些悲惨的结局面前，荒诞精神的基本运动是询问："这证明了什么？"

小说就是如此象《日记》一样提出荒诞的问题的。小说建立了死亡的逻辑，表现了激奋，"可怕的"自由，以及沙皇们变得具有人性的光荣。一切皆善，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什么都不是可恨的：这些都是荒诞的判断。这是多么神奇的创造啊，那些火与冰的人物看起来和我们多么亲近啊！在他们心中轰鸣的那个醉心于冷漠的世界一点也不使我们感到可怕。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我们日常的焦虑。大概没有人能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善于把如此接近我们、如此折磨我们的魅力赋予荒诞的世界。

然而，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两段话将显示那种引导作家进行别的披露的完全的形而上的颠倒。逻辑的自杀者的推论引起了批评家的一些异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发展了他的立场，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相信永生对人来说是这样必要（没有它，他就会自杀），那它就成了人类的正常状态。既然如此，人类灵魂的永生就肯定是存在的。"①另一方面，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的最后几页中，在那场和上帝进行的巨大搏斗之后，孩子们问阿辽沙②："卡拉玛佐夫，宗教说我们死后会复活，我们还能互相见面，这是真的吗？"阿辽沙回答说："当然，我们会见面的。我们将愉快地相互讲述过去的一切。"

---

① 《作家日记》，1876年12日，第367页。括号中文字系加缪所加。——原编者注

② 卡拉玛佐夫兄弟之一。

这样，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和伊凡就被打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这的确关系到一个结论。阿辽沙的情况不象梅思金公爵①的情况那么含糊。后者是个病人，生活在一种持续的、带着微笑和冷漠的现实中，这种非常幸福的状态可以是公爵所说的永恒的生活。相反，阿辽沙说得好："我们会重逢的。"不存在自杀和疯狂的问题了。对于确信永生和他的快乐的人来说，那有什么用呢？人用他的神圣性换取幸福。"我们将愉快地相互讲述过去的一切。"这样，基里洛夫的手枪在俄国的某地打响，但是世界继续转动着它的盲目的希望。人们没有明白"这一点"。

因此，和我们说话的不是一个荒诞的小说家，而是一个存在的小说家。这里，跳跃仍然是动人的，使启发了它的那种艺术崇高起来。这是一种感人的、充满怀疑的、不可靠的、热烈的赞同。谈及《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贯穿这本书各部分的主要问题就是我毕生有意或无意识地感到痛苦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问题。"很难相信一部小说足以把一生的痛苦转化为快乐的确实性。一位评论者② 正确地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伊凡有联系——《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确定的章节使他花费了三个月的努力，而他所说的"渎神的话"却是在昂奋之中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完了。他的人物没有一个不在肉中带着这根刺的，不刺激它或者不在感觉或不道德中寻求解救之方的③ 。无论如何，让我们停留在这种怀疑之上吧。这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在那里面，在一种比日光还要强烈的明暗对比中，我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的主人公。

② 鲍里斯·德·施莱泽。——作者原注

③ 纪德对此有新奇而深刻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是多配偶的人。——作者原注

们能够抓住人反对他的希望的斗争。创造者到了终点，选择了反对他的人物。这种矛盾使我们得以引入一种细微的差别。这里说的不是一部荒诞的作品，而是一部提出荒诞的问题的作品。

根据斯塔夫罗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卑躬屈膝，是“羞耻”。相反，一部荒诞的作品是不提供回答的。全部区别就在这里。最后让我们记住：在这种作品中反驳荒诞的不是它的基督教的特性，而是它对未来生活的预告。人们可以同时是基督徒和荒诞的人。是基督徒而不相信来世，有这样的例子。说到艺术品，就有可能明确荒诞的分析的一种方向，人们可以在上文中预感到。这种方向导致提出“福音书的荒诞性”。它阐明了这种反复出现的观念，即信念并不妨害怀疑。相反，人们清楚地看到，《群魔》的作者虽是驾轻就熟，最后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创造者对他的人物的惊人的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里洛夫的回答，实际上可以概括如下：存在是虚幻的，也是永恒的。

没有前途的创造

因此我觉察到希望是不能永远被回避的，就是对那些想要摆脱它的人，它也能够纠缠不休。这是我觉得迄今为止谈到的作品所具有的意义。我至少可以在创造的方面举出几部真正荒诞的作品①。然而，万事总有个开头，这个研究的目的在于某种忠诚。教会对异端分子是那样严厉，仅仅是因为它认为再没有比迷途的孩子更危险的敌人了。但是，对于创立正统派的教

① 例如麦尔维尔的《白鲸》。——作者原注

条来说，大胆的诺斯替教派① 的历史和摩尼教② 潮流的持续比任何祈祷都起了更大的作用。比较起来，荒诞也是如此。人们发现偏离的道路就认出了荒诞的道路。就在荒诞的推理的终点，在它的逻辑支配的一种态度中，仍可看到希望以一种最动人的面目出现，而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表明了荒诞的苦行的艰难。这尤其表明了一种不断地坚持的意识的必要，并和本文的一般范围相连。

如果这还谈不上清点荒诞的作品的话，人们至少可以就创造的态度，即一种能够补足荒诞的存在的态度，作出结论。一种否定的思想才能如此完好地为艺术服务。它的隐晦的、谦卑的方法对于理解一部伟大的作品就和黑对于白一样地必要。“无所为”地劳动和创造，用泥土塑造，知道他的创造没有前途，看到他的作品毁于一旦同时也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传之久远也并不更为重要，这就是荒诞的思想所给予的难以得到的智慧。同时执行两个任务，一方面是否定，另一方面是激励，这就是展现在荒诞的创造者面前的道路。他应该赋与虚无以色彩。

这导致一种关于艺术品的特殊的观念。人们过于经常地把一位创造者的作品看成是一系列彼此孤立的见证。人们把艺术家和文人混为一谈。一种深刻的思想是处在不断的成长中的，它汲取生活的经验，并在其中形成。同样，一个人的独特的创造也在其作品的持续的、繁多的面貌中变得牢固。一些作品补足另一些作品，更正或校正，甚至也反驳。如果某种东西结束了创造，那不是盲目的艺术家的胜利然而虚幻的叫声，“我什么

① 公元一至三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

② 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

都说完了。”而是创造者的死，它结束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的书本。

这种努力，这种超人的意识，读者不一定看得见。在人类的创造中是没有神秘的。意志产生了这种奇迹。但是至少，没有真正的创造是不含有秘密的。大概一连串的作品可能只是同一种思想的一连串的近似。然而人们可以设想另一类创造者，他们使用重叠的方法。他们的作品可以仿佛彼此间没有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相互矛盾的。然而，把它们重新放回整体中，它们仍然会各就其位。它们也是从死亡中获得它们最终的意义。它们接受了作者的生活所具有的光明的最亮部分。这时，他的一系列作品不过是一连串的失败。但是，如果这些失败都保持着同一种共鸣，创造者就能重复他自己的环境的形象，并使他所持有的没有结果的秘密发出回响。

在这里，支配的努力是可观的。但是，人类的智力还足以做得更多。它只是显示了创造的意志的一面。我曾在别的地方指出，人类的意志除了维持意识别无其它目的。不过，这样做没有纪律是不行的。在对忍耐和清醒的各种培养中，创造的培养是最有效的。它也是人类唯一尊严的令人震惊的见证：顽强地反抗他的环境，坚持一种被视为没有结果的努力。它要求每日的努力，自制，对真实的界限的准确估量，节制和力量。它造成了一种苦行。这一切都“无所为”，都是为了重复和停滞不前。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对人提出的考虑和它给人提供了机会来克服他的幻想并稍稍更接近他的赤裸的真实。

请不要在美学上搞错了。我这里指的不是耐心的调查，对一个论点的不断的、无结果的阐明。正好相反，如果我表达得

清楚的话。主题小说是旨在证明的作品，是最可憎的作品，它最经常地从一种得到满足的思想中获得灵感。人们显示自以为持有的真理。然而，人们使之运行的是观念，而观念是思想的反面。那些创造者是些羞答答的哲学家。我说的或我想象的那些创造者却是一些清醒的思想家。在思想返回自身的某一点上，他们就把他们的作品的形象竖立起来，作为一种有限的、必死的、反抗的思想的明显的象征。

这些作品也许证明了某种东西。但是这些证据，与其说是小说家提供给别人的，不如说是给予自己的。本质是他们的胜利存在于具体之中，而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这种有血有肉的胜利是一种思想为他们准备的，在这种思想中，抽象的能力受到了屈辱。当它们完全受到了屈辱，具体就同时使创造放出荒诞之光，是反讽的哲学创作出热情的作品。

任何放弃了统一的思想都激励着多样性。而多样性是艺术的胜地。解放精神的唯一的思想是那个使它独处并确信其界限和临近的结局的思想。没有什么教条吸引它。它等待着作品和生活的成熟。作品离开了它，将又一次让人听见一个灵魂的几乎不曾减轻的声音，这灵魂永远地摆脱了希望，或者作品什么也不让人听见，如果创造者对他的活动感到厌倦而想改变道路的话。两者是一样的。

因此，我要求于荒诞的创造，正如我要求于思想、反抗、自由和多样性的一样。然后荒诞的创造就展示出它的深刻的无用性了。在这种智力和激情相互混合、相互激励的日常努力之中，荒诞的人发现了一种造成他的力量的本质的纪律。必需的专心、固执和洞察力就这样与征服的态度会合了。这样，创造也就是赋与他的命运一种形式。对于这些人物来说，他们的作

品确定了他们，至少等于他们确定了作品。演员已经告诉我们了：在外表和本质之间没有界线。

让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都不具有真实的意义。在这条自由的路上，还要前进一步。对于这些彼此亲近的精神、创造者或征服者来说，最后的努力是知道如何也从其事业中解放出来：做到接受作品本身，无论是征服，是爱情或是创造，也可以不存在；这样来完成全部个人生活的深刻的无用性。这甚至可以使他们更容易完成他们的作品。正如看到了生活的荒诞允许他们带着一切过分的行为投入生活一样。

剩下的就是命运了，它的唯一的出路是必然带来不幸的。除了死亡这唯一的命定之物外，一切，快乐或幸福，都是自由。世界仍然存在，人是唯一的主人。联系着他的，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他的思想的命运不再是自我牺牲，而是重新活跃起来变成形象。它表演，当然是在神话之中，不过这些神话的深刻只是人类痛苦的深刻，而且象思想一样不可穷尽。不是使人高兴、使人盲目的神的寓言，而是人间的面目、动作和悲剧，其中凝聚着一种艰难的智慧和没有结果的激情。

西绪福斯神话

神判处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不断地推上山顶，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上滚落下来。他们有某种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

如果相信荷马，西绪福斯是最聪明最谨慎的凡人。然而根据另一种传说，他倾向于强盗的营生。我看不出这当中有什么矛盾。关于使他成为地狱的无用的劳动的原因，看法有分歧。有人首先指责他对神犯了些小过失。他泄露了他们的秘密。埃

索波斯①的女儿埃癸娜被宙斯劫走。父亲对女儿的失踪感到奇怪，就向西绪福斯诉苦。西绪福斯知道此事，答应告诉他，条件是他向科林斯城堡供水。西绪福斯喜欢水的祝福更胜过上天的霹雳。他于是被罚入地狱。荷马还告诉我们西绪福斯捆住了死神。普路同② 忍受不了他的王国呈出现一片荒凉寂静的景象。他催促战神把死神从他的胜利者手中解脱出来。

有人还说垂死的西绪福斯不谨慎地想要考验妻子的爱情。他命令她把他的遗体不加埋葬地扔到公共广场的中央。西绪福斯进了地狱。在那里，他对这种如此违背人类之爱的服从感到恼怒，就从普路同那里获准返回地面去惩罚他的妻子。然而，当他又看见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尝到了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海，就不愿再回到地狱的黑暗中了。召唤、忿怒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他又在海湾的曲线、明亮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面前活了许多年。神必须作出决定。墨丘利③ 用强力把他带回地狱，那里为他准备好了一块巨石。

人们已经明白，西绪福斯是荒诞的英雄。这既是由于他的激情，也是由于他的痛苦。他对神的轻蔑，他对死亡的仇恨，他对生命的激情，使他受到了这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这是为了热爱这片土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关于地狱里的西绪福斯，人们什么也没告诉我们。神话编出来就是为了让想象力赋予它们活力。对于他的神话，人们只看见一个人全身绷紧竭力推起一块巨石，令其滚动，爬上成百的陡坡；人们看见皱紧的面孔，脸颊抵住石头，一个肩承受着满是粘土的庞然大物，一只脚垫于其下，用两臂撑住，沾满泥土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
② 罗马神话中的冥王。
③ 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众神的使者。

双手显示出人的稳当。经过漫长的、用没有天空的空间和没有纵深的时间来度量的努力，目的终于达到了。这时，西绪福斯看见巨石一会儿工夫滚到下面的世界中去，他又得再把它推上山顶。他朝平原走下去。

我感兴趣的是返回中、停歇中的西绪福斯。那张如此贴近石头的面孔已经成了石头了！我看见这个人下山，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这时刻就象是呼吸，和他的不幸一样肯定会再来，这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当他离开山顶、渐渐深入神的隐蔽的住所的时候，他高于他的命运。他比他的巨石更强大。

如果说这神话是悲壮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如果每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他，那他的苦难又将在哪里？今日之工人劳动，一生中每一天都干着同样的活计，这种命运是同样的荒诞。因此它只在工人有了意识那种很少的时候才是悲壮的。西绪福斯，这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而又在反抗，他知道他的悲惨的状况有多么深广：他下山时想的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他的痛苦的洞察力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

如果在某些日子里下山可以在痛苦中进行，那么它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此话并非多余。我还想象西绪福斯回到巨石前，痛苦从此开始。当大地的形象过于强烈地缠住记忆，当幸福的呼唤过于急迫，忧伤就会在人的心中升起：这是巨石的胜利，这是巨石本身，巨大的忧伤沉重得不堪承受。这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①。然而不可抗拒的真理一经被承认便告完结。这

① 《圣经》说，耶稣在橄榄山下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让门徒祷告，不要睡觉，免受迷惑。他次日于此地被犹大出卖。

祥。俄狄浦斯先就不知不觉地顺从了命运。从他知道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便开始了。然而同时，盲目而绝望的他认识到他同这世界的唯一的联系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新鲜的手。于是响起一句过分的话："尽管如此多灾多难，我的高龄和我的灵魂的高贵仍使我认为一切皆善。"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一样，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就这样提供了荒诞的胜利的方式。古代的智慧和现代的英雄主义会合了。

不试图写一本幸福教科书，是不会发现荒诞的。"啊！什么，路这么窄……？"然而只有一个世界。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他们是不可分的。说幸福一定产生于荒诞的发现，那是错误的。有时荒诞感也产生于幸福。俄狄浦斯说："我认为一切皆善。"这句话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凶恶而有限的宇宙之中。它告诉人们一切并未被、也不曾被耗尽。它从这世界上逐走一个带着不满足和对无用的痛苦的兴趣进入这世界的神。它使命运成为人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应该在人之间解决。

西绪福斯的全部沉默的喜悦就在这里。他的命运出现在面前。他的巨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诞的人静观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象钳口不语。在突然归于寂静的宇宙中，大地的成千上万细小的惊叹声就起来了。无意识的、隐秘的呼唤，各种面孔的邀请，都是必要的反面和胜利的代价。没有不带阴影的太阳，应该了解黑夜。荒诞的人说"是"，于是他的努力便没有间断了。如果说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却绝没有高级的命运，至少只有一种命运，而他断定它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轻蔑的。至于其他，他自知是他的岁月的主人。在人返回他的生活这一微妙的时刻，返回巨石的西绪福斯静观那一连串没有联系的行动，这些行动变成了他的命运，而这命运是他创造的，在他的记忆的目光下统一起来，很快又由他的死加章盖印。这

样，确信一切人事都有人的根源，盲目却渴望看见并且知道黑夜没有尽头，他就永远在行进中。巨石还在滚动。

我让西绪福斯留在山下！人们总是看得见他的重负。西绪福斯教人以否定神祇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他也断定一切皆善。这个从此没有主人的宇宙对他不再是没有结果和虚幻的了。这块石头的每一细粒，这座黑夜笼罩的大山的每一道矿物的光芒，都对他一个人形成了一个世界。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弗朗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迫使读者反复阅读。它的结局，或竟无结局，暗示出一些解释，但都没有被清晰地显露出来，它们要显得凿凿有据，就要求从一个新的角度重读一遍。有时可能会有两种解释，那就必须有两种读法。这正是作者之所求。然而，若是想把卡夫卡作品中的一切都从细节上解释清楚，那就错了。一个象征总是普遍的，无论它的译解多么准确，一位艺术家也只能再现其生动性：逐字的译解是没有的。总之，最难理解的莫过于一部象征的作品。一个象征总是超越它的使用者，并使他实际说出的东西比他有意表达的东西更多。在这方面，领会一个象征的最可靠的途径是不挑动它，阅读时不带先入之见，不去寻求它的暗流。特别是对卡夫卡，应当顺应他的写法，从外表接触情节，从形式接触小说。

初看上去，而且是对一个冷漠的读者来说，那是一些令人不安的遭遇，这些遭遇促使一些颤栗的、执拗的人物奋力追随他们永远也提不出的一些问题。在《审判》中，约瑟夫·K受到控告，但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他无疑很想为自己辩护，但他不

知道辩护什么。律师们认为他的案子很难办。这期间，他并未耽误恋爱、吃喝或读报。后来，他受到审判。然而法庭很暗，他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他只是设想他被判决了，但判了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有时也发生怀疑，但他仍继续活着。过了很久，两位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先生来找他，请他跟他们走。他们极有礼貌地把他带到一个荒凉的郊外，把他的脑袋按在石头上，扼死了他。犯人在死前只说了声："象一条狗。"

看得出，在一篇最明显的优点恰恰是自然的故事中，是很难说到象征的。然而，自然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范畴。有些作品，读者觉得其事件是自然的。但也有一些作品（的确更为少见），人物觉得他发生的事情是自然的。由于一种奇特而明显的反常，越是人物的遭遇不同寻常，故事的自然就越明显：这是和人们可以在一个人生活的奇特性和他接受这种奇特性的单纯性之间的距离成正比例的。似乎这种自然就是卡夫卡的自然。恰好。人们清楚地感觉到了《审判》的含义。有人说这是人类状况的一种形象。也许是吧。然而，事情既比这简单，又比这复杂。我是说小说的意义更独特，更涉及卡夫卡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若说是他使我们忏悔的话，可说话的却是他。他活着，然而他已被判决。从他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小说的开头几页中，他就已经知道了；如果说他试图有所补救，他却并不感到惊奇。他对这种缺乏惊奇倒是永远也惊奇不够的。正是从这些矛盾中，人们认出了荒诞作品的最初迹象。有才智的人把他的精神悲剧投射到具体事物中去。他只能借助一种永久的反常做到这一点，这种反常赋与色彩以表达虚无的权力，赋与日常举动以表达永恒野心的力量。

同样，《城堡》也许是一种有行动的神学，但它首先是一个

寻求恩宠的灵魂的个人遭遇，是这样一个人的个人遭遇，他要求这个世界的事物交出它们最大的秘密，要求女人交出睡在她们身中的上帝的标志。而《变形记》则肯定是展示了一种清醒的伦理学的骇人图景。但它也是人发觉不费力就变成了虫子时所体验的那种不可估量的惊异的产物。卡夫卡的秘密就存在于这种本质的含混之中。这些在自然和非常、个体和万有、悲剧和日常、荒诞和逻辑之间的永久的摇摆，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既给了他反响，又给了他意义。为了理解荒诞的作品，应该列举的正是这些反常现象，应该加强的正是这些矛盾。

一个象征实际上意味着两个方面，两个观念和感觉的世界，以及一部关于二者之间应和的词典，最难编写的就是这部词典。然而，意识到两个世界并存，就是走上了发现其秘密联系的道路。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超自然的不安①。尼采有言："大问题就在街上。"看来人们这里正面临着对这句话的无穷无尽的开掘。

在人类的状况中，既有根本的荒诞，又有无法改变的崇高，这是一切文学的老生常谈。两者同时发生，仿佛是自然的事。让我们再说一遍，两者把我们的灵魂的放肆和我们的肉体的短暂快乐分裂开来，它们在这可笑的分裂之中互为形象。荒诞，是因为正是这肉体的灵魂如此过分地超越了这肉体。对于要想象这种荒诞的人来说，应该在一种平行的对立面的作用中赋与它生命。卡夫卡就是这样用日常表达悲剧，用逻辑表达荒诞。

---

① 要记住，人们也可以同样正当地从社会批评的意义上解释卡夫卡的作品（例如《审判》）。何况可能并没什么好选择的。两种解释都是好的。在荒诞这个用语中，我们看到，针对人的反抗也是针对上帝的，伟大的革命总是形而上的。——作者原注

一个演员，越是避免夸张他塑造悲剧人物时花的气力就越多。如果他有节制，他引起的恐怖就将是没有节制的。在这方面，希腊悲剧富有教益。在一部悲剧中，命运总是在逻辑和自然的面目下被更强烈地感觉到。俄狄浦斯的命运是有预言在先的。他犯有谋杀乱伦二罪是被超自然地决定了的。剧情的全部努力在于展示逻辑的体系，这逻辑体系将一步步趋近完成主人公的不幸。仅仅告诉我们这一罕见的命运并不太可怕，因为这不象是真的。但是，如果这命运的必然性在日常生活、社会、身分、亲昵感情的范围内向我们展示出来，那么，恐怖就达到了顶点。在这种震撼着人并使他说“这不可能”的反抗中，就已经有了“这是可能的”这种绝望的肯定。

这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秘密，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个方面。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通过相反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人心有一种恼人的倾向，即只把压倒它的东西称作命运。不过，既然幸福也是不可避免的，那它也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它之不合理有其独特的方式。但是现代人在没有低估它的时候，却把功劳归于自己。相反，关于希腊悲剧津津乐道的命运还是大有可谈的，传说中的宠儿们，例如尤利西斯，就在最凶险的遭遇中自己解救了自己。

无论如何都应记住的是这种使逻辑、日常与悲剧相连的秘密的共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变形记》的主人公萨姆沙是一位旅行推销员。这就是为什么在那奇特的遭遇使他变成一条害虫中最使他烦恼的是老板可能对他缺勤表示不满。他长出了爪子和触须，脊背拱起，白色的斑点布满肚皮——我并不认为他对此不感到惊奇，否则就没有效果了——这使他产生了“轻微的烦恼”。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的主要作品《城堡》中，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占了优势，然而在这部一切

都没有结局、一切都在重新开始的奇特的小说中，形象地表现出的却是一个寻救圣宠的灵魂的本质的遭遇。象这样地把问题化为行动、使一般和特殊相重合，人们也可见之于任何伟大的创造者所特有的小手法之中。在《审判》之中，主人公也可以叫施密特，或者叫弗朗茨·卡夫卡。然而他叫约瑟夫·K。这不是卡夫卡，然而的确是他。这是一个普通的欧洲人。他象众人一样。然而他也是实体K，提出了这道血肉方程中的X。

同样，如果卡夫卡想表现荒诞，他借助的是一致。大家都知道那个疯子在澡盆里钓鱼的故事。一位对精神病治疗独具见解的医生问他“咬钩了吗?”,只见他正色作答：“没咬，笨蛋,这是在澡盆里呀。”这故事具有巴罗克风格。然而人们敏感地领会到荒诞的效果是多么与过分的逻辑联系在一起。卡夫卡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人满怀着痛苦鼓足勇气在澡盆里钓鱼，并且知道什么也钓不出来。

因此，我在这里看出一种符合原则的荒诞的作品。例如，对于《审判》，我可以断言它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肉体胜利了。不落言诠的反抗（然而正是反抗在写),清醒的、沉默的绝望(然而正是绝望在创造),小说人物一直到死都洋溢着的那种惊人的行动自由，什么都不缺乏。

不过，这世界并不象看起来那么封闭。在这个没有进步的宇宙中，卡夫卡将引入一种形式独特的希望。在这方面，《审判》和《城堡》的方向是不一致的。它们互为补充。从这一作品到那一作品，人们可以发现那难以觉察到的进展，它表明在逃避方面所取得的过分的征服。《审判》提出问题，而《城堡》在某种意义上予以解决。前者根据一种几乎是科学的方法进行描写，但不做结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解释。《审判》诊断，《城

堡》设想疗法。但是这里建议的药并不能治好病，只不过是让疾病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它帮助人们接受疾病。在某种意义上说（请想想克尔凯郭尔）它使疾病缠身不去。测量员K除了噬咬着他的这种焦虑想象不出别种焦虑。他周围的人喜欢上了那种空虚和那种无名的痛苦，仿佛痛苦有了一种令人宠爱的面貌。弗莱达对K说："我多么需要你。自从我认识了你，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感到被遗弃了呀。"使我们爱上压垮我们的东西、并使希望产生于一个没有出路的世界之中的这服精妙的药，使一切都为了改观的这种突然的"跳跃"，就是存在的革命和《城堡》本身的秘密。

在手法上，很少有比《城堡》更严密的作品。K被任命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他到了村庄。但是从村庄到城堡无路可通。在几百页中，K顽强地寻找着道路，使尽了手段，耍花招，转弯抹角，从不生气，想要就任人家给他的职务。每一章都是一次失败。同时也是新的开始。不是出于逻辑，而是出于恒心。这种顽强性造成了作品的悲剧性。K向城堡打电话，他隐约听到的是模糊而混杂的说话声，朦胧的笑声和遥远的呼唤。这就足以使他充满希望，就象夏日天空中出现的那些征兆，或者给了我们活下去的理由的那些晚上的许诺。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卡夫卡特有的忧郁的秘密。实际上，这和人们在普鲁斯特的作品或普洛丁笔下的风景中感到的那种忧郁是一样的：对失去的乐园的怀念。奥尔加说："巴纳贝早上对我说他要去城堡，我感到十分忧郁：此行大概是无用的，这一天大概要白费了，这希望大概是徒劳的。""大概"，仍是在这种细微的差别上，卡夫卡写出他的整部作品。对永恒的追寻是如此的细心，但是还毫无办法。卡夫卡的人物是些有灵感的自动木偶，他们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将来被剥夺了消遣[1]、完全听命于神的污辱时的形象。

在《城堡》中，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屈服变成了一种伦理。K的巨大希望是被城堡接纳。他一个人做不到，于是他的全部努力就在于配得上那种恩惠，即失去人人都让他感觉到的外乡人身份而成为村庄的居民。他希望的是一个职业，一个家，一种正常而健康的人的生活。他忍受不了他的疯狂了。他想变得有理智。他想摆脱使他成为村庄的陌生人的那种奇特的诅咒。在这方面，有关弗莱达的插曲意味深长。这个女人认识城堡的一个官员。如果K让她成了他的情妇，那是因为她的过去。他从她身上得到了某种超越他的东西，同时他也意识到那种使她永远与城堡不相称的东西。人们在这里想到了克尔凯郭尔对雷吉娜·奥尔森的奇怪的爱情。在某些人那里，吞噬着他们的永恒之火大到足以把周围的人的心也在其中烧尽。把不属于上帝的东西给了上帝，这个悲惨的错误也是《城堡》的这一插曲的主题。但是对卡夫卡来说，似乎这并不是一个错误。这是一种教条，是一次"跳跃"。万物皆备于上帝。

测量员离开弗莱达而走向巴纳贝姐妹，这一事实含义更深。因为巴纳贝家是村中唯一完全被城堡和村庄抛弃的人家。姐姐沙玛丽亚拒绝过城堡一官员的可耻的建议。随之而来的不道德的诅咒使她永远失去了上帝的爱。不能为上帝丧失名誉，就是自己使自己不配上帝的恩宠。人们可看出存在哲学的一个熟悉的主题：与道德相悖的真理。这里事情将会引起后果。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走过的道路，即从弗莱达到巴纳贝姐妹，正是

① 《城堡》中，帕斯卡的意义上的"消遣"是通过卫士们体现的，他们使K"摆脱"忧虑。如果弗莱达终于成了一个卫士的情妇，那是因为她喜欢装饰胜过真理，喜欢每日的生活胜过共同分担的焦虑。——作者原注

从信任的爱情到荒诞的神化那条道路。这里卡夫卡的思想又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会合了。“巴纳贝的故事”处于书末，这并不令人惊讶。测量员的最后的企图是通过否定上帝的东西重新发现上帝，是在他的冷漠、不义和仇恨的各种空虚而丑恶的面貌后面、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善和美的范畴来认出他。这个要求城堡接纳他的陌生人，他在其旅行终了时被流放得稍稍更远了些，因为这一次是他背弃了自己，为了试图只带着他的疯狂的希望进入圣宠的荒漠，他抛弃了道德、逻辑和精神的真理①。

这里，希望一词并非可笑。相反，卡夫卡讲述的状况越是悲惨，这种希望就变得越不易改变、越撩人。《审判》越是真正地荒诞，《城堡》激起的“跳跃”就越显得动人和不合理。但是，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如同克尔凯郭尔所表述的存在思想的反常现象：“人们应该拼命地打击人间的希望，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通过真正的希望而获得拯救。”而人们可以解道：“为了写《城堡》，必须先写出《审判》。”

大部分谈论卡夫卡的人实际上都把他的作品说成是一种绝望的呼喊，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救援。这种说法需要修正。希望和希望不同。我觉得亨利·波尔多② 先生的乐观的作品特别使人泄气。这是因为对那些稍许有些苛求的心灵来说什么也得不到允许。相反，马尔罗的思想却总是使人振奋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希望不一样，绝望也不一样。我只看到荒诞的作品本身可以导致我希望避免的那种背叛。那种仅仅是无意义地重复一种没有结果的状况、无微不至地颂扬要灭亡的东西的作品，在

---

① 显然，这只适用于卡夫卡留给我们的《城堡》的未完成稿。然而，作家会在最后几章中打破小说的情调的统一性，这是值得怀疑的。——作者原注

② 亨利·波尔多(1870—1963)。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倾向保守。

这里变成了幻想的摇篮。它解释，它赋与希望一种形式。创造者再也不能脱离它。它不是它本该是的那种悲剧的作用。它赋予作者的生活一种意义。

无论如何，奇怪的是，一些受有相近影响的作品，如卡夫卡、克尔凯郭尔、谢斯托夫的作品，简言之，存在的小说家和哲学家的作品，虽然整个地转向荒诞及其后果，最终却是通向希望的巨大呼喊。

他们拥抱吞噬着他们的上帝。希望是通过谦卑进来的。因为这个存在的荒诞为他们保证了稍许多一些的超自然的真实。如果这个生活的道路通向上帝，那么就有一条出路。克尔凯郭尔、谢斯托夫和卡夫卡的主人公们重复他们的路线时所怀有的韧性和顽强是这种信心的一种动人的奇特的保证①。

卡夫卡不承认他的上帝具有道德的崇高、明显性、善良和一致性，但这是为了更好地投入他的怀抱。荒诞被承认，被接受，人顺从了它，而从这时起，我们知道就不再有荒诞了。在人类状况的局限内，还有什么比允许摆脱这种状况更大的希望呢？我又一次看到，存在思想和流行的看法相反，是充满着一种过分的希望的，正是这种思想用原始基督教和宣布救世福音搅动了旧世界。然而，在这种成为一切存在思想的特点的跳跃中，在这种固执中，在这种无平面的神性的测量中，怎么能看不到一种舍弃一切的清醒的标记呢？人们只希望这是一种骄傲，它放弃是为了自救。这种放弃将是富有成果的。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改变那一点。在我看来，说清醒象一切骄傲一样没有结果，这并减少不了它的道德的价值。因为一种真理根据其定

① 《城堡》中唯一没有希望的人物是阿玛丽亚。与测量员最激烈地相对的正是她。——作者原注

义本身也是没有结果的。所有的明显的事物都是如此。在一个什么都有却又什么都不能解释的世界中，一种价值或一种玄学的丰富性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

无论如何，人们在这里看到卡夫卡的作品存在于什么样的思想传统之中。事实上，把从《审判》到《城堡》的手法看作是严密的，这会是不聪明的。约瑟夫·K和测量员K只是吸引着卡夫卡的两极①。我会和他说一样的话的，而且我会说他的作品大概不是荒诞的。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看不到他的伟大和普遍性。他的伟大和普遍性来源于他善于如此深广地用形象表现从希望到忧伤、从绝望的智慧到有意的盲目之间的日常的转变。他的作品是普遍的（一部真正荒诞的作品不是普遍的），因为其中表现了逃避人类的人的动人面孔，他在他的矛盾中汲取相信的理由，在他的富有成果的绝望中汲取希望的理由，并把他对死亡的可怕的学习称作生活。他的作品是普遍的，还因为是受了宗教的影响。如同在一切宗教中一样，人从他自己的生活的重压下解脱出来。然而，如果说我知道这一点，如果说我也能欣赏他，那么我也知道我并不寻求普遍的东西，我寻求真实的东西。两者可以不相重合。

如果我说真正使人绝望的思想恰恰可以用对立的标准加以明确，悲剧的作品可以是那种在一切希望都排除的情况下描写一个幸福的人的生活的作品，人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这种看问题的方式。生活越是激动人心，失去它的念头就越荒谬。人们在尼采的作品中感觉到的那种绝妙的枯燥的秘密也许正在这

① 关于卡夫卡的思想的两个侧面，试比较《在苦役犯监狱中》："罪孽(请理解为人的)从来是不可怀疑的"和《城堡》的片断(莫缪斯的报告)："测量员K的罪名难以成立。"——作者原注

里。在观念的这个范围内，尼采好象是从一种荒诞的美学中引出极端的后果的唯一的艺术家，因为他的最后的信息存在于一种没有结果的、征服的清醒和一种对任何超自然的慰藉的固执的否定之中。

不过，上述可能已足以揭示卡夫卡的作品在本文论及的范围内所具有的最大的重要性。这里，我们被带到了人类思想的边缘地带。从一个词所具有的全部意义来理解，人们可以说这作品中的一切都是本质的。无论如何，它整个地提出了荒诞的问题。如果人们愿意把这些结论和我们最初的看法联系起来，把内容和形式联系起来，把《城堡》的隐秘含义和它展开在其中的自然的艺术联系起来，把K的热情而骄傲的寻求和它在其中进行的日常背景联系起来，人们就会明白这作品究竟有多么伟大。因为，如果说怀念是人类的标记，那么可能谁也不曾赋予这些遗憾的幽灵们这样的血肉和凹凸。但是，人们也同时可以领会荒诞的作品所要求的特殊的伟大究竟是什么，而它也许并不在这里。如果艺术的特性是使一般与特殊相联系，使一滴水的短暂永恒与光线的作用相联系，那么更为正确的是根据荒诞的作家能够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引入的距离来估量他的伟大。他的秘密在于善于发现它们在最大的差异中相接的桥梁。

说真的，这种人和非人共存的精确的地点，纯洁的心灵是能够随处看到的。如果说浮士德和堂吉诃德是艺术的卓越的创造，那是由于他们用人世间的双手向我们指出的不可度量的伟大。不过总有这样的时刻，精神否认这些手可以触摸的真理。也有这样的时候，创造不再被当成悲剧，而只是被认真对待。这时人只关心希望。然而那并不是他的事情。他的事情是脱离诈术。况且，我在卡夫卡向整个宇宙提起激烈的控诉之后看见的正是他。最后，卡夫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判词宣布这个连服

鼠都参与了希望的丑恶、令人震惊的世界无罪①。

① 以上所述显然是对卡夫卡的作品的一种解释。但是应该补充说，这丝毫也不妨碍抛开一切解释，从纯粹美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评价。例如，B·格勒图森在他为《城堡》所写的杰出的序言中，就局限于仅仅跟随他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称为"醒着的睡眠者"的痛苦的想象，这要比我们聪明。奉献出一切，却又什么都不肯定，这是这些作品的命运，也许是它们的伟大。——作者原注

散文三题

郭宏安　译

反 与 正

这是一个古怪而孤独的女人。她和各种精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与它们的争吵，拒绝见家里的某些人，因为他们在她藏身的那个世界里名声不好。

她从姐姐那儿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这五千法郎到了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来，颇使人有困扰之感。应该把这笔钱投在什么地方。几乎每一个人都会使用一笔巨大的财富，可当这笔财富很小的时候，困难就来了。这女人始终不变。她快死了，想使自己那一把老骨头日后有个遮蔽。这时有个真正的机会送上门来。她那个城的公墓里，有一块出租墓地刚刚到期，土地的所有者们在那里起了一座壮观的地下墓室，线条简洁，砌有黑色的大理石，一句话，的确是一件珍宝，他们四千法郎就让给她了。她于是买了这座墓室。这可是一笔稳稳当当的证券，不受金融波动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她让人整理了墓坑，随时都可接待她的躯体。一切就绪，她让人用金色的大写字母刻上她的名字。

这件事使她深感满意，竟对这墓产生了一股真情。开头，她来看看工程的进展，后来就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必到了。这是她唯一的外出和唯一的消遣。快到下午 2 点钟的时候，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城门，那里就是公墓了。她进了墓室，仔细地

关好门，跪在跪凳上。就这样，她面对着自己，比较着过去的她和将来的她。她找到了那一条断链的环，不费力看破了上帝隐秘的意图。通过一种奇特的象征，她有一天甚至恍然大悟：她在世人的眼中已然死了。万圣节那天，她比往日到得晚了些，发现门下虔诚地铺满了紫色堇。原来是一些不相识的同情者，他们非常细心，看到墓前竟没有鲜花，就分担了家人的痛苦，一起来怀念这被遗忘的死者。

现在，我还得再谈谈这些事情。窗户的另一头有一座花园，我只能看见它的围墙。还有光影流动的几丛树叶。往上，仍旧是树叶。再往上，就是太阳了。人们感到外面的空气兴高采烈，世界一片欢乐，然而我却只看见枝叶的影子在我的白色窗帘上晃动。五束阳光耐心地在房间里撒下一股干草的香味儿。一阵微风吹过，窗帘上的影子活跃起来。一片云遮住了太阳，随即又飘走，从阴影中射出了那一瓶金合欢花的灿烂的黄色。这就足够了：只一缕微露的光亮，我的心头就充满了一种模糊的、使人昏昏然的快乐。正是那个1月的午后使我面对世界的反面。空气中还透着寒冷。到处是一片片似可捏碎的阳光，但已蕴含着永恒微笑的种种迹象了。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只能投入这枝叶和阳光的游戏之中。化作这一片光，我的香烟在其中燃烧；化作这一股温柔和激情，它们在空气中呼吸。倘若我想认识我自己，那就是在这光的深处。倘若我想理解和享受这种交出了世界的奥秘的滋味，那就是我在宇宙的深处所发现的我自己。也就是说，我自己就是使我从环境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极度的感动。

在此之前，我说的是另一些事情，说的是人和他们所购买的坟墓。现在，让我从时间之布上剪下这一分钟吧。有些人在书页中夹一朵花，藏起一次使他们动情的散步。我也散步，但

那是一位神祇在抚爱我。生命是短暂的，虚掷光阴就是犯罪。有人说，我是活跃的。然而活跃仍旧是虚掷光阴，因为人在消耗自己。今日乃是一次暂停，我的心前去迎会它自己。如果说那种焦虑仍在压迫着我，那就是感觉到了这不可能知的瞬间正象水银珠一样地从我指间流走。有些人愿意对着世界转过背去，那就由他们吧。我不抱怨，因为我看着我长大。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王国在这世界上。这阳光，这阴影，这炎热，这来自空气深处的寒冷：一切都写在这窗口之中，我透过它看见天空撒下它的完满去迎会我的怜悯，我还会去问某种东西是否正在死去，人是否在受苦吗？我可以说，我一会儿就说，重要的是合乎人情，朴实单纯。不，重要的是真，于是一切尽在其中，例如人情和纯朴。那么当我活在这世界上，我什么时候更真呢？动欲之前我已被满足。永恒在彼，我希望着。现在我所希望的已不再是幸福，而仅仅是自觉。

一个人在观照，另一个人在掘墓，如何将他们分开？如何将人及其荒诞分开？看哪，天微笑了。光在膨胀，夏天快到了吗？这就是那些应该爱的人的眼睛和声音啊。我以我所有的姿态眷恋着世界，我以我所有的怜悯和感激眷恋着人。在世界的这些正与反之间，我不愿选择，我不喜欢人们选择。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是清醒的、嘲讽的。他们说："这说明您不善良。"我看不出其间的联系。当然，我听人说某人不道德，我的理解是某人需要一种道德；我听人说某人蔑视智力，我认为他是承受不了怀疑。反正我不喜欢人们作假。睁开双眼正视光犹如正视死亡，这才是大勇。说到底，问题在于如何指明这种对生活的酷爱和这种隐秘的绝望之间的联系。如果我倾听蜷缩在事物深处的嘲讽①，它就会慢慢呈现出来。它会眨着小而亮的眼睛说：

① 即巴莱斯所说"自由的保证"。——原注

“生活吧，就象……”尽管多方求索，我的全部学问尽在此了。

无论如何，我并不能肯定我说得对。我是否想到人们讲给我听的那个女人，这并无关紧要。她要死了，她还没有咽气，女儿就给她穿衣服入殓。实际上，四肢还没有变硬时，事情似乎更容易些。不过，我们生活在匆匆忙忙的人们中间，这究竟是很可奇怪的。

蒂巴萨的婚礼

春天，蒂巴萨住满了神祇，它们说着话儿，在阳光和苦艾的气味中，在披挂着银甲的大海上，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在铺满了鲜花的废墟上，在沸滚于乱石堆里的光亮中。在某个时辰，田野被太阳照得黑乎乎一片。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抓住在睫毛边上颤动的一滴滴光亮和色彩。芬香植物浓郁的气味直刺嗓子眼儿，在酷热中让人透不过气来。极远处，我只能勉强看见舍努阿山那黑黑的一团，这山的根在环绕村庄的群山里，它平稳而沉重地摇晃着，跑去蹲在大海里。

我们穿过村庄，这村庄已经开向海滩了。我们进入一个黄色和蓝色的世界，迎接我们的是阿尔及利亚夏天的土地的芬芳而辛辣的气息。到处可见，玫瑰花越出别墅的墙外；花园里，木槿还只有淡淡的红色，而一片繁茂的花，其茶红色却奶油一般浓，还有一片长长的蓝色鸢尾花，其边缘弯得极为精巧。石头都是热的。我们走下金黄色的公共汽车时，肉店老板们正坐着红色的车子进行早晨的巡回，他们吹响喇叭呼唤着居民。

港口左侧，有一条干燥的石头小路，穿过一片乳香黄连木和染料木，通向废墟。道路从一座小塔灯前经过，然后深入田野。灯塔脚下，已经有开着紫色、黄色和红色的花的肥大植物爬向海边的岩石，大海正吮吸着，发出阵阵亲吻似的响声。我

们站立在微风中，头上的太阳只晒热了我们的脸颊的一面，我们望着光明从天上下来，大海没有一丝皱纹，它那明亮的牙齿绽出微笑。进入废墟王国之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旁观者。

走了几步，苦艾的气味就呛得我们喉咙难受。它那灰色的绒毛盖满了无际的废墟。它的精华在热气中蒸腾，从地上到天上弥漫着一片慷慨的酒气，天都为之摇晃了。我们迎着爱情和欲望走去。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也不寻求人们向伟人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阳光之外，亲吻之外，原野的香气之外，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对于我，我不想一个人独自来到这里。我经常和我喜欢的那些人一起来，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明媚的微笑，那是充满爱愉的脸呈现出的微笑。这里，我把秩序和节制留给别人去说。这是自然的大放纵，这是大海的大放纵，我整个儿地被抓住了。在这废墟与春天的结合中，废墟又变成了石头，失去了人强加于它的光滑，重新回到自然之中。为了这些回头浪子，自然毫不吝惜鲜花。在广场的石板中间，天芥菜长出了它那白色的圆脑袋，红色的天竺葵把它的血撒在昔日的房屋、庙宇和公共广场上。如同许多的知识将一些人引向上帝，许多的岁月将废墟又带回母亲的家园。今天，它们的过去终于离去，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与这种深厚的力量分开，这力量把它们引向尘世间的事物的中心。

多少时间在碾碎苦艾，抚摸废墟、试图让我的呼吸与世界骚动的叹息在相配合之中过去了！我深深地沉入原野的气味和催人入睡的昆虫合唱之中，对着这充满着热的天空那不堪承受的雄伟睁开了双眼。成为自己，找到深藏的能力，这并不那么容易。然而，望着舍努阿山那结实的脊梁，我的心平静了，洋溢着一种奇异的信心。我学会了呼吸，我融合了我自己，我完成了我自己。我攀登过一座又一座山丘，每一座都给了我奖赏，

如同那座庙宇，其园柱度量着太阳的行程，人们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村庄，它的白色、粉红色的墙，它的绿色的阳台。也如同东山上那座大教堂，它还保留着墙，其周围很大范围内摆着出土的石棺，大部分刚刚被发掘出来。它们曾经收容过死者，现在则长出了鼠尾草和野萝卜。圣萨尔萨教堂是基督教的教堂，然而每一次从窗洞望出去，我们看见的都是世界的旋律：长满松柏的山丘，或是滚动着一群二十米长的白犬的大海。背伏着圣萨尔萨教堂的山丘顶部平坦，风通过柱廊吹得更为畅快。在早晨的太阳下，空中摇荡着一种巨大的幸福。

需要神话的人们是很可怜的。在这里，神祇充当着岁月流逝的河床或参照物。我描绘，然后我说："这是红色，这是蓝色，这是绿色。这是大海，这是高山，这是鲜花。"我无须提到狄俄倪索斯①就可以说我喜欢把鼻子紧贴着乳香黄连木的花球。我还可以无拘无束地想到那首献给得墨忒耳② 的古老颂歌："世上活着的人中看见这些事情的人是幸福的。"看见，而且在世上看见，这教训怎能忘记？对于厄琉西斯③ 的神秘，只需沉思就够了。就在这里，我知道我接近世界永远是不够的。我应该精赤条条，然后带着大地之精华的香气投入大海，在后者之中洗刷前者的精华，在我的皮肤上牢牢地系上一条纽带，为了这纽带，大地和大海嘴对嘴地呼吸了那么久。进入水中，先是一阵寒战，然后是一种又凉又浑的胶上升，然后是两耳嗡嗡作响，流鼻涕，嘴里发苦——这是游泳，两臂出了海象添了一层水，再在太阳底下晒，每一块肌肉都在扭曲中磨炼；水在我身上流，我的腿

①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希腊神话中丰产和农业女神，司谷物成熟。

③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在一片骚动中占有了波浪——天际消失了。上了岸，跌进沙滩，委身于世界，重新回到我的血肉的重力之中，太阳晒得我昏头昏脑，我渐渐看见胳膊上水流了下去，干了的皮肤露出金黄色的汗毛和沙砾。

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节制地爱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情。抱紧一个女人的躯体，这也是把从天空降下大海的那种奇特的快乐留在自己身上。刚才，当我想扑向一丛苦艾，让它的芬芳进入我的身体时，我应该不顾一切偏见地意识到，我正在完成一桩真理，这既是太阳的真理，也是我的死亡的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这里玩耍的，正是我的生命，这生命散发着火热的石头的气味，充满了大海和刚刚开始鸣叫的蝉的叹息。微风是清凉的，天空是蔚蓝的。我无保留地爱这生命，愿意自由地谈论它，因为它使我对我作为人的处境感到骄傲。然而，人们常常对我说：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不，确有可以骄傲的东西：这阳光，这大海，我的洋溢着青春的心，我的满是盐味儿的身体，还有那温情和光荣在黄色和蓝色中相会的广阔的背景。我必须运用我的力量和才能来获取的正是这一切。这里的一切都使我完整无损，我什么也不抛弃，我任何假面也不戴，我只须耐心地学习那困难的生活本领，这抵得上所有那些生活艺术。

快到中午了，我们穿过废墟回到港口边上的一家小咖啡馆。阳光和色彩的铙钹在我们的脑袋里轰响，好凉快啊，那阴影憧憧的大厅，那绿色的、冰镇的大杯薄荷茶！外面，是大海和飞扬着滚烫的尘土的公路。我坐在桌前，试图在闪动睫毛间捉住热得发白的天空那眩目的五颜六色。我们的脸上满是汗水，轻薄的衣裳下面的身体却是凉爽的，我们都炫耀着与世界进行了一天的婚宴所感到的幸福的疲倦。

历经某种更新。人们常常抱怨很快就感到厌倦，而这时恰恰应该赞赏世界，因为曾经被遗忘过而显得常见常新。

傍晚，我进入位于国家公路旁的公园，那里花木井然，更见秩序。我走出混乱的芳香和阳光，在因夜晚而凉爽的空气中，精神平静下来，松驰的躯体品味着因爱情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内心寂静。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我看着田野渐渐地变圆。我心满意足。头上，一株石榴树垂下花蕾，还没有张开，满布着棱纹，仿佛一只只握起的小拳头，其中包容着春天的一切希望。身后是一丛丛迷迭香，我只闻见了一阵酒香。山丘嵌在树间，再远些，大海如带，上面是一角天空，仿佛抛锚的帆船，安详而温柔。我的心中涌起一种奇特的快乐，就是那种产生于良心安宁的快乐。演员都体验过一种感情，那是当他们意识到演好了一个角色的时候，更确切地说，他们使自己的姿态和所演人物的姿态互相吻合，以某种方式进入一种事先谋划好的意图之中，而且又一下子使之与自己的心一起跳动。我感觉到的正是这个：我演好了我的角色。我做了人应该做的事，虽然一整天都感到快乐这件事并不是一桩非凡的成功，但却是一种处境的充满了感情的完成，在某些场合中，这使得幸福成为我们的一种义务。于是，我们又感到了孤独，然而是在满足之中。

现在，树上站满了鸟雀。大地缓缓地叹息着，渐渐遁入黑暗。很快，黑夜将随同第一批星辰降临在世界的舞台上。白天的明亮的神祇们将返回每日一次的死亡之中。但又会有别的神祇出现。他们的脸色阴暗、憔悴，一定是出生于大地的心脏之中。

至少是现在，一阵阵波浪穿过颤动着金色花粉的空间扑到我的脚下，在沙滩上散开。大海，原野，寂静，土地的芬芳，

我周身充满着香气四溢的生命，我咬住了世界的这枚金色的果子，心潮澎湃，感到它那甜而浓的汁液顺着嘴唇流淌。不，我不算什么，世界也不算什么，重要的仅仅是使我们之间产生爱情的那种和谐与寂静。我不想只为我一个人要求这爱情，我知道并且骄傲地与整个人类来分享，这人类生自太阳，生自大海，活跃而有味儿，它从纯朴中汲取伟大，它站在海滩上，向它的天空那明亮的微笑送去会心的微笑。

重返蒂巴萨

你怀着一颗愤怒的灵魂，离家远航，穿过海上的岩礁，定居在异国的土地上。

——《美狄亚》

五天来，阿尔及尔一直下雨，最后竟连大海也打湿了。下不完的大雨，厚得发粘，从仿佛永不干涸的天空的高处，朝着海湾扑下来。大海象一块灰色的、柔软的海绵，在迷茫的海湾里隆起。但是，在持续的雨中，水面看起来似乎并不动。只是远远地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宽阔的鼓荡，在海上掀起一片朦胧的水汽，朝着被围在湿漉漉的林荫道之中的港口漫去。城市本身也升起一片水汽，掠过水淋淋的白墙，去和海上的水汽相会。人无论朝哪个方向，呼吸的似乎都是水，空气终于能喝了。

面对这被水汽团团裹住的大海，我走着，等着，这12月的阿尔及尔，对于我仍然是一座夏天的城市。我逃离了欧洲的黑夜，逃离了人间的寒冬。然而这座夏天的城市也失去了笑声，只给我一些隆起的、发亮的脊背。晚上，我躲在亮得刺眼的咖啡馆里，从那些认得出却叫不出的人的脸上看出了我的年龄。我只知道他们跟我一起年轻过，而现在已不再年轻了。

然而我依旧固执地等着，也不大知道等什么，也许是重返蒂巴萨的时刻吧。当然，重返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希望四十岁时重新体验爱过或二十岁时极大地享受过的东西，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疯狂，而且几乎总要受到惩罚。不过我对这疯狂已有经验。我已经回过蒂巴萨，那是在战后不久，而那战争的年代，在我正标志着青年时代的结束。我想我那时是希望重获一种不能忘怀的自由。的确，在这个地方，二十年前，我常常整整一个上午都在废墟间徜徉，闻苦艾的气味，靠着石头取暖，寻找小小的玫瑰花，这些玫瑰谢得很快，只能活到春天。只是在正午，蝉也因不堪酷热而钳口，我才逃离吞噬一切的光明燃起的那一片贪婪的大火。入夜，我有时睁着眼睛躺在繁星密布的天空下。那时候，我是在生活。十四年后，我又看见了我的废墟在距离海浪几步远的地方，我沿着这座已被遗忘的小城的街道走着，穿过长满苦涩的树木的田野；在俯视着海湾的高地上，我象以往一样抚摸着焦黄的圆柱。然而，废墟已被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只能从被特许的入口进去。由于一些似乎被道德认可的理由，夜间在那里散步也被禁止了；白天，人们则会遇见一位宣过誓的守卫。大概是出于偶然吧，那天早晨，废墟上也下着雨。

我感到困惑，我在荒僻、潮湿的田野里走着，至少试图重获那种力量，这力量直到目前还是忠实的，它帮助我接受那些既成的东西，在我一旦承认不能加以改变的时候。的确，我不能在时间之流中逆行，不能把我爱过的、已在很久之前骤然消失的面貌重新给予世界。事实上，1939年9月2日，我没有去希腊，我原本是应该去的。相反，战争来了，后来战火又燃遍了希腊。那一天，在积满了黑水的石棺前，在沾满了污泥的柽柳下，我在自己身上又发现了那阻隔在炽热的废墟和铁丝网之间

的距离和岁月。我先是在美的景象——我唯一的财富——中长大，又以丰富为开端，接着来的却是铁丝网，我说的是暴政，战争，警察，反抗的时代。不能不习惯于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仅只成了回忆。而在这泥泞的蒂巴萨，回忆本身也正越来越淡薄。这里说的就是美、丰富、青春！在熊熊大火的照耀下，世界顿时现出了它的皱纹和创伤，旧的和新的。它一下子老了，我们也一样。我来这里寻求的那种冲动，我知道它只能激起那种连自己也不知道就要迸发出来的冲动。没有点儿无邪，就绝不会有爱。然而无邪安在？王国崩溃了，民族和人互相揪住脖子噬咬，我们的嘴被玷污了。我们原先是无邪而不自知，现在则是有罪而不自愿：神秘随着我们的知识一道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关心起道德来了，真可笑啊。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德！在那无邪的年代，我不知道德为何物。现在我知道了，但我不能根据它来生活。在我曾经喜欢的高地上，在倾颓的庙宇的潮湿的圆柱间，我仿佛跟着什么人在走，我听得见石板和瓷砖上的脚步声，却永远也赶不上了。我又去了巴黎，数年之后才回家。

然而，那些年中，我隐隐地感到缺了点儿什么。当人们一旦有机会强烈地爱过，就将毕生去追寻那种热情和那种光明。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联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圣所缺乏的崇高。但是，无论如何，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地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为了再生，必须有一种恩惠、

忘我和一个祖国。有几个早晨，在路的拐角，一滴美妙的露珠落在心上，随即便消散了。然而那清凉还在，而心所一直要求的正是这清凉。我又该出发了。

在阿尔及尔，我第二次在同样的、仿佛从我以为是最终的离去那时候起就没有停过的雨中走着，在一种无尽的、散发着雨水和海水的气味的忧郁中走着；尽管天空大雾弥漫，背影在骤雨中逝去，咖啡馆的硫光改变了人们的面容，我仍固执地希望着。难道我不知道阿尔及尔的雨看似无穷无尽却终有一刻要停止吗？就象我家乡的那些河流，两个小时内膨胀起来，淹没大片农田，却转眼间就干涸了。果然，一天晚上，雨停了。我又等了一夜。一个水淋淋的清晨从纯净的海上升起，光彩照人。天空象眼睛一样新鲜，被水洗了又洗，露出最细最疏的经纬，从那儿射下一道颤动的光，给了每幢屋、每株树一个鲜明的轮廓、一种令人赞叹的新奇。在世界的早晨，大地也该是从一片类似的光明中冒出来的。我又踏上了通往蒂巴萨的道路。

对于我，这条69公里的路，没有一公里不铺满了回忆和感受。狂暴的童年，卡车轰鸣中少年的梦幻，清晨，鲜丽的姑娘，海滩，总是处于巅峰状态的年轻的肌肉，晚上一颗十六岁的心的淡淡的焦虑，生之欲望，光荣，还有那岁岁年年总是一样的天空，充满了汲不尽的力量和光明，永不满足，一连数月，一个一个地吞噬着在正午那阴郁的时刻摆在海滩上的，呈十字状的祭品。当道路离开萨赫尔及其长满古铜色葡萄的山丘而向着海岸伸展下去的时候，我立刻就在天际看见了那也总是一样的，在早晨几乎是不可察知的大海。可是我并没有停下来看它。我想看的是舍努阿这座沉重而结实的山，它是整整的一块，沿着蒂巴萨海湾向西延伸，然后进入大海。人们在到达之前，远远地就能看见它，裹在一片还与天空混沌不分的蓝色的、轻柔的

水汽中。随着人们走近，它渐渐凝聚，直到获得包围着它的海水的颜色，仿佛不动的大浪，其神奇的奔涌突然被凝固在陡然平静下来的大海之上。再近些，快到蒂巴萨的时候，就看见它那高耸的主体，泛着棕色和绿色，这是一尊无可动摇的、浑身披着苔藓的老神灵，是它的儿子们的庇护所和避风港，而我正是它的儿子。

我一面望着它，一面穿过铁丝网，进入废墟间。在12月耀眼的光亮中，我又一丝不爽地发现了我前来寻找的东西；尽管光阴流逝，世事沧桑，在这片荒凉的大自然中，这些东西的确是只奉献给我一个人的；人的一生倘若有这么一、二次，也就可以认为是圆满的了。从长满橄榄树的广场上，可以看见下面的村庄。那儿无声无息，只有轻烟在明净的天空中升起。大海也不声不响，仿佛在灿烂而冰冷的光的不断冲洗中窒息了。只有远远地来自舍努阿的鸡鸣在赞颂这白昼的脆弱的荣光。废墟那边，极目望去，也只能在一片水晶般透明的空气中看见斑痕累累的石头、苦艾、树木和完美的圆柱。在一段无法计数的时刻内，清晨仿佛凝固了，太阳仿佛站住了。在这光明、这寂静中，多少年的愤怒和黑夜慢慢地消融了。我在我身上听见了一种几乎被忘却的声音，仿佛我那久已停歇的心又开始轻轻地跳动了。现在我醒了，我一个一个地认出了寂静造成的难以察觉的声音：鸟儿的持续的低音，悬崖下大海轻而短促的呻吟，树的颤动，圆柱的盲目的歌唱，苦艾的摩擦，倏忽即逝的蜥蜴。我听见了这一切，我也在倾听我身上涌起的幸福的波涛。我好象终于进了避风港，至少是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将从此不再结束。不过，片刻之后，太阳明显地在天上又爬了一步。一只鸟鸦唱出简短的前奏，紧接着四面八方就爆发出一阵鸟鸣，有力，热烈，带着欢快的杂乱和无限的陶醉。白昼重新上路了。

它要带着我直到晚上。

正午，我站在半沙半土的山坡上，望着大海。山坡上长满了天芥菜，那一片片的天芥菜，仿佛近几个月激浪退下时留下的水沫。大海这时已筋疲力尽，翻腾不动了。我消除了两种干渴，这两种干渴是不能长久欺骗的，除非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这两种干渴就是美和赞叹。因为唯有不被爱才是恶运，唯有不爱才是不幸。今天，我们大家都死于这种不幸。因为鲜血和仇恨使心失去血肉，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我们生活在喧嚣中，在这喧嚣中，爱是不可能的，而只有正义也是不够的。因此，欧洲憎恨白昼，只知道给自己以不义。但是，为了不使正义变得萎缩，变成一枚果肉干而涩的橙子，我在蒂巴萨重新认识到，必须在自己身上保留一种新鲜和一股快乐的源泉，使之不受污损，必须钟爱逃脱了不义的白昼，必须怀着这种争得来的光明投入战斗。我在这里重新发现了过去的美和一片年轻的天空，我掂量着我的运气，终于明白了，在我们的疯狂肆虐的那些年里，对于这一片天空的回忆从未离开过我。是这回忆最终使我不绝望。我一直清楚蒂巴萨的废墟比我们的工地和瓦砾都年轻。在这里，世界每天都在一片常新的光明中重新开始。啊，光明！这是古代戏剧中所有人物面对着命运发出的呼喊。这最后的依靠也是我们的依靠，我现在明白了。在隆冬，我终于知道了，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我又离开了蒂巴萨，又看见了欧洲和她的斗争。然而，对这一天的回忆仍然支持着我，帮助我以同一种心情接受令人振奋的东西和令人沮丧的东西。在我们所处的这一困难时刻，除了不排斥任何东西，学会用白线和黑线打同一根绷得要断的绳

子，我还能希望什么？在迄今我所有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中，我觉得我清楚地认出了这两种力量，就是在它们相互对立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不能否定我生于其中的光明，但是我也不愿拒绝这个时代的奴役。在这里用其它一些更响亮更残暴的名字来与蒂巴萨这甜蜜的名字相对抗，简直是太容易了：今日之人有一条内心之路，这条路我很熟悉，因为我在两个方向上都走完过，它从精神的山丘通向罪恶的都会。无疑，人们可以永远休息，酣睡在山丘上，或者寄居在罪恶之中。然而，倘若人们放弃存在的一部分，他就必须放弃存在，也就必须放弃生活或者直接的爱。于是就有了一种不拒绝生活的任何东西的生之意志，而生活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的美德。我的确希望我已经发扬过这一美德，哪怕是相隔很久。既然很少有时代象我们的时代这样要求人们以同样的态度正视甘与苦，我就愿意不回避任何东西，准确地保留这双重的回忆。是的，有美，也有屈辱。无论做起来多么难，我愿永不背叛任何一方。

然而，这仍象是一种道德，而我们活着是为了一种比道德更深远的东西。假使我们能说出它的名字，那将是怎样一种寂静。在蒂巴萨东面的圣萨尔萨山上，晚上是有人的。说真的，天还很亮，但是在亮中已有一种看不见的衰弱宣告了白昼的结束。起风了，夜一般轻，突然，无浪的大海朝着一个方向，如一条平静的大河般从天际的一端向另一端流去。天暗下来了。这时，出现了神秘，夜之精灵和快乐之彼岸。然而如何解释这一切？我从这里带走的一枚小钱币有一面很清晰，是一张美丽的女人面孔，它向我重复着我在那一天里知道的一切，另一面已经锈蚀了，我在归途中于指间感觉得到。这张无唇的嘴能向我说些什么，除了另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我的东西，这声音在我身上，它每天都让我知道我的无知和我的幸福。

“我所寻找的秘密深藏在一条长满橄榄树的山谷里，在草下，在冰冷的墓下，一幢古旧的、散发着葡萄嫩枝气味的房屋周围。二十多年中，我跑遍了这条山沟，跑遍了相象的另一些山沟，我询问过沉默的牧羊人，我敲过无人居住的废墟的大门。有时，在第一颗星级上还很亮的天空的时候，在一片细腻的光雨下，我以为我明白了。我也的确明白。也许我一直是明白的。然而没有人愿意要这秘密，大概我自己也不要，但我离不开我的秘密。我生活在我的家庭之中，这个家庭以为统治着富有而丑陋的、用石头和雾建立起来的城市。日日夜夜，她高声说话，万物在她面前折腰，而她不向任何东西折腰，因为她对任何秘密都充耳不闻。她的力量支持着我，却使我厌烦，有时她的呼声令我疲倦。然而她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我们流着同一种血。我也是孱弱的、吵闹的，和她一个鼻孔出气，我不也是在乱石间呼喊过吗？所以，我竭力忘却，在我们的铁与火的城市中徜徉，我对着黑夜勇敢地微笑，我呼唤风暴，我将是忠诚的。我果然忘了，从此变得活跃，但却两耳失聪。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准备因衰竭和无知而死去的时候，我将能放弃我们的刺眼的坟墓，去躺在山谷中，沐浴着同一种光明，最后一次学会我已经知道的东西。”

1953年

局外人

郭宏安　译

第一部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他似乎不大高兴。我甚至跟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他没有理我。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见我戴孝的时候，一定会安慰我的。现在有点象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

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天气很热。跟平时一样，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赛莱斯特还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

点儿烦，因为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

为了及时上路，我是跑着去的。这番急，这番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的时候，正歪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远地方来。我不想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走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当儿，门房说个不停，后来，我见了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随后，他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此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就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无须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菲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作朋友。他们对过去的一些事有共同的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还会闷得慌呢。”

这是真的。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之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这又是因为不习惯。差不多为此，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

院长还在跟我说，可是我几乎不听了。最后，他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的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没说话，他领着我出

去了。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里了。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这里每逢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有两三天工夫才能安定下来。这给服务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闲谈。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不作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说开了。真象一群鹦鹉在叽叽喳喳低声乱叫。走到一座小房子门前，院长与我告别："请自便吧，默而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下葬定于明晨十点钟。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还有，您的母亲似乎常向同伴们表示，希望按宗教的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只不过想告诉您一声。"我谢了他。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

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玻璃天棚，四壁刷着白灰。有几把椅子，几个×形的架子。正中两个架子上，停着一口棺材，盖着盖，一些发亮的螺丝钉，刚拧进去个头儿，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看得清清楚楚。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一方颜色鲜亮的围巾。

这时，门房来到我的身后。他大概是跑来着，说话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再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叫住了他。他问我："您不想？"我回答说："不想。"他站住了，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问道："为什么？"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好象只是想问问。我说："不知道。"于是，他拈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说道："我明白。"他的眼睛很漂亮，淡蓝色，脸上有些发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恶疮。"因为我不明白，就看了看那女护士，只见她眼睛下面绕头缠了一条绷带。在鼻子的那个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人们

所能见到的，就是一条雪白的绷带。

她出去以后，门房说："我不陪你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表示，他没有走，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使我很不自在。傍晚时分，屋子里仍然很亮。两只大胡蜂在玻璃天棚上嗡嗡地飞。我感到困劲儿上来了。我头也没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他立即回答道："五年了，"好象就等着我问他似的。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门房，他一定会惊讶不止。他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说到这儿，我打断了他："噢，您不是本地人？"我这才想起来，他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跟我谈起过妈妈。他说要赶快下葬，因为平原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住过，而且怎么也忘不了巴黎。在巴黎，死人在家里停放三天，有时四天。这里不行，时间太短，怎么也习惯不了才过这么短时间就要跟着柩车去下葬。这时，他老婆对他说："别说了，这些事是不能对先生说的。"老头子脸红了，连连道歉。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他说得对，很有意思。

在小停尸间里，他告诉我，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他觉得自己身体还结实，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无论如何，他还是养老院收留的人。他说不是。我先就觉得奇怪，他说到住养老院的人时(其中有几个并不比他大)，总是说："他们"，"那些人"，有时也说"老人们"。当然，那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还管着他们呢。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天一下子就黑了。浓重的夜色很快就压在玻璃天棚上。门房打开灯，突然的光亮使我眼花目眩。他请我到食堂去吃饭。但是我不饿。他于是建议端杯牛奶

咖啡来。我喜欢牛奶咖啡，就接受了。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咖啡，想抽烟。可是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我想了想，认为这不要紧。我给了门房一支烟，我们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的朋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端点咖啡来。"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照在白墙上的灯光使我很难受。他说不行。灯就是那样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我后来没有怎么再注意他。他出去，进来，摆好椅子，在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了一些杯子。然后，他隔着妈妈的棺木在我对面坐下。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膊的动作看，我认为她是在织毛线。屋子里暖洋洋的，咖啡使我发热，从开着的门中，飘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味。我觉得我打了个盹儿。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弄醒了。乍一睁开眼睛，屋子更显得白了。在我面前，没有一点儿阴影，每一样东西，每一个角落，每一条曲线，都清清楚楚，轮廓分明，很显眼。妈妈的朋友们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一共有十来个，静悄悄地在这耀眼的灯光中挪动。他们坐下了，没有一把椅子响一声。我看见了他们，我看人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他们的面孔和衣着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真难相信他们是真的在那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束腰的带子使她们的大肚子更突出了。我还从没有注意过老太太会有这样大的肚子。男人几乎都很瘦，拄着手杖。使我惊奇的是，我在他们的脸上看不见眼睛，只看见一堆皱纹中间闪动着一缕混浊的亮光。他们坐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看了看我，不自然地点了点头，嘴唇都陷进了没有牙的嘴里，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脸上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都面对着我，摇晃着脑袋坐在门房的左右。有一阵，我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他们是审判我来了。

不多会儿，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躲在一个同伴的后面，我看不清楚。她抽抽答答地哭着，我觉得她大概不会停的。其他人好象都没有听见。他们神情沮丧，满面愁容，一声不吭。他们看看棺材，看看手杖，或随便东张西望，他们只看这些东西。那个女人一直在哭。我很奇怪，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了，可我不敢对她说。门房朝她弯下身，说了句话，可她摇摇头，嘟囔了句什么，依旧抽抽答答地哭着。于是，门房朝我走来，在我身边坐下。过了好一阵，他才眼睛望着别处告诉我："她跟令堂很要好。她说令堂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什么人也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那个女人的叹息声和呜咽声少了，但抽泣得很厉害，最后总算无声无息了。我不困了，但很累，腰酸背疼。现在，是这些人的沉默使我难受。我只是偶尔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不知道是什么。时间长了，我终于猜出，原来是有几个老头子嘬腮帮子，发出了这种怪响。他们沉浸在冥想中，自己并不觉得。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算不了什么。但是现在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们都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我现在还记得，有时我睁开眼，看见老头们一个个缩成一团睡着了，只有一位，下巴颏压在拄着手杖的手背上，在盯着我看，好象就等着我醒似的。随后，我又睡了。因为腰越来越疼，我又醒了。晨曦已经悄悄爬上玻璃窗。一会儿，一个老头儿醒了，使劲地咳嗽。他掏出一块方格大手帕，往里面

吐痰，每一口痰都象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其他人都被吵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站了起来。这样不舒服的一夜使他们个个面如死灰。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出去时竟都同我握了手，好象过了彼此不说一句话的黑夜，我们的亲切感倒增加了。

我累了。门房把我带到他那里，我洗了把脸。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好极了。我出去时，天已大亮。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岭上空，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带来了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好天。我很久没到乡下来了，要不是因为妈妈，这会儿去散散步该多好啊。

我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闻着湿润的泥土味儿，不想再睡了。我想到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这个时辰，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对我来说，这总是最难挨的时刻。我又想了一会儿，被房子里传来的铃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一阵忙乱声，随后又安静下来。太阳在天上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要见我。我到他办公室去。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拿起电话，问我："殡仪馆的人已来了一会儿了，我要让他们来盖棺。您想最后再见见您的母亲吗？"我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他们可以去了。"

然后，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谢了他。他在写字台后面坐下，叉起两条小腿。他告诉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还有值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不许去送殡，只许参加守灵。他指出："这是个人道问题。"不过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莱兹参加送葬。说到这儿，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点孩子气。他和您的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拿他们打趣，他们对贝莱兹说：'她是您的未婚妻。'他只是笑。他们觉得开心。问题是默而索太太的

死使他十分难过，我认为不应该拒绝他。但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我昨天没有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来，往窗外观望。他看了一会儿，说：“马朗戈的神甫来了。他倒是提前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教堂，教堂在村子里。我们下了楼。神甫和两个唱诗童子等在门前。其中一个手拿香炉，神甫弯下腰，调好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时，神甫已直起腰来。他叫我“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里，我随他进去。

我一眼就看见螺钉已经旋进去了，屋子里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说车子已经等在路上，神甫也开始祈祷了。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神甫、唱诗童子、院长和我，一齐走出去。门口，有一位太太，我不认识。“默而索先生，”院长介绍说。我没听见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向我低了低瘦骨嶙峋的长脸。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养老院。送葬的车停在大门口，长方形，漆得发亮，象个铅笔盒。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他身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一个态度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他就是贝莱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脚堆在鞋上，大白领的衬衫太大，而黑领花又太小。鼻子上布满了黑点儿，嘴唇不住地抖动。满头的白发相当细软，两只耷拉耳，耳轮胡乱卷着，血红的颜色衬着苍白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司仪安排了我们的位置。神甫走在前面，然后是车子。旁边是四个抬棺材的。再后面，是院长和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断后。

天空中阳光灿烂，地上开始感到压力，炎热迅速增高。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走。我穿着一身深色衣服，觉得很

热。小老头本来已戴上帽子，这时又摘下来了。院长跟我谈到他的时候，我歪过头，望着他。他对我说，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傍晚常由一个女护士陪着散步，有时一直走到村里。我望着周围的田野。一排排通往天边山岭的柏树，一片红绿相杂的土地，房子不多却错落有致，我理解母亲的心理。在这个地方，傍晚该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时刻啊。今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这片地方直打颤，既冷酷无情，又令人疲惫不堪。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觉贝莱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走快了，老人落在后面。车子旁边也有一个人跟不上了，这时和我并排走着。我真奇怪，太阳怎么在天上升得那么快。我发现田野上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簌簌的草响。我脸上流下汗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个伙计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同时，他用右手掀了掀鸭舌帽檐，左手拿手帕擦着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连声说："晒得够呛。"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边是您的母亲吗？"我又回了个"对"。"她年纪大吗？"我答道："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少岁。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回了回头，看见老贝莱兹已经拉下五十多米远了。他一个人急忙往前赶，手上摇晃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额上渗出了汗珠，他也不擦。

我觉得一行人走得更快了。我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爆裂，脚一踩就陷进去，留下一道亮晶晶的裂口。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象在这黑油泥里浸过似的。我有点迷迷糊糊，头上是青天白云，周围是单调的颜色，开裂的柏油是粘乎乎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死气沉沉的黑，车子是漆得发亮的黑。这一切，阳光、皮革味、马粪味、漆味、

香炉味、一夜没睡觉的疲倦，使我两眼模糊，神志不清。我又回了回头，贝莱兹已远远地落在后面，被裹在一片蒸腾的水气中，后来干脆看不见了。我仔细寻找，才见他已经离开大路，从野地里斜穿过来。我注意到前面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莱兹熟悉路径，正抄近路追我们呢。在大路拐弯的地方，他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拉下了。他仍然斜穿田野，这样一共好几次。而我，我感到血直往太阳穴上涌。

以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准确、自然，我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很怪，与她的面孔不协调，那是一种抑扬的、颤抖的声音。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她说得对。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我还保留着这一天的几个印象，比方说，贝莱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滴的泪水流上面颊。但是，由于皱纹的关系，泪水竟流不动，散而复聚，在那张形容大变的脸上铺了一层水。还有教堂，路旁的村民，墓地坟上红色的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真象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血红色的土，杂在土中的雪白的树根，又是人群，说话声，村子，在一个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以及当汽车开进万家灯火的阿尔及尔，我想到我要上床睡它十二个钟头时我所感到的喜悦。

二

醒来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向老板请那两天假时他的脸色那么不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可以说是忘了，起床

的时候才想起来。老板自然是想到了，加上星期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日，而这是不会叫他高兴的。但一方面，安葬妈妈是在昨天而不是在今天，这并不是我的错，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星期六和星期天总还是我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情。

昨天一天我累得够呛，简直起不来。刮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今天干什么，我决定去游泳。我乘电车去海滨浴场。一到那儿，我就扎进水里。年轻人很多。我在水里看见了玛丽·卡多娜，我们从前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她是打字员，我那时曾想把她弄到手。我现在认为她也是这样想的。但她很快就走了，我们没来得及呀。我帮她爬上一个水鼓，在扶她的时候，我轻轻地碰着了她的乳房。她趴在水鼓上，我还在水里。她朝我转过身来，头发遮住了眼睛，她笑了。我也上了水鼓，挨在她身边。天气很好，我开玩笑似地仰起头，枕在她的肚子上。她没说什么，我就这样待着。我两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蓝的，泛着金色。我感到头底下玛丽的肚子在轻轻的起伏。我们半睡半醒地在水鼓上待了很久。太阳变得太强烈了，她下了水，我也跟着下了水。我追上她，伸手抱住她的腰，我们一起游。她一直在笑。在岸上晒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您还黑。"我问她晚上愿意不愿意去看电影。她还是笑，说她想看一部费南代尔①的片子。穿好衣服以后，她看见我系了一条黑领带，显出很奇怪的样子，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跟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说："昨天。"她吓得倒退了一步，但没表示什么。我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我收住了口，因为我想起来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这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人总是有点什么

① 费南代尔(Fernandel, 1903—1971)，法国著名喜剧演员。

过错。

晚上，玛丽把什么都忘了。片子有的地方挺滑稽，不过实在是很蠢。她的腿挨着我的腿。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吻了她，但吻得很笨。出来以后，她跟我到我的住处来了。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得到她姊姊家去。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天，这真烦人，因为我不喜欢星期天。于是，我翻了个身，在枕头上寻找玛丽的头发留下的盐味儿，一直睡到十点钟。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躺着，直到中午。我不想跟平时那样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饭，因为他们肯定要问我，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了，没吃面包，我没有了，也不愿意下楼去买。

吃过午饭，我有点闷得慌，就在房子里瞎转悠。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还挺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太大了，我不得不把饭厅的桌子搬到卧室里来。我只住这一间，屋里有几把当中的草已经有点塌陷的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一张铜床。其余的都不管了。后来，没事找事，我拿起一张旧报，读了起来。我把克鲁申盐业公司的广告剪下来，贴在一本旧簿子里。凡是报上让我开心的东西，我都剪下贴在里面。我洗了洗手，最后，上了阳台。

我的卧室外面是通往郊区的大街。午后天气晴朗。但是，马路很脏，行人稀少，却都很匆忙。首先是全家出来散步的人，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膝盖，笔挺的衣服使他们手足无措；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花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是一位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绸连衣裙；父亲是个相当瘦弱的矮个儿，我见过。他戴着一顶平顶窄檐的草帽，扎着蝴蝶结，手上一根手杖。看到他和他老婆

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带的人都说他仪态不凡。过了一会儿，过来一群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光的，系着红领带，衣服腰身收得很紧，衣袋上绣着花儿，穿着方头皮鞋。我想他们是去城里看电影的，所以走得这样早，而且一边赶电车，一边高声说笑。

他们过去之后，路上渐渐没有人了。我想，各处的热闹都开始了。街上只剩下了一些店主和猫。从街道两旁的无花果树上空望去，天是晴的，但是不亮。对面人行道上，卖烟的搬出一把椅子，倒放在门前，双腿骑上，两只胳膊放在椅背上。刚才还是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空了。烟店旁边那家叫“彼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空无一人，侍者正在扫地。这的确是个星期天的样子。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象卖烟的那样放着，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去拿了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起来。很快，天阴了。我以为要下暴雨，可是，天又渐渐放晴了。不过，刚才飘过一片乌云，象是要下雨，使街上更加阴暗了。我待在那儿望天，望了好久。

五点钟，电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了，车里挤满了从郊外体育场看比赛的人，有的就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后面几辆车里拉着的，我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是运动员。他们扯着嗓子喊叫，唱歌，说他们的俱乐部万古常青。好几个人跟我打招呼。其中有一个甚至对我喊：“我们赢了他们。”我点点头，大声说：“对。”从这时起，小汽车就多起来了。

天有点暗了。屋顶上空，天色发红，一人黄昏，街上也热闹起来。散步的人也渐渐往回走了。我在人群中认出了那位仪态不凡的先生。孩子在哭，让大人拖着走。这一带的电影院几乎也在这时把大批看客抛向街头。其中，年轻人的举动比平时

更坚决，我想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冒险片子。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人到得稍微晚些。他们显得更庄重些。他们还在笑，却不时地显出疲倦和出神的样子。他们待在街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附近的姑娘们没戴帽子，挽着胳膊在街上走。小伙子们设法迎上她们，说句笑话，她们一边大笑，一边回过头来。其中我认识好几个，她们向我打了招呼。

这时，街灯一下子亮了，使夜晚空中初现的星星黯然失色。我望着满是行人和灯光的人行道，感到眼睛很累。电灯把潮湿的路面照得闪闪发光，间隔均匀的电车反射着灯光，照在发亮的头发、人的笑容或银手镯上。不一会儿，电车少了，树木和电灯上空变得漆黑一片，不知不觉中路上的人也走光了，直到第一只猫慢悠悠地穿过重新变得空无一人的马路。这时，我想该吃晚饭了。我在椅背上趴得太久了，脖子有点儿酸。我下楼买了面包和面片，自己做了做，站着吃了。我想在窗前抽支烟，可是空气凉了，我有点儿冷。我关上窗户，回来的时候，在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上摆着酒精灯和面包块。我想星期天总是忙忙碌碌的，妈妈已经安葬了，我又该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

三

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活儿。老板很和气。他问我是不是太累了，他也想知道妈妈的年纪。为了不弄错，我说了个“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象松了口气，认为这是了结了一桩大事。

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提单，我都得处理。在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手。中午是我最喜欢的时刻。晚上，我就不那么高兴了，因为公用的转动毛巾用了一天，都湿透了。一天，我向老板提出了这件事。他回答说他对此感到遗憾，不过这毕竟是小事一桩。我下班晚了些，十二点半我才跟艾玛努埃尔一起出来，他在发货部门工作。办公室外面就是海，我们看了一会儿大太阳底下停在港里的船。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带着哗啦啦的铁链声和噼噼啪啪的爆炸声。艾玛努埃尔问我“去看看怎么样”，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追上去。我被包围在一片嘈杂声和灰尘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到这种混乱的冲动，拼命在绞车、机器、半空中晃动的桅杆和我们身边的轮船之间奔跑。我第一个抓住车，跳了上去。然后，我帮着艾玛努埃尔坐好。我们喘不过气来，汽车在尘土和阳光中，在码头上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着。艾玛努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来到赛莱斯特的饭馆，浑身是汗。他还是那样子，挺着大肚子，系着围裙，留着雪白的小胡子。他问我“总还好吧”，我说好，现在肚子饿了。我吃得很快，喝了咖啡，然后回家，睡了一会儿，因为我酒喝多了。醒来的时候，我想抽烟。时候不早了，我跑去赶电车。我干了一下午。办公室里很热，晚上下了班，我沿着码头慢步走回去，感到很快活。天是绿色的，我感到心满意足。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回家了，因为我想自己煮土豆。

楼梯黑乎乎的。我上楼时碰在老萨拉玛诺的身上，他是我同层的邻居。他牵着狗。八年来，人们看见他们总是厮守在一起。这条西班牙种猎犬生了一种皮肤病，我想是丹毒，毛都快掉光了，浑身是硬皮和褐色的痂。他们俩挤在一间小屋子里，

久而久之，老萨拉玛诺都象它了。他的脸上长了些发红的硬痂，头上是稀疏的黄毛。那狗呢，也跟它的主人学了一种弯腰驼背的走相，撅着嘴，伸着脖子。他们好象是同类，却相互憎恨。每天两次，十一点和六点，老头儿带着狗散步。八年来，他们没有改变过路线。他们总是沿着里昂路走，狗拖着人，直到老萨拉玛诺打个趔趄，他于是就又打又骂。狗吓得趴在地上，让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儿拽了。要是狗忘了，又拖起主人来，就又会挨打挨骂。于是，他们两个双双待在人行道上，你瞅着我，我瞪着你，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碰到狗要撒尿，老头儿偏不给它时间，使劲拽它，狗就沥沥拉拉尿一道儿。如果狗偶尔尿在屋里，更要遭到毒打。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赛莱斯特总是说“这真不幸”，实际上，谁也不能知道。我在楼梯上碰见萨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他对它说：“混蛋！脏货！”狗直哼哼。我跟他说：“您好，”但老头儿还在骂。于是，我问狗怎么惹他了，他不答腔。他只是说：“混蛋！脏货！”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正弯着腰在狗的颈圈上摆弄什么。我提高了嗓门儿。他头也不回，憋着火儿回答我：“它老是那样。”说完，便拖着那条哼哼唧唧、不肯痛痛快快往前走的狗出去了。

正在这时，我那层的第二个邻居进来了。这一带的人都说他靠女人生活。但是，人要问他职业，他就说是“仓库管理员”。一般地说，大家都不大喜欢他。但是他常跟我说话，有时还到我那儿坐坐，因为我听他说话。再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他叫莱蒙·散太斯。他长得相当矮，肩膀却很宽，一个拳击手的鼻子①。他总是穿得衣冠楚楚。说到萨拉玛诺，他也说：“真是不幸！”他问我对此是否感到讨厌，我回答说不。

① 即塌鼻子。

我们上了楼，正要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我那里有猪血香肠和葡萄酒，一快儿吃点怎么样？……"我想这样我不用做饭了，就接受了。他也只有一间房子，外带一间没有窗户的厨房。床的上方摆着一个白色和粉红色的仿大理石天使像，几张体育冠军的相片和两三张裸体女人画片。屋里很脏，床上乱七八糟。他先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肮脏的纱布，把右手缠了起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和一个跟他找碴儿的家伙打了一架。

"您知道，默而索先生，"他对我说，"并不是我坏，可我是火性子。那小子呢，他说：'你要是个男子汉，从电车上下来。'我对他说：'滚蛋，别找事儿。'他说我不是男子汉。于是，我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到此为止吧，不然我就教训教训你。'他说：'你敢怎么样？'我就揍了他一顿。他倒在地上。我呢，我正要把他扶起来，他却躺在地上用脚踢我。我给了他一脚，又打了他两耳光。他满脸流血。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说话的工夫，散太斯已缠好了绷带。我坐在床上。他说："您看，不是我找他，是他对我不尊重。"的确如此，我承认。这时，他说，他正要就这件事跟我讨个主意，而我呢，是个男子汉，有生活经验，能帮助他，这样的话，他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什么也没说，他又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怎么都行，他好象很满意。他拿出香肠，在锅里煮熟，又拿出酒杯、盘子、刀叉、两瓶酒。拿这些东西时，他没说话。我们坐下。一边吃、他一边讲他的故事。他先还迟疑了一下。"我认识一位太太……这么说吧，她是我的情妇。"跟他打架的那个人是这女人的兄弟。他对我说他供养着她。我没说话，但是他立刻补充说他知道这地方的人说他什么，不过他问心无愧，他是仓库管理员。

"至于我这件事，"他说，"我是发觉了她在欺骗我。"他给

她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他为她付房租，每天给她二十法郎饭钱。“房租三百法郎，饭钱六百法郎，不时地送双袜子，一共一千法郎。人家还不工作。可她说那是合理的，我给的钱不够她生活。我跟她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半天的工作干干呢？这样就省得我再为这些零星花费操心了。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给你二十法郎，替你付房租，可你呢，下午和你的女友们喝咖啡。你拿咖啡和糖请她们，出钱的却是我。我待你不薄，你却忘恩负义。’可她就是不工作，总是说钱不够。所以我才发觉其中一定有欺骗。”

于是，他告诉我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她不能解释是怎么买的。不久，他又在她那里发现一张当票，证明她当了两只镯子。他可一直不知道她有两只镯子。“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在欺骗我。我就不要她了。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才揭了她的老底。我对她说，她就是想拿我寻开心。您知道，默而索先生，我是这样说的：‘你看不到人家在嫉妒我给你带来的幸福。你以后就知道自己是有福不会享了。’”

他把她打得见血方休。以前，他不打她。“打是打，不过是轻轻碰碰而已。她叫唤。我就关上窗子，也就完了。这一回，我可是来真的了。对我来说，我惩罚得还不够呢。”

他解释说，就是为此，他才需要听听我的主意。他停下话头，调了调结了灯花的灯芯。我一直在听他说。我喝了将近一升的酒，觉得太阳穴发烫。我抽着莱蒙的烟，因为我的已经没有了。末班电车开过，把已很遥远的郊区的嘈杂声带走了。莱蒙在继续说话。使他烦恼的是，他对跟他睡觉的女人“还有感情”。但他还是想惩罚她。最初，他想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去，叫来“风化警察”，造成一桩丑闻，让她在警察局备个案。后来，他又找过几个流氓帮里的朋友。他们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正

如莱蒙跟我说的那样，参加流氓帮还是值得的。他对他们说了，他们建议“破她的相”。不过，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要考虑考虑。在这之前，他想问问我的意见。在得到我的指点之前，他想知道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什么也没想，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问我是不是认为其中有欺骗，我觉得是有欺骗。他又问我是不是认为应该惩罚她，假使是我的话，我将怎么做，我说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我理解他想惩罚她的心情。我又喝了点酒。他点了一支烟，说出了他的主意。他想给她写一封信，“信里狠狠地羞辱她一番，再给她点儿甜头让她后悔”。然后，等她来的时候，他就跟她睡觉，“正在要完事的时候”，他就吐她一脸唾沫，把她赶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的确，她也就受到了惩罚。但是，莱蒙说他觉得自己写不好这封信，他想让我替他写。由于我没说什么，他就问我是不是马上写不方便，我说不。

他喝了一杯酒，站起来，把盘子和我们吃剩的冷香肠推开。他仔细地擦了擦铺在桌上的漆布。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钢笔和一小方瓶紫墨水。他告诉我那女人的名字，我看出来是个摩尔人。我写好信。信写得有点儿随便，不过，我还是尽力让莱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然后，我高声念给他听。他一边抽烟一边听，连连点头。他请我再念一遍。他非常满意。他对我说，“我就知道你有生活经验。”起初，我还没发觉他已经用“你”来称呼我了。只是当他说“你现在是我的真正的朋友了，”这时我才感到惊奇。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对。”做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他可是好象真有这个意思。他封上信，我们把酒喝完。我们默默地抽了会儿烟。外面很安静，我们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过去了。我说：“时候不早了。”莱蒙也这样想。他说时间过得很

快。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真的。我困了，可又站不起来。我的样子一定很疲倦，因为莱蒙对我说不该灰心丧气。开始，我没明白。他就解释说，他听说妈妈死了，但这是早晚要有的事情。这也是我的看法。

我站起身来，莱蒙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男人之间总是彼此理解的。我从他那里出来，关上门，在漆黑的楼梯口待了一会儿。楼里寂静无声，从楼梯洞的深处升上来一股隐约的、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耳朵里血液一阵阵流动声。我站着不动。老萨拉玛诺的屋子里，狗还在低声哼哼。

四

这一星期，我工作得很好。莱蒙来过，说他把信寄走了。我跟艾玛努埃尔去了两次电影院。银幕上演的什么，他不是常能看懂，我得给他解释。昨天是星期六，玛丽来了，这是我们约好的。我见了她心里直痒痒，她穿了件红白条纹的漂亮的连衣裙，脚上是皮凉鞋。一对结实的乳房隐约可见，阳光把她的脸晒成棕色，好象朵花。我们坐上公共汽车，到了离阿尔及尔几公里外的一处海滩，那儿两面夹山，岸上一溜芦苇。四点钟的太阳不太热了，但水还很温暖，层层细浪懒洋洋的。玛丽教给我一种游戏，就是游水的时候，迎着浪峰，喝一口水花含在嘴里，然后翻过身来，把水朝天上吐出去。这样，水就象一条泡沫的花边散在空中，或象一阵温雨落回到脸上。可是玩了一会儿，我的嘴就被盐水烧得发烫。玛丽这时游到我身边，贴在我身上。她把嘴对着我的嘴，伸出舌头舔我的嘴唇。我们就这

样在水里滚了一阵。

我们在海滩穿好衣服，玛丽望着我，两眼闪闪发光。我吻了她。从这时起，我们再没有说话。我搂着她，急忙找到公共汽车，回到我那里就跳上了床。我没关窗户，我们感到夏夜在我们棕色的身体上流动，真舒服。

早晨，玛丽没有走，我跟她说我们一道吃午饭。我下楼去买肉。上楼的时候，我听见莱蒙的屋子里有女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老萨拉玛诺骂起狗来，我们听见木头楼梯上响起了鞋底和爪子的声音，接着，在“混蛋！脏货！”的骂声中，他们上街了。我向玛丽讲了老头儿的故事，她大笑。她穿着我的睡衣。卷起了袖子。她笑的时候，我的心里又痒痒了。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象不爱她。她好象很难过。可是在做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吻了她。就在这时，我们听见莱蒙屋里打起来了。

先是听见女人的尖嗓门儿，接着是莱蒙说：“你不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我要教你怎么不尊重我。”扑通扑通几声，那女人叫了起来，叫得那么凶，楼梯口立刻站满了人。玛丽和我也出去了。那女人一直在叫，莱蒙一直在打。玛丽说这真可怕，我没答腔。她要我去叫警察，我说我不喜欢警察。不过，住在三层的一个管子工叫来了一个。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了。他又用力敲了敲，过了一会儿，女人哭起来，莱蒙开了门。他嘴上叼着一支烟，样子笑咪咪的。那女人从门里冲出来，对警察说莱蒙打了她。警察问：“你的名字。”莱蒙回答了。警察说：“跟我说话的时候，把烟从嘴上拿掉。”莱蒙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抽了一口。说时迟，那时快，警察照准莱蒙的脸，重重地、结结实实地来了个耳光。香烟飞出去几米远。莱蒙变了脸，但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声下气地问警察他能不能拾起他

的烟头。警察说可以，但是告诉他："下一次，你要知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女人一直在哭。不住地说："他打了我。他是个乌龟。"莱蒙问："警察先生，说一个男人是乌龟，这是合法的吗？"但警察命令他"闭嘴"。莱蒙于是转向那女人，对她说："等着吧，小娘们儿，咱们还会见面的。"警察让他闭上嘴，叫那女人走，叫莱蒙待在屋里等着局里传讯。他还说，莱蒙醉了，哆嗦成这副样子，应该感到脸红。这时，莱蒙向他解释说："警察先生，我没醉。只是我在这儿，在您面前，打哆嗦，我也没办法。"他关上门，人也都走了。玛丽和我做好午饭。但她不饿，几乎全让我吃了。她一点钟时走了，我又睡了一会儿。

快到三点钟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莱蒙。我仍旧躺着。他坐在床沿上。他没说话，我问他事情的经过如何。他说他如愿以偿，但是她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打了她。剩下的，我都看到了。我对他说，我觉得她已受到惩罚，他该满意了。他也是这样想的。他还指出，警察帮忙也没用，反正是她挨揍了。他说他很了解警察，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他还问我当时是不是等着我回敬警察一下子，我说我什么也不等，再说我不喜欢警察。莱蒙好象很满意。他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一块儿出去。我下了床，梳了梳头。他说我得做他的证人。怎么都行，但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照莱蒙的意思，只要说那女人对他不尊重就够了。我答应为他作证。

我们出去了，莱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想打一盘弹子，我差点赢了。他还想逛妓院，我说不，因为我不喜欢那玩意儿。于是我们慢慢走回去，他说他惩罚了他的情妇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他对我挺好，我想这个时候真舒服。

远远地，我看见老萨拉玛诺站在门口，神色不安。我们走近了，我看到他没牵着狗。他四下张望，左右乱转，使劲朝黑

洞洞的走廊里看，嘴里念念有词，又睁着一双小红眼，仔细地在街上找。莱蒙问他怎么了，他没有立刻回答。我模模糊糊地听他嘟囔着："混蛋！脏货！"心情仍旧不安。我问他狗哪儿去了。他生硬地回答说它走了。然后，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象平常一样，带它去练兵场。做买卖的棚子周围人很多。我停下来看《国王散心》。等我再走的时候，它不在那儿了。当然，我早想给它买一个小点儿的颈圈。可是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脏货能这样就走了。"

莱蒙跟他说狗可能迷了路，它就会回来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狗能跑几十公里找到主人。尽管如此，老头儿的神色反而更不安了。"可您知道，他们会把它弄走的。要是还有人收养它就好了。但这不可能，它一旦丑，谁见了谁恶心。警察会抓走它的，肯定。"我于是跟他说，应该去待领处看看，付点钱就可领回来。他问我钱是不是要很多。我不知道。于是，他发起火来："为这个脏货花钱！啊！它还是死了吧！"他又开始骂起它来。莱蒙大笑，钻进楼里。我跟了上去，我们在楼梯口分了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老头儿的脚步声，他敲敲我的门。我开开门，他在门槛上站了会儿，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他进来，但他不肯。他望着他的鞋尖儿，长满硬痂的手哆嗦着。他没有看我，问道："默而索先生，您说，他们不会把它抓走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不然的话，我可怎么活下去呢？"我对他说，送到待领处的狗保留三天，等待物主去领，然后就随意处置了。他默默地望着我。然后，他对我说："晚安。"他关上门，我听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咯吱咯吱响。我听见透过墙壁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原来他在哭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妈妈。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得早起。我不饿，没吃晚饭就上了床。

五

莱蒙往办公室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他跟他说起过我）请我到他离阿尔及尔不远的海滨木屋去过星期天。我说我很愿意去，不过我已答应和一个女友一块儿过了。莱蒙立刻说他也请她。他朋友的妻子因为在一堆男人中间有了作伴的一定会很高兴。

我本想立刻挂掉电话，因为老板不喜欢人家从城里给我们打电话。但莱蒙要我等一等，他说他本来可以晚上转达这个邀请，但是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一帮阿拉伯人盯了他整整一天，内中有他过去的情妇的兄弟。“如果你晚上回去看见他们在我们的房子附近，你就告诉我一声。”我说一言为定。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我立刻不安起来，因为我想他一定又要说少打电话多干活儿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要跟我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他只是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想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直接在当地与一些大公司做买卖，他想知道我能否去那儿工作。这样，我就能在巴黎生活，一年中还可旅行旅行。“您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您会喜欢的。”我说对，但实际上怎么样都行。他于是问我是否对于改变生活不感兴趣。我回答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我在这儿的生活并不使我不高兴。他好象不满意，说我答非所问，没有雄心大志，这对做买卖是很糟糕的。他说完，我就回去工作了。我并不愿意使他不快，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想，我并非不幸。我上

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一类的雄心大志。但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怎么样都行，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于是，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是不爱她。她说："那为什么又娶我呢？"我跟她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我们可以结婚。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只要说行就完了。她说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阵，一声不响地望着我。后来她说话了。她只是想知道，如果这个建议出自另外一个女人，我和她的关系跟我和玛丽的关系一样，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于是她心里想她是不是爱我，而我，关于这一点是一无所知。又沉默了一会儿，她低声说我是个怪人，她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我，也许有一天她会出于同样的理由讨厌我。我一声不吭，没什么可说的。她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说她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办。这时我跟她谈起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认识认识巴黎。我告诉她我在那儿住过一阵，她问我巴黎怎么样。我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肤是白的。"

后来，我们出去走了走，逛了城里的几条大街。女人们很漂亮，我问玛丽她是否注意到了。她说她注意到了，还说她对我了解了。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但我还是希望她和我在一起，我跟她说我们可以一块儿去赛莱斯特那儿吃晚饭。她很想去，不过她有事。我们已经走近了我住的地方，我跟她说再见。她看了看我说："你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我很想知道，但我没想到要问她，而就是为了这她有着那种要责备我的神气，看到我尴尬的样子，她又笑了，身子一挺把嘴唇凑上来。

我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晚饭。我已开始吃起来，这时进来一个奇怪的小女人，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坐在我的桌子旁边。她当然可以。她的动作僵硬，两眼闪闪发光，一张小脸象苹果一样圆。她脱下短外套，坐下，匆匆看了看菜谱。她招呼赛莱斯特，立刻点完她要的菜，语气准确而急迫。在等凉菜的时候，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小块纸和一支铅笔，事先算好钱，从小钱包里掏出来，外加小费，算得准确无误，摆在眼前。这时凉菜来了，她飞快地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和一份本星期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地把几乎所有的节目一个个勾出来。由于杂志有十几页，整整一顿饭的工夫，她都在细心地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她吃完站起来，用刚才自动机械一样准确的动作穿上外套，走了。我无事可干，也出去了，跟了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石上走，迅速而平稳，令人无法想象。她一往直前，头也不回。最后，我看不见她了，也就回去了。我想她是个怪人，但是我很快就把她忘了。

在门口，我看见了老萨拉玛诺。我让他进屋，他说他的狗丢了，因为它不在待领处。那里的人对他说，它也可能被轧死了。他问到警察局去搞清这件事是否是办不到的，人家跟他说这类事是没有记录的，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我对老萨拉玛诺说他可以再弄一条狗，可是他请我注意他已经习惯和这条狗在一起，这一点他说得对。

我蹲在床上，萨拉玛诺坐在桌前的一张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放在膝盖上。他还戴着他的旧毡帽。在发黄的小胡子下面，他嘴里含含糊糊不知在说什么。我有点讨厌他了，不过我无事可干，也没有一点睡意。没话找话，我就问起他的狗来。他说他是在他老婆死后有了那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

的时候，他曾经想演戏，所以当兵时，他在军队歌舞剧团里演戏。但最后，他进了铁路部门，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现在有一小笔退休金。他和他老婆在一起并不幸福，但总的说来，他也习惯了。她死后，他感到十分孤独。于是他便跟一个工友要了一条狗，那时它还很小。他得拿奶瓶喂它。因为狗比人活得时间短，他们就一块儿老了。“它脾气很坏，”萨拉玛诺说，“我们俩常常吵架。不过，这总算还是一条好狗。”我说它是良种，萨拉玛诺好象很高兴。他说：“您还没在它生病以前见过它呢。它最漂亮的是那一身毛。”自从这狗得了这种皮肤病，萨拉玛诺每天早晚两次给它抹药。但是据他看，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老头儿说他要走了。我跟他说他可以再待一会儿，对他狗的事我很难过，他谢谢我。他说妈妈很喜欢他的狗。说到她，他称她作“您那可怜的母亲。”他猜想妈妈死后我该是很痛苦，我没有说话。这时，他很快地，不大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这一带的人对我看法不好，因为我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但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很爱妈妈。我回答说，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他们对我看法不好，但是我认为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我雇不起人照顾她。“再说，”我补充说，“很久以来她就和我无话可说，她一个人待着闷得慌。”他说：“是啊，在养老院里，她至少还有伴儿。”然后，他告辞了。他想睡觉。现在他的生活变了，他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好意思地伸过手来，这是自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皮。他微微一笑，在走出去之前又说：“我希望今天夜里狗不要叫。我老以为那是我的狗。”

六

今天是星期天，我总也睡不醒，玛丽叫我，推我，才把我弄起来。我们没吃饭，因为我们想早早去游泳。我感到腹内空空，头也有点儿疼。我的香烟有一股苦味。玛丽取笑我，说我“愁眉苦脸”。她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披散着头发。我说她很美，她高兴得直笑。

下楼时，我们敲了敲莱蒙的门。他说他就下去。由于我很疲倦，也因为我们没有打开百叶窗，不知道街上已是一片阳光，照在我的脸上，象是打了一记耳光。玛丽高兴得直跳，不住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了些，觉得肚子饿了。我跟玛丽说了，她给我看看她的漆布手提包，里面放着我们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们就等莱蒙了，我们听见他关上了门。他穿一条蓝裤，短袖白衬衫，但是戴了一顶平顶草帽，引得玛丽大笑。袖子外的胳膊很白，长着黑毛。我看了有点不舒服。他吹着口哨下了楼，看样子很高兴。他朝着我说：“你好，伙计，”而对玛丽则称“小姐”。

前一天我们去警察局了，我证明那女人“不尊重”莱蒙。他只受到警告就没事了。他们没有调查我的证词。在门前，我们跟莱蒙说了说，然后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并不很远，但乘车去更快些。莱蒙认为他的朋友看见我们去得早，一定很高兴。我们正要动身，莱蒙突然示意我看看对面。我看见一帮阿拉伯人正靠着烟店的橱窗站着。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不过他们总是这样看我们的，正好象我们是些石头或枯树一样。莱

蒙对我说，左边第二个就是他说的那小子。他好象心事重重，不过，他又说现在这件事已经了结。玛丽不大清楚，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说这些阿拉伯人恨莱蒙。玛丽要我们立刻就走。莱蒙身子一挺，笑着说是该赶紧走了。

我们朝汽车站走去，汽车站还挺远，莱蒙对我说阿拉伯人人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还在老地方，还是那么冷漠地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地方。我们上了汽车。莱蒙似乎完全放了心，不断地跟玛丽开玩笑。我感到他喜欢她，可是她儿乎不答理他。她不时望着他笑笑。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了车。海滩离公共汽车站不远。但是要走过一个俯临大海的小高地，然后就可下坡直到海滩。高地上满是发黄的石头和雪白的阿福花，衬着已经变得耀眼的蓝天。玛丽一边走，一边抡起她的漆布手提包打着花瓣玩儿。我们在一排排小别墅中间穿过，这些别墅的栅栏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其中有几幢有阳台，一起隐没在柽柳丛中，有几幢光秃秃的，周围一片石头。走到高地边上，就已能看见平静的大海了，更远些，还能看到一角地岬，睡意朦胧地雄踞在清冽的海水中，一阵轻微的马达声在宁静的空气中传到我们的耳边。远远地，我们看见一条小拖网渔船在耀眼的海面上驶来，慢得象不动似的。玛丽采了几朵蝴蝶花。从通往海边的斜坡上，我们看见有几个人已经在游泳了。

莱蒙的朋友住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房子背靠峭壁。前面的木桩已经泡在水里。莱蒙给我们作了介绍。他的朋友叫马松。他高大，魁梧，肩膀很宽，而他的妻子却又矮又胖，和蔼可亲，一口巴黎腔。他立刻跟我们说不要客气，他做了炸鱼，鱼是他早上刚打的。我跟他说他的房子真漂亮。他告诉我他在这儿过星期六、星期天和所有的假日。他又说："跟我的妻子，

大家会合得来的。”的确，他的妻子已经和玛丽又说又笑了。也许是第一次，我真想到我要结婚了。

马松想去游泳，可他妻子和莱蒙不想去。我们三个人出了木屋，玛丽立刻就跳进水里了。马松和我稍等了一会儿。他说话慢悠悠的，而且不管说什么，总要加一句“我甚至还要说”，其实，对他说的话，他根本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谈到玛丽，他对我说：“她真不错，我甚至还要说，真可爱。”后来，我就不再注意他这口头语，一心只去享受太阳晒在身上的舒服劲儿了。沙子开始烫脚了。我真想下水，可我又拖了一会儿，最后我跟马松说：“下水吧？”就扎进水里。他慢慢走进水里，直到站不住了，才钻进去。他游蛙泳，游得相当坏，我只好撇下他去追玛丽。水是凉的，我游得很高兴。我和玛丽游远了，我们觉得，我们在动作上和愉快心情上都是协调一致的。

到了远处，我们改作仰游。我的脸朝着天，一层薄薄的水幕漫过，流进嘴里，就象带走了一片阳光。我们看见马松游回海滩，躺下晒太阳。远远地望去，他真是一个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一起游。我游到她后面，抱住她的腰，她在前面用胳膊划水，我在后面用脚打水。哗哗的打水声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我觉得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往回游了，我恢复了正常的姿势，呼吸也自如了。在海滩上，我趴在马松身边，把脸贴在沙子上。我跟他说“真舒服”，他同意。不一会儿，玛丽也来了。我翻过身子，看着她走过来。她浑身是水，头发甩在后面。她紧挨着我躺下，她身上的热气，太阳的热气，烤得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玛丽推了推我，说马松已经回去了，该吃午饭了。我立刻站起来，因为我饿了，可是玛丽跟我说一早上还没吻过她呢。这是真的，不过我真想吻她。“到水里去，”她说。我们跑起来，

迎着一片细浪扑进水里。我们划了几下，玛丽贴在我身上。我觉得她的腿夹着我的腿，我感到一阵冲动。

我们回来时，马松已经在喊我们了。我说我很饿，他立刻对他妻子说他喜欢我。面包很好，我狼吞虎咽地把我那份鱼吃光。接着上来的还有肉和炸土豆。我们吃着，没有人说话。马松老喝酒，还不断地给我倒。上咖啡的时候，我的头已经昏沉沉的了。我抽了很多烟。马松、莱蒙和我，我们三个计划八月份在海滩过，费用大家出。玛丽忽然说道："你们知道几点了吗？才十一点半呀。"我们都很惊讶，可是马松说饭就是吃得早，这也很自然，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吃午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竟使得玛丽笑起来。我认为她有点儿喝多了。马松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海滩上走走。"我老婆午饭后总要睡午觉。我嘛，我不喜欢这个。我得走走。我总跟她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不过，这是她的权利。"玛丽说她要留下帮助马松太太刷盘子。那个小巴黎女人说要干这些事，得把男人赶出去。我们三个人走了。

太阳几乎是直射在沙上，海面上闪着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从建在高地边上、俯瞰着大海的木屋中，传来了杯盘刀叉的声音。石头的热气从地面反上来，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开始，莱蒙和马松谈起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和事。我这才知道他们认识已经很久了，甚至还一块儿住过一阵。我们朝海水走去，沿海边走着。有时候，海浪漫上来，打湿了我们的布鞋。我什么也不想，因为我没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这时，莱蒙跟马松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在海滩尽头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有两个穿蓝色司炉工装的阿拉伯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看了看莱蒙，他说："就是

他。”我们继续走着。马松问他们怎么会跟到这儿来。我想他们大概看见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手里还拿着去海滩的提包，不过我什么也没说。

阿拉伯人走得很慢，但离我们已经近得多了。我们没有改换步伐，但莱蒙说了：“如果要打架，你，马松，你对付第二个。我嘛，我来收拾我那个家伙。你，默而索，如果再来一个，就是你的。”我说：“好。”马松把手放进口袋。我觉得晒得发热的沙子现在都烧红了。我们迈着均匀的步子冲阿拉伯人走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当距离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阿拉伯人站住了。马松和我，我们放慢了步子。莱蒙直奔他那个家伙。我没听清楚他跟他说了句什么，只见那人摆出一副不买账的样子。莱蒙上去就是一拳，同时招呼一声马松。马松冲向给他指定的那一个，奋力砸了两拳，把那人打进水里，脸朝下，好几秒钟没有动，头周围咕噜咕噜冒上一片水泡，随即破了。这时，莱蒙也在打，那个阿拉伯人满脸是血。莱蒙转身对我说：“看着他的手要掏什么。”我朝他喊：“小心，他有刀！”可是，莱蒙的胳膊已给划开了，嘴上也挨了一刀。

马松纵身向前一跳。那个阿拉伯人已从水里爬起来，站到了拿刀的那人身后。我们不敢动了。他们慢慢后退，不住地盯着我们，用刀逼住我们。当他们看到已退到相当远的时候，就飞快地跑了。我们待在太阳底下动不得，莱蒙用手捂住滴着血的胳膊。

马松说有一位来这儿过星期天的大夫，住在高地上。莱蒙想马上就去。但他一说话，嘴里就有血泡冒出来。我们扶着他，尽快地回到木屋。莱蒙说他只伤了点皮肉，可以到医生那里去。马松陪他去了，我留下把发生的事情讲给两个女人听。马松太太哭了，玛丽脸色发白。我呢，给她们讲这件事让我心烦。

最后，我不说话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

快到一点半的时候，莱蒙和马松回来了。胳膊上缠着绷带，嘴角上贴着橡皮膏。医生说不要紧，但莱蒙的脸色很阴沉。马松想逗他笑，可是他始终不吭声。后来，他说他要到海滩上去，我问他到海滩上什么地方，他说随便走走喘口气。马松和我说要陪他一道去。于是，他发起火来，骂了我们一顿。马松说那就别惹他生气吧。不过，我还是跟了出去。

我们在海滩上走了很久。太阳现在酷热无比，晒在沙上和海上，散成金光点点。我觉得莱蒙知道去哪儿，但这肯定是个错误的印象。我们走到海滩尽头，那儿有一眼小泉，水在一块巨石后面的沙窝里流着。在那儿，我们看见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躺着，穿着油腻的蓝色工装。他们似乎很平静，差不多也很高兴。我们来了，并未引起任何变化。用刀刺了莱蒙的那个人一声不吭地望着他。另一个吹着一截小芦苇管，一边用眼角瞄着我们，一边不断重复着那东西发出的三个音。

这时候，周围只有阳光、寂静、泉水的轻微的流动声和那三个音了。莱蒙的手朝装着手枪的口袋里伸去，可是那个人没有动，他们一直彼此对视着。我注意到吹笛子的那个人的脚趾分得很开。莱蒙一边盯着他的对头，一边问我："我干掉他？"我想我如果说不，他一定会火冒三丈，非开枪不可。我只是说："他还没说话呢。这样就开枪不好。"在寂静和炎热之中，还听得见水声和笛声。莱蒙说："那么，我先骂他一顿，他一还口，我就干掉他。"我说："就这样吧。但是如果他不掏出刀子，你不能开枪。"莱蒙有点火了。那个人还在吹，他们俩注意着莱蒙的一举一动。我说："不，还是一个对一个，空手对空手吧。把枪给我。如果另一个上了，或是他掏出了刀子，我就干掉他。"

莱蒙把枪给我，太阳光在枪上一闪。不过，我们还是站着

没动，好象周围的一切把我们裹住了似的。我们一直眼对眼地相互盯着，在大海、沙子和阳光之间，一切都停止了，笛音和水声都已消失。这时我想，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突然间，那两个阿拉伯人倒退着溜到山岩后面。于是，莱蒙和我就往回走了。他显得好了些，还说起了回去的公共汽车。

我一直陪他走到木屋前。他一级一级登上木台阶，我在第一级前站住了，脑袋被太阳晒得嗡嗡直响，一想到要费力气爬台阶和还要跟那两个女人说话，就泄气了，可是天那么热，一动不动地待在一片从天而降的耀眼的光雨中，也是够难受的。待在那里，还是走开，其结果是一样的。过了一会儿，我朝海滩转过身去，迈步往前走了。

到处依然是一片火爆的阳光。大海憋得急速地喘气，把它细小的浪头吹到沙滩上。我慢慢地朝山岩走去，觉得太阳晒得额头膨胀起来。热气整个儿压在我身上，我简直迈不动腿。每逢我感到一阵热气扑到脸上，我就咬咬牙，握紧插在裤兜里的拳头，我全身都绷紧了，决意要战胜太阳，战胜它所引起的这种不可理解的醉意。从沙砾上、雪白的贝壳或一片碎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光亮，象一把把利剑劈过来，剑光一闪，我的牙关就收紧一下。我走了很长时间。

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一堆黑色的岩石，阳光和海上的微尘在它周围罩上一圈炫目的光环。我想到了岩石后面的清凉的泉水。我想再听听淙淙的水声，想逃避太阳，不再使劲往前走，不再听女人的哭声，总之，我想找一片阴影休息一下。可是当我走近了，我看见莱蒙的对头又回来了。

他是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头在岩石的阴影里，身子露在太阳底下。蓝色工装被晒得冒热气。我有点儿吃惊。对我来说，那件事已经完了，我来到这儿根本没想那件

事。

他一看见我，就稍稍欠了欠身。把手插进口袋里。我呢，自然而然地握紧了口袋里莱蒙的那支手枪。他又朝后躺下了，但是并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我离他还相当远，约有十几米吧。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在他半闭的眼皮底下目光不时地一闪。然而最经常的，却是他的面孔在我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晃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有气无力，比中午的时候更加平静。还是那一个太阳，还是那一片光亮，还是那一片伸展到这里的沙滩。两个钟头了，白昼没有动；两个钟头了，它在这一片沸腾的金属的海洋中抛下了锚。天边驶过一艘小轮船，我是瞥见那个小黑点的，因为我始终盯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我只要一转身，事情就完了。可是整个海滩在阳光中颤动，在我身后挤来挤去。我朝水泉走了几步，阿拉伯人没有动。不管怎么说，他离我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的阴影吧，他好象在笑。我等着，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烫，我觉得汗珠聚在眉峰上。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头也象那天一样难受，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并逃不过太阳。但是我往前走了一步，仅仅一步。这一次，阿拉伯人没有起来，却抽出刀来，迎着阳光对准了我。刀锋闪闪发光，仿佛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就在这时，聚在眉峰的汗珠一下子流到了眼皮上，蒙上一幅温吞吞的，模模糊糊的水幕。这一泪水和盐水搀和在一起的水幕使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那把刀刺眼的刀锋总是隐隐约约地对着我。滚烫的刀尖穿过我的睫毛，挖着我的痛苦的眼睛。就在这时，一切都摇晃了。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的气息。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我全身都绷

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我摸着了光滑的枪柄，就在那时，猛然一声震耳的巨响，一切都开始了。我甩了甩汗水和阳光。我知道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而在那里我曾是幸福的。这时，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然而，那却好象是我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

第 二 部

一

我被捕之后，很快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讯问的都是身份之类，时间不长。第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谁都不感兴趣。八天之后，一位预审推事倒是好奇地看了看我。不过开始时，他也只是问问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年月和地点。然后，他想知道我是否找了律师。我说没有，还问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为什么这样问呢？”他说。我回答说我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他微笑着说：“这是一种看法。不过，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您不找律师的话，我们将为您指定一个临时的。”我觉得法律还管这等小事，真是方便得很。我对他说了我的这一看法。他表示赞同，说法律制订得很好。

开始，我没有认真对待他。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子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黑暗中。我已经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谈话之后，我看清他了，我看

到一个五官清秀的人，深蓝的眼睛，身材高大，长长的灰色小胡子，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我认为他是通情达理的，总之，是和蔼可亲的，虽然有时一种不由自主的抽搐扯动了他的嘴。出去的时候，我甚至想伸出手来跟他握手，幸亏我及时地想起来我杀过一个人。

第二天，一位律师到监狱里来看我。他又矮又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服服帖帖。尽管天热（我穿着背心），他却穿着一身深色衣服，硬领子，系着一条很怪的领带，上面有黑色和白色的粗大条纹。他把夹在胳膊下的皮包放在我的桌上，自我作了介绍，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材料。我的案子不好办，但是如果我信任他，胜诉是没有疑问的。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咱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了解了我的私生活。他们知道了我妈妈最近死在养老院里。他们到马朗戈去做过调查。预审推事们知道了我在妈妈下葬的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我的律师对我说："您知道，我有点不好意思问您这些事。但这很重要。假使我无言以对的话，这将成为起诉的一条重要的根据。"他要我帮助他。他问我那一天是否感到难过，这个问题使我十分惊讶，我觉得要是我提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很为难的。不过，我回答他说我有点失去了回想的习惯，我很难向他提供情况。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是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儿，律师打断了我，显得激动不安。他要我保证不在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法官那儿说。不过，我对他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很疲倦，也很困，我根本没体会到那天的事的意义。我能够肯定地说的，就是我更希望妈妈不死。但是我的律师没有显出高兴的

样子。他对我说："这还不够。"

他想了想。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我是控制住了我天生的感情。我对他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他以一种很怪的方式望了望我，仿佛我使他感到有些厌恶似的。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将会出庭作证，这将会使我"大吃其亏"。我请他注意这件事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他只是说，明显的是，我和法院从来没有关系。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住他，向他解释说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而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得到合乎人性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到我使他很不痛快。他不理解我，他有点怨恨我。我想对他说，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地和大家一样。可是，这一切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说。

不久之后，我又被带到预审推事面前。时间是午后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里很亮，只有一层纱窗帘挡住阳光。天气很热。他让我坐下，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因为不凑巧"没有能来。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等待我的律师来帮助我。我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指头按了按桌上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进来，几乎就在我的背后坐下了。

我们俩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讯问开始。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他想知道对此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象第一次一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这无关紧要。"他不说话了，看了看我，然后相当突然把身子一挺，很快地对我说："我感兴趣的，是您这个人。"我不大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他又说："在您的举动中，有些事情我不大明白。我相信您将帮助我理解。"我说一切

都很简单。他让我把那天的情形再讲一遍。我把对他讲过的东西又说了一遍：莱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和开了五枪。我每说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直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同意地说道："很好。"而我呢，翻来复去地说一件事已经让我烦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他停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我使他感兴趣，如果上帝帮忙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此之前，他想问我几个问题。开门见山，他问我是不是爱妈妈。我说："爱，象大家一样。"一直有节奏地敲着打字机的书记一定是按错了键子，因为他很不自在，不得不往回退机器。推事又问我——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逻辑性——，是不是连续开了五枪。我想了想，说先开了一枪，几秒钟之后，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这时，我又看见了那阳光火爆的海滩，我又感到了太阳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什么也没说。在一片沉默中，推事好象坐立不安。他坐下来，抓了抓头发，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神情很奇特："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往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推事把双手放在前额上，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都有点儿变了："为什么？您得对我说。为什么？"我一直不说话。

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的办公室一头的一个档案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他拿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摇晃着，一边朝我走来。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地大声问我："这件东西，您认得吗？"我说："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很快地、热情洋溢地说他相信上帝，他的信念是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罪孽深重到上帝不能饶恕的程度，但是他必须悔过，要变成孩子那

样，灵魂是空的，什么都能接受。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子上，差不多就在我的头顶上摇晃着十字架。说真的，他的这番推理，我真跟不上，首先是因为我热，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落在我的脸上，也因为我有点儿怕他。不过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因为无论如何罪犯毕竟还是我。可是，他还在说。我差不多听明白了，据他看，在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那就是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这一事实。其余的都很明白，但这一点，他不懂。我正要跟他说他这样固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最后一点并不那么重要。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劝告了我一番，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他愤怒地坐下了，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弃上帝的人都信仰上帝。这是他的信念，如果他要怀疑这一点的话，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叫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我认为，这与我无关，我跟他说了。但他已经隔着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伸到我的眼皮底下，疯狂地大叫起来："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请求他饶恕你的罪过。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受难呢？"我清楚地注意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我已厌倦了。屋子里越来越热。跟平时一样，当我想摆脱一个我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时，我就作出赞同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真的以为是打胜了："你看，你看，"他说，"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了？"当然，我又说了一次"不"。他一屁股坐在他的椅子上。

他好象很累，待了好久没说话，而打字机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还在打着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注视着我，有点儿伤心，轻声地说："我从未见过您这样顽固的灵魂。来到我面前的罪犯看到这个受苦受难的形象，没有不痛哭流涕的。"我正要回答他这恰恰说的是罪犯，可是我想起来我也跟他们一样。这种

想法我却总也不能习惯。这时，推事站了起来，好象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还是那么厌倦，只问了问我对我的行动是否感到悔恨。我想了想，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觉得他不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我经常见到这位预审推事。只是我每次都有律师陪着。他们只是让我对过去说过的东西的某些地方再明确一下，或者是推事和我的律师讨论控告的罪名。但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渐渐地，审讯的调子变了。好象推事对我已经不感兴趣了，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了，我也再没有看见他象第一天那样激动过。结果，我们的谈话反而变得更亲切了。提几个问题，跟我的律师聊聊，审讯就结束了。用推事的话说，我的案子照常进行。有时候，如果谈的是一般性的问题，他们就把我也拉上。我开始喘过气来了。这时，人人对我都不坏。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解决得这样好，演得这样干净利落，竟至于我有了“和他们都是自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我有点惊奇的是，有生以来最使我快活的竟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推事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反基督先生。”然后，他们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

二

有些事情我是从来也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我将来是不喜欢谈论我这一段生活的。

不过，后来我也没发现反感有什么必要。实际上，头几天我并不是真的在坐牢，我在模模糊糊地等着什么新情况。直到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玛丽来看我之后，一切才开始。从我收到她的信的那一天起（她说人家不允许她再来了，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就是从那一天起，我才感到我住的地方是牢房，我的生活到此为止了。我被捕的那一天，他们先把我关在一间已经有好几个囚犯的牢房里，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我都笑了。然后他们问我犯了什么事儿。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但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他们告诉我怎样铺睡觉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做成一个长枕头。整整的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几天之后，我被关进一个单间，睡在一块木板上。我还有一个便桶和一个铁盆儿。监狱建在本城的高地上，透过一个小窗口，我可以看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着铁栏杆，脸朝着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进来，说有人来看我。我想这是玛丽。果然是她。

要到接待室去，得穿过一条长走廊，上一段台阶，最后再穿过一条走廊。我走进去，那是一个明亮的大厅，光线是从一个大窗户里射进来的。两道大铁栅横着把大厅分成三部分。两道铁栅之间相距约八到十米，把探望的人和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在我面前，她穿着带条子的连衣裙，脸晒得黑黑的。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十几个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丽周围都是摩尔人，身旁的两个，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紧闭着嘴唇，穿着黑衣服，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说话指手划脚，声音很高。由于铁栅间的距离，探望的人和囚犯都不得不高声叫嚷。我进去之后，吵吵嚷嚷的声音传到光秃秃的大墙上又折回来，明亮的阳光从天上泻到玻璃上射进大厅，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牢房又静又暗。我得有好几秒钟才能适应。但是，我

最后还是看清了呈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面孔。我注意到一个看守坐在铁栅间通道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他们不大叫大嚷。尽管大厅里乱糟糟的，他们低声说话彼此倒还听得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下面升上来，在他们头上来往穿行的谈话声中，好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低音部。这一切，我都是在朝着玛丽走去时注意到的。她已经紧紧地贴在铁栏杆上，竭力朝着我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怎样和她说这件事。

“怎么样？”她大声问道。

“就是这样。”

“身体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

“好，都有。”

我们都不说话了，玛丽一直在微笑。那个胖女人对着我身边的一个人大叫，那人无疑是她的丈夫，个子很高，金黄头发，目光坦率。我听到的是一段已经开始的谈话的下文。

“让娜不愿意要他，”她扯着嗓子大叫。

“哦，哦，”那男人说。

“我跟她说你出来后会再雇他的，她还是不愿意。”

玛丽也对我大声说莱蒙问我好，我说：“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我旁边那人给盖住了，他正问“他可好”。他老婆笑着回答道：“他的身体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我左面是个矮小的年轻人，手很纤细。他什么也不说。我注意到他对面是那位小老太太，两个人紧紧地相互望着。不过我没有时间再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对我喊道不要失望。我说：“对。”同时，我望着她，我真想隔着裙子搂住她的肩膀，我真想摸摸这细腻的布料，我不太清楚除此之外还应该盼望什么。但是这肯定就是玛丽刚才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微笑。我只看到她发亮的牙齿和眼角上细细的皱纹。

她又喊道："你会出来的，出来就结婚！"我回答道："你相信吗？"但主要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她于是很快地大声说她相信，我将被释放，我们还去游泳。但那个女人又吼起来，说她在书记室留了个篮子。她一样一样讲她放在里面的东西，要查对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很贵。我另一边的邻居和他母亲一直互相望着。地上蹲着的阿拉伯人在继续低声交谈。外面的光线好象越来越强，直射在窗户上。

我感到有些不舒服，真想走开。嘈杂声让我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多看看玛丽。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玛丽跟我讲她的工作，她不住地微笑。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交织成一片。唯有我身边那个矮小的年轻人和那个老太太之间是一个寂静的小孤岛，他们只是互相望着。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一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那个小老太太走近铁栏杆，这时，一个看守向她的儿子打了个手势。他说："再见，妈妈。"她把手从两根铁栏杆间伸出来，慢慢地，持续地摆了摆。

她一走，一个男人进来，手里拿着帽子，占了她留下的那块地方。这一边也有一个犯人被带了进来，他们热烈地谈了起来，但声音很小，因为大厅已经安静下来了。有人来叫我右边的那个人了，他老婆并没有放低声音，好象她没注意到已经不需要喊叫了："保重，小心。"然后就该我了。玛丽做出吻我的姿势。我在出去之前又回了回头。她站着不动，脸紧紧地贴在铁栅栏上，还带着为难的、不自然的微笑。

她的信是那以后不久写的。那些我从来也不喜欢讲的事情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不管怎么说，不该有任何的夸大，这件事我做起来倒比别的事容易。在我被监禁的开始，最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我还常有一些自由人的念头。例如，我想去海

滩，朝大海走去。我想象着最先冲到我的脚下的海浪的响声，身体跳进水里以及我所感到的解脱，这时我才一下子感到了牢房的四壁相距是多么的近。但这只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只有囚徒的想法了。我等待着每日在院子里放风或我的律师来访。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常想，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飞过或白云相会，就象在这里等待着我的律师的奇特的领带，或者就象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耐心等到星期六拥抱玛丽的肉体一样。何况，认真想想，我并不在一棵枯树干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不过，这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常常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况且，一般地说，我并没有到这种程度。开头几个月很苦。但是我不得不努力克制，也就过来了。例如，我老是想女人。这很自然，我还年轻嘛。我从不特别想到玛丽。我是想到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所有我过去认识的女人，想到我爱过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想来想去，牢房里竟充满了一张张女人的面孔，到处只见我的性欲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我的精神失常，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却使我消磨了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好感，他总是在开饭的时候跟厨房的伙计一道来。是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跟我说这也是其他人所抱怨的头一件大事。我对他说我跟他们一样，我认为这种待遇不公正。“可是，”他说，“正是为了这个才让您坐监狱呀。”

“什么？为了这个？”

“是啊，自由，就是这个呀。您被剥夺了自由。”

我从来没想到这一层。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说：“不错，不然的话，惩罚什么呢？”

“对，您明白事理。他们不懂。最后他们总是自己想办法。”

看守说完就走了。

还有香烟也是个问题。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拿去了我的腰带，我的鞋带，我的领带，口袋里所有的东西，特别是我的香烟。一进牢房，我就要求他们还给我。但他们对我说这里禁止吸烟。头几天真难过。也许是这件事使我最为沮丧。我从床板上撕下几块木头来咂一咂。我整天想吐。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抽烟，抽烟并不损害任何人。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但这时候，我对不抽烟已经习惯了，这个惩罚对我已不成其为惩罚了。

除了这些烦恼外，我不算太不幸。全部的问题，我再说一遍，还是如何消磨时间。从我学会了回忆的那个时刻起，我就一点儿也不感到烦闷了。有时候，我想我从前住的房子，在想象中，我从一个角落开始走，再回到原处，心里数着一路上所看到的东西。开始，很快就数完了。但每一次重新开始，就变得稍微长了些。因为我想起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家具上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件东西的全部细小的地方，而那些细小的地方本身，还有镶嵌着什么啦，一道裂缝啦，一条有缺口的边啦，还有颜色和木头的纹理啦。同时，我还试图让我这份清单不要断了线，试图把每一件东西都数全。结果，几个星期之后，单单数我房间里的东西，我就能过好几个钟头。这样，我越是想，想出来的原已忘记或根本认不出的东西就越多。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过上一百年。他会有足够的东西来回忆而不至感到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好处。

还有睡觉。开始，我夜里睡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地，夜里睡得好，白天也能睡着了。我可以说，在最后几个月里，我每天睡十六到十八个钟头。那么，我每天要消磨的时间

就剩下六个钟头了，其中包括吃饭、大小便、回忆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

在草褥子和床板之间，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块旧报纸，几乎粘在布上，已经发黄透亮了。那上面有一则新闻，开头已经没有了，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人离开捷克的一个农村，外出谋生。二十五年之后，他发了财，带着老婆和一个孩子回来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在家乡开了个旅店。为了让她们吃一惊，他把老婆孩子放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到了他母亲的旅店里，他进去的时候，她没认出他来。他想开个玩笑，竟租了个房间，并亮出他的钱来。夜里，他母亲和他妹妹用大锤把他打死，偷了他的钱，把尸体扔进河里。第二天早晨，他妻子来了，无意中说出那旅客的姓名。母亲上吊，妹妹投了井。这段故事，我不知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事不象真的，另一方面，却又很自然。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旅客有点自作自受，永远也不应该演戏。

这样，睡觉、回忆、读我的新闻，昼夜交替，时间也就过去了。我在书里读过，说在监狱里，人最后就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但是，对我来说，这并没有多大意义。我始终不理解，到什么程度人会感到日子是既长又短的。日子过起来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它居然长到一天接一天。它们丧失了各自的名称。对我来说，唯一还有点意义的词是“昨天”和“明天”。

有一天，看守对我说我进来已经五个月了，我相信这点，但我又不理解。对我来说，我在牢房里过的总是同样的一天，做的也总是同样的事。那天，看守走了之后，我对着我的铁碗，看了看自己。我觉得，就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我的样子还是很严肃。我晃了晃那铁碗。我微笑了，可碗里的神情还是那么严肃，忧愁。天黑了，这是我不愿意谈到的时刻，无以名

之的时刻，监狱各层的牢房里响起了夜晚的嘈杂声，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我走近小窗口，借着最后的光亮，我又端详了一番我的样子。还是那么严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那会儿，我就是那么严肃嘛。但就在那时，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清楚地听见了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认出来了，这就是很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的声音啊，我这才明白，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一个人说话。于是，我想起了母亲下葬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不，出路是没有的，没有人能想象在监狱里的晚上是怎样的。

三

我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也快得很。我知道天气刚刚转热，我的事就要有新的动向。我的案子定于重罪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审理，这次开庭将于六月底结束。辩论的时候，外面太阳火辣辣的。我的律师告诉我辩论不会超过两天或三天。他还说："再说，法庭忙着呢，您的案子并不是这次最重要的一件。在您之后，立刻就要办一件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有人来提我，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送进一间小里屋里。我们坐在门旁等着，隔着门，听见一片说话声、叫人的声音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吵吵嚷嚷地让我想到那些群众性的节日，音乐会之后，大家收拾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一个还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说不害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看一场官司，我觉得有趣，我有生以来还从没有机会看过呢。"的确，"第二个法警说，"不过看多了也累

得慌。”

不一会儿，房子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门，让我走到被告席上去。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尽管挂着窗帘，有些地方还是有阳光射进来，空气已经闷得不行。窗户都关上了。我坐下，两名法警一边一个。这时，我看见我面前有一排面孔，都在望着我，我明白了，这是陪审员。但我说不出来这些面孔彼此间有什么区别。我只有一个印象，仿佛我在电车上，对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着新上来的人，想发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恶。不过，区别并不大，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还有，门窗紧闭的大厅里这么多人也使我头昏脑胀。我又看了看法庭上，还是一张脸也看不清。我认为，首先是我没料到大家都急着想看看我。平时，谁也不注意我这个人。今天，我得费一番力气才明白我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因为报纸，他指给我坐在陪审员座位下面桌子旁边的一群人，说：“他们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馆的人呀。”他认识其中的一个记者，那人这时也看见了他，并朝我们走过来。这人年纪已经不小了，样子倒也和善，只是脸长得有点滑稽。他很亲热地握了握法警的手。我这时注意到大家都在握手，打招呼，谈话，好象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微笑着跟我说话了，希望我一切顺利。我谢了他，他又说：“您知道，我们有点儿夸大了您的案子。夏天，对报纸来说是个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弑父案还有点儿什么。”他接着指给我看他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矮个子，那人象只肥胖的

脚，带着一副黑边大眼镜。他说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不过，他不是为您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宗弑父案，人家也就要他同时把您的案子一道发回去。"说到这儿，我又差点儿要感谢他。但我想这将是很可笑的。他举手向我亲切地摆了摆，离开了我们。我们又等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了。他穿着法衣，周围还有许多同行。他朝记者们走去，跟他们握了握手。他们打趣，大笑，显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铃响为止。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朝我走来，跟我握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说话，剩下的就由他办了。

左边，我听见有挪椅子的声音，我看见一个身材细高的人，穿着红色法衣，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折起长袍坐下了。这是检察官。执达吏宣布开庭。同时，两个大电扇一齐嗡嗡地响起来。三个推事，两个着黑衣，一个着红衣，夹着卷宗进来，很快地朝俯视着大厅的高台走去。着红衣的那个人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把帽子放在身前，用手帕擦了擦小小的秃顶，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他们都漠不关心，有点傻乎乎的样子。然而，其中有一个，年纪轻得多，穿一身灰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的领带。他把笔放在前面，望着我。在那张不大匀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两只淡淡的眼睛，专心地端详着我，表情不可捉摸。而我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好象是我自己看着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当然也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场合的规矩，我对后来发生的事都没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向检察官和向陪审团提问（每一次，所有的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再向我的律师提问。

庭长说应该传讯证人了。执达吏念了一些姓名，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群我刚才没看清楚的人当中，我看见几个人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老多玛·贝莱兹，莱蒙，马松，萨拉玛诺，玛丽。玛丽还焦虑不安地看了看我。我还在奇怪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赛莱斯特最后听到他的名字，站了起来。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馆见过的那个小女人，她还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神气。她紧紧地盯着我。但是我没有时间多考虑，因为庭长讲话了。他说真正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无须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据他说，他的职责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有关一宗他要客观对待的案子的辩论。陪审团提出的判决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在任何情况下，如有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捣乱的情况，他都要把听众逐出法庭。

大厅里越来越热，我看见推事们都拿报纸扇了起来，立刻响起一阵持续的哗啦哗啦的纸声。庭长示意，执达吏送来三把草蒲扇，三位推事马上使用起来。

审讯立刻开始。庭长心平气和地，我觉得甚至是带着一些亲切感地向我发问。不管我多么厌烦，他还是先让我自报家门，我想这也的确是相当自然的，万一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可就太严重了。然后，庭长又开始叙述我做过的事情，每读三句话就问我一声："是这样吗？"每一次，我都根据律师的指示回答道："是，庭长先生。"这持续了很久，因为庭长叙述得很细。这时候，记者们一直在写。我感到了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和那个小自动机器的目光。电车板凳上的那一排人都面向着庭长，庭长咳嗽一声，翻翻材料，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提出几个与我的案子表面上没有关系而实际

上可能大有关系的问题。我知道他又要谈妈妈了，我感到我是多么厌烦。他问我为什么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我没有钱请人照看她，给她看病。他问我，就个人而言，这是否使我很难受，我回答说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不需要从对方得到什么，再说也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俩都习惯了新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一点，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别的问题向我提出。

这一位半转过脊背对着我，并不看我，说如果庭长允许，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怀着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独自回到水泉那里。"不是，"我说。"那么，您为什么带着武器，又单单回到这个地方去呢？"我说这是偶然的。检察官以一种阴险的口吻说："暂时就是这些。"接下来的事就有点不清楚了，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但是，经过一番秘密磋商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改在下午进行。

我没有时间思考。他们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饭。很快，在我刚感到累时，就有人来提我了。一切又重来一遍，我被送到同一个大厅里，我面前还是那些面孔。只是大厅里更热了，仿佛奇迹一般，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和几个记者，人人手中都拿了一把蒲扇。那个年轻的记者和那个小女人还在那儿，但他们不扇扇子，默默地望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养老院院长，这才略微意识到了我所在的地方和我自己。他们问他妈妈是不是埋怨我，他说是的，不过院里的老人埋怨亲人差不多是一种通病。庭长让他明确妈妈是否怪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他又说是的。但这一次，他没有补充什么。对另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所表现出的冷静感到惊讶。这时，院长看了看他的鞋尖儿，说我不想看看妈妈，没哭过一次，下葬后立刻就走，没有在她

坟前默哀。还有一件使他惊讶的事，就是殡仪馆的一个人跟他说我不知道妈妈的年龄。大厅里一片寂静，庭长问他说的是否的确是我。院长没有听懂这个问题，说道："这是法律。"然后，庭长问检察官有没有问题向证人提出，检察官大声说道："噢！没有了，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这样响亮，他带着这样一种得意洋洋的目光望着我，使我多年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愿望，因为我感到这些人是多么地憎恨我。

问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之后，庭长听了门房的证词。门房和其他人一样，也重复了同样的仪式。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就转过脸去了。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看看妈妈，却抽烟、睡觉，还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激怒了整个大厅里的人，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是有罪的。他们又让门房把喝牛奶咖啡和抽烟的事情重复一遍。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着一种嘲讽的光亮。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是否和我一道抽烟了。可是检察官猛地站起来，反对这个问题："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减弱证词的力量而反诬证人的作法究竟是什么作法？但是，证词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不可抵抗的力量！"尽管如此，庭长还是让门房回答这个问题。老头子很难为情地说："我知道我也不对，但是我当时没敢拒绝先生给我的香烟。"最后，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说："没有，只是证人说得对。我的确给了他一支香烟。"这时，门房既有点儿惊奇又怀着某种感激的心情看了看我。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我的律师得意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员们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是检察官在我们头上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说道："对，陪审员先生们会重视的。而他们的结论将是，一个外人可以请喝咖啡，而一个儿子，面对着生了他的那个人的尸体，就应该拒绝。"门房回到他的座位上去。

轮到多玛·贝莱兹了，一个执达吏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莱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母亲，他只在下葬的那一天见过我一次。他们问他我那天干了些什么，他回答道："你们明白，我自己当时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也没看见。痛苦使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晕倒了。所以，我不能看见先生做了些什么。"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过我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于是，检察官也说："陪审员先生们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我的律师生气了。他用一种我觉得过火的口吻问贝莱兹，他是否看见我不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一阵哄堂大笑。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道："请看，这就是这场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检察官沉下脸来，居心叵测，用铅笔在档案材料的标题上戳着。

在审讯暂停的五分钟里，我的律师对我说一切都进行得再好不过，然后，他们听了赛莱斯特的辩护，他是由被告方面传来的。所谓被告，当然就是我了。赛莱斯特不时地朝我这边望望，手里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他有几个星期天跟我一起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是我现在认为他那时没有戴硬领，因为他领口上只扣着一枚铜纽扣。他们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但也是一个朋友。"问到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谁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问他是否注意到我是个缄默孤僻的人，他只承认我不说废话。检察官问他我是不是按时付钱，他笑了，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他们又问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这时，他把手放在栏杆上，看得出来他是有所准备的。他说："依我看，这是件不幸的事。谁都知道不幸是什么。这使你没法抗拒。因此，依我看，这是件不幸的事。"他还要继续

说，但庭长说这很好，谢谢他。赛莱斯特有点儿愣了。但是他说他还有话。他们让他说得简短些。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件不幸的事。庭长说："是啊，这是当然。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判断这一类的不幸。谢谢您。"仿佛他已尽其所能并表现了他的好意，他就朝我转过身来。我觉得他的眼睛发亮，嘴唇哆嗦着。他好象是问我他还能做些什么。我呢，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任何表示，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拥抱一个男人。庭长又一次请他离开辩护席。赛莱斯特这才回到旁听席上去。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那里，身子稍稍前倾，两肘支在膝头上，手里拿着草帽，听着大家说话。玛丽进来了。她带着帽子，还是那么美。但是我喜欢她披散着头发。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感觉到她轻盈的乳房，看得出她的下嘴唇总是有点儿发肿。她好象很紧张。一上来，人家就问她从什么时起和我认识。她说是从她在我们公司做事的时候起。庭长想知道她和我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是我的朋友。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说她的确要和我结婚。检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突然问她是什么时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了个日子。检察官以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气指出，那似乎是妈妈死后的第二天。然后，他又颇含讥讽地说他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很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口气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能不越过通常的礼仪。因此，他要求玛丽讲一讲我碰见她的那一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那里去。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阅了那一天的电影片目。他要玛丽自己说那一天放的是什么电影。她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一部费南代尔的片子。她说完，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庄重，伸出手指着我，用一种我认为的确是很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

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的关系，就去看滑稽影片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用不着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是一片寂静。忽然，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还有别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说的，她很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吏在庭长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

紧接着是马松说话，人们都不怎么听了，他说我是个正经人，他"甚至还要说，是个老实人"。至于萨拉玛诺，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关于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说我跟妈妈无话可说，所以我才把妈妈送进养老院。他说："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他被带了出去。

轮到莱蒙了，他是最后一个证人。莱蒙朝我点点头，立刻说道我是无罪的。但是，庭长说法庭要的不是判断而是证据。他要他先等着提问，然后再回答。他们要他明确他和被害人的关系。莱蒙趁此机会说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他姐姐。但庭长问他被害人是否就没有理由恨我。莱蒙说我到海滩上去完全是出去偶然。检察官问他作为悲剧的根源的那封信怎么会是我写的。莱蒙说那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这宗案子里对人的良心所产生的坏作用已经不少了。他想知道，当莱蒙羞辱他的情妇时，我没有干涉，这是不是出于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证，是不是出于偶然；我在作证时说的话纯粹是献殷勤，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莱蒙靠什么生活，莱蒙说是"仓库管理员"。检察官朝着陪审员们说道，众所周知，证人干的是乌龟的行当。我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是一个最下流的无耻事件，由于加进了一个道德上的魔鬼而变得更加严重。莱

蒙要申辩，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但是人家要他们让检察官说完。他说："我的话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莱蒙。莱蒙说："是，他是我的朋友。"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我看了看莱蒙，他也正看着我。我说："是。"检察官于是转向陪审团，说道："还是这个人，他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随随便便地杀人！"

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只见他举起胳膊，法衣的袖子都落了下来，露出了里面浆得雪白的衬衫，大声嚷道："说来说去，他被控埋了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听众一阵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了披法衣，说道需要有这位可敬的辩护人那样的聪明才智才能不感到在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感人的、本质的关系。他用力地喊道："是的，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句话似乎在听众里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上的汗水。但他本人似乎也受到了震动，我明白我的事情不妙了。

审讯结束。走出法院登上车子的时候，一刹那间，我又闻到了夏日傍晚的气息，看到了夏日傍晚的色彩。在这走动着的，昏暗的囚室里，我仿佛从疲倦的深渊里听到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的，某个我有时感到满意的时刻种种熟悉的声音。在已经轻松的空气中飘散着卖报人的吆喝声，滞留在街头公园里的鸟雀的叫声，卖夹心面包的小贩的喊叫声，电车在城里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港口上方黑夜降临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心中画出了一条我在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市随意乱跑时的路线。是的，这是很久以前我感到满意的那个时刻。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松的、连梦也不作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因为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着第二天。仿

佛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静的睡眠。

四

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见大家谈论自己也总是很有意思的。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的时候，我可以说，大家对我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行还要多。不过，这些辩护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的罪行，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尴尬。尽管我心里不安，但有时我很想参加进去说几句。但这时我的律师就对我说："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可以这么说，他们好象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时地真想打断他们，对他们说："可说来说去，究竟谁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呀。"但是三思之后，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再说，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别人所感到的兴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例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使我厌烦了。只有那些和全局无关的片言只语，几个手势，或连珠炮般说出来的大段议论，还使我感到惊奇，或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思想实质是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先生们，我将提出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然后是这个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启示。"

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他提出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岁数，第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同玛丽一起回去。那个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他的话的，因为他说什么“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情妇原来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到了莱蒙的事情。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倒不乏其清晰正确。他说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我和莱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这个“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我在海滩上向莱蒙的仇人进行挑衅。莱蒙受了伤。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一个人回去。我预谋打死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会儿。“为了保证事情干得彻底”，我又沉着地、稳妥地、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开了四枪。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我把这一系列事情的线索给你们勾画出来，说明这个人如何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的，你们可能认为可以用当时的情况加以减轻的行动。这个人，先生们，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都听过他说话，不是吗？他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他熟悉用词的分量。人们不能说他行动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

我听着，我听见他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平常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的身上，怎么就能变成沉重的罪名。至少，这使我感到惊讶，我不再听检察官说话了，直到我又听见他说：“难道他曾表示过悔恨么？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的过程中，这个人从来没有一次对他这个卑劣的罪行表示过激动。”这时，他朝我转过身来，用指头指着我，继续对我横加责难，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对我的行动我并不怎么悔恨。但是他这样激

烈却使我吃惊。我真想亲切地、甚至友爱地试着向他解释清楚，我从来不会对某件事真正感到悔恨。我总是为将要发生的事，为今天或明天操心。但是，当然啰，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中，我是不能以这种口吻向任何人说话的。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示亲热，也没有权利有善良的愿望。我试图再听听，因为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仔细探索过我的灵魂，结果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对于人性，对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我都是一窍不通。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也不能怪他没有。但是说到法院，宽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正在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的时候。"这时，他又说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他重复了他在辩论中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到我的杀人罪时多得多，多到最后我只感到早晨的炎热了。最后，他停下了，沉默了一会儿，又用低沉的、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先生们，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一宗滔天罪行：杀死亲生父亲。"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使人无法想象。他斗胆希望人类的正义要坚决予以惩罚而不能手软。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使他感到的憎恶来，几乎是相形见绌的。他认为，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杀死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作准备，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他提高了声音说："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你们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

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发亮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决地完成它。他说我与一个我连最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我不能对人类的心有什么指望，因为我对其基本的反应根本不知道。他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而在我这样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操之已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时请求处人以极刑的话，我却从未象今天这样感到我这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我在这张除残忍之外一无所见的人的脸上感到了憎恶。”

检察官坐下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寂静。我呢，我已经由于炎热和惊讶而昏头昏脑了。庭长咳嗽了几声，用很低的声音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站了起来。由于我很想说话，我就有点儿没头没脑地说我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庭长说这是肯定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摸不清我的辩护方式，他说他很高兴在我的律师发言之前先让我说清楚我的行动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我意识到了我很可笑，我说是因为太阳。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耸耸肩膀，马上，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说时间不早了，他需要好几个钟头，他要改在下午。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仍旧搅动着大厅里沉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说不完了。有一阵，我注意听了听，因为他说：“的确，是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使用这种口吻，每次谈到我时他也总是以“我”相称。我很奇怪。我朝一个法警弯下身子，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住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是这样。”我呢，我想这还是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和这个法庭距离很远了。再说，我也觉得我的律师很可笑。他很快以挑衅为理由进行辩护，然后也谈起我的灵魂。不过，我觉得他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他说："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灵魂，但是与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说，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个正经人，一个正派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来，若论儿子，我是典范，我在力之所及范围内尽力供养母亲，最后，为了让她享受到我力所不及的舒适，这才把老太太送进养老院的。他说："先生们，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因为说到底，如果需要证明这些设施的用处和伟大，只须说是国家本身资助的就够了。"只是他没有提到下葬的问题，我感到这是他的辩护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些长句，由于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没完没了地谈论我的灵魂，使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变成一片没有颜色的水，我看得头晕目眩。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从街上穿过所有的大厅和法庭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上我的脑海，这种生活虽已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发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在这里我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的想法涌上了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想赶紧让他们结束，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大嚷大叫，我也几乎没有听见。他说陪审员们是不会把一个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亡那里去的，他要求考虑那些可减罪的情节，因为我已背上了杀人罪的重负，这是永远的悔恨，最可靠的刑罚。法庭中止辩论，我

的律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说："棒极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拉我来作证："嗯，您说怎么样？"他说。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的赞扬并不真心真意，因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听到的一些声音，我可以猜想到傍晚时分的凉爽。我们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大家一道等着的事只跟我一人有关。我又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样。我碰到了那个穿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象自动机器一样的女人的目光。这使我想了起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我都没有朝玛丽那边看过一眼。我并没有忘记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见她坐在赛莱斯特和莱蒙之间。她朝我做了个小小的动作，仿佛是说："总算完了。"我看见她那有些焦虑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但我觉得我的心已和外界隔绝，我甚至没有回答她的微笑。

法官们回来了。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什么"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等。陪审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我原来在里面等候的那间小屋子里。我的律师也来了。他口若悬河，话说得从来也没有象现在那样有信心，那样亲切，他认为一切顺利，我只须坐几年监狱或服几年苦役就完事。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有没有上诉最高法院的机会。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意见，免得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不能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地看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否则，要费的公文状纸就太多了。我的律师说："无论如何，上诉是可以的。不过，我确信判决会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约有三刻钟。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

我告别，说道："庭长要宣读对质询的答复了。您要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一阵门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过，听不出远近。接着，我听见大厅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读着什么。铃又响了，门开了，大厅里一片寂静，静极了，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别处，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我这时才觉得认清了我在所有这些人脸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尊敬。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没有。"他们这才把我带走。

五

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甫，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可逆转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条出路。我又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也只能看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的脸上那把白昼引向黑夜的逐渐减弱的天色。我躺着，把手放在脑后，等待着。我不知道想过多少次，是否曾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情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法警的绳索断了，临刑前不翼而飞，于是，我就怪自己从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经常关心。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象大家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是一定有专

门著作，我却从来没有想到去看看。那里面，也许我会找到有关逃跑的叙述。那我就会知道，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一种不可遏止的预想中，仅仅有那么一回，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什么东西。仅仅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由我的良心去管。报纸上常常谈论对社会欠下的债。按照他们的意思，欠了债就要还。不过，在想象中这就谈不上了。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子跳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般地跑，跑能够为希望提供各种机会。自然，所谓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是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东西允许我有这种享受，一切都禁止我作这种非分之想，那不可逆转的进程又抓住了我。

尽管我有善良的愿望，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判决是在二十点而不是在十七点宣布的，它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论，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作出的，它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而法国人（或德国人，或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这一切使得这决定很不严肃。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作出这项决定的那一秒钟起，它的作用就和我的身体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同样确实，同样可靠。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讲的关于我父亲的一段往事。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全部确切的事，可能就是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有一天，他去看处决一名杀人凶手。他一想到去看杀人，就感到不舒服。但是，他还是去了，回来后呕吐了一早上。我听了之后，觉得我的父亲有点儿叫我厌恶。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很自然的。我当时居然没有看出执

行死刑是件最最重要的事，总之，是真正使一个人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件事！如果一旦我能从这座监狱里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我想，我错了，不该想到这种可能性。因为要是，有那么一天清晨我自由了，站在警察的绳子后面，可以这么说，站在另一边，作为看客来看热闹，回来后还要呕吐一番，我一想到这些，就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心头。然而，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想法，因为这样一想，我马上就感到冷得要命，在被窝里缩成一团，还禁不住把牙咬得格格响。

当然啰，谁也不能总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制订了一些法律草案。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根本的是要给犯人一个机会。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就足以安排许多事情。这样，我觉得人可以去发明一种化学药物，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机会杀死受刑者（是的，我想的是受刑者）。条件是要让他事先知道。因为我经过反复的考虑，冷静的权衡，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给任何机会，绝对地没有。一劳永逸，一句话，受刑者的死是确定无疑的了。那简直是一桩已经了结的公案，一种已经确定了的手段，一项已经谈妥的协议，再也没有重新考虑的可能了。如果万一头没有砍下来，那就得重来。因此，令人烦恼的是，受刑的人得希望机器运转可靠。我说这是它不完善的一面。从某方面说，事情确实如此。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也得承认，严密组织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总之，受刑者在精神上得对行刑有所准备，他所关心的就是不发生意外。

我也不能不看到，直至此时为止，我对于这些问题有着一些并非正确的想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上断头台，要一级一级地爬到架子上去。我认为这是

由于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缘故，我的意思是说，关于这些问题人们教给我或让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但是有一天早晨，我想起了一次引起轰动的处决，报纸上曾经登过一张照片。实际上，杀人机器就放在平地上，再简单也没有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小得多。这一点我早没有觉察到，是相当奇怪的。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使我大为叹服。一个人对他所不熟悉的东西总是有些夸大失实的想法。我应该看到，实际上一切都很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走到它跟前，就跟碰到另外一个人一样。这也很讨厌。登上断头台，仿佛升天一样。虽然想象力是有了用武之地。而现在呢，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倒一切：一个人被处死，一点也没引起人的注意，这有点丢脸，然而却非常确切。

还有两件事是我耿耿于怀时常考虑的，那就是黎明和我的上诉。其实，我总给自己讲道理，试图不再去想它。我躺着，望着天空，努力对它发生兴趣。天空变成绿色，这是傍晚到了。我再加一把劲儿，转移转移思路。我听着我的心。我不能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消失。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想象出那样一个短暂的时刻，那时心的跳动不再传到脑子里了。但是没有用。黎明和上诉还在那儿。最后我对自己说，最通情达理的作法，是不要勉强自己。

我知道，他们总是黎明时分来的。因此，我夜里全神贯注，等待着黎明。我从来也不喜欢遇事措手不及。要有什么事发生，我更喜欢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后只在白天睡一睡，而整整一夜，我耐心地等待着日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是那个朦胧晦暗的时辰，我知道他们平常都是在那时候行动的。一过半夜，我就开始等待，开始窥伺。我的耳朵从没有听到过那么多的声音，分辨出那么细微的声响。我可以说，在整

个这段时间里，我总还算有运气，因为我从未听见过脚步声。妈妈常说，一个人从来也不会是百分之百的痛苦。当天色发红，新的一天悄悄进入我的牢房时，我就觉得她说得实在有道理。况且也因为，我本是可以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也本是可以紧张得炸开的。甚至一点点窸窣的声音也使我扑向门口，甚至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发狂似地等待着，直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很粗，那么象狗的喘气，因而感到惊骇万状，但总的说，我的心并没有炸开，而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

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认为我已抓住这一念头里最可贵之处。我估量我能获得的效果，我从我的思考中获得最大的收获。我总是想到最坏的一面，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去死。”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当然喽，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别的男人和女人就这么活着，而且几千年都如此。总之，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反正总是我去死，现在也好，二十年后也好。此刻在我的推理中使我有些为难的，是我想到我还要活二十年时心中所产生的可怕的飞跃。不过，在设想我二十年后会有什么想法时（假如果真要到这一步的话），我只把它压下去就是了。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所以（困难的是念念不忘这个“所以”所代表的一切推理），所以，我的上诉如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

这时，只是这时，我才可以说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允许自己去考虑第二种假设：我获得特赦。苦恼的是，这需要使我的血液和肉体的冲动不那么强烈，不因疯狂的快乐而使我双眼发花。我得竭力压制住喊叫，使自己变得理智。在这一假设中我还得表现得较为正常，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

设。在我成功的时候，我就赢得一个钟头的安宁。这毕竟也是不简单的啊。

也是在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又一次拒绝接待神甫。我正躺着，天空里某种金黄的色彩使人想到黄昏临近了。我刚刚放弃了我的上诉，并感到血液在周身正常地流动。我不需要见神甫。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她已经很多天没给我写信了。那天晚上，我反复思索，心想她给一名死囚当情妇可能已经当烦了。我也想到她也许病了或死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既然在我们现已分开的肉体之外已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们，已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彼此想念，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再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她死了，我也就不再关心她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很清楚，我死了，别人也就把我忘了。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了。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冷酷无情的。

恰在这时，神甫进来了。我看见他之后，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要害怕。我对他说，平时他都是在另外一个时候到来。他说这是一次完全友好的拜访，与我的上诉毫无关系，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我的上诉是怎么回事。他坐在我的床上，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不过，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是很和善的。

他坐了一会，胳膊放在膝头，低着头，看着他的手。他的手细长有力，使我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慢慢地搓着手。他就这样坐着，一直低着头，时间那么长，有一个时候我都觉得忘了他在那儿了。

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眼睛盯着我，问道："您为什么拒绝接待我？"我回答说我不信上帝。他想知道我是不是对此确有把握，我说我用不着考虑，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

把身子朝后一仰，靠在墙上，两手贴在大腿上。他好象不是对着我说，说他注意到有时候一个人自以为确有把握，实际上，他并没有把握。我不吭声。他看了看我，问道："您以为如何？"我回答说那是可能的。无论如何，对于什么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可能不是确有把握，但对于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我是确有把握的。而他对我说的事情恰恰是我所不感兴趣的。

他不看我了，依旧站在那里，问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因为极度的绝望。我对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是害怕，这是很自然的。他说："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我所见过的所有情况和您相同的人最后都归附了他。"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权利。那也证明他们还有时间。至于我，我不愿意人家帮助我，我也恰恰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发生兴趣。

这时，他气得两手发抖，但是，他很快挺直了身子，顺了顺袍子上的褶皱。顺完了之后，他称我为"朋友"，对我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不是因为我是个被判死刑的人；他认为，我们大家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人。但是我打断了他，对他说这不是一码事，再说，无论如何，他的话也不能安慰我。他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了。不过，您今天不死，以后也是要死的。那时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将怎样接受这个考验呢？"我回答说我接受它和现在接受它一模一样。

听到这句话，他站了起来，两眼直盯着我的眼睛。这套把戏我很熟悉。我常和艾玛努埃尔和赛莱斯特这样闹着玩，一般地说，他们最后都移开了目光。神甫也很熟悉这套把戏，我立刻就明白了，因为他的目光直盯着不动。他的声音也不发抖，对我说："您就不怀着希望了吗？您就这样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整个儿地死去吗？"我回答道："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又坐下了。他说他怜悯我。他认为一个人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不能忍受的。而我，我只是感到他开始令我生厌了。我转过身去，走到小窗口底下。我用肩膀靠着墙。他又开始问我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声音不安而急迫。我知道他是动了感情了，就听得认真些了。

他说他确信我的上诉会被接受，但是我背负着一桩我应该摆脱的罪孽。据他说，人类的正义不算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说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说它并未因此而洗刷掉我的罪孽。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罪孽。人家只告诉我我是个犯人。我是个犯人，我就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能再对我要求更多的东西了。这时，他又站了起来，我想在这间如此狭窄的囚室里，他要想活动活动，也只能如此，要么坐下去，要么站起来，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眼睛盯着地。他朝我走了一步，站住，好象不敢再向前一样。“您错了，我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们可以向您要求更多的东西。我们将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要求什么？”“要求您看。”“看什么？”

教士四下里望了望，我突然发现他的声音疲惫不堪。他回答我说：“所有这些石头都显示出痛苦，这我知道。我没有一次看见它们而心里不充满了忧虑。但是，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你们当中最悲惨的人就从这些乌黑的石头中看见过一张神圣的面容浮现出来。我们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容。”

我有些激动了。我说我看着这些石墙已经好几个月了。对它们，我比世界上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更熟悉。也许，很久以前，我曾在那上面寻找过一张面容。但是那张面容有着太阳的色彩和欲望的火焰，那是玛丽的面容。我白费力气，没有找到。现在完了。反正，从这些水淋淋的石头里，我没看见有什么东

西浮现出来。

神甫带着某种悲哀的神情看了看我。我现在全身靠在墙上了，阳光照着我的脸。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然后很快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我说："不。"他转过身去，朝着墙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轻声地说："您就这么爱这个世界吗？"我没有理他。

他就这样背着我待了很久。他待在这里使我感到压抑，感到恼火。我正要让他走，让他别管我，他却突然转身对着我，大声说道："不，我不能相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盼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说那是当然，但那并不比盼望成为富人，盼望游泳游得很快，或生一张更好看的嘴来得更为重要。那都是一码事。但是他拦住了我，他想知道我如何看那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就朝他喊道："一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然后，我跟他说我够了。他还想跟我谈谈上帝，但是我朝他走过去，试图跟他最后再解释一回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意把它浪费在上帝身上。他试图改变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对他说他不是我的父亲，让他当别人的父亲去吧。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不，我的儿子，我是您的父亲。只是您不能明白，因为您的心是糊涂的。我为您祈祷。"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好象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了似的，我扯着喉咙大叫，我骂他，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掀住他的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话，喜怒交迸的强烈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他的神气不是那样地确信无疑吗？然而，他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甚至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好象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

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过那件事。我干了某一件事而没有干另一件事。而以后呢？仿佛我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什么都不重要，我很知道为什么。他也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他懂，他懂吗？大家都幸运，世上只有幸运的人。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或者想跟我结婚的玛丽，也都是有罪的。莱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玛丽把嘴唇伸向一个新的默而索，又有什么关系？他懂吗？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从我的未来的深处……我喊出了这一切，喊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已经有人把神甫从我的手里抢出去，看守们威胁我。而他却劝他们不要发火，默默地看了我一阵子。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了。

他走了之后，我平静下来。我累极了，一下子扑到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满天星斗照在我

的脸上。田野上的声音一直传到我的耳畔。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盐的气味，使我的两鬓感到清凉。这沉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静，象潮水一般浸透我的全身。这时，长夜将尽，汽笛叫了起来。它宣告有些人踏上旅途，要去一个从此和我无关痛痒的世界。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觉得我明白了为什么她要在晚年又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她又玩起了“重新再来”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将尽的养老院周围，夜晚如同一段令人伤感的时刻。妈妈已经离死亡那么近了，该是感到了解脱，准备把一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我也是，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象这巨大的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象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叫声。

鼠　疫

顾方济　徐志仁　译

林友梅　校

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
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

——丹尼尔·笛福①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城市本身相当丑陋，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它的外表很平静，但要看出它在各方面都不同于很多商业城市，那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才行。怎么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的城市？怎么能使人想象在那里，既看不到飞鸟展翅，又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总之这是一个毫无特点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只在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只有那清新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才带来春天的信息，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烈日烤炙着过分干燥的房屋，使墙上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人们如果不放下百叶窗就没法过日子。但到了秋天，却是大雨滂沱，下得满城都是泥浆。直到冬天来临，才出现晴朗的天气。

①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十八世纪名作家，著有《鲁滨孙飘流记》等。

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于气候的缘故，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到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例如：喜欢女人，爱看电影和到海滨去沐浴。但是他们很有分寸，把这些娱乐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里则设法多赚些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在咖啡馆相聚，在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步或者呆在阳台上。年轻人喜欢寻找一些短暂而强烈的刺激，至于那些年纪大的人的嗜好，则不外乎跑跑滚球俱乐部，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宴会，或者上俱乐部去狂赌，碰碰牌运。

有人一定会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现象，我们的同时代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不错，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而后却把业余生活的时间浪费在赌牌、上咖啡馆和闲聊上，这种情况，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们却不时地在考虑一些其他的生活内容。虽然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可是能有这种考虑就比没有强。而奥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现代城市，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虑什么其他事情的。因此，没有必要确切地描绘我们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不是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就是安于长期的夫妇生活。除这两个极端之外，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不是他们所独创的。奥兰跟别处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本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死亡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好，还是说难受比较恰当。生病总是不舒适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如生了病就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人们的体贴，要有扶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奥兰，为了适应严酷的气候、大量的生意经、枯燥无味的景色、短促的黄昏、娱乐的方式等等，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生病的人在那里都感到孤寂，更何况是垂死的人。试想当全城的人都忙于在电话中或在咖啡馆里谈着票据呀、提货单呀、贴现呀等等的同时，一个关闭在被烈日烤得劈啪发响的重重墙头后面的垂死病人该是什么境况？人们可以想象，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一个干热的地方，当死神来临时将会带来何等难受的滋味！

这番情况介绍也许能使人对该城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虽然如此，这一切毕竟不该过分予以夸张。值得提出的是该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样平庸。但是一旦过惯了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是不难习惯的，因此可以说一切都还过得去。当然，这样看来，这个城市的生活的确不太有情趣。不过，这里至少没有发生过什么混乱，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劳常常赢得外来游客的理所当然的好评。这个没有景色、没有草木和没有灵魂的城市却给人们一种宁静的感觉，最后会把人带入梦乡。可是，应该说句公正话，该城四周风景之美倒是无与伦比的。它处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周围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个轮廓完美无缺的海湾。令人遗憾的只是城市是背着海湾建造的，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是看不到海的。

知道了上述这些情况，就不难相信，这个城里的居民是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我们下面会看到——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就

是本书要报道的内容。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简直不可置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说："这件事发生了。"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入了他要叙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拥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最后还有终于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他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还可以……然而这段开场白和哗众取宠的话也许该到此为止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有关下述这件事的头几天的经过，还得说得详细些才行。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使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在看门人看来，简直是一件荒唐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且可能是只死老鼠。但这也白说，米歇尔丝毫不动摇：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停了一下，象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医生细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当时想的并不是老鼠，只是这口鲜血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到山区疗养所去。他一回家就看见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付旅途劳顿，预先作的准备。她微笑着说："我觉得很好。"

医生在床头灯的亮光下注视着她转过来向着他的脸庞。尽

管她已有三十岁了，又是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始终同她少女时一样。大概是这一微笑使其他不足之处都消失了。

“能睡就睡吧，护士十一点钟来，我陪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吻了一下她那有点湿润的前额。她带着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也即四月十七日，八点钟，看门人在医生经过时拦住了他，责怪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过道中放了三只死老鼠。这些老鼠大概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它们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站了一些时候，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者自我暴露。然而并无下文。

“好啊，这些坏家伙，”米歇尔说，“我终究会把他们抓住的！”

里厄觉得迷惑不解，他决定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开始他的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在那些区里的垃圾清除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笔直的道路行驶时，掠过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废物箱。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一数，丢弃在菜皮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大约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沿街的屋子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房里。床上躺着病人。他是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来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想喘口气，重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声哮鸣。他老婆拿来一只面盆。

医生在为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它们出来了，您见到了吗？”

他老婆接口说：“不错，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老头儿搓搓手又说："它们走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哪！"

里厄接着注意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完毕，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告诉他："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别的老鼠。

"噢，没有，"看门人回答说，"你知道，我守在这里，量这些畜生也不敢来。"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母亲将于明天来到。她是因儿媳要离家养病，所以来为儿子照料家务的。医生走进屋子，护士已到了。里厄看见他的妻子站着，穿着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过了。他微笑着对她说：

"这样好，很好。"

过了不久，他们到了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车车厢里。

她注视了一下车厢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花费了，对吗？"

"需要这样，"里厄说。

"关于这些老鼠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事很奇怪，但是会过去的。"

他接着急速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象叫他不要再往下说了。但是，他又说：

"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看窗外。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你推我搡。火车的排汽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回过身来，他见到她脸上挂满着眼泪。

他轻声地说："不要这样。"

她含着泪，重又露出笑容，但笑得有点儿勉强。她深深地透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得好好保重啊！"他说。

但是她已听不见了。

里厄走近月台的出口处，迎面碰到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手搀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出门去。奥东先生是个高个儿，黑头发，相貌一半象过去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象一个阴郁的运尸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答道：

"我在等我的夫人，她是专程去探望我家属的。"

火车鸣笛了。

推事说："老鼠……"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注意了一下，但又回过头来向着出口处，说：

"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时候，唯一使他不能忘记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打那儿经过，膀子下挟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

同一天下午，门诊一开始，里厄接见了一位青年人，据人家告诉他，这人是新闻记者，早上已经来过。他叫雷蒙·朗贝尔。这是一个身材不高，宽肩膀，神色果断，双目明亮而聪明的人。朗贝尔身穿运动衣式样的服装，看来生活宽裕。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他是受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纸的委托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的，要找些关于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条件并不好。但是在进一步谈论之前，他

想知道，记者是否能据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是说您能全面地对这种情况进行谴责吗？”

“全面？说实话，不能。不过我想这样的谴责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这样的谴责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是否能做到坦率而毫无保留。

“我只能接受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不能提供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您的话简直同圣茹斯特①如出一辙，”新闻记者微笑着说。

里厄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讲的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但他喜爱他的同类，因此，就他本人来说，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

“我想我理解您的话，”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医生送他到门口说：

“谢谢您能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显得不耐烦地说：

“好，我懂得，请原谅我打扰您。”

医生同他握手，告诉他此刻市内发现大量死老鼠，关于这件事，可能有不寻常的报道可写。

“哦！”朗贝尔叫了起来，“这事我感兴趣。”

下午五时，医生正要为另一些病家出诊，在楼梯上同一个

---

① 圣茹斯特(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年纪还比较轻的人擦肩而过，此人外形厚实，肥头大耳，凹陷的脸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在住在这幢楼房最高一层的那些西班牙舞蹈家的家里，他曾经见过这个人几次。这人名叫让·塔鲁，他站在梯级上，一本正经地吸着香烟，一边注视着脚旁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来，灰色的眼睛冷静地盯住医生，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接着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奇怪的事情。

里厄说："不错，可是这件事到头来会令人厌恶的。"

"不全是这种看法，医生，只是从某一个方面看是这样。我们不过是从未见过类似的事罢了。但是我对这事感兴趣，不错，实在感兴趣。"

塔鲁用手向后掠了掠头发，重新观察那只老鼠，这会儿，它已不动了。他向里厄笑道：

"总之，医生，这主要是看门人的事情。"

医生正好看见看门人在楼房前面，背靠着门口附近的墙上，他那平时充血的脸上显露出一副倦容。

里厄告诉看门人，又发现了死老鼠，老米歇尔说："对，我知道，现在是三三两两的出现。不过在别的房子里情况也是这样。"

他神情沮丧，显得心事重重，漫不经心地用手擦着脖子。里厄问他身体怎样。当然，看门人不能说自己身体不好，他说只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根据他的看法，这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这些老鼠使他感到不安。要是不再看到老鼠，一切都会大大好转。

可是第二天早晨——那天是四月十八日，医生从车站接他母亲回来时发觉米歇尔的面颊下陷得更厉害了。从地窖到楼顶，楼梯上有十来只死老鼠。邻居们的垃圾桶里也装满了。医生的

母亲知道了这事却不吃惊。她说：

“这类事情是有的。”

她身材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显得很和善。

她说：“贝尔纳，见到你我很高兴，这些老鼠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情绪。”

医生同意他母亲的话；真的，跟她在一起，什么事情总好象很容易解决似的。

但是，里厄仍然打了一个电话给市镇灭鼠所。他认识那里的所长，问他是否听到有大量老鼠死在露天这件事。梅西埃所长说他听说了，并且，在他那离开码头不远的所里就有人发现五十来只。不过，他不能肯定这情况是否严重。里厄也决定不了，但是他认为灭鼠所应该管一管。

梅西埃说：“对，有命令下来就行。如果你认为真值得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要求上级下命令。”

“值得一做，”里厄说。

刚才他的女佣告诉他，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中，已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大致上就在这一时期，城里的人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从工厂和仓库中清除出了好几百只死老鼠。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临死抽搐时间过长的老鼠弄死。而且，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医生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有人群聚居的地方，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中，或者一连串地浮在下水道里有待清除。晚报自那天起抓住了这桩事情，责问市政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对付这一令人厌恶的现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灭鼠所奉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后，由该所派两辆车

子运往垃圾焚化厂烧毁。

然而此后几天中，情况严重起来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不断增加，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批地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隐匿的屋角里、地下室、地窖、阴沟等处成群地爬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光亮处踌躇不前，在原地打上几个转，最后就死在人的脚旁。到了夜里，在过道中或巷子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的轻声惨叫。在郊区的早晨，人们见到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带着一小块血迹。有些已肿胀腐烂，有些直挺挺地伸着四肢，须毛还直竖着。在市区可以在楼梯口或院子里见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也有孤零零地死在市政大厅里，学校的风雨操场上，有时还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使城里的人惊愕不止的是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也能发现它们。武器广场、林荫大道、海滨马路，一处接着一处遭到污染。尽管人们一清早就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是它们在白天又越来越多地在市内出现。不少夜行者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脚下会踏到一只软绵绵的刚死不久的老鼠。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她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她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看一下我们这座小城市的惊愕心情吧！直到那时为止它还是安安静静的，几天之内就大乱起来，就象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他那浓厚的鲜血突然沸腾，造起反来。

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搜集、提供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的机构）在义务广播消息中报道，仅仅在二十五日一天中收集和烧毁的老鼠就达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这个数字使人对市内每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它更加剧了人们的慌乱。在这以前，人们的心情不过是对一件令人厌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觉这

个尚不能确定其广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了。只是那个患气喘病的西班牙老头儿仍旧搓着手重复地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他说话时露出一副老年人兴致勃勃的神情。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当情报资料局宣布收集到八千只左右的死老鼠时，人们的忧虑达到了顶峰。有人要求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有人谴责当局，还有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经在谈论躲到那里去的打算。但到了第二天，当情报资料局宣称这个怪现象已突然停止，灭鼠所捡到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时，全城才松了口气。

可是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正在把汽车停靠在屋子前面的时候，发现看门人正从路的另一端吃力地走来，歪着脑袋，叉手叉脚地活象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臂膊。医生认识这位教士，和他见过几面。他是帕纳卢神甫，是一位博学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市内威望很高，即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淡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医生等着他们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很粗。他觉得不大舒服，需要换换空气。但是他的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痛得厉害，迫使他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

"有几个肿块，"他对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臂膊伸出车门外，用手指四面按按米歇尔伸过来的颈子底部，那里长着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休息，量一量体温，下午我再来看您。"

看门人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这该是一种瘟疫，"神甫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目露出一丝笑意。

吃了午餐后，里厄正在重新看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知他妻

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他的一个老病人打来请他出诊的电话。他是市政府的一个职员，长期以来患主动脉瓣狭窄症。因为他穷，里厄不收他的诊费。

他在电话中说："对，是我，您还记得我。但这次是别人。请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事。"

他说话时声音很急促。里厄首先想到看门人，但决定晚一步去看他。过了几分钟，医生就来到了外围地区费代尔布街上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那又阴又臭的楼梯上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他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黄色的短髭，高个儿，背有点驼，狭肩膀，四肢瘦长。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里厄说："他现在好一点了，我本来认为他完了。"

说着，他擤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着，下面是一张翻倒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虽然用的是最普通的言语，但似乎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响声。我一见门上写的字——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一声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又说：

"照我看，过程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面前是一间明亮、但陈设简陋的房间。在一张铜床上躺着一个矮胖子。他吃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医生停步不前。在这个人呼

吸的间歇中，他好象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太突然，脊椎没有断，当然，有点窒息难受。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并且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带着呼吸困难的声音说："谢谢您，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嗯，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那末我去报告。"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着说他已好了，没有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请您相信我，我有必要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

接着他把身子往后一仰，开始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一会儿了，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科塔尔先生，您得明白，别人会归咎医生的。比如说您企图再干的话……"

科塔尔挂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搞了，又说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些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

"明白啦，这个咱们别谈了，过两三天我再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告诉格朗："今天晚上要看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清楚，不过我会亲自当心他的。"

格朗摇着头又说：

“告诉您，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不管怎样，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阴暗的屋角，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否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本地区的传闻没有十分在意。他说：

“我脑子里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看望一下看门人。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账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口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象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晨街头的人声好象比往常更加活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全体居民从一星期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气息。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心，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体温已下降到38°。他觉得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对医生说：“医生，他好点了，是吗？”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呓语不断，又呕吐起来。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看门人好象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住病人的两只脚，眼望着里厄。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救护车里，医生和看门人的老婆俯身望着病人。从他布满蕈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老

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也呈铅青色，呼吸短促，身体被淋巴结肿胀折磨得象在撕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床里，好象想让床把自己裹起来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紧迫地召唤着他。看门人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结束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已开始。在这一时期里，原先的震惊正在逐渐转变为恐慌。市民们以前从未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老鼠倒毙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死于怪病的鬼地方。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态发展仅仅到此为止，那末人们久而久之无疑也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间不仅是看门人和穷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尔领头走的道路。就从这一时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怖，开始考虑。

在详细叙述新发生的事件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于刚才描述过的这一时期的看法。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曾提到过让·塔鲁，他是几个星期以前来奥兰定居的，从那时起就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表面看来，他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生活相当舒适。城里的居民虽然渐渐地跟他熟悉起来，但谁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也不明白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碰得到他。从早春起，人们常在海滨见到他在欢畅地游泳。这位脸上常带笑容的好好先生好象对一切正当娱乐都很来劲，却不入迷。事实上，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习惯是同本城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经常地往来。

他的那些笔记本里的记载，不管怎么说，也可算是这段困

难时期的一种记事。但是这段记事很特别，似乎反映出一种偏重细小事物的成见。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塔鲁是一个着眼于琐碎细节的人。在这全城的大动乱中，他总是致力于记述这段历史的轶闻琐事。人们无疑地要为他这种成见感到惋惜，对他的铁石心肠表示怀疑。可是，正是这些笔记本能够对这一时期的记事提供大宗具有重大意义的次要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使人们不致过早地对这位风趣人物作出判断。

让·塔鲁是从他到达奥兰之时开始写这些记录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能住在这座那么丑陋的城市里，感到出奇地满意。对点缀市府的两座铜狮作了细致的描绘。对这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和城市布局荒谬等，都不苛求。塔鲁还在描述中夹杂了他在电车中和马路上听到的一些交谈，但不加评论，在稍微后面一点提到的一段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对话则属例外。塔鲁曾经亲耳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的交谈：

"康这个人，你很熟悉吧？"一个售票员说道。

"康？那个高个子，黑胡子的是吗？"

"就是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对，一点也不错。"

"可是，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呢？"

"在老鼠事件之后。"

"哟！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不清楚，他当时发烧。不过，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腋下长了脓肿，没有能顶住。"

"可是看上去他的健康情况和别人没有两样啊！"

"不，他的肺部比较弱，还参加市军乐队，一直吹短号，这玩意儿是伤身体的。"

“啊！”另一个最后说，“一个有病的人就不该再吹短号了。”塔鲁写了这些环节后提出了疑问：康明知参加市军乐队对自己有害处，但为什么仍然参加了？又有什么深奥的理由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星期日的游行演奏？

接下去是记述塔鲁所看到的窗户对面的阳台上时常出现的情况，对此他似乎很有好感。原来他的房间朝向一条小小的横街，那里的墙影下经常睡着几只猫儿。每天吃完午饭，全城正在炎热的天气里打瞌睡的时候，马路对面的阳台上就出现一个矮老头，他长着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白发，穿着军人式的服装，显得笔挺而庄严。他用并不亲切但柔和的“咪咪”声，呼唤那些猫儿。猫儿张一张睡眼，还是动也不动。那人在小街的上空将一张张小纸撕碎，散落下去的白纸蝶儿吸引住这些牲畜，它们走到街心，犹豫地把爪子伸向那些最后还在飘落的纸屑。矮老头就对准猫儿使劲地吐唾沫。假如有一口吐中了，他就笑了起来。

最后，塔鲁好象还是被这座城市的商业魅力所吸引住了，那里的市容、繁华、甚至娱乐都象是受做生意的需要所支配似的。这个特点（笔记本里是这样写的）获得塔鲁的赞赏，甚至在他某一段颂扬的文字里用上这样的感叹作为结束语：“总算不虚此行！”在这位旅客的这一时期的笔记里，只有这些地方似乎才是出于他本人的真情。不过要看出这些笔记的意义和严肃性那是困难的。另外一段笔记的内容也是如此，在记述一个旅馆出纳员由于发现一只死老鼠而记错了账目后，塔鲁比平时较为潦草地加上了这些话：“问题：要不浪费时间，怎么办？答案：到漫长的时间里去体验。方法：在牙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过上几整天；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度过星期日的下午；去听别人用听不懂的语言做报告；在选定一条路程最远

又最不方便的铁路线上去旅行，当然还得站着；去剧院售票处前排队而没买到票等等。”但是紧跟这些不着边际的语言和思想之后，笔记里又开始详细记叙起城里的电车来，说它的模样象条舢板，它的颜色模糊不清，它的车厢肮脏成习，末了用一句不知所云的“真了不起”来作结束。

现在且看塔鲁在老鼠一事上所作的记载：

“今天，对面的矮老头失了常态。猫儿都不见了。由于街上发现大量死老鼠，猫儿也就失踪了。依我看来，这并非是猫儿去吃死老鼠了。我记得我的一些猫儿就是厌恶死老鼠的。可能它们钻到地窖里去乱跑，而矮老头就不知所措了。他的头发也梳得不那么整齐，人也不那么精神了。看上去他有心事。过一会他进去了。但在进屋前他还毫无目标地吐了一下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中途停驶，因为里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它是怎么来的。两三个妇女下了车。丢掉了死老鼠，电车就重新开走了。

“旅馆里，值夜的——这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对我说这些老鼠是灾难的先兆。‘当老鼠离开轮船的时候……’我回答他说，就轮船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城市里还从未有人证实个这种先兆。然而他却断定不疑。我就问他，依他看来，可能发生什么灾难。他也说不上来，因为在他看来，灾难是不可能预见的。反正如果发生地震，他也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又问我这是否会使我担心。

“我对他说：‘我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求得内心宁静。’

“他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在旅馆的饭厅里，有一家人很有趣。父亲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衣服，硬领子。在他秃顶的左右两边，有两撮灰白的头发。他有一双圆而冷酷的小眼睛，削尖的鼻子，横阔的嘴，

活象一头驯服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到饭厅门口，然后侧身让他的妻子走进来——他的妻子小得象只黑鼠，后面又跟着进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打扮得象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他走到餐桌旁，等妻子坐下，然后自己入座，最后轮到两只小狗爬上椅子。他称呼妻子和孩子都用'您'字，但对妻子讲的常是彬彬有礼的刻毒话，对孩子用的则是权威的口吻；

"'尼科尔，您真是讨厌极了！'

"小姑娘几乎要哭出来。这也是必然的。

"今天早晨，男孩对老鼠事件很起劲，想在吃饭时讲一讲。

"'吃饭不要讲老鼠，菲利普。我不许您以后再提这个词儿。'

"'您爸爸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小狗埋头到狗食盘中去了。猫头鹰就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其实这也是多余的。

"即使有着老先生的这番训诫，城里还是大谈其老鼠事件，报纸也介入了。本市新闻栏里通常登载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却整栏都是攻击市政当局的内容：'我们的市政官员们是否注意到这些腐烂的死老鼠会引起的恶果？'旅馆经理讲来讲去的也是这件事，其原因是他正在恼火：在一家体面的旅馆的电梯里发现老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为了安慰他，对他说：'但这是大家都碰到的嘛！'

"'正是因为这样，'他回答我说，'我们现在也和大家一样了。'

"是他对我讲起这种奇怪的高烧症最早的一些病例，现在这种病已使大家担忧了。他的收拾房间的女佣中，已有一人得了这种病。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不会传染的，'他赶紧加以说明。

“我对他说这对我是无所谓的。

“‘啊，我知道，先生您跟我一样，是位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高见，反正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

就从这时起，塔鲁的笔记开始比较详细地记述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家都已在担心的高烧症。塔鲁记下了那个矮老头终于在老鼠不再出现后重新见到了他的猫儿，以及他耐心地校正自己吐唾沫的位置的情况。接着他又记载了有人已能举出十几起这样的高烧病例，其中大多数是不治之症。

最后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医生的刻划转述一下作为资料。据笔者的判断，他描绘得相当逼真：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的脸儿，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但是下颌突出。鼻子高而挺，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嘴角微翘，嘴唇厚实，而且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的皮肤黝黑，汗毛也呈黑色，他总是穿着深色的服装，但很合适。他的外表有点象西西里的农民。

“他走路敏捷。跨下人行道也不改变步伐，但是过了马路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半是轻轻一跳。他驾驶汽车，常常心不在焉。指示方向的箭头也常不放下，即使车子转了弯也是这样。头上从来不戴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看门人的尸体运走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里夏尔说，“两人丧命，一个是两天，另一个是三天内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已好转。”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里夏尔说，“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

“没人跟我说过，可是这些症状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

正在谈论时，天气却变坏了。在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之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这又热又潮湿的春天还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这座象蜗牛那样隆起在高原上的几乎全面背海的城市里，笼罩着一片忧郁阴沉的气氛。在这些粗涂灰泥的长墙之间，两旁尽是积满尘垢的玻璃橱窗的街道中，以及肮脏发黄的电车里，到处都觉得有点

被天气困住似的。只有里厄的那个年老病人哮喘没有发作，因而感到这种天气是一种享受。

“热得难熬，”他说，“但这对支气管倒挺不错。”

热得的确难熬，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医生当时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费代尔布街，参加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是他觉得自己这种感觉毫无根据。所以产生这种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焦躁的情绪和大量的心事在纠缠着他，因此他觉得必须快点使自己的头脑镇定下来。

他抵达那儿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着，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陈设很简单。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木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虽已拭去一半但还能认得出来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来，头部痛得不能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不住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了又合起来。

他告诉医生，他对科塔尔不太熟悉，只是认为他有点小积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他们之间长时期来只有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的关系。

“我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几天以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带回家来的粉笔，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这时，科塔尔走到楼梯口，帮我拾起来。他还问我，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作什么用。”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自从离开中学后，他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对呀！”他对医生说，“有人向我保证：这对更好地掌握法语

的词义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用蓝粉笔再抄一遍词尾的变化——性、数、格的变化和变位，又用红粉笔抄写那不变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懂得，但是他对这表示感兴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但这毕竟……当然我没想到他会用它来完成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警官带着秘书来到了。他首先要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发觉格朗在谈到科塔尔时，总是称他为“绝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决定”这种词儿。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原因，格朗却显得咬文嚼字。最后大家同意选用“内心痛苦”一词。警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事先一点也看不出他的所谓“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对我说邻居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一定把火柴还来。我叫他留着。”

警官又问这位职员，科塔尔有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觉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象要跟我谈话。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转向里厄，有点尴尬地说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于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在访问前有个准备。当里厄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床上竖起身子，带着不安的神情，转身向门口望着。

“是警察局吧？”

“不错，”里厄说，“且别激动。完成两三项手续后，就没您

的事了。”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毫无用处，再说他是不喜欢警察局的。里厄不耐烦了，说：

“我也对他们并无好感。如要一次就完事，必须对他们的问话回答得快、回答得正确。”

科塔尔不吭声了，医生转身向门口走去，但这个矮胖子叫住他，并在他走近床边时拉住了他的手：

“他们不会伤害病人，一个上吊过的人，您说对吗，医生？”

里厄看了他一会，然后向他保证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且自己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才来到这里的。病人似乎松了口气，里厄就叫警官进来。

他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且问他能否清楚地说明他这行动的种种动机。他两眼不望警官，只是回答说，“内心痛苦”，当时正是这个动机。警官追问他是否还要再犯。科塔尔激动起来，回答说不想再干了，只想人家不要来烦他。

警官气愤地说：“我要提醒您，现在是您在找别人的麻烦。”

里厄当即做了个手势，这对话也就到此为止。

警官走了出去，叹了口气，说：“您想吧，自从大家议论这个高烧的事儿以来，我们要做的事可真不少呢……”

他问医生高烧的事儿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完全不知道。

“这全是天气关系，没有别的原因，”警官下了这个结论。

的确，这是天气关系。就在这一天里，各种东西变得愈来愈粘手，而里厄每出诊一次，他的担忧也就增加一分。当天下午，郊区那个老病人的邻居，双手紧压着腹股沟，边说吃语，边在呕吐。淋巴结比看门人的要大得多。其中一个开始流脓，很快就溃烂得象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就打电话给省里的药物仓库。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写着：“他们答复说没有。”而别

处又有人来叫他去处理同样的病情。显而易见，必须打开这些脓肿。用手术刀划上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带血的脓水。病人流着血，四肢叉开，腹部腿部出现斑点。有的淋巴结停止出脓，断而重新肿大。大多数情况就是病人在难闻的奇臭中死去。

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喧嚷，对这些情况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路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情。但是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商议起来。在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人会想到采取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是惊人的。不到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谁要是关心这种怪病的话，都能肯定这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卡斯特尔，就选中这个时候前来找他。

他对里厄说："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验结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着化验。我曾在中国做过一段时期医生，约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是在疾病发作的当儿没有人敢直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不可惊动：不能慌乱，切不能慌乱。而且就象一个同行说的：'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样明白。"

里厄思忖着。他从诊所的窗口眺望那远处遮住海湾的峭壁悬崖。天空虽然一片蔚蓝，但色彩暗淡，随着夜幕的降临而逐渐消逝。

里厄说："对！卡斯特尔。这是难以相信的。但是看样子，这很象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

这位老医生说："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它在温带地区已经绝迹'多年'了。"

里厄耸了耸肩膀说："绝迹？这怎么理解呢？"

"对，而且不要忘记：约在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好吧。但愿这次的情况不比过去更严重。不过这简直难以叫人相信是真的。"

“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恶梦。然而恶梦并不一定消失，在恶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

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①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的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象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

医生这时已感到不耐烦。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病例还不能称作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

① 普罗科匹厄斯(约499—565)，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

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出现了这些症状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回忆起一句话，就是他在手册里罗列症状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不错，出现了这些症状后，人的性命如同悬丝，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一点没错——都耐不住要做这难以观察的动作，结果一命呜呼。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调和：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那样安宁无争的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入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飙而筑起了高墙；雅法[①]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獗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象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不，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一天的宁静。窗外忽然传来一辆瞧不见的电车的丁当声，一刹那驱走了残忍和痛苦的想象。只有在星罗棋布的简陋屋子那边的大海，才是世界上骚扰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莱修[②]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

① 今以色列港口。

② 卢克莱修，即Titus Lucretius Carus，古罗马拉丁诗人。

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象：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

但是，理智驱走了这种荒诞的想象。不错，“鼠疫”两字已被提出来了；不错，就在这个时刻里，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可是没有关系，有办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清，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鼠疫就会停止蔓延，因为这种疫病并不是凭想象就会发生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不正确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这极有可能——那当然最好，否则的话，我们也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办法来制伏它。

医生打开窗户，外面的声音一下子传了进来。隔壁工厂里的锯木机发出老是不变的急促的呼啸声。里厄振作起精神来。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阵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里厄医生正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这位市府职员虽然担任很多职务，但他经常定期被叫到统计部门，去管户口。因此他就有机会统计死亡数字。他为人殷勤，答应过里厄将统计报告的一份抄本亲自送来给他。

医生看见格朗和他的邻居科塔尔一同进来。格朗举起一张单子，告诉里厄说：

“医生，数字在上升：两天里死去十一人。”

里厄向科塔尔打了个招呼，并问他近来觉得怎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定要前来向医生致谢并对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是里厄却注视着统计表。

里厄说：“看来，或许有必要下决心肯定这种疾病的名称了。直到目前，我们还犹豫不决。随我来吧，我要去化验室。”

“对，对，”格朗说着，跟随医生走下楼梯。“是什么东西，就该叫它什么东西。不过，这个叫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反正这对您也没用。”

“您瞧，”职员微笑着说，“这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不吭声。街道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这里短暂的黄昏已近尾声，夜幕即将来临，星星开始出现于昼光未尽的天际。街头的路灯不久就亮了起来，天色显得暗了下去，而谈话的声音倒好似提高了音调。

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对不起，我要去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家乡所说的：‘今天

该做的事绝不可以搁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马尔的格朗的癖好，他爱用那里的成语，再会加上几句没有出处的平庸的陈词滥调，诸如“梦幻的时刻”或“仙境般的灯火”等等。

科塔尔说：“啊，的确不错。晚饭以后可休想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他的活儿是否为市府做的。格朗回答说不，他是为自己做的。

“啊！”里厄随口问了一句，“那么进行得如何？”

“我在这上面花了好些年工夫，必然有些收获。但也可以说并无多大进展。”

“大致上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里厄停下来问道。

格朗整了整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不清不楚地说了一番。里厄模模糊糊地听出似乎是有关个性发展方面的事。这时格朗却已离开他们，迈着碎步在无花果树下顺着马恩大街走去了。他俩到了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找他谈谈，请教些问题。里厄正在摸弄口袋里的统计表，就叫他到诊所里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明天正好要到科塔尔的地区里去，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看他。

医生离开科塔尔时却发现自己在想格朗，设想他遇上了一次鼠疫，这可并非是象这一次那样微不足道的鼠疫，而是一次历史性的大鼠疫。“这种人倒可幸免于难。”他记得在书本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特别损害身强力壮的人。想着，想着，医生忽然发现这位公务员似乎有点神秘莫测。

初看上去，约瑟夫·格朗确实是个恰如其分的市府小职员，他的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他的身份。他的身材又长又瘦，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总是存心要尺寸特别宽大的，以为这样可以

穿得长久些。他的下牙床还有着大部分牙齿，但是上面的牙齿却全掉光了。微笑起来，掀起的主要是上唇，因而口腔显得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修士般的走路姿态，贴着墙根悄悄进门的习惯，以及他身上的一股烟酒气味和毫无气派的神情，那么只能设想这是一个趴在办公桌上的人物，一心一意核对着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编制税收的年轻工作人员收集清除垃圾的新税率的参考资料。连一个一无成见的人也可看出，他好象生来就是当一名市府临时辅助工的人，每天收入六十二个法朗三十分，干着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在他的就业登记表“擅长”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他在二十二年前考上学士学位后，因为经济拮据，只能辍学，接受了这个工作。据说当时人们曾经给予他很快“转入正式录用”的希望。这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里的一些行政上的棘手问题。随后人家又向他保证能获得一个生活可以过得比较宽裕的科员职位。当然，约瑟夫·格朗做事并非出于飞黄腾达的欲望，这在他的苦笑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能够依靠正当手段，换取稳定的物质生活，从而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这样的远景非常使他向往。所以他接受这个差使，自有光明正大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乎对自己理想的忠实不渝。

经过好多年，他这个临时性的工作一直没有改变，这期间生活程度却大幅度上涨。格朗的工资虽有几次一般性的增加，可是小得可怜。他在里厄面前也曾吐过怨言，但似乎谁也没理会这件事。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的特点之一就在这里。他本来可以提出要求，即使不给他应享的权利——该享什么权利他也没有把握——至少也应履行过去许下的诺言。但是当初雇用他的领导已死了多年，而他本人却又回忆不起以

前的诺言到底是怎样讲的，归根结底，还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言词。

正是这最后的特点最能刻划出我们这位同胞的形象，这一点里厄也能看得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一直写不出一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伺机进行必要的活动。据他说，“应得的权利”一词特别难以出口，他对此也并不坚持；也不宜使用“许下的诺言”这个词，因为这就指明要许诺人承担义务，不免显得太放肆，和自己低微的职务不太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用诸如“照顾”、“请求”、“感激”等词，因为他感到这样用词有失个人尊严。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字眼，我们这位同胞才继续把这个庸庸碌碌的差事干下去，直到如今上了年纪。再者，正如他经常对里厄医生说的，经历一段时间习惯以后，他发觉自己的物质生活总算有了保障，只须做到量入为出就行了。市长——我们城里的一位工业巨头——曾经有句名言，格朗认为说得很对，那就是：到头来（市长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道理都在这个词上），到头来，从未见到过有人饿死。总之，格朗的生活虽然艰苦得近似苦行修士的生活，“到头来”倒也使他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作风，从某种角度来说，可称值得人们学习。他一贯勇于坚持正确的思想，这样的人在我们城里或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从他吐露的有关自己的只言片语中就可看出他的善良和富于感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是不敢承认有这些品质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热爱他的外甥们和自己的姐姐，这是他仅有的亲人，他每隔两年要回法国去探望一次。他的父母早在他幼年时即已去世，一想起他们，他就觉得伤心，这个事实他也并不否认。他直言不讳最爱听每天下午五点传来的他那个区里的柔和动人的钟声。虽然感触是那么单纯，可是一个字

眼得费多少力气！表达乏术，实是他最大的忧虑。每次碰到里厄，总是跟他说："唉！医生，我还得好好学习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衷情。"

那天晚上，医生目送这位公务员离去，突然想出了格朗要说的话来：原来他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里厄边想边走，一直走到化验室，一路上这种想法使他感到放心。他明知这样的印象是愚蠢的，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了那么简朴奉公、连癖好也是无可指责的公务员，这座城市竟会遭到鼠疫横祸。说实在话，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些癖好竟然会出现在鼠疫横行的环境中，所以他认为鼠疫实际上不会在我们的居民中蔓延开去。

第二天，里厄提出被大家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终于使省府同意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

里夏尔表示："百姓果真担心不安，但流言蜚语也在肆意夸大事实。省长对我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迅速行动起来，但是不要声张。'他又认为肯定这不过是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带了卡斯特尔同车前往省府。

卡斯特尔对他说："您可知道省里没有血清吗？"

"知道，我已经打过电话给储存处，那里的主管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得从巴黎运来哪！"

"希望不要太慢才好。"

"我已打电报去了，"里厄答道。

省长待人很和气，但很容易激动。

他说："开会吧，先生们，要我把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里夏尔认为不必要，这些医生对情况都很了解。问题倒在于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老卡斯特尔粗声粗气地说："问题在于要弄清楚这究竟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位医生惊叫了起来。其他的人似乎在犹豫。省长陡地一震，下意识地掉过头来望着门口，仿佛要看看这扇门是否已挡住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不让它传到通道中去。里夏尔表示，依他看来不必惊慌，现在能够确认无误的只不过是一种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并发症的高烧而已，而任何一种假定，不

论在科学上或生活上，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边安详地咀嚼着他那上唇的发黄的短髭，一边抬起头来，目光炯炯，看了里厄一眼，然后善意地环顾了一下其他的人，告诉大家他心里十分明白这确是一场鼠疫。不过，如果公开承认这件事的话，那肯定得采取一些无情的措施。他也知道使得他的同事们裹足不前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为了使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不管怎样，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妥当。

卡斯特尔说："问题不在于这种方式妥当不妥当，重要的是它能叫人开动脑筋。"

大家见里厄一言不发，于是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种伤寒性的寒热，但是伴有腹股沟腺炎和呕吐。我做过腹股沟肿块切开手术，并送化验室去进行过化验。化验室认为已找到鼠疫特有的粗短形杆菌。不过我要补充说明，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不符合通常对其形态的描述。"

里夏尔强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斟酌一下不马上作出结论，有一批化验已进行了几天，至少要等结果出来了再说。

沉默片刻后，里厄说道："可是当一种细菌能在三天内使脾脏肿大四倍，使肠系膜神经节增大到象桔子般大小，并具有象糊状物那样的质地，这就不容许我们继续斟酌下去了。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如果听任疾病按照这个速度蔓延开去而不加制止，那要不了两个月，城内居民就有可能死去一半。因此你们管它叫鼠疫也罢，发育热也罢，关系不大，重要的倒是你们得设法不要让疫病引起城中一半居民的死亡。"

里夏尔的意见是决不能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何况疾病是否传染尚未证实，因为病人的亲属都还安然无恙。

"但是其他人中间也有死的，"里厄提醒大家说，"当然，疫

病的传染性从来也不是绝对的，否则的话，那就会出现死亡数字无限增长，人口会突然迅速减少的现象了。这不是把情况说得太严重的问题，而是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罢了。”

然而，里夏尔认为要把问题归纳一下，他提醒大家说，如果疫病不自行停止蔓延的话，那就有必要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才能制止。但要做到这点，又必须正式承认这是一场鼠疫，而这事至今还不能绝对肯定，因此需要考虑。

里厄则坚持说：“不用考虑法律规定的这些措施是否严厉，要考虑的倒是为了使城里半数居民免于死亡，这些措施是否必要。余下的是行政方面的事情，而正好我们的制度规定要有一位省长专门来解决此类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即使我们不确认这是鼠疫的话，它照样会夺去半数居民的生命，”里厄说。

里夏尔激动地插嘴说：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这是鼠疫，他有关征候群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

里厄回答说他并没有描述过征候群，他不过叙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所看到的，就是腹股沟腺炎、斑点、带谵语的高烧，和四十八小时内死亡。他问道：“里夏尔先生是否能担保即使不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这场瘟疫也会停止蔓延呢？”

里夏尔踌躇不决，注视着里厄说：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的看法，您肯定这是一场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您的见解大概是，即使这不是鼠疫，也要采取规

定在鼠疫发生时适用的防疫措施吧。”

“如果一定要我有个看法，那么这就是我的看法。”

医生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里夏尔说：

“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来，就当作鼠疫来处理吧。”

他的这种说法博得大家热烈的赞同。

“我亲爱的同行，这也是您的意见，是吗？”里夏尔问。

“词句如何，关系不大，”里厄说。“我们要讲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根据半城人命决不会遭殃这样的假定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因为如果这样做，到头来半城的人命就恐怕真的会送掉。”

里厄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离开了会场。过了一些时候，里厄到了那散发着油煎食物香味和便溺臭味的郊区，一个垂死的妇人在惨叫，胯间血淋淋的，她回过头来望着他。

第二天，高烧症又有了些发展，甚至见了报，不过，报道的方式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又过了一天，里厄在城内最不显眼的角落里看到省府匆忙地叫人张贴的小小白色布告。从这种布告中很难看出当局正视事实的态度，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看来是为了迎合有人不想惊动舆论的愿望。省府决定的开场白宣称在奥兰地区发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是否会传染还不能确定。这些病例的特征尚未达到令人真正担忧的程度，相信市民是会保持镇静的。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大家都能理解这点——省长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纯为防止任何瘟疫的威胁，市民应予理解和照办。省长完全相信能得到市民的通力合作。

布告接着开列采取的全部措施，其中包括在下水道中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以及对用水进行严格的检查等。布告要求居民们保持最大限度的清洁卫生，还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医务所去。此外，规定病人家属必须申报医生的诊断结果，并同意把病人送医院特设病房进行隔离。这些病房具有特殊设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疗效。另有几条补充条例规定病人房间和运输车辆必须进行消毒等事项。布告最后要求患者家属接受卫生检查。

里厄医生猛然一转身离开布告处，往诊所走去。正在等着他的约瑟夫·格朗一见到了他便又举起了双手。

里厄说："是，我知道，数字上升了。"

前一天晚上，市内有十来个病人死去。医生对格朗说他可能在晚上和他见面，因为他要去访问科塔尔。

“您做得对，”格朗说，“您这样对他会有好处的，因为我发觉他变了。”

“怎么了？”

“他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以前他不这样吗？”

格朗犹豫起来。他不能说科塔尔以前没有礼貌，这样讲法可能不正确。这是个不开朗、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姿态有些象头野猪。呆在自己屋子里，在一个小饭馆里进餐，外出时行踪诡秘，这就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情况。他的公开身份是推销各种酒的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总是有两三个人来看他，大概是他的顾客。晚上，他有时也到他家对面的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位公务员甚至注意到科塔尔似乎比较爱看强盗片。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代理商都表现得性情孤僻而多疑。

根据格朗的看法，这一切都大有改变，他说：

“不知怎么说好，反正我的印象是，不知对不对，他在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想同大家厮混在一起。他现在常常同我说话，常邀我一起出去，我不好意思老是拒绝他。再说他也引起我的关心，总之，我救过他的命。”

自从自杀事件发生以来，就再也没有人来看过科塔尔。不论在路上或在他的供应商那里，他到处博取人们的好感。他从未用过那么和气的口吻同食品杂货店老板聊天，也从未有过那么大的兴趣去听一个女烟商讲话。

格朗说：“这个女烟商是一条十足的毒蛇。我曾告诉过科塔尔，但是他却说我错了，应当看到人家也有好的方面。”

也有这么两三回，科塔尔请格朗到城中高级饭店和咖啡馆

去，他已开始涉足那些场所。

“那儿挺不错的，”他说，“而且在那里，周围的人都不坏。”

格朗注意到那些地方的服务人员都对这位代理商招待得特别周到，当他发现科塔尔在给小帐方面显得特别大方时，他懂得了其中道理。科塔尔对于人家回报他的殷勤显得十分领情。有一天，餐厅服务员领班送他到门口并且帮助他穿上大衣时，他曾对格朗说：

“这是一个好伙计，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说：

“这个……证明我不是一个坏人。”

此外，他有时会脾气突变。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稍稍怠慢了他一点，他回家时异乎寻常地火冒三丈，反复谩骂：

“这个混蛋，他跟别人一样都得了帐！”

“别人是哪些人？”

“所有其他的人。”

格朗还在女烟商那里见到一幕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正起劲地谈着话，那妇人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妇人说：

“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才能让好人松口气。”

可是她的话不得不突然中断，因为科塔尔突然神色大变，连招呼也不打，就冲出了店门。格朗和女烟商看着他跑掉，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格朗又向里厄描述科塔尔其他方面的性情变化。科塔尔的思想过去一向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大鱼总是吃小鱼的”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最近一

段时期以来，他只买奥兰正统派思想的报纸，而且就在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阅读，人们简直会说他是有点故意做给人看的。还有一次，在他病愈起床后没几天，当格朗要上邮局去的时候，科塔尔请他代劳给他一位关系疏远的姐姐汇去一百法郎的月规钱。但是当格朗要走的时候，他又关照说：

“给她汇上二百法郎吧，这样可以叫她喜出望外。她认为我从来不想到她，而事实上我是十分惦记她的。”

他同格朗还有过一段奇特的对话。他对格朗每晚从事的一点工作感到好奇，问过格朗，想要知道底细，格朗不得不告诉他。

“好啊，您在写书，”科塔尔说。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比写书更复杂些！”

“啊！”科塔尔惊叹了一声，又说，“我真想能象您一样。”

格朗露出惊异的神情，于是科塔尔结结巴巴地说，当上一个艺术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何以见得？”格朗问道。

“因为一个艺术家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许多地方人家都会让他三分。”

看布告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我看他也不过是和别人一样，已被老鼠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罢了。再不然就是，他可能也害怕得高烧症。”

格朗答道：

“我却不信，医生，假使您愿意知道我的看法……”

外面灭鼠的车子在窗下经过，排气声大得骇人。里厄沉默不语，直到对方能听到他的话时才漫不经心地问那位公务员的看法。格朗则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

“这是个心有内疚的人。”

医生耸耸肩膀。正象警察分局局长所说的那样，还有别的更要紧的事要做。

午后，里厄和卡斯特尔作了一次交谈。血清仍未运到。

里厄问道："不过这种血清是否管用？这种杆菌有些古怪。"

"哦！"卡斯特尔说，"我倒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生物的样子总是有些独特，但终究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不过是您的假定。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当然，这是我的假定。不过大家都这样认为。"

在这一天中间，每当医生想起鼠疫，就会感到脑袋微微发胀，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也害怕起来了。他两次走进顾客很多的咖啡馆，他也跟科塔尔一样需要人们的热情。里厄知道这样做是可笑的，但是这倒能提醒他曾答应过去看这个代理商的事。

傍晚，医生看到科塔尔坐在饭厅的桌子前。他进去的时候，看到在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着的侦探小说，但是天色已经很暗，看来，在夜色朦胧中很难看书。比较可能的是，科塔尔在一分钟前坐在昏暗中沉思。里厄问他身体可好。科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唠唠叨叨地说，他身体不坏，不过要是能保证没有人来打扰他，身体还会更好些。里厄劝告他说，一个人不能老是孤独地生活。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专门找你麻烦的人。"

里厄没作声。

"请注意，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我刚才正在看这本小说，里面叙述一个倒霉的家伙在一个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却蒙在鼓里。大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写入档案。您认为这是公正的吗？您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

吗？”

“这倒不能一概而论，”里厄说，“不错，从某一方面说来，他们完全没有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您不应长期与世隔绝，该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象恼火了，说他是经常出去走动的，有必要的话，整个区的人都能为他证明。甚至在本区外，认识他的人也不少。

“您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他是我的朋友。”

室内光线越来越暗。郊区街道渐渐热闹起来。路灯一亮，外面传来一阵低低的、轻松的欢呼声。里厄走上阳台，科塔尔也跟了出来。跟城里寻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各区吹来，传来了喃喃低语，送来了烤肉的香味，吵吵嚷嚷的年轻人拥到了街上，渐渐地街上到处都是由于感到自己轻松而欢乐的人们的嘈杂声，这声音随风飘来，夹杂着一股芬芳的气息。黑夜中，瞧不见的轮船发出响亮的鸣笛声，从海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了喧闹声，这是里厄往日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时刻，今天由于他所获知的一切情况的影响，这时刻却似乎使他感到压抑。

他对科塔尔说：“可以开灯了吧？”

灯光一亮，这个小矮个儿眨巴着眼，瞧着里厄。

“请告诉我，医生，假使我得了病，您是否将收我进医院到您的科里治疗？”

“为什么不呢？”

科塔尔又问是否有过在诊所里或医院里逮捕人的情况。里厄回答说有过这种事例，但是这一切要根据病人的病情而定。

科塔尔说：“我呀，我对您是信任的。”

接着他问医生是否可以让他搭他的车子到市里去。

在市中心区，街上的行人已较稀少，灯光也寥若晨星，孩

子们还在门口玩耍。医生在科塔尔的要求下，把车子停在一伙孩子的面前。他们在玩跳房子游戏，边玩边大声叫嚷。其中一个黑色的头发梳得很平伏、头路笔直、但面孔却很脏的孩子用带着威胁性的炯炯的目光瞅着里厄。医生不去看他。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同医生握手道别。他讲话嗓音嘶哑，发音困难，他一连回头向身后望了两三次，说：

“大家都在谈论鼠疫，是否真有此事，医生？”

“人们一直在讲，这并不奇怪，”里厄说。

“您说得对。一旦有十来个人丧命，那就末日来临了。这恐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发动机已开动，里厄的手已搭在变速操纵杆上准备开车。他又重新看看一直以严肃而平静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孩子。孩子忽然向他咧嘴一笑。

“那末我们希望些什么呢？”里厄问，一边朝着孩子微笑着。

突然，科塔尔一把抓着车门，用带着呜咽而狂怒的声音呼喊：“希望来一次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说罢，掉头就跑掉了。

地震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天满城奔走，忙着跟病人家属交谈或直接找病人谈话。里厄自行医以来，从未感到他的职业对他有过这样大的压力。直到现在，病人们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完全信任他。可是现在医生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愿讲真话，并且带着惊恐、不信任的神色，对他们的病情真相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不习惯对付的斗争。晚上十点光景，里厄驱车到最后一个病人——老气喘病患者的门前时，他已累得难以从车座中爬起身来，就停留了一下，望望昏暗的街头和漆黑的天空中忽隐忽现的星星。

老气喘病患者坐在床上，气好象顺了一点，正在数着鹰嘴豆，从一只锅中拿出来，放到另一只锅里。看见医生进来，高

兴地招呼。

“怎么啦，医生，”他说，“是霍乱吗？”

“从哪里听说的？”

“在报纸上看到，无线电广播也这样说。”

“不，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讲，”老头十分激动地说，“那些头头们太会夸张了，嗯？”

“不要听人家瞎说，”医生说。

他看过了老头儿的病，就在这间寒酸的饭厅当中坐了一会儿。不错，他害怕，他知道明天一早市郊有十来个患腹股沟腺炎、绻缩着身子的病人在等他。经施行腹股沟腺切开手术，仅有两三例可以有所好转，大多数得送医院，而他明白医院对穷人说来意味着什么。有一个病人的妻子对他说过：“我不要他给他们当试验品。”他不会给他们当试验品，只不过一死了事罢了。十分清楚，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至于“特别配备”的病房是什么模样，医生也心中有数：这是两所把别的病人仓促地搬走后空出来的楼房，窗门缝隙已经堵塞，楼房四周用防疫警戒线加以隔离。如果瘟疫不自行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所设想的这些办法看来是难以奏效的。

然而，晚上发表的官方公报仍很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声称，省府的措施已被接受，群众情绪平静，并且已有三十来个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特别病房里有几张病床？”

“八十张。”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是胆小，还有其他更多的人来不及申报。”

“埋葬尸体有人监督吗？”

“没有，我已经打电话给里夏尔，告诉他应该采取完善措施，而不是专讲空话，还应该对瘟疫建立起切实的防止蔓延的壁垒，否则干脆什么也不要做。”

“他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无能为力。我看数字还会上升。”

三天内，两所病房就住满了。里夏尔听说快要把一所学校出空，以筹办一所辅助性医院。里厄在等待防疫疫苗，并为病人开刀排脓。卡斯特尔则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从古书堆中找资料。他的结论是：

“老鼠现在是死于鼠疫或死于一种同鼠疫十分相象的疫病。这些老鼠散播了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防止，这些跳蚤传播疫病的速度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里厄默然。

这时候天气象是稳定下来了。最近几次大雨后的积水逐渐被太阳晒干。蔚蓝的天际迸射出一道金黄色的阳光，刚开始出现的热浪中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这季节的一切都引人进入宁静的境界。然而在四天中，高烧症有过四次触目惊心的跃进。四天时间，死亡的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到了第四天，一所幼儿园被宣布改为辅助病房。市民们以前还在用相互开玩笑的办法来继续掩盖内心的忧虑，但现在他们走在街上已显得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个电话，他说：

“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省长说：“我已看到数字，果真是令人担心的。”

“这些数字已不只是令人担心的了，它们已说明了问题。”

“我即将向殖民地政府报告，等候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说：

“命令！恐怕还得想象一番才行！”

“血清呢？”

“本星期内可以运到。”

省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打一个报告向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还写了病人情况，加上数字。当天，有四十个人死亡。据省长说，他要亲自负责自第二天起加强原来的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仍按原计划执行，患者住房必须封闭并加以消毒，患者亲属须进行安全性检疫，病人死亡后的埋葬事宜由市政当局组织安排，具体办法看情况决定。过了一天，飞机运来了血清。这些血清足够供正在治疗中的病人应用，但如疫情有所发展那就不够了。里厄接得回电说血清的应急储备已经提尽，现在已开始制备新的。

这时候，近郊把春意送到了市场。沿着人行道成千上万朵玫瑰花正在卖花人的篮子里萎谢，甜醇的玫瑰花香飘浮全城。表面上一切如常：电车在高峰时间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他的时间则乘客稀少，车子肮脏不堪；塔鲁依旧观察那个矮老头，后者仍然用口水吐猫；格朗每晚照旧回家去干他的神秘的工作；科塔尔还在到处乱转；预审推事奥东先生还是带领他那几只动物来来往往；患气喘病的老头儿照样在搬弄鹰嘴豆。人们依然有时会遇到新闻记者朗贝尔，他态度安详，但只关心自己；到了晚上，街上依旧人群熙攘，电影院门前排着长队。至于疫情，倒好象缓和下来了，几天中只死了十来个人。但不多久，疫情一下子恶化，死亡人数重又直线上升。在死亡记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拍来的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

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在此以前，尽管这些不平常的事件使本城居民感到意外和忧虑，但每个人都能够各就各位照常办理自己的事情，而且看样子这种情况一定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封闭，他们就发觉大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是一锅煮，只有想法适应这种环境。情况就是这样，一种与心上人离别那样的个人感情就在开始几个星期中一变而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还夹杂着一种恐怖之感，这就成了这种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封城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有些母子、有些夫妇和情侣在几天前分手时还只作了暂时离别的打算，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以为过几天、或至多过几个星期肯定又能见面，亲人的别离对他们的日常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因为在省府禁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实际上封城已经开始，而且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在考虑之例。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象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在法令实施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群拥向省府，有的打电话，有的亲自去向官员们申诉情况。情况都同样地值得关心，但又都同样地不可能考虑。说真的，需要经过许多天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处在毫无协商余地的情况中。“通融”、“照顾”、“破格”等词

都已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许可。因为一方面，城市与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联系已全部断绝；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传带病菌。开始时还有些幸运者向城门把关的守卫人员说情，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把信件传递了出去。这还是在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后的开始几天，那时守卫人员被同情心所打动也是自然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守卫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肯再承担这种谁也无法估量其后果的责任。最初还允许同别的城市用长途电话通讯，但结果公用电话处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线路全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有几天全部停止通话。而后又严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诸如死亡、出生和结婚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可通话。剩下的唯一途径是电报。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和情侣，现在只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电报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用尽了，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怆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死心地继续写信，不断想出些办法，希望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到头来终于是一场空。我们所设想的办法有些可能奏效，但是谁也无法判断，因为没有收到对方的回音。一连几星期之久，我们只能重复地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呼吁，这样过了一阵，原先出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内容，试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字句来表示我们艰难的生活。这番固执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这种和墙壁进行的枯燥对话，结果看来还不及电报的规格化的用语顶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没有人能出得了城，于

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让鼠疫发作前出去的人回来。省政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规定回来的人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再次离城。只能进，不能出。这一来，也有些家庭——但为数不多——一心只想与亲人相见，不经慎重考虑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去请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回来。然而那些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地明白过来，他们这样做无异把亲人驱入虎口，于是宁愿忍受别离之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只出现过一个例子，说明人的感情胜过了对惨死的恐惧。但出乎人们意料，这次事例并不涉及一对狂热的爱情凌驾痛苦之上的情侣，而是发生在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尔太太是在发现鼠疫前几天到邻城去的。他们的家庭也并不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模范家庭，作者甚至敢说直到如今，还不能肯定这对夫妇对于他们的结合是否感到满意。但是这次无情而又持续的隔离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彼此分处两地无法生活，而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上述情况是一桩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离别显然要持续到鼠疫被扑灭为止。就我们大家而言，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过，奥兰人的感情是简单的）现在却已改变了面貌。平时最放心对方的丈夫或情人发现自己变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认在爱情问题上轻浮风流的男子也变得忠实不渝起来。平时对住在一起的母亲不加关心的儿子发觉如今脑际经常萦绕着母亲面上的一道皱纹，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忧思和懊悔。这种无情的、彻底的、前途茫茫的分离把我们推入了心烦意乱的境地，使我们成天魂梦萦绕于那离别不久却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筹莫展。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如果换一种环境，我们这些市民会在寻欢作乐、忙忙碌碌之中去寻找排遣。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小城中闲步时，走来走去总是那么几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是前一时期同现在已不在身边的亲人一齐走过的街道。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作者在这里可以肯定他所写的东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当然，这些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车不通的时刻总是会到来，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同亲人的两地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设法安排自己的一切来度过这段时光。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

特别是，全体市民很快就克制住以前养成的推算他们还要分离多久的习惯，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有一些最悲观的人把这一分离的时间推断为六个月，于是他们对这一段时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准备，鼓足勇气接受考验，并竭尽全力来熬过这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可是当他们偶尔遇到一个朋友，或见到报上一则消息，或者头脑中闪过

某种臆测，再不然便是突然变得有远见起来，这时他们就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相信疫病会持续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过一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使他们感到好象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谨慎、回避痛苦和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效果当然不大，他们竭力避免这种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结果连把鼠疫暂且置于脑后、幻想日后与亲人团聚的情景——这种幻想，总的说来，是常有的——也给冲掉了。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象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他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着过去，而感觉到的不过是惆怅。他们真想把同现在所盼望着的亲人以前在一起时能做而未做的事情都补进过去的回忆中去。同时，在他们的囚禁生活中，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印上在外地亲人的影儿，即使在比较愉快的情况下也如此，因为他们当时的实际处境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象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让火车在幻想中通车，让时光在幻想中充满响个不停的门铃声——然而这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这是一种流放，那么大多数的情况是放逐在自己家中。虽然作者比较熟悉的是一般群众的流放生涯，却也不能不

提一提象记者朗贝尔这样一些人的处境。这些人是在旅途中意外地被鼠疫关在城里的，他们既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又远离故乡，因而倍增了他们的别离之愁。在所有感到被流放的人中，他们的感受是最深的，因为虽说在时间引起的烦恼方面，他们也和大家的感受一样，但是他们更多一层空间引起的烦恼——思乡之情。他们时时碰撞在一堵高墙上，它把他们所在的疫区和远在天涯海角的家乡隔离了开来。这些人白天整天地在灰尘飞扬的城内徘徊，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知道的家乡的薄暮和清晨，一些无足轻重的浮光掠影和令人心烦意乱的迹象都能增加他们的苦恼：长空的燕影，黄昏的露珠，或者僻静街道中的一线阳光异彩。这个能为人们排解一切烦恼的外部世界，他们闭上双目不去观望，却沉湎于他们那些过于逼真的幻想，竭力集中思想于一片土地上：在那里两三座小丘，喜爱的树木，几张妇女的脸盘，沐浴于一片光芒之中，构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境界。

最后我们来专门谈谈最耐人寻味的情侣情况。这恐怕也是作者最有资格谈论的问题。这些人受到不少其他烦恼的困扰，其中必须一提的是悔恨情绪。他们目前的处境倒能让他们用一种既激动又客观的眼光来思考他们的情感。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本身的缺陷很少会不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他们发觉对于在外地的亲人的事迹和动作姿态已不能准确地想象出来。他们抱怨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外地的情侣的时间安排，他们责怪自己太轻率，没有去了解这一点，反而装腔作势地认为，对一个在恋爱中的人说来，知道对方的时间安排也不见得就是快乐的源泉。从这时开始，他们就很容易去追溯过去的爱情，并察觉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平时我们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任何爱情都可变得更完美，尽管我们往往毫不赧颜地甘愿让自己的爱

情停留在平庸的水平上，但在回忆之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了。这个打击我们全城的飞来横祸不仅带来令人抱怨叫屈的苦难，而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己造成的痛苦，使我们甘心忍受。这就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及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情形之一。

这样，每个人必须接受独自面对着苍天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这种普遍的得过且过的生活久而久之也许能磨炼人的性格，但目前却已开始使人变得斤斤计较小事的得失。比如说，我们城里的某些人已成了另一种事物的俘虏，他们受天晴天雨的支配。看他们的样子仿佛他们出生第一遭直接受到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露头，他们就显得喜形于色，而一碰到下雨天，那么他们的脸上和精神上就象蒙上一层阴沉的幕帘。仅在几星期前，他们还没有这种脆弱和不合情理的听天由命的心理，因为他们在人前并不是孤独的，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的人在他们的宇宙中还占有一个位置。但从现在起，他们则显然听凭老天爷摆布，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毫无根据地抱着希望。

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邻居来帮助自己，各人都是心事重重地独处一隅。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他会发觉他和谈话对象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讲的确实是他整整几天来思念和痛苦所凝成的语言，他想表达的是长期受到等待和激情煎熬的形象，而另一个却认为他发的只是些老生常谈的牢骚，谈的是那种比比皆是的苦闷，人人都有的伤感。不管回答是善意还是恶意，总和讲话者的意愿相违，因此还是闷声不响为妙。有些人耐不住沉默寡言的苦闷，但又不能和别人推

心置腹，于是只得人云亦云，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聊聊一般的人情来往，社会动态，无非是每天的新闻而已。把最真实的痛苦通过庸俗的套语来表达，这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俘虏们只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看门人的同情或引起听他们讲话的人的兴趣。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管这些流放者的苦恼多么难忍，不管他们那颗空虚的心感到多么沉重，在发生鼠疫的初期，他们却仍可说是一群幸运儿。因为正当全城开始感到恐慌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却都集中在期待中的人儿身上。在全城陷于绝境的时候，爱情的自私心理却保全了他们。他们想到鼠疫，只因为它有把生离变成死别的危险。因此在疫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却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这倒也是好事，而且简直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气概。绝望的心理使他们不感到恐慌，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如说，即使他们中间有人被死神攫走，事情也总是发生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正当他在思想深处和一个影子不绝地喁喁细语时，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一下子被抛到黄泉之下，悠然长眠。他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荫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象：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色，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

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懊丧，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祈祷周——下面还要谈及——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入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

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电影院终于只得将同样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们的收入却也不见减少。

最后再来谈谈咖啡馆的情况。在一座葡萄酒和烧酒贸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这类商品的库存总是可观的。因为咖啡馆倒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的。说实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乐观的言论也到处可闻。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两天，里厄医生从医院出来遇见科塔尔，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说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说：“不错，我身体完全好了。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嗯！严重起来了吧？”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现在它没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将被它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尔讲到他区里的一个食品杂货店大老板囤积居奇，以图厚利。当人家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床底下藏着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鼠疫是不会给钱的。”科塔尔有着一肚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有关鼠疫的传闻。譬如有人说在市中心区，一天早上，一个带有鼠疫症状的男子在高烧中精神错乱，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去，把她紧

紧搂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尔用一种同他语气不相容的和悦的语调说道：“我们大家都将发疯，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约瑟夫·格朗终于向里厄医生倾吐了他的秘密。他见到放在书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过头来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说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格朗说道，“这还是运气。”医生回答说这的确是运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来。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说。

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象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格朗很早就结婚，对象是邻居家的一个贫穷的年轻姑娘。他就是为了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都从未到他们那个区以外的地方去过。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让娜的父母看见那位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点好笑。她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休息时间常常见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视着街景。她母亲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帮着她。她身材长得那么纤细，使格朗每次见她过马路时总是要为她担上几分心：所有车辆一到她面前都成了庞然大物。有一天两人在卖圣诞节礼物的店铺面前走过，她朝着橱窗里陈列的东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后一仰靠住他说：“太美了！”他紧握着她的手腕。这样他们就订了终身。

往后的事，照格朗说，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一忙，爱情也就淡了。由于办公室主任食言，让娜也只得工作了。读者读到这里，应该用些想象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话。劳累的工作助长他随波逐

流、得过且过的思想，他越来越少说话，他也没有能够继续满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爱。一个忙于工作的人，生活在贫穷中，前途逐渐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无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哪里还谈得上爱情？让娜也许已感到痛苦了，但当时她忍着没离开他；人们长期饮着苦酒而不自知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到后来，她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爱过你，但现在我厌倦了……我并不因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为了幸福才找新的开端。"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现在轮到约瑟夫·格朗开始难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开端，正象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他却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地想着她。他本来想写一封信给她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说，"这有困难。对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们相爱时，我们无需说什么话就彼此了解。然而双方的爱情不是永久不变的，有一个时期，我本来可以找些话来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绢擤鼻涕，再擦擦他的胡髭。里厄瞧着他。

"医生，"格朗老头说，"请原谅，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了使我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妻子，告诉她说，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继续当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着她。

封城后过了三个星期，里厄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人在等他。

那人说："我想您认识我吧。"

里厄觉得好象曾见到过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发生前，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而来

讨教过你，”那人说，“我叫雷蒙·朗贝尔。”

“啊，对了！现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说。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来请里厄医生帮忙的。

他接着说：“原谅我的冒昧，但是在这城中我没有熟识的人，我们报馆的通讯员不幸是个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辉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象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为了结束谈话，他试图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贝尔只能耸耸肩膀。这时他们已走到市区的中心。

"真是糊涂话，医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来就是为着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能否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个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

钮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象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头望着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讲

大道理，不过他讲的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末照您说我只好想别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气的口吻说，“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说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事情与他无关。

朗贝尔突然发作了，大声说：“不，这事与您有关。我来找您就是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在这次决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当时我想过，您这个参加系铃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铃。但是您却无动于衷，您根本不顾任何人。您没有为分居两地的人着想。”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他确是不想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了，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

里厄仿佛从分心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得了，”他说，“不光是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断语。但是您发火总是不对的。假使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当然高兴之至。但问题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徇情。”

朗贝尔忍不住大摇其头。

“不错，发火是我错。而且我这样也浪费掉您不少时间。”

里厄要求朗贝尔随时把进行的结果告诉他，并且请这位记者不要对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会有一项计划让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朗贝尔突然显得困惑不安起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点。”

接着他又犹豫起来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象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受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入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断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运走。于是又得开始讲抽象的大道理，困难的场面也开始出现，因为病人家属知道，只有这个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见到。“可怜可怜吧！医生！”洛雷太太说，她是在塔鲁

所住的旅馆中工作的女佣的母亲。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他必须打电话。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钟声。起初，邻居们推窗望望，后来就抢着把窗关上。接下来便是挣扎、啼哭、劝说，总之是些抽象的观念。在这些被发烧和恐慌搞得乱哄哄的寓所里，出现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但是病人还是被带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的情况都象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样：当他走进墙上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时，病人的母亲欲笑不笑地来迎接他说：

“我想这不会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发烧吧？”

他掀开了毯子和衬衣，默默地观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那母亲看着女儿的腿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母亲们在露出的腹部所显示的致命的症状前号哭，脸上带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们紧紧抓住，无济于事的话、许诺、哭泣，一片混乱；每天晚上，救护车的警钟声引起了无济于事的、情绪激动和痛苦的场面，晚上出诊时间长，而且遇到的情况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这种相同的场面不断地重复出现外，再也盼不到出现任何别的了。不错，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样地一成不变，只有一样东西也许是在起着变化，那就是

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前深深感觉到了这点：他两眼盯着朗贝尔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馆大门，觉察到那难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袭到他整个心灵。

几个星期的令人精疲力尽的生活过去了，每晚暮色降临后全城的人照旧拥上街头在原地转圈，这时，里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气去克制同情心。当人们觉得同情也无补于事后，对它也就厌倦了。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任务，因而借以自慰。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里厄回家时茫然的目光，感到难受，同时也因里厄将他唯一能得到的母爱的温暖漠然置之而深为痛心。要同抽象观念作斗争，就不得不象他一样。但这又怎样能使朗贝尔明白这一点呢？对朗贝尔说来，抽象观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驰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这位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抽象观念比幸福更要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日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每人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阴沉险恶的斗争，在新的局面下展开，构成本城在这一冗长时期中的整个活动，而里厄则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斗争。

然而有的人看到的是抽象的观念，有的人看到的却是事实。鼠疫发生后一个月，情势变得令人沮丧，首先是由于疫情再次猖獗，其次是因为帕纳卢神甫作了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这位神甫就是在米歇尔老头儿初发病时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教士。帕纳卢神甫由于为奥兰地理协会的杂志经常写文章而声誉卓著，在碑铭的复原工作方面是个权威。他曾在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上作过一系列的报告，拥有的听众比这方面的专家所拥有的还要众多。他在讲演时热烈捍卫严格的天主教教义，对现代的放浪主义和过去几世纪的愚昧主义同样不妥协，毫无保留地向听众灌输严酷的大道理，由此而享有盛誉。

在鼠疫流行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城内的教会当局决定采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与鼠疫作斗争：组织一个星期的集体祈祷。这种群众性的表示虔诚的宗教活动的结尾是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向为照料疫病患者而献身的圣人——圣罗克——祈祷。借这一机会，人们要求帕纳卢神甫讲话。这位神甫为此在半个月前已从关于圣奥古斯坦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在这方面他在所属修会中具有特殊的声望。这位天性激烈而热情的神甫接受了人们的要求，毅然担当了这一任务。在这次讲道之前，全市很早就已谈开了。这次讲道也可算是这一时期中的一件大事。

参加这一星期活动的群众很多。这倒不是因为奥兰的居民平时对宗教特别虔诚，比如说在星期日早上海浴浴场就一向是

同教堂中的弥撒唱对台戏的，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突然受到感召而皈依宗教，而是一方面由于封城，港口封锁，不可能再到海滨去游泳，另一方面，他们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心境之中，他们的灵魂深处虽然尚未真正意识到那些使他们遭受打击的意外事件的真实性，但是他们显然感到事情是有点不同往常了。有不少人却总在希望着瘟疫即将过去，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安然无恙。所以他们还不觉得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对他们来讲，鼠疫不过是一个讨厌的不速之客，既来了也总有一天会走的。他们虽然害怕，但并未绝望。把鼠疫看作他们生活方式，忘却在发生这场瘟疫前的生活，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而言之，他们处于期待中。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同对待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既不是无所谓，也不太热情。用"客观"一词来形容是较为恰当的。参加祈祷周的大多数人的想法，就象一个忠实信徒对里厄医生所说的那样："不管怎样，反正这没有坏处。"塔鲁也在笔记中写着：中国人在类似情况下将敲锣打鼓赶瘟神。但他指出：事实上敲锣打鼓究竟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是根本无法知道的。接下来他只是加上了这么两句话：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点不弄清楚，谈论其他任何想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不管怎么说，城里的教堂在整整一星期中几乎挤满了善男信女。头几天，不少居民还停留在门廊前栽着棕榈树和石榴树的园子里，倾听着一直传到街头、波涛般起伏的祈求和祷告声。不久，这些旁听者在别人的榜样鼓舞下，也渐渐地进入教堂，他们胆怯的声音混杂在教堂内的答祷声中。到了星期日，大群的人拥进教堂正殿，连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和台阶的最后几级上也挤满了人。前一天开始，天色阴沉，大雨倾盆，那些

站在外面的人撑着雨伞，教堂里飘浮着一股炉香和湿衣服的气味，这时，帕纳卢神甫登上了讲道台。

他中等身材，相当粗壮，当他靠着讲道台的栏杆，两只粗大的手紧握木栏的时候，人们只见一个厚实的乌黑身形，上面是两块红得发亮的面颊和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声音宏亮，激动，传送得很远。他面对望弥撒的信徒，开始讲了一句激烈的、一字一顿的话："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从教堂内直到广场上，信徒们立即一阵骚动。

神甫接下来讲的话，在逻辑上，似乎和这个扣人心弦的开场白不相衔接。然而正是听了这段话市民们方才明白，神甫象猛击了一棍似的，用巧妙的演讲技巧一下子就突出了他整个讲道的主题思想。帕纳卢紧接着他的第一句话，诵读了《圣经》的《出埃及记》中关于埃及发生瘟疫的原文，接下去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灾难是为了打击天主的敌人。法老①违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点你们要细想一番。跪下吧。"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这最后一句话讲出口时，全场鸦雀无声，暴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更增加了教堂内肃静的气氛，话音显得分外嘹亮，有几个听道的人，经过片刻的犹豫，从他们的座位上滑下，跪倒在跪凳上。其他人认为也应该效法，渐渐地在一片椅子的嘎嘎声中，全体听道的人都跪了下来。这时帕纳卢重新直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越来越重的语气接着说："如果说今天鼠疫降到了你们头上，那是因为你们考虑问题的时刻到了。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在人间这座

① 古埃及君王称号。

巨大无边的粮仓里，毫不容情的灾难打着人类的麦子直到麦粒从麦秆脱下为止。麦秆总是比麦粒多，受上天召唤的人总是多于得救者，这种不幸并不是天主的意志。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成为罪恶的渊薮，很久以来，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宽容而存在。人们以为只要能忏悔，什么罪过都可以犯。有了忏悔，每个人都有恃无恐，到时候，肯定会起忏悔心，那就行了。从现在起到那时的一段时间里，最容易做的就是因循下去，得过且过，余下的事，仁慈的天主自会安排。好吧，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天主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以慈悲的目光俯视着这城市里的人们，已不耐烦再等了，在他永久的期待中已失去了信心，他已掉转脸去了。失去了天主的灵光，我们只落得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中。”

教堂里有一个人象一匹不耐烦的马似地长吁了一口气。神甫略一停顿，继续说下去，语气比较低沉了：“在《金色的传说》①中说，在翁伯托国王时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受到一场鼠疫的浩劫，活着的人几乎不够埋葬死者。这次鼠疫在罗马和帕维亚地区尤其猖獗。当时有一位善神显圣，命令一个手拿打猎用长矛的恶神对着房屋挥打，他在一所房屋上打多少下，这所屋子里就得死多少人。”

帕纳卢朝着教堂前广场的方向伸开两条短短的胳臂，好象指着飘摇的雨幕后的什么东西似的，他有力地说：“弟兄们，现在就是那场致人死命的追猎在我们的街道上进行着。请看，这位象魔王一样神气、凶神一样威武的瘟神，站在你们屋顶的上空，右手举着红色打猎用长矛，左手指着你们的一所房屋。也许就在此刻，他正指向你们的门口，那长矛敲在房屋的木板上

① 意大利圣徒传记作家雅克·德沃拉季内于公元1260年左右所著的圣徒传。

砰然作响。就在此刻，鼠疫走进你们的家，坐在你们的房间里等着你们回家。它在那里，不慌不忙，全神贯注，不怕你们跑掉，就象世间的因果报应一样万无一失。它只要向你们一伸手，那末世界上任何力量，你们要明白，甚至徒劳无功的人类科学也不能使你们免受其难。结果你们在那痛苦的血淋淋的打谷场上受到了敲打，和麦秆一起被扔掉。”

讲到这里，神甫更进一步详述这场灾难的悲哀景象。他描绘那根巨大的长矛在城市上空挥舞，随心所欲地打击一下，重又鲜血淋漓地举起，然后把鲜血和人类的痛苦一起散播下去，“作为来日收获真理的种子。”

帕纳卢神甫讲完了这一长段话，停顿了一下，他的头发披在额前，浑身颤抖着，扶着讲道台的双手使讲道台也抖动起来。接着他用低哑的嗓子带着谴责的语气说：“不错，思考的时候到了。你们以为每星期日来朝拜一次天主就够了，其余日子可以自由自在了。你们想，做些跪拜动作就可以抵消你们罪恶的无所谓态度了。但是天主是需要热情对待的，这种一曝十寒的态度是不足以报答他无边的深情的。他要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说真的，这是爱的唯一方式。现在他已等得失去耐心，而让灾难降临在你们的头上，象降在有史以来一切有罪的城市头上那样。现在你们领略到什么是罪恶，正象该隐①父子、大洪水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②、法老和约伯③以及一切受诅咒的人们所经历过的那样。自从这个城市把你们和灾难一起团团围困起来那天起，你们象上述所有的

① 《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之子，曾杀死他的兄弟。

② 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因人民犯罪而焚于天火。

③ 《圣经》中受上帝考验的人。

人一样对生灵和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你们现在明白了，终于要回到根本问题上来了。”

一股潮湿的风刮进教堂正殿，大蜡烛的火焰被吹歪，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帕纳卢在浓烈的蜡烛味、咳嗽声和打喷嚏声中用一种非常高明而巧妙的技巧继续发表他的高论。他以平静的音调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揣测我的讲话究竟是什么用意。我要把你们引向真理，尽管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却要告诉你们应当感到欣慰。现在已不再是用一些劝告，用一只友爱的手来劝人为善的时候。今天真理就是命令，而得救的道路就是红色长矛向你们指出的和把你们向那边推过去的那条路。弟兄们，上天的仁慈就在这里显示无遗，他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好两个方面，既有善，也有恶，既有忿怒，也有怜悯，既有鼠疫，也有得救。这场鼠疫，它既能把你们置于死地，也能超度你们，向你们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①的教友们把鼠疫看作一种上天所赐的获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没有得病的人用鼠疫病人用过的被单裹在身上以求必死。当然，这种要求得救的过激做法并不值得推荐。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操之过急的行为，非常近乎傲慢。我们不应当比天主更性急，一切企图加速天主早已安排好、不可动摇的命令的行为都会导致走向异端。但是这一事例至少也有它的教育意义：它使我们更有远见，能察觉到隐藏在痛苦深处的这道美妙的永生之光。这道光照亮了通向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显示了万无一失、能变恶为善的上天意志。今天这道光又一次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弟兄们，我今天给你们

① 即埃塞俄比亚。

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希望你们从这里得到的不仅是谴责你们的话，而且还有使你们心境平静的福音。”

讲到这里，人们听出帕纳卢的话已结束。外面的雨也停了，从露出太阳但尚有雨意的天空，一道淡淡的阳光泻到了广场上。街上传来了嘈杂的人声，辘辘的车轮声，城市已苏醒过来，各种喧闹声又传入耳中。听道者们在一片悄悄的骚动声中轻轻地收起他们的用品。这时神甫重又发言，他说，在阐明了鼠疫的天意根源和这一灾难的惩罚性质后，他的话已经讲完。他不想在这么悲惨的问题上不合时宜地用漂亮的词句来修饰他的结论。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对大家讲得一清二楚。他只提醒人们说，在马赛发生大鼠疫时，历史学者马蒂厄·马雷曾抱怨当时陷身于既无助又无望的地狱之中。然而马蒂厄·马雷是瞎了眼！恰恰相反，帕纳卢神甫认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今天更体会到天主赐予大家的帮助和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

这次布道对我们这里的人是否有作用，还很难说。预审推事奥东对里厄医生宣称，帕纳卢神甫的演讲是“绝对驳不倒的”。但大家的意见并不都是如此肯定的。然而这次布道使某些人在至今还是模糊的概念上稍为清楚了一些，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因犯了不知什么罪恶而被判处一种无法想象的监禁。有些人仍继续他们的平凡生活，设法适应这种禁闭生涯；另一些人则截然不同，一心只想逃出这个灾难的牢狱。

开始时，人们对同外界隔绝一事还能忍受，就象他们忍受任何暂时性的麻烦一样，反正只是打乱了他们某些生活习惯而已。但是突然间他们发觉这是一种非法监禁的生活：置身于苍穹之下，开始承受夏日的郁热。这时，他们模糊地感到这种囚禁的生活已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有时一到傍晚，凉爽的空气使他们精力恢复，这时，他们往往会干出绝望的事来。

最初，不知是否由于巧合，就是从这个星期日起，城中的恐惧心理的普遍和深刻的程度，足以使人能猜想到这个城里的人开始真正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城市的气氛有点变了。但是说真的，究竟是气氛变了还是心理变了，这倒是个问题。

布道后没几天，里厄同格朗在一起走向市郊的路上谈论着这一事件。里厄在黑夜中撞到一个在路上摇摇摆摆、不往前走的汉子身上。这时，城中亮得越来越迟的路灯突然大放光明。他们身后的路灯一下子照亮了这个人，他闭着眼睛，无声地笑

着，因此而绷得紧紧的苍白脸庞上流着大滴的汗珠。他们绕了过去。

“这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刚挽住他的手臂，发觉这位职员神经紧张，浑身打着哆嗦。

“要不了多久，这座城中就只有一些疯子了，”里厄说。

他已累得嗓子冒烟了。

“喝点东西吧。”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那里只有柜台上的一盏灯亮着，人们在昏暗的淡红色光线下轻声地交谈着，这个样子讲话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里厄惊异地看到格朗向柜台上要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并且说这杯酒很凶。过后他就想走了。到了外面，里厄好象听到黑夜中到处都是呻吟声。在路灯上面，从黑暗的夜空某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呼啸声，使他联想起那无形的瘟神正在一刻不停地搅动着炎热的空气。

“还好，还好，”格朗说。

里厄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还好，”他说，“我有我的工作。”

“不错，”里厄说，“这是您的一个有利条件。”

里厄决定不去听那呼啸声，问格朗对他的工作是否满意。

“反正我认为我搞得很顺当。”

“还要搞很长时间吗？”

格朗显得很兴奋，酒意已出现在他的话音里。

“我也不知道。但问题不在这儿，医生，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里厄在黑暗里猜到他正在挥舞着手臂，好象他准备好的什么话突然来到了嘴边，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

“您知道，医生，我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者手中的时候，他看后站起身来向他的助手们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这突如其来的说明使里厄感到意外，他好象看到他这位朋友把手举到头上，接着又把手臂一挥，做出脱帽的动作。上空传来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越来越响了。

“对，”格朗说道，“应该做到十全十美为止。”

里厄虽然对文学界的习惯知道得不多，但根据他的印象，事情做起来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出版者在办公室里大概是不会戴帽的。但是，事情也很难说，里厄认为还是不说为妙。他不由自主地又倾听起鼠疫的神秘呼啸声来。这时他们已走近格朗所住的区里，因那里的地势比较高，一阵微风吹来，身上感到凉快，同时也吹走了城中所有的喧闹声。格朗还在不断地讲，但里厄并没有完全听见这位老好人在说些什么，只明白他所说的那本书页数已写了不少，然而这位作者为了使作品达到完善的地步，真是绞尽了脑汁。“为了一个字，往往整晚整晚，整个星期整个星期的时间花上去……有时只是为了一个连接词。”讲到这里，格朗停下来抓住医生大衣上的一颗纽扣，一连串的话音从他那张缺了牙的嘴中含糊不清地吐了出来。

“医生，您总知道，必要的话，要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不算太难。要在‘而且’和‘接着’之间进行挑选，这已比较不容易了。如果要从‘接着’和‘随后’之间决定用哪一个，那就更难了。但是确实还有比这更难的，就是‘而且’该用不该用的问题。”

“不错，”里厄说，“我明白。”

他说罢又往前走。另一个显得不好意思，又追了上来。

“请您原谅，”他嗫嚅着说，“今晚我也不知怎么搞的。”

里厄轻轻地拍拍格朗的肩膀，说愿意帮助他，并说对他所讲的很感兴趣。对方的情绪略略平静了一些，在走到他家门前时，他犹豫了一下后就邀请里厄上他家去坐一坐。里厄接受了邀请。

格朗请里厄坐在餐室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着稿纸，稿纸上字体写得很小，还划着一道道涂改的杠子。

“对，就是这个，”格朗冲着里厄探询的目光回答说。“你要喝些东西吗？我这里有点酒。”

里厄谢绝了。他看看稿纸。

“请别看了，”格朗说，“这是我的初稿，它使我头痛，头痛得要命。”

他自己也在注视所有这些稿纸。他的手似乎无法抗拒地被其中一张所吸引住，把它拿了起来，隔着没有罩子的灯泡照着。纸在他手中颤动着。里厄注意到职员的额上湿漉漉的。

“坐下吧，”里厄说，“请念给我听。”

那职员向里厄看了一眼，微笑着，显出非常领情的样子。

“好，”他说，“我也确实很想这样做。”

他一直看着稿纸，略等一会儿，然后坐下。同时，里厄在注意聆听城中传来的模糊的嗡嗡声，好象是在回答鼠疫的呼啸。就在这个时候，里厄对展现在他脚下的城市，对被这个城市禁闭的人们以及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嚎叫声都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格朗提高了他低沉的嗓门念道：“在五月份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 ①

① 原文为“栗色”。下文中，格朗因未解“栗色”的词义，误以为“栗色牝马”系马的一种品种，因而在修改句子时，将“富丽”改为“黑色”，闹了笑话。故此处模拟作者的用词，改译为“枣骝”，使译文与下文配合。

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格朗念完这一句后，两人都不作声，这时他们又听到了这苦难城市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格朗放下了稿纸，继续对它凝视着。过了一会，他抬头问里厄：

“您觉得怎么样？”

里厄说这个开头使他渴望知道下文，而对方却兴奋地说这个观点不对头。他用手掌拍拍他的稿纸说：

“这里只能写出个大概。如果我能把我所想象的情景完美无缺的描绘出来，如果我的句子能和这个骑马小跑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末，其余部分就更顺利了，特别是一开始想象力就非常丰富，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是要做到这点，他的工作还着实不少。他决不同意就这样去付印，因为尽管这个句子有时令他感到满意，他也明白它还不能完全同实际情况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流利的笔调使它或多或少近于陈词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到这里，窗外传来人们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离座站起身来。

“您将会看到我搞出些名堂来，”格朗说着，把脸掉过来望着窗口，又加上一句：“当这一切完工的时候。”

急促的奔跑声又传来了，里厄已下楼走到街上，有两个人从他面前跑过。看来，他们是在向城门口奔去。我们这个城里有些人被炎热的天气和鼠疫搞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打算硬来，试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还有象朗贝尔那样的一些人也想逃离这个新出现的恐慌的气氛，不过他们比较固执、比较巧妙，但并不更得手些。朗贝尔先是不断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活动。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要求他会周旋，善应付。他走访过很多官员和其他的人，这些人的资望向来是人所公认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这种资望却毫无用处。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了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极不愿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入形式主义者这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

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作出决定；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地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得多的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这位记者就这样一处接着一处地走访，搞得精疲力尽。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凳上坐等，面对着劝人购买免税国库证券和动员人们参加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招贴，又由于他经常走进办公室，里面有哪几张面孔，有些什么文件夹和档案架，不用看，一猜就着，因此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他已一清二楚。正象朗贝尔带些辛酸味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一切也有好处，那就是使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感觉不到鼠疫的蔓延。何况这样还可以使日子打发得快些，而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里厄没法否认这一事实，但觉得这未免过于概括了一点。

有过这么一次，朗贝尔曾产生过希望。他接到过省府发下的一份情况调查表，要求他据实填写，内容有身份、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源以及个人经历之类。这给他的印象是对一些可能被送回原地的人们的一次调查。从某个办公室得到的一些含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经过几次明确的探询后，终于找到了寄报表的单位，他们这才对他说，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什么需要？”朗贝尔问。

他们就向他明确指出，这是准备在他得了鼠疫而死亡时，一方面便于通知他的家属，另一方面可研究是否应由市府负担

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亲属来付清帐目。当然，这证明他与期待着与他重逢的人并没有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不过，这并不带来任何安慰。更值得注意的事——朗贝尔当然也注意到了——倒是一个单位在灾情最严重的情况下能以什么方式继续服务，并且不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指示，而是主动为了未来的工作才这样做，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象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入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

朗贝尔有时还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的时间。车站的月台是不准进去的，但与外边相通的候车室则敞开着，逢到大热天乞

丐有时就会到这里来，因为这儿阴凉。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先的行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标语牌和铁路警局的条例，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大厅很阴暗，一只有好几个月没有生过火的旧生铁火炉还在那里，周围地上满是过去洒成 8 字形的水渍。墙上有几张宣传到邦多尔或戛纳去度自由幸福的假期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那里体验到了处于绝境中的人在看到了外面的自由时所产生的憎恶之感。他曾告诉过里厄，使他看了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故宫的鸽子，北火车站，先贤祠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及一个过去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使他欣赏的这座城市中的一些其他去处。这些景象这时都在他脑海中逐一出现，使他什么事也不想做。里厄认为这不过是他把这些景象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的缘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医生，说他喜欢一早四点钟醒来思念他的家乡，医生不难从他本身的经验理解为他那时是在思念他那留在外边的女人，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的时刻。凌晨四点的时候通常人们什么都不做，在睡大觉，即使度过了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夜晚后也是这样。不错，这个时候人们在睡觉，这时的思念能令人心安，因为一颗不落实的心渴望永远占有他心爱的人儿，而在心上人不在的时候，就渴望能使她进入无梦的酣睡中，直到团圆之日才醒来。

布道后不久，天气转热，已是六月底了。在布道的星期日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后，第二天，炎夏天气突然出现在天际和屋舍上空。先是热风吹了一整天，把墙壁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城市整天在持续的热浪和骄阳之下烤炙。除了拱廊马路和屋子里边，全城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刺目的阳光的烤炙。太阳到处盯住城里的人不放，他们一停下，就晒得更厉害。由于这几天的暴热正好和直线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郊区的平坦的马路和带有平台的房屋之间，热闹的市声逐渐减少。在这一地区，原来人们习惯在门口活动，现在所有的门户都关上了。百叶窗也紧闭着，谁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了躲避鼠疫还是抵挡热气。但是，从一些屋子里则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象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

在关卡附近时常发生冲突，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引起暗中发生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伤，城中还传说有人死亡，反正在这酷热和恐怖影响下的城市中，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的确在不断增强，而当局已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正在认真地考虑万一这些受到灾难驱使的居民造起反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报纸公布重申不准出城的禁令，并且威胁说违令者要受监禁处分。巡逻队在市内巡回。往往在寂

静无人和晒得发烫的路上，先听到踩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见到一些马队在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之间行进。巡逻队过去了，一种不安的寂静重又笼罩着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枪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布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枪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

周围一片寂静，热气蒸腾。在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市民的眼里，任何事情都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季节变换时出现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也第一次受到大家关注。人人带着恐惧的心情，因为大家理解暑气会助长瘟疫，同时人人又都感到夏天确实已经来临。晚上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啁啾声变得清越起来。苍茫的暮色使六月的天空变得异常开阔，雨燕的鸣声已显得和这种景色不大协调。市场上的鲜花，含苞未放的已看不到，都是盛开的，早市以后，花瓣散落在尘埃遍地的人行道上，人们清楚地看到春意迟暮。曾几何时，春之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全城的人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在尘埃和沮丧情绪之下变得灰白色的街道，同每天使全城的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成百的死亡者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不停地逞威，正是引人思睡和度假的时刻，但却不再象从前那样诱人入水嬉戏或是恣情纵欲，相反，这时刻在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只能给人以空虚之感。过去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古铜色的肤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闪烁发光，现在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烈日和鼠疫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是由疫病引起的一种重大变化。平时这个城里的人总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夏天的到来。那时全城向大海打开了大门，年轻人纷纷拥向海滩。今夏完全不同了，离城较近的海滨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好呢？

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经常注意鼠疫蔓延的总的情况，而且记下了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他还描述了瘟疫的一些悲惨动人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冷冷清清、家家百叶窗紧闭的居住区，他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声，然后放下叶板重又遮闭住她那昏暗的房间，而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种情况：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

他还继续对他特别看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观察。他告诉我们，那个玩猫的矮老头儿也活得够凄凉的。原来一天早晨，正象塔鲁所写的那样，几下枪声，发出几颗铅弹就打死了大部分的猫，其余的惊惶地逃离了街道。同一天，矮老头儿在惯常的时刻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些惊讶，俯身向街道的尽头张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敲打着阳台的铁栏杆。他又等待了一会儿，撕了一些小纸片，回进去了又出来，过了些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关上落地窗，突然不见了影子。此后几天中，同样的场面重复出现了几次，但是从矮老头儿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愁闷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塔鲁白白地等待这个每天都应该出现的人，窗户关得牢牢的，里面的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儿吐唾沫”，这是笔记本的结束语。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

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因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

"这样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

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

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象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象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象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

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

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干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式。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

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扁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匀称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入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

塔鲁同时把疫城中度过的一天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此可以使人对这个城里的人今夏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

过分了。”接着他开始写道：

“清早，阵阵微风轻拂着行人稀少的城市。这个时刻正是死神肆虐的黑夜和垂死呻吟的白昼这二者的间隙，此时鼠疫好象暂时歇息，喘上一口气。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口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说明等一会儿它们不会跟其他店家一起开门。卖报的睡眼朦胧，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消息，身子靠在路角上，活象个梦游病患者，他们的姿态好象是在向路灯兜售报纸。再过一会，他们将被头班出场的电车闹醒，伸开拿着报纸的手臂，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是否会有一个鼠疫横行的秋天？ B……教授的回答：不会的。’‘一百二十四人死亡，这就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

“尽管纸张供应日益紧张，使有些期刊被迫减少篇幅，但仍有一种新的报纸《瘟疫通讯》问世，自称它的任务是：‘以充分客观的精神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减退；向他们提供对瘟疫未来情况最有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以支持决心与灾难进行搏斗的一切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振作人民的精神状态，传达当局的指示，简言之，聚集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有效地同侵袭我们的病害作斗争。’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地转变为专事登载一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早上六点钟左右，所有报纸在离商店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以前便在店门口排长队的人群中销售，而后在到达郊区的挤满着人的电车上叫卖。电车已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行驶十分艰难，踏脚板和栏杆处都挤满了乘客。但是有件怪事，所有乘客都尽量背向着人以免互相传染。到站时电车中的男女乘客一拥而下，他们急急忙忙地互相远离，各自独处。常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发生一些吵闹；情绪恶劣，这已是人们的慢性病了。

“头几班电车开过后，城市渐渐苏醒了，几家啤酒店首先开门，柜台上放着‘咖啡无货’、‘请自备白糖’等牌子。接着商店也开门了，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太阳也逐渐升起，一阵阵的热气慢慢在七月的天空蒙上一层铅灰色。这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头闲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似乎想借助摆阔气的方式来制止住鼠疫。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每天十一点左右，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假如瘟疫蔓延的话，道德观念也会逐渐淡薄。我们将又会看到象古罗马时代米兰人在坟墓边上恣意狂欢那样的情景。

“中午，饭馆里一瞬间就客满了。很快地在饭馆门口三五成群聚集着没找到座位的顾客。天空的光线由于天气太热而减弱了亮度，等空位子吃饭的人们呆在被烈日晒得火烫的街道旁大遮阳布底下。饭馆之所以这样拥挤，是由于它们可以大大简化人们的食品供应紧张问题，但是却丝毫不能减少人们对疾病传染的恐惧：顾客们不厌其烦地花许多时间把餐具擦了又擦。不久前某些饭馆张贴出这样的通告：‘本馆餐具经沸水消毒’。但是它们逐渐地也不再做什么广告了，反正顾客不得不来。再说顾客也不在乎花钱。上等酒或号称上等酒的饮料、价钱最贵的加菜，大家拼命地抢着饮用。在一家饭馆里，似乎也出现过惊慌失措的场面，原因是有一个顾客觉得不舒服，面色发白，起身离座，踉踉跄跄地急速走出门去。

“两点左右，城中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宁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会集的时刻。沿着一幢幢灰色大房子的整条街上，热浪还是不断地涌来，漫长的囚禁时间要到火热的夜晚压到了这座人群熙攘、声音嘈杂的城上时才告结束。天气开始转热的头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晚间有时见不到人群。但是

现在凉意初返，给人们带来了不说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大家走上街头，忘乎所以地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充满一对一对情侣和热闹的喧嚣声的城市，投入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每晚在林荫道上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天主是伟大的，皈依他吧！'而大家却相反地投向他们搞不清楚的事物或者比天主更紧要的东西。开始时大家认为这场疫病不过是一般的疾病，因此宗教仍不失其原有的地位；如今他们看到这事的严重性，他们就想到寻欢作乐上来了。白昼刻划在他们脸上的苦闷，一到热气腾腾、尘土飞扬的黄昏就一变而为疯狂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起来。

"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这样的人说来，死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要死，人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

那次同里厄的会面是塔鲁要求的，他的笔记本中有这段记载。那天晚上，里厄在饭厅里等着他，两眼注视着他的母亲，她安静地坐在饭厅角落里的一只椅子里。每当家务完毕，她便在这里消磨时间。她现在双手合在膝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在等待他。但是当他一出现，母亲的脸上就起了变化。平时勤劳的生活给她面部带来的默默然的表情这时好象活跃起来。过一会儿，她重又静默下来。那晚，她眺望着那时已经冷清清的街道，路灯已减少了三分之二，相隔很远的地方，一盏光线很弱的路灯略微冲破一些城市的黑暗。

“在整个鼠疫期间，路灯照明一直要这样减少吗？”里厄老太太问。

“大概是这样。”

“但愿这不要拖到冬天，要不然未免太凄凉了。”

“是呀，”里厄说。

他看到他母亲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前额。他明白这是由于这些日子来的担忧和过度疲劳使他面容消瘦了不少。

“今天情况不太好吧？”里厄老太太问。

“噢，跟平时一样。”

跟平时一样！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血清，看来效力比第一批还差，统计数字又在上升。除了患者家属以外不可能在其他人身上进行预防接种；要普遍进行接种必须大量生产才行。大多数腹股沟肿块似乎已到了硬化季节，始终不见溃破，在这

种情况下，病人痛苦异常。自前一天起，又发现了两例新类型的瘟疫，鼠疫杆菌感染了肺部。当天，在一次会议上，精疲力尽的医生们向不知所措的省长提出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肺鼠疫的口对口的传染。要求得到了批准，但跟平时一样，人们对结果还是一无所知。

他端详了一下他的母亲，她那栗色美丽的眼睛使他想起了多年的温柔深情。

“母亲，你怕吗？”

“象我这般年纪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白天的时间是够长的了，而我以后又经常不在这里。”

“只要我知道你是要回来的，等着你也无所谓。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想你在干些什么。她有什么消息吗？”

“有，一切都好，如果我相信最近的一份电报所讲的话。但是我看她讲这话是为了使我放心。”

门铃响了，医生向母亲微笑一下，走过去开门。塔鲁在阴暗的楼梯平台上样子好象一只穿着灰衣的大狗熊。里厄请客人在他的书桌前面坐下，自己站在他的安乐椅后面。他们之间隔着书桌上的一盏室内唯一亮着的电灯。

“我想，”塔鲁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同您谈话。”

里厄一言不发表示同意。

“在十五天或一个月后，您在这里将无能为力，事态的发展将使您无法应付。”

“说得对，”里厄说。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得不好，你们缺少人手和时间。”

里厄又承认这是事实。

“据我了解，省府在考虑一种群众服务组织，所有身强力壮

的男子必须一律参加救护工作。”

“您的消息倒很灵通，但是这件事已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省长在犹豫。”

“为什么不征求志愿人员？”

“征求过了，但结果很差。”

“这是通过官方途径搞的，而且缺乏信心。他们的想象力不够，他们从来没有跟上灾情发展的步伐，他们所设想的办法对付感冒还差不多。假使我们听任他们去搞，他们就会完蛋，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完蛋。”

“可能是这样，”里厄说，“我该告诉您，他们甚至考虑用犯人来做所谓的粗活。”

“我认为还是用有自由的人比较好。”

“我也这么想，但是为什么呢？”

“我看见那些判死刑的觉得受不了。”

里厄看了一下塔鲁说：“那么，怎办呢？”

“我有一个组织志愿防疫队的计划。请准许我去搞，且把政府搁在一边。再说他们也忙不过来。我几乎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可以组成第一批骨干，当然我本人也参加。”

“当然，”里厄说，“您一定猜到我是乐于接受的。我们需要助手，特别是干这一行。我负责去使省府接受这个主意。再说他们也没有选择余地。但是……”

里厄思考了一下说：

“但是这项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点您很清楚。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向您讲明白。您好好考虑过没有？”

塔鲁用他灰色的眼睛望着他说：

“您对帕纳卢的布道有什么想法，医生？”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也回答得自然：

“我在医院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实在难以接受集体惩罚的说法。但是，您要知道，天主教徒有时就是这么说，但从来也不真的这样想。他们的为人实际上比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来得好。”

“那么您也同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能叫人睁开眼睛，它能迫使人们思考！”

医生不耐烦地摇摇头。

“鼠疫象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里厄刚一提高嗓门，塔鲁就打了一个手势，好象是要他平静下来。他还微微地笑了一笑。

“对，”里厄耸耸肩膀说道，“不过您还未回答我的问题，您想过了没有？”

塔鲁在安乐椅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得舒服些，并让脑袋显露在灯光下。

“您相信天主吗，医生？”

问题仍旧提得自然，但这一次，里厄倒犹豫起来。

“不相信，但是这说明什么呢？我是处在黑夜里，我试图在黑暗中看得清楚些。好久以来我就已不再觉得这有什么与众不同了。”

“这不就是您同帕纳卢分歧的地方么？”

“我不这么想。帕纳卢是个研究学问的人，他对别人的死亡见得不多，所以他是代表一种真理在讲话。但是，任何一个地位低微的乡村教士，只要他为他管辖的教区里的教徒施行圣事，听见过垂死者的呼吸声，那他就会和我有相同的想法。他首先

会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一件好事。”

里厄站了起来，这时他的脸处于阴暗中。他说：

“这且不谈吧，既然您不愿回答。”

塔鲁微微地笑笑，仍坐在椅中不动。

“我能以问题来回答吗？”

这次轮到医生微微地笑了，他说：

“您喜欢神秘，那么请吧。”

“好！”塔鲁说，“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富有牺牲精神？您的回答恐怕也可以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医生仍留在暗影里没动，他说已经回答过了，假如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他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一种天主，是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就是自以为有这种信仰的帕纳卢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肯如此死心塌地地委身于天主。至少在这点上，里厄认为他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同客观事物作斗争。

“啊！”塔鲁说，“这就是您对自己的职业的看法吗？”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说着又回到灯光下。

塔鲁轻轻地吹出了一声口哨，医生看看他。

“不错，”里厄说，“您一定会想这未免太自大了吧。请相信我，我只有这应有的骄傲，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过去后将来会怎样。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过后再让他们去思考问题，我自己也要考虑。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把他们治愈。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再没有别的了。”

“对付谁呢？”

里厄转身向着窗口，推测着远处墨黑的天空之下的大海。

他感到的只是疲乏，同时又在抗拒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无法理解的念头：想跟这个古怪而又给他亲切之感的人一诉肺腑。

“我完全不知道，塔鲁，我可以发誓，我完全不知道。当我开始行医时，我干这一行有点迷迷糊糊，因为我需要干它，也因为这同其他行业一样，是年轻人所企求的行业之一。或许也因为，对象我这样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行业。还有，得经常看着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吗？您听见过一个女人临死时喊叫‘我不要死’吗？而我却见到听到了。对着这种情景，我发觉自己无法习惯。那时我还年轻，我甚至对自然规律抱有厌恶的情绪。从此，我变得比较谦逊了，理由不过是我总不习惯于看人死去，此外我一无所知。但毕竟……”

里厄中断了他的话，重新坐下，他觉得舌敝唇焦。

“毕竟什么？”塔鲁慢腾腾地问。

“毕竟……”医生继续说，但又犹豫起来，一边注视着塔鲁，“这是一件象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对吗？既然自然规律规定最终是死亡，天主也许宁愿人们不去相信他，宁可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双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

“对，”塔鲁表示赞同，“我能理解。不过您的胜利总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里厄的面色阴沉下来，说道：

“总是暂时的，我也明白。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是一个理由。不过，我在想，这次鼠疫对您说来意味着什么。”

“不错，”里厄说，“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塔鲁对医生凝视了一会，而后起身以沉重的脚步走向门口。里厄也随后跟着走去。当他走近塔鲁时，后者好象低着头

注视着自己的脚，一面说：

“这一切是谁教您的，医生？”

他立刻得到的回答是：

“贫困。”

里厄把书房的门打开，在过道上向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看望在郊区的一个病人。塔鲁建议陪他一同前去，医生答应了。在过道的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太太。里厄把塔鲁介绍给她。

“一位朋友，”他说。

“噢！”里厄老太太说，“我很高兴认识您。”

当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看着她。在楼梯平台上，医生想按亮定时开关的照明灯，但灯不亮，楼梯一片漆黑。医生想这是否又是新的节约措施的结果，然而他又无从证实。若干时间以来，房屋里的情况和城市里的一切都乱糟糟。这也许是由于看门的和我们一般市民什么事都不再关心的缘故。但是医生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思索，因为身后的塔鲁又说话了：

“还有一句话，医生，即使您听了感到可笑也罢：您完全正确。”

里厄在黑暗里对自己耸了耸肩膀说：

“老实说，我一无所知。您呢，您有什么想法？”

“噢！”另一个平静地说，“我要懂得的东西不多。”

医生站住脚，塔鲁在他后面的梯级上，脚滑了一下。他一把抓住了里厄的肩膀站稳了。

“您认为对生活都懂了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传来了回答，声音同刚才一样平静：

“是的。”

当他们走到街上时，发觉时间已经很晚。恐怕已十一点

了。城中静悄悄的，只听到一些轻微的窸窣声，遥远的地方传来救护车的丁当声。他们跨进汽车，里厄发动了引擎。

他说："明天您得上医院来打防疫针。在着手干这个活儿之前，最后一句话是：您得考虑一下，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

"这种估计是没有意义的，医生，这您也同我一样明白。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全部死于鼠疫，恰恰只有一个洗死尸的人活了下来，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

"这不过是他保住了他那三分之一的机会而已，"里厄以一种突然低沉下来的声音说，"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确还要全部从头学起。"

这时他们已到了郊区，路灯照亮了冷清清的街道，他们停了车。站在汽车前，里厄问塔鲁是否愿意进去，对方说好。天空的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里厄突然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说：

"您说说看，塔鲁，什么东西驱使您想干这事的？"

"我不清楚，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

"理解。"

塔鲁转身向房子走去，直到他们走进老气喘病患者家里为止，里厄没有再看到塔鲁的脸。

第二天起，塔鲁就着手干了起来，他组织起第一支队伍。以后又有许多小队纷纷成立。

作者无意过分强调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我们城里的许多人如果处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倾向于夸大它们的作用。但作者则趋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正因为如此，对塔鲁所建立的卫生防疫组织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符合客观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不愿大事歌颂良好意愿，而对英雄主义也仅仅给予恰当的重视。但他仍愿充当历史见证人的角色，记载下当时由于鼠疫造成的全体市民的痛苦和迫切的心情。

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而在这种时候不

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有助于我们城里的人对鼠疫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们确信，鼠疫既已发生，那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由于抗疫已成为某几个人的任务，它的实质也就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事。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同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时我们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入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我们城中许多新的伦理学家当时说，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什么用，还是屈膝投降为佳。而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总是他们所看清楚的东西：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正因为这样，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使出全部力量，就地取材制造血清，这是很自然的事。里厄同他都希望搞一种从横行

全城的细菌中培养出来的血清，它可能比外地运来的血清具有更直接的疗效，因为当地的细菌同通常确定的鼠疫杆菌的形态略有不同。卡斯特尔期望很快获得他的第一批血清。

正因为这样，那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现在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塔鲁所组织的一部分卫生防疫队专门在居民稠密地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他们试图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那些未经消毒的气楼和地窖。另一部分卫生防疫队跟随医生出诊，负责鼠疫患者的运输工作，甚至有时由于缺少专职人员，他们就充当运送病人和尸体的汽车驾驶员。这一切都必须做登记和统计工作，格朗已接下了这项任务。

从这一点看来，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加犹豫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点力，其他的事，对他说来，年事太大，胜任不了。他每晚能把六到八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贡献出来。当里厄向他热烈致谢时，他感到惊异：“这又不是最困难的事。有鼠疫嘛，应该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啊！要是一切都象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罢他又弹起他的老调来了。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完毕后，里厄就同格朗聊起来，最后塔鲁也参加进来了。格朗以越来越明显的喜悦心情向他们两人倾诉自己的心事，而他们两人也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格朗在鼠疫中还不断干着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自己也终于在其中找到一种精神放松的感觉。

塔鲁常常会问：“女骑士怎么啦？”格朗则老是这样回答：“她骑着马在小跑，在小跑。”他说时露出勉强的微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已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这个形容词而从此改用“苗条”

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女骑士。他又加上一句："这比较具体些。"又有一次，他向他的两位听众宣读经过如下修改的第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样更好些，对吗？"格朗说，"我觉得改为'在五月的一个清晨'比较好，因为'五月份'中的这个'份'字把小跑的节奏拉得太长了些。"

其次他表示他正在为"富丽"这一形容词动脑筋。在他看来，这个词没有表现力，他正在寻找能够一下子就形象地描绘出他所想象的那匹豪华的牝马的词。"肥壮"不行，虽然具体，但有些贬义。"辉煌"这个词他曾考虑采用，但音韵不够谐和。一天晚上，他隆重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黑色的枣骝牝马。"照他的说法，黑色含蓄地表示漂亮。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

"枣骝这个词不说明马的品种而是指毛色。。

"什么颜色？"

"嗯……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十分尴尬。他说：

"谢谢，幸亏有您在这里，但您瞧，这是多么困难。"

"'华丽的'，您觉得怎样？"塔鲁说，格朗注视着他，一边沉思着说：

"对，对！"

他渐渐露出了笑容。

过了些时候，他又承认"花"这个字使他伤脑筋。由于他除了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之外，别处都没到过，所以有时向他的朋友了解关于布洛涅树林小径上的花草情况。老实说，这些小径

在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中不象有过什么花，但是职员坚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起来了。他对他们的疑惑感到奇怪。“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观察。”但是医生有一次看到他十分兴奋，他把“花径”二字改为“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①。他搓着手说：“这样一来啊，既看得到，又闻得着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眉飞色舞地念着：“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上。”但是，由于朗读的缘故，句子末了一连三个“的”字听起来很不顺耳，格朗嗫嚅着坐了下来，神情沮丧。接着他向医生告别，他需要再去考虑考虑。

事后人们获悉，就在那一时期里，他在办公室里表现得心不在焉，而那时正是市政府人手短缺、事务繁忙的当儿，因此这种态度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提醒他说，他拿了工资就要完成他的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很好完成。负责人说：“听说您业余时间在卫生防疫组织里干义务劳动，这我不管，但我所要管的是您的工作。而在这困难的时刻，您要贡献您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就应该做好您的本位工作。要不然的话，其余的工作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

“不错，他说得对，”医生表示赞同。

“不过，我实在心不在焉，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句子结尾的问题。”

他想把结尾改为“在开满了花的树林中的小径上”，将“布洛

① 此处由于格朗推敲字眼，更换用词，因而在他所写的句子中，语法结构发生变化，译成中文，不易理解，故将译文略作改动。下文还有类似情况，不再另注。

涅”几个字删掉，认为反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样一来，“开满了花”的不一定是“小径”，也可能是“树林”了。他又考虑有没有改为“开满了花的树林小径”的可能性。然而他任意地把“树林”这个词夹在“开满了花的”和“小径”的中间，也不妥帖，这对他真是个肉中之刺，不胜其苦。有几个晚上，他的确好象比里厄还疲劳。

不错，这种推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使他疲劳不堪，但是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完成。每晚他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并加上曲线，慢慢地设法把情况说明得尽量精确。他经常到医院去找里厄，请医生为他在一个办公室或医务室里找一张桌子，他摆好文件，就好象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样地工作起来。在医院里飘浮着的浓烈的消毒剂气味和由疾病本身产生的气味中，他挥动着纸张使墨迹干燥。他那时一本正经地再不去想他的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错，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邪恶，也不是象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这至少就是里厄医生在报上看到或广播里听到关于外界对这座疫城所发出的呼吁和鼓励时的感想。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送来了支援物资，同时，每晚通过电波和报纸大量表示同情和赞扬的评论拥到了我们的孤城中来。但是每当听到这种歌功颂

德的语调或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但表示这种关心时用的只是人们试图表达不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语，而这种言语就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

有时到了深夜，人踪稀少，万籁俱寂，当医生要上床开始他非常短暂的睡眠时，他打开了收音机。从千万里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笨拙地试图说出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说是说了，但同时又证实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分担他所看不见的痛苦，处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境地确是可 怕 的。“奥兰！奥兰！”声音徒然从海外传来。里厄也徒然聚精会 神地 听着。一会儿，高谈阔论开始了，这使格朗同讲话者漠不相干的鸿沟越来越深。“奥兰吗？奥兰！”“别喊啦！”医生想，“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舍此别无他途。他们太远了。”

瘟神此时正蓄足全力，准备扑向孤城，使其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鼠疫即将到达高峰的前夕，余下尚待叙述的就是那些象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了。他们为了重新找到失去的幸福，从瘟神口边夺回他们严加保卫、不使受损的身家性命的一部分，长期来，不顾形式单调，拼命地进行活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接受威胁着自己的奴役。虽然表面上这种方式不见得比其他方式有效，但依笔者看来，倘也有它的意义，而且，虽然怀有自炫的心情，甚至自相矛盾，它确能显示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豪感。

朗贝尔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攫住自己，正在进行着斗争。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希望，他就告诉里厄，决定另找出路。记者首先从咖啡馆的服务员身上打主意，因为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对什么都熟悉。但是他最初问讯的几个对象告诉他的，只是这类举动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事处分。有一次他甚至差一点被人当成煽动出城者。后来还是在里厄家碰到了科塔尔，事情才算有了一些眉目。那一天，里厄同他谈到了记者在行政部门碰壁的事情。几天后，科塔尔在路上遇到朗贝尔，前者以自己近来在社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来接待朗贝尔。他说：

“一直毫无进展吗？”

“对，毫无进展。”

“不能指望机关，他们是不会理解人的。”

“的确如此，我在另找门路，但这并不容易。”

“啊！”科塔尔说，“我懂。”

他知道一整套办法，向朗贝尔介绍了一番，使后者听了感到惊奇。他告诉朗贝尔，很久以来，奥兰所有的咖啡馆他都经常去，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了解到有一个组织专干这一行。原来科塔尔近来花费很大，入不敷出，于是也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正在贩卖香烟和劣酒，这些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因为有人已向我建议过。”

“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越来越变得热辣辣的，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

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燠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口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象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末，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去。”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象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入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

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然而又转向他们两人说：

“这是要花钱的。”

这是一种征求对方同意的表示。

朗贝尔答应说：“那当然。”

过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后者轻松地说：

“噢，不必，为您服务我觉得高兴。况且您是个记者，有朝一日您会还我的情的嘛！”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登上通向城内高地的没有树荫的街道。海关营房的一部分房屋已改成了诊疗所，大门前聚着一些人。他们抱着探望一次病人的希望，当然这是不会获准的；他们或者想打听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一个钟头以后就会过时了。这一群人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很热闹，加西亚和朗贝尔所以会约好在这儿见面，看来和这种环境不无关系。

“真奇怪，”科塔尔说，“您执意要走。总的来讲，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朗贝尔答道。

“噢！那当然，在这里要担些风险。不过，就是在鼠疫发生前，要通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不是也要冒同样大的风险么？”

正在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的近旁停了下来。塔鲁在开车，里厄处于半睡眠状态。

他醒后，就为他们作介绍。

“我们认识的，”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他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到市区去。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约会。”

里厄看看朗贝尔。

“对，”后者说。

“啊！”科塔尔吃惊地说，“医生也知情吗？”

“预审推事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一面关照他说。

科塔尔的脸色变了。果然，奥东先生顺着街以有力而规则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走到这一小堆人面前时，脱帽招呼。

“您好，推事先生！”塔鲁说。

推事也向这两位坐车来的人问好，又朝站在他们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看看，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把领取年金的人和记者向他介绍了一下。推事仰头朝天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一个苦闷的时期。

“有人对我说，塔鲁先生，您在搞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我不敢完全赞同。医生，您看这病还会蔓延吗？”

里厄回答说应该希望它不会如此，推事也重复说必须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天的意图是无法窥测的。塔鲁问他当前的事件是否为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这方面的案件减少了，我干的只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遵守老的法律。”

“这是由于相比之下，这些老法律显得好一些，这是必然的事，”塔鲁说。

推事一变原先双眼凝望着天空好象在寻思的样子，而以一种冷漠的神色看着塔鲁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判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推事走了，科塔尔说：“那个家伙啊，他是头号敌人！”

汽车起动了。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来了。他走过来并不向他们做出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还得等一等”来代替打招呼。

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她们手中几乎都拎着篮，妄想着这些东西能送到她们生病的亲人手中，更荒唐地希望她们的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门口由武装哨兵把守着。从大门和营房之间的院子里不时传出一声怪叫，这时在场的一些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向诊疗所看望。

正当三个人观看着这一情景时，身后一声清楚而低沉的“你们好”的声音使他们回过头去。虽然天很热，拉乌尔仍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穿着一身深色双排扣子的服装，头戴一顶卷边的呢帽，面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嘴巴经常紧闭着。拉乌尔说话急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吧。加西亚，你可以离开我们了。”

加西亚点了一支香烟，让他们三人离去了。他们随着夹在

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快速地走去。

“加西亚对我说明白了。事情可以办得到，不管怎样，这件事要花您一万法郎，”拉乌尔说。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答应。

“明天到海军区的西班牙饭店里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走开后，科塔尔请朗贝尔原谅他第二天不能来，因为有事，反正朗贝尔也用不着他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饭店时，里面的人都掉过头来瞧着他。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处在一条已被太阳晒干的黄色小街的低处，去那里吃饭的全是男人，大多数外表象西班牙人。坐在店堂尽头的一张桌旁的拉乌尔对记者打了一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去，这时，瞧着朗贝尔的这些人面上好奇的神色顿时消失，重新各自进餐。与拉乌尔同桌的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儿，胡髭没有剃净，肩膀宽得异乎寻常，头发稀少，脸长得象马面，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中，露出一双长着黑毛的细长手臂。当朗贝尔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讲到他时只是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相信能够帮助您，他将让您……”

这时女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要吃什么，打断了拉乌尔的话。

“他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再由他们把您介绍给和我们合伙的几个守卫人员。但到那时事情还未全部解决，还要等到那些守卫人员认为有机可趁时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他们中的一个人家里住上几夜，他家离关卡不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替您作必要的联系，当一切安排妥当，也由他同您结算费用。”

这位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断地把甜椒和西红柿做成的拌凉菜捣碎，然后大口大口地往里吞。过一会儿他开腔了，稍微带一点西班牙口音。他建议朗贝尔第三天早上八点在教堂的门廊底下碰头。

“还要等两天，”朗贝尔着重地提了一下。

“这是由于这事不容易办，”拉乌尔说，“要找人嘛。”

这匹马再次点一下头，朗贝尔不太热情地表示同意。在余下的午餐时间里，大家寻找别的话题。等朗贝尔发现这匹马是个足球运动员后，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在这项运动中也有不少经验。他们谈到法国全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能以及W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这匹马变得活跃非凡，他不用“您”而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并要他相信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踢中卫。他说：“你知道，中卫是支配全局的，而支配全局，这才叫踢足球。”朗贝尔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他是踢中锋的。不过他们的谈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收音机轻声地反复播送情意缠绵的乐曲后，开始报道说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在场的人全无反应。马面人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分手时，这位中卫有力地同朗贝尔握手说：

“我叫贡扎莱斯。”

这两天时间在朗贝尔的感觉中简直长得没完没了。他到里厄那里把全部行动详情告诉了他，然后陪着医生到一家病人家去出诊。走到一个等待着里厄、病情可疑的病人家门口，朗贝尔向医生告别。这时在过道里，传来一阵奔跑声和人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不要耽搁，”里厄低声说道。

他样子看来很疲倦。

“疫情发展太快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倒不是这点，统计表上的曲线甚至上升得慢了点，只是对付鼠疫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军队中，一般都用人力来补救物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连人力也不够。

“外地不是来了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了。按照目前疫情，还勉强能对付，如疫情再发展就不够了。”

里厄注意听着屋内的声音，然后向朗贝尔笑笑，说道：

“对，您应该快点把您的事办成。”

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低沉地说：

“您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走的。”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这一点，但朗贝尔继续往下说：

“我相信我不是个懦夫。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这方面我经受过考验。只是当我想到某些情况时，我就感到受不了。”

医生直望着他的脸：

“您会和她见面的。”

“也许会，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她在这段时间内会老起来，就不能忍受。三十岁的人要开始老了，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里厄低声说他相信能理解。这时，塔鲁来了，很兴奋的样子。

“我刚才去请帕纳卢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结果怎样？”医生问道。

“他思考过后，答应了。”

“我感到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比他的布道要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就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向里厄眨眨眼睛。

“给人创造机会，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工作。”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好的星期四那天来到教堂的门廊下，离开八点还有五分钟。空气还相当清新，在天空中飘浮着即将被上升的热气流一下子就吞没的圆圆的小朵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仍旧可以闻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一阵淡淡的潮气。东面屋后的太阳只晒热了装饰着广场的圣女贞德全身镀金的塑像的帽盔。一只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无人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内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诵读圣诗声，同时又涌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突然，诵诗声停了，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中出来，跨着急促的步子向城中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人影登上大石级向门廊走来。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忽然想起这地方恐怕是不准抽烟的。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朗贝尔走到了阴暗的拱顶底下。过了一会，在正殿中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身影。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象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贡扎莱斯已从石级上走下来向城市方向走去。

“我想您已经走掉了，”他对记者说，“这不足为怪。”

他解释说，他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等待约好在七点五十分会

面的几个朋友。但是他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了，干我们这一行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他另订约会，定于第二天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会面。朗贝尔叹了口气，把呢帽向后一推。

“没关系，”贡扎莱斯笑着说，“你要想一想：在球赛中需要有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传球，这一大套做完后才能射入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一场足球赛只要一个半小时。”

奥兰的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所在地是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长的散步场所，一边靠着俯瞰港口的峭壁。第二天，朗贝尔先一步到达约会地点，仔细地读着阵亡将士的名单。几分钟后，有两个人走过来，向他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散步处的栏杆边凭栏眺望，好象全神贯注地俯视着空无一人的港口。他们两人一样身材，都穿着一样的蓝裤子，一样的短袖子海军蓝色毛线衣。记者稍稍走远一些，去坐在一张长凳上以便从容地打量他们。他看出他们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那时，他看到贡扎莱斯走了过来，并向他道歉。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罢带他到两个青年那边，介绍两人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去，他们两人非常相象，朗贝尔估计他们是兄弟俩。

“好吧，”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不知是马塞尔还是路易说，还要等两天才轮到他们值班守岗，为期一周，必须看准一个最方便的日子行事。把守西门的共有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

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识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支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

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象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

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帐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入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象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

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象。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象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干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象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

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

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了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

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啰，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又说：

“我对你们说还得重起炉灶哪！”

他问里厄卫生防疫队工作进行得怎样。里厄回答说有五个队在工作，希望再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边，好象一心专注在他的指甲上。里厄打量着他蜷曲在床边的粗矮壮健的身形。忽然他发现朗贝尔在注视着他。朗贝尔说：

“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印象是，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干的，”塔鲁说。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

“您说说，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不会。”

“对啦，但您能为理想而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理想而死的人我是看够了。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已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里厄一直留神倾听着记者的话，始终望着他。这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人不是一种概念，朗贝尔。”

对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极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末，医生，让我们安心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我嘛，只有这点想法。”

里厄站了起来，好象突然感到厌倦起来。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严肃起来问道。

“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啊！”朗贝尔怒气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分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这事儿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道：

“不，您没有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二位，我看你们在这一切活动中，一点也不会失去什么：在正路上走嘛，总是容易的。”

里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

“走吧，我们还有事呢。”

他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后面，但刚走出去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记者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在离这里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疗养所里？”

朗贝尔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动作，但塔鲁已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在我找到离开这座城市的办法之前，您能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干一阵子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说：

“行，朗贝尔。谢谢您。”

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象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入，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

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入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獗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

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象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象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

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和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

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入土？

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

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

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象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迸。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的。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

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

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象座小山，无数气泡就在流通的空气中噗噗破裂。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

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来随时就要不足。这些护士和埋尸人员开始是公家雇佣的，后来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死于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会传染上。可是仔细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发生瘟疫的整个时期中，干这一行的人始终没有缺少过。最危急的时期是在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

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入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线路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

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入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飘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一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象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身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象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象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

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

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同意接受。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象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象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怏怏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他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

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沟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象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象，或者可以说，他们象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象别人一样看报听广

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精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乒乒，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一无生气，就象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

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辚辚、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

到了九月和十月，鼠疫已经使奥兰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城。由于疫病势焰不减，几十万居民也只得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没完没了地在城里团团转。在天空中，浓雾、热潮和阵雨相继而来。一群群来自南方的鸹鸟椋鸟无声无息地掠过苍穹，绕城而过，好象帕纳卢神甫所描述的瘟神在屋顶上空正把那根古怪的长矛挥舞得呼呼作响，吓得它们不敢飞近。十月初，滂沱大雨把街道冲洗得一干二净。在这段时间里，笼罩着一切的就是这种疫病势焰不减的严重局面。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疲惫不堪。事实上，卫生防疫人员已经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劳累了。里厄医生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觉察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滋长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奇怪心理的时候。比如，这些人在这以前，对一切有关鼠疫的消息一直都十分关切，然而现在他们却置若罔闻。朗贝尔是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那个病房是不久前才设在他旅馆里的，他对在他那里隔离观察的人数了如指掌。他对自己制定的那套制度的细则十分熟悉：一旦发现瘟疫迹象，必须立即将病员转移至医院医治。另外，这些用在隔离病人身上的血清所产生的效验数据，他都能历历如数家珍。但是，他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有多少。他确实不知道疫情是愈来愈猖獗还是在逐渐缓和。而且，不管情况如何，他仍然希望不久能逃出城外。

至于其他人员，由于日以继夜、专心致志地忙于工作，他们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一个医疗效果，

他们作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是漫不经心地姑妄听之，使人感到，他们好象大战时那些因构筑工事累得精疲力竭的士兵一样，只致力于使他们的日常工作不出差错，而对决战或者停战再也不抱什么指望。

格朗虽然在继续进行有关鼠疫的必要计算，但是可以肯定，他统计不出总的结果。他与塔鲁、朗贝尔和里厄不一样，不象他们看上去就是不容易累倒的人；他的身体一向不很好，但却同时担任几件工作：市政府助理，里厄的秘书，还有他自己在夜间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处于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他常用这么两三个决定好的打算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比如：在鼠疫扑灭以后，要彻底休息一段时间，至少一个星期，以便认认真真地把他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使人“脱帽致敬”的工作做完。有时，他也会突然变得情不自禁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自动地向里厄谈到让娜，思念她此时此刻可能在哪里，以及她看到报上的消息会不会想到他。有一天，里厄用十分平淡的语气同他谈起自己妻子的事，这使里厄自己都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谈过。他妻子打来的电报总是说她很好，并请他安心，但他有点放心不下，于是就决定给他妻子住的那个疗养院发了一个电报去问问主任医师。结果，对方回电说他妻子病势加重，但院方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控制病情不让它恶化。他一直把这一消息压在心里，现在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怎么会把这件事告诉格朗的，除非是因为过分疲劳的缘故。原来这位公务员先是对他谈到让娜，然后问起他的妻子，于是里厄才回答的。“您知道的，”格朗说道，“现在这种毛病会很快治好的。”里厄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他开始感到与妻子分离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并说，要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早已帮助妻子战胜病魔，可是现在看来，她准会感到十

分孤独。后来他就不说下去了，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了格朗提的问题。

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塔鲁比较能顶得住一些，不过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爱东探西问的习惯，如果按深度来说并没有丢掉的话，那末从广度来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样化了。其实，在整个这段时期中，看来他似乎只关心科塔尔。自从旅馆改成隔离病房以来，他已搬到里厄家里去住。他不大爱听格朗或者里厄平时晚上谈论抗疫的情况。他往往没听上几句，就立刻把话题转到他通常关心的奥兰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去。

至于卡斯特尔，他有一天跑来通知里厄医生血清已准备就绪，两人决定要在奥东先生的男孩——就是那个刚送进医院，在里厄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的孩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医生在把最近的统计数字告诉他那老朋友时，发现对方已经在安乐椅上睡得很沉了。平时卡斯特尔的脸上总是露出一股温文尔雅、而又带有讥讽的神色，显示出无限的青春活力，而这时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张突然变得毫无生气的脸，只见半开的嘴边挂着一丝唾液，显露出他的精力衰竭和年迈苍老。面对着这张脸，里厄禁不住一阵心酸，喉咙发哽。

每当感情脆弱时，里厄就意识到自己确是疲劳了。他控制不住，感情外露。平时，他大多能控制住自己，显得心肠很硬，不动感情，但偶尔也会感情爆发，有时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唯一的抵御方法就是躲藏在这铁石心肠的外表之下，把他心中用以控制感情的绳索上的结紧紧扯住。他深知这是他能继续干下去的好办法。至于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更多的幻想了，即使他还保持了一些，但现在也都被疲劳所磨灭了，因为，他知道，在这看不到尽头的时期里，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而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就断定病人患了不

治之症，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拉住他的手腕嚎叫："医生，救救他的命吧！"但是他在那儿并不是为了救人性命，而是为了下令隔离。他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出人们憎恨他，但是憎恨又怎样呢？有一天，人家对他说："您没有心肝！"怎么会没有呢？他有。就是这颗心使他能坚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目送那些本该活着的人离开尘世。就是这颗心使他能日复一日地工作下去。今后，他的心只够使他做到这一步。这样的心，怎么能足以救人的命呢？

不！他整天给人的不是援救，而是提供情况。当然，干那种事不能叫做是真正的职业。但是，在这群惶惶不可终日和面临瘟疫浩劫的人们中间，究竟谁还有这闲心思从事真正的职业呢？疲劳还真有点好处。如果里厄头脑清醒一点的话，这种到处都在散发出来的死人气息一定会使他触景生情，无限感慨。但是，每天忙得只有四小时睡眠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对待事物就是公事公办，就是说要按照公正的原则，一种丑恶的嘲弄人的公正原则办事。至于别人，就是那些病人膏肓的人，他们也体会到这一点。在鼠疫发生以前，人们把这位医生当作救星，三粒药丸和一个针筒就解决问题，而且人们常常挽着他的胳膊，顺着走廊一路送他出来。这样虽然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但毕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现在是截然相反了，他到人家家里去要带上几个士兵，必须用枪托砸门，人家才会出来开门，就好象他们是要把这一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把全人类送上死亡的道路。唉！这倒是真的，人不能离群索居，他也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同样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每当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就会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

而且在这些想法里还交织着与亲人分离的孤独情绪。这些想法也同样在他朋友们的脸上反映出来。所有那些坚持不懈地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渐渐感到支撑不住，可是这种疲乏所引起的最危险的后果，还不是他们对外界动态以及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而是在于他们对自己那种放任自流、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是不是绝对必要的事，凡是在他们看来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懒得去做。因此，这些人就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所制订的卫生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应该进行消毒的许多规定，其中有一些，他们也忘了遵守，有时甚至顾不上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赶到肺部受鼠疫侵袭的病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临时被叫到感染者家里去的，他们感到已无此精力再到某处去为自己滴注必要的防疫药物。这倒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这场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对象。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而运气又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可是，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没有疲劳不堪，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露出一副扬扬得意的神色。这就是科塔尔。他对别人继续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却选中了塔鲁，只要后者有空，便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塔鲁总是诚心诚意地接待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从不怠慢。这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奇迹：不管工作得多么劳累，塔鲁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关心备至。甚至有几个晚上他累垮了，但第二天照旧精神抖擞。科塔尔曾经对朗贝尔说："我跟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很通人情。他总是很体谅别人。"

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塔鲁的日记内容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的身上。塔鲁曾试图在日记中如实地、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反映出科塔尔告诉他的种种想法和对事物的看法。这篇题为"关

于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的记录占了笔记本好几页纸，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塔鲁对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是一个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愉快。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在塔鲁面前，他有时会用这类话来表达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不过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着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鼠疫的威胁，但好就好在他是和大家共患难的。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染上鼠疫。他似乎是靠着这样一种想法在过日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了，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象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入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钮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在晚上一同出去。他后来就在笔记本里

记叙他们如何在傍晚或深夜走入人影幢幢的人群中去，摩肩接踵地夹杂在若隐若现的人堆里，因为每隔相当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弱亮光的路灯。他俩就这样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阴影。这就是科塔尔几个月前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求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放荡不羁的享乐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鹜。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大部分人都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人们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种有闲生活却只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在一对男女的后面。过去，这种成对的男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要避人耳目，而现在却是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科塔尔情不自禁地说："啊！真是好样儿的！"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他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塔鲁认为，在科塔尔的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多少恶意。科塔尔常说："这些事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得意心情，毋宁说是表明了他的不幸遭遇。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觉得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了。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象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难道我能说：在我被逮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被逮捕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遇到鼠疫……您

要我谈谈我的看法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塔鲁接着写道：“确实，他并不是信口开河，他恰如其分地猜测出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一方面却又由于存有戒心而彼此疏远。人们都深深懂得不能轻信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会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乘您对他毫无戒备之机，把鼠疫传染给您。如果有人，象科塔尔那样，花上许多工夫在他所找的同伴中间去发现一些可能会告密的人，那么，他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十分体谅有下述想法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尽管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仍能泰然自若，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就领教过这一切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完全象别人那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而言之，跟我们所有这些还没有丧命于鼠疫的人一样，他也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天都濒于毁灭。但是，由于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认为，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这也是完全正常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他看来，大家分担恐怖，那比他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受得多。他错也就错在这一点上，而且就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被人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比别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笔记本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证实在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大致上可以说明一下当时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认为它很重要。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到市歌剧院去观看歌剧《俄耳甫斯

与欧律狄刻》①。演出该剧的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刚发生时来 到本城的。这个被鼠疫封锁在城里的剧团在与市歌剧院协商以后，迫不得已每周把这部歌剧重演一次。因此，几个月来，每逢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响起了俄耳甫斯的回肠荡气的悲歌和欧律狄刻的微弱无力的呼吁。但是，这部歌剧却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卖座率始终很高。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中，周围坐满了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姗姗来迟的人总是竭力让人注意到他们的进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在轻声调音的时候，只见一个个人影清晰地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上的人鞠躬致意，在斯文的轻声交谈中，人们又恢复了几小时前他们在城中阴暗的街道上行走时所失去的那种镇定情绪，服饰打扮驱走了瘟神。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甫斯引吭悲歌，如泣如诉，唱得十分出色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开始高雅地评论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唱出了他的深情。全场以一种颇为适度的热情作出了反应。人们几乎没有发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中带有一些不应有的颤音，以及他在向阴间的神灵哭诉，恳求怜悯时，悲哀的声调稍为有点过分。他有些动作做得不稳，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种失误当作是别具风格，认为它使这位歌剧演员的表演增添了光彩。

演到第三幕，在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唱二重唱时（即在欧律狄刻和她的爱人诀别的时候），场内才出现某种惊讶的反应。

① 这部歌剧是德国音乐家格卢克(1714—1787)谱写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善弹竖琴的歌手，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在结婚那天被毒蛇咬死，他到阴间去，用乐曲感动了阴间的神灵，获准放回他的爱妻，但规定在离开阴间之前，不能回顾。俄耳甫斯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下他身后的欧律狄刻，随即被雷击死。

好象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一波动，或者更肯定地说，好象来自正厅的嘈杂声证实了他此刻内心的感情，他选定这个时刻穿着古装，伸出双臂，分开两腿以滑稽的姿态向台前的脚灯走去，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些牧歌向来是不合时宜的，但观众们感到，此时此刻它是第一次变得真正不合时宜，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座上的观众都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场去。起先是肃静无声，就象人们刚做完礼拜离开教堂，又象瞻仰死者遗容之后走出殡仪馆，妇女们整理了一下衣裙，垂头丧气地离去，男人们手挽女伴，领着他们退场，不让她们碰撞那些挡道的加座。但是，这种波动逐渐加剧了窃窃私语变成高声惊叫，人群拥向出口，挤作一堆，相互冲撞，大声叫嚷。科塔尔和塔鲁这时方才站起身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中的一幅画面：从一个古怪地弯曲着四肢的蹩脚演员身上看到了降临在舞台上的鼠疫，而这时剧场里一切豪华的装饰品，比如那些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椅子上的凌乱的花边织物都变成了一无用处的废物。

在九月头上的几天里，朗贝尔一直跟里厄一起非常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那天要在国立男子中学门口会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

那天中午，贡扎莱斯和记者看到那两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来到会面地点。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不过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事。总之，这星期没轮到他们值班，只好耐心等到下星期，一切再重新安排。朗贝尔说他也这么想。贡扎莱斯建议下星期一再碰碰头。不过，这次他们将把朗贝尔安置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贡扎莱斯说："咱俩再碰一下头。要是我不在，你就直接到他们家去。有人会把他们俩的地址告诉你的。"但这时，马塞尔和路易两人中有一个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领这位朋友到他们那儿去。要是他不挑剔的话，他们那儿有够四个人吃的。这样，他就知道地址了。贡扎莱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就向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关卡。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小屋，墙很厚，有油漆过的木外板窗，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笑容可掬、满脸皱纹的西班牙老大娘。她用大米饭来招待客人。贡扎莱斯表示惊讶，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大米了。马塞尔说："住在城门口附近总可以想到一点办法的。"朗贝尔又吃又喝，贡扎莱斯说他是个好伙伴，而这时候记者的脑子里却只是在想他在城里还得呆一个星期。

实际上，他还要等上两个星期，因为为了减少值班班次，警卫值班已改为两个星期换一次。于是在这两周中间，朗贝尔持续不断地拼命干，几乎闭着双眼从黎明一直埋头工作到夜晚。他总是到深夜才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从以前的闲散生活突然转入现在的令人疲乏不堪的工作，使他几乎丧失了幻想和精力。他很少谈及关于他即将潜逃出城的事。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一个星期以后，他私下告诉里厄医生说，在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酒。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到他的腹股沟胀得厉害，两臂上下活动也感困难。他想，这下子传染上鼠疫了。当时他唯一的反应——后来他与里厄一致认为这种反应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奔到这个城的高处，在那儿，从一个狭小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天空，但是仍看不到大海，就在那儿，他大声地呼唤他妻子的名字，吼声回荡在城墙的上空。后来回到家里，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的征兆，因此，他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感到有些难为情。里厄说他很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感到需要这样做。”

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末，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干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茴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口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象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确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他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

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

他皱着前额，重新把卡片叠好。

“现在剩下来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结帐了。”

塔鲁站起来，将身子靠在桌边，说道：

“您不是就要动身了吗？”

“今天半夜里。”

塔鲁说，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并叫朗贝尔多保重。

“您这是说真心话吗？”

塔鲁耸了耸肩膀答道：

“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我们走吧。”

“不是这么回事，”朗贝尔很尴尬地说。他停了下来。

塔鲁看了看他，突然向他微笑起来。

他们穿过一条小走廊，走廊的墙漆成浅绿色，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在快要走到的两扇玻璃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门后有几个人影子在晃动着，动作很怪。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个四周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他们推开了玻璃门。这是一间宽广的大厅，尽管天气炎热，窗户还是紧闭着。墙的上部有几架调节空气的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风叶搅动着飘浮在两排灰色病床上空混浊而炎热的空气。大厅内四面八方，只听到一片单调的哀鸣声，有人在低声呻吟，也有人在高声呼号。从装有铁栅栏的高高的窗口中泻进来一股强烈的光线，有几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在这光线下缓慢地走动。在这大厅里朗贝尔感到热得十分难受。里厄弯着身子站在一个正在呻吟的病人面前，朗贝尔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有两个女护士在床的两旁帮着把病人的下肢分开。当里厄重新直起身子的时候，一位助手递过一只盘，他把手术器械往盘里一扔，接着就一动不动地站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正在包扎的病人。

当塔鲁走近时，里厄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事。剩下的就是在朗贝尔走后重新组织第三调查组。”

里厄点点头。

塔鲁接着说："卡斯特尔做出了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下试验。"

"啊！这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在这儿呢！"

里厄转过身来。当他看到记者时，他那双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就眯了起来，他说：

"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象真的，好象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末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末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象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象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末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症，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推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象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

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复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字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回口袋里去了。

卡斯特尔仍旧坐着，他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里厄。

“您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里厄回答说：“没有。他在隔离营里。”

孩子在床上呻吟，里厄使劲地握住床架的横档，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病孩，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起来，接着又咬紧牙关，身体有点弯成弓形，四肢渐渐分开。从盖着军用毛

毯的赤条条的小身体上，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病孩的肌肉渐渐松驰下来了，他的两臂和两腿也向床中央收拢，他始终闭着眼，不声不响，呼吸显得更加急促。这时里厄的目光刚好与塔鲁的相接，但后者却把目光避开了。

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些孩子的死亡，因为几个月来。使人感到恐怖的鼠疫是不选择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象今天早晨那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看着孩子痛苦地受折磨。当然，这些无辜的孩子受到痛苦的折磨，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件令人愤慨的事。但是至少在这以前，可以说，他们是在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这样长时间地看到过一个无辜者的垂死挣扎。

这时病孩的胃好象被咬了似的，他的身体又重新弓起来，口里发出尖细的呻吟声。有好几秒钟，他的身体就这样地弯成弓形，一阵阵寒战和痉挛使得他全身抖动，好象他那脆弱的骨架被鼠疫的狂风刮得直不起来，被连续不断的高烧袭击得断裂开来。狂风一过，他又稍稍松驰了一点，热度好象退了，他就象被遗弃在潮湿而又发臭的沙滩上，微微喘息，暂时的憩息已象进入了长眠。当灼热的浪潮第三次向他扑来，使他有点颤动的时候，他就蜷缩成一团，在高烧的威胁下，他退缩到里床，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被子。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红肿的眼皮底下涌出，开始沿着铅灰色的脸往下流去。经过这阵发作之后，孩子已精疲力尽，他蜷缩着他那瘦骨嶙峋的两腿和那两只在四十八小时内瘦得象劈柴的胳膊。在这只被弄得不成样子的床上，他摆出了一个怪诞的、象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

塔鲁弯下身去，用他那笨拙的手擦掉小脸上的眼泪和汗水。卡斯特尔早已合上书本，看着病孩。他开始说话，但是因为嗓音突然走样，所以他不得不咳上几声才能把那句话讲完。

“里厄，这孩子早晨的病势没有缓解过，是吗？”

里厄说是，但是他说这孩子坚持的时间比通常人们所看到的还要长。帕纳卢看上去好象有点歪倒在墙上，他低声说：

“如果这孩子还是要死掉的话，那么这样反而会使他受苦的时间拖得更长些。”

里厄突然转向神甫，张开口想说什么，但是他没出声，明显地是在极力克制自己。他又把目光转移到孩子身上。

病房里充满了日光。在其他五张床上，病人在动，在呻吟，但是都有点拘谨，好象是大家商定了似的。只有一个病人在房间的另一端叫唤着，他每隔一定时间就发出一声又一声轻微的叹息，而这种叹息听上去倒象是惊叫而不太象痛苦的哀鸣。看来连病人也不象开始时那样感到害怕了。现在，他们对染上这种疾病抱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只有这孩子在拚命地顽抗挣扎。里厄不时地按小孩的脉搏，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摆脱他目前无能为力、静止不动的这种状态，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焦躁不安的表现和自己热血沸腾的感觉已浑然一体。那时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已不分彼此，于是就试图尽自己的尚未消耗过的全部力量去扶持这个孩子。但是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分钟就不协调了，孩子没领他的情，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下那只纤细的手腕，又回到他原来站的地方去了。

沿着用石灰粉刷过的墙，阳光由粉红色逐渐变成黄色。在玻璃窗外，一个炎热的早晨开始了。格朗在离去时说他要回来的，但大家几乎没有听见。大家都等待着。孩子一直闭着眼睛，现在好象平静了一点。他的两只手变得象爪子似的，慢慢地刨着床的两侧，然后，又举起来，去抓靠近膝盖的床单。突然，孩子蜷起两腿，直到大腿碰到腹部才停止不动。这时，他第一

次张开眼睛看看站在他面前的里厄。在他那张土灰色的凹陷下去的脸上，嘴巴张开来了，几乎立即就发出一声拖长的、音调几乎不因呼吸而发生变化的叫喊，整个病房里突然充满了一种单调的、刺耳的抗议声，它简直不象是一个人的声音，而象是所有的病人同时发出来的怪叫声。里厄紧咬牙根，塔鲁转过身去。朗贝尔走到床前，站在卡斯特尔旁边，这时，卡斯特尔合上了那本摊开在膝盖上的书本。帕纳卢看着那小孩因病而污垢满布的小嘴，它在发出那种让人辨别不出年龄的叫声。神甫跪了下来，在那连续不断、不可名状的哀叫声中，大家自然而然地听到他用一种有点儿压低但又很清晰的声音说："我的天主，救救这孩子吧。"

但是孩子还是在叫喊，他周围的其他病人也骚动起来了。那个在病房另一头不停地叹息的病人加速了呻吟的节奏，最后他也真正地叫喊起来，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呻吟得越来越厉害。一片痛苦的哀鸣声象潮水一样在病房里泛滥，淹没了帕纳卢的祷告声。里厄紧紧抓住床架的横档，闭上眼睛，感到极度疲劳和厌烦。

当他重新张开眼睛时，他发现塔鲁在他身边。

里厄说："我必须走开，看到这些人我已再也忍受不住。"

但是突然之间，别的病人都一声不响了。这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叫声早已变得很弱，它越来越低，终于停止。在孩子周围的病人又开始呻吟起来，但声音很低，犹如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这场刚刚结束的斗争的回声，因为这场斗争已经结束。卡斯特尔已走到床的另一边，他说，完了。孩子的嘴张开着，但是默默无声，他躺在乱成一团的床单之中，他的身体一下子缩得很小了，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帕纳卢走近病床，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他拿起他的

长袍，沿着中间过道走了出去。

塔鲁问卡斯特尔："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吗？"

老医生摇了摇头。

"说不定，"老医生强带笑容说，"他毕竟支持了很长时间。"

但是里厄已经离开病房，他走得那样快，神态那样冲动，以至当他走过帕纳卢身边时，神甫伸手去拉住他。神甫说："算了，医生。"

里厄仍象刚才那样冲动地转过身来粗暴地对神甫说："啊！这个孩子至少是纯洁无罪的，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接着他转过身去，走在帕纳卢前面，穿过病房的门，走到院子的尽头。他在积满尘土的小树中间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擦了擦已经流到眼睛里的汗水。他想再高声呼喊一下，好解开使他心碎肠裂的心头死结。热浪慢慢地在无花果树的枝杈中间降临。早晨的蓝天很快地就被一层微白色的云彩遮住，使空气变得更闷热了。里厄灰心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看着树枝和天空，呼吸慢慢地平定下来，疲劳也逐渐恢复。

他听到背后有人说："为什么跟我说话发那么大火？这样的情景，我也是一样受不了的啊！"

里厄转身向帕纳卢说：

"是啊，请原谅我。疲劳简直是一种疯狂。在这个城里我有时候按捺不住，忍受不下去。"

帕纳卢喃喃地说："我明白。因为这一切超过了我们的承受限度，这就令人恼火。不过，或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里厄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瞪着帕纳卢，摇了摇头说："不，神甫。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在帕纳卢脸上闪过了痛苦的阴影。

“啊，医生，”他悲伤地说，“我刚懂得什么叫天主的恩惠。”

可是里厄又颓丧地在长凳上坐下。他又感到十分疲倦，对神甫的话，他用较缓和的语气回答说：

“我知道，这正是我所缺少的。不过我不想跟您讨论这些事。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能使我们超越渎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唯有这一点是重要的。”

帕纳卢在里厄身旁坐下来。他显得很激动。他说：

“对，对。您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

里厄略带笑容。

“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

帕纳卢迟疑了一下说：

“医生……”

但是他停下不说了。他的前额上也开始冒出汗来。他喃喃地说了声“再见”，他站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在他要走的时候，正在沉思的里厄也站了起来，向神甫走近了一步说：

“再一次请您原谅。今后我决不再这样发火了。”

帕纳卢向他伸出手，忧伤地说：

“不过，我没有把您说服！”

里厄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疾病。这一点您是很明白的。可是不管您愿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忍受它们和战胜它们。”

里厄一边握着帕纳卢的手，目光不朝神甫看，一边说：

“您瞧，现在就连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

自从帕纳卢加入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他把自己置身于抢救人员的行列之中，置身于他认为是自己应该呆着的行列之中，即参加第一线的抢救工作。他看到过不少死亡的场面。尽管原则上他注射过抗疫血清，是有免疫力的，但他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毫不担心的。表面上，他一直很镇静。不过，自从那天他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一个孩子死去之后，他变了样。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紧张不安的神情。有一天他微笑着对里厄说，现在他正在写一篇题为：《一个神甫能否请医生看病？》的短论。当时在里厄的印象中，帕纳卢实际上是在写一篇题材更为严肃的文章，只是他没有讲明罢了。当里厄医生表示很想拜读一下他的作品时，帕纳卢告诉里厄，说他在专为男教徒做弥撒的时候要作一次布道，借此机会，他至少可以阐明自己的某些观点。

“医生，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会对这题目感兴趣的。”

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神甫作了第二次布道。说实话，这次听道者的座位要比第一次布道时空得多了。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对本城的居民来说，已经不再具有那种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城市目前所处的困难情况下，“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对大多数人说来，当他们尚未完全放弃参加宗教仪式，或是说，尚未到达这样的地步，即既参加宗教仪式又过着极端不道德的私生活，两者并行不悖，这时，他们会用一些缺乏理性依据的迷信来代替平时的宗教活动。他

们宁可佩带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徽章或圣洛克的护身符，而不是猫弥撒。

比如，本城居民迷信预言的习惯就是一个例子。在春天的时候，人们就已在期待鼠疫过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一下别人，这种疫病到底还要拖延多久，因为大家都深信它不会拖延下去。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灾祸真的会没完没了，同时，鼠疫结束就成了人人的希望。于是，人们就互相传递占星术士的各种预言，或者天主教会的一些圣人的谶语。城里的一些印刷商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人们的这种着迷的心理中渔利，于是就把当时城里流行的谶语和预言大量印刷出版。当他们觉察到公众的这种好奇心漫无止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派人到市图书馆去博览群书，从野史轶闻中寻找这类东西，然后印出来在城里推销。当他们在图书资料中再也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请一些新闻记者来杜撰，而这些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能与他们的历代优秀同行媲美的才华。

某些预言甚至在报上长篇连载，人们在读这些文章时的贪婪程度，与正常时期阅读报上的那些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两样。有些预测是通过一些怪诞的计算编造出来的，它们的根据是：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的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另一些预测采用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鼠疫进行比较的办法，从而总结出历次鼠疫的共同点(预言把它们称之为常数)，通过同样怪诞的计算，据说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有关这次鼠疫的启示。但是最受公众欢迎的，无疑是下述的这一类，它们用那种《启示录》①式的语言来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每一事件都可能是

① 《圣经·新约·启示录》系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重降"的景象。

要在这个城市中应验的，而且事件又很复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米斯① 和圣女奥迪尔② 求教，而且总是获得满意的结果。此外，所有一切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到最后总是使人感到宽慰。但唯独鼠疫始终难以使人感到宽慰。

市民们以这些迷信活动代替了宗教，所以当帕纳卢讲道的时候，教堂里只有四分之三的座位上坐着人。讲道的那天晚上，里厄在到达时，感到通过入口处的弹簧门灌进来的一股股风正在信徒们中间自由回旋。就在这寒气袭人、寂静无声的教堂里，里厄在全部由男教徒组成的听道者中间坐了下来，接着他看到神甫登上讲道台。神甫用一种比第一次讲道时更加柔和、更加深思熟虑的语调说话，而教徒们有好几次发现他说话时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说话中已不称“你们”而称“我们”。

可是，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开始提醒大家说，好多月来，鼠疫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坐在我们的桌边或者坐在我们亲人的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旁走动，看到它在工作场所等待我们上班，因此现在，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接受它那不断地对我们说的话，而这些话，由于当初思想没有准备，我们很可能没有好好地听进去。帕纳卢神甫以前在这同一地点布道时所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至少他自己坚信不疑。但是也很可能，正象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想的和讲的都缺乏

① 诺斯特拉达米斯(1503—1566)，法国占星家，医生，生于圣雷米，曾写过一本预言集。

② 圣女奥迪尔：阿尔萨斯公爵阿达尔里克的女儿。公元660—720年左右，她在孚日山区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慈善之心，因而现在感到后悔。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是真实的，就是任何事情总有值得汲取的东西。最残酷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种恩惠。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基督徒应寻求的东西，就是他应领受的这种恩惠，他还应该知道这恩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么才能找到它。

这时候，在里厄周围，人们都显得十分自在地坐在长凳的靠手之间，并尽可能坐得舒适些。教堂进口处包着垫衬物的隔音门有一扇在轻轻地来回摆动着，有人跑去把它制住了。里厄由于被这些杂声分了心，没听清楚帕纳卢在他的布道中又讲了些什么。神甫大概是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里厄模糊地把神甫的话理解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后来他的注意力被帕纳卢强有力的声音吸引住了。神甫说，有些事在天主看来，人们是可以解释的，而另一些事，人们就没法解释。当然，世界上有善与恶，而且一般地说，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要深入到恶的内部，把它解释清楚，那就困难了。比如，从表面上看，恶有必要的恶和不必要的恶。有被打发到阴间去的唐璜[①]，也有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好色之徒被雷击毙是应该的，那么这孩子为什么要吃苦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除此以外，上帝给了我们一切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可以说，在这以前，宗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现在，恰恰相反，上帝把我们置于面临绝壁、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都成

① 西欧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代表蔑视神鬼、风流放浪、好色如命的贵族。

了鼠疫的阶下囚，我们只得在死亡的阴影下去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现成话来越过这道囚牢的墙。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的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会补偿他所受到的痛苦的。但事实上是否如此，神甫一无所知。谁能确实肯定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如果谁这么说，谁就算不上是一个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主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不，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问题，神甫宁愿处于绝壁之下不求愈越，因为他忠实地接受这种象征着十字架的磔刑考验。于是，他毫无畏惧地对那天来听他布道的这些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临了。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可是你们中间谁敢全不信？"

里厄刚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但没等他想完，神甫已经接着大声地讲下去。神甫指出，这个命令，这个纯洁的要求，就是赐予基督徒的恩惠。这也是他的德行。神甫知道，在他就要讲的德行里，有些过分的东西会使许多人听起来不顺耳，因为他们习惯于一种更宽容的、更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在鼠疫流行时期的宗教不可能同平时的宗教一样，如果上帝同意，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能得到安息和快乐，那末在这不幸透顶的时期，他可以对人的灵魂提出过头一点的要求。今天，上帝赐予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恩惠，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灾难中，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再去寻求和支持这个至高无上的德行：作出抉择，要就是全盘接受信仰，要就是全盘否定。

在上一个世纪，有个教外的作家曾扬言，说他揭开了教会

的秘密，他断言不存在什么炼狱①。他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只有天堂和地狱，根据人们生前选择的道路，死后要么进天堂得永生，要么下地狱受永罚。但帕纳卢认为这是一种邪说，一种只能出自一个没有任何信条的灵魂的邪说，因为炼狱是有的。不过，可能在某些时期中，人们不应该过分指望炼狱，某些时期中，谈不上有什么可以饶恕的罪孽的问题。凡是罪都足以导致下地狱，凡是无动于衷的态度都是犯罪的，这就是说，要么有罪，要么无罪。

帕纳卢停了一下，这时里厄透过门缝更清楚地听到外面的风好象呼啸得更厉害了。就在这时，神甫说，他所讲的这种对一切全盘接受的品德，按照平时人们给予它的狭义的解释，是无法被人理解的，这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谦让，而是一种自卑自贱，不过，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卑自贱。当然，一个孩子竟遭受到这样的痛苦，这是使人心灵上感到耻辱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应该投身于这种痛苦之中，正因为如此——帕纳卢使他的听众确信，他要说的话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我们应当主动去“要”这种痛苦，因为天主愿意“要”它。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别无选择地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一直走到底。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落到全盘否定信仰的地步，他会决定全部接受。现在，在各处教堂里，当那些善良的妇女听说人体上肿胀的淋巴结是排除身上罪愆毒液的自然管道的时候，她们就说：“我的天主啊，让我身上长淋巴结吧！”基督徒也会象这些妇女一样，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听凭他的圣意安排——即使这种圣意无法理解。人们不能说：

① 也叫涤罪所，根据天主教教义，这是人死后暂时受苦的地方。善人生前罪愆没有赎尽，死后升天堂前须在涤罪所中暂时受苦，至罪愆涤尽为止。

“这个，我懂，但是，那个，不能接受。”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每当帕纳卢神甫讲话稍稍停顿一下的时候，周围马上会发出一阵轻轻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刚开始，神甫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了下去，装作代替他的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呢？他预料到，人们将会说出“宿命论”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啊，只要人们允许他在“宿命论”前面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的话，那末他会毫不害怕这个字眼的。当然，应该再次指出，不要去模仿他上次讲到过的那些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也不应该去学那些波斯的鼠疫患者的样子，这些人一面把他们的旧衣服扔向由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纠察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降到这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因为后者想战胜天主赐予的灾难。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要去学习那些开罗的修道士，他们在上个世纪鼠疫蔓延的时候，为了防止受感染，避免接触信徒们又潮又热的嘴，就用镊子夹圣体饼来举行送圣体仪式。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是犯了罪孽的，因为前者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熟视无睹，而后者，正相反，他们使人类对病痛的害怕心理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把问题巧妙地回避了。他们一直都对天主的声音装聋作哑。此外，帕纳卢还想举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在赎俘会修道院中的八十一个修道士中，只有四人幸免。而在这四人中，有三人是逃走的。当时编年史作者们是这样记述的，限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不会写得更详尽，但是当帕纳卢神甫读这篇文献时，他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那个没有逃走的修道士身上，这个修道士不管面前有七十

七具尸体，尤其不顾他那三个同伴已经逃跑，还是一个人留了下来。于是，神甫一面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一面大声地说："我的弟兄们，应该学这位留下的修道士！"

一个社会，为了应付灾祸所引起的混乱局面，必然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维持合理的秩序，而问题决不是对此抱不合作的态度。不要听那些伦理学家的话，说什么应该俯首听命和放弃一切。我们只要能开始在黑暗中略为摸索地前进和力争做些有益的事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事，哪怕是涉及到孩子们的死亡，也应该听任它们自然发展，充分相信天主的安排，而不要去寻求个人的解决办法。

讲到这里，帕纳卢神甫追忆了贝尔增斯主教在马赛遭受鼠疫浩劫时的崇高形象。他让人回想起在鼠疫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主教在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之后，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挽救方法时，他就叫人在他的屋子四周用墙围起来，带了粮食把自己关在屋里；而那些一直把他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居民，就象人们在极度痛苦时感情会一反常态那样，都对他发起火来，把死尸堆在他的屋子周围，要让他也传染上鼠疫。他们甚至把一些尸体从墙上扔进去，非要他死去不可。因此，虽然这位主教在最后作出这一懦弱表现的时候，曾以为这样就已与死亡的世界隔绝了，可是死人却还是从天而降，落到他的头上。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确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没有可供我们避难的岛屿。是的，没有这么一个中间安全地带，没有。应该接受这件令人愤慨的事，因为我们必须作出抉择，对天主要么恨，要么爱。那末谁敢作出恨天主的选择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卢神甫最后总结说，"对天主的爱是一种艰苦的爱。要具有这种爱，就要具有一种彻底的忘我精神和一种无视个人安危的气魄。而且，也只有有了这种爱才能从精

神上抹掉孩子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具有这种爱才能使死亡成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懂得死亡，只能去求得死亡。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一起汲取的艰巨的教训。这就是在人们看来是残酷的，而在天主看来是起决定作用的信仰，也就是大家应该去逐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使自己与这个孩人的形象看齐。达到这一最高的境界时，一切都会合成一体，不分轩轾，到那时，真理才会从表面的不公平中涌现出来。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教堂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几世纪来，鼠疫的牺牲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就在死者去的坟墓上布道，而他们所宣扬的精神正不断地从这堆包括那些死去的孩子在内的骨灰中焕发出来。”

当里厄走出教堂的时候，一阵狂风从那扇半开着的门里吹进来，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它给教堂里带进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股人行道返潮的气味，它使人们在还没有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象出城市是个什么面貌。走在里厄医生前面的是一位老年教士和一位年轻的副祭，他们费劲地按住了帽子。尽管风那么大，那位年长的仍在不停地评论着这次布道。他很钦佩帕纳卢的口才，但是他为这位神甫所流露出来的如此大胆的思想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次布道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力量，而是带有更多的忧虑成分，一位象帕纳卢这样年龄的教士是不应该忧虑的。低着脑袋挡风的年轻的副祭说，他经常跟这位神甫打交道，很了解他的思想演变，并且说帕纳卢的论文可能还要大胆得多，不过，教会大概是不会允许他出版的。

老年教士问：“那么，他到底有什么见解呢？”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大风围着他们呼啸，使年轻的副祭无法讲话。当他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只是说：

“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塔鲁听了里厄告诉他的、关于帕纳卢在布道时所讲的这一番话之后，对医生说，他认识一位神甫，这位神甫在战争中发现一个青年人的两只眼睛已经被人挖掉，于是，他丧失了信仰，不信教了。

塔鲁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

塔鲁的这一见解是否能清楚地解释帕纳卢在以后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所作出的那种使周围的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人们以后会对它作出判断的。

在布道以后，过了几天，帕纳卢果然也忙起搬家的事来。这时候也正是由于疫情严重，在城里刮起一股搬家风的时候。塔鲁不得不离开旅馆，搬到里厄家去住，神甫也不得不放弃原先他所属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公寓房间，搬到一个还没有传染上鼠疫的、经常上教堂的老年女教徒家去。在搬家时，神甫已经感到自己越来越疲乏和焦虑不安。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这位房东太太的尊敬，因为，这位老太太曾向他热烈地赞扬了圣女奥迪尔的预言，而当时神甫大概是由于疲乏的缘故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尽管他后来作了不少努力，想使这位老太太对他至少没有恶感，但是他没有成功。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在他回到他的那间放满针钩花边织物的卧室之前，他总是看到她背对着他坐在客厅里，同时又听到她冷冰冰地，身子也不回一下，向他说声："晚安，神甫。"一天晚上，在上床的时候，神甫觉得头重脑胀，感到隐伏在他体内已好几天的热度象决了口的激流似地往手腕和太阳穴处冲来。

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是通过他的女房东的口大家才知道

的。第二天早上，按照她的老习惯，她起得很早。过了一会儿，她很奇怪没有看到神甫从他的房里出来。犹豫了好一阵子，她才决定去敲开他的门。她发现神甫一夜没有合过眼，仍躺在床上。感到周身有一种压抑感，而且他的脸部显得比平时更红。根据这位老太太自己的话，她很有礼貌地建议神甫去请医生来看一下，但是她的建议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使她感到遗憾。于是，她只能离开神甫的房间。过了一会之后，神甫按铃，请人把她找去。他对自己刚才的脾气暴躁表示歉意，并且向她声明说，他目前身上的不舒服与鼠疫无关，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很持重地回答他说，她之所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是担心他得了鼠疫，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自身的安全，她的安全是掌握在天主手里的，而她只是想到神甫的健康，因为她认为自己对他的健康负有部分责任。可是据她说，当时神甫再也没有说什么，她为了履行她的义务，再次建议他去请医生来。神甫还是拒绝了，只是他补充说了一些在老太太听来是十分含糊的理由。她认为自己只听懂了这一点：神甫之所以拒绝看医生，是因为这样做与他的原则不符。而这一点正好是她所无法理解的。由此她得出结论，认为她的那位房客的头脑已因发烧而发生混乱，她只能弄点药茶给他喝喝。

她决心不折不扣地履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她每隔两小时去看一次病人。使她最吃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一种不断的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一会儿把被单掀开，一会儿又把它重新拉到身上，他不断地用手摸他那汗淋淋的前额，并经常坐起身来，使劲地咳嗽，可是咳出来的声音就仿佛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又嘶哑，又带痰声，象硬逼出来的那样。那时，他好象是无法从他的喉咙深处挖出使他窒息的棉花团一

般。经过这阵发作之后，他带着十分疲乏的神色向后倒在床上。最后，他又坐起身子，并且在这片刻之间，他的眼光凝视着前方，而这种眼光比他先前所有的焦躁不安的样子更显得狂热。但是这位老太太，对于要不要去请医生，要不要违背病人的愿望，还在犹豫。她想，尽管样子看起来很可怕，但这可能只是一阵高烧的突然发作吧。

到了下午，她想问问神甫的病情，但她所得到的仅仅是支支吾吾的回答。她又重新提出了她的建议。于是，神甫又坐起身来，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但却非常清楚地回答说他不要请医生。这时，这位女房东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说，如果神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她就拨那只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每天在无线电广播里要重复十来次的电话号码，她总是念念不忘她的责任。想在夜里去看看她的房客和照料照料他。但是这天晚上，她把新煎好的药茶给神甫喝下去之后，想躺一会儿，结果一睡却睡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她急忙向神甫的房间奔去。

神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昨天，他的脸色因极度充血的关系涨得通红，而今天却变成一种青灰色，特别是他的脸部还很饱满，所以看起来更加明显。神甫凝视着悬挂在床上面天花板上的一盏小小的彩色玻璃珠串吊灯。当老太太走进屋子的时候，他朝她转过头来。据女房东说，这时他好象经过昨晚通宵的折磨，已经垮了，再也没什么力量反抗了。她问神甫身体怎么样。她注意到神甫用一种冷漠得出奇的声音回答说，他身体不好，但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请人把他送到医院，一切按规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吓坏了，慌忙奔去打电话。

中午，里厄来了。听了女房东的一番叙述之后，他只回答说，帕纳卢要求送医院是对的，但看来是太晚了。神甫用同样的无动于衷的神态接待了医生。里厄检查了神甫的全身，感到

很惊讶，因为他除了发现病人的肺部有肿胀现象和病人感到肺部有压抑感之外，没有发现有任何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主要症状。但是，不管怎么说，脉搏很弱，而且总的病势十分严重危急，因此希望很少。

里厄对帕纳卢说："您身上没有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但事实上，是可疑的，因此，我不得不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奇怪地笑了笑，好象是表示礼貌，但没有吭声。里厄出去打了电话之后又回到屋里。他看着神甫，亲切地对他说：

"我会留在您身边的。"

神甫显得又活跃起来了，把目光转向医生，这时在他的眼神里好象重新出现一种热情。后来，他开口了，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困难，以至无法知道他说这话是否带着忧伤的成份。

他说："谢谢。但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

他请人把放在他床头的十字架像递给他，当他拿到后，就转过身去望着它。

在医院里，帕纳卢没开过口。他象一个物件似的任人给他进行各种治疗，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十字架像。然而，神甫的病情依旧难以断定，在里厄思想里还是疑虑重重。这既象鼠疫，又不象鼠疫。再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鼠疫一直在使医生感到难以诊断，它好象是以此为乐。不过，拿帕纳卢的这个病例来说，他后来发生的情况将证明这种无法断定是无关紧要的。

热度升高了。咳嗽声越来越嘶哑了，病人整天受到咳嗽的折磨。晚上，神甫终于咳出了这块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它是鲜红色的。在发高烧过程中，帕纳卢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他半个身子倒在

床外，已经断了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毫无表情了。人们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这一年的亡人节①不同往常。当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因为它已突然发生了变化，转凉的天气一下子把秋老虎赶走了。象往年一样，一阵阵冷风不停地刮起来，大块大块的云从地平线一头奔向另一头，给房屋顶上铺上了阴影，但云块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重新照在这些房屋上。第一批雨衣已经出现。人们注意到，涂上橡胶、闪闪发光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报纸报道说，二百年前在南方发生严重的鼠疫时，医生为了预防自己传染上这种病，都穿着涂油的衣服。于是，那些商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过时的衣服存货拿出来倾售，因为人人都希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但是，尽管市内景色反映出季节的特点，公墓却是人迹罕至，冷落不堪。往年这时候，电车上充满了菊花的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来到她们亲人安葬的地方，把鲜花放在他们的墓前。在这个日子里，人们想以此来补偿死者在长长几个月中被人遗忘而独处黄泉之下的境遇。但是，这一年，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想念死者，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已经想得过多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三分遗憾和七分伤感的心情去扫他们的墓了。他们已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到他们墓前表示并没有将他们遗忘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闯进人们生活里来捣乱的死鬼，所以人们要忘记他们。因此，这一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被人们巧妙

① 天主教定十一月二日为亡人节，以追思去世之人。按照法国风俗习惯，实际上提前一天扫墓。扫墓时，置菊花束于亡者墓前。

地混了过去。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带讽刺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说来倒是真的，在焚尸炉里鼠疫之火越烧越欢。一天一天的过去，死者的数目可也真的并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象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从原则上看来，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比如说，鼠疫情势图表上的那条曲线，先是不断上升，然后是沿着横的方向前进，这使里夏尔医生感到十分快慰。他说，“这张图表好得很，好极了。”他认为鼠疫已达到了一个所谓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獗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

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在这一段时期中，疫情相对稳定，因而里厄所建立的医疗组织还足够应付局面。工作得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必再担忧还要作出

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须继续有规律地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不过也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出现的种种肺部受鼠疫感染的病症目前正在向全城的各个角落蔓延开去，就象风那样，在人们的肺里吹燃里一场火灾，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许多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形式的鼠疫出现，现在感染的危险性更大了。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专家们的意见一直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卫生防疫人员继续戴用消毒纱布口罩。不管怎么说，乍看起来，疫病似乎已蔓延开来。但是，因为淋巴腺鼠疫的病例正在减少，所以结算下来总数仍保持不变。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

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入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

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看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抽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入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象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搔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因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精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

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扎莱斯领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带着朗贝尔和塔鲁朝着看台的一个角落里走去。奥东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他看到他们来就站起来迎接。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打扮，还戴着那条硬领子。塔鲁只发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都竖了起来，一只鞋的鞋带散开了。这位推事显得很疲倦，他讲话时目光从不正视对方。他说，他看到他们很高兴，并委托他们谢谢里厄医生替他办过的事。

其他的人都没有讲话。

“我希望……”推事过了一会说，“菲利普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推事提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意识到事情起了变化。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在两朵云彩中间斜照到看台上，给三张脸镀上了一层金色。

塔鲁回答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什么痛苦。”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推事继续朝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

他们跑去向贡扎莱斯告别，他正在看一张轮班值勤表。这位运动员一边笑着一边和他们握手。

“至少我又找到了更衣室，”他说，“还是老样子。”

过了一会儿，当隔离营主管人陪送塔鲁和朗贝尔出去的时候，在看台上响起了一阵沙沙声。接着，那些平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夹带着嗡嗡的声音通知说，这些被隔离的人应该回帐篷去，要发晚餐了。这些人慢腾腾地离开了看台，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回到帐篷里去。当他们都安顿好之后，有两辆电瓶车，就是人们在火车站里看到的那种车子，装着两只大锅子，开到两个帐篷中间。只见人们伸出胳臂，两只长柄勺子伸入两只大锅里，然后从锅里把食品捞出来分别放在两只饭盒里。电瓶车又开动了，它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又停下

来分发晚餐。

“这倒很科学，”塔鲁对主管人说。

“对，很科学，”主管人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得意地说。

暮色苍茫，天空万里无云，一股柔和而无暖意的余辉沐浴着隔离营。在傍晚的宁静环境中，从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阵匙儿和碟子的声音。几只蝙蝠在帐篷上空飞来飞去，然后又突然消失了。从墙外传来了一辆有轨电车在轨道的岔口上轧轧作响的声音。

“可怜的推事，”塔鲁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喃喃地说，“真该替他想想办法。但是怎么去帮助一个推事呢？”

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惶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磨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扬扬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魆魆的、象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冈。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忽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不时闪过星空。微风吹来了芳草和石头的气息。四周一片寂静。

"这天气真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了下来，"好象鼠疫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似的。"

塔鲁转过身去，背对着里厄，眺望大海。

"对，"他隔了一会儿说，"天气真舒服。"

他走到里厄身旁坐下，并仔细地端详着医生。微光在天边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碰撞的声音从街道的深处传到他们的耳边。屋子里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塔鲁用非常自然的声调问道："里厄，您难道从来也不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作朋友吗？"

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作朋友的。不过，我们过去都没

有时间。”

“好，这就使我放心了。您愿不愿意把现在这会儿作为是我们共叙友情的时刻？”

里厄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么，好吧……”

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象悄悄地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了好一阵子。汽车开走了，跟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模糊的惊呼声再一次打破了寂静。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陪伴着他们两人的只是静悄悄的天空和星星。塔鲁站起身来，坐在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里厄。一眼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形象一张剪影似地贴在星空中。他讲了很久，下面是他讲话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们简单地谈谈吧。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天真无邪的思想，也就是说，脑子象一张白纸似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苦恼的人，我开始过得很不错，一切对我来说都相当顺利：我智力也挺好，我很能获得女人的好感，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某些忧虑的话，那末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了。现在……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象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

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象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

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地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象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象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象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象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

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转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时起，我一看到那本《谢克斯旅行指南》就十分反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法院、死刑和处决。我震惊地发现，我父亲可能已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每逢这种日子他就起得特别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把闹钟上好了发条。我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母亲，不过我对她作了更仔细的观察，于是我明白他俩之间已没有丝毫感情，我母亲是在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就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象我当时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懂了，对她也无所谓原谅，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家里很穷，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现在一定在等我说这句话：我当时立刻就离家出走了。不，我在家里还呆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又找他的闹钟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那天一整夜我没睡着。第二天当他回家时，我已经走了。接下来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父亲派人四处找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什么也没向他解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要是他逼我回家，我就自杀。他生性较温和，终于同意我离去，不过他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这种想无拘无束地生活的行为是很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的，而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忍住真诚的眼泪向我百般嘱咐。以后，隔了很久，我才经常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同时也见到了他。我想，这些接触也就使他满足了。至于我，我对他并不怨恨，

只不过心里有点惆怅。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接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之所以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那么冗长，这是因为它正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讲得快一点。从十八岁那年起，我离开了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糊口度日，我干过许多差使。一切总还算顺利。但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要替这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一笔帐。因此，我曾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过政治。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我曾经是这样想的，别人也曾经对我这样说的，而归根结底，这种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于是，我就跟其他一些我所爱的、而且至今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处决（那是在匈牙利），于是，童年时在法庭里所遇到的这种使我晕头转向的场面又一次使我（当时我已成人）视线模糊起来。

“您从来也没见过枪毙人吧？没有，当然罗，旁观者一般是邀请的，而且观众也是事先经过选择的。结果您只能停留在图画和书本中的描写水平上：眼睛蒙上布条，人捆绑在木柱上，远处几个兵士。告诉您，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执行处决

的行刑队站在离犯人一米半远的地方，这个你知道吗？要是犯人向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碰到士兵们的长枪！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这个您也知道吗？不，您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因为人们是不谈这些细节的。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好好睡过。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也就是说，不停地想着这些事。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至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象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发哽。虽然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有时候我向他们倾诉我内心的不安时，他们却对我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他们还向我灌输一些常常是很感动人的道理，硬使我接受我所无法接受的东西。不过我回答说，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穿着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也会振振有词，讲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道理来，而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所提出的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和迫不得已的情况，那么我就不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所讲的同样理由。他们向我指出，如果要附和这些穿红色法衣的人的话，有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去垄断判刑的权利。不过，我当时心想，要是让了一次步，那么就得一直让步到底。看来历史也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他们不是都在争

先恐后地杀人吗?!他们都杀红了眼，而且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和别人进行争辩，而是那只红棕色的猫头鹰，是法庭上的那件肮脏勾当：一张张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锁上镣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并为他的死亡办理好一切手续，以便他整夜整夜地处于垂死的恐怖之中，最后睁着眼睛，束手待毙。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胸口上的窟窿。我心想，在等待把问题弄清楚的过程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是的，在没有把问题弄明白之前，我决定采取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

“从那以后，我的思想没改变过。长期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死亡。是的，我一直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们大家当时都生活在鼠疫之中，于是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直到今天，我还在设法了解他们每个人，力图使自己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冤家对头，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失去的安宁。我只知道，为了使自己不再是一个鼠疫患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如果说这还不能拯救他们的话，至少也能尽量少使他们受害，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一点好事。因此，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我一概拒绝接受。

“因此，这场鼠疫并没有使我学到任何东西，要不，就是它教会了我应该跟您在一起同它作斗争。根据可靠的资料，我知道（是的，里厄，我对生活了解得很透彻，这一点您是看得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因此，我们要不断地留心自己，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脸上，从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只有细菌是自然产生的。其余的，例如健康，正直和纯洁，可以说是出自意志的作用，一种永远也不该停止的意志的作用。正直的人，也就是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这种人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不分心。而为了做到永远不分心，就要有意志力，就要处于紧张的状态！是的，里厄，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不想当鼠疫患者，那就更累人了。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显得很疲乏，因为今天大家都有点传染上了鼠疫。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不愿再当鼠疫患者的人觉得精疲力竭，对他们说来，除了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摆脱这种疲乏。

“从现在起，我知道，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现在将由其他人来创造历史。我也知道，我不能从表面上去判断这些人。我这个人没有资格当一个合理的杀人凶手。这当然不是一个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象我现在这样，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是说，在这地球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应该尽可能地拒绝站在祸害一边。这在您看来或许比较简单，但我却不知道这是不是简单，但是我知道我说的情况是确实的。我曾经听到过许多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差点儿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同时也迷惑了不少其他人，使他们同意谋杀。这才使我明白，人们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他们讲着一种把人搞糊涂的话。于是，为了走

上正道，我决定讲话和行动毫不含糊。因此，我说，在这世界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如果，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自己也变成祸害的话，那么，最低限度，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您看，这不能算是奢望吧！

“当然，应该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事实上，人们遇到的真正的医生很少，而且可能也很难遇到。所以，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的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获得安宁。”

最后，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地敲着平台。经过一阵沉默之后，里厄挺了挺身子，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远处响起了救护车的两下铃声。刚才还是模模糊糊的惊呼声现在都汇集到城市的边缘，靠近石头山冈的地方。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一种象爆炸那样的声音，然后，四周又是一片寂静。里厄看到灯塔又闪了两次光。微风好象已增强了风势，同时，有一股带盐味儿的阵风从海面上吹来。他们现在清楚地听到波涛冲去悬崖时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

“总之，”塔鲁爽直地说，“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

“可是您不信上帝。”

“是啊。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这是我今天遇到的唯一具体问题。”

突然，从刚才传来叫声的那边出现了一大片微光，一阵分辨不清的嘈杂声，沿着风的方向，传到两个朋友的耳畔。微光

立刻就暗了下去，而远处，在那些平台的边缘，只剩下一片淡淡的红光。在风势暂停的时候，他们清楚地先听到一片人的叫喊声，接着是一阵射击声，最后是人群的喧哗声。塔鲁站了起来，倾听着，但他们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塔鲁说："城门口又打起来了。"

"现在已经结束了，"里厄回答说。

塔鲁喃喃地说，这决不会结束，而且还会有牺牲者，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可能是这样，"里厄回答说，"不过，您知道，我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过，我的雄心没您的大。"

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就看了对方一眼。但是在夜空模糊的光线下，他看到的是一张忧伤和严肃的脸。风又重新刮了起来，里厄感到风吹在身上，暖洋洋的。塔鲁振作一下说：

"为了友谊，您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

里厄回答说："做您想做的事。"

"去洗个海水澡。即使对未来的圣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高尚的乐趣。"

里厄微笑起来。

塔鲁接着说："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到防波堤上去。总而言之，要是只生活在鼠疫的环境中，那就太愚蠢了。当然，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不过，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对，走吧，"里厄说。

不一会儿，汽车在港口的栅栏附近停了下来。月亮已经升

起，夜空中乳白色的光辉向四处投下了模糊的影子。在他们后面是城里鳞次栉比的房屋，一股热烘烘的混浊气流从那里吹来，驱使这两位朋友走向海边。他们向一个士兵出示了通行证，后者检查了好久才放他们走。他们穿过堆满了木桶和散发出酒香和鱼腥味的场地，朝着防波堤的方向走去。快走近时，一股碘和海藻的气味告诉他们大海在望。接着，就传来了波涛声。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下轻声吼鸣。当他们登堤时，万顷波涛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海面象丝绒那样厚实，又象兽毛那样柔软光滑。他们在面向大海的岩石上坐下。海水以缓慢的节奏冲上来又退下去。大海的起伏象人的呼吸一样平静，亮晶晶的反光在水面上时隐时现。在他们面前，展现着一幅漫无边际的夜景。里厄用手抚摸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他的周身。他转向塔鲁，从他朋友的那张安详而严肃的脸上，猜测出塔鲁也有着相同的幸福感，但他也知道这种幸福感不能使塔鲁忘却任何事物，当然也不会忘却世上的杀戮。

他们脱掉了衣服。里厄先跳下水。开始时，他感到水有点凉，但等他重新浮上水面时，却感到水是温的。蛙泳了一会后，他才懂得，这天晚上，海水之所以是温的，这是因为秋天的大海从地面吸收了在夏天时一连好几个月中贮存起来的热量。他以均匀的动作向前游着，双脚拍打着海面，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道翻滚的泡沫，海水沿着他的胳膊流到他的腿部。他听到很响的扑通一声：塔鲁下水了。里厄翻过身来，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面对悬挂着月亮和布满星星的天空。他深深地呼吸。接着，他越来越清晰地听到打水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塔鲁在后面游近了，不多会儿，连他的呼吸声也能听到了。里厄翻过身来，以同样的速度跟他的朋友齐头并进。塔鲁游得比他快，于是他只得加快速度。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里，他们以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力量向前推进，孤寂地远离了尘嚣，终于摆脱了这座城市和鼠疫。里厄先停下来，接着他们就慢慢地游回去。在回岸途中有一段时间他们遇到了一股冰冷的水流，在大海的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下，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他们重新穿好衣服，一言不发地踏上了归途。但这时，他们已成了一对同心同德的朋友，这天夜晚给他们留下了亲切的回忆。当他们远远地看到疫城的哨兵时，里厄知道现在塔鲁和他都在心里说着同样的话：鼠疫刚刚把他们忘却过一时，这很不错，但现在又该重新开始。

是的，又该重新开始了，鼠疫是不会长期地把任何人遗忘的。在十二月份，它又在市民们的胸口“燃烧”起来，使焚尸炉烧得通亮，使隔离营内无事可干、空着双手的人影不断增加，它以一种既顽固而又不规则的速度不停地蔓延。市政当局曾寄希望于冬天的来临，希望寒冷能刹住瘟疫的势头，然而鼠疫却毫不停步地越过了初冬的严寒。还得等啊！但是，人们等久了也就不再等了，全城居民过着毫无希望的日子。

对里厄医生来说，那天晚上他所享受的那种短暂的宁静和友谊的时刻也一去不复返了。城里又开设了一个医院，因此里厄只能整天跟病人打交道。他发现，虽然目前肺鼠疫患者与日俱增，但是病人似乎都能跟医生很好地配合。他们不再象鼠疫开始时那样沮丧或癫狂，而是好象对自己的利益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主动要求获得一些对他们最有益的东西。他们不断地要水喝，大家都想得到别人的热情对待。尽管里厄还是跟平时一样地劳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象以往那样孤独了。

十二月底左右，里厄收到预审推事奥东先生从隔离营写来的一封信，说他被隔离检疫的时间已超过规定，而管理部门却找不到他进隔离营的日期，因此人们还错误地把他关在里面。奥东夫人不久前已从隔离病房出来，她曾向省里提出抗议，结果她在那里碰了钉子，人们回答她说：决不会出差错。里厄请朗贝尔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几天后，奥东先生就来看他了。

事实上，果真出了差错，因此里厄感到有点气愤。可是业已消瘦的奥东先生却举起了一只软弱无力的手，字斟句酌地说，大家总会有出差错的时候。医生只觉得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里厄说："推事先生，您打算做些什么？一大堆卷宗等着您去处理呢。"

"啊，不，"推事说，"我想请假。"

"说的倒是，您该休息休息。"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回隔离营去。"

里厄惊讶地说："您不是刚从那儿出来吗？"

"我刚才没说清楚。有人告诉我说，在这个隔离营里是有志愿管理人员的。"

推事的圆眼睛滴溜溜的转了一下，他用手把竖起来的一撮头发弄弄平……

"要明白，我或许在那儿有事可做。另外，说起来也挺傻：在那儿能使我常想起我的小男孩。"

里厄看着他。在奥东先生的那双严厉而又缺乏表情的眼睛里是不可能突然出现温存的目光的。但是它们已变得较为混浊，失去了原来金属般的光泽。

"那当然，"里厄说，"既然您愿意去，那这件事就让我来办吧。"

医生果然把这件事办妥了，直到圣诞节为止，疫城中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塔鲁也一如既往，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各处。朗贝尔告诉医生说，在两个年轻的卫兵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个秘密的办法跟他情人通信。他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一封信。他建议里厄也利用一下他的渠道，医生同意了。这几个月来，里厄还是第一次写信，他提起笔来感到十分困难。他已经忘了某种语言。信发出了，可是迟迟不见回音。至于科塔尔，

他现在正是鸿运高照，生意兴隆，他的小规模的投机买卖使他大发横财。不过格朗在这节日期间却不太如意。

这一年的圣诞节与其说是福音节，倒不如说是地狱节。店铺里空空如也，黯然无光，橱窗里尽是些假巧克力或空盒子，电车中的乘客脸色阴沉，没有一点昔日圣诞节的气氛。往年的圣诞节，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都团聚在一起，而今年却只有少数特权者躲在积满污垢的店铺后间，用骇人的代价换来一些脱离大众而又见不得人的享受。教堂里充满着的不是谢恩声，而是哀鸣。在这座阴沉而寒冷的城市里，只有几个孩子在奔跑，因为他们还不懂得瘟疫在威胁着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跟他们提到，过去有圣诞老人，背着礼物而来，他虽与人类的痛苦同样古老，但却象年轻人的希望那样富于生气。现在，在大家的心灵里只留下一个很古老、很黯淡的希望，它使人不至于自暴自弃，走向死亡，而且坚持生活下去。

圣诞节前夜，格朗没有赴约。里厄很担心，因此第二天一清早就到他家去，但没有找到他。医生就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十一点左右，朗贝尔到医院里来告诉里厄，说他远远看到格朗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脸色十分苍白，后来格朗就不见了。于是，医生和塔鲁就坐车去寻找。

中午，天气十分寒冷。里厄跳下汽车，从远处瞧着格朗。这位老公务员的脸几乎紧紧地贴在一个橱窗上，橱窗里放满了粗糙的木刻玩具。眼泪从他的脸上象断了线的珍珠似地淌下来。里厄见了，心潮起伏，因为他懂得这些泪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感到一阵心酸，咽喉憋得难受。里厄同时也回忆起了这个不幸者在订婚时的情景：那时候也是圣诞节，在一家店铺前，让娜偎依在格朗的胸前，仰着身子，抬头对他说她很高兴。如今她那充满恋情的清脆的声音又从遥远的过去回到了格朗的

耳边，这是肯定的。里厄知道，此时此刻这位泪流满脸的老人在想什么，而他也跟格朗一样在想：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象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这时格朗通过玻璃的反映看到了里厄。他转过身，靠在橱窗上看着医生走过来，眼泪不停地淌着。

“啊！医生，啊！医生，”他呜咽着说。

里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频频点头，表示同情。他同格朗一样感到苦恼。这时他心头怒火翻腾，因为不论是谁，在看到大家都遭受到的痛苦时，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唉，格朗，”他回答说。

“我想找时间写封信给她，让她知道……让她能毫无内疚地感到快活……”

里厄拉着格朗向前走，他的动作有点粗暴。而格朗则一边几乎毫不抗拒地任他拖着走，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些不成句的话。

“这实在拖得太久了。我想听天由命了，有什么办法呢？啊！医生！我看起来就象现在这样平静。可是，我总是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勉强做得保持常态。可现在，实在受不了啦！”

他停了下来，浑身颤抖，眼睛象疯了似的。里厄抓起他的手，发现手烫得厉害。

“该回去了。”

但是格朗挣脱了医生的手，奔了几步路，然后停了下来，张开双臂，开始前后摇摆起来。他就地旋转了一下，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脸部被继续流着的眼泪弄得肮脏不堪。行人们远远看到这种情景，突然停了下来，不敢再向前走了。里厄只得

把老人抱了起来。

格朗躺在床上，呼吸非常困难，肺部受到了感染。里厄考还是一下：这位老公务员没有家室，何必送他进隔离病房呢？虑了让自己跟塔鲁一起来照料他吧……

格朗的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脸色发青，眼睛暗淡无光。他凝视着塔鲁用一只木箱子的碎片在壁炉里燃起的小小的火焰。他说："我的病情不妙。"他边说话边咳嗽，咳嗽的声音听起来很怪，好象是从他那燃烧着的肺部的深处发出来的劈劈啪啪的声音。里厄叫他停止说话，并说他会痊愈的。病人先是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接着脸上又出现了一丝温柔的表情。他费劲地挤了挤眼，说："要是我能死里逃生，医生，我向您脱帽致敬！"但是，话刚说完，他就进入了衰竭状态。

几小时后，里厄和塔鲁发觉格朗坐在床上。里厄从他那烧得通红的脸上看到病情恶化，感到十分吃惊。但病人的神志好象比刚才清醒了些，一见到他们，就立即用一种异常低沉的声音请求他们把他放在抽屉里的一份手稿拿给他。他接过塔鲁递给他的手稿，连看也不看，就紧紧地把它贴在胸口，然后又把它递给里厄，做了个手势，表示请医生念一下。这是一份五十来页的短短的手稿。医生翻了翻，发现在这些稿纸上只是写着一句同样的话，只不过是抄了又抄，改了又改，增增删删。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字一再地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成句子。作者在他的手稿里还作了注释，罗列了那句句子的不同写法，注释有时极其冗长。但是在最后一页的末尾，只写着一句书法十分工整的句子，而且墨迹还很新鲜："我亲爱的让娜，今天是圣诞节……"在这句话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那句句子，这当然是最新的写法了。"请念一下，"格朗说。于是里厄就念起来。

“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

“是这样写吗？”老人用一种狂热的声音问道。

里厄没有抬起眼睛看他。

老人激动地说：“啊！我知道。美丽，美丽，这个字不确切。”

里厄握住了病人搁在被子上的手。

“算了吧，医生。我没时间了……”

他的胸部困难地起伏着，突然，他大声说：

“把它烧掉！”

医生犹豫起来，但格朗重复了他的命令。他说话的语气是那样地严厉，又是那样地痛苦，最后里厄只得把这些稿纸扔到快要熄灭的炉子里去。房间里很快就亮了起来，一阵短暂的燃烧使屋子里略添暖意。当医生回到病人床前，只见他已转过身去，脸儿乎贴在墙上。塔鲁看着窗外，好象对这种场面无动于衷。给格朗注射了血清后，里厄对他的朋友说，病人过不了今夜就会死去，于是塔鲁提出让自己留下看护。医生同意了。

整个晚上，格朗将要死去的这个想法一直在里厄的脑海中萦回。但是，第二天早晨，里厄发现格朗已经坐在床上和塔鲁说话。高烧已退，现在只剩下全身无力的症状了。

“啊！医生，”老公务员说，“我错了。不过，我可以重写。您将会看到，我都记得很清楚。”

里厄对塔鲁说：“等一等再看。”

但是到了中午，仍没有丝毫变化。到了晚上，已经可以认为格朗已脱离险境了。里厄对这一起死回生的现象一点也不理解。

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却给里厄送来了一个年轻的女病人。

起先他也认为她已病入膏肓，因此病人一到医院，他就叫人把她隔离起来。这位在昏迷中的姑娘不停地讲胡话，她的病征完全说明她已得了肺鼠疫。但是第二天早晨，热度就退了。当时，医生还以为这种现象跟格朗的情况一样，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根据经验，他认为这是一个凶多吉少的征兆。可是到了中午，热度却没有回升。晚上，它只升高了几分，而到了第三天早晨，体温已经正常了。尽管那姑娘很疲乏，但她在床上很自由自在地呼吸着。里厄对塔鲁说，这姑娘的得救完全是反常的事。但是这一星期中，在里厄的医院里一连发生了四起同样的情况。

周末那一天，那位患气喘病的老人十分激动地接待了里厄和塔鲁。

“这下行啦，”他说，“它们又跑出来了。”

“什么东西跑出来了？”

“嘿！老鼠呗！”

从四月份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一只死老鼠。

塔鲁对里厄说：“是不是一切又会象以前一样重新开始？”

老人高兴地搓着手。

“瞧它们奔跑的样子！看了真叫人高兴。”

他已看见过两只活生生的老鼠从他家门口窜进来。一些邻居也告诉过他，他们家里，老鼠也重新出现了。在一些屋梁上，人们又重新听到已经忘记了好几个月的老鼠骚动声。里厄等着了解每周开始时发表的统计总数。结果，有关数字表明，疫势已减弱。

尽管居民们没想到疫势会突然减弱，但是他们还不敢高兴过早。这些月来，他们越来越希望能摆脱瘟疫的折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懂得了谨慎，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越来越不指望在短期内就能看到鼠疫结束。可是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一新的现象，于是在人们内心深处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但又不敢明说的希望。其他一切都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统计数字下降了，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相形之下，那些刚死于鼠疫的人就算不了什么。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人们没有公开盼望"健康时代"立即到来，但是他们却暗中在等待着。比如说，从那时起市民们就很乐意——尽管表面上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谈论在鼠疫结束后怎样去重新安排他们的生活。

大家一致认为一下子恢复鼠疫发生前的那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破坏起来很容易，而要重建那就困难了。人们只是认为食品供应可能会有所改善，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不再为最迫切的问题操心了。但事实上，在这些无关紧要的谈话里却同时冒出一种荒诞的希望来，使市民们有时会感到不对头，于是他们就急忙说，无论如何，鼠疫是不会一夜之间就结束的。

果然，鼠疫没有很快停止蔓延，但从表面看来，疫势减弱的速度超出了一般合乎情理的期望。在一月初，严寒持续不退，这是很罕见的。冷空气好象已经凝结在城市的上空。但天空却从来没有象这样蔚蓝。连日来，灿烂而没有暖意的阳光整天沐

浴着这座城市。这种新鲜的空气使疫势在三个星期里连续减弱，死于疫病的人数越来越少，瘟神似乎也劳累得精疲力尽了。在一个短短的时期里，鼠疫几乎失去了它在好几个月里积蓄起来的全部力量。就拿格朗或者上面谈到的那个姑娘来说，他们本已被选中为它的牺牲品，但他们却逃脱了它的魔爪，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现在它往往在某些区里猖獗两三天，而同时却在另一些区里销声匿迹；在星期一它比平时夺走了更多人的生命，可是到了星期三，它却让全部病人几乎都逃脱了。看到它这种时而喘息不前，时而迅猛扑来的情况，人们就会说，它是由于烦燥和厌倦而垮下来了，不仅前一时期那股叱咤风云的威势、百发百中的精确打击能力已烟消云散，就连对自身的控制力也一去不复返了。卡斯特尔的血清一下子获得了一系列的疗效，而在这以前，这是从前也没有过的。过去，医生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从不见效，而现在却突然都百试百灵起来。好象鼠疫也遭到了围攻，似乎它突然的衰弱使人们到目前为止一直用来抵抗它的迟钝的武器变得锐利了。不过，有时鼠疫又会倔强起来，在一种盲目的振奋中，夺走了三四个病人的生命，而这些病人本来是有希望治好的。他们都是这场灾难中的倒霉鬼，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他们却成了鼠疫的牺牲品。推事奥东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人们不得不把他撤出隔离营。塔鲁说他运气不佳，但是人们不知道塔鲁说这话是指推事的死，还是指后者活着的时候运气不佳。

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疫势是在全线退却。省里的公报先是隐约流露出一点希望，最后向公众证实了这样一种信心，即胜利的大局已定，鼠疫正在放弃它的阵地。实际很难断定这是个胜利。只是人们不能不感到鼠疫好象去得和来时一样突然。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没变，昨天还是行之无效，而今天，

却看来很合适。人们只是得到这样的印象：鼠疫已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了，或者，可能它在达到了它的目标之后自行撤退。总之，可以说它的使命完成了。

可是，城里好象没有任何变化。白天，街上还是那样静悄悄的，而到了晚上却挤满了同样的人群，大多数人都穿着大衣，围着围巾。电影院和咖啡馆跟以往一样生意兴隆。但要是再仔细观察一下，人们就会注意到一张张脸都比以前开朗了，有时还挂着一丝微笑。这使人想起：在这以前，没有一个人在街上露过笑容。实际上，几个月来把这座城市缠得紧紧的不透光的帷幕已经出现了一个裂缝，而且每星期一从无线电广播新闻中，人们可以发现这个裂缝正在扩大，最后它将大到可以让人呼吸了。不过，人们只是悄悄地松了口气，还不敢明显地流露出喜悦的心情。要是前些时候传来诸如有一列火车已经出站，或者有一艘轮船已经到达港口，或者汽车将重新可以在市内通行等消息时，那准是谁也不会随便相信的，可是如果上述新闻公布于一月中旬的话，那却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这种变化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但这些微妙的差别，事实上却说明了市民们在希望的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大步，而且我们可以说，当市民们的心头点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光时，从这时开始，鼠疫的横行时期实际上就结束了。

但是，在整个一月份里，他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还是很矛盾的。确切地说，他们处在一种兴奋和沮丧两者相互交替的状态之中。尽管疫情统计的结果令人振奋，但最近还是发生了好几起试图逃跑的事件，这使当局感到十分意外，连守卫城门的岗哨也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大多数的逃跑事件都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这时候逃跑的人是受一些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所支配的。对一些逃跑的人来说，鼠疫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深深地播

下了怀疑的种子，使他们不能摆脱这种心情，他们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虽然鼠疫时期已经过去，但他们继续按照这个时期的准则来生活。他们是一些落后于形势的人。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绝大部分是那些在这以前一直被迫与亲人分离的人，经过了这段长期禁闭和心情沮丧以后，现在刮起的这股希望之风吹得他们反而失去了耐心，使他们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一想到与心上人重逢之日已经在望，但又怕功亏一篑，先行死去，不但团圆顿成泡影，连长期的煎熬也白费了劲，这时，他们禁不住惶惶不安起来。在这些月里，尽管他们被囚禁和流放，但他们还是顽强地坚持等待，而现在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然而它却摧毁了恐惧和绝望所不能摧毁的东西。他们等不及鼠疫结束，为了赶在它的前面，象疯子似地拼命向前冲。

不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自然流露的乐观迹象。比如说，人们发现物价已显著地下降。从纯经济学观点来看，这一现象无法解释。各种困难并没有减少，在城门口还保持了隔离检疫的手续，食品供应远远没有改善。因此，这一现象完全是精神因素造成的，好象疫势的减弱到处都有反应一样。同时，那些过去一直习惯于集体生活，但由于鼠疫横行而不得不单独分开的人也乐观了起来。城里的两个修道院重新开办了，因此集体生活得到了恢复。军人的情况也是同样。他们被重新召回到空着的营房里去，恢复了正常的部队生活。这些事虽小，但却很说明问题。

一直到一月二十五日，市民们就生活在这种秘而不宣的兴奋状态之中。这一星期，统计数字大大下降，经过与医学委员会商议，省里宣布鼠疫可以算是结束了。此外，公报补充说，为了慎重起见——这一点肯定能获得市民的赞同——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预防措施还要维持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一

发现鼠疫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就必须保持现状，重新采取有关措施”。但是，大家都把这些补充说明看成是一些官样文章，因此一月二十五日晚，城里欢腾了起来。为了配合大家这种兴高采烈的气氛，省长命令恢复正常时期的照明。在晴朗而寒冷的天空下，居民们又说又笑，闹声不绝，成群地拥向灯火辉煌的大街。

当然，许多屋子照旧紧闭着百叶窗。在这同一天的夜晚，可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不过在这些沉浸于哀伤中的人们中间，许多人心里也感到很大的宽慰，因为他们终于不必再担心会看到其他亲戚死去，或者不必为了保存自身而战战兢兢。就在此时，有些家庭中还有一个患鼠疫的病人住在医院里，而且全家人不是住隔离病房就是呆在家里，等待这场灾难有朝一日能真正离开他们，就象它现在已离开其他人那样。这些家庭对目前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无疑是最无缘分的。当然，他们也抱有希望，只是他们把它贮藏在心底里，在还没有真正的把握之前，他们是决不会把它掏出来的。对他们来说，这种处于垂死和欢乐之间的等待，这种默默无言的夜晚，在四周一片欢腾的气氛的衬托下，就显得格外残酷了。

但是，这些例外的情况丝毫不影响其余人满意的心情。当然，鼠疫还没有结束，而且它还将证明自己确是没有结束。可是大家的思想已经走在时间的前面，提前了好几个星期，似乎列车早就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轨上鸣笛飞驰，轮船在闪闪发光的海面上破浪前进了。要是再过上一天，大家的头脑可能不再那样发热，可能又会产生怀疑。但是目前仿佛整个城市都开动了起来，正在离开它曾经打下石基的地点，离开这些与外界隔绝的、阴森森的、静止不动的地方，最后带着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离去了。这一天晚上，塔鲁、里厄、朗贝尔和其他一些人混杂在人群中走动，他们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在塔鲁和

里厄离开了林荫大道很久后，甚至当他们在人影稀少的街道里沿着一幢幢紧闭着百叶窗的房屋默默地走着时，这种欢乐的声音还传到他们的耳边。痛苦在百叶窗后面继续折磨着人，而在离这些房子不远的大街上却充满着欢乐。由于他们已很疲倦，所以无法把这种痛苦和这种欢乐分离开来。解放的时刻迫近了，但这一时刻却同时充满了欢笑和眼泪。

当欢乐的嘈杂声变得更响的时候，塔鲁停了下来。在阴暗的路面上，有一个黑影在轻快地奔跑。原来是一只猫，这是春天以来人们见到的第一只猫。它在马路中间停了一下，犹豫了一会，舔舔爪子，把爪子迅速地抓一下它的右耳朵，接着又悄悄地奔了起来，最后消失在黑夜里。塔鲁微笑了起来。那个矮老头也准会高兴的。

但正当鼠疫好象远远离去，回到它那不为人知的巢穴里时，根据塔鲁的笔记，城里至少有一个人却为此感到十分惊慌，这就是科塔尔。

说实在的，自从统计数字开始下降以来，这些笔记变得相当奇怪。可能是由于疲劳的缘故，笔记的字迹显得很难辨认，而且它的内容也常常东拉西扯。此外，塔鲁的笔记一直是以记述客观事实为主，但现在却第一次充满了个人的见解。比如，在记录有关科塔尔情况的冗长篇幅中，人们可以读到一小篇关于这个玩猫老头儿的报告。根据塔鲁自己所说，在鼠疫期间，他对这位老头儿始终是很尊重的，无论是在鼠疫发生之前，还是在鼠疫结束之后，这老头儿一直使他很感兴趣，至于后来情况变了，老头儿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但这决不能怪塔鲁缺乏诚意，因为他曾设法找过这老头儿的。在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们分手之后，过了几天，塔鲁曾站在那条小巷口，希望能看到老头儿。那些猫已毫不爽约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几处充满阳光的地方取暖。但是在老头儿习惯出现的时刻，百叶窗却仍紧紧地关闭着，而且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塔鲁再也没看见百叶窗开过。于是，塔鲁出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小老头儿正在恼火或者已经死了。如果在恼火，那是因为老头儿以为自己有理，是鼠疫坑害了他；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下他的情况，正象考虑那个患气喘

病的老头儿一样，想一想他是不是个圣人。塔鲁并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是认为他的情况能给人一种“启示”。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可能人们只能达到某些近乎圣人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得去做一个谦逊而仁慈的恶神了。”

在这些笔记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其他人的评论，但这些评论总是与科塔尔的事情夹杂在一起，而且经常写得很分散。有些是写格朗的，说他现在已经健复，重新开始了工作，好象连一点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些提到里厄医生的母亲。塔鲁跟这位老太太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有时候也聊上几句。塔鲁把这些零星的谈话内容、老太太的态度、她的微笑以及她对鼠疫的看法都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他重点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讲话时的那种简单明了的表达方法，以及她对某一扇窗户的偏爱：这扇窗朝着宁静的街道，傍晚，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两手放得安安稳稳，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坐到暮色苍茫，夜幕渐渐降临到她的房内，把她变成一个黑影，最后把她那静坐不动的轮廓淹没在黑暗里。塔鲁还重点描写了她在屋里从这间走到那间的那种轻盈的步伐，还有她那善良的品质——虽然她在塔鲁面前从不明显流露出来，但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他处处能隐约体会到这一美德。最后，塔鲁认为，她具有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尽管她沉静、谦逊，但她在任何一种“光芒”之前，哪怕是在瘟神的“光芒”之前也毫不逊色。可是人们发现，塔鲁在笔记中写到此处，笔迹就开始歪歪扭扭起来，显得十分奇怪。而他接着写的那几行字就很难辨别了。最后的几句话第一次涉及他个人的事，这又一次说明他已控制不住他的笔了：“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也同样谦卑，我很喜欢她的这一品质，我一直想跟她在一起。我不能说她在八年前已经死了，她只是比平时更谦

卑地躲人耳目罢了，而当我回过来的时候，她已不在那儿了。”

言归正传，现在该谈科塔尔了。自从统计数字下降以来，他曾以种种借口，到里厄那儿去了好几次。但是实际上，每次他总是要求里厄对疫势进行预测。“您是否认为鼠疫就会这样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他对于这一点是怀疑的，或者至少他是这样说过的。但是他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这似乎说明他的信心也不够坚定。在一月中旬，里厄早就很乐观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每一次，这些回答非但没有使科塔尔高兴，却相反地使他产生种种反应，这些反应因时而异，有时是恼火，有时是沮丧。到后来，医生不得不对他说，尽管统计的结果表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不能就立即高呼胜利。

“这就是等于说，”科塔尔接着问，“人们还一点也拿不准，鼠疫说不定在哪天又会卷土重来，对吗？”

“对的，正象治愈率也可能越来越高一样。”

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忧虑的，但却显然使科塔尔感到宽慰。他曾当着塔鲁的面，和他区里的商人们谈话，竭力宣传里厄的见解。说真的，他也不难做到使人相信他的话，因为现在人们对这些初步胜利的狂热已经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又产生了怀疑；省里的公告确实激动人心，但当这阵激动的劲头一过，怀疑的阴影又回到人们中间。科塔尔看到大家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时，感到放心。但有时候他也感到沮丧。“是啊，”他对塔鲁说，“最后城门总会打开的。到那时，您看吧，人们一定都会把我撇下！”

在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大家发现科塔尔的性格变化无常。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设法讨好他区里的居民和熟人，但突然整整有好几天，他老是和他们顶嘴。至少，在表面上，他退出了社交场合，一夜之间，就开始过起一种遁世的生活来。

在饭店里，在戏院里，在他常去的咖啡馆里，人们再也看不见他的踪迹。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恢复他在发生鼠疫以前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整天关在自己的套房里，叫附近的一家饭店给他每天送来饭菜。只有在晚上，他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买一点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一出店门，他就奔向行人稀少的街道。虽然塔鲁在那时遇见过科塔尔，不过他也只能从后者的嘴里掏出了几句最简单的话。过不多久，人们一下子发觉科塔尔又变得爱跟人交往了：他滔滔不绝地和人谈论鼠疫，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每天晚上又高高兴兴地出没于人群之中。

省里发布公告的那天，科塔尔无影无踪了。两天后，塔鲁在街上遇到了他，后者正在那里徘徊。科塔尔请塔鲁陪他回到郊区去。由于那天下班后塔鲁感到特别累，所以他迟疑了一下。但科塔尔坚持他的请求。当时他显得很激动，话说得很快，嗓门很高，手势乱打个不停。他问塔鲁是不是认为省里的公告真的会使鼠疫结束。当然，塔鲁认为一份公告本身并不足以阻挡一场灾难，但人们揆情度理，认为鼠疫行将结束，除非发生意外情况。

科塔尔说“对啊，除非发生意外。不过，意外总是有的。”

塔鲁向他指出，省里规定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这证明省里多少是预料到了会有意外情况。

科塔尔的神色还是那样地阴沉和不安，他说：“省里做得很对，因为从情况发展的趋势来看，它发布的公告很可能是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塔鲁认为这种事也有可能，但他说，最好还是思想上准备着在不久的将来城市会开放，生活会恢复正常。

“行啊，就照您说的，”科塔尔说，“不过，您说的生活恢复正

常是指什么呀？”

“电影院里有新的影片，”塔鲁微笑着回答说。

但是科塔尔没有笑。他想知道人们会不会认为：鼠疫将丝毫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一切将会象从前一样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塔鲁认为：鼠疫又会使城市发生变化，又不会使它发生变化；当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居民们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正常，就象一切都没有变过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来，人们无法把一切都遗忘掉，即使是一心想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鼠疫会留下一些痕迹，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灵里。这个矮小的领年金者直言不讳地说他对心灵不感兴趣，并说他甚至对心灵的问题一点也不在乎。他所关心的就是想知道行政组织本身是否会改变，比如说，所有的机构是否会象从前一样地照常运转。于是塔鲁不得不承认他实在心中无数。按照塔鲁的看法，所有这些机构，由于在鼠疫期间都遭到了破坏，可以想象得出，在重新开始工作时会遇到点困难。人们还可以有这种看法：一大堆的新问题将会出现，因而至少说，旧机构免不了要重行调整。

科塔尔说：“啊！这有可能，实际上，大家都得一切重新开始。”

这时，两人已走到了科塔尔家附近。后者显得很兴奋，竭力装出乐观的样子。他想象城市会恢复正常生活，它将忘掉它的过去，以便重新从零开始。

塔鲁说：“是啊，总之，对您也一样，事情会好转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他们站在门前，握了握手。

“您说得对，”科塔尔越来越激动地说，“重新从零开始，这

倒是不错。”

但这时，有两个人突然从走廊的黑暗处跑了出来。塔鲁刚听到科塔尔在问这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这两个衣冠楚楚、模样象是公务人员的人就问这个矮子他是不是叫做科塔尔，后者发出了一种低沉的惊呼声，没等这两个人和塔鲁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他转身就跑，一下子消失在黑夜里了。塔鲁略微镇静了一会后，就问这两个人要干什么。他们作出一副既谨慎而又有礼貌的样子回答说，他们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说完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朝着科塔尔刚才逃跑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塔鲁就把刚才的场面记录了下来，但立即又提到他很疲倦（他的笔迹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接着写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这不成为一个理由来让自己不作好思想准备，于是他自问他自己是否真的有所准备。最后——而塔鲁的笔记也到此结束——他自己回答说，无论在白天和夜里人总会有片刻时间是懦怯的，而他就怕这一片刻。

第三天，也就是在城门开放的几天前，里厄医生中午回到自己家里，想看看有没有他一直等待的那份电报。虽然他白天的工作跟鼠疫最猖獗的时候一样累人，但是这种等待最后解放的心情消除了他的全部疲劳。他现在正生活在希望之中，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一个人不能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总是弄得那么紧张；全力以赴地跟鼠疫作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要是有这么一个感情奔放的时刻，让劲儿松驰一下，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他所等待的那份电报有好消息的话，里厄将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且他认为大家也都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他走过门房时，新来的看门人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向他微笑致意。在上楼梯的时候，里厄脑子里还留着这位看门人的那张被疲劳和穷困折磨得苍白的脸。

是的，当抽象观念告一段落之后，他将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运气不坏的话……但在他开门时，他母亲就跑来告诉他，说塔鲁先生不舒服。塔鲁早晨起来过，但他无力出门，现在刚重新躺下，老太太正在发愁。

“这大概没什么关系，”她的儿子说。

塔鲁直挺挺躺在床上，他那沉重的头部深深地陷在长枕头里，隔着厚厚的被子，还能看出他那结实的胸部。他正在发烧，头痛得厉害。他对里厄说他的症状很难断定，也有可能是鼠疫。

“不，现在还一点也不能确定，”里厄在给他检查之后说。

塔鲁当时渴得要命。在走廊中，医生对他的母亲说，这可能是鼠疫的开端。

“啊！”老太太说，“这怎么可能呢？不该发生在现在啊！”

她接着马上说：

“我们把他留下吧，贝尔纳。”

里厄想了想说：

“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可是城门就要开放了。我想，要是你不在这儿的话，我倒会行使我第一个权利，把他留下。”

“贝尔纳，”她说，“你把我们两人都留下吧。你知道我刚才又打过预防针。”

医生说塔鲁也打过预防针，但可能是由于劳累的缘故，他大概忘了注射最后一次血清和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里厄走入自己的书房。当他回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塔鲁看见他拿着几支装满血清的大安瓿。

“啊！是这种病吧，”塔鲁说。

“不是，这不过是一种安全措施而已，”里厄解释道。

塔鲁伸出了胳膊作为回答，接着里厄就给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注射，也就是他自己平时给其他的病人进行的那种注射。

“我们晚上再看看结果，”里厄说完看了看塔鲁。

“怎么不隔离，里厄？”

“现在还一点都不能肯定您是不是得了鼠疫。”

塔鲁费劲地笑了笑。

“给人注射血清，同时又不下命令隔离，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里厄转过身去说，

“我母亲和我两人会照料您的。您在这儿会更舒服一些。”

塔鲁没吭声。这时里厄正在整理那些安瓿，他想等到塔鲁

说话时再转过身去。最后，他走到床边。病人看着他。塔鲁的脸部表情显得很疲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还是镇静如常。里厄向他笑笑说：

“要是您能睡的话就睡吧。我过一会儿再来看您。”

当医生走到门口时，他听到塔鲁在叫他，于是他又回到病人跟前。

但是塔鲁好象在犹豫该怎么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讲了：

“里厄，应该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我需要知道。”

“我答应您的要求。”

塔鲁的那张大脸扭动了一下，勉强一笑。

“谢谢。我不愿死，我要斗争。不过要是我输了，我也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里厄俯下身去，紧紧地抓着塔鲁的肩膀，说：

“不！要做一个圣人，就应该活下去，斗争吧！”

这天的天气开始很冷，后来渐渐暖和了些，到了下午就下了好几场大雨和雹子。黄昏时分，天空略有放晴之意，但天气却变得更加寒冷刺骨。里厄晚上回来，连大衣也没顾得上脱掉就走进了他朋友的房间。他的母亲正在那儿打毛线。塔鲁好象没有移动过位置，但从他那由于高烧而变得惨白的嘴唇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坚持斗争。

“怎么样？”医生说。

塔鲁耸了耸他那露出被外的宽厚的肩膀。

“就这样，”他说，“我输了。”

医生俯身观察病人，发现在滚烫的皮肤下面出现了一串串的淋巴结，病人的胸部发出一阵阵杂音，使人联想起地下铁工厂的嘈杂声。塔鲁的情况很奇特，他的病症说明他同时患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鼠疫。里厄直起身来说，血清要过一会儿才能发

挥全部作用。塔鲁好象想说什么似的，但一阵高热卡住了他的咽喉，把他的话压了下去。

晚饭后，里厄和他母亲来到病人身边坐下。随着黑夜的来临，塔鲁的斗争也开始了。而里厄知道这一场跟瘟神的艰巨的斗争要一直继续到黎明。但是在这一斗争中最精良的武器并不是塔鲁的熊腰虎背，而是他的血液，也就是说里厄刚才在注射时所看到的、沿着针头从塔鲁胳膊里流出来的血液，更确切地说，是他血液里内在的那种比灵魂还要难于捉摸的东西，这是任何科学都无法作出解释的。里厄只能看着他的朋友进行斗争。他要做的无非是使脓肿早一点成熟，打一些补针，但是几个月来反复的失败使他学会了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措施的效果。实际上，他唯一的任务是为这些措施的偶然生效而创造条件，而这种偶然性常常是要靠人去促成的。他想，一定要促成这种偶然性，因为瘟神的表现已弄得里厄摸不着头脑了。它又一次卷土重来，力图挫败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它已从那些看来它似乎已经扎根的地方消失了，但是它却又出现在那些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它又一次搞得人们目瞪口呆。

塔鲁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跟瘟神战斗着。整整一夜，在病魔的袭击下，他始终没有焦躁不安，而只是以他那粗壮的躯体和他那默默无声的意志力来进行斗争。整整一夜，他也从来没有吭过一声，他以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正全神贯注于斗争，不能有一刻分心。里厄只能根据他朋友的眼睛来观察这一斗争的各个阶段：时而睁开，时而闭上；眼皮时而紧闭，贴着眼球，时而放松；目光时而凝视着一样东西，时而又回到医生和他母亲的身上。每当医生和他目光相接时，塔鲁总是作出巨大的努力，报以微微一笑。

有这么一会儿，街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似乎人们

听到了远处的雷鸣，正在迅速奔跑。雷声越来越近，最后街上响起了潺潺的流水声；又开始下雨了，不久，雨中夹杂了冰雹，劈劈啪啪地打在人行道上。窗前的挂帷一阵阵地波动。在阴暗的屋里，里厄的注意力曾一度被雨水声吸引了过去，现在他又重新端详起在床头灯光照耀下的塔鲁来。医生的母亲还在打毛线，她不时地抬起头来注意地看看病人。医生现在已把该做的事都做过了。雨后，房内一片寂静，但充满了一种无形的战争中听不见的搏斗声。失眠折磨着医生，他仿佛在寂静中听到一种轻轻的、有规律的呼啸声，这种怪声在整个鼠疫流行期间一直在他耳边回荡。他向他母亲打了个手势，请她去睡觉。她摇摇头表示拒绝，两眼炯炯有神，接着她就拿起手里的毛线活，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在编结针针头处的一个针眼，生怕打错了要返工。里厄站起身来去给病人喝水，然后又回来坐下。

外面的行人，趁着阵雨暂停，在人行道上加快了步伐。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轻下来，最后消失在远处。医生第一次发现这天夜晚跟发生鼠疫前的夜晚有着相同之处，街上很晚还有不少散步的人，而且也听不到救护车的铃声。这是一个摆脱了鼠疫的夜晚。似乎在寒冷、灯光和人群的驱赶下，瘟神从这座城市的黑暗深处逃了出来，溜进了这间暖烘烘的房间，向塔鲁那毫无生气的躯体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它已不再在城市的上空捣乱了，但却在这房间的沉闷的空气里轻声呼啸。几小时来，里厄所听到的就是它的声音。现在只得指望它的声音也会在这儿停下来，指望它也会在这儿承认失败。

在黎明前不久，里厄俯身对他母亲说：

“你该去睡一会，等八点钟好来接替我。在睡觉前，先滴注一下药水。”

老太太站起身来，放好毛线活，走到床边，塔鲁闭着眼睛

已经有好一会了，汗水使他的头发卷成一圈圈的贴在他坚强的额上。老太太叹了口气，病人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一张温柔的脸正俯向着他，高烧的滚滚热浪没有把他冲垮，在他的嘴边又出现了顽强的微笑，但他的眼睛又立刻闭了起来。他母亲一走，就留下里厄一个人了，他坐到她的椅子上。现在街上鸦雀无声，死一样的沉寂。房间内开始感到清晨的寒冷。

医生蒙蒙眬眬地打起盹来，但是黎明时第一辆汽车把他从半睡眠状态中惊醒了。他打了个寒战，看了看塔鲁，于是他明白现在正是斗争的间隙时间，病人也睡着了。马车的木轮和铁轮还在远处滚动。窗外，天还是黑沉沉的。当医生向床边走去时，塔鲁用毫无表情的眼睛望着他，好象还没有睡醒似的。

里厄问："您睡着过了，是吗？"

"是的。"

"感到呼吸舒畅了点吗？"

"舒畅了点。这说明点问题吗？"

里厄沉默了一会说：

"不，塔鲁，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您跟我一样都知道这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

塔鲁表示同意。

"谢谢，"他说，"请您始终确切地回答我。"

里厄在床脚边坐下。他感到在他身旁的病人的两条腿象死人的一样又直又僵硬。塔鲁的呼吸声变得更粗重了。

"热度又该上升了，是吗，里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是的，不过到中午我们才能知道。"

塔鲁闭上了眼睛，好象是在养精蓄锐似的。他的脸上有一种厌倦的神态。他在等待热度回升，而实际上，高烧已经在他体内的某处开始翻腾起来。当他睁开眼时，他的目光暗淡无

神。只是当他发现里厄俯身靠近他时，眼睛才闪了闪光。

“喝水吧，”里厄对他说。

他喝了水，头又往后倒下。

“时间真长啊！”他说。

里厄抓住他的手臂，但是塔鲁已把目光转向别处，没有作出反应。突然，高烧象潮水冲破了病人体内的某一堤坝那样，明显地又涌到了他的额部。当塔鲁把目光转向里厄时，医生把脸凑过去鼓励他。塔鲁还想勉强露出笑容，但这时他那咬得紧紧的牙关以及被一层白沫封住的嘴唇使他无法如愿。不过在他变得僵硬的脸上，两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闪耀着勇敢的光芒。

早上七点，老太太走进病房。医生回到他的书房打电话到医院，以便安排别人在那里替他的班。他同时也决定推迟门诊时间，在他书房内的沙发上躺一会儿，但他刚躺下就马上站起身来，回到了房间里。这时，塔鲁的脸已转向老太太，看着她那小小的身影，而老太太则正弯着身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两只手合在一起搁在腿上。她看到塔鲁这样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因此就把一个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并站起来把那盏床头灯关掉。但是日光很快地透过窗帘，不多会儿就驱走了屋内的黑暗，照亮了病人的脸庞。老太太发现他那凝滞的目光还停留在她身上。她俯身替他整理了一下枕头，直起腰来，把手放在他潮湿而又鬈曲的头发上，停留了一会。这时她听到一种仿佛从远处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向她表示感谢，并告诉她说现在一切都很安适。当她重新坐下来时，塔鲁已合上了眼睛，在他那衰弱的脸上，尽管嘴闭得很紧，好象又出现一丝微笑。

中午，高烧已达到了顶点。一阵阵剧烈的、出自体内深处的

咳嗽使病人的身躯不断地颤动，同时他又开始吐起血来。他的淋巴结已停止肿胀，但并未消退，硬得象紧紧地拧在关节上的螺丝帽，里厄认为已经不可能再动手术把它们打开。在一阵阵的烧高和咳嗽的间隙中，塔鲁还不时地把目光投向他的两个朋友。但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被瘟神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脸部，在日光的照耀下，变得越来越惨白了。高烧象一场暴风雨，使他周身不时地惊跳、抽搐，他越来越虚弱，最后渐渐地被这场暴风雨征服了。从现在起，里厄所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疮百孔，被这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他眼看着塔鲁渐渐地淹没在鼠疫的大海里，而他对此却束手无策。他只能留在海岸上，张开着双手，心如刀割。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灾难。最后，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里厄的视线，因此他没能看见塔鲁突然一翻身，面朝着墙壁，接着好象在他体内的某个地方有一根主弦绷断了似的，在一声低沉的呻吟中离开了人间。

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经结束，四周一片寂静。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觉到，在这具已经穿上衣服的尸体上面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气氛。许多天以前的一个晚上，紧接着人们冲击城门之后，在那一并排的似乎高高凌驾于鼠疫之上的平台上空，就曾出现过这种气氛。那时候，他就联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种情景：他亲眼看到一些病人死去，接着，类似这种宁静的气氛就会出现在病床的上空。这种间隔，这种庄严的间隙，这种战斗后的平静到处都是一样，这是一种吃了败仗后的寂静。但是，现在笼罩着他朋友周围的气氛却寂静得异乎寻常，它跟街上以及这座已摆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寂静气氛是多么

协调！因而，在里厄的感觉中，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它宣告了一切战争的结束，但同时又把和平变成了一种不治的创伤。医生不知道塔鲁最后是否找到了安宁，但至少在这时候，他自己预感到他将象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一个埋葬自己朋友的人一样，不会再有安宁的时刻了。

外边，夜晚仍然是那样的寒冷，星星在明朗而又冷峭的天空里闪耀着。在若明若暗的房间里，他们感到玻璃窗上寒气逼人，听到了严寒的夜晚里大风的凄厉的呼啸声。老太太坐在床边，姿势仍和平时一样，床头灯照亮了她的右侧。在屋子中间，远离灯光的地方，里厄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他想起了他的妻子，但每次他总是克制自己，打消这种念头。

在夜幕开始降临时，街上行人的鞋跟在寒冷的夜里发出清晰的咯噔声。

老太太说："你一切都安排妥了吗？"

"妥了，我已经打过电话。"

于是，他们又开始默默无声地守着尸体。老太太不时地看看他的儿子。当母子俩的目光偶尔碰在一起时，里厄就向她微微一笑。晚间街上那些熟悉的声音相继传到他们的耳边。虽然现在城里还没有正式批准车辆可以通行，但许多车辆又都重新行驶起来，它们络绎不绝地在路面上飞驰而过。讲话声、呼唤声此起彼落，接着是一片寂静，然后又传来马蹄声、两辆电车转弯时在轨道上的磨擦声、隐约的嘈杂声，随后又听到了夜晚的风声。

"贝尔纳？"

"嗳。"

"你累吗？"

"不累。"

里厄知道他母亲这时候在想什么，他知道她在疼他。但他也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是件了不起的事，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表达出来的。因此，他母亲和他永远只能默默地相爱。但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死去，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却没有能够进一步地互相倾诉彼此之间的爱。同样，他曾和塔鲁在一起生活过，塔鲁在这天晚上死了，但他们也没能真正享受过两人之间的友情。正象塔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输了。但是他，里厄，他又赢得了什么呢？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现在鼠疫和友情对他说来已成为回忆中的事了；他现在也懂得了柔情，但总有一天，柔情也将成为一种回忆。是的，他只不过是赢得了这些东西。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可能这就是塔鲁所说的“赢了”的含义！

街上又传来一辆汽车驶过的声音，老太太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里厄对她笑了笑。她对他说她不累，但马上补充说：

“你应该到山区去休息休息。”

“当然罗，妈妈。”

是的，他将到那儿去休息一下。为什么不呢？这可也是一个去那儿回忆一下的借口。不过，要是只懂得些东西，回忆些东西，但却得不到所希望的东西，这样活着就叫做“赢了”的话，那么这种日子该是多么不好过啊！大概塔鲁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而且他体会到，一种没有幻想的生活是空虚的。一个人没有希望，心境就不会得到安宁。塔鲁认为，人是无权去判任何人刑的，然而他也知道，任何人都克制不了自己去判别人的刑，甚至受害者本身有时就是刽子手，因此他生活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从来也没有在希望中生活过。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想做圣人，才想通过帮助别人来求得安宁？事实上，里厄对此

毫无所知，而这也无关重要。塔鲁给里厄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他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驶驾着医生的汽车，或者就是他那魁梧的躯体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一种生活的热情，一种死亡的形象，这就叫知识。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当里厄医生在早晨收到他妻子去世的消息时，他才显得很冷静。那时他正在自己的书房里。他母亲几乎是奔着给他送来一份电报，接着她又出去给送信人小费。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这一份打开的电报。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呈现的灿烂的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说："就是那件事，在八天以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说他已经预料到了，当然这是很难受的事。但是，在说这话的时候，他感到，他的痛苦来得并不突然。好几个月来，特别是这两天来，同样的痛苦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拂晓时分，城门终于开放了，全城的居民、报纸、无线电广播以及省里的公报都对此表示祝贺。尽管笔者跟有些人一样，当时不能完全投身到这狂欢的行列中去，但他感到有必要报道一下城门开放后的那些欢乐的时刻。

规模盛大的狂欢活动整天整夜地举行。同时，火车也开始在站上冒烟了，而那些从遥远的海洋开来的轮船已经驶向港口，这个新气象生动地表明，对所有那些因长期分离而感到痛苦的人来说，这一天是他们大团圆的日子。

在这儿，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曾经折磨了那么多市民的别离之情已发展到了何等地步。白天到达和离开该城的火车都载满了旅客。大家早就订购了这一天的车票，在暂缓撤销禁令的两个星期中，人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在最后的时刻省里会取消原来的决定。此外，有些旅客在快要到达该城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摆脱恐惧的心理，因为即使说他们对自己亲人的命运有一定了解，但他们对于其他人，对于这座城市本身却一无所知，他们把奥兰市的面貌想象得十分可怕。不过上面讲的仅仅适用于那些在整个分离期间还没有受到爱情煎熬的人。

至于那些多情的人，他们确实一直在想着他们的美事。他们唯一的变化是：在这些流亡的日子里，他们曾经想使时间过得快一点，而且他们后来还拼命要它过得更快些，但是当他们快要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却相反地希望时间过得慢些，而当火

车开始刹车并准备进站时，他们甚至希望时间停止不动。他们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强烈的情绪，认为这几个月来他们由于失去了爱情生活而遭到了损失，因此他们下意识地要求得到一种补偿：希望即将来到的欢乐时间能比度日如年的等待时间慢上两倍。那些在房间里或者在站台上等待他们的人——比如朗贝尔，他的情人早已得到了通知，并在几星期前就作好了动身的准备——也同样地迫不及待，心烦意乱，因为多少月来，鼠疫已使这种柔情蜜意化成了抽象观念，这就使朗贝尔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与他那有血有肉的心上人儿——这种柔情蜜意的具体对象——一起重温旧情。

他真想重新变成鼠疫初期时的自己，那时他恨不得一口气奔出城门外，飞到他爱人的怀里。但他现在知道这已不可能了。他变了，经过这场鼠疫，他已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尽管他拼命想驱除它，但它象隐藏在心底的忧虑那样继续缠住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了，他没有思想准备。幸福来得真迅速，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朗贝尔知道他将一下子再度获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

此外，每个人的心情都或多或少地跟朗贝尔一样，因此笔者应该讲的是大家的情况。虽说在这个火车站台上，他们又开始了各自的私人生活，但当他们相互交换目光和微笑的时候，他们还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患难与共的集体。然而，当他们一看到火车的浓烟，那种流放的心情就在一阵使人忘乎所以的兴高采烈之中突然化为乌有了。在好久以前，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就在这个站台上开始了长期的分离；而现在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在这同一的站台上，在一阵热烈的、激动的拥抱之中，在接触到他们已经开始生疏了的身体的一瞬之间结束了这一望穿

秋水的苦恼。那个向朗贝尔飞奔过来的身影还没等他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伸开胳臂搂住了她，她的头紧紧地偎依着他，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一头熟悉的头发，这时他禁不住热泪直淌，他不知道这是此时此刻的幸福之泪，还是长期来一直压抑着的痛苦之泪，不过他至少感到这些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核实，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张脸，还是正相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这个疑团要等他以后再去弄清楚了。眼下他想表现得跟他周围的人一样，好象相信鼠疫可以来临，可以消逝，可是人儿却不会变心。

他们一对一对地紧紧依偎在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如醉如痴，忘却了身外还有世界存在，似乎战胜了鼠疫；他们忘却了一切痛苦，忘却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这些人正打算回到家里去证实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因为他们长期没有收到亲人们的音讯，心里早就滋长了战栗不安的情绪。对于这些又感到了新的痛苦的人来说，对于另一些这时正在为死去的亲人沉痛哀思的人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离别之情已达到了高潮。对这些母亲、妻子、丈夫或情人来说，他们亲人的尸骨现在已经埋在死人坑里或者已经化为灰烬；对他们来说，鼠疫依然存在。

但是谁还会想到这些孤苦伶仃的人？中午，太阳驱散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在空中与它较量的寒气，阳光连续不断地照耀着这座城市。时间也仿佛停下来了。山冈顶上的炮台在宁静的天空中不断轰鸣。全城的人都跑到大街上来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它标志着痛苦的时间已经结束，遗忘的时间还没有开始。

各处广场上，人们都在跳舞。一夜之间，路上交通变得分外拥挤，汽车越来越多，街道水泄不通。整个下午，城里钟声齐

鸣，铿锵之音在蔚蓝的天空中、在金色的阳光下回荡。教堂里充满了欢乐的谢恩声。但与此同时，娱乐场所也挤得透不过气来，咖啡馆的老板也不顾以后如何营业，把最后剩下的酒全部卖给了顾客。柜台前挤满了一群群情绪同样激动的人，其中还可以看到许多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顾忌地搂抱在一起。人人都在叫着，笑着。这些月来，他们把生活的热情都积聚了起来，人人都不轻易流露这种热情。然而在这一天，在他们得以幸存的日子里，他们把它全部倾注了出来。明天才是小心翼翼地开始生活的日子。而现在，各种完全不同阶层的人都象兄弟一般汇聚在一起。死神没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解放的欢乐却给予它诞生的机会，它至少能维持上几个小时之久。

但是这种一般的热情洋溢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比如说，黄昏来临之前，那些跟朗贝尔一起挤在街上的人往往用一种泰然自若的态度来掩饰一种更微妙的幸福感。许多对男女，许多家人看起来确实象一些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在他们曾经受过苦难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向刚回到城里的亲人们指出鼠疫在这些地方所留下的明的或暗的痕迹，它的全部历史的见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喜欢摆出一副向导的架式，装出一副见多识广、鼠疫的见证人的样子，他们只谈鼠疫的危险而对它所引起的恐怖却只字不提。这种乐趣也并无害处。但另外也有些人他们走的是更加扣人心弦的"路线"；比如，一个情人满怀回忆中的焦虑不安的柔情，会对他的女伴说："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我曾经苦苦地思念你，可是你不在啊！"这些热情奔放的游客当时是很容易认出来的，因为在这一片嘈杂声中，他们边走边喁喁私语、互诉衷情，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比十字路口的乐队更真切地表达出这种获得解放的心情，因为在这一片欢乐的喧哗声中，这一对对快乐

的、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的人儿，虽然语言不多，却得意扬扬地、自私地显出一副非常幸福的样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鼠疫已经结束，恐怖时期已经过去。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在那里，杀死一个人如同杀死几只苍蝇那样，已成为家常便饭；他们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行为，这种有预谋的疯狂举动，这种对一切原有的社会道德置之不顾的囚禁生活；他们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着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当时，我们中间每天有一部分人的尸体被投入焚尸炉的巨口，最后化成一股浓烟，而另一部分人则每天在无可奈何和惊恐万状的枷锁下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总之，这就是里厄医生所看到的情景。当时，将近黄昏，他独自一人在这片钟声、炮声、音乐声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朝着市郊的方向走去。他要继续行医，因为病人是没有休假的。在美丽的霞光映照下，城市中飘起了过去熟悉的烤肉和茴香酒的香味。在里厄的四周是一张张仰天欢笑的脸。一对对男女紧紧地贴在一起，红红的脸蛋显得情意激动，他们不时地发出充满情意的叫声。是的，鼠疫结束了，恐怖时期过去了，而这种热情的拥抱说明了鼠疫确确实实曾经是人们流放和分离的根源。

好几个月来，里厄发现在行人的一张张脸上都带有一种亲如一家的神色，到今天他才恍然大悟，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现在只要看一看他周围的人就懂了。这些人终于盼来了鼠疫的结束，但由于艰难拮据，他们公然穿上了流放者的衣着。其实，他们长期来一直过着一种流放者的生活，这种生活起先只是通过他们脸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茫然若失和远离故乡

的神情反映出来，而现在在他们的衣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鼠疫发生后，城门随着关闭，从那时起，他们只是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失去了能抚慰一切痛苦的人间温暖。在不同程度上，住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这些男男女女都曾渴望团聚，当然，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团聚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当时对大家来说，这同样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都曾使尽全力去呼唤离别的情人，渴望肉体的温暖，往日的柔情，或怀念过去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失去了人们的友情，无法再通过诸如信件、火车、轮船之类的正常途径来跟人们取得联系，保持友情，因而深受其苦但又并不自觉。还有少数可能象塔鲁那样的人，他们也希望团聚，但这团聚的对象却是一种他们无法确定的东西，不过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合乎愿望的东西，因为想不出恰当的名字，有时，他们就把这东西称做“安宁”。

里厄继续走着。他越往前走，周围的人就越多，嘈杂声也越响，他似乎感到自己在原地踏步不前，市郊跟他之间的距离总是保持不变。他渐渐觉得自己跟这些吵吵闹闹的人群正在融化成一体，他越来越领会到他们的叫喊声意味着什么，他懂得在这些声音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代表了自己的心声。是的，大家都曾在肉体上和心灵上为难以忍受的分离、无可挽回的流放和永远不能满足的渴望而感到痛苦。在这些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在一阵阵救护车的铃声中，在这些所谓命运发出的警告声中，在这种一潭死水似的恐怖气氛以及人们内心的强烈反抗中，有一阵巨大的呐喊声在空中回荡不息，在提醒着这些丧魂落魄的人们，告诉他们应该去寻找他们真正的故乡。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真正的故乡是在这座窒息的城市的墙外，在山冈上的这些散发着馥郁的香气的荆棘丛里，在大海里，在那些自

由的地方，在爱情之中。他们想回到故乡的怀抱，恢复幸福的生活；对其余的一切，他们不屑一顾。

至于这种流放和这种团聚的愿望究竟有什么意义，里厄却又无从知晓。他继续往前走，到处人们挤他，向他吆喝。就这样，他渐渐地走到了行人比较稀少的街道上。他认为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都无关紧要，只须看到有这种符合人们心愿的东西存在就够了。

从现在起他对这点有所了解，在市郊的那些几乎空无一人的街上，他对这点就看得更清楚了。有些人恋恋不舍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一心只想回到他们那充满爱情的家园，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或许会得到满足。当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失去了自己所等待的亲人，还在城里踽踽独行。另有些人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象某些人那样遭到了两次分离的痛苦，后者在鼠疫发生以前没有能够一下子就建立起爱情，其后又在好几年的岁月中盲目地一味追求这种勉强的结合，以至最终由情人变成了冤家对头，前面说的那些还算是幸运的人，象里厄本人一样，曾经轻易地相信时间能解决问题：一念之差，结果暂别成了永诀。但是另外还有些人，例如朗贝尔（医生就在这天早晨离开他的时候对他说过："勇敢些，现在该是您得胜的时候了。"），他们这些人很快就重新找到了原先以为已经失去了的亲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会感到幸福。他们现在知道，要是说在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且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

相反地，所有那些超然的人，那些向往着某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的人，都没有找到任何符合他们心愿的东西。塔鲁好象已经求得了他曾经说过的那种难觅的安宁，但他只是通过死亡才得到了它，而那时这种安宁已经对他毫无用

处。在斜阳的余辉下，里厄看到一些人，在家门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充满激情地互相凝视着；这些人之所以能获得他们所向往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所要求的东西是他们唯一力所能及的东西。当里厄刚要转入格朗和科塔尔住的那条街的时候，他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满足于得到人和他那可怜但又伟大的爱情的人，确实应该使他们，或者至少是每隔一段时间使他们得到欢乐作为奖励。

这篇叙事到此行将结束。现在正是里厄医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了。但在记载这部历史的最后的一些事件之前，他至少想说明一下他写这部作品的理由，希望大家知道他是坚持以客观见证人的态度来记录的。在整个鼠疫期间，他的职业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该城的大部分居民和了解他们的心情。因此，他完全有资格来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过，他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想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谨慎态度。总的说来，他竭力避免叙述那些他自己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他竭力避免把一些无中生有的想法强加在他的那些鼠疫时期的伙伴们的身上，他总是以那些偶然地或者由于发生了不幸的事件而落到他手里的资料来作为依据的。

他是在为一种罪行作证，因此他象一个善良的证人那样，保持了一定的谨慎的态度。但同时，根据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们，在他们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因此，他分担了他们的一切忧思，而且他们的境遇也就是他的境遇。

作为一个忠实的见证人，他主要是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的文献和传闻都记载下来。但他个人要讲的事，诸如他的期待的心情，他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他都不打算涉及。即使他提到了一些，那也只不过是为了了解他们，或者使别人了解他们，同时也是为了把他们经常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东西尽可能明确地

表达出来。说实在的，这种服从理智的努力并没有使他付出很高的代价。每当他情不自禁地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直接掺合到成千上万的鼠疫患者的呻吟中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没有一项不是别人的痛苦，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而现在大家却都能够同病相怜，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因此他就不谈个人的事。显然，他应该代表大家讲话。

但在这些市民中间至少有一个人，里厄医生是不能代表他讲话的。这就是塔鲁有一天跟里厄谈起的那个人："他唯一的真正的罪行就是他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除此以外，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一件事，我只能勉强原谅他。"这个人具有一颗愚昧无知的心，一颗孤独的心，而我们的故事在写了这个人之后也就应该结束了。

当里厄医生离开充满着节日的欢乐的大街，并刚要转入格朗和科塔尔住的那条街时，他被一道警戒线拦住了去路。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远远传来的狂欢声更衬托出了这个地区的寂静，他感到这儿既荒僻又寂静。他出示了他的证件。

"不能过去，医生，"警察说，"有个疯子正在向人群开枪射击。不过，请您呆在这儿，您可以帮帮忙。"

这时，里厄看见格朗正向他走来。格朗对情况也一点不了解。人们不让他走过去，而他听说子弹是从他的那栋房屋里射出来的。远处，在残阳的照耀下，房屋的正面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霞光。四周是一大片伸展到对面人行道为止的空旷的场地。在街中心，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只帽子和一块脏布片。里厄和格朗远远望去，看到在街的另一头也有一道警戒线，它与挡住他们去路的那条警戒线平行地遥遥相对。在这条警戒线后面还可以看到区里的几个居民在匆忙地来来去去。再仔细一看，

他们还发现一些握着手枪的警察蹲在这栋房屋对面的一些大楼的门后面，而这栋房屋所有的百叶窗都关着，但三楼有一扇百叶窗好象半开着。街上静悄悄的，能听到的只是从市中心断续地传来的乐声。

一会儿后，从房屋对面的某一栋大楼里发出了“砰砰”两下手枪声，那扇半开的百叶窗顿时就爆裂成碎片。然后又重新恢复了寂静。里厄经过了一整天的吵闹，现在又从远处看去，感到这个场面似乎有点儿不象是真的。

“这是科塔尔的窗户啊！”格朗突然激动地说，“不过，科塔尔没在那儿。”

“你们为什么开枪？”里厄问警察。

“我们正在逗他。我们现在在等一辆车，车上带着必要的装备，因为他向所有想要走进屋子大门的人开枪。有一个警察已经中了弹。”

“他为什么要开枪呢？”

“不知道。当时人们正在街上游逛。他们听到第一下枪声时，还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等到第二下枪声响时，就有人叫喊起来了，一个人受了伤，于是大家就逃跑了。一个疯子，懂吗！”

四周又静了下来。时间过得非常慢。突然间，他们看见在街的另一头出现了一条狗，这是里厄很久以来看见的第一条狗。这是一条西班牙猎狗，身上很脏，它的主人可能是一直把它藏着，直到今天才放出来。现在，它正沿着墙小跑而来，到了这栋屋子门口附近，犹豫了一下，一屁股蹲下，接着就弯过身子来咬跳蚤。警察吹了好几声哨子叫唤它。这条狗抬起头来，然后下了决心，慢慢地穿过马路去嗅那顶帽子。就在这时，从三楼射出一发子弹，打中了狗，只见它突然翻过身来，四只爪子

拼命挣扎，最后侧身倒下，一阵阵长时间的抽搐使它浑身颤动。警察们立即回击，从对面大楼的门里射出五、六发子弹，那扇百叶窗又被打得碎片纷飞。接着又恢复了寂静。这时太阳已落得更低了一些，阴影开始移向科塔尔的窗户。在大街上，从医生的身后传来了一阵轻轻的刹车声。

“他们来啦！”警察说。

一些警察背朝外从车上下来，他们拿着绳索、梯子和两包用油布包起来的长方形的东西。他们走到一条围绕着这一排房屋的街上，在格朗那栋房子的对面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人们看到，或是更正确地说，人们猜想到，在这些屋子的门后出现了一些骚动。接着人们开始等待。那条狗已经一动不动地倒在一滩暗黑色的血泊里。

突然，从警察们占据着的屋子的窗户里发出一阵哒哒哒的手提式冲锋枪声。随着这一阵射击，那扇被瞄准的百叶窗一片片地碎落下来，成了一个黑暗的大窟窿。里厄和格朗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看过去，什么也分辨不清。当这阵射击停下来的时候，在距离较远的一栋房屋里，第二支手提式冲锋枪又接着从另一个角度响起来了。子弹可能打进了窗的方框，因为其中有一颗子弹打下了一堆砖头的碎片。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三个警察飞速穿过马路，冲入大门。几乎同时，另外三个警察也跟着冲了进去，这时射击也就停止了。人们还在等待。从屋里传出了两声爆炸声。接着是一阵嘈杂声，人们看见一个只穿衬衣、不停地叫喊着的矮个儿几乎是足不着地给拖了出来。同时，所有沿街的百叶窗都象出现奇迹一般一下子全打开了，窗口挤满了瞧热闹的人，一大群人从屋里走了出来，挤在警戒线后面。这时，人们看到这矮个儿已到了马路中间，两脚着地，两只胳膊被警察拧到背后。他叫喊着。一个警察跑到他跟前，又稳又狠

地猛揍了他两拳。

“这是科塔尔，”格朗结结巴巴地说，“他疯了。”

科塔尔被打倒在地上。只见那个警察使尽全力对准躺在地上的人踢了几脚。接着一群乱哄哄的人骚动起来，朝着医生和他的老朋友走来。

“散开！”警察说。

当这群人在里厄面前走过时，他把目光避开了。

在暮色朦胧中，格朗和里厄走了。好象刚才发生的事件已使这个区从一种麻木的状态中苏醒了似的，这些偏僻的街道又重新沸腾起来，快乐的人群又闹开了。格朗在走到家门口时向医生告别。他要干活去。但临上楼之前，他对医生说，他已经给让娜写了信，并说现在他很高兴。接着他提到了自己已重新改写了那句句子：“我把形容词全部划掉了。”

说罢，他就带着一种调皮的笑容，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里厄行了个礼，但是里厄却在想着科塔尔。他朝着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家走去，一路上耳边总是回响着拳头打在科塔尔脸上所发出的那种沉重的声音。想到一个犯罪的人比想起一个死去的人可能更不好受。

当里厄到达病人家的时候，天色已完全黑了。在病人的房间里，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那些庆祝自由的欢笑声，而那老头儿的脾气还是跟往常一样，在继续不停地玩他那鹰嘴豆换锅的游戏。

“是啊，玩玩，高兴高兴，他们做得对，”他说，“有苦就得有乐，要不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医生，您的那位同事呢？他现在怎么了？”

一阵阵爆炸声传到他们耳边，但这不是枪炮声，孩子们在放爆竹。

上空闪闪发光，在山冈附近，星星看上去象燧石一般冷硬坚实。这一天的夜晚跟上次他和塔鲁在一起的那个夜晚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天晚上他们是为了排遣鼠疫给他们带来的心头烦闷而到这个平台上来的。但是今天，悬崖下的大海比那天夜里更不平静。四周的空气轻飘飘地浮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点也闻不到那还不很凉的秋风所带来的海水味。可是来自城里的喧哗声却犹如阵阵波涛冲击着平台的墙脚。但这天的夜晚是解放的夜晚，而不是反抗的夜晚。远处，可以看到一大片暗红色的光，那里是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和广场。在解放了的夜晚，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传到里厄耳边的声音正是人们的心愿所汇成的吼鸣。

从黑沉沉的港口那儿升起了市政府放的第一批礼花。全城发出了一片长时间的低沉的欢呼声。所有那些曾经被里厄爱过而现在已经离开了他的人们，如科塔尔、塔鲁、医生自己的妻子，所有这些人，有的去世，有的犯罪，现在全都被遗忘了。那老头儿说得对，人们还是跟以前一个样。这就是说人们还是那样生气勃勃、单纯无知，而现在就在这平台上，里厄忘却了痛苦，感到自己跟人们在一起。一阵阵越来越响亮、越持久的欢呼声不断地从市中心一直传到平台底下，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火树银花，犹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面对这种景色，里厄医生于是决定动手编写这篇到此为止的故事。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不过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

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彩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堕　落

郭宏安　译

先生，我可以不揣冒昧，为您效劳吗？我怕您不知道如何让掌管这家企业的大猩猩明白您的意思。事实上，他只讲荷兰话。除非您允许我为您办这一案子，否则，他是猜不出您要刺柏子酒的。看，我敢说他听懂了我的话；他这一点头，该是表示他对我的论据是折服了。果然，他去了，以一种适度的迟缓来加快脚步。您真运气，他没有嘟囔。当他拒绝服务的时候，嘟囔一声就行了：没有人再坚持。纵情使性，这是大型动物的特权。我告退了，先生，为您效劳，我感到荣幸。谢谢，若是果真不惹人生厌的话，我就接受您的邀请。您太好了。我就把我的杯子放在您的杯子旁边吧。

您说得对，他的沉默轰然震耳。这是种原始森林的寂静，笼罩一切，包括嘴巴。我们的寡言朋友对文明语言表示不满，其顽固程度有时令我吃惊。他的职业是在这家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间里接待各国海员，不知何故，他称这间酒吧为墨西哥城。对如此尊敬这间酒吧的人来说，您不认为他们要为他的无知会使人不快而担心吗？请想象一下那个住在巴别塔① 里的克罗-马尼翁人② 吧！至少，他会感到离乡背井之苦。啊不，此人并无流落之感，他走他的路，什么也加害不了他。我从他嘴里听到的为数不多的话里有一句是“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该要什么

① 据《圣经·创世记》，人类曾拟修高塔通天，上帝为破坏计，使之发生语言上的分歧，卒因彼此不能互通思想而失败，此塔名巴别塔。

② 纪元前三万年左右，生活在欧洲的一种猿人。

不要什么呢？无疑的，指的是我们这位朋友自己。我承认，这些铁板一块似的生灵吸引着我。当人们或是出于职业需要，或是出于天性，就人这类生灵沉思良久之时，往往会怀念起灵长类来。它们是不打小算盘的。

不过，说真的，我们的主人却是有一点小算盘的，尽管相当模糊。由于听不懂人们当他面说的话，他就养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由此而产生这副满腹狐疑的庄严气派，至少他好象对人和人之间有什么事不对劲起了疑心。这种态度使那些与他的职业无关的谈话不太容易进行。您看，比方说，在他背后墙上，他头顶上方的那块长方形的空白，那是一幅被摘掉的画的位置。事实上，那里原有的一幅画特别引人注目，是一幅真正的杰作。您猜怎么样，主人收到它，又把它让出的时候，我都在场。两次都是同样的疑虑重重，反复思考了几个星期。从这一点看，社会也是有些，应该承认，多少有些败坏了他率直淳朴的天性。

请注意，我并不在审判他。我认为他的疑心有根据，而且，如您所见，如果我的喜怒形于色的天性对此不加反对的话，我将乐于赞同他的疑心。我爱说话，唉！但也随和。尽管我知道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一有机会，我就要交换看法。我在法国时，每逢遇见有才智的人，我就不能不立即与之结交。啊！我看见您在对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① 皱眉头。我承认我对这种语态有癖好，一般地说，我对高贵的语言有癖好。请相信，我自己也责备这种癖好。我知道爱好精致的袜子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双肮脏的脚。尽管如此，风度却和常常掩盖着湿疹的府绸

① 在极讲究的书面语言中使用的一种语态。使用这种语态，表明使用者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但有时也表明使用者近乎冬烘的学究气。

衬衣相似。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聊以自慰的是，说话结结巴巴的人也并非纯洁无瑕。对，还是喝酒吧。

您在阿姆斯特丹逗留许久吗？一座美丽的城市，是不是？迷人？这个形容词我很久没听到了。我离开巴黎已经有好几年了。然而，记忆犹新，对我们美丽的首都，还有它的滨河路，我什么也没有忘记啊。巴黎是个真正的假象，是个壮丽的舞台，住着四百万具人形的生灵。据最近一次调查，接近五百万了？当然，他们该生下小的了。这不足为怪。我总觉得我们的同胞有两大狂热：思想和通奸。乱七八糟，姑且这样说吧。不过，我们不要遣责他们；不独他们如此，整个欧洲也这样。我有时梦想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说我们。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我敢说，下了这个有力的断语之后，文章就作尽了。

荷兰人，啊不，他们远非那么现代化。您看看他们，优哉游哉。他们干什么？这些先生靠那些妇人工作为生。这是些公的和母的，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家伙，他们来这儿，象平时一样，或是出于说谎癖，或是出于愚昧。总之，是由于想象力过于丰富或缺乏想象力。这些先生们不时地玩刀弄枪，然而，别以为他们认为有必要。角色要求这样，如此而已，他们放出最后几发子弹，害怕得要死。除此而外，我觉得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后者是慢慢地整家整户地杀人。您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社会就是为了这种灭绝而组织起来的吗？您自然是听说过巴西河流中那些极小的鱼，它们成千上万地一齐攻击粗心大意的游泳者，小口小口地，飞快地清扫他，一会儿工夫，就只剩下一具完整干净的骨架。您看，这就是它们的组织。“您想过一种干净的生活？象大家一样吗？”您自然回答说是。怎么能够说不呢？“同意。人家于是就来清扫您。这是一门职业，一个家庭，一种

有组织的娱乐。”小小的牙攻击肉体，直至骨头。我不公正了。不应该说这是它们的组织。这是我们的：争先恐后地清扫别人。

终于给我们拿来了刺柏子酒。祝您健康。是的，大猩猩张嘴叫我博士。在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是博士或教授。他们喜欢尊敬，这是出于好意或是出于谦逊。在他们这里，至少恶毒的言行不是一种国家制度。无论如何，我不是医生①。您若想知道的话，我来到此地之前是律师。现在，我是法官一忏悔者。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为您效劳。很高兴认识您。您大概经商吧？差不多？回答得妙！也很确切：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差不多。这样吧，允许我扮演侦探。您差不多同我一般年纪，有着差不多是饱经世故的四十岁人的深明底细的眼神，您差不多是衣著讲究，也就是说，象我们那里的人一样，而且，您有一双光滑的手。因此，您是个资产者，差不多！是一个讲究的资产者。对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皱眉头，事实上就证明了您的文化程度，首先是因为您知道它，然后是因为它又使您厌恶。最后，我使您开心，不是自夸，这说明您的脑筋在某种程度上是开通的。因此，您差不多……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职业不如宗派那样令我感兴趣。请允许我向您提两个问题，您只需在不觉得唐突的情况下再回答我。您拥有财产吗？有一些？好。您与穷人分享吗？不。那么，您是我称之为保守的犹太人的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您未曾奉行过《圣经》的教导，您是不会晋升得更快的。这使您晋升？那您知晓《圣经》喽？您真使我感兴趣。

至于我……还是您自己来判断吧。从身材、肩膀、人家常说是凶恶的脸来看，我更象个橄榄球员，是不是？但是，如果

① 法文中，医生称为"docteur"，与博士(docteur)是一个词。

从谈吐看，应该说我还有些高雅之处。向我的大衣提供毛的骆驼肯定是长了疥；然而，我的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我也很世故，但现在却不加提防地，只根据您的模样就讲了心里话。最后，尽管我举止得体，谈吐优雅，我却是滨海区海员酒吧间的常客。算了，别打听了。一句话，我的职业是双重的，和人这类生灵一样。我已对您说过，我是法官一忏悔者。在我身上只有一件事很简单，即我一无所有。是的，我曾经富有过，不，我从未与人分享过什么。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也曾是一个保守的犹太人……啊！您见听港口的汽笛了吗？今夜，须德海上要起雾了。

您要走？原谅我拖住了您。如果您允许，我来付帐。您在墨西哥城，就是在我家里，我在这儿接待您感到非常高兴。我明天晚上一如既往，肯定在这儿，我感激地接受您的邀请。您的路……那么……最简单的是，我陪您一直到港口，您认为有所不便吗？从那儿，绕过犹太区，您就会找到那些漂亮的大街，街上驶过摆满鲜花、音乐声震耳欲聋的电车。您的旅馆就在其中的一条街上。当拉克街。您先走，请。我嘛，我住在犹太区，直到我们的希特勒兄弟们打扫地盘的时候一直这样叫法。什么样的大清洗啊！七万五千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或被屠杀，这是真空清扫。我欣赏这种专心致志，这种有条不紊的耐心！如果没有魄力，就该有方法。这儿，这种方法其效如神，没说的，我住在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个帮助我理解大猩猩和他的戒心。这样我就可以同我的天性作斗争，它使我身不由主地滑向同情。当我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时，我上的某一个我就在敲警钟。“减速。危险。”甚至在同情心最为强烈的时候，我还是保持警惕。

您知道吗？在我小小的故乡，有一次在镇压时，一个德国

军官彬彬有礼地请一位老太太在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作为人质枪毙。选择，您想象一下吧。那个？不，这个。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您别坚持，相信我，先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都是可能发生的。我认识一个心地纯良的人，他不愿意怀疑。他是个和平主义者，绝对自由主义者，他以同样的感情爱全人类和所有的动物。一个优秀的灵魂，是的，这是肯定的。在欧洲的最后几次宗教战争中，他归隐田园了。他在门槛上写道："不管您来自何方，请进，欢迎您。"您说，谁答复了这盛情的邀请呢？民兵①，他们如同进了自己的家，开膛掏了他的内脏。

噢！对不起，太太！原来她什么也没懂。这么多人，嗯，这么晚了，还下着雨，几天都没有停！幸好，有刺柏子酒，黑暗中唯一的光明。您感到了投在您身上的金色的、紫铜色的光亮吗？我喜欢趁着刺柏子酒的热力，在晚上穿过城市。我整夜整夜地走着，冥想着，无休止地自言自语着。象今天晚上一样，是的，我怕有些使您厌烦了吧，谢谢，您真是彬彬有礼。然而，话真是太多了，我一张嘴就要说。何况，这个国家激发起我的灵感。我爱这里的人民，他们挤满了街道，夹在房屋和水之间的狭小空间里，被雾、冰冷的土地以及象洗衣盆一样冒着气的大海包围着。我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双重的，他们在这里，同时又在别处。

真的，听着他们沉重的、走在油腻的路上的脚步声，看见他们在店铺中间笨重地走过，那里面摆满了金色的鲱鱼和枯叶色的首饰，您一定以为他们今天晚上会在这里吧？您象众人一样，把这些老实人当成一些顾问和商人，怀着长生不老的希望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维希政府的军事组织，致力于与德国法西斯合作，破坏抵抗运动。

去数他们的钱，而他们唯一的雅兴就在于有时戴着宽大的帽子听讲解剖学？您错了。的确，他们在我们身边走着，但是，看看他们的脑袋在哪儿吧：在那红绿色招牌下由霓虹、刺柏子酒和薄荷酒组成的迷雾中。荷兰是个梦，先生，一个黄金和烟雾的梦，白天烟雾迷漫，夜晚金光闪烁，日日夜夜相继如斯，这梦里充塞着洛汉格林①，如同那些心不在焉地骑着车把高高的黑色自行车的人一样，象一群阴郁的天鹅，不停地盘旋在全国各地，大海周围，运河两岸。他们想入非非，头裹在紫铜色的云中，在迷雾的金色的香烟中打着旋儿，高高飞起，睡眼惺忪，他们不在这里了。他们向几千公里外进发，去爪哇，遥远的岛屿。他们向印度尼西亚的那些做鬼脸的神祇祈祷，用它们装点所有的窗户。它们此时正在我们头顶徘徊，然后作为庄严的表征，附在招牌和梯形的屋顶上，提醒这些思乡的移民，荷兰不仅仅是商人的欧洲，而且是大海，通向扶桑国② 的大海，在那些岛屿上，人们死的时候疯狂而幸福。

我信口说下去，我在辩护啊！对不起。这是习惯，先生，是天赋，也是我想让您了解这座城市，事物的心脏！因为我们正处在事物的中心。您注意到阿姆斯特丹的同心的运河好象地狱之圈？资产阶级的地狱，自然是纠缠着噩梦。当人们从外圈开始，一圈深似一圈，生活，亦即罪恶，变得越来越浓厚，越来越阴暗。这儿，我们正处在最后一圈。是……啊！您知道？见鬼，您变得更难于确定等级了。然而，您因此而明白为什么我能说事物的中心正在这里，尽管我们处在大陆的边缘。敏感的人理

① 欧洲民间传说中人物。他被选中保卫爱尔索·德·布拉邦女公爵。他使她摆脱了敌对的臣属，并与之结婚，他许下诺言，绝不询问她的身世。后来，他未能信守诺言，于是就乘天鹅拖曳的飞舟出走。

② 原文为Cipango，是中世纪末欧洲人对日本人的称呼，似可译为扶桑国。

解这些怪事。无论如何，看报的人和通奸的人不能走得更远了。他们来自欧洲各地，在内海周围黯然无色的沙滩上停下。他们听着汽笛，徒然在迷雾中寻觅船舶的轮廓，然后，再度越过运河，冒雨返回。他们在这里中转，用各种语言到墨西哥城要刺柏子酒喝。我在那儿等着他们。

明天见吧，先生，亲爱的同胞。不，您现在找得到路了；我在这座桥边同您告别。我夜里从来不过桥。这是许了一次愿的结果。反正，您设想某人投水吧。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您跟着跳下去救起他，在严寒的季节，您将冒最大的危险！或者您丢下他，逃回家去，有时会感到莫名其妙的疲疼。晚安！怎么？玻璃窗后面的那些女人？梦，先生，廉价的梦，神游印度！这些人涂抹着香料。您进去，她们拉上窗帘，航行于是开始。裸体之上，有神降临，岛屿癫狂，随波逐流，棕榈覆盖，如临风之乱发。不妨一试。

什么是法官—忏悔者？啊！您对我的这个称呼感到奇怪。请相信，其中并无任何戏谑，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是我的职务的一部分。但是，我应该首先摆出一定数量的事实，这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我的叙述。

几年前，我在巴黎当律师，真的，还颇有名气哩。当然，我没有向您说出我的真实姓名。我专门承揽所谓高尚的诉讼，为寡妇和孤儿辩护。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反正也有行为过分的寡妇和凶恶残忍的孤儿。但是，只须在被告身上闻到一点儿受害者的气味，就足以使我挥动衣袖投入行动。怎样的行动啊！简直是一场风暴！我的心全在那衣袖上了。人们简直真会相信正义每夜都与我同眠。我肯定，您会钦佩我的语气恰当，感情确切，辩护有说服力，还有我的热情以及适度的愤激。身体方

面，我也是得天独厚，能随时表现出一种高贵的仪态。再者，有两种真诚的感情支持着我：为站在法庭上代表正义的栏杆的这一方面感到的满足，以及对于所有法官的一种本能的轻蔑。说到底，这种轻蔑也许不是出自本性。现在我知道了它有它的道理。但是，从外表看。它毋宁象一种激情。人们不能否认，至少是眼下，还需要法官，是不是？然而，我不能理解人可以指派自己去担任这种令人惊奇的职务。既然我看见了他，我还是容忍了，有点象我容忍蝗虫一样。区别在于，这种直翅目昆虫的入侵从未给我带来过一文钱，而我却是以和被我蔑视的人对话来谋生的。

这样，我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这足以使我良心安宁。法律的观念，因有理而感到的满足，自尊自重的喜悦，亲爱的先生，这是我得以站住或前进的强大动力。相反，如果您剥夺了人的这些东西，您就把人变成了疯狗。仅仅是因为人因缺少这些东西而忍受不了，就犯下多少罪行啊！我过去认识一个工业家，他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妻子，人人都钦佩她，可是他却欺骗她。此人的确因为自己理亏而恼火，因为得不到或不能给予自己有德的证明而恼火。他的妻子越是显得完美，他越是恼火。最后，他的理亏变得不能忍受。您想他干了什么？停止欺骗她？不。他杀了她。这样我才和他有了往来。

我的情况更值得羡慕。我不仅没有触犯法网之虞（特别是，我绝无杀妻的运气，因为我是独身），而且我还为他们辩护，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是些好杀人犯，如同某些人是些好野蛮人一样，我进行辩护的方式本身给予我极大的满足。我在职业上的确是无可指责的。我从未受贿，这自不待言，我也从未屈尊去找门路。更为罕见的是，我从未同意去奉承任何一位新闻记者，为了使他对我有利；以及奉承任何一位官员，他的友谊可能会有

用处，我曾有幸两次或三次被授予荣誉勋位，而我以一种谨慎的尊严拒绝了，我从这种尊严中得到了真正的奖赏。最后，我从未让穷人付钱，也从未就此自我宣扬。亲爱的先生，请不要以为我是自吹自擂。我仍旧是无所作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贪婪代替了宏图大志，这始终引我发笑。我的志向更远大，您将会看到，这种用语对我是贴切的。

然而，您已经在说我自满了。我由着自己的天性，任其发展，我们都知道幸福即在于此，尽管我们为了彼此相安无事，有时以自私自利为名装模作样地谴责这些乐趣。至少，我天性中的这一部分我任其发展，对寡妇孤儿我必然产生共鸣，日久天长，这一感情终于驾驭了我的全部生活。例如，我特别喜欢帮助盲人过马路。远远地，我看见一根手杖在路的拐角犹豫，我就奔上去，抢先一秒钟，伸出仁慈的手，让盲人只接受我的帮助，用我温暖而有力的手引导他走上人行横道，穿过往来的车辆，走向安全的地带，然后，彼此激动地分手。同样，我总是喜欢回答问路的行人，借给他们火，助推车的人一臂之力，推抛锚的汽车，买救世军的报纸，或买老妇人的鲜花，虽然我知道那是从蒙巴纳斯公墓里偷来的。还有，啊，这更难于启齿了，我还乐善好施。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大基督徒，他承认，当人们看见一个乞丐走近家门时的第一个感觉是很难受。而我，却喜出望外。我们且不谈这个吧。

还是谈谈我的礼貌吧。那是出了名的，而且不容置疑。礼貌的确给了我巨大的欢乐。如果我有幸，早晨在公共汽车里或地下电车里，给一些看起来应该坐着的人让坐，拣起一个老妇人掉在地上的东西，然后带着我惯有的微笑还给她，或仅仅是把我叫的出租汽车让给更急需的人，这样，我的一天就充满了光明。应该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也很快活，在公共交通罢工

时，我有机会在我的汽车里拉上几位回不了家的不幸的同胞，在剧场里，让出我的座位好使一对男女坐在一起，在旅途中，把一个姑娘的提箱放在她够不着的架子上，这都是我比别人更经常做的事，因为我更留神这种机会，更会品味其中的乐趣。

我也被认为是慷慨大方的，我也的确如此。公开或私下，我都有赠与。当我该拿出一件东西和一笔钱时，我所感到的远远不是痛苦，而是经久不衰的快乐，有时我看到这些赠与毫无回报以及有可能变成亡恩负义，不免产生某种伤感，但是这与我所获得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快乐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乐善好施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我憎恶被迫而为。金钱方面的锱铢必较使我厌烦，我容忍了它，但心绪恶劣。我应该有权决定我的赠与。

这是些小事，但是，它们将使您理解我在我的生活中，尤其是在我的职业中发现的持久的乐趣。例如，在法院的走廊上，被一个被告的妻子叫住，该被告之得到辩护仅仅由于我出自正义和怜悯，我是说免费辩护，听这个女人喃喃地说，什么也不能表达对我为他们所做的事的感激之情，我回答说这是很自然的，谁都会这样做，甚至帮他们一把以度过未来的艰难日子，然后，为了打断这种感情的流露，让他们保留一种正义的共鸣，我就吻吻那可怜女人的手，就此停住，相信我，亲爱的先生，这就超脱庸俗的野心而上升到顶点，在那里，存在的确实只有道德。

我们停留在这些顶峰上吧。您现在明白了我说更远大的志向的意思了吧。我说的正是这些顶点，我只能在那上面生活。是的，我从来只是在高尚的境界中才感到怡然自得。哪怕是生活中的细节，我也需要处于高境界中。公共汽车与地下电车，我更喜欢公共汽车；马车与出租汽车，我更喜欢马车；平台与

夹楼，我更喜欢平台。我喜欢运动性质的飞机，在那上面，可以把头伸向广阔无垠的天空；我也是船尾楼上的不知疲倦的散步者。在山里，我逃避那山口高地间纵横交错的山谷，我至少还是个准平原上的人。如果命运迫使我选择一种体力劳动的职业，车工或屋面工，请放心，我选择屋顶上干活，与眩晕为侣。船舱、船台、隧道、山洞、深渊，都令我厌恶。我甚至对洞穴学家怀有一种特别的仇恨，他们居然胆敢占据报纸的头版，他们的活动令我作呕。努力达到负八百米的标高，冒着把脑袋夹在乱石嶙峋的狭窄入口（这些糊涂虫称为虹吸管！）中的危险，我觉得这是性情败坏或受了刺激的人在逞能。那底下隐藏着罪恶。

恰好相反，一个自然形成的阳台，高耸于海面五六百米之上，可以俯视明亮的大海，那是我呼吸最畅快的所在，尤其是当我独自一人，高踞于人类这蚁群之上时。我很容易讲清楚，布道、重要的说教、拜火的仪式为什么要在人迹可至的高山上进行。我认为，在地窖和囚室里，人们是不能沉思冥想的（除非囚室设在塔里，有着广阔的视野），而只是在里面消磨岁月。我理解这个人，他当了教士又还俗，因为他的房门不是如他所愿朝向一片广阔的风景。而是朝向一堵墙壁。请您相信，至于我，我可不消磨岁月。一天里每时每刻，我都在自身中和众人中向高处攀登，在那里点燃有共目睹的火焰，于是，一阵欢乐的致敬声朝我升起。这样，我至少是热爱生活，对我的优秀品质感到满意。

我的职业成功地完成了这种攀登高峰的志愿。它使我摆脱了任何辛酸之感，对那些我总是施恩而从不欠他们什么的人的辛酸之感。它使我高踞于法官之上，该我来审判他们，高踞于被告之上，迫使他们认罪。任何审判都与我无涉，我不在法庭

的舞台上，而在某个地方，在舞台的上空，如同人们不时借助机关使之降临，以使情节面目一新、并赋予它应有的意义的神明一般。总之，超然在上的生活依然是被大多数人景仰和礼拜的不二法门。

在我的好罪犯中，有几个在杀人时也都是听命于这种感情的。有人阅读描述他们的悲惨处境的报纸，无疑是给予他们一种不幸的奖赏。如同许多人一样，他们对默默无闻感到厌烦，这种焦躁有时也能使他们令人不快地铤而走险。说到底，杀了门房，足以使人出名。不幸的是，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名声，因为有那么多理当并且已经挨刀的门房。罪行不断地占据着前台，而杀人犯却是昙花一现，随后即被代替。这些短暂的胜利最后要付出太高的代价。相反，为我们不幸的希望出名的人辩护，才真正是被人承认，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而且是通过更为经济的手段被人承认。这也就鼓励我施展理应得到嘉奖的努力，为使他们付出尽可能少的代价。他们付出的，多少也是代我而付。作为回报，我表现出的义愤、才智和激情偿还了我欠他们的一切。法官惩罚，被告赎罪，而我，除去一切义务，即避免了审判，又避免了惩罚，自由地生活在一片伊甸[①]之光中。

亲爱的先生，伊甸园不就是直接驾驭的生活吗？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从来就不需要学会生活。在这一点上，我是生而知之。有一些人，他们的问题是防备他人，或至少是与他人合拍。对于我，合拍是天生的。需要的时候不拘礼节，必要的时候三缄其口，既能玩世不恭又可庄重凛然，这一切我都得心应手。

① 据《圣经·创世记》，上帝在东方设一花园，令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居住，名伊甸园。

因此我深孚众望 。在上流社会的成功不可胜数。我的仪表也不错，既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舞客，又是一个审慎小心的学者，我能够，谈何容易，同时爱女人和正义，我搞体育运动和美术，打住吧，免得您疑心我骄傲自满。不过，请您想象一个人正在盛年，体魄强健，天赋极厚，体力活动和智力活动一样敏捷，不穷不富，睡得香甜，对自己由衷地满意，而表现出来的却是极其随和。您得承认，我尽管谦虚，但仍可以说我的生活是成功的。

的确，比我更自然者罕有其人。我与生活的和谐是完全彻底的，我全部溶化进去，从上到下，不拒绝生活中任何讥讽、伟大和束缚。尤其是，肌肉，物质，一句话，身体，它使那么多人在爱情中，在孤独中狼狈不堪，灰心丧气，却给我带来了同样的乐趣，并且没有使我奴化。我生来就是为了有一躯体。由此而产生我身上的和谐，这种轻松的控制，人们感觉到它，有时并且承认它有助于生活。因此，人们刻意求我为友。譬如说，人们经常以为早已见过我了。生活，其存在和赠与，迎面而来；我以一种善意的自豪感接受此种敬意。事实上，由于这样充实、淳朴地作人，我觉得自己有些超人的味道了。

我生于正经人家，但并不显赫（我父亲是军官），然而，某个早晨，我谦卑地承认，我感到自己是王子，或者是燃烧的荆棘① 。务请注意，这是我确信自己比所有的人都聪明之后的又一种认识。不过，这种信念并无结果，因为那么多笨蛋都有这种信念。不，由于志得意满，我感到，真是不知道该不该承认，感到被选定了。众人之中，唯独我被选定去获得这漫长而稳定的成功。一句话，这是我谦逊的结果。我拒绝将这一成功归于我个人的功

① 据《圣经》，上帝在一片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形。

劳，我不认为集如此不同而极端的优点于一人是纯粹偶然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以某种方式感到，我之有权如此幸福地生活，是出于某种上天的旨意。如果我对您说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您就会更觉得这种信念所具有的异常之处了。不管这种信念是否平常，它却长期使我超脱于日常琐事之上，我的的确确翱翔于空中许多年，说真的，我由衷地怀念那些岁月。我一直翱翔到晚上……不，那是另一码事了，应该忘掉它。况且，也许我夸大其词。我各方面都舒舒服服，真的，然而，同时又对什么都不满足。每一种快乐都驱使我追求另一种快乐。我参加了一个又一个晚会。有时通宵跳舞，越来越对人和生活入迷。有时，我在这些晚会上滞留很晚，跳舞、低度烧酒、我的发作、众人粗暴的放纵，将我投入到既厌倦又满足的沉醉之中，仿佛在疲倦到极点的一刹那间，我终于知道了人和世界的奥秘。然而，第二天，疲倦消失了，奥秘亦随之而去；我又重新扑了进去。我就这样跑啊，总是心满意足，从不乐极生厌，不知在何处停住，直到那一天，不如说直到那一晚上，音乐中止，灯光熄灭。曾使我幸福过的那些晚会……但是，请允许我招呼我们的原始人朋友。点点头谢谢他，尤其是，请跟我喝酒吧，我需要您的同情。

我看出来这番表白使您惊讶。您从未突然地需要同情、帮助和友谊吗？不，当然。我嘛，我学会了只满足于同情。这更容易得到，又不承担任何义务。“请相信我的同情，”心里这样说，紧接着就是“而现在，咱们谈别的事吧”。这是一种议会议长的感情：廉价地得到，然后就是灾难。友谊，就不那么简单了。需要长时间的、艰苦的努力才能得到，一经得到，就无法摆脱，必须正视。尤其是不要以为您的朋友每天晚上都给您打电话，他们本该如此，这是为了想知道您是否正好那天晚上决定自

杀，或更简单些，您是否需要有人作伴，是否不能出门。不，如果他们打电话，请放心，肯定是那晚上您不是独自一人，而生活又是美好的。自杀，倒不如说是他们把您推向它，据他们说，是出于您对您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亲爱的先生，上天使我们免于被朋友抬得过高！至于那些出于职责而爱我们的人，我想说父母们，他们算亲属（什么样的用语啊！），所以又当别论了。他们有"必须"这一字眼，但是，不如说这个词成了子弹；他们打电话犹如打冲锋枪。而他们瞄得很准。啊！巴才纳① 之流！

什么？哪天晚上？我回头再谈，跟我要有耐心。再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谈朋友和亲属，恰恰是正题。您看，人家跟我谈起过一个人，他的朋友被关进监狱，他就每天晚上在房里席地而卧，为了不再享受他所爱的人被剥夺了的舒适。谁，亲爱的先生，谁会为了我们而睡在地上呢？我自己能吗？听着，我愿意如此，我也将会如此。是的，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能够，而普天下也将获得拯救。然而，谈何容易啊，因为友谊朝三暮四，至少是无能为力。它愿意的事，它做不到。也许，说到底，它的愿望还不够强烈？也许我们爱生活还爱得不够？您注意到唯有死亡才能唤醒我们的感情吗？如同我们爱刚刚离开我们的朋友，是不是？如同我们钦佩主人的朋友，他们不说话了，嘴里塞满黄土！于是，尊敬自然而然地来了，他们也许一生都在等待我们的这种尊敬。您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对死人更公正、更宽宏大量吗？原因很简单！对他们没有义务。他们让我们自由，我们可以从容不迫，把尊敬穿插在鸡尾酒和可爱的情妇之

① 巴才纳，法国元帅。一八七三年因叛国罪被判死刑，后改为二十年监禁。服刑期间越狱，后逃至西班牙。此处所指不明。

间，一句话，在闲暇之中。如果他们强迫我们什么，那就是怀念他们。然而我们却是健忘的。不，在我们的朋友中，我们爱的是刚刚死去的人，痛苦的死者，我们的悲恸，最后是我们自己。

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尽量躲避他。我有点儿讨厌他，再加上他还有道德。不过，您放心，他临死时又看见了我。我那一天没有白过。他死了，对我感到满意，握着我的手死了。有一个女人，老是死缠着我，但终属徒劳，她也很知趣，年纪轻轻就死了。我的心中立刻感到空了一块！再加上又是自杀！上帝啊，多么美妙的骚乱啊！电话畅通，心潮澎湃，语句有意简短，然而大有弦外之音，抑制着痛苦，甚至，是的，有点自我谴责！

人就是如此，亲爱的先生，有两副面孔：既爱别人又爱自己。如果碰巧公寓里有一宗丧事的话，请观察一下您的邻居吧。他们沉睡在自己的小日子中，突然，比方说，门房死了。他们醒了，骚动起来，打听消息，有了恻隐之心。一桩死讯正待发布，戏剧终于开扬。他们需要悲剧，有什么办法，天性如此，这是他们的开胃饮料。再说，难道是出于偶然我才跟您谈门房吗？我曾有过一位，真是不讨人喜欢，简直是恶毒的化身，一个分文不值而心怀怨恨的怪物，就是一个方济各会① 修道士也会对他失望。我甚至不理他了。然而，仅仅因为他的存在，我平日的兴致就被败坏了。他死了，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您愿意跟我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葬礼的前两天颇有意思。门房的老婆病了，躺在那间唯一的屋子里，她身旁的架子上放着箱子。房客得自己取信。他们

① 基督教中的一个教规极严、劝人甚力的教派，发源于意大利。

开开门，说一声："您好，太太。"他们听她手指着死者颂扬他，然后拿走他们的信。这没有任何令人高兴之处，是不是？所有的房客都从这间散发着石炭酸味的屋子里走过。他们不派仆人前去，不，他们自己来享用这桩意外的收获。仆人亦然，不过是偷偷地。下葬的那一天到了，箱子太大出不了门。"噢，亲爱的，"门房的老婆躺在床上，带着一种又悲又喜的惊讶说道，"他是多么高大啊！""别担心，太太，"安排葬礼的人回答道，"就会出去的，让他站着。"于是，让他站着出去，然后再让他躺倒，只有我一个人（和一个当过酒馆侍者的人，死者生前每晚都和他喝开胃酒）去公墓，往一具豪华得令我吃惊的棺材上撒鲜花。然后，我去看门房的老婆，为了得到女戏子的道谢。告诉我，这一切有何道理呢？什么也没有，开胃酒而已。

我还安葬过律师团里的一个老同事。他是一个颇受轻蔑的办事员，我总是同他握手。再说，我在哪儿工作，都同那里的一切人握手，能握两次就不握一次。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廉价地获得所有人的同情，这对我的发展是必要的。安葬我们的办事员，首席律师是不屑一顾的。我却不然，虽然第二天还要出门，并且是一次重要外出。正因为如此，我知道我的在场会引人注目，得到有利的评价。于是，您明白，那天下着大雪也未能使我后退。

什么？我就要说到，别担心，何况我并未离题呀。不过，先让我提请您注意，那个女门房因想更好地感受自己的激动，买了个上好橡木、手把镶银的基督受难像而倾家荡产，一个月之后，她搅上了一个嗓音动听、神气活现的家伙。他打她，人们听见可怕的叫喊，随即，他打开窗户，唱出心爱的歌："女人啊，你们多么漂亮！""活该，"邻居们说。请问活该什么？好，表面上众人都反对这个男中音，女门房也反对他。然而无从证明他们

不相爱。也无从证明她不爱她的丈夫。最后，嗓子和胳膊都累了，那个神气活现的家伙飞了，她又颂扬起死者，好一个忠实的女人！反正我还认识别人，表面上众人都拥护他们，他们却并不更忠实，也不更真诚。我认得一个人，他把一生的二十年奉献给一个轻薄女子，他为她牺牲了一切，友谊、工作、甚至一生的体面，却在一天晚上发现自己从未爱过她。他厌倦了，一句话，象大部分人一样地厌倦了。他为自己硬造了一个复杂悲惨的一生。应该发生点什么事，这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承担义务的原因。应该发生点什么事，哪怕是没有爱情的奴役、战争或者死亡。丧葬万岁！

我至少没有这种托辞。既然我支配着生活，我就不厌倦。我跟您说起的那天晚上，我甚至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不厌倦。不，真的，我不想有什么事情发生。然而……您看，亲爱的先生，那是个美丽的秋夜，城里倒还温和，塞纳河上已经水气氤氲了。入夜，天色暗淡下来，西方却依然明亮，路灯微弱地闪烁着。我沿左岸的路朝艺术大桥走着。河水在旧书店关闭的书箱中间闪闪发亮①。路上的行人寥寥，巴黎已是晚餐时分。我踩着落叶，那枯黄、沾满尘土的落叶还让人想起刚刚逝去的夏天。我走过一杆杆街灯，倏忽闪过眼帘的星辰渐渐缀满天空。我品味着失而复得的寂静、夜晚的温馨和空荡荡的巴黎。我心满意足。这一天过得很好：一个盲人，我所希望的减刑，我的主顾的热烈的握手，下午的几桩善举，在几个朋友面前发表了一篇精采的即兴演说，评论我们的领导阶级心肠之冷酷和我们的优秀分子之虚荣。

我登上此时空无一人的艺术大桥，想要看看深夜中依稀难

① 塞纳河畔的书商们多将旧书放在若干铁箱内，置于露天。

辨的河水。我面对着弗尔加朗①，俯视着河心小岛。我感到周身涌起一种强大的，怎么说呢，功德圆满的巨大感情，我的心膨胀起来。我挺了挺腰，正要点燃一支香烟，点燃一支满足的香烟，这时，一阵笑声在我背后响起。我大为惊异，猛一转身，悄然无人。我一直走到桥的栏杆旁，既无驳船，亦无小舟。我朝小岛走去，又听见背后的笑声，稍微远了些，似乎正顺流而下。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笑声渐渐微弱，但我还是在背后听得清清楚楚，除了从水里，这声音不会来自任何地方。同时，我感到心在急速地跳动。您听明白，这声音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是一种善意的、自然的、几乎是友好的笑声，它使事情重新变得正常。况且，我很快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又上了滨河路，步人多非那街，买了包我根本不需要的香烟。我昏头昏脑，呼吸紊乱。那天晚上，我打电话找一个朋友，他不在家。出门还是不出门，我犹豫不决，突然，我听见有人在窗户底下笑。我打开窗户。人行道上，果然有些年轻人在快活地告别。我关上窗户，耸了耸肩；无论如何，我还有份卷宗要研究。我进了浴室想喝杯水。我的脸在镜子里微笑，可是，我的微笑似乎具有双重性了……

怎么?原谅我，我刚才想到了别的事情。我们明天见，当然。明天，是的，是这样。不，不，我不能留下。再说，棕熊找我商量事情，您看见他在那边。他肯定是个正直的人，警察卑鄙地捉弄他，是出于纯粹的邪恶。您认为他有个杀人犯的脑袋?您放心，这是一个专干这一行的人的脑袋。他溜门撬锁也也同样出色，您若知道这个穴居人也善于倒卖绘画，一定会感

① 巴黎塞纳河中斯德岛西端的名称，呈三角形，其上树木掩映，芳草如茵。

到惊奇。在荷兰，人人都是绘画和郁金香方面的专家。此人态度谦虚，是最著名的一次绘画盗窃案的作案者。哪一次？我也许会对您说。别对我的学问感到吃惊。尽管我是法官一忏悔者，我还是这儿的业余小提琴手：我是这些老实人的法律顾问。这并非易事，但是我引起别人的信任，是不是？我的笑声爽朗，握手有力，王牌就在这里。再有，我解决了几宗难案，首先是出于利益，其次是出于信念。如果鸨儿和小偷永远、处处都被定罪，那么正经人就会全部地、不断地自认为无罪。而据我看——您看，您看，我说到了！——这尤其应该避免。否则，就会贻笑大方了。

真的，亲爱的同胞，我感激您的好奇心。不过，我的故事毫无异常之处。既然您坚持，您该知道，几天之内我还有点在想那笑声，随后就忘了。逐渐地，我好象在我身上某处听见了它。不过，大部分时间里，我不费劲就想到了别的事情。

但是，我应该承认，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涉足滨河路了。当我乘汽车或公共汽车路过的时候，在我身上出现了某种沉默。我想我是在等待。然而，我过了塞纳河，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松了口气。那时，我身体也有些不好。什么确切的病也没有，只是感到虚弱，难以恢复好兴致。我去看医生，他们给了我一些兴奋剂。我的精神振奋起来，然后又消沉下去。生活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当身体不适的时候，心就萎靡不振。我好象忘了一部分我不学而会的东西，然而我原来却知道得那么清楚，我这是想说，我知道如何生活。是的，我的确认为一切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今天晚上，我也不感到精力充沛。我甚至说话都费劲儿。好象我说得不那么好了，推理也不那么有把握了。无疑，和天

气有关。喘不过气来，空气沉闷，压着胸脯。我亲爱的同胞，如果我们出去在城里走一走，您看有所不便吗？谢谢。

晚上，运河多美啊！我爱发霉的水的气息，爱浸泡在运河里的落叶的气味，爱那从摆满鲜花的平底驳船上升起的阴郁的气味。不，不，这口味毫无病态可言，相信我。相反，这在我是一种先人之见。事实是我竭力喜欢这些运河。世界上我最爱的，是西西里①，您听清楚，而且还要在埃特纳火山②上，俯视岛屿和大海。还有刮信风时的爪哇。是的，我年轻时去过那里。一般地说，我爱所有的岛屿。在那儿更容易处于主宰地位。

一座精致的房子，是不是？您看见的是两个奴隶的脑袋。一块招牌。房子原来属于一个奴隶贩子。啊！不，那时这种把戏并没有人想隐瞒！人们高声谈论，说："看，我临街有幢房子，我运奴隶，卖黑肉！"您能想象今天会有人公开地声称这是他的职业吗？多大的丑闻啊！我从这儿就听见我的巴黎同行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多么顽固啊，他们毫不犹豫地发出两三份宣言，甚至更多！经过考虑，我在他们后面签了名。奴隶制度，啊，那可不行，我们反对！要是不得不在自己家里，或是工厂里建立奴隶制度，那好，顺理成章，可是大吹大擂，那才糟糕透顶。

我很知道人们离不了统治别人和被别人服待。每个人都需要奴隶，如同需要纯洁的空气一样。统治，就是呼吸，您同意这个观点吗？甚至命运最不济的人也能够呼吸。社会阶梯最底层的人还有其配偶和孩子呢。如果他是光棍，他还有条狗。一句

① 地中海中的大岛，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西南方。

② 西西里岛上东北部的活火山，为欧洲最高的活火山。

话，能够发怒而另一个不能顶撞，这是根本的。“人不能顶撞他父亲”，您知道这句话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不可解释。在这个世界上，不顶撞他爱的人顶撞谁呢？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令人信服的。应该由一个人说了算。否则，任何一种道理都可以有另一种道理与之对立，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相反，实力解决一切。我们花了时间，明白了这一点。例如，您该注意到，我们古老的欧洲终于用正确的方法来推究问题了。我们不再象幼稚时代那样说：“我这样想。您如何反驳？”我们表达得清晰了。我们用通告代替了对话。“这就是真理，我们说，你们尽可以讨论，这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几年以后，将有警察，它将向你们表明我有理。”

啊！亲爱的地球！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自己能干什么。听着，我换个例子，主题不变，我总是喜欢被微笑着服待。如果女仆神情忧郁，她就毒化了我的日子。无疑，她完全有权不高兴。但是，我想，笑着服务比哭着服务对她更好。事实上，这对我更好。不过，我的推理虽不精采，也不完全愚蠢。同样，我总是拒绝去中国饭馆吃饭。为什么？因为亚洲人，当他们不说话，而又在白人面前的时候，经常带着一种轻蔑的神气。这样怎能品味烧鸡呢，又怎能一边看着他们，一边想自己有理呢？

这完全是句知心话，奴役，最好是微笑的奴役，实在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不能没有奴隶的人，他们称奴隶为自由人不是更为有利？首先是为了原则，其次是为了不使他们失望。的确应该给他们这种补偿，不是吗？这样，他们将继续微笑，而我们也良心安宁。否则我们将被迫反躬自省，我们将痛苦得发疯，甚至将变得谨慎，什么都得小心害怕。因此，不要挂招牌，招牌会引起公愤。再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坐在桌旁，

嗯，亮出其真实的职业、身份，人们将不知如何是好了！请想象一张名片吧：杜邦，胆小鬼哲学家，或基督徒业主，或通奸的人文主义者。真的，人们可以选择。但那将是地狱了！是的，地狱应当这样的：街道挂着招牌，但无法解释。人们一经划定等级，终生不变。

比方说您，我亲爱的同胞，想想您的招牌将是什么吧。您不说话？算了，您以后再回答我吧。反正我知道我的：两副面孔，是个可爱的雅努斯①，上面写着家传的格言："别相信。"我的名片上写着："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伶人。"听着，我跟您说的那晚上以后不久，我出了点事。我帮助一个盲人过马路，当我在人行道上离开他的时候，我向他致敬。这一脱帽致敬显然不是为了他，因为他看不见。那是对谁而发的呢？对公众。演完角色后，致敬。不错吧，嗯？在这一时期的另一天，对一个开车的，他感谢我帮助了他，我回答他说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当然，我想说，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但是，这个不幸的口误一直使我耿耿于怀，的确，说到谦逊，我是无与伦比的。

应该谦卑地承认一点，我亲爱的同胞，我总是虚荣得要死。我，我，我，这就是我宝贵的生命之歌，不管我说什么，都听得见它。我永远是一边说话，一边自我吹嘘，特别是以一种我深谙其中奥妙的吵吵嚷嚷的谨慎来自我吹嘘。的确，我总是自由地、强有力地生活。只是，面对所有的人我感到自由，其最充分的理由是我不承认有与我平等的人。我总是自视比所有的人都聪明，这我已经说过，但我以为自己更敏感，更机灵，是个优秀射手，无与伦比的司机，最好的情人。甚至在那些很容易检验出我的劣势的领域中，比如说网球，我只是个差强人

① 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古老神祇，具有阴阳两副面孔。

意的球伴，我也很难不相信，如果我有时间训练，我会超过最高的等级。我只承认我的优越，这就解释了我的善意和坦然。当我照顾他人的时候，那是纯粹的屈尊低就，我有完全的自由，而全部功劳又回到我的手上：我在我的自爱中又升高了一级。

在我同您说起的那天晚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其它几件事实，我渐渐发现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不，不是立刻，也不是十分清楚。首先我需要重获记忆。逐渐地，我看得越来越清楚，我学会了一些我过去知道的东西。在那之前，总是有一种惊人的遗忘能力在帮助我。我忘了一切，而首先是忘了我的决心，实际上，什么都不算数，战争、自杀、爱情、苦难，当环境迫使我去关心，我当然关心了，然而是以一种彬彬有礼，浮光掠影的方式去关心。有时，对一宗与我日常生活无关的案子我装作充满激情。但我的心并未参与进去，当然了，除非我的自由受到妨碍。怎么跟您说呢？悄悄地溜了。是的，一切都悄悄地从我身上溜了。

说句公道话：有时候，我的遗忘还是值得称赞的。您注意到有些人，其信仰在于原谅一切侮辱，他们也的确原谅了，然而却永远不能忘怀。我不是那种原谅侮辱的人，但是我最后总是忘得一干二净。以为被我憎恨的人看到我笑盈盈地向他致敬而感到惊讶不止。根据他的天性，他或者钦佩我精神之博大或者蔑视我的怯懦，却想不到我的理由更为简单：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于是，使我冷漠或不讨人喜欢的同一种弱点却使我成了一个高尚的人。

因此，过一天算一天，我的生活只有一种持续性，即我，我，我。过一天算一天，搞女人；过一天算一天，行善或作恶；过一天算一天，如同狗一样；但是，每一天都是我，坚守岗位。我就这样浮上了生活的表面，某种程度是在口头上，从来也不

是真的。所有那些几乎没有读过的书，那些几乎没有爱过的朋友，那些几乎没有游览过的城市，那些几乎没有占有过的女人！我出于厌倦或出于消遣，有过一些行动。人们跟着，他们想依附，然而一无所有，而这就是不幸。那是对他们来说。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忘了。我从来只记着我自己。

渐渐地，记忆回到我的脑海。或不如说我回到了记忆中，我在那儿发现了回忆，它在等着我。在同您说之前，请允许我，亲爱的同胞，给您举几个例子（我确信它们会对您有用），谈谈我在探索中的发现。

一天，我驾着汽车，在绿灯前起动迟了一秒钟，我们有耐心的同胞立即在我背后发疯似地按喇叭，正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桩发生在同样情况下的遭遇。一辆摩托车超了我，驾驶的人是干瘪的小个子，戴着夹鼻眼镜，穿一条高尔夫球裤，遇到红灯，停在我前面。停下的时候，小个子将发动机熄了火，他竭力再打着，可是白费力气。绿灯亮了，我以习惯的礼貌请他把摩托车让一让，我好过去。小个子还在为噗哧噗哧的发动机恼火。于是，他根据巴黎礼节的通例，让我一边歇着去。我坚持着，一直彬彬有礼，只是在声调中有点轻微的焦急。人家立刻让我明白，不管怎么说要把我带走。这时，我背后有几只喇叭开始响了。我的口气更加坚决，要求对方有礼貌和承认自己阻碍了交通。这个暴躁的家伙无疑是由于发动机明显的作对而恼羞成怒，告诉我，如果我想尝尝老拳的话，他称之为松松筋骨，他很乐于奉送。如此的厚颜无耻使我义愤填膺，我出了车子，想要教训教训这个嘴里不干不净的家伙。我不想当胆小鬼（但愿别人也别这么想！），我比对方高出一头，我的肌肉一直为我好好地效劳。我现在还认为与其给人松筋骨还不如被人松筋骨。我在马路上还未站稳，从越聚越多的人群中出来一个

人，向我直奔而来，他让我明白我是卑鄙之尤，他不允许我揍一个因骑摩托而处于劣势的人。我面对这位侠客，实际上，我甚至没看清他。我刚一回头，几乎是同时，我听见摩托车又砰砰地响了，耳朵上也狠狠地挨了一下子。我还没有记下这一切，摩托已经走远了。我昏头昏脑，木然地朝达达尼昂① 走去，这时，一场愤怒的合奏从一长串汽车的喇叭中发出，越来越响。绿灯又亮了。我还有些迷迷糊糊，没有去揪住那个截住我的蠢货，乖乖地回到车子里。我开动了车子，经过那蠢货身旁的时候，他向我致敬，说了句“可怜的家伙”，这句话我现在还记着。

您说这是小事一段？当然。只是我很长时间才忘掉，这是其重要性。然而，我毕竟有自慰的理由。我挨了打而没有回击，人们却不能指责我怯懦。我从两方面遭到袭击和制止，两方面我都闹翻了，最后喇叭又使我糊里糊涂。可是，我感到不幸，仿佛我失去名誉一样。我重新看到自己，上了车，在那群人的一片讥讽的目光下毫无反应，我还记得，我穿了一身极高雅的蓝衣服，那群人因此更加开心。我听见说“可怜的家伙”，我觉得这一称呼毕竟是对的。总之，我当众丢了脸。的确，当时的情况也不作美，但永远是当时的情况啊。事后，我清楚地看到我当时应该怎么办。我看到我给那达达尼昂兜头一拳，将他打倒，然后上车去追那打我一拳的肮脏家伙，追上他，把他的摩托车扔在人行道上，把他拖到一边，理所当然地痛打一顿。我在想象中，上百次地，但脚本略有更动，拍摄这小电影。但是太晚了，有几天，我心怀一种卑鄙的仇恨。

瞧，又下雨了。您愿意在这门洞里停一会吗？好。我说到哪

① 法国作家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的主人公。

儿了?啊!对，名誉！当我又想起这段遭遇时，我明白了它意味着什么。总之,我的梦想没有经得起事实的考验。现在清楚了，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个完人，在人格上和职业上都受到尊敬。如果您愿意的话，半是塞尔当①，半是戴高乐。一句话，我愿意在一切事情上都占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摆架子，装模作样，更多地显示身体的灵巧而不是智力的秉赋。可是当众挨打而无反应之后，再想望这种美好的形象于我已是不可能了。如果我曾经是真理和智慧之友的话，如同我自许的那样，这桩已被看客遗忘了的遭遇对我又有什么呢?我差一点承认我无缘无故地生气，既已生气，又差一点承认我由于缺乏机智而不知如何面对我的愤怒所引起的后果。我没有那样做,却急切地希望报复，痛打和战胜对方。好象我真正的愿望不是成为人世间最聪明，最仁慈的人，而只是想打谁就打谁，成为最强大的人，而且还是以一种最粗鄙的方式。事实上，您清楚地知道，任何聪明的人都梦想着当强盗，只以暴力支配社会。由于这不象阅读某类题材的小说那样容易使人相信，一般地说人们就转向政治，投向最残酷的政党。如果能够统治所有的人，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卑鄙又有何妨呢，是不是?我发现自己正做着压迫人的甜梦。

至少，我知道只有罪人以及被告的罪过对我毫无损害时，我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的犯罪使我雄辩，因为我并不身受其害。当我受到威胁时，我不仅变成法官，更有甚者，变成一个狂暴的主人，要不顾一切法律，痛责罪人，使其屈服。在此之后，我亲爱的同胞，就很难再郑重其事地认为自己有奉行正义的使命，充当孤儿寡妇的天然保护者了。

既然雨大了，我们还有时间，我敢向您披露不久以后在我

① 塞尔当，法国拳击运动员，曾获一九六四年中量级世界冠军。

记忆里的一个新发现吗？我们坐在这凳子上避避雨吧。数百年来，抽烟斗的人观赏着同样的雨落进同一条运河里。我要向您讲述的却更加困难些。这一次，事关一个女人。首先应该知道，我总是不费力地在女人身上获得成功。我不是说成功地使她们幸福，也不是说我因她们而幸福。不，仅仅是成功而已。我愿意的时候，差不多总能达到目的。想象一下吧，人家觉得我有魅力。您知道什么是魅力，那是一种会不提出任何明确的问题而得到肯定的回答的方法。我当时就是这样。这让您感到惊讶？算了吧，别否认这一点。我是心血来潮，这是很自然的。唉！过了一定的年龄，任何人都对自己的面貌负有责任。我的面貌……管它呢！事实如此，人家认为我有魅力，我且利用一下。

然而，我并没有任何小算盘，我是善意的，或差不多。我和女人的关系是自然的，轻松的，如同人们所说，是容易的。其中不掺杂诡计，或仅仅只有诡计，然而是公开的，她们认为是一种敬意。用通行的话说，我爱他们，这就是说，我从未爱过其中任何一位。我一直认为讨厌女人是庸俗的，愚蠢的，而且我认为，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女人都比我好。不过，这有什么关系？我把她们抬得这样高，更经常地是利用她们而不是为她们效劳。

当然，真正的爱情是例外，那是百年之中只有二三次的。余下的时间里，只有虚荣或厌倦。至于我，不管怎么说，我不是葡萄牙修女①。我的心并不干枯，差得远呢，相反，却充满了温情，还容易流泪。只是我的热情总是转向我自己，我的温情也是为了我自己。无论如何，说我从未爱过是不对的。至少在我的一生中是有一种伟大的爱情，其对象一直是我本人。根

① 意思是说，我并非心如古井。语出何典，未详。

据这一观点，经过了青年时代不可避免的麻烦之后，我很快就打定主意：好色，我的爱情生活中唯有它才存在。我只是寻求作乐和征服的对象。我的体格帮了我的忙，自然待我不薄。我对此颇感自豪，我得到很大的满足，简直不知道该说是感官的满足还是威望的满足。好，您要说我又吹牛了。我不否认，当我把真实的事胡吹一通时，我就更加无法自豪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的好色，姑且只谈好色吧，都是那么实在，哪怕为了一次十分钟的艳遇，我也会不认爹娘，不顾事后会辛酸地后悔。我说什么来着！尤其是为了一次十分钟的艳遇，更有甚者，尤其是我确信这艳遇好景不长。当然，我有原则，比方说，朋友的妻子是神圣的。只不过是，在几天之前，我会完全真心实意，中止了对丈夫的友谊。也许我不该称这为好色？好色并不令人厌恶。让我们宽容一些，让我们谈谈缺陷，一种生来的无能，是我们在爱情生活中所看到的另一种表现。这种缺陷，说到底，令人惬意。它与我的健忘配合，对我的自由有利。同时，由于某种疏远，由于它所给予我的顽强的独立神气，它提供给我新的成功机会。由于竭力不存幻想，我给予幻想家的食粮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我们的女友们与波拿巴① 有共同之处，她们总是想在别人都失败的地方成功。

此外，在这种交易中，我还满足了好色以外的东西：我对游戏的爱好。我把女人看成某种游戏中的伙伴，她们起码对天真无邪特别喜爱。您看，我受不了厌烦，我在生活中只看重娱乐。任何一种团体，哪怕是出类拔萃的，很快就使我厌倦，而我对喜欢的女人却从不厌烦。我简直难于承认，我会去拿十次与爱因斯坦的谈话去交换与一个漂亮的女配角的初会。真的，

① 指拿破仑·波拿巴。

在第十次幽会的时候，我就希望与爱因斯坦谈话了，或是去作艰难的阅读。总之，我从来只是在我的短暂的放纵的间隙才关心大问题。有多少次，我站在人行道上，与朋友讨论方酣，却听丢了人家提出的推理的线索，因为一个迷人的女人正穿过马路。

于是，我就作戏。我知道她们不喜欢朝目标走得太快。如她们所说，首先应该是谈天，温存。作为律师，我娴于辞令，在军队里，我学过演戏，亦颇知温存之道。我经常改变角色，但总是同一场戏。比方说，不可理解的吸引力这一类的节目："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理由，我并不想被吸引，我对爱情感到厌倦，等等"。这些节目永远有效，尽管这是最老的节目之一。还有神秘的幸福，任何别的女人也没有给过您，这幸福可能好景不长，甚至肯定不长（因为人们太不能保证了），而它正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我改良了一小段台词，总是受到欢迎，我肯定您也会鼓掌的。这段台词的基本意思是痛苦地、无可奈何地表明，我一无是处，不值得倾心相许，我的生活在别的地方，它不需要通常的幸福，也许我本该热爱这种幸福胜于其余的一切，然而，已经太晚了。这种晚是决定性的，至于其原因，我保守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是相信我所说的，我生活在我的角色中。于是，毫不足怪，我的伙伴们也热烈地演起戏来。我的女友中最敏感者竭力理解我，她的努力使她愁肠寸断，委身于我。其余的，满意地看到我尊重游戏的规则，因为我具有行动之前先说话的委婉，也就毫不拖延，走向现实。我赢了，而且是双重的胜利，因为除了我对她们的欲望之外，我还每次都通过检验我的魅力而满足了我对自己的爱。

这一切是如此地真实，尽管有时候，某些女人只给予我一些粗俗的快乐，我却努力日渐疏远地和她们重修旧好，无疑是

由于分离和随即突然恢复的默契产生了独特的欲望，同时，也是为了验证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着，而这种关系的加强却取决于我。有时，我甚至让她们发誓不再属于其他的任何男人，为了一劳永逸地平息我的不安之感。心灵，甚至想象，都与这不安无涉。某种奢望那么深地体现在我身上，我竟不顾明显的事实，难以想象一个曾经委身于我的女人还能够属于他人。她们向我立下的誓言拴住了她们，却解放了我。因为她们不属于任何人，我于是可以决心断绝，否则，这对我几乎是永远不可能的。对她们的检验从此完成，而我的权力亦长久地得到保障。奇怪，不？然而就是这样，我亲爱的同胞。一些男人喊："爱我吧！"另一些则喊："别爱我吧！"但是，某种最坏的，最卑劣的人说："别爱我，但要忠于我！"

只是，唔，验证永无终止，每逢新人即应重新开始。由于不断地重新开始，人们就习以为常。不假思索，话就来了，随后就是下述反应：有朝一日会处于占有却不真正有欲望的境况之中。相信我，对于某些人来说，不占有自己没有欲望的东西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这正是有一天发生的事，无须跟您说她是谁，只消说她以其萎靡的、贪婪的神气吸引了我，但并未引起我真正的骚乱。坦率地说，这件事平庸无奇，早在意料之中。但是，我从来没有过麻烦，我很快就将她置诸脑后，不再相见。我想她毫无觉察，我甚至没有想到她会有看法。再说，她的消极的神气在我看来使她与众不同。几个星期以后，我却得知她向第三者泄露了我的缺点。我立刻觉得有点被欺骗了，她不象我以为的那样萎靡，她并不缺乏判断力。然后，我耸了耸肩，装作一笑置之。我甚至还确确实实笑了起来；很清楚，这件意外之事并不重要。如果有那么一个领域，在那里谦虚应该成为习惯，这个领域难

道不就是性欲及其一切不可预料之事吗？否，即使在孤独之中，也是双方争着要占便宜。尽管我耸肩膀，但事实上我是如何行动的呢？不久以后，我又看见这个女人，为了引诱她我做了该做的事，又重新真正地占有她。那并不困难，她们也不甘失败。从这时起，我也并不很明确地愿意，然而事实上我却开始百般污辱她。我丢弃她，又重新获得她，强迫她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刻委身于我，我在各方面都待她如此粗暴，最后竟倾心于她，如同我想象狱卒系于囚徒一样。直到那一天，在一阵痛苦、压抑、狂乱的快乐中，她高声赞颂奴役她的这一切。那一天，我开始疏远她。以后，我就忘了她。

尽管您出于礼貌而沉默，我还是同意您的意见，这场艳遇不太光彩。但是，考虑考虑您的生活吧，我亲爱的同胞！挖掘您的记忆，也许您会发现某个类似的故事，您以后会讲给我听的。至于我，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我还发笑呢。但这是另一种笑，相当象我在艺术大桥上听到的那种笑。我笑我的话和我的辩词。比笑我对女人说的话还要厉害地笑我的辩词。对她们，起码，我的谎话少。在我的态度中，本能说话清清楚楚，毫不拐弯抹角。爱的举动，比方说，是一种供词。其中自私在大喊大叫，明目张胆，虚荣则昭然若揭，或者真正的仁慈也在其中显露出来。最后，在这桩令人遗憾的故事里，和我在其它故事里相比，我比自己原先想的还直率，我说了我是谁，我如何才能生活。不管外表如何，我在私生活中，尤其是当我象我跟您说的那样做人的时候，这要比我在论及无罪和正义时表现出来的职业的感情奔放更值得尊敬。至少，可以看到我的为人，我不能弄错我的天性。没有一个人在寻欢作乐中是虚伪的，我这是读到还是想到的呢，亲爱的同胞？

这样，当我考虑到我与一个女人彻底分离的困难时，这种

困难使我同时有着那么多的关系，我并不谴责我心中的温情。当我的一个女友等待情欲的辉煌胜利等得厌倦，谈起分离的时候，并不是温情使我行动。我立刻前进，后退，变得口若悬河。我在她们身上唤起温情和甜蜜的柔肠，而我所感到的也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我只是为这一拒绝所激动，也为可能失去感情而不安。有时候，我认为我确实感到了痛苦，真的。但是，只要那不听话的女人真的走了，就足以使我轻易地忘掉她，如同她在我身边，而她决定还再来的时候，我忘掉她一样。不，当我面临被抛弃的危险时，唤醒我的不是爱情，也不是仁慈，而仅仅是希望被爱，得到据我看来属于我的东西。我一被人爱上，而我的相好重又被我忘却，我就高兴，我就舒服，我就变得讨人喜欢。

请记住，这种感情，一旦我重新获得，我就感到它的重量。在我恼火的时候，我就想理想的出路可能是为我感兴趣的人去死。一方面，这一死终于能固定我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会对她解脱束缚。然而，人们不能希望所有的人都去死，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享受一种非如此不能想象的自由而使地球灭绝人迹。我的感觉反对，我对人的爱也反对。

当一帆风顺，当人们在给我安宁的同时，又给我刚刚离开一个女人的床就同另一个女人更温柔更快活地来去 自 由 的时候，我在这些艳遇中所体验到的唯一深刻的感情是感激，好象我把刚刚欠下其中一位的债扩展到所有其他女人身上一样。此外，不论我的感情表面上如何混乱，我获得的结果是明确的：我把我周围所有的爱情都维持着，以便随意使用。我承认，我能够生活的唯一条件是，在地球上，所有的人，或者尽可能的大多数，都转向我，他们永远是无人占有的，没有独立的生活，随时准备回答我在任何时候发出的召唤，对毫无结果心甘情愿，

直到我屈尊，以我的光明恩赐他们的那一天。总之，为了我生活幸福，我选出的人就该不生活。他们就该越来越只是从我的好兴致中讨生活。

啊！务请相信，我在向您讲述这些时毫无满意之感。我想到那段时期，我要求一切而自己一无所付，我动员了那么多人为我服务，我在某种意义上把他们置于冰箱里，为了使自己某一天可以随手可取，用起来方便，这时候，我不知如何称呼涌上我心头的那种奇怪的感情。不会是羞耻吧？告诉我，亲爱的同胞，羞耻不是有点儿灼人吗？是吧？那么，也许是它，或者是那些与名誉有关的可笑的感情里的一种。尽管我脱离本题，竭力杜撰，但愿您公正地对待这种杜撰，反正我觉得自从我在记忆中发现了那桩艳遇之后，这种感情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我也再不能延宕下去而不去讲它了。

瞧，雨停了！劳驾陪我回家吧。我累了，奇怪，不是因为我说多了，而是因为想到了我还得讲的事情。好吧！要讲我的基本发现，三言两语就够了。为什么要讲更多呢？为了让雕像纤毫毕露，应该抛弃华丽的辞藻。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夜里，是在十一月份，在我以为听到背后的笑声的那天晚上前二三年，我到了左岸，通过王家大桥回家。半夜一点钟，下着小雨，说毛毛雨更合适，行人寥寥。我刚刚离开一个女友，此时她肯定已经睡了。我走得兴致勃勃，还有些懒洋洋，周身平和，血液缓缓地流着，如同小雨一般。上了桥，我从一个俯在栏杆上的人后面走过，他好象正在望着流水。走得更近些，我认出了那是个身腰纤细的女人，穿着黑衣服。在深色头发和大衣领子之间，只看见后脖颈，新鲜而湿润，我对此是敏感的。然而，我犹豫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过了桥头，上了滨河路，朝圣米谢尔走去，我住在那儿。我已经走了大约五十米远，听见身体

跃进水里的声音，尽管距离这么远，但在夜的寂静中，我觉得那声音非常宏大。我立即站住了，但未回头。几乎同时，我听见一声呼叫，重复了好几次，顺流而下，然后戛然而止。夜色突然凝固，我觉得那随之而来的寂静无边无际。我想跑，却仍伫立不动。我认为，我因寒冷和惊恐而瑟瑟发抖。我心想应该快快行动，我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软弱占据了我的全身。我忘了当时我想些什么。“太晚了，太远了……”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一直在倾听，纹丝不动。然后，我轻移小步，冒着细雨，走远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们到了，这是我住的房子，我的掩蔽所。明天？好，如您所愿。我将乐意带您去玛尔肯岛，您将看到须德海。十一点在墨西哥城见面。什么？那个女人？啊！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我都没有读报。

一个玩偶般的小村子，您不觉得吗？不乏秀丽之处。但是，我领您到这小岛上来不是为了看美景，亲爱的朋友。谁都可以让您欣赏女人的帽子，木套鞋，在装饰过的房子里，渔夫们在木器蜡的气味中抽着上等烟草。不，我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但却可以向您指出此地所具有的重要性。

我们上了堤坝。顺着堤坝，就可以尽可能远地离开这些过于美丽的房子。坐坐吧，请。怎么样？您看，不是吗，最美的否定之景！左边，那一堆灰烬，人们称之为沙丘；右边，灰色的长堤，脚下是苍白的海滩；前面，大海的颜色有如稀薄的洗衣水，广阔的天空反射着灰白的水光。的确是个了无生气的地狱！一切都是水平的，没有任何光彩，天地无色，生命已死。难道不是普遍的消亡、刺眼的虚无吗？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人！只有您和我，存在于这个终于荒芜了的世界面前！天有生命吗？

您说得对，亲爱的朋友。它变厚，然后又稀薄起来，打开的是气的阶梯，关上的是云的大门。那是鸽子。您没注意到吗，在荷兰的天空中，充塞着几百万只鸽子，当它们飞在高空中时，无影无踪，它们扇动羽翼，齐上齐下，发灰的羽毛充满空中，犹如一排排宽厚的波浪随风来去。鸽子在高空中等待，成年累月地等待。它们在大地上空盘旋，观望，想落下来。然而除了大海、运河、铺满招牌的屋顶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一个脑袋上可以落脚①。

您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承认我累了。我语无伦次，朋友们乐于向我表示钦佩我的思想的清晰，现在没有了。我说朋友们，当然，是从原则上说的。我没有朋友了，我只有同谋。作为抵偿，他们的数目在增加，他们是人。在人类中，您是第一个。在这儿的总是第一个。我怎么知道我没有朋友了？这很简单：有一天我发现了这一点，那天，为了开玩笑，多少是为了惩罚他们，我想自杀。但是，惩罚谁呢？某几位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没有人会感到受了惩罚。我明白我没有朋友了。再说，即便还有，我也觉得与事无补。如果我能自杀而后又看见他们，那么，自杀倒也值得。然而，大地昏黑，木头又厚，葬衣也不透明。灵魂的眼睛，是的，当然，如果有灵魂的话，如果它也有眼睛的话！可问题就在这儿，人们没有把握，从来就没有把握。否则就有了出路，就终于能够让人认真对待自己了。只有您的死，才能使人们相信您的理智、真诚和您的痛苦之沉重。只要您一息尚存，您的情况就可疑，您就只能受他们怀疑。那么，只要确信可以看到那种场面，就值得向他们证明他们不相信的东西，使他们惊讶。然而，您自杀了，他们相信与否又有何干，

① 指鸽子寻找城里所竖的雕像，然后落其头上。

您不能获得他们的惊讶和他们的悔恨，何况这悔恨又是短暂的，您终于不能根据每个人都有的梦想参加自己的葬礼。为了不再被怀疑，应该不再活着，千真万确。

再说，这样不是更好吗？他们的冷漠使我们感到太痛苦了。“你要为我付出代价！”一个姑娘对她父亲说，他不让她与一个过分讲究的求爱者结婚。于是她自杀了。然而，那父亲根本没付出什么代价。他非常喜欢甩钩钓鱼。过了三个星期天，他下河了，说是为了忘掉那件事。他算得准，他是忘了。说实话，如果相反，那才奇怪呢。人们以为死是为了惩罚他老婆，反而还了她自由。最好是不见这种事为妙。且不说还有可能听到人们为您的行动提供理由。关于我的，我已经听到了：“他自杀是因为他受不了……”啊！亲爱的朋友，人是多么不善于虚构啊！他们总是以为人为了一个理由而自杀。然而，自杀完全可以有两个理由。不，他们不懂这一点。那么，自愿地死有什么用？为自己愿意有的关于自己的看法而轻生有什么用？您死了，他们则加以利用，对您的行动赋予一些愚蠢或庸俗的动机。亲爱的朋友，殉道者应当在被遗忘，被取笑或被利用之间进行选择。至于被理解，绝不可能。

然后，让我们开门见山吧，我爱生活，这是我唯一的弱点。我是那样地热爱它，对此外的一切毫无想象力。这样的渴望有种平民味儿，您不觉得吗？贵族总是稍稍离开本人，离开本人的生活来想象自己。需要死的时候去死，宁折不弯。我呢，我弯，因为我还继续爱我自己。喂，我跟您讲了这一切之后，您认为我怎么了？厌恶我自己？哪里，主要是别人厌恶我。肯定，我知道我的过失，我感到遗憾。但是，我继续忘却它们，那种顽强劲儿是颇值得赞扬的。与此相反，针对他人的诉讼却不断地在我心中进行。这肯定使您不快吧？您大概想这不合逻辑吧？

但问题不在于合乎逻辑。问题在于从中间滑过去，特别是，噢！对了，问题在于逃避审判。我不说逃避惩罚。因为不经审判的惩罚是可以忍受的。况且，有一个词可以保证我们的无辜：不幸。不，相反，问题在于中止审判，避免总是被审判而总是不宣读判词。

然而，中止谈何容易。今天，我们随时都准备进行审判，正如随时都准备通奸一样。至于过失的区别，则毋庸担心。如果您表示怀疑，请您在八月份，留神听听海滨旅馆餐桌上的言谈，我们的仁慈的同胞到那儿去医治厌倦。如果您还犹豫不决，读读我们那些时髦的大人物所写的东西吧。或者观察一下您自己的家庭，您就会明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别给他们借口来审判我们，一点儿也别给！否则，我们就会粉身碎骨。我们被迫要同驯兽者一样谨慎。如果他在进入兽笼之前不幸用剃刀把脸刮破，那对野兽来说将是一顿怎样的美餐啊！有一天，我犯了疑，也许我不是那么值得钦佩，于是我恍然大悟。从此，我变得满腹狐疑。既然我已经流了点血，我就会全部流尽：它们要吞食我了。

我和同时代人的关系看起来也是这样，但是变得微妙地不协调。我的朋友们没有变。一有机会，他们总是吹嘘在我身边感到的和谐与安全。但我却只感到不协调和充满我全身的混乱，我觉得自己有弱点，并在公众的控告之下暴露出来。在我看来，我的同类不再是我习以为常的那种毕恭毕敬的听众了。以我为中心的圈子破裂了，他们站成一排，如在法庭上一样。自从我悟出我身上有可以受审的地方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审判别人的倾向。是的，他们还在那里，一如既往，然而在笑。或不如说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看着我，暗自窃笑。那段日子里，我甚至觉得人们对我下绊子。事实上，

有两三回，我去公共场所时，不明不白地绊了脚。有一次，我竟然跌倒了。作为一个笛卡儿主义的法国人，我立刻镇定起来，并将一切意外归咎于唯一讲得通的神意，我想说是偶然性。管它呢，我还是满腹狐疑。

我的警觉被唤醒，不难发现我有敌人。首先是在我的职业中，然后是在我的社交生活中。对一些人来说，我对他们施恩，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不得不施恩。总之，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我发现了也不感到太伤心。但是，对我来说，更困难、更痛苦的是承认我在一些几乎不认识或根本不认识的人中有敌人。我总是怀着一颗我已给过您几次证据的淳朴之心在想，如果这些不认识我的人来同我交往，他们肯定会不由自主地爱我。其实不然！我尤其是在那些只远远地见过我而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中间感到敌意。他们显然是疑心我的生活很充实，自由地沉溺在幸福中，而这是不可饶恕的。成功的神气，当它被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时，会使驴子发怒。再说，我的生活满得要胀破，因为没有时间，我多次回绝了别人的趋奉。基于同样的理由，我随即也忘了我的回绝。然而，这些趋奉是那些生活不充实的人作出的，他们基于同样的理由，记着我的回绝。

这样，算下帐来，女人就让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姑且仅举一例。我用于她们身上的时间，不能再给男人，而他们并不总原谅我。怎么办呢？只有您同意与他们分享，他们才谅解您的幸福和成功。然而，为了幸福，就不该太多地顾及别人。至此，出路被堵塞了。要么因幸福而被审判，或者被免诉而悲惨。对于我，受到的不公正则更为严重：我因过去的幸福而被判罪。我长期生活于普遍和谐的幻境中，满面春风，无所用心，来自各方的审判、利箭和嘲笑都遇我而消溶殆尽。从自我警觉的那一天起，我清醒了，同时遍体鳞伤，一下子失去了力量。

于是，在我周围普天下人都开始嘲笑我。

这是任何人（除了那些不生活的人，我说的是智者）也忍受不了的。唯一的防身武器存在于邪恶之中。于是，人们为了自己不被审判，就匆匆忙忙地审判别人。有什么方法？人类最自然的念头，天真地出现的，犹如来自他本性的深处，是他自己的无辜。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大家都象那个小法国人，他在布森瓦尔德① 执意要向文书提交一份申请书。文书本人也是俘虏，登记他的到来。一份申请书？文书和他的伙伴笑了："没用，老兄。这儿的人不提申请。""问题是，先生，"小法国人说，"我的情况特殊。我是无辜的！"

我们都是特殊情况。我们都求救于某种事情。每个人都宣称无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为此而指控人类和上苍。您恭维某人为变得聪明和仁慈而付出的努力，这仅使他一般地高兴。相反，如果您欣赏他天性仁慈，那他就会心花怒放。反之，如果您对一个罪犯说，不是天性，也不是性格，而是环境使他犯了罪，他会狂热地感激您。在辩护中，他甚至会选择这一时刻流泪。然而，正直和聪明都没有与生俱来的价值。正如人们出于天性犯罪肯定不比出于环境犯罪负有更多的责任一样。但是，这些骗子希望得到赦免，也就是不负责任，他们肆无忌惮地为天性辩护或以环境为借口，尽管二者相互矛盾。根本点在于他们是无辜的，他们的品德，由于一生下就具备，因而不致受到怀疑，他们的过失出于瞬间的不幸，永远只是暂时的。我跟您说过，问题在于中止审判。由于难以中止，难以让人既钦佩又原宥它的本质，人们就都设法致富。为什么？您问过自己吗？

① 布森瓦尔德，德国魏玛附近的一个大集中营，设立于一九三七年，死于其中的人超过五万，一九四五年四月被美军解放。

当然是为了权力。尤其是，财富使人免于马上受审，把您从乘地铁的人群中解脱出来，关进镀镍的汽车里，让您处于宽敞的花园里，卧铺车厢里，豪华的办公室里。亲爱的朋友，财富还不就是开释，但已是缓刑了，得到它总是好的……

特别是，当您的朋友要求您真诚地对待他们时，别相信他们。他们只是希望您把他们看成他们自以为的那副好样子，向他们提供一种补充的确实性，而这种确实性是他们在您对于真诚的保证中汲取的。真诚怎么能成为友谊的一个条件呢？不惜代价地追求真象的爱好，是一种什么也不放过，什么也抵抗不了的情欲。这是罪过，有时是舒适，或是自私。因此，如果您处于这种情况之中，不要犹豫，要答应说真话，尽可能圆满地撒谎。您回答他们深切的期望，向他们双倍地证明您的感情。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这可太真实了。我们宁肯避免与他们往来。相反，最为经常的是我们对和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因此，我们并不希望改掉我们的弱点，也不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大概首先应该被判犯了错误。我们只是希望在我们的道路上受到怜悯和鼓励。一句话，我们希望不再有罪，同时对自己的纯洁不作努力。不要够多的无耻，也不要够多的道德。我们既无力作恶亦无力为善。您知道但丁吗？真的？见鬼。那您知道但丁在上帝和撒旦的争执中接受了中立的天使。他把他们置于不确定的地带，在他的地狱的某种前厅里。亲爱的朋友，我们正在这前厅里。

耐心？您大概说得对。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着末日审判。可是，您看，我们多急啊。急得我不得不当了法官一忏悔者。然而，我首先得和我的发现一致，要和我的同时代人的讪笑了结。从我被召唤的那天起，因为我确实被召唤了，我不得不回答，至少要寻求答案。那不容易，我徘徊良久。首先，这笑声

和发笑的人应该教会我对自己看得更清楚，教会我发现我并不是单一的。不要笑，这事实并不象它所表现的那么原始。人们称那些在其它事实以前发现的事实为原始事实，如此而已。

反正是经过了我对自己的长期研究之后，我把人类的深刻的两重性大白于天下。我在记忆中搜索之后，明白了，虚心佐我闪光，谦卑助我制胜，德行辅我压迫。我通过和平的手段进行战争，最后通过无私的手段获得了我觊觎的一切。比方说，我从不抱怨人家忘了我的生日；人家甚至怀有一种钦佩之情对我关于此事的缄默感到惊讶。然而，我的无私之原因却更不引人注目：我想被人忘却，以便我能够自怨自艾。那是我熟悉的、最光荣的日子之一，几天之前，我就戒备着，不泄露任何东西，以免引起我期待着过错的那些人的注意和唤起他们的回忆（有一天我不是企图假造一份日历吗？）。由于我很好地显示了孤独，这才能够沉溺于一种雄伟的忧郁的魅力之中。

这样，我所有的德行就有了一个不那么威严的反面。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的缺点转而对我有利，这是真的。比方说，我被迫掩盖我生活的罪恶部分，使我装出一副冷淡的、人们常常混同于德行的那种神气，我的冷漠使人们爱我，我的自私在我的慷慨大度中达到顶点。我停下吧：太多的类比会妨害我的证明。什么！我装做作石心肠，我不能拒绝奉献给我的一杯酒或一个女人！我被视为活跃的、有力的，我的王国是床笫。我高喊我的忠实，我认为，没有一个我爱的人，最后我也从未背叛过。当然，我的背叛并不妨障我的忠实。我由于萎靡不振而完成了一件巨大的工作，我由于发现了乐趣而不断地帮助我的邻人。我徒劳无益地重复说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我只是从中得到了不关痛痒的慰藉。某些早晨，我审理案子直到结束，我得出结论，我精于轻蔑。那些我最常帮助的人，是最受轻蔑的人。

彬彬有礼地、怀着充满激情的友爱，我每天都往所有的盲人脸上吐唾沫。

坦率地说，这有理由辩解吗？有一个，但是太卑鄙了，我不能考虑利用它。无论如何，理由是这样：我从未打心眼里相信人类的事务可以是严肃的。严肃在哪里，它不存在于我所见的一切东西里，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我只觉得我见到的事就象一种游戏，或者令人开心，或者惹人生厌。那种我永远也不理解的努力和信念的确存在着。我总是以一种惊奇的、略带怀疑的神气看着那些奇怪的人为金钱而死，因失去某种“地位”而绝望或者神气凛然地为家庭的兴旺而献身。我更理解的是那位朋友，他带头戒烟，凭着意志而成功了。一天早晨，他打开报纸，读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了，知道了它的值得钦佩的威力，就立即走进一家烟店。

没有疑问，有时候我装作严肃地对待生活。但是，严肃本身的轻佻很快就显现出来，我只不过是尽可能好地继续演我的角色。我装作能干、聪明、讲道德、富于公民心、愤怒、宽容、友爱、循循善诱……我就止打住，一句话，您已经明白，我象那些荷兰人一样，他们既在那儿又不在那儿：我不在，同时又占据了最大的位置。只是在我运动的时候，在团里，当我在为了取乐而演的戏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我才是真诚的、热情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一种游戏的规则，它并不是严肃的，只是人们把它看作是严肃的来开心。现在仍然如此，一个进行着星期天比赛的挤得满满的体育场，一个我总是以一种无可比拟的热情喜爱的剧场，这是世界上仅有的、我在其中感到自己清白无罪的两个地方。

然而，当事关爱情、死亡、穷人的工资的时候，谁会承认这种态度是合法的呢？可是怎么办呢？我只在小说中或舞台上

才想象得出绮瑟① 的爱情。我觉得垂死的人有时候是深入到他的角色中去了。在我看来，我的穷主顾的辩解总是出自同一个稿子。从此，我由于生活在人们中间但不赞同他们的利益，而不能够相信我所承担的义务。我的礼貌，我的懒散，足以回答他们在职业、家庭、公民生活中对我的期待，然而，有一次，却因某种心不在焉最后就把一切都弄砸了。我在双重气氛中度过我的全部生活，我最重大的行动常常是那些我参与最少的行动。我所不能原谅自己的、使我蠢上加蠢的，难道不是这个吗？它使我最凶猛地抗拒正在我身上和我周围进行的、迫使我寻求出路的审判。

在一段时间内，我的生活表面上一如既往，仿佛毫无变化。我沿着轨道前进。好象由于巧合，关于我的赞扬加倍地增多。灾难恰恰在此。您记住："当所有的人都说您的好话时，您就倒霉了！"啊！那个人谈的是金玉良言！我倒霉了！机器于是开始不听话，莫名其妙地停停走走。

这时，死的念头闯入我的日常生活。我计算着距离末日的时间。我寻找和我同龄的、已经死去的人。我将没有时间完成我的使命，这个念头折磨着我。什么使命呢？我毫无所知。坦率地说，我的所做所为值得继续吗？然而，并不确切地是这个。事实上，一种可笑的恐惧追逐着我：人不能不招供他所有的谎言就死去。不是对上帝，也不是对他的代表，我超然在上，您想得到的。不，是向人招供，比方说，向一个朋友，或向一个所爱的女人。否则，哪怕一生中只有一个谎言被隐瞒，死就会使它变得不可改变。既然唯一知道它的人是长眠于他的秘密

① 法国中世纪传奇小说《愁斯丹与绮瑟》的女主人公，被后人视为痴情女子的典型。

之上的死者，那就再不会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一种真相被绝对地戕杀，这使我头晕目眩。今天，顺便说一句，它更可以说是给我一些微妙的快乐。例如，想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有的人都试图知道的事；想到我保有一件让三个警察局疲于奔命的东西，真是妙不可言。但是，别说这个了。当时，我没有找到办法，我痛苦。

当然，我没有束手待毙。在多少代人的历史中，一个人的谎言有什么关系！企图将犹如沧海一粟的一桩卑鄙谎言带进真相的光明之中又是多大的奢望啊！我也想到，躯体的死亡，如果根据我之所见来判断，其本身就是一种足够的惩罚，它饶恕一切。人们通过垂死挣扎的汗水获得了拯救（也就是彻底消失的权利）。它阻止不了不安的加重，死亡在我的枕畔逡巡不去，随我一道起床，恭维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好象谎言与恭维并长，如此地过分，以致我永远了结不了这笔帐。

我支持不住的那一天来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混乱的。既然我是说谎言，我要将这公诸于世，在那些笨蛋尚未发现我的两重性时，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掷去。我既已被挑动坦白，我就将回答挑战。对于众人的嘲笑，我就设想自己陷入普遍的讥讽之中。一句话，问题还在于中止审判。我想把笑我的人拉到我这边来，或者至少是我站到他们那边去。比方说，我打算在街上冲撞盲人，通过我感觉到的阴暗的、意想不到的快乐，我发现我灵魂中对他们的憎恶已到什么程度：我捉摸着把残废人的小车的轮胎扎破，到工人干活的脚手架底下大喊“肮脏的穷鬼”，到地铁里给婴儿吃耳光。我这一切都想过，但没做一件，或者，如果我做了某件类似的事，我也忘了。反正是正义这个词将我投入奇怪的狂怒之中。我不可避免地继续在辩护中使用这个词。但是，我通过公然污蔑人类精神来解我心头之恨；我宣布将发

表一份宣言揭露被压迫者对正人君子的压迫。有一天，我在一家饭馆的平台上吃龙虾，一个乞丐缠着我，我叫来了老板撵他走，对这个伸张正义的人的话大鼓其掌："您打扰了别人，"他说，"您处在这些先生女士们的位置上试试看！"我则对任何愿意听的人说，很遗憾我再也不能象我曾钦佩其性格的俄罗斯地主那样行事了：他命人同时鞭打向他行礼的农民和不向他行礼的农民，以惩罚他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属冒犯的放肆。

我还想起更为严重的放肆。我开始写作《颂歌献给警察》和《铡刀颂》。特别是，我必须按时去那些专门的咖啡馆，那儿聚集着我们的职业人文主义者。我的良好的经历使我自然而然地受到欢迎。在那儿，我若无其事地说了句粗话："感谢上帝……，或更简单："我的上帝……"您知道我们的咖啡馆无神论者是多么怯懦的领圣体者。我这句粗话说出之后，接着就是一片惊愕，他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然后一阵大乱，一些人逃出咖啡馆，另一些人义愤填膺，什么也不听，只是嗷嗷大叫，所有的人都由于痉挛而扭曲着身体，犹如圣水之下的魔鬼一般。

您该认为这是幼稚的。然而，也许这些玩笑中有一个更为严肃的理由。我打算搅乱这游戏，特别是，对，破坏那个美化了的声誉，一想到它我就怒气冲冲。"一个象您这样的人……"人们亲切地对我说，而我的脸都白了。我不愿要他们的尊重了，因为它不是普遍的，然而它怎么能是普遍的呢，既然我不能与人共享？那么，最好是把它们，审判和尊敬，都盖上一层可笑的外衣。我将千方百计地消除这个使我窒息的感情。为了把肚子里的东西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我想把我这具到处招摇的漂亮的人体模型打碎。就这样，我又想起一次谈话，那是我该同年轻的见习律师进行的一次谈话。替我作介绍的首席律师不着边际的溢美之词使我恼火，我再也坐不住了。我怀着人们期待

于我的、我毫无困难地应约交付的奔放和激情开始了。但是，我突然劝他们将大杂烩用作辩护的方法。我说，不是那种现代宗性教裁判所使之臻于完善的大杂烩，这种大杂烩既审判窃贼又审判老实人，而以前者的罪过来制服后者，相反，是通过使老实人的罪行成立而为窃贼辩护，具体地说，就是靠律师。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说得十分清楚：

“假定我接受为一个令人怜惜的公民辩护，他因嫉妒而杀了人。我将说，法官先生们，当一个人在看到他天性中的善良正被狡猾的性欲考验时，请考虑他处在愤怒中时可以宽恕的地方。相反，处于栏杆的这一方，在我自己的椅子上，我从未善良过，也从未受过骗，这不是更严重吗？我是自由的，你们的严酷我是幸免了，然而我是什么样的人呢？说到骄傲，我是太阳国公民，我是一个色情狂，一个震怒的法老，一个懒散的王。我没有杀死一个人？当然还没有！然而，我没有让一些有功劳的人死去吗？也许。而可能我准备好再干。而这个人，看看他吧，他不再干了。他还因为那么好地工作过而惊讶不止呢。”这番话在我那些年轻同事中引起了一点儿波动。过了一会儿，他们还是决定一笑置之。当我作出结论，雄辩地援引人类及其假定的权力时，他们完全放心了。那一天，习惯战胜了一切。

我重复这些可爱的胡闹，只是使舆论有些狼狈。并非解除舆论的武装，更非解除我的武装。我所见到的听众普遍的惊讶，他们的有些回避的窘迫。相当象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别抗议——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平静。您看，为了证明自己无辜，自己认罪已经不够，如果我不是一只纯洁的羔羊的话。应该采取某种方式来认罪，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才制订出这套方式，在我陷入最完全彻底的弃绝之前还没有发现它。直到那时笑声继

续在我周围回响，我的杂乱的努力未能除掉其中善意的以及差不多还是亲切的成分，这些都使我难受。

我觉得涨潮了。白日将尽，我们的船不能延宕不走了。看，鸽子集聚在高空，紧挨着，几乎不动，而天色暗下来了。您愿意我们不说话来品味这一相当险恶的时刻吗？不，我使您感兴趣？您真老实。再说，我现在有使您真正感兴趣的危险了。在我解释关于法官一忏悔者的看法之前，我将跟您谈谈放荡和难受。

您弄错了，亲爱的，船走得很好。须德海是个死海，或者差不多是个死海。它的海岸平直，消失在雾中，不知道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因此，我们的航行没有任何参照物，不能估算出速度。我们前进，一切都毫无变化。这不是航行，这是梦。

在希腊半岛，我有相反的印象。新的岛屿不断地出现在水平线上。无树的山梁画出了天际，嶙峋的海岸清晰地呈现在海上。毫不混淆；在明朗的光亮中，一切都可供参照。日日夜夜，我站在小船上，眼前掠过一个又一个岛屿，在水花飞溅、笑声四起的航行中，小船轻轻移动，我却觉得是跳上了那短促清凉的海浪之颠。从此，希腊就在我身上的某个地方漂动，在我记忆的边缘，不知疲倦地……嘿！我也在那儿漂动，我变得抒情了！让我停住吧，亲爱的，我求求您。

顺便说一句，您了解希腊吗？不？更好！请问我们在那儿干什么？在那儿应该有颗纯洁的心。您知道，在那里，朋友双双在街上散步，手拉着手。是的，女人待在家里，人们看见一些人，成熟，可敬，留着小胡子，步履庄严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拉着朋友的手。在东方有时候也这样？但是，告诉我，在巴黎的街上，您会拉着我的手吗？这是笑谈。我们讲究仪态，然而

污垢却掩饰着我们。我们到希腊的岛上之前，应该好好洗一洗。那儿的空气是贞洁的，大海和娱乐是明朗的。而我们……

让我们坐在这些横渡大西洋的船上吧。好大的雾！我觉得我那时正在走向难受牢房。是的，我将对您说那是什么。在我挣扎一番之后，在我耗尽了我的目中无人的神气之后，我因徒劳而灰心丧气，决定离开人类社会。不，不，我没有寻找荒岛，这已不复存在了。我只是栖身在女人身旁。您是知道的，她们的确不谙责任何弱点，她们更多地是侮辱我们的力量并使之丧失战斗力。这就是为什么女人不是对战士的、而是对罪犯的奖赏。这是他的避风港，他的落脚处，一般地说，他是在女人的床上被逮捕的。难道她们不是地上乐园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东西吗？我狼狈不堪，向我的天然避风港跑去。我不再夸夸其谈了。由于习惯，我还演点儿戏，但已穷于杜撰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招供，生怕再说出些粗字眼儿，那时候，我真觉得我需要爱情了。下流，是不是？反正我感到一种暗暗的痛苦，某种使我变得更加空虚的匮乏，它使我半是被迫、半是好奇地承担某些义务。既然我需要爱和被爱，那我就认为自己陷入了爱情。换句话说，我装傻。

我常常对提一个问题感到惊讶，这个问题，我作为过来人总是加以回避的。我想问："你爱我吗？"按照惯例，在这种场合应该回答："你呢？"如果我回答是，我就承担了超越我的真实感情的义务。如果我竟敢说不，我就有不再被爱之虞，我因此而痛苦。我希望得到休息的感觉越是受到威胁，我越是向对方要求它。因此，我被引向越来越明确的许诺，我竟至于向我的心强求一种越来越巨大的感情。就这样，我被一个迷人的、大惊小怪的女人的虚假热情抓住了，她熟读爱情文章，对爱情很健谈，并象一个知识分子宣布无阶级社会那样有信心。您不会不

知道，这种信念具有诱惑力。我也试着谈情说爱，最后我自己也深信无疑。至少，直到她成了我的情妇，直到我明白了爱情文章教人谈情说爱，却不教人如何行动的时候为止。爱上了一只鹦鹉，我却得和一条蛇睡觉。于是，我到别处去寻找书本上才有的、而我在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爱情。

但是，我缺乏训练。我排他性地爱我自己已经三十余年了。怎么能指望丢掉这样一种习惯呢？我根本没有丢掉，我还是一个在爱情上只想不做的人。我增加了许诺。我同时搞几次艳遇，如同我过去同时保持许多关系一样。我积聚了比我在冷漠的黄金时代更多的不幸，当然是对别人来说。我的鹦鹉失望之余想要绝粒而死，我跟您说过吗？幸好我及时赶到，忍气吞声地握住她的手，直到她遇到了从巴厘旅行归来的、两鬓灰白的工程师，那是在她心爱的周刊上描写过的。反正，我离激动还差得很远，在所谓永恒的情欲中获得宽恕后，我更增加了自己错误的分量，更加迷失了道路。我也因而对爱情怀有一种厌恶，一听到《玫瑰色的生活》和《殉情的绮瑟》就咬牙切齿。于是，我试图以某种方式放弃女人而贞洁地生活。无论如何，她们的友谊对我也该够了。可是，这就等于是放弃了演戏。除了欲望，女人令我厌烦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显然，我也令她们厌烦。没有了戏，没有了剧场，我无疑是处于真相之中了。然而真相，亲爱的朋友，是令人十分厌倦的。

对爱情和贞洁感到了绝望，我终于想到还剩下放荡，它足以代替爱情。它消弥讪笑，带回安宁，尤其是它使人永生。深夜，清醒地沉醉到某种程度，睡在两个姑娘之间，发泄了全部欲望，希望不再是劳役，您看，精神无时不在，生之痛苦一去不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生活在放荡中，也从未停止过长生不老的想法。我跟您说的不正是我深刻的本性以及我对自

已的伟大的爱的证明吗？是的，我想长生想得要死。我太爱我自己了，不能不希望我的爱情的宝贵对象永不消失。由于人们在警觉的情况下，或者在稍许清醒一点的时候，看不出有可以成立的理由将长生不老赐给一只淫荡的猴子，所以，应该给自己找到代用品。因为我希望无限地生活，所以我同婊子睡觉，彻夜痛饮。早晨，当然，我嘴里有一股人总有一死的苦涩的味道。然而，我长时间地飞翔，非常幸福。我敢向您承认吗？我还柔情脉脉地回忆起那几个晚上，我去一个低级酒馆找一个变相的舞女，她的宠爱使我感到荣幸，我甚至还为了她跟一个吹牛皮的乌龟大打出手。每天晚上，在红色的灯光和这极乐之地的灰尘中，我都在柜台前面炫耀，象一个拔牙的人那样撒谎，长时间地喝酒。我等着黎明，最后倒在我的公主的永远不整的床上，她机械地纵情于快乐，然后立即睡去。阳光慢慢地照亮了这场灾难，在那光荣的早晨，我起了床，呆立不动。

酒和女人，让我们承认吧，给我提供了我配享有的唯一慰藉。我向您透露了这个秘密，亲爱的朋友，您别害怕会滥用它。您将看到真正的放荡是解放，因为它不产生任何义务。人们在其中只拥有自己，因此它是那些爱恋自身的伟人最喜欢的事情。它是一座丛林，既没有过去亦没有未来，尤其没有许诺，没有立即到来的惩罚。它进行的场所远离众人。人们进去时，把恐惧如同希望一样扔在门外。谈话不是必须的，人们来寻觅的东西不用说话就能得到，是的，甚至经常不用钱。啊！请您让我向那些不相识的、被遗忘的、而那时帮助过我的女人们致以特别的敬意。今天，依然有某种类似尊敬的东西混杂在我对她们的回忆中。

反正，我毫无节制地运用这种自由。人们甚至看到我在一个旅馆里，在人们称为罪孽之中纵情声色，我同时和一个中年

妓女，一个上流社会的年轻姑娘一道生活。我在前者面前扮演殷勤的骑士，使后者能够认识某些现实。不幸，那妓女有着相当强的资产阶级天性，打那以后，她同意为一家对现代思想非常开放的教会报纸写回忆录。那年轻姑娘则结了婚，以满足她脱了缰的本能，使她杰出的天赋得以施展。那时候，我也不无自豪地作为平等的一分子被一经常遭到诬蔑的男性团体所接纳。我是滑到那上面去的：您知道，甚至很聪明的人都以比他的邻座多喝一瓶酒为荣。我本来可以最终在逸乐中得到安宁和解脱。但是，我又在逸乐中碰到一个我自身的障碍。那是我的肝，突然出了毛病，还有疲倦，厉害得至今还缠着我。人们装作长生不老，而数星期之后，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拖到第二天了。

当我放弃我的夜间功勋的时候，这次经验的唯一益处是生活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痛苦了。疲倦噬咬着我的肉体，同时腐蚀了我心内许多生命点。每一种过度的行为都削弱生命力，因而也减轻了痛苦。与人们的看法相反，放荡毫无狂热之处。它只不过是一次长眠。您应该注意到，对于真正因嫉妒而痛苦的人来说，最急迫的事情莫过于同被认为欺骗了他们的那个女人睡觉。当然，他们愿意再一次确信他们的宝贝一直属于他们。如同人们所说，他们愿意占有这宝贝。不过，紧接着，他们就不那么嫉妒了。肉体的嫉妒是想象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们施于自身的审判。人们把自己在同样场合也会有的丑恶思想加诸于对方身上。幸好，过度的享乐削弱想象力和判断力。于是，痛苦与男子气概一道睡下，而且睡得同后者一样地长久。同样的道理，青年人同他们最初的情妇在一起而失去了先天的不安，同时，某些婚姻，这是经过行政权力批准的放荡，变成了大胆和手段的单调的枢车。是的，亲爱的朋友，资产阶级的婚姻使我

们的国家不守礼仪，很快就面临死亡之门。

我夸大其辞？不，但是杂乱无章。我只是想告诉您我从这花天酒地的几个月中所得到的好处。我生活在迷雾中，笑声变得喑哑，终于觉察不到了。本来已在我身上占据了如此位置的冷漠再也碰不到障碍而扩大了它的僵化。再无激动了！总是一样的脾气，或者根本毫无脾气。生了结核的肺干枯了，也就痊愈了，渐渐窒息了它的幸运的主人。我亦如是，平静地死于痊愈。尽管我的声誉由于辩护词的偏差而受到极大损害，正常地履行职务受到不规律的生活的干扰，我仍操本行。然而，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人们对我夜生活的过度不象对我的言语的挑衅那么忌恨。我有时在辩护中引证上帝，纯粹是口头上的，使我的主顾产生不信任。他们无疑是害怕上天不能够象一个在法律条文上无懈可击的律师那样好地照管他们的利益。从这里到作出结论，即我根据我无知的程度援引神明，只有一步之遥。我的主顾注意到这一点，逐渐稀少了。我还在辩护，但已越来越无力了。有时候，我忘了我已不相信我说的话了，我就辩护得好。我自己的声音拖着我，我跟着它；不象过去那样真正地飞翔，只是略高于地面，我在降落。最后，在职业范围以外，我很少见人，只保持着一二个苟延残喘的疲沓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或是度过纯属友谊的晚会而毫无兴致，或是强忍厌倦，几乎不听人家跟我说的话，差别仅此而已。我胖了一些，我可以最后相信危机业已结束。剩下的只是衰老了。

然而有一天，我邀一女友旅行，我并没有告诉她那是为了庆祝我的痊愈。我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自然是处于最高的甲板上。突然，我在铁色的洋面上发现了一个黑点儿。我立刻掉转目光，心开始怦怦跳动。当我竭力凝视时，那黑点儿却消失了。我正要喊叫，愚蠢地呼救，我又看见了它。

那是轮船丢下的一块残物。但是，我看着它心里难受，立刻想到那是一个淹死的人。于是，如同一个人早就知道一个念头的真实含义而就是对它无可奈何一样，我乖乖地明白了，几年前，在我背后，在塞纳河上回响着的喊声，被河水带着奔向海峡，不断地在世界上前进，越过大洋无边的水面，正在这儿等着我，直到这一天我碰到它。我也明白了，它将继续在所有的海上、河上等着我，总之在我苦涩的洗礼水所在的任何一处等着我。请告诉我，这里，我们不是在水上吗？不是在平平的、单调的、无边无际的、其边沿与大地的边沿合而为一的水面上吗？如何能相信我们将到达阿姆斯特丹？我们将永远出不了这个广阔的圣水盘。听！您听不见那杳无踪迹的大海鸥的叫声吗？如果它们朝我们叫，那是呼唤我们做什么呢？

但是，那一天，仍是那些大海鸥在叫，它们已经在大西洋上呼唤过，那一天，我最终明白我没有痊愈，我一直动弹不得，我得顺应这种情况。光荣的生活结束了，而愤怒和激动也结束了。应该屈服，认罪。应该在难受牢房中生活。真的，您不知道地沟里的小牢房，中世纪时人们称之为难受牢房。这种牢房有别于其它牢房的是其巧妙的尺寸。其高不足以使人直立，其宽不足以使人横卧。必须采取侏儒的姿势，沿对角线的方向过活。打盹儿就跌倒，守夜得蹲着。亲爱的，发现这么简单的事，要有天才，这个字我是掂量过的。日复一日，由于这种使关节僵硬、永远不变的束缚，犯人知道他是有罪的，而无辜就在于愉快地伸展四肢。您能够想象一个习惯于高峰和最高甲板的人囚在这样的牢房里吗？什么？人们可以在这种牢房里生活而无罪？难以想象，极其难以想象！否则我的推理将一败涂地。无罪被归结为驼着背生活，我拒绝考虑这种假设，一秒钟也不考虑。况且，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人的无辜，却可以肯定一切人的

罪状。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罪行的见证，这就是我的信念，我的愿望。

相信我，宗教在其树立道德、宣布戒律的当时就错了。对确立罪状和惩罚来说上帝是不必要的。在我们自己的帮助下，有我们的同类就足够了。您刚才说末日审判①。请允许我毕恭毕敬地付之一笑。我正站稳脚跟等着它呢：我见识过更可怕的、人类的审判。对他们来说，没有可以酌量减刑的情节，甚至最良好的意图也归于罪恶之列。您至少听说过唾沫牢房吧，那是一个民族最近想象出来的，以证明他们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民。一个砖砌的场所，囚徒在里面站着，但是不能动。一座齐颌的坚固的门把他关在这水泥壳中。人们只能看见他的脸，每个经过的看守都往他脸上肆意吐唾沫。囚徒被夹在牢房中，不能拭脸，不过他被允许闭眼睛。这倒是真的。怎么样？亲爱的，这是一桩人类的发明。他们为了这件小小的杰作并不需要上帝。

那么？那么，上帝的唯一用途将是保障无辜，我则更将宗教看成一座大洗衣场，但它作为洗衣场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恰恰是三年，而那段时间里它并不叫作宗教。以后，肥皂匮乏，我们的鼻子脏了，我们互相擤鼻涕。大家都是懒虫，大家都受到惩罚，我们互相吐唾沫吧。嘿，进难受牢房！人人争先恐后地吐，如此而已。我要告诉您一桩大秘密，亲爱的。别等末日审判了。它每天都在进行。

不，没什么，在这神圣的潮湿中，我有点儿打战。再说，我们已经到了。到了。您先请。请您再待一会儿，陪陪我。我还没说完，应该继续。继续，这才是难事。听着，您知道为什么人家把他钉上十字架吗？另一位，您现在想到的那个人。也

① 基督教认为，世界毁灭之前，人类面临最后的审判，以别善恶。

许知道？好，这有一大堆理由。谋害一个人总是有理由的。相反，却不能为他活着找出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总可以找到律师为犯罪辩护，而为无辜辩护却只是有时候可以找到。然而，在两千年间人家给我们很好地加以解释的理由之外，却有一个极大的理由来解释这痛苦的挣扎，而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这样细心地来掩盖它。真正的理由是他知道，知道他自己也不是全然无辜。如果他没有人们指控他的过失，他也是犯了别的过失，哪怕他不知道是什么。他不知道吗？不管怎么说，他知道原委；他该是听说过某次对无辜者的大屠杀。犹太的儿童被杀害，正是在他们的父母带他们去安全地点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他，他们为什么死？当然，他并不愿意。那些嗜血的士兵，那些被砍为两段的儿童，都使他厌恶。但是，象他那样的人，我肯定他不会忘记他们。而那忧郁，人们在他所作所为中猜到的忧郁，难道不是那个人的不可救药的忧郁吗？他整夜整夜地听见拉结① 哀哭她的孩子们，听见她拒绝安慰的声音。怨恨之声在黑夜中升起，拉结呼唤着为他而死的孩子们，而他却活着。

因为他了解他知道的事，洞悉人类的一切——啊，谁会相信让别人死而自己不死不是一桩罪过！——日夜面对着自己无意的罪过，所以，立定脚跟，继续下去，对他来说已变得太困难了。最好是了结。不为自己辩护，死去，以便不再独自活着，到别处去，到那也许他会得到支持的地方去。他没有被支持，他心怀怨气，而为了结束一切，人们对他的话进行了删节。是的，那是第三位福音传播者②，我认为是第三位福音传播者开始删除他的怨言。“为什么你抛弃了我？”这是造反的喊声，不是

① 《圣经》中的人物。

② 《圣经·新约》第三章的作者，该章称《路加福音》。路加系公元一世纪人，原是异教徒，后改宗基督教。

吗？于是，拿剪刀来！记住，如果路加什么也没有删除，人们将不大会注意到这件事；这件事将不会占这么重要的地位，不管怎么说。这样，删节者喊出了他删掉的东西。世界的秩序因此暧昧不明。

这并不妨碍被删节者继续下去。而我，亲爱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一段时间，对每一分钟，我不知道如何捱到下一分钟。是的，人们能够在这世界上进行战争，装作去爱，折磨他的同类，在报纸上自我炫耀，或只是一边打毛衣一边说说邻居的坏话。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继续下去，仅仅是继续下去，那就已是超人的事。而他不是超人，这您可以相信我。他为他的死叫喊，这就是为什么我爱他，朋友，他连死了都不知道。

不幸的是他撇下了我们，我们得继续下去，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囚居在难受牢房里。我们知道了他之所知，却不能为他之所为，不能象他那样死去。自然，人们试过多次以他的死来互相帮助。“你们不光彩，好，这是事实。那好，不零卖。要一古脑儿在十字架上处理掉！”无论如何，对我们说这样的话的确是高招。但是，眼下在十字架上攀登的人太多了，不过是为了人们能从更远的地方看到他们，哪怕为此而践踏一下已在那儿待了许久的人。为了行善而放弃慷慨的人太多了。噢，不公正，人们待他的不公正，使我心碎的不公正啊！

算了，看我又来了，我又要辩护了。请原谅我，要知道我有我的理由。瞧，几条街之外有一座博物馆，叫作“我主在阁楼里”。当时，他们在阁楼里设置地下经堂。有什么办法，这儿的地下室都被水淹了。可是今天，请放心，他们的天主不再住阁楼了，也不住地下室。他们把他高高挂在法庭上，放在他们心中的隐秘之处，他们钉钉子，尤其是他们审判，以他的名义审判。他温和地对女罪人说：“我也不，我也不判你的罪。”这什

么也挡不住，他们依然判罪，他们不宽宥任何人。以天主的名义，这就是你的账。天主？他不要求这么多，我的朋友。他愿意人们爱他，仅此而已。当然，有人爱他，甚至在基督徒中也有。然而，人家清查他们。何况他也预料到了，他有幽默感。彼得①，您知道，那个粗汉子，彼得背弃他："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等等。"真的，他过分了。而他却搞了个文字游戏："在这块石头②上，我盖我的教堂。"没有比这句讽刺的话更厉害的了，您不觉得吗？可是不然，他们还有更大的胜利呢！"你们看，他说了！"他的确说了，他很了解这个问题。然后，他永远地走了，让他们去审判和判决，嘴上是宽宥，而心里是惩罚。

因为不能说没有怜悯了，不，伟大的神，我们就不停地谈论着怜悯。只不过是，人们不宣告任何人无罪。无辜已经死去，法官泛滥成灾，各式各样的法官，基督教的，反基督教的，他们是一丘之貉，在难受牢房上妥协了。因为不应该只折磨基督徒。其他人也有份儿。在这座城市中，有几座房子曾经庇护过笛卡儿，您知道其中之一变成什么了吗？一座疯人院。是的，这是普遍的疯狂，还有迫害。我们也一样，自然，我们是被迫下水。您可以意识到我不放过任何东西，从您那方面，我知道您所想的也不亚于我。从此，既然我们都是法官，我们在彼此面前就都有罪，我们都以卑鄙的方式当基督，一个一个地被钉上十字架，而总是不明白。至少我们将被钉上十字架，如果我，克拉芒斯，没有找到出路的话。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真相大白……

---

① 耶稣使徒之一。

② 法文中，彼得写作Pierre，与石头(la pierre)一词同形。

不，就说到这儿吧，亲爱的朋友，什么也别怕！况且，我要离开您了，我们已到了我的门口。有什么办法，在孤独中，再加上疲倦，人很愿意把自己当成预言家。反正，这正是我，栖身荒漠，那里乱石嶙峋，大雾弥漫，臭水纵横，这正是我，平庸时代的空虚的预言家，没有使命的以利亚①，遍体发烧，满肚烧洒，背靠着发霉的门，手指向低矮的天，满嘴是无法无天、不能忍受任何审判的人的诅咒。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这一切，亲爱的，这就是全部问题。赞成法律的人并不害怕使他重新守法的审判。然而，人类最高的痛苦是没有法律而被审判。我们正在这一痛苦之中。法官们失去了惯常的抑制，任凭偶然的摆布，两口并作一口吃。因此，该去试试要比他们走得快，不是吗？这就是大混乱。预言者和治病者成倍增加，他们匆匆忙忙，为了带着一部好法律或一个完美无缺的组织在大地荒芜之前赶到。幸好，我赶到了！我既是结局，又是开端，我宣布法律。总之，我是法官—忏悔者。

是的，是的，我明天跟您说这美好的职业是干什么的。您后天走，那我们的时间就很紧了。请到我这里来吧，您按三下铃。您回巴黎吗？巴黎很远，巴黎很美，我没有忘记它。我记得它的霞光，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夜幕落到烟雾缭绕的蓝色屋顶上，干燥而轧轧作响，城市低沉地轰鸣，河水仿佛倒流。我那时在街上游荡。现在他们也在游荡，我知道的！他们在游荡，装作匆匆走向厌倦的妻子、严厉的家……啊！我的朋友，您知道孤独地在大城市中游荡是什么滋味吗？……

躺着接待您，真是惭愧。没什么，有些发烧，喝点儿刺柏

① 以利亚，公元前九世纪希伯来预言家。

子酒就会好的。这种突然发作我已经习惯了。我认为，这是我当教皇的时候得的疟疾。不，只一半儿是玩笑。我知道您想什么：从我的叙述中分辨真伪很困难。我承认您想得有道理。我自己……您看，与我接近的一个人将人分为三等：喜欢无可隐瞒胜于被迫说谎者，喜欢被迫说谎胜于无可隐瞒者，同时喜欢说谎和隐私者。我让您去选择对我最合适的情况。

说到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谎言最后不也通向真理吗？而我的故事，或真或假，不是都朝着同样的结局、具有同样的意义吗？如果在两种情况下，它们都表明了我过去是什么人，现在是什么人，它们是真是假又有何妨呢？有时候，人们看一个说谎的比看一个说真话的还要清楚呢。真相，如同光亮，炫人眼目。谎言则相反，是一抹美丽的霞光，它使每样东西都显出价值。随您怎么看，反正我曾在一个俘虏营里被委任为教皇。

请坐。您看看这间屋子。家徒四壁，的确，然而干净。一幅维尔麦尔① 的画。没有家具，没有锅。也没有书，我很长时间不读书了。从前，我的房间里满是读了一半的书。这跟那些人吃肥鹅肝吃一半扔一半一样可恶。况且，我也不喜欢忏悔了，那些忏悔的作者们写书主要是为了不忏悔，为了不道其所知。当他们声称要坦白时，也正是他们要提防的时候；他们要给死尸化装了。相信我，我是金银匠。我说话斩钉截铁。没有书了，一切无用的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严格的必需品，清晰、光亮有如棺材。此外，这些荷兰床，如此坚硬，铺着崭新的、用贞洁熏过的单子，人已经裹在尸布里死了。

您很想知道我当教皇的遭遇？您知道，平淡无奇。我还有

① 维尔麦尔(Vermeer, 1632—1675)，荷兰画家，其作品以精确的形式和浓郁的诗意见称。

劲儿跟您谈吗？是的，我觉得在退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非洲，多亏隆美尔先生，战事如火如荼。我没有参加，不，请放心。我已避开了欧洲的战事。我当然被征入伍，但是我从未见过战火。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遗憾。也许那会改变许多事情？法国军队不需要我上前线，它只要求我参加撤退。后来，我又看见巴黎了，还有法国人。差不多在我发现自己是个爱国者的时候，我想参加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抵抗运动。您笑？您错了。我是在沙特莱的地铁里发现这一点的。一条狗在迷宫里迷了路。那狗个子大，毛硬，一只耳朵断了，眼睛里喜洋洋的，它跳跃着，嗅着行人腿肚子。我怀着一种古老的、忠实的温情喜欢狗。我爱它们，因为它们总是宽大为怀。我叫它，它犹豫着；显然，它被征服了，在我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起劲地摇尾巴。这时，一个年轻的德国兵轻快地走过我身旁。他走到狗跟前，抚摸着它的脑袋。那狗不犹豫了，以同样的热情跟上他的脚步，消失了。据我对德国兵所感到的嫉妒和愤怒来看，完全应该承认我的反应是爱国主义的。如果狗跟上一个法国老百姓，我甚至想都不想了。我想象那可爱的畜生成了德军某团的护身符，这使我义愤填膺。因此，测验是有说服力的。

我到南方去，想打听一下抵抗运动的情况。可是到了那里，了解了情况，我又犹豫了。我觉得事情有些疯狂，说穿了，是想入非非。我认为地下活动和我的气质不符，也不合我对空气流通的高峰的爱好。我觉得人家是要我整日整夜地在地下室里织地毯，等着一些畜生把我从那儿撵出去，先是拆了我的地毯，然后把我拖到另一个地下室去直打到死去活来，我钦佩那些热心于这种深处英雄主义的人们，然而不能仿效。

我于是到了北非，模模糊糊地想从那儿去伦敦。可是，在非洲，形势不明朗，我觉得敌对的政党都有道理，就两方都不

参加。根据您的表情，我看出来您认为我对于这些有意义的细节匆匆带过。这么说吧，我根据您的真实价值判断您，我匆匆带过是为了让您更好地注意到它们。总之，我到了突尼斯，一位可爱的女友保证了我的工作。这女友是个极聪明的人，搞电影工作。我跟她到了突尼斯市，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后我才知道她的真实职业。登陆那天，她被德国人逮捕，我也同时被捕，但是我并无这种愿望。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至于我，他们未动我一根毫毛，我万分焦虑，后来才知道那主要是一种安全措施。我被关进的黎波里① 附近的一座集中营，那里，除恶劣的待遇外，更为痛苦的是口渴和缺乏物品。我不跟您描绘了，我们这些人，世纪中期的孩子，无需图画就能想象这种地方。一百五十年前，人们一听到湖和森林就会顿生柔情。今天，我们有牢房抒情诗。因此，我相信您。您只须增加某些细节：酷热，直射的阳光，苍蝇，沙子，缺水。

跟我一起的有个年轻的法国人，他有信仰。是的！简直是个童话。是杜盖斯克林② 那类人物，如果您愿意的话。他为了战斗，从法国到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将军把他关了起来。他看到在佛朗哥的监狱中，埃及豆，如果我敢说，是经罗马祝福过的，就陷入极深的忧郁之中。无论是非洲的天，他后来在那里碰了壁，还是营里的娱乐，都没有使他摆脱忧郁。他的思考，加上太阳，使他有些失去常态。有一天，在一顶如熔铅般滚烫的账篷底下，我们十几个人在蝇阵中喘着气，他又激烈地抨击起他称为罗马人的那个人。他好几天没刮胡子，望着我们，目光游移。他裸露的上身汗水淋淋，手在历历可见的肋条上移动

① 利比亚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里是轴心国的重要军事基地。

② 杜盖斯克林(1320—1380)，法国军事家，他被视为骑士精神和爱国热情的体现者，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英雄业绩的传说。

着，象在弹奏似的。他向我们宣布，应该有一个新教皇，这个教皇要生活在不幸的人中间，而不是在教皇座上祈祷，而且越快越好。他一边摇头，一边用茫然的目光盯着我们。“对，”他说，“尽可能地快。”然后，他突然平静下来，有气无力地说，应该在我们中间挑选，找一个人，要全面，既有缺点又有优点，大家向他宣誓服从，唯一的条件是他答应使我们，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的共同的痛苦永远具有生命力。“在我们中间，”他说，“谁的弱点最多？”我出于玩笑，抬了抬手指，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好，若望-巴蒂斯特干这事。”不，他没这样说 因为我那时有另外一个名字。至少，他宣布说，我那样自告奋勇意味着最大的德行，建议选举我。其他人同意，虽说视同儿戏，但也带着一点庄严的意味。事实上是杜盖斯克林把我们震住了。我自己并不觉得完全可笑。我首先发现我的小预言家有道理，然后就是太阳，累死人的劳动，抢水的战斗，一句话，我们情绪不佳。总之，教皇权力我行使了好几个星期，而且是越来越认真。

教皇的权力是什么？我的天，我是某种类似队长或支部书记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其他人，甚至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都习惯于服从我了。杜盖斯克林痛苦，我对他的痛苦则加以引导。我于是觉察到当教皇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容易。昨天跟您讲了关于法官，我们的兄弟，那么多轻蔑的话之后，我又想起了这一段。集中营里的大问题是水的分配。其他的团体也成立了，有政治的也有宗教的，每个团体都优待自己的同志。因此，我也被迫优待我的同志，这已经是小小的让步了。即便在我们之间，我也不能维持完全的平等。根据我的同志们的状况，以及他们要干的活儿，我多给这人或那人一些。这种区分后果严重，您可以相信我。但是，我累了，无意再想这段日子了。这么说

吧，我在喝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同志的水的那一天大功告成了。不，不，不是杜盖斯克林，他已经死了。他放弃得太多。如果他在那儿，看在他的份上，我还可以忍耐得更久，因为我爱他，是的，我爱他，至少我觉得。但是，我喝了水，这是确实的，我自己说服自己，其他人需要我，比起那个反正要死的人来说更需要我，我应该为他们而保存自己。亲爱的，帝国和宗教就是这样在死亡的阳光下诞生的。为了修正一点儿我昨天讲的话，我要告诉您一个伟大的思想，它是在我说那些不知是经历过还是梦想过的事情的时候产生的。我的伟大思想是，应该原谅教皇。首先，他比任何人都需要原谅。其次，这是居于他之上的唯一方式……

噢！您关严了门吗？是的。请您检查一下。请原谅，我老是害怕门闩出毛病。在我入睡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是否插上了门闩。每天晚上，我都得起来检查一下。人们什么都不放心，我跟您说过了。请别以为，这种对于门闩的担心在我是一种担惊受怕的有产者的反应。过去，我不锁门，也不锁车。我不紧抓着钱，也不老惦记着我的东西。说真的，我对有一些财产感到害羞。曾几何时，我在社交场合的谈话中，充满信念地高喊："财产，先生们，就是谋杀！"我因为没有足够伟大的心灵让一个值得资助的穷人来分享我的财富，于是就把它留给可能来的小偷了，希望这样用偶然来改正不公。何况今天我已一无所有了。因此，我不担心我的财产，却担心我自己和我的机智。我念念不忘的是杜门谢客，在这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小天地里为王，当教皇，作法官。

还有，请您打开那个壁橱。那张画，是的，看看它。您认不出来？这是《铁面无私的法官们》。您不觉得奇怪？难道您的文

化修养不够？如果您读报的话，您会记得，一九三四年，根特[①]圣-巴封大教堂里著名的范·埃克[②]所绘祭坛嵌板中的一块，《神秘的羔羊》被窃。那副嵌板就叫作《铁面无私的法官们》。它表现法官骑马去瞻仰圣畜。后来就以一极好的复制品来代替，因为原作已不可寻。您看，这就是。不，我在其中毫无干系。一个墨西哥城的常客，那天晚上您看见过的，有一个晚上，他酩酊大醉，以一瓶酒的价钱卖给了大猩猩。我先是劝我们的朋友把它挂在一个好位置上，挂了很久。正当人们在全世界寻找他们的时候，这些虔诚的法官却威镇墨西哥城，高踞于醉汉和乌龟之上。后来，根据我的请求，大猩猩将它存放在这里。他有些不乐意，但是我跟他讲了这些事，他害怕了。从此，我就单独和这些可敬的法官为侣。那边，您看见了，在柜台上方，他们留下了一片怎样的空白啊。

为什么我没有归还这副嵌板？哈哈！您有警察的反应，您！那好，我象回答预审法官那样回答您，假如有朝一日某人发现这幅画在我的房间里的话。第一，因为它不属于我，而属于墨西哥城的老板，他和根特城的主教同样有资格拥有它。第二，因为人们从《神秘的羔羊》前面走过，没有人会识别复制品与原作，因此，没有人会因为我的过错而受到损害。第三，因为我以这种方式居于统治地位。假法官被抬出来供全世界瞻仰，唯独我知道真法官。第四，因为我将有幸被投入监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念头。第五，因为这些法官去与羔羊会面，而羔羊已不复存在，无辜亦然，因此，偷了这幅嵌板的窃贼成了不被人知的正义的工具，还是以不违背正义为宜。

---

① 根特，比利时城市，城中有著名的圣-巴封大教堂，藏有名画《神秘的羔羊》。

② 范·埃克，比利时十五世紀画家。

最后，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处于秩序之中了。正义与无辜永远分离，后者在十字架上，前者在壁橱里，我有了根据我的信念而工作的自由天地。我可以良心安宁地履行法官—忏悔者这一困难的职业，我在其中摆脱了那么多的失望与矛盾，而现在是，既然您要走了，是我向您说出这一职业是什么的时候了。

请允许我坐起来，这样呼吸畅快些。噢！我多累啊！把我的法官们锁起来，谢谢。法官—忏悔者这职业，我现在来履行。习惯上，我的事务所在墨西哥城。但是，伟大的使命超出工作地点。甚至在床上，甚至在发烧的时候，我都工作。何况，这种职业，简直不是干，而是时时刻刻在呼吸着它。其实您别那么想，五天之内我跟您说了那么多话仅仅是为了开心。不，我过去说的已经够多了，可以不再说了。现在，我的话是有目的的。显然，它要抑制笑声，并使自己逃避审判，尽管表面上没有出路。避免受审的最大障碍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第一个出来对自己宣判吗？因此，应该一视同仁，将宣判扩及所有的人，以达到事先冲淡它的目的。

没有谅解，绝没有，对任何人都没有，这就是我开始时的原则。我否认良好的动机，值得尊敬的错误，失足，可以酌情减刑的情节。我这儿不祝福，不给予宽恕。我只是算账，然后说："是这么多。你是个恶棍，色情狂，说谎癖，同性恋者，异想天开的家伙，等等。"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生硬。在哲学上如同在政治上，我同意任何一种拒不承认人是无辜的理论，同意任何一种把人视同罪人的实践。亲爱的，您在我身上看到一个关于奴役的明智拥护者。

说真的，没有奴役，就没有最后的解决。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过去，我只有嘴巴是自由的。我在早餐时把它扩大到

面包片上，我一整天咀嚼着它，我在世界上带来一股因自由而甘美、清凉的气息。谁反驳我，我就用这个大词猛击过去，我用它来为我的欲望和我的势力服务。我在床上，在我的女伴们的耳畔轻轻地说着这个词，它帮助我把她们甩开。我偷偷地把它……算了，我兴奋起来了，失去了节制。反正，我给了自由派一个更加无私的用场，甚至，看我有多天真，我甚至为它辩护了两三次，当然还没有到为它献身的程度，可也担了些风险。应该原谅我的这些冒失，我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自由原来不是一种奖赏，也不是一枚人们喝香槟酒来祝贺的勋章。它不是一件礼物，也不是一盒能给您口腹之乐的甜食。啊！不，相反地，那是一种苦役，一次长跑，极为孤独，令人精疲力竭。没有香槟酒，没有一个朋友温情地挽留您，为您举杯。独自一人在阴沉的大厅里，在小酒吧间里，面对法官，独自作出决定，面对着自己或者面对着别人的裁判。在任何一种自由后面都有一篇判词；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太沉重了，担负不了，尤其是在发烧，受苦，或不爱任何人的时候。

啊！亲爱的，对于一个孤独、没有上帝、没有主人的人来说，岁日沉重得难以忍受。因此应该为自己择一主人。上帝不时髦了。况且这个字已无意义，不值得冒使人不快的风险。还有，我们的道德家，如此正经，爱他们的邻人和一切，总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在教堂里不布道，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与基督徒的身份区别开。据您看，是什么阻止他们皈依宗教呢？尊重，也许是对人的尊重，对，尊重人。他们不愿引起公愤，他们为人而保留自己的看法。我认识一位不信神的小说家，他每天晚上都祈祷。这并不妨碍什么：在他的书里，他对上帝干了些什么啊！怎样的松筋骨[1]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说的了！一个活跃

[1] 见本书第521页倒数第6行。

的自由思想家，我曾对他推心置腹的活跃的自由思想家，他并无恶意地朝天举起双手："您什么也没有教会我，"这个宣传自己学说的人叹息道，"他们都是这样。"据他看，我们百分之八十的作家，如果他们可以不署名的话，他们会写上帝之名并对它顶礼膜拜。然而，他们署名，据他说，是因为他们爱自己，如果他们对什么都不礼拜，是因为他们厌恶自己。由于他们毕竟不能不审判，于是，他们就在道德方面争先恐后。总之，他们具有合乎道德的恶魔精神。真是一个古怪的时代！思想被搞乱了，我有一个朋友，当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丈夫的时候不信神，与人通奸之后就皈依了宗教，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啊！阴险的小人，戏子，伪君子，一副可怜相！相信我，甚至当他们放火烧天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这副样子。不管他们不信神还是虔诚，莫斯科人还是波士顿人，他们都是基督徒，父子相传。可恰恰是没有父亲了，没有规矩了。人是自由的，那就得自己想办法。由于他们特别是不愿要自由，不愿要它的判词，他们就请求人家把自由放在他们手上，他们发明可怕的规则，他们竞相建造焚尸的柴堆以代替教堂。他们是些萨沃纳罗拉①，我跟您说。但是，他们只相信罪恶，从来不相信宽宥。当然了，他们也想望宽宥。他们所愿要的是：宽宥，肯定，放弃，生之幸福，还有谁知道什么东西，订婚，鲜艳的少女，正直的男子，音乐。因为他们多情善感。比方说我吧，我不多情善感，您知道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全心全意的完全的爱情，日日夜夜，在不间断的拥抱之中的、享乐的、令人热狂的爱情，就这样连续五年，然后死去。唉！

① 萨沃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宣教者，他布道的内容为对个人犯罪的反省和淡泊的生活。

因为没有订婚，没有不间断的爱情，于是就有粗暴的婚姻，带着强力和鞭子。最根本的是，如同在儿童眼中，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每一个行动都被判决，善与恶被武断地、因而是明显地抬出来。而我，尽管我是西西里人和爪哇人，我同意基督徒是分文不值，虽然我对第一个基督徒怀有友情。然而，在巴黎的桥上，我也知道了我害怕自由。不管主人如何，为了替代上天的律条，还是主人万岁吧。"我们的父，您暂时在此……我们的导师，我们令人愉快的严厉的领袖，哦，残酷而敬爱的引路人……"最后，您看，最根本的是不再自由，是怀着悔恨之心服从比自己更为狡黠的人。当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那就是民主了。亲爱的朋友，还不算应该为孤独地死去而进行的复仇。死是孤独的，而奴役则是集体的。与我们同时，其他人也有他们的账，这是重要的。所有的人终于聚集起来，然而是跪着，低着头。

象社会上其他人那样活着不是很好吗？为此，其他人不是该与我相象吗？威胁，耻辱，警察，是这种相象的圣礼。我被蔑视、被追捕、被压抑，因此，我能够大显身手，享受真实的我，最后，回归自然。这就是为什么，亲爱的，我在庄严地向自由致敬之后，悄悄地决定应该立刻将它还给随便什么人。只要我能够，我就在我的墨西哥城教堂里宣讲，我要良民们顺从，要他们谦卑地设法获得奴役的舒适，哪怕将奴役表现为真正的自由。

但是，我并未发疯，我清楚地意识到，奴隶制度不是明天就会有的。那是未来的一宗善举，如此而已。从现在起到那时，我得与现实合拍，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哪怕是临时的也好。因此，我得找到另一种办法将审判扩及所有的人，以减轻它在我肩上的重量。我找到了这办法。请把窗子开开一点儿，这里热

得出奇。别开得太大，我还冷呢。我的思想既简单又丰富。如何将所有的人都拉下水而自己有权在太阳底下晒干？我要登上讲坛，如同我的许多著名的同时代人那样，诅咒人类吗？那太危险了！一天，或一个夜里，笑声会突如其来地爆发。您给别人的判词最终会落到您的头上，打个正着，造成一些损失。您说怎么办呢？那好，这儿有这样一个高招。我发现，在等待主人及其笞枚的时候，我们应当象哥白尼一样，倒过来推理以求胜利。既然人不审判自己就不能判决别人，那就得自己攻击自己以获得审判别人的权力。既然任何一位法官有朝一日都得成为忏悔者，那就应该走相反的路，当忏悔者，以便能够最后成为法官。您跟得上吗？好。为了说得更清楚，我跟您讲讲我如何工作。

我首先关闭了律师事务所，离开巴黎去旅行；我试图化名，在某个不缺少练习机会的地方安身。世界上这样的地方很多，但是，偶然、方便、嘲讽以及某种苦修的必要使我选择了一个水流纵横，大雾弥漫的都会，它被运河紧紧箍住，出奇地拥挤，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我在海员区的一个酒吧间里设下事务所。来自港口的主顾五花八门。穷人不去豪华的街区，而有身份的人总是，至少一次，您见过的，最后流落到声名狼藉的地方。我特别留意资产者，迷途的资产者；和他们，我发挥出最大的能量。我以高手的姿态，使他们奏出最文雅的音调。

因此，一些时日以来，我就在墨西哥城干我这有用的职业。您已经有了经验，这职业首先在于尽可能经常地进行公开忏悔。我上下左右、全面地认罪。这不困难，现在我记性很好。但是注意，我并不捶胸顿足，粗野地认罪。不，我机灵地航行，色调多变，横生枝节，最后，我谈话因人而异，引导他们与我竞相忏悔。我把涉及我的事与涉及别人的事混在一起。我博采共

同的特点，一同经受过的痛苦，共有的弱点，时兴的气派，时下的名人，如同它在我身上和在别人身上存在的那样。我用这些制造了一幅既是所有的人、又不是任何个人的肖像。一句话，一个面具，颇象狂欢节上的那种，既忠实又简化。在他面前，人们心里说："瞧，我遇见过他。"肖像完成了，比如今晚，我不胜悲痛地将它拿出来："看，唉！我就是这副样子。"公诉状已经完成，而同时，我展示给我同时代人的肖像变成了一面镜子。

我满身污秽，慢慢地揪着头发，脸上划过一道道指甲印，然而目光敏锐，站在全人类面前，回顾我的耻辱，同时盯着我所制造的效果，说："我是无耻之尤。"于是，神不知鬼不觉，我在谈话中从"我"过度到"我们"。当我到了说"我们就是这副样子"的时候，把戏就搞成了，我可以说出他们的真象了。我跟他们一样，当然了，我们在一个锅里。然而，我优越的地方是我明白，这给我谈论的权利。您看得到这好处，我肯定。我越是认罪，我越是有权审判你们。更有甚者，我激起你们自己审判自己，这使我感到轻松。啊！亲爱的，我们是奇怪而可悲的人，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惊讶和反感的机会就不会少。试试吧。请放心，我将怀着深厚的博爱之情倾听您的忏悔。

别笑！是的，您是个挑剔的主顾，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您会来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人不那么聪明，更容易动感情；我立刻就把他们搞糊涂了。对于聪明的人，需要时间。然而，深入地给他们解释方法也就够了。他们忘不了，他们思索。这一天或那一天，半是游戏，半是混乱，他们坐到了桌旁。您，您不只是聪明，您的神气是圆滑的。但是，您承认您今天觉得不如五天以前对自己那么满意了吗？我现在等着您给我写信或者再来。因为您会再来的，我肯定。您将发现我毫无变化。

而且，既然我找到的幸福对我是合适的，我为什么要变呢？我接受了两重性，而不为此感到痛苦。相反，我安顿下来，在这儿找到了我毕生追求的舒适。实际上我错了，不该对您说最根本的是避免审判。最根本的是能够为所欲为，哪怕不时地大声宣扬自己的卑鄙。我重又为所欲为，这一次没有笑声了。我没有改变生活，我继续爱自己，利用别人。只是我忏悔过失使我得以更轻松地重新开始，得以享受两次，先是我的天性，其次是迷人的悔恨。

自从我找到了解决办法之后，我就沉醉于一切，女人、傲慢、厌倦、仇恨，甚至沉醉于寒热病，我此时正以无上的快乐感到热度在上升。我终于处在支配地位，而且永远如此。我还发现了一座高峰，我独自攀登，从那儿，我可以审判所有的人。有时候，当夜色确实美妙的时候，我远远地听见一阵笑声，我重又起了疑心。但是，我很快就将一切，创造物与创造，置于我自己的缺陷的重压之下，我于是复归常态。

我将在墨西哥城等待您的问候，需要多久我就等多久。拿掉这床被子，我想喘口气。您会来的，是不是？我甚至将告诉您我的具体的做法，因为我对您有一种友爱之情。您会看到我整夜教他们知道他们是令人厌恶的。从今晚起，我将重新开始。我离不了、也不能剥夺自己这样的时刻，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个醉倒在地，双手捶胸。这时，我高大起来，亲爱的，我高大起来，自由地呼吸，我站在高山之巅，平原在我的眼底伸展。我感到自己是上帝，感到自己在颁发放荡生活的最后证书，这是多么的令人陶醉！我高踞在我的卑鄙的天使之上，在荷兰天空的顶点，我看见大批人经过末日审判，穿过雾与水，朝我升起。他们缓缓上升，我看见其中的第一个已经到了。在他迷惘的脸上，用一只手半掩着，我看见共同的命运所产生的忧伤以

及因不能避开它而感到的绝望。而我，我怜悯而不宽宥，理解而不原谅，尤其是，啊，我终于感到人们崇拜我！

是，我很激动，我怎么能老老实实地躺着呢？我得比您高，我的思想托起了我。那些夜里，不如说那些早晨，因为堕落在黎明时分发生，我出了门，步履迟钝地沿着运河走着。灰白的天空中，羽毛层变得稀薄，鸽子飞得更高，齐屋顶一抹绯红的光亮，预示着我的新的创造的一天。在当拉克街上，第一辆电车在潮湿的空气中发出铃声，在欧洲的边陲唤起了生活，在这欧洲，同一时刻，几亿人，我的臣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嘴里充满苦涩的味道，去干那毫无乐趣的工作。于是，我的思想飞翔在这不知不觉中臣服于我的这块大陆上，啜饮着正在来临的、浸透着苦艾酒的一天，最后沉醉在恶意的言语中，我幸福，我幸福，我跟您说，我不许您不相信我是幸福的，我幸福得要死！噢，太阳，海滩，信风吹拂下的岛屿，回忆为之绝望的青春！

我又躺下了，原谅我。我害怕激动起来，但我不流泪。人有时迷路，有时怀疑明显的事实，甚至在他发现了过好日子的秘密的时候。当然，我的解决办法并非理想。但是，当他不爱他的生活，当他知道需要改变，他不能选择，是不是？怎样才能成为另一个人？不可能。应该什么人也不是，应该为了某个人而忘掉自己，至少一次。但是怎么办呢？别过分地凌辱我。我象那个老乞丐一样，那一天在咖啡馆的平台上，他不愿意放开我的手："啊！先生，"他说，"并非我是个坏人，但我失去了光明。"是啊，我们失去了光明，失去了早晨，失去了那个自我原谅的人的纯真。

看哪，下雪了！我得出去！在银白的夜里入睡的阿姆斯特丹，覆盖着雪的小桥底下暗玉砌就的运河，阒无人迹的街道，

无声无息的脚步，那将是纯洁无瑕，然而转眼就变成明日的泥泞。您看巨大的雪团打在窗上散成一片。这是鸽子，一定是。它们终于决定下来了，这些小宝贝，它们用厚厚的一层羽毛覆盖了运河、屋顶，它们扑打着所有的窗户。怎样的一次入侵啊！让我们希望它们带来好消息！所有的人都将获救，嗯，不止是选民和富人，苦难将被分担，而您，比方说，从今天起，每天晚上为了我睡在地上。纯粹的诗情！算了，承认吧，如果有一辆车从天而降，将我带走，如果突然白雪燃起大火，您将惊讶不止。您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但是，我还是得出去。

好，好，我安心地躺着，您别担心！别太相信我所流露的情感，也别太相信我的疯狂。它们都是有节制的。喂，现在您要跟我谈您自己了，我将知道我热情洋溢的忏悔的目的之一是否已经达到。的确，我一直希望我的对话者是个警察，他将因《铁面无私的法官们》盗窃案而逮捕我。除此之外，任何人也逮捕不了我，是不是？但是，这宗窃案将使人落入法网，我为了成为同谋而安排好一切，我藏着这幅画，谁愿意看谁就看。您逮捕我吧，那会是一个好开端。也许其他的事人家也要管，比方说，我将被斩首，我就不再害怕死亡了，我也将获救。在聚集起来的人民头上，您将举起我的依然新鲜的脑袋，以使他们从中认识自己，而我则再度统治他们，杀一儆百。一切都将完成，无人看见，无人知晓，我将结束我的在荒漠中呼喊而拒绝走出去的伪预言家的生涯。

但是，您当然不是警察，否则那就太简单了。怎么？啊！您看，我早有所料。我感到对您怀有的奇怪的友爱之情这就有了意义。您在巴黎操律师这一美妙的职业！我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同一类的人。我们不是都一样吗？不停地说，不对着任何人说，总是去会商同样的问题，而我们事先早就知道答案。那么，

跟我讲讲，我求求您，有天晚上您在塞纳河畔的路上遇到的事，您如何做到从不冒生命危险。您自己说出那话吧，多年来，这些话不断地在夜里回响在我的耳畔，而我最后将通过您的口说出："唉，年轻的姑娘，再往水里跳一次吧，让我第二次有机会来使我俩都得救！"第二次，嗯，多冒失啊！假定，亲爱的大律师，假定人们根据我们的话看待我们呢？应该勉为其难吧。哎哟……水这么凉！但是，让我们放心吧！现在太晚了，将永远是太晚了。谢天谢地！

流放与王国

郭宏安　译

不贞的妻子①

长途汽车的窗户关着，一只瘦小的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已经有一会工夫了。它无声地、疲倦地飞着，颇有些怪。雅妮娜看不见它了，后来又看到它落在她丈夫纹丝不动的手上。天气寒冷。每当有一阵风挟着沙子打得窗子沙沙响时，那只苍蝇就打一个哆嗦。冬天的早晨，阳光微弱，汽车走得很慢，颠得厉害，车皮和车轴叮当乱响。雅妮娜望了望她的丈夫。马赛尔的头发已经灰白了，低低地压在狭窄的脑门上，宽鼻子，不规则的嘴，那神气真象一个爱赌气的牧羊神。遇到路上每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她都感到他靠着她的身子猛地一跳。过后他那笨重的上身又落下来压在他叉开的腿上，眼神依然是呆滞的，麻木的，茫然的。只有他那双汗毛稀少的大手好象还在活动。灰色法兰绒上衣的袖子超过衬衫袖子，盖住了腕部，使这双手显得更短了。它紧紧地抓住夹在两腿间的一口小帆布箱子，对那只苍蝇在上面迟疑不决的爬动好象毫无感觉。

突然，风的吼叫声变得清晰可闻，包围汽车的浓雾也更厚了。沙子一把一把地打在窗子上，仿佛被无形的手甩过来似的。那只苍蝇动动怕冷的翅膀，一曲腿，飞了。汽车慢了下来，似

① 标题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

乎就要停了。后来，风好象停了，雾也散了一点，汽车又加快了速度。尘埃弥漫，有几个地方露出了一线光明。窗外，两三株纤弱、发白的棕榈树，象是金属刻出来的，突然间出现，转眼又消失了。

“什么鬼地方！”马赛尔说。

车上坐满了阿拉伯人，个个都把脑袋缩进斗篷里，闭着眼睛。有几位把脚搁在椅子上，比别人晃得更加厉害。他们不说话，令人捉摸不透，雅妮娜终于感到了压抑；她觉得她和这些无声无息的人一道旅行已经好几天了。其实，汽车天亮从铁路终点站出发，迎着晓寒，在这片多石的、萧条的高原上才开了两个钟头。出发时还可以看到高原把它的笔直的轮廓线一直伸到泛出微红的天边。可是后来起风了，渐渐把这片广袤无垠的原野整个儿吞没了。从这时起，旅客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一个个地都不说话了，仿佛是在白夜里默默地航行，只是偶尔擦擦被钻进车厢里的沙子刺痛的嘴唇和眼睛。

“雅妮娜！”听到丈夫叫她，她蓦地一惊。她又一次想到象她这么高大健壮的女人叫这个名字多么可笑。马赛尔想知道装样品的箱子在什么地方。她用脚在坐椅底下找了找，碰到一件东西，认定那就是箱子。她弯不下腰，一弯腰就憋气。可在中学里她是体操冠军，气足得用不完。从那时到现在有很久了吗？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不算什么，她觉得好象那还是昨天的事情，当时她决定不了是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是结婚。就在昨天，她焦急不安地想过，她可能会孤独地度过垂暮之年。她并不孤独，那个当年紧紧跟着她的法科大学生此刻就坐在她身边。她最终还是同意嫁给他，尽管他的个子矮了一点，她也不大喜欢他那贪婪而短促的笑声以及鼓得太厉害的黑眼睛。然而，她喜欢他和在此地定居的法国人一样具有生活的勇气。她也喜欢他遇到

不如意的人和事时的那种狼狈相。最主要的，她喜欢有人爱她，而他对她殷勤备至。他经常使她感到她之存在就是为了他，最后也就使她获得了真实的存在。不，她不孤独……

汽车一个劲儿地鸣喇叭，在看不见的障碍物之间前进。但是车子里没有一个人动弹。雅妮娜突然感到有人看她，她转向过道对面和自己一排的座椅上的乘客。那个人不是阿拉伯人，她惊讶自己居然出发时没有注意到他。他身穿法国撒哈拉兵团的制服，头戴深灰色帆布军帽，长着一张瘦削的、黑狗型的棕褐色长脸。他的眼睛是淡色的，含着某种阴郁的神色，死死地盯着她。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又转向她的丈夫。他一直目视前方，望着浓雾和大风。她把大衣裹紧了，但还看得到那个又高又瘦的法国兵。他的身材那么细，穿着紧身的制服，仿佛是用某种干燥的、容易粉碎的材料捏出来的，用沙子和骨头的混合物捏出来的。这时她看见坐在她前面的阿拉伯人瘦骨嶙峋的手和晒黑的脸，发现他们尽管宽袍大袖，坐在椅子上还挺松快，而她和她丈夫却刚好挤得下。她拉紧大衣的下摆。她其实并不胖，只不过是高大丰满，肉感，吸引人——男人们的目光使她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她的脸略带稚气，眼睛清亮，和她的身体恰成对比，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温暖的，令人感到舒服的。

不，一切都和她想象的不一样。马赛尔想带她到各地去做生意，起初她不愿意。他早就想作这次旅行了，确切地说，是战争结束以后，生意又恢复正常的时候。战前他已不学法律，继承了他父母经营的小布店，日子过得还不错。守着大海，他们的青年时代本来可以很幸福。可是，他不怎么喜欢费体力的事情，很快，他就不再带她去海滩了。只是到了星期天，他们才开车出城去散步。其余的时间，他宁可呆在堆满五颜六色的布匹的铺子里，那间铺子坐落在半土著、半欧洲区的一条临街

的拱廊下。他们就住在铺子楼上的三间房里，房间里装饰着阿拉伯幔帐和巴拜斯家具。他们没有孩子，就在半启的百叶窗下的昏暗中打发日子。夏天，海滩，散步，甚至天空都离他们远了。除了生意，马赛尔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认为她发现了他对金钱怀有真正的热情，她不喜欢这一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她也乐得享受。他并不吝啬，在她身上花钱更是大方。他常说："万一我出点什么事，你可以不受穷。"的确，必须丰衣足食才行。可是有些东西并不是最基本的需要，如何能够保证不缺呢？她偶尔隐隐约约感到的正是这一点。眼下她还是帮助丈夫管账，有时也替他在铺子里接待顾客。最难熬的是夏天，热得打不起精神，连那种懒洋洋的甜蜜之感都荡然无存。

时值盛夏，战争突然爆发。马赛尔入伍，后来又复员，布匹奇缺，生意停顿，炎热的街上杳无人踪。现在要是出点什么事，她可不免要受穷了。因此，一待市场上又有了纺织品，马赛尔就想到高原和南方的村镇去走走，越过中人直接向阿拉伯商人销售，他想带她一道去。她知道路上交通不便，她的呼吸又有毛病，所以她原本想呆在家里。可是他一再坚持，她也就同意了，犯不上劳神费力地拒绝他。他们就这样走了这么远，说真的，事情一点也不象她想的那样。她本来怕酷热、成群的苍蝇、散发着茴香味的肮脏的旅馆。她没想到会碰上严寒，刺骨的冷风，乱石遍地象极地一样荒凉的高原。她也曾梦想过棕榈树和温暖的沙子，可她现在看到的沙漠却不是这样，到处是石头，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就是在天上，也弥漫着冰冷的、沙沙作响的石头末，地上，只是在石头缝里，才长着一些干瘪的禾本科植物。

汽车猛地停住。司机向大家说了几句话，她听不懂，虽然

她一生都在听人家讲这种语言。“怎么回事？”马赛尔问。司机这回用法语说，可能沙子把汽化器堵住了。马赛尔又一次诅咒这个地方。司机咧嘴一笑，他保证没有关系，他就去把汽化器弄干净，然后就可以走了。他打开车门，冷风钻进来，立刻有千万粒沙子打在人们的脸上。全体阿拉伯人都把鼻子埋进斗篷里，身子缩成一团。“关门呀，”马赛尔吼道。司机笑着走回车门，不慌不忙地从仪表盘下取出几样工具，没有带上车门就向前头走去，象个小点子一样消失在浓雾中。马赛尔叹了口气。说：“他准是一辈子都没见过发动机。”“别说了，”雅妮娜说。突然，她吃了一惊。紧靠着汽车，在公路路堤上站着几个人影子，一动不动。在斗篷的风帽底下，在一排面罩后面，只看得见他们的眼睛。他们默不作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盯着旅客们看。“放羊的，”马赛尔说。

车子里静悄悄的。所有的乘客都低着头，仿佛在倾听莽莽高原上横冲直撞的风的吼声。雅妮娜忽然发现车上没有什么行李。在铁路终点站，司机把他们的大箱子和几包货物搬上了车顶。车厢里行李架上只有几根疙疙瘩瘩的手杖和几个扁平的草包。看起来，这些南方人是空着手出门的。

司机回来了，还是那么敏捷。他也用一块布蒙住了脸，只露出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他宣布马上开车。他关上车门，风立刻不叫了，沙雨打在窗子上的声音却更清晰了。发动机咳嗽了一声，又咽气了。起动了半天，发动机好歹转了。司机猛踩油门，汽车嗷嗷直叫，打了个响嗝，总算上路了。那些衣衫褴褛的牧羊人仍旧呆立不动，其中有人举起一只手，那只手随即消失在他们背后的浓雾里。汽车刚一开动就在变得更糟的公路上颠簸起来。阿拉伯人被颠得摇来晃去。雅妮娜正感到困劲儿上来的时候，面前出现了一个装满槟榔糖的黄色小盒子。那个脸

象鬣狗的士兵正冲着她笑呢。她迟疑片刻，拿了一块糖，说了声“谢谢”。鬣狗把盒子装进口袋，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收敛了。现在，他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前面的道路。雅妮娜转向马赛尔，只看见他结实的颈窝。他在观看窗外的雾，雾从容易破碎的路堤上升起，变得更浓了。

他们走了几个钟头了，个个疲惫不堪，无精打采，这时，外面响起一阵喊叫声。一群穿着斗篷的孩子象陀螺似地打着旋子，又是跳，又是拍手，围着汽车跑来跑去。汽车开进一条长街，两边是低矮的房屋，绿洲到了。风还在刮，不过，墙壁挡住了沙子，光线亮了一些。天空可还是阴沉沉的。汽车吱地一声刹住，停在一家旅馆前，旅馆的窗户很脏，门廊是用夯实的土建成的。雅妮娜下了车，在街上，她感到两腿发软。在房屋上空，她看见了清真寺纤细的黄色尖塔。左边，已经有绿洲边缘的棕榈树出现了，她真想走过去。尽管时近中午，天气还是很冷，风吹得她发抖。她转向马赛尔，先看到那个士兵朝她走过来。她等着他向她微笑或敬礼。可他看也不看她就走过去了，随即不见了。马赛尔呢，他正忙着找人把装布匹样品的黑木箱子从车顶上搬下来。那可不容易。只有司机一个人照料行李，他已住手不干了，正站在车顶上向车子周围穿斗篷的人们大声嚷嚷。雅妮娜四周都是皮包骨的脸，耳中充满了喉音浓重的喊声，她突然感到了疲劳。“我进去了，”她对马赛尔说。马赛尔正着急地招呼司机。

她走进旅馆。老板是个瘦而寡言的法国人，迎上前来，把她带到二楼一间通向临街走廊的房间。房间里似乎只有一张铁床，一把涂了亮漆的椅子，一个不带帘子的壁橱，一架芦苇编的屏风后面是洗脸间，洗脸池上盖着一层极细的沙子。老板关上门之后，雅妮娜感到一股冷气从光秃秃的刷了石灰的四壁向

她袭来。她不知道该把手提包放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该呆在什么地方。要么躺下，要么站着，怎么样都冷得发抖。她站着，手里拎着包，眼睛盯着天花板旁边一个象枪眼似的小气窗。她在等，但她不知道在等什么。她只是感到孤独，感到透心地凉，心口上压着一块大石头。她神不守舍，几乎听不见街上传来的嘈杂声，其中还夹杂着马赛尔的喊叫声。相反，她注意到来自那个小气窗的流水声，那是风吹过棕榈林发出的响声，她觉得那林子是这样地近。后来，风似乎更猛了，淙淙的流水声变成了浪涛的呼啸声。她想象墙后面有一片棕榈的海洋，每一棵树都挺拔，柔韧，随风起伏。她的等待完全落空了，然而这看不见的波涛却使她疲倦的眼睛为之一爽。她木然伫立，垂着手，微曲着背，感到寒气顺着沉重的双腿直往上升。她梦想着那挺拔而柔韧的棕榈树，梦想着少女时代的她。

盥洗过后，他们下楼到餐厅去。餐厅的光秃秃的墙上，在粉色和紫色的底子上画着骆驼和棕榈树。拱形的窗户漏进了一点可怜的光线。马赛尔跟老板打听镇上商人的情况，然后，一个制服上挂着一枚军功章的阿拉伯老头来给他们上菜。马赛尔忙着要办事，撕开面包就吃。他不让妻子喝水，说："这水不开。喝酒吧。"她不爱喝酒，喝了就头晕。有一道菜是猪肉。"古兰经禁止吃猪肉。但是古兰经不知道煮熟的猪肉不会让人生病。我们知道如何烹调。你在想什么？"雅妮娜什么也不想，或者她也许在想厨师比先知高明。不过她得赶快吃了。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还要往南。今天下午必须走访镇上所有重要的阿拉伯商人。马赛尔催着阿拉伯老头上咖啡。那人点点头，脸上没有笑容，迈着小步走了出去。"早晨吃得慢，晚上别太快，"马赛尔笑着说。咖啡终于来了。他们转眼就喝完咖啡，走上寒冷

的、尘土飞扬的街头。马赛尔叫了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帮他抬箱子，照例先讲讲价钱。他又一次让雅妮娜知道，他一贯认为他们阿拉伯人总是漫天要价，准备让你就地还钱。他们俩在前面抬着箱子，雅妮娜跟在后面，挺不自在。她在厚大衣下面加了一件毛衣，她本来并不想穿得这么鼓鼓囊囊的。猪肉虽说煮得很熟，还有她喝的那点酒，也都使她感到不利索。

他们沿着一座小公园往前走，公园里的树上落满了灰尘。路上遇见的阿拉伯人都拢起斗篷的下摆给他们让路，却好象没有看见他们似的。她发现这里的阿拉伯人即便穿得破烂，也有一种自豪的神气，而她居住的那个城市里的阿拉伯人却没有。箱子在人群中开路，雅妮娜跟在后头。他们经过一座开在黄土围墙上的大门，来到一个小广场，那里栽的树同样死气沉沉，广场尽头，最宽的那一边，拱廊下有一溜店铺。他们就在广场上，在一座粉刷成蓝色、象炮弹一样的小房子前面停了下来。里面就有一间屋子，全靠大门漏进一点光去，一个白胡子阿拉伯老人坐在一块发亮的木板后面。他正端着茶壶，往三个色彩斑斓的小杯子里倒茶。他们站在门口，还没有看清昏暗的店堂里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就有一股薄荷茶的清香扑鼻而来。马赛尔跨过门坎，穿过摆得碍手碍脚的锡茶壶、茶杯、托盘和陈列明信片的活动架子，就到了柜台前。雅妮娜就留在门口，为了不挡住光线，她略微偏在一旁。这时，她发现老商人背后的暗处，有两个阿拉伯人朝他们微笑。铺子后边堆满了塞得鼓鼓的口袋，那两个阿拉伯人就坐在口袋上。红色和黑色的地毯、绣花的领巾挂了一墙，口袋和装满香料的小木箱堆了一地。柜台上，有一架铜盘锃亮的天平和一把刻度已经磨平的米尺，周围摆了一排圆锥形糖块，其中一块的蓝色厚纸包装已经拆开，尖儿也没有了。茶香之外，屋子里还飘散着羊毛和调料的气味。

老商人把茶壶放在柜台上，向马赛尔问好。

马赛尔用他讲生意时惯用的低嗓门急急忙忙地说了一通，然后打开箱子，拿出布匹丝绸，把天平和米尺推在一边，把他的货摊开在老商人面前。他有点激动，提高了嗓门，莫名其妙地发笑，就象一个女人想取悦于人可又对自己缺乏信心。他张开双手模仿着卖与买的动作。老人摇摇头，把茶盘递给背后的那两个阿拉伯人，只说了几句话，马赛尔似乎就泄了气。他把布匹收起来，装进箱子，擦去脑门上居然会沁出来的汗珠。他把小脚夫叫来，便朝拱廊下走去。在第一家铺子里，虽说老板一开始装出同样傲慢的样子，他们的运气稍有好转。“这些人自以为象上帝一样高高在上，”马赛尔说，“可他们也得卖东西！人人都有难处啊。”

雅妮娜不答话，只是跟着走。风差不多停了，天空这儿那儿地放晴，仿佛厚厚的云中开出了一口口蓝色的深井，寒冷、耀眼的阳光从中直泻下来。他们此刻已经离开广场，走过一条条小胡同，胡同两边土墙上挂着十二月的发霉的蔷薇花，疏疏落落地还有几棵干枯的、被虫子咬空的石榴。灰尘和咖啡的香味，烧树皮的烟气，石头和绵羊的气息，飘浮在这个街区。店铺之间相距很远，中间隔着厚厚的墙垣。雅妮娜觉得两条腿越来越沉，可她丈夫的情绪已逐渐平稳，他的货开始脱手了，他也就好说话多了。他叫雅妮娜“小宝贝”，说这趟旅行总算没有白费工夫。“当然啦，”雅妮娜说，“最好跟他们直接打交道。”

他们打另一条路回镇中心。下午已过去大半，天空几乎完全晴了。他们在广场上停了下来。马赛尔搓着手，温情脉脉地打量着放在他们面前的箱子。“你看，”雅妮娜说。从广场的那一头走过一个高大的阿拉伯人，清瘦，健壮，身着天蓝色斗篷，足登黄色软靴，带着手套，青铜色面皮，鹰勾鼻，高视阔步地

走来。他缠着头巾，他与土著事务部① 的法国军官的区别仅此而已，雅妮娜对这些军官有时是颇为欣赏的。他直冲着他们走来，目中无人，边走边慢条斯理地摘下一只手套。“好家伙，”马赛尔耸耸肩膀说，“这小子还以为自己是个将军呢。”是的，这里的人都有这股傲慢劲儿，可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广场上地方那么大，他却偏偏直冲着箱子走过来，眼里没有箱子，也没有他们。他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要不是马赛尔一下子抓住箱子的把手往后一拉，眼看他就要撞上来。那人却若无其事，径直走了过去，不慌不忙地拐向围墙那一边。雅妮娜望了她丈夫一眼，他显得十分狼狈。“他们以为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他说。雅妮娜没有答腔。她讨厌这个阿拉伯人的妄自尊大，忽然感到自己很不幸。她想走，她怀念自己那一小套房间。一想到回旅馆，回到那间冰冷的屋子，她的心就凉了。她突然想起来老板曾劝她去登城堡的平台，从那儿可以眺望沙漠。她跟马赛尔说了，还说可以把箱子留在旅馆里。可是他累了，他想在晚饭前睡一会儿。“那你请便吧，”雅妮娜说。他望了望她，突然变得关怀备至。“当然陪你罗，亲爱的，”他说。

她在旅馆门前等他。街上穿白衣服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没有一个女人，雅妮娜觉得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男人，然而没有人看她一眼。有几个人慢慢地把脸朝她转过来，却似乎并没有看见她。在她看来，他们都是一个模样，都有一张瘦削的、棕褐色的脸。汽车上的法国兵的脸，那个戴手套的阿拉伯人的脸，也都一样，都带着一种狡狯而傲慢的神气。他们把脸转向这个异邦女人，却视而未见，从她身边走过去。她的脚踝已经

① 法国殖民主义军事机构，最初负责治理阿尔及利亚全境。后来建立民政部门。土著事务部仅管辖阿尔及利亚南部。

肿了。她越来越不自在，渴望早些离开这里。“我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呢？”这时，马赛尔出来了。

他们踏上城堡的台阶，已是下午五点钟了。风完全停了。天也完全晴了，现在是一片湛蓝。空气干冷，刺得脸生疼。在台阶中段，一个阿拉伯老人斜倚在墙上，问他们要不要向导。他动也不动，好象早就料到他们不会雇他。台阶的好几个拐弯处都有用夯土筑实的平台，却仍嫌太长太陡。他们越往上爬，空间越开阔。他们爬得越高，天色越明亮，空气越寒冷、干燥，从绿洲传来的每一种声音都听得格外真切。空气被照得发亮，仿佛在他们周围颤动，随着他们的升高，这颤动越发厉害，好象他们的脚步踏在水晶般的光明里，引发出一圈圈震幅不断加大的声波。他们登上平台，目光豁然开朗，它越过了棕榈林，消失在无垠的天边。雅妮娜觉得，整个天空响彻一个洪亮、短促的乐音，其回声渐渐充满她头上的空间，然后戛然而止，留下她和这无边的原野默然相对。

她的目光沿着一条完美的曲线，慢慢地从东移到西，没有一点儿遮拦。脚下，阿拉伯城区蓝色和白色的平台层层迭迭，晾着一簇簇辣椒，一片深红。看不见人，但是从人家院子里，和烤咖啡豆的香味同时腾起笑语声和难以理解的跺脚声。稍远些，棕榈林被粘土墙分割成不等的方块，树梢在风中沙沙作响，不过，平台上并感觉不到有风。再远些，直到地平线，是土黄和灰色的石头的王国，一星儿生气都没有。只在离绿洲不远的地方，挨着绕过棕榈林西边的那条干河道，才看到几顶黑色的大帐篷，周围有几头一动不动的单峰驼。远远望去，它们显得小极了，在灰色的地上用一种古怪的文字拼成一些深奥难解的符号。沙漠上空，一片寂静。

雅妮娜全身重量都靠在平台的护墙上，默默无言，她的面

前是一片虚空，她无力摆脱。马赛尔在一边不耐烦了。他冷，想下去。这里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她的目光盯住天际，移不开了。那边，更往南，天地相接成一条清晰的细线的地方，她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等待她。迄今为止，她一直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可是她也一直感到缺少这种东西。天色已近黄昏，光线渐渐散去，从清澈的晶体变为流体。与此同时，在这个偶然来到这里的女人的心头，岁月、习惯和苦闷结成的疙瘩正在慢慢解开。她眺望游牧人的宿营地，她甚至连住在里面的人都没有看见，黑色的帐篷之间也没有任何动静，她却不由自主地老想着他们，可今天以前她还不大知道有他们存在。这些人没有房屋，与世隔绝，三五成群地在她目光所及的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游荡，而这片土地只是一个更为辽阔的空间的极小部分，这空间令人目眩地向南方伸展，直到几千公里以外才出现第一条河以及河水哺育的森林。从古至今，在这片广袤的疆域的干旱的、被榨得只剩下骨头的土地上，总有一些人无休止地来回迁徙。一无所有，却不仰承任何人的鼻息，贫穷然而自由，他们是一个古怪王国的主人。雅妮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法使她的心头生出一股愁绪，这愁绪是那么甜蜜，那么浩茫，她不由得闭上了眼睛，细细品味。她只知道这个王国一直是许给她的，但它永远不可能属于她，永远不可能了，也许除了那倏忽即逝的一瞬间。在那一瞬间，她睁开了眼睛，看到天空突然静止不动，光明凝固不流，从阿拉伯城区传来的人语声一下子归于寂静。她仿佛觉得地球已停止转动，从这个时刻起，人人都不老不死。从此，在所有的地方，生命都停顿了，除了在她的心里。她的心里，这时候有一个人因痛苦和惊喜在哭泣。

然而，光明复又流动，轮廓分明，没有热力的太阳即将下沉。西方染上一抹绯红，而苍茫的暮色已笼罩东方，正慢慢地

在整个原野上铺开。狗叫了，这遥远的叫声在更加清冷的空气中上升。雅妮娜这时才知道，她已冻得直打牙了。“冻死了，”马赛尔说，“你真傻。回去吧。”他笨拙地握住她的手。她驯顺地离开护墙，跟他下去。台阶上的那个阿拉伯老人仍然呆在那儿不动，目送他们回城。她一路上没看见一个人，突然感到十分疲倦，自身的重量压得她抬不起腿来。她刚才的兴奋已经过去了，而现在，她感到自己太高大、太肥胖了，对于她刚刚进入的这个世界来说，也太白了。只有小孩、少女、干瘪的人和鬼鬼祟祟的鼠狗才能不声不响地来到这块土地上。要不是拖着沉重的脚步直到昏睡，直到死亡，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确实，她是拖着两条腿走进餐厅的。丈夫突然变得不爱说话了，要不就诉说他的劳累，而她正在和一场感冒作无力的斗争，浑身发烧。她好不容易挪回房间，上了床。马赛尔跟着上床，立即关了灯，也不向她要求什么。屋子里冰冷。雅妮娜感到浑身发冷，体温却不断升高。她喘不过气来，血液在流动，却不能给她带来温暖。某种恐惧向她袭来，越来越大。她翻了个身，旧铁床被压得咯吱咯吱乱响。不，她不愿意病倒。她的丈夫已经入睡，她也该入睡了，必须睡着。微弱的市声透过小气窗传到她的耳际。摩尔人的咖啡馆的老式留声机哼出依稀可辨的曲调，那曲调伴着一片慢腾腾的人语声飘过来了。必须睡着。可她却在数那些黑色的帐篷，眼皮后面出现兀然不动的骆驼，无边无际的孤独包围了她。是啊，她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她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过了不久，她醒了。周围一片沉寂。然而，城市边缘有几只狗在万籁俱寂的黑夜中声嘶力竭地吠叫。雅妮娜打了个寒颤。她又翻了个身，感到丈夫结实的肩头紧贴着她的肩头，于是，半睡半醒的她一下子缩成一团，偎依在丈夫的怀里。她睡得不

熟，晃晃悠悠，仿佛在水里漂流，不知不觉中紧紧抓住丈夫的肩膀，好象那是她最安全的避风港。她在说话，可嘴里发不出声音。她在说话，可她自己也听不清说些什么，她只感到了马赛尔身上的温暖。二十多年来，夜夜如此，永远只有他们俩，他的体温，甚至在病中，旅途中，就象现在……再说，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又能做些什么呢？没有孩子！她缺少的不正是孩子吗？她不知道。她跟着马赛尔，仅此而已，因为感到有人需要她而心满意足。除了让她知道他少不了她之外，他没有给过她别的乐趣。肯定，他并不爱她。爱情，即便是充满着恨的爱情，也不会是那种老绷着的脸。他的脸什么样？他们总是在黑暗里摸索着相爱，谁也看不见谁。除了黑暗中的爱情，难道还有大白天里大叫大嚷的爱情？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他需要她，她也需要这种需要，日夜赖此为生，特别是在夜里，每天夜里，当他不愿孤独，不愿衰老，不愿死去的时候。那时候他有一种执拗的表情，她有时也在别的男人脸上认出这种表情。男人都是疯子，这是他们唯一共同的表情。平日里他们装出通情达理的样子，到时候就发起疯来，绝望地扑向一个女人，为了在女人身上埋藏他们因孤独、黑夜而产生的恐惧。其实他们并没有欲望。

马赛尔动了动，象是为了离她远一点。不，他不爱她，他只是害怕除她以外的别的东西罢了。她和他早就该分开了，孤眠独宿直到老死。但是谁能总是一个人睡呢？某些人这样做，他们离群索居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或曾遭受不幸，于是就与死亡同床共枕。马赛尔，特别是他，是永远也做不到的。他是个软弱的，没有防卫能力的孩子，见了痛苦就害怕。他正是她的孩子，也需要她，恰在这时，马赛尔发出一声呻吟。她把身子贴得更紧一些，一只手搁在他的胸脯上。而在心里，她叫他的

爱称，这名字是她从前给他取的，后来偶而倒还用用，却不再去想它原来的含义了。

她全心全意地呼唤他。不管怎么说，她也需要他，需要他的力量，他小小的怪癖，她也怕死啊。“我要能克服这种恐惧的话，我就幸福了……”立刻，一种无名的烦忧吞没了她。她离开了马赛尔。不，她什么也克服不了，她得不到幸福，她将要死去，而且还不曾得到解脱。她心口难受，有一个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突然发现，二十年来她一直背着这个重负，而此刻她正在重负底下竭尽全力地挣扎。她要得到解脱，即便马赛尔，即便其他人永远不得解脱！她醒了，坐在床上，侧耳谛听仿佛近在咫尺的召唤。然而，从黑夜的尽头传来的，只有绿洲上嘶哑的、不知疲倦的犬吠声。一阵微风掠过，她听起来象是流过棕榈林的潺潺水声。风来自南方，那里，沙漠和黑夜交融在重又静止不动的天宇下，那里，生命停顿，人人不老不死。随后流水似的风声也消失了，她甚至不能肯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声音，除非有一个无声的召唤。这召唤，她可以任意取舍。但是，如果她不立刻回答，她将永远不能理解它的含义。要立刻回答，是的，至少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她悄悄地下了床，站在床边不动，注意观察丈夫的呼吸。马赛尔还在睡。一会儿工夫，床上的温暖离开了她，她感到冷了。借助街灯透过百叶窗射进的微弱的光亮，她找到衣服，慢慢地摸索着穿上了。她手里拎着鞋子走到门口，在黑暗中又等了一会儿，轻轻地开了门。撞锁咔嚓一响，她不动了。她的心怦怦直跳。她竖起耳朵，没听到什么动静，才又拧了拧。她觉得撞锁老也拧不到头。她终于把门打开，溜出门外，小心翼翼地把门带上。然后，她把脸贴在门上，又等了等，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了远远地传来的马赛尔的呼吸声，她转过身子，冰

冷的夜气迎面扑来，她沿着走廊跑了。旅馆的大门关着。她打开门锁的当儿。守夜人睡眼惺忪出现在楼梯口，用阿拉伯语对她说了些什么。“我就回来，”雅妮娜说。她投入夜的怀抱。

漆黑的夜，一串串星星垂挂在棕榈树和房屋上空。她沿着短短的通往城堡的林荫道往前跑，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静夜里弥漫着寒冷，再没有太阳与它争雄，冰凉的空气刺痛了她的肺。她跑啊，跑啊，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然而，上坡路的高处出现了几点亮光，七扭八拐地冲着她滚了下来。她停住脚步，听到一阵象是昆虫振翅的声音，最后，在越来越大的亮光后面，她看到了巨大的斗篷，以及斗篷底下纤弱的自行车轮子。斗篷擦身而过，三个小红灯在她身后出现，随即消失在黑暗中。她继续朝城堡跑去，跑到城堡的台阶中间，冷气刺得她的肺如同刀割，她真想停一停。她鼓起最后一股劲，终于冲上平台，趴在护墙上。她气喘吁吁，眼前一片模糊。跑并没有使她发热，她浑身都在打颤。但很快，她急促地吞下去的冷气就在她的体内均匀地流布，战栗之中正生出一股微微的暖流。她的眼睛终于在夜空面前睁开了。

除了石头冻裂、化成细沙的微弱的毕剥声外，没有一丝风，没有一声响，来打破笼罩着雅妮娜的孤独和寂静。然而，过了片刻，她似乎觉得头顶上的天空在笨重地旋转。在这干燥、寒冷、浓重的夜色深处，千万颗星星不断地生成，它们刚刚射出闪烁的寒光，就开始无声无息地朝着地平线坠落。雅妮娜被吸引住了，凝神静观这飘飘荡荡的流火。她和星辰共同旋转，他们共同遵循的一条亘古不变的道路渐渐把她引入她的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存在之中，那里，寒冷和欲望正在交战。在她面前，星星一颗接一颗坠落，熄灭在荒原上的乱石丛中。每坠落一颗星，雅妮娜都感到更靠近了黑夜一步。她的呼吸平缓了，她已忘却

寒冷，忘却放荡不羁的生活或心如古井的生活，忘却生与死的无穷忧虑。这么多年，她一直为恐惧所驱，疯狂地，无目的地奔逃，现在她终于停下来了。此刻，她仿佛又找到了她的根，汁液重又在体内运行。她不再发抖了。腹部紧贴住护墙，她向正在旋转的天空探出身子。她的心还在骚乱之中，她等待它平静下来，等待身心归于静谧。最后一批星星落得更低，停在沙漠边缘的上空不动了。于是，夜气如水，注满雅妮娜全身，柔情缱绻，令人不能自持。它从她的身心最深处逐渐上升，汇成涓涓细流，一直流到她轻轻呻吟的唇边。刹那间，她倒在冰凉的地上，整个天宇在她的身上展开。

雅妮娜仍旧是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马赛尔还没有睡醒。但是当她躺下的时候，他却哼了一声，几秒钟之后，他霍地坐了起来。他说话了，她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下了床，开开灯，灯光刺得她眼睛疼。他跌跌撞撞地走向洗脸间，拿起放在那里的一瓶矿泉水，喝了半天。正当他一条腿已经上了床，准备钻被窝的时候，他看了她一眼，感到莫名其妙。她哭了，哭成了个泪人儿，还止不住。“没什么，亲爱的，”她说，“没什么。”

译者附记：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施康强同志的译文，谨在此志谢。施康强同志的译文发表在《世界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三期。

叛 教 者

——或一个精神错乱的人

“真乱，真乱呀！我脑袋里的东西该整理整理了。自从他们割掉了我的舌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另一条舌头在我脑壳里不停地动着，有个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在说话，突然又停止了，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哦，我听见的事情太多了，我说不出来，真乱呀，如果我张开嘴，那就象一颗滚动的石子儿发出的声音。条理，来点儿条理，舌头说，可它同时又说了别的事情，对，我一直渴望着条理。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可靠的，我正等着来替换我的传教士。我在他来的路上，离塔卡萨有一个钟头的路程，藏在一堆崩塌的乱石中间，坐在一枝老枪上。荒原上，天亮了，很冷，可一会儿又该太热了，这个地方真让人发疯，而我已经不知道呆了多少年了……不，还得再忍耐一会儿！传教士应该今天早晨到，要不就是晚上。我听说他跟一位向导一起来，可能他们俩只有一头骆驼。我得等，我等着，冷啊，就是因为冷我才发抖。还得忍耐，卑鄙的奴隶！

“我已经忍耐了这么久了。我在家的时候，在那 高 高的中央高原上，父亲粗鲁，母亲野蛮，天天喝酒，喝肥肉汤，尤其是酒，又酸又凉，还有漫长的冬天，寒冷的风，成堆的雪，讨

厌的蕨类植物，啊！我想走，一下子离开这一切，到有阳光和清水的地方去生活。我相信了神甫，他跟我谈修道院，他天天找我，因为他有时间，那个地方的人都信新教，他每次走过村子都得溜墙根儿。他跟我谈未来，谈阳光，他说天主教就是阳光，他教我读书，把拉丁文灌进我那僵硬的脑袋里：'这孩子聪明，可就是头驴，'我的脑壳是够硬的，我这一生中跌过多少次，可从来没出过血。'真是个牛头，'我那个粗野的父亲说。我进了修道院，他们非常得意，因为从新教控制的地方招一个人来，就是一大胜利，在他们的眼中，我的到来无异于升起了奥斯特利茨① 的太阳。这太阳苍白了点，这倒是真的，因为酒喝多了。他们喝酸酒，他们的孩子就长龋齿，就该杀神甫，可是别担心，他传教去了，因为他早就死了，酸酒把他的胃烧了个大窟窿，那么，只得去杀这个传教士了。

"我有一笔账要跟他算，跟他的老师算，跟我的老师算，他们骗了我，跟卑鄙的欧洲算，所有的人都骗了我。传教，他们嘴上就挂着这个词儿，到野蛮人那里去吧，对他们说：'这就是上帝，看看他吧，他从不打人，也从不杀人，他用温和的声音发号施令，他伸过来另一半脸② ，他是老爷中最大的老爷，选择他吧，你们看他把我变得多好，侮辱我吧，然后你们就会看到证据。'是的，我信了上帝，我觉得我变好了，我胖了，差不多可以说漂亮了，我愿意受人侮辱。夏天在格勒诺布尔③ ，当我们穿着黑袍，一个紧挨一个地列队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碰见

① 捷克斯洛伐克村庄，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于此大败俄奥联军。
②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③ 法国东部城市。

了穿着轻薄短裙的姑娘，我可不斜着眼睛看，我鄙视她们，我等着她们侮辱我，而她们有时却哈哈大笑。于是我就想："让她们打我吧，往我脸上吐唾沫吧，'果然，她们的笑声象长着尖牙利爪，撕扯着我，这侮辱，这痛苦，是多么甜蜜啊！当我痛骂自己的时候，我的导师很不理解，他说："不，您身上还有好的东西！'好的东西！我身上只有酸酒，别无其他，这样更好，人要不坏，怎么能变好，我从他们教给我的东西中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我甚至仅仅明白了这一点，我怀着一个念头，象一头聪明的驴子，一条道儿跑到黑，我喜欢赎罪，我对平庸发火，总之，我也想成为榜样，让人家看见我，让他们看见我的时候对那种使我变好的东西表示敬意，通过我向上帝致敬吧。

"野蛮的太阳啊！它升起来了，沙漠变样了，它失去了仙客来花那样的颜色，啊，我的群山，还有那雪，温柔的软绵绵的雪，不，那是一种发灰的黄色，这太阳大放光明之前的令人不快的时刻。不，地平线上还什么也没有，在我前面，高原消失在一圈还挺柔和的光晕中。在我身后，道路通向一个沙丘，塔加萨就藏在后面，它那铁一般的名字在我的脑袋里敲了这么多年。第一个跟我说话的是个半瞎的老教士，他隐居在修道院里，可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个呢，他是唯一的一个，而我呢，使我吃惊的，并非他讲的盐城和在炎热阳光照射下的白墙，而是野蛮居民的残忍，这座城市把任何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据他所知，在所有企图进城的陌生人中，只有他能够讲述他的见闻。他们用鞭子抽他，在伤口上撒上盐，往嘴里塞满盐之后，把他赶到沙漠里去，他遇见了游牧人，算他有运气，他们居然动了恻隐之心，而我呢，从此我就根据他的故事梦想着灼热的盐和天空，梦想着偶像堂及其奴隶们，还能找到比这更野蛮、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吗？对，我的使命在那里，我应该去向他们显示

我的上帝。

“在修道院，他们唠唠叨叨，对我大泼冷水，说应该等一等，那不是个传教的地方，我还不成熟，我应该做专门的准备，我该有自知之明，还要对我进行考验，然后再看！可老是等待！不，进行专门的准备和接受考验，这可以，因为那都是在阿尔及尔进行的，那还使我离那儿更近，可其余的，我摇了摇我那僵硬的头，我反复地说，到最野蛮的人那里去，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他们家里，直到在偶像堂里，现身说法，向他们显示我的上帝的真理是最为强大的。当然啦，他们侮辱我，可我并不害怕侮辱，而对于显示上帝的真理来说，侮辱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我忍辱含垢的方式，我将象强大的太阳一样征服这些野蛮人。强大，是的，我舌头上不断滚动的就是这个词儿，我梦想着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使人跪倒在地，迫使对手投降，最后使之改宗，对手越是盲目、残暴、自信、信仰坚定，他的招供就越是宣告了促使他失败的那种东西的优势。使一些一时迷途的老实人改宗，这是我们的教士极为平庸的理想，我鄙视他们，他们有那么大的权力，敢做的事情却如此微不足道，他们没有信仰，而我有，我想要刽子手们承认我，让他们跪在我面前，让他们说：‘上帝啊，这就是你的胜利。’最后只用言语就制服一群坏蛋。啊！我确信刚才这段话说得头头是道，而用另一种方式说话，我就不太有把握了，我一旦有个想法，就紧紧抓住不放，这就是我的力量，对，我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却觉得可悲。

“太阳又升高了，我的额头开始发烫了。周围的石头发出沉闷的毕剥声，只有枪管才是清凉的，象草地，象夜雨那样凉爽，以前，在晚上，汤慢慢地烧着，我父亲和我母亲等着我，有时他们对我笑笑，我也许爱他们。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路上开始

升起热气，来吧，传教士，我等着你，现在我知道该对使命作出什么样的回答了，我的新老师给了我教训，我知道他们说得对，应该跟爱算账。当我逃离修道院来到阿尔及尔的时候，我把这些野蛮人想象成另外的样子，但我的想象只有一个与事实相符，那就是他们很凶恶。我呢，我偷了总务的钱箱，脱去道袍，穿越阿特拉斯①、高原和沙漠，横越撒哈拉的司机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跟我说：'别到那里去。'他也是，他们这些人都怎么了，几百公里的瀚海，沙浪翻滚，随风进退，再过去就是山，一色的黑峭壁，刀子一样锋利，过了山还需要一名向导，越过一片无边无际的棕色的石海，象是千万面冒火的镜子，又烤人，又晃眼，这才到那黑人疆土和白人国家交界的地方，盐城就坐落在那里，向导抢了我的钱，我真傻，我总是那么傻，我让他看到我的钱，他把我扔在半路上，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打了我一顿，说：'你这条狗，这就是路，我很荣幸，去吧，去那儿吧，他们会教训你的。'他们教训了我，是的，他们打我，就象这太阳一样，辉煌而傲慢，除了夜里，总是没完没了地射出灼人的光芒，现在，阳光很猛，太猛了，地上仿佛突然冒出灼人的长矛，啊，躲躲吧，对，躲躲吧，趁着一切还没有变得模模糊糊，快躲到大石头底下去吧。

"这儿很阴凉。盐城坐落在那个热气蒸腾的小盆地里，人怎么能在那儿生活呢？笔直的墙是用镐凿成的，粗粗地刮平，留下的毛刺竖立着，活象一片片明晃晃的鳞片，这儿那儿蒙上一层金黄色的沙子，略微有些发黄，大风扫过墙壁和平台之后，一切又都闪烁出一片耀眼的白色，天空仿佛也被扫净，露出一张蔚蓝色的皮。我被晃得什么也看不见。那些天里，一场静止不

① 北非高原名。

动的大火接连几个钟头在那些白色的平台上熊熊燃烧，许多平台都连成一片，就好象曾有过那么一天，他们一齐动手挖一座盐山，首先将其铲平，然后就地开掘街道、房屋、窗户，或者就好象，是的，这样说更好，就好象他们用沸水的水龙喷射，切开了他们的滚烫的白色地狱，这显示出，别人一生中连三十天都住不下去的地方，他们能住，这地方在沙漠中央，白昼的酷热使人们彼此间没有任何接触，在他们之间竖起一道用看不见的火焰和沸腾的水晶做成的屏障，接踵而至的夜寒使他们一个个蜷缩在他们的岩盐贝壳里不动，这些干燥的大浮冰上的居民们，这些黑色的爱斯基摩人，一下子又在他们的立方体雪屋中打起冷战来。黑色的，对，因为他们穿着黑色的长袍，盐，他们的指甲中塞满的是盐，夜里，他们在冻得发抖的睡眠中苦涩地嚼着的也是盐，他们所喝的从一道闪光的缝隙中流出的泉水里也有盐。这盐有时候在他们的黑袍上留下一道道痕迹，活象雨后蜗牛爬过留下的痕迹一样。

“雨，啊，上帝，就是一场真正的雨，下得久，下得猛，从你的天上落下来的雨啊！于是，可憎的城市逐渐被蚕食，慢慢地倒坍，毫无办法，在一道粘乎乎的激流中全部溶化了，沙子和残酷的居民们一齐被卷走。只一场雨啊，上帝！什么，哪个上帝，他们就是上帝呀。他们统治着他们那人丁稀少的家园，统治着他们使之葬身矿山的黑奴，在南部地区，挖一块盐就等于要一条命，他们戴着又黑又脏的头巾，无声无息地从闪着白光的街上走过，夜里，整个一座城市酷似一个乳白色的幽灵，他们弯着腰进入屋内，盐墙微微地发光。他们睡了，但睡得很轻，一醒来就发号施令，就打人，他们说他们是天下第一，他们的神是真神，必须服从。这就是我的老爷们，他们不知有怜悯，作为老爷，他们想当孤家寡人，独来独往，独家统治，因为只

有他们才敢于在盐和沙里建立一座既有严寒又有酷热的城市。而我……

“温度上升，真烫人啊，我出汗了，他们可从来不出汗，现在，阴凉地也热起来了，我感到了头顶上岩石反射下来的阳光，阳光照射，象锤子砸下来一样地射在石头上，这是音乐，中午的规模巨大的音乐，数百公里的土地上空气的颤动和石头的颤动，咦，象从前一样，我又听见了寂静。对，几年前，迎接我的正是这种寂静，当时，守卫把我带到他们跟前，带到一个阳光照耀下的广场的中央。包围着它的平台一个个渐次升高，青天如盖，压在小盆地的四周。我跪在这面白色的盾牌中间，从墙上伸出来的盐与火的利剑刺痛了我的双眼，我累得脸发白，耳朵也被守卫打出了血，而他们，身材高大，穿着黑衣，一声不吭地盯着我。时值正午。天空象一块白热化的铁板，在炽烈的阳光的敲击下振颤不已，他们盯着我，时间在消逝，他们没完没了地盯着我，而我承受不住他们的目光，气喘得越来越厉害，终于，我哭了，他们却突然不声不响地转过身去，朝着同一个方向一齐走了。我跪着，只看见他们的脚上穿着黑红两色的凉鞋，闪着盐光，踢起了黑色的长袍，脚尖稍稍翘起，脚跟轻轻着地，当广场上空无一人时，有人把我拖进偶像堂。

“就象我今天蹲在这块岩石下面一样，火一样的阳光穿透了头顶上厚厚的石头，我在偶像堂的昏暗角落里蹲了好几天，那间偶像堂比其他房子稍微高些，围了一圈盐墙，没有窗户，上面就是星光灿烂的夜。好几天，他们只给我一碗发咸的水，扔给我一把米，象喂鸡似地，我就拣起来。白天，门仍紧闭着，但不那么暗了，仿佛不可抵抗的阳光射穿了厚厚的盐墙。没有灯，但我沿墙摸索着往前走时，摸到了装饰墙壁的棕榈叶，屋子尽头有一扇粗糙的小门，我用手摸来摸去，摸到了门闩。好

多天了，很久了，我已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钟点，但我记得他们给我扔了十二次米，我挖了个坑埋粪便，但是白费劲儿，总是有一股兽穴的气味，过了很久，门大开了，他们进来了。

“我还蹲在角落里，一个人朝我走过来。我感到盐杀得我脸火辣辣的，我呼吸着棕榈叶的土腥气，看着他走过来。他在离我一公尺远的地方站住了，默默地盯着我，摆摆手，我站了起来，他一直盯着我，眼睛象金属那样发亮，没有表情，一张棕色的马脸，他抬起了手。他一直不动声色，他揪住了我的下嘴唇，慢慢地拧，直到把我的肉撕开，他并没有松开手指，而是让我转圈，往后退，直退到屋子中央，他一拉我的嘴唇，我就跪在了地上，头晕目眩，满嘴流血，然后，他转身回到那些人身边，他们都沿墙站着。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呻吟，天热得难以忍受，门虽大开，可并没有一个影子进来，但光亮中却钻出了巫师，他头上插满了拉菲亚树① 叶，上身裹着珍珠铠甲，草裙下面露出一双光腿，脸上戴了一副用芦苇和铁丝编的面具，上面开了两个方孔露出眼睛。他后面跟着乐师和女人，女人都穿着沉重的、五颜六色的袍子，看不出体形。他们在屋子里头的那扇门前跳舞，舞姿粗糙，几乎没有节奏，乱动而已，终于，巫师打开了我身后的小门，主人们不动，他们望着我，我转过身去，我看见了偶像，它有两个斧形的脑袋，鼻子象扭曲的铁丝，仿佛一条蛇。

“他们把我带到它面前，台座跟前，让我喝一种黑乎乎的水，真苦，真苦呀，我的脑袋立刻象着了火一样，我大笑起来，这就是侮辱啊，我被侮辱了。他们把我的衣服扒光，把我的头发和身上的毛剃净，在我身上涂了油，用经盐水浸过的鞭子抽我的

① 马达加斯加岛上产的一种棕榈树。

脸，我笑，扭过脸，但是，每次都有两个女人揪住我的耳朵，让我的脸朝着巫师的鞭子，我只看见他的方形的眼睛，我一直在笑，浑身是血。他们住手了，没有人说话，就我一个人说话，我的脑袋里已开始乱了，后来，他们把我拉起来，强迫我抬眼望着偶像，我不笑了。我知道现在我已宣誓为它效劳，崇拜它了，不，我不笑了，恐惧和痛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这白色的屋子里，在这太阳一直在外面起劲地烧灼的墙壁间，我仰着脸，记忆已经消失，是的，我试图向偶像祈祷，我只有它了，甚至它那狰狞的面孔也不象其余的一切那么狰狞了。这时，他们用一根绳子绑住了我的脚踝，不过，我还能迈开步子。他们又跳起舞来，但这一次是在偶像前面跳，主人们一个一个地出去了。

“他们一走，门就关了，音乐重新响起，巫师燃起一堆树皮，围着它跺起脚来，他那高大的影子在墙角折断，在墙上颤动，整个屋子里到处是舞动的人影。他在一个角落里画了个方框，女人们把我拉进去，我感到她们的手又干燥又温柔，她们在我身旁放了一碗水和一小堆米，对我指了指偶像，我明白了，我应凝视着偶像。这时，巫师把她们一个个叫到火堆旁，殴打其中的几个，她们呻吟着，然后就跪在我的上帝偶像面前，巫师还在跳，他让她们都出去，只留下一个，她很年轻，正蹲在乐师身旁，还没有挨打。他揪住她的辫子，缠在手上不停地绕，她两眼突出，身体后仰，终于仰面跌倒了。巫师放开她，大叫一声，乐师们转身对着墙，从一对方眼的面具后面发出的叫声高得不能再高了，这时那个女人发了狂似地在地上打滚，最后，她匍匐在地，用胳膊抱住脑袋，也叫了起来，但那声音是低沉的，而那巫师还在嚎叫，还在望着偶像，他又恶狠狠地把她抓了起来，动作十分敏捷，那女人的脸被沉重的袍子裹住，看不

见。而我，由于孤独而昏了头，也大叫起来，是的，对着偶像恐惧地嚎叫，直到他们一脚把我踢到墙根，啃了一嘴盐，就象今天，我用一张没有舌头的嘴啃着石头，等着我要杀掉的那个家伙。

“现在，太阳略微偏过正午了。从石缝中望去，天空如一块炽热的金属，给太阳熔出一个洞，象我那张话说得滔滔不绝的嘴一样，在单调的沙漠上空无休止地喷吐出一条条火河。我面前的那条路上还什么也没有，地平线上一点尘土也看不见，在我身后，他们该找我了，不，还不到时候，只是在傍晚他们才开门，我才能出去一会儿，在此之前，我整日打扫偶像堂，换祭品，晚上，就举行仪式。我有时挨打，有时不挨打，但我总是在为偶像效劳，那偶像就象镌刻在铁上那样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现在是留在我的希望中。从来没有一个神象它那样支配了我，控制了我，我一生的每时每刻都奉献给它了，痛苦和不痛苦，不痛苦不就是快乐吗，都归功于它，甚至，对了，甚至欲望，因为几乎每天都有那种没有个性的、凶神恶煞般的活动，我参加得多了，但我只是听见而没有看见，我得面壁而立，否则就要挨打。脸贴着盐墙，墙上野兽似的影子在晃动，我听着那长长的嚎叫声，嗓子眼儿发干，一种灼人的、一种强烈的不属于性的欲望冲上太阳穴，揪住了肚皮。日复一日，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了，岁月仿佛在酷热和盐墙的阴险的反射中溶化了，时间不过是一种急缓无定的汩汩声罢了，只是从中定期地爆发出阵阵痛苦和疯狂的嚎叫声，长长的白昼，亘古不变，偶像至高无上，正象暴虐的太阳照着我的石屋，而现在和从前一样，我因不幸和欲望而哭泣，一个恶毒的希望烧灼着我，我想背叛，我舔着我的枪管，舔着它里面的灵魂，它的灵魂，只有枪才有灵魂，啊！是的，就在他们割了我的舌头的那一天，我学会了

崇拜恨的不灭的灵魂！

“多么混乱，多么狂暴，啊，啊，热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匍匐在地，我躺在我的枪上。谁在这儿喘气？我忍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酷热，这等待，我得杀了他。没有一只鸟儿，没有一茎草儿，石头，冷漠的欲望，沉寂，他们的嚎叫，这条在我身上说话的舌头，他们割了我的舌头之后的漫长、平淡、枯燥的痛苦，夜里没有水，夜啊，我被关在盐窝里与偶像厮守时渴望着的夜啊。只有群星清冷，泉水幽暗的夜才能拯救我，才能让我摆脱人类的凶神恶煞，可我始终被关着，不能够凝神观望它。如果那个传教士还耽搁未到，我至少可以看到夜降临在沙漠上，弥漫天宇，群星如金色的葡萄从幽暗的中天垂挂下来，我可以尽情地喝，湿润我那干瘪的黑窟窿，那里已没有活的柔软的筋肉在感到清凉了，最后去忘掉割舌发狂的那一天吧。

“真热，真热呀，盐化了，至少我以为盐化了，热气烘烤着我的眼睛，巫师进来了，没有戴面具。他身后跟着一个我没见过的女人，差不多赤身裸体，只披着一身破布片，脸上刺成偶像的模样，除了一种不祥的惊愕之外，什么表情也没有。唯独她那纤细平板的身体还有些活气，巫师打开门时，她就趴在神像前了。然后，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出去了，气温上升，我一动不动，偶像盯着我看，它脚下的那具不动的肉体开始慢慢地活动了，我走近了，那女人的刺成偶像的脸没有变化。只是她的眼睛瞪大了，盯住我看，我用脚碰了碰她的脚，好烫，这个偶像什么也没说，一直睁大眼睛盯着我，渐渐翻过身来，收起两条腿，抬起，慢慢地分开。这时，巫师一直在盯着我呢，他们进来了，把我从那女人身边拉开，狠狠地打我那个犯罪的部位，犯罪！什么罪，我置之一笑，罪在何处，德又在何处，他们让我贴墙站着，一只铁手揪住我的牙床骨，另一只掰开我

的嘴，拉出舌头，直拉到出血的程度，那是我在象一头野兽那样嚎叫吗，最后，一下锋利而清凉的抚摸，是的，是清凉，掠过了我的舌头。我苏醒过来时，已是黑夜了，我独自一人，靠在墙上，身上沾满了已经变硬的血，嘴里塞了一团气味奇特的干草，不流血了，可里面空空如也，只有阵阵难耐的疼痛。我想站起来，旋即跌倒，我感到幸福，无比地幸福，我终于死了，死亡也是清凉的，在它的阴影下什么神也没有。

“我没死，一天，在我站起来的同时，一种新的仇恨产生了，我朝里面的那扇门走去，打开，关上身后的门，我恨我的同胞，偶像还在那儿，我站在那个洞的尽头，比向它祈祷更进一步，我还信仰它，我背弃了我迄今所信仰的一切。敬礼，它是力量，它是强权，人们可以毁灭它，但不能使它改崇，它用它那双茫然迟钝的眼睛望着我头上的地方。敬礼，它是主人，唯一的上帝，它的无可争议的属性是恶，不存在善良的主人。我由于受尽了侮辱，肉体因唯一的痛苦而喊叫，我生平第一次把全身心交给了它，赞同了它的作恶的秩序，崇拜它的恶的世界原则。它的王国是一座在盐山里雕出来的不毛之城，远离大自然，没有沙漠上本来就稀少的短暂的花朵，避开了或凶或吉的偶发之事，如太阳和沙漠都曾见过的一片怪异的云，一场急而猛的雨，总之，这是一座有秩序的城市，直角，方屋，僵硬的人，我成了这个王国的俘虏，自由地作了这个城市的充满仇恨备受折磨的公民，我背叛了人们曾经教给我的漫长的历史。他们欺骗了我，唯有恶的统治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欺骗了我，真理是方的，沉的，密的，不容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善是个梦幻，是个竭力追求而不断推迟的计划，是个永远不可到达的极限，它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唯有恶能到达极限，能绝对地统治，应该为恶效劳，以便建立起它的王国，然后再考虑干什么，然后是什么意

愚，就是说，唯有恶是现实的，打倒欧洲，打倒理性，打倒荣誉，打倒十字架。对，对我的主人们的宗教我要改宗，对，对，我是奴隶，但假如我也作恶，那我也就不再是奴隶了，尽管我的脚被绑住了，我的嘴变哑了。啊！热得我要发狂了，沙漠被不堪忍受的阳光照得噼啪直响，而他，另一位上帝，温情的上帝，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气得翻白眼，我背弃了他，因为现在我认识他了。他想入非非，他想撒谎，人家就割了他的舌头，让他再不能说话欺骗别人，人家用钉子钉他，直钉进脑袋里，他那可怜的脑袋啊，就象现在我的脑袋一样，多乱呀，我真累，大地没有震动，我肯定，人们杀掉的不是一个义人，我不相信，没有什么义人，只有使无情的真理统治一切的作恶的主人。是的，唯有偶像有强权，它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神，恨是它的命令，是一切生命的泉源，是清凉的水，象冰嘴烧胃的薄荷酒一样清凉。

“于是，我变了，他们也知道我变了，我遇见他们时就吻他们的手，我成了他们的一员，崇拜他们没个够，我信任他们，我希望他们也割掉我的同胞们的舌头，就象他们割掉我的一样。当我知道传教士要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该如何行动。那一天和其他的日子一样，也象那些继续了这么久的日子一样，阳光晃得什么也看不见。傍晚时分，人们看见一个守卫在盆地的高处奔跑，不一会儿，我被拖到大门紧闭的偶像堂前。一个人把我按在一个阴暗角落的地上，用十字形的短剑威胁我，没有人说话，直到一阵陌生的声音充满了平时安静的城市，我听了半天才认出那说话的声音，原来那是我的语言，然而这种声音一起来，那刀尖就贴近了我的眼睛，守卫一声不响地盯着我。我听见两个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一个问道，这间屋子为何有人把守，是否要破门而入，我的中尉，另一个说‘不行’，语气生硬，

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达成了一个协议，城市接受二十个人驻扎，条件是在围墙之外，尊敬当地风俗。当兵的笑了，原来他们在停止抵抗而军官还不知道，总而言之，他们首先接受一个人给他们的孩子看病，那是个神甫，然后再说领土的事。当兵的说，要是没有士兵在此的话，他们会阻挠神甫的想法实现，'啊！不会，'军官说，'反正贝福尔神甫也要先于部队到达，他两天后到达此地。'我再没听到别的什么，我一动不动，在刀尖下呆若木鸡，我感到难受，好象有一个带着针和刀的轮子在我心中乱转。他们真是发疯了，他们真是发疯了，竟让人碰他们的城市，碰他们的无敌的强权，碰真正的神，而那个家伙，要到这里来的那家伙，他们将不割掉他的舌头，他将炫耀他的傲慢的仁慈，而不付任何代价，不忍受任何侮辱。恶的统治将被推迟，怀疑将依旧存在，人们还要浪费时间去梦想不可能的善，还要毫无结果地费尽气力，而不是去加速可能的世界的到来，我望着那把威胁着我的刀，啊，唯一能统治这个世界的强权啊！强权啊，城市里的声音渐渐消失，门终于开了，我独自一人与偶像作伴，失去信用，心中充满苦涩，我向它发誓要拯救我的新信仰，拯救我的真正的主人，拯救我的独裁的上帝，我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背叛。

"呶，热气退了一点，石头也不颤动了，我可以从我的窝里出来了，看看沙漠，它蒙上了一层黄色和赭石色，很快就变成淡紫色了。昨夜，我等着他们睡着。把门锁死，象平时一样，迈着可以用绳量的整齐步伐走出来，我认识路，知道从哪儿能拿到枪，也知道哪个门没有人看守，就在这星光稀疏，夜色微明，沙漠尚黑的时刻来到了这里。现在，我觉得我好象已在这片石头中间隐藏了许多许多天了。快，快，啊，他快来呀！过一会儿，他们该找我了，他们将在每一条路上飞奔，他们不知

道我是为了他们，为了更好地为他们效劳才走的，我被饥饿和仇恨弄得昏昏沉沉，两条腿也没有劲了。啊，那边，哈哈，路的尽头，有两头骆驼逐渐变大，用侧对步跑着，已经看见一点点影子了。它们用习惯的活泼而又漫不经心的步伐跑着。他们终于来了！

“枪，快，我迅速装上子弹。偶像啊，我那边的上帝啊，让你的强权得以维持，让侮辱加倍地来吧，让绝不宽容的仇恨统治这个该死的世界吧，让恶人永作主人吧，让王国来到那个举世无双的盐与铁的城市吧，在那里，穿黑衣的暴君们无情地奴役和拥有一切！而现在，叭叭，朝怜悯开枪，朝无能和它的仁慈开枪，朝推迟恶的到来的一切开枪，开两枪，他们翻身落下，骆驼直奔天边而去，一群黑色的鸟直冲上蔚蓝的天空。我笑，我笑，这一个穿着可憎的袍子的人在地上打滚，他微微抬起头，看见了我，我，脚上套着锁链的他的万能的主人，他为什么对着我微笑，我要粉碎这微笑！枪托砸在仁慈的脸上的声音多么悦耳，今天，今天终于大功告成，几个小时之后，无风的沙漠上就会到处有鬣狗东闻闻西嗅嗅，然后耐着性子一溜小跑，直奔等待它们的腐尸美餐而去。胜利了，我向天空张开双臂，天似乎也感动了，在对岸隐约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影子，啊，欧洲的夜，祖国，童年，为什么我得在这胜利的时刻流泪呢？

“他动了，不，声音是从别处来的，那边是他们，他们象一群黑色的鸟朝这边飞来了，他们朝我扑过来，抓住我，啊！啊！对，打吧，他们害怕他们的城市被攻破，害怕他们的人民在痛苦中嚎叫，害怕我会招来（我就是要招来）士兵们对神圣的城市进行报复。现在你们就自卫吧，打吧，先打我吧，你们拥有真理！啊；我的主人们，他们会战胜士兵们，他们会战胜语言和爱情，他们将重人沙漠，越过大海，用他们的黑面罩来增强欧洲的光明，往肚子上打，对，往眼睛上打，他们将把他们的

盐洒遍大陆，一切植物，一切青春都将灭绝，一群群的哑巴脚上绑着锁链，顶着真正信仰的酷热阳光，和我一起在世界的沙漠中走着，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了。啊！他们给我带来的痛苦太大了，他们的狂暴是有益的，我骑在这匹战马上，可怜我吧，他们要对我施行四马分尸，我放声大笑，我喜欢这把我钉上十字架的击打声。”

“沙漠多么宁静，夜已降临，我孤零零的，我渴。还得等待，城市在哪里，远处的这些声响，也许士兵们胜利了，不，不该如此，即便他们是胜利者，但他们还不够凶恶，他们不会统治，他们还要说应该变好，还会有几百万人处于善恶之间，无所适从，呆若木鸡，偶像啊，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一切都完了，我渴，我的身体直冒火，黑夜蒙住了我的眼睛。

“这漫长漫长的梦，我醒了，不，我要死了，天亮了，白昼的第一缕光明是给别的活着的人的，而我只有严酷的阳光和苍蝇。谁在说话，没有人，天没有放晴，不，不，上帝不对沙漠说话，可这个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它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恨和强权而死，谁会原谅我们呢？’这是我身上的另一条舌头在说话还是那个躺在我脚边不愿死的人呢？他反复地说：‘勇敢些，勇敢些，勇敢些。’啊！如果我又错了怎么办！以前曾亲如兄弟的人们啊，唯一的依靠，我多么孤独，别抛弃我吧！来了，来了，你是谁，遍体鳞伤，满嘴流血，是你呀，巫师，士兵们制服了你，那儿的盐可是杀人的，是你呀，我亲爱的主人！扔掉这副恨的面孔吧，变得仁慈吧，我们都错了，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将重建慈悲之城，我想回家。是的，帮助我吧，就是这样，伸出你的手，给……”

一把盐塞住了饶舌的奴隶的嘴。

沉默的人们

城市一大早就活跃起来了。虽说是隆冬，天气却极好，海堤的尽头，水天一色，明晃晃一片。伊瓦尔无心观看，骑着自行车，在俯瞰港口的林荫道上笨重地行驶着。他的一条瘸腿放在固定的脚镫上，一动不动，另一条腿费力地蹬着，路面还蒙着昨夜的湿气，很难走。他坐在车座上，显得那么瘦小，低着头，躲避着旧电车轨道。他常常一拧车把，让过超越他的汽车，不时地用胳膊肘碰碰腰间的挎包，那里面放着费南德为他准备的午饭。这时，他就想到了挎包里的东西，心头一阵酸楚。两大片面包中间只夹着奶酪，而不是他爱吃的西班牙式煎蛋或炸牛排。

他从未觉得上班的路这么长。他老了。他四十岁了。尽管他还象葡萄藤一样地精干，但肌肉的活力却恢复得不那么快了。有时，他读体育报道，三十岁的运动员就被称作老将，他就耸耸肩。“这就是老将了，”他对费南德说，“那我呢，我早该趴下了。”然而，他知道记者并非全无道理。三十岁上，气已经短了，只不过难以察觉就是了。人到四十，还没有趴下，是还没有，但也早就在准备着了，只不过稍稍有些提前罢了。不就是为这一原因，许久以来，他在往城那头制桶厂去的路上，不再看大海了吗？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大海是总也看不够的，大海能让

他在海滩上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尽管他瘸腿，或者恰恰因为他瘸腿，他一直喜欢游泳。后来，一年年过去了，他娶了费南德，有了一个男孩，为了糊口，他星期六在制桶厂加班，星期天帮人干零活。渐渐地，他抛却了老习惯，不再有那种运动激烈但却使人心满意足的日子了。深而清的海水，炽热的阳光，姑娘，肉体的享受，这是他的家乡仅有的幸福。而这种幸福随着青春一去不返了。伊瓦尔依然爱海，不过那只是在傍晚，在海湾里的水色稍许深了一些的时候。那个时刻是多么甜蜜啊。他下了班，坐在自家的平台上，怀着满意的心情穿着费南德熨得平展展的干净衬衣，喝着茴香酒，那杯子上还蒙着水气呢。天黑了，天空中一时间充满了一种温馨的气息，同他闲谈的邻居也骤然降低了声音。这时，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幸福，或者是不是想哭一场。至少，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是和谐的，他没有什么要做的，唯有等待，静静地等待，而他并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早晨，在上班的路上，他不再喜欢看海了，海却总是忠实地在那儿等着他，他要到晚上再看它。这天早上，他低着头骑车，比平时更吃力，因为他的心情也是沉重的。昨晚他开会回来，说他们复工了。“那么，”费南德快活地说，“老板给你们提工资了？”老板根本就没有给提工资，罢工失败了。应该承认，他们没有搞好。那是一次出气的罢工，工会不出力是有道理的。再说，十五六个工人也算不了什么，工会考虑到其它制桶厂，它们的日子不好过。不能太埋怨他们。制桶业受到船舶和罐槽车制造业的威胁，很不景气。大木桶和大酒桶造得越来越少，老是修理旧桶。的确，老板们是看到了他们的生意受到损害，但他们仍然想维持一定的利润；他们认为最简单的就是冻结工资，尽管物价上涨了。要是制桶业垮台了，制桶工人怎么办呢？千辛万苦学了一门手艺，是不能改行的；制桶手艺又难学，很

长时间才能出师。优秀的制桶工人为数很少，他得会装配弯曲的桶板，在火上用铁箍箍紧，不用棕毛或麻就箍得差不多滴水不漏。伊瓦尔会，并且颇为自豪。改行并没有什么，可放弃自己精通的、内行的手艺，那就不容易了。职业是个好职业，可就是没有出路，人被卡死了，只好忍气吞声。然而忍气吞声也不容易。难的是要闭上嘴，不能正经地讨价还价，每天早晨去上班，越来越累，到了周末，人家爱给多少就领多少，而那点儿钱是越来越不够用了。

于是，他们愤怒了。有两三个人还犹豫，可是同老板进行了第一轮谈判之后，他们也被激怒了。确实，老板冷冰冰地说，爱干不干。一个人是不能这么说话的。“他是怎么想的！”埃斯波西托说，“他以为我们会低头吗？”不过，老板人并不坏。他接了父亲的班，在厂里长大，几年来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工人。有时候，他请他们在厂里进快餐，大家点着刨花，烤沙丁鱼或猪血肠，乘着酒兴，他还是挺可亲的。过年的时候，他总是送给每个工人五瓶好酒。工人中谁有了病，或有点什么事，结婚或受洗之类，他往往会送一件银器。他的女儿出生时，人人都分到糖果。有两三次他邀请伊瓦尔到他海滨的地产上去打猎。无疑，他爱自己的工人，他常常记起他的父亲是学徒出身。但是，他从不到工人家里去，他想不到。他只想自己，因为他只了解自己，而现在居然说出爱干不干的话来。换句话说，这回是他固执了。可他嘛，他是可以这样的。

他们迫使工会同意罢工，工厂关了门。“你们别费那个劲搞纠察队了，”老板说，“工厂不开工，我还省两个钱呢。”他说得不对，但这无济于事，因为他当面对工人说，他是出于仁慈才让他们干活的。埃斯波西托气坏了，当面说他不是人。那一位也火了。他们甚至动起手来，只好把他们拉开。但是同时，工人

们也顶不住了。罢工二十天了，女人们在家里愁眉苦脸的，有两三个人泄气了，最后，工会建议让步，答应作仲裁，以加班来弥补罢工的损失。他们决定复工。当然，还得充充好汉，说是还没有完，还要再看看。然而今天早上，这股疲劳劲儿活象失败的重压，奶酪取代了肉，不容再有幻想了。多好的太阳也没有用了，对大海也再没什么想头了。伊瓦尔蹬着那唯一的脚镫，仿佛每蹬一圈他就老了一点似的。他一想到又要看到工厂、同志和老板，心情就越发沉重。费南德不安地问："你们要对他说什么？""什么也不说。"伊瓦尔骑上车，摇了摇头；他紧咬着牙，有着纤细线条的、满是皱纹的小脸也绷得紧紧的。"大家干活了，这就够了。"他骑着车，始终咬着牙，心里憋着一股阴郁的冰冷的怒气，仿佛天也阴了下来。

他下了林荫道，离开大海，拐进西班牙老区潮湿的街道。街道通到一个只有车库、废铁堆和修车铺的地方，工厂就矗立在那儿，象个大棚，下面一半是砌成的，上面玻璃窗同波形铁皮屋顶相接。工厂面对着旧制桶厂，那是个大院，里面套着几个破旧的小院，企业扩大以后，它就成了堆放旧机器和旧木桶的仓库。大院那边，隔着一条铺着旧瓦的过道，就是老板的花园了，尽头起了一幢房子。墙上长满了爬山虎，台阶上掩映着瘦弱的忍冬花，房子虽大而难看，却也还讨人喜欢。

伊瓦尔一眼就看见工厂大门紧闭。一群工人静静地站在门前。从他在这儿干活那天起，他到厂时门还关着，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老板想要显示自己的胜利。伊瓦尔拐向左边，把自行车放进连着厂房的小屋里，然后朝大门走去。他老远就认出了埃斯波西托，那是个大块头，棕色头发，遍身是毛，在他旁边干活；还有工会代表马尔库，他长着一个假声男高音的脑袋；还有厂里唯一的阿拉伯人赛义德；还有其他人。他们不说话，

看着他走过去。他还没有走近他们，他们就突然转过身去，工厂的大门开了。门启处，工头巴莱斯泰出现了。他打开一扇沉重的大门，背朝着工人，慢慢地沿铁轨推着。

巴莱斯泰在工人中年纪最大，他不赞成罢工，但是埃斯波西托一跟他说他是为老板效劳，他就不说话了。现在，他站在门旁，穿着海蓝色的毛衣，身体显得又宽又矮，已经光着脚了（只有他和赛义德是光脚干活的）。他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去，他的眼睛的颜色是那么浅，衬着一张晒黑的老脸，仿佛没有颜色似的，小胡子厚而下垂，嘴上流露出忧伤的神情。他们不说话，对于象战败者一样进厂感到耻辱，对自己的沉默感到愤怒，而沉默的时间越长，就越是不能打破。他们过去了，不看巴莱斯泰，他们知道，他让他们这样进厂是在执行命令，他的辛酸而悲伤的表情也告诉他们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伊瓦尔看了他一眼。巴莱斯泰很喜欢他，对他摇了摇头，没说什么。

现在，他们都到了入口右边的小更衣室。用白木板隔开的存衣间都打开了，木板两边都挂着一个上锁的小柜，从入口处算起最后一个存衣间靠着厂房的墙，已改装成淋浴间，夯实的地上挖了一条排水沟。厂房中间，一个个工作区放着已经做好的大酒桶，但还没有箍紧，等着在火上烤牢，还有开了大长口子的厚木长凳（有些圆桶底板，要等着刨光，嵌进几张长凳的大口子里），最后是黑乎乎的炉子。入口左边，沿墙摆着工作台，前面是一堆堆要刨光的桶板。离更衣室不远，靠右墙有两台大电锯，上了油，马力很大，静静地躺在那儿，闪闪发光。

对于在这里干活的寥寥几个人来说，厂房早就显得过于宽敞了。这在大热天里还有好处，冬天可就难受了。而今天，在这片空旷的地方，活计撂在那儿，木桶乱堆在墙角，只在下面箍了一道，上面还散着，活象一朵朵盛开的大木头花，锯末盖满

了长凳、工具箱和机器，这一切都使工厂显出一种废弃不用的样子。工人们都穿着旧毛衣和褪色的、打满补丁的长裤。他们眼睁睁地望着，一个个迟疑不决。巴莱斯泰打量着他们，说道："怎么样，动手吧？"他们不说话，一个个走向自己的岗位。巴莱斯泰一处处简短地提醒工人们，哪件活该开始，哪件活该结束。没有人吭声。很快，第一锤打了下去，敲在把铁箍嵌入木桶鼓起部分的包铁木楔上，发出了响声，刨子碰在木结上，发出吱吱声；埃斯波西托开动电锯，发出锯齿磨擦的嚓嚓声。赛义德依照吩咐抱来木板，或者点燃刨花，他们就在火上烤木桶，使铁片箍住的部位鼓起来。没有人叫他的时候，他就沿着工作台，用锤子猛敲生锈的宽铁箍。刨花燃烧的气味开始充满厂房。伊瓦尔刨光和装配埃斯波西托破好的木板，他又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心里稍稍敞亮了些。大家闷头干活，渐渐地，一种热乎劲，一种生命力，又在厂里复苏了。明亮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亮了厂房。在金光闪烁的空气中，烟雾发出淡蓝的颜色，伊瓦尔甚至听见附近有只小虫在鸣叫。

这时，对着旧厂的门朝里打开了，老板拉萨尔先生站在门口。他身材瘦长，褐发，刚过三十岁。他神情自得，一身浅灰褐色的华达呢，上装大敞着，露出白衬衣。他的脸上瘦骨嶙峋，仿佛用刀削过，但他象大多数喜欢运动的人那样，举止自然洒脱，通常总能引起好感。不过，他进门时似乎有些窘迫。他的问好声没有平时响亮，反正是没有人答理。锤声迟疑了片刻，有些杂乱，随后又更加起劲地响了起来。拉萨尔先生犹犹豫豫地迈了几步，然后朝才来了一年的小瓦勒里走去。他在电锯旁，离伊瓦尔只几步远，正把一块桶底放在一只大酒桶上。老板一直看着他干活。他一声也不吭。"喂，孩子，"拉萨尔先生说，"还行吧？"小伙子的动作突然变得更加笨拙了。他朝旁边的埃斯波

西托瞥了一眼，他正往粗壮的胳膊上一块一块地放桶板，准备给伊瓦尔送去。埃斯波西托也望了望他，一边继续干活，于是，瓦勒里又扭脸对着大酒桶，没答理老板。拉萨尔一愣，在小伙子面前呆立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转身朝向马尔库。马尔库骑在长凳上，正在小心翼翼地刮薄桶底的边缘，动作缓慢而准确。“您好，马尔库，”拉萨尔说，声音更干巴了。马尔库不理，只一心一意地刮出薄薄的刨花。“你们怎么啦？”拉萨尔大声说，转向了所有的工人。“不错，咱们是没有达成协议。可咱们还得在一块儿干活呀。这样又有什么用呢？”马尔库站了起来，举起桶底，用手掌试了试薄薄的圆边，带着非常满意的神情眯起了无精打采的眼睛，然后一声不响地朝一个正在装配木桶的工人走去。整个厂房里，只有锤子和电锯的响声。“好吧，”拉萨尔说，“等这股劲儿过去了，你们再让巴莱斯泰来跟我说。”他迈着沉着的步子走出车间。

转眼之间，在车间的嘈杂声中，铃声响了两次。刚刚坐下准备卷支烟的巴莱斯泰又费力地站了起来，朝里头的小门走去。他一走，锤子就敲得不那么响了，一个工人甚至歇手不干了，就在这时，巴莱斯泰又回来了。他站在门口，只说道：“马尔库，伊瓦尔，老板叫你们去。”伊瓦尔先想去先洗手，被马尔库一把抓住了胳膊，就一瘸一拐地跟着他走了。

外面院子里，好清新的阳光，仿佛水一样微微颤动，洒在伊瓦尔的脸上和裸露着的手臂上。他们走上台阶，掩映其上的忍冬已经开出了几朵花。他们进入走廊，墙壁上挂着各种文凭，这时，他们听见了孩子的哭声和拉萨尔先生的声音：“午饭以后，你先让她睡下，要是还不好，就叫医生。”接着，老板出现在走廊里，把他们让进那间他们已经熟悉的小办公室，里面摆着模仿乡村风味的家具，墙上装饰着体育运动的奖品。“请坐，”拉萨

尔说着，也在办公桌后面落了座。他们依然站着。“我让你们来，是因为，您，马尔库，您是代表，而你，伊瓦尔，你是我的仅次于巴莱斯泰的最老的职工。谈判已经结束，我不想旧话重提。我不能，绝对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事情已经解决了，咱们一致同意，必须复工。我看出来你们怨恨我，这使我很难受，我有什么感受就对你们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点：眼下我不能做的，也许生意有了起色我就能做了。如果我能做，不等你们要求，我就会做的。在此期间，还是让我们通力合作吧。”他不说了，仿佛在想什么，然后抬眼望着他们，说道：“怎么样？”马尔库望着外面。伊瓦尔紧咬着牙，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听我说，”拉萨尔说，“你们都很固执。这会过去的。等你们恢复理智的时候，别忘了我刚才跟你们说的话。”他站起身来，朝马尔库走去，伸出了手。“再见！”他说。马尔库的脸色陡然间变白了，他那张抒情歌手的脸沉了下来，刹那间变得恶狠狠的。他猛然掉转脚跟，走了。拉萨尔也脸色煞白，看了看伊瓦尔，没有伸出手来。“见鬼去吧！”他喊道。

他们回到车间时，工人们正在吃午饭。巴莱斯泰出去了。马尔库只说了句：“放屁，”回到自己干活的地方。埃斯波西托不啃面包了，问他们说了些什么，伊瓦尔说他们什么也没说。随后，他去拿挎包，回来坐在他干活的长凳上。他刚咬了几口，看见赛义德躺在离他不远的一堆刨花上，望着大玻璃窗出神，这时的天空不那么亮了，玻璃窗泛着蓝光。他问他是不是吃过饭了，赛义德说他吃过无花果了。伊瓦尔不吃了，心头一热，见过拉萨尔后一直不曾离开他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了。他站起身，掰了一块面包给赛义德，赛义德不要，他就说下星期一切都会好的，“你再请我好了。”赛义德笑了。他咬着伊瓦尔给他的面包，轻轻地，仿佛他不饿似的。

埃斯波西托拿来一口旧锅，用刨花和碎木燃起一小堆火，把盛在瓶子里带来的咖啡烧热。他说这是他熟悉的一个食品杂货商得知罢工失败后送给工人们的礼物。一只盛芥末的杯子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每传一次，埃斯波西托都往里面倒一些加了糖的咖啡。赛义德一气喝了，觉得比吃面包更高兴。埃斯波西托就着滚烫的锅喝了剩下的咖啡，一面咂着嘴，一面骂骂咧咧。这时，巴莱斯泰进来，说该干活了。

正当大家站起来，收拾废纸餐具，塞进挎包时，巴莱斯泰走到他们中间，突然说，这件事对大家，对他自己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也没有理由象小孩子一样行事，赌气一点儿用也没有。埃斯波西托手里拿着锅，转身对着他，他那张厚墩墩的长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伊瓦尔知道他要说什么，大家想的跟他一样，他们不是在赌气，人家封了他们的嘴，说的是爱干不干呀，愤怒和无能为力有时会使人这样痛苦，甚至喊都喊不出来。说到底，他们是男子汉，不会去装笑脸，作媚态。但埃斯波西托这些话一句也没说，他的脸终于放松了，轻轻地拍了拍巴莱斯泰的肩膀，而其他人都走开干活去了。锤声又响起来了，厂房里充满了熟悉的轰鸣声以及被刨花和汗水浸湿的旧衣服的气味。大锯轰轰地响着，啮咬着埃斯波西托慢慢推进的新鲜的木板。从咬开的地方冒出一股湿润的锯末，象面包屑一样，落满了在吼叫着的锯条两侧紧握着木板的毛茸茸的大手上。木板破开之后，就只听见发动机的轰鸣了。

伊瓦尔现在感到弯向长刨的背酸痛起来。通常疲乏要来得晚些。显然，这是因为他几个星期不活动，缺乏锻炼。但是，他也想到了年龄，在那种年龄上，手工劳动比一般要求精确性的劳动更令人感到吃力。今天的酸痛也说明他老了。靠肌肉起作用的工作最终要受到诅咒，那时它也就成了死亡的先行，出

过大力气的晚上，睡眠就恰恰和死亡一样。孩子想当小学教师，是有道理的，那些对体力劳动发表长篇大论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

伊瓦尔直起腰，想喘口气，也想驱散这些阴郁的想法，这时铃又响了。铃声响个不停，但响得奇怪，忽而短暂地停止，接着又急促地响起来，工人们都放下了活计。巴莱斯泰听着，感到惊讶，随后他拿定主意，慢慢地朝门口走去。他走后不久，铃声终于停止了。他们又干起活来。门突然开了，巴莱斯泰朝更衣室跑去，旋即出来，脚上穿着帆布鞋，在经过伊瓦尔身旁的时候，一面还在穿外衣，一面对他说："小家伙犯病了，我去叫杰尔曼。"他朝大门跑去了。杰尔曼大夫照管这个工厂，他住在郊区。伊瓦尔重复了这个消息，未加评论。大伙儿围着他，面面相觑，陷入窘境。只听见电锯发动机空转的响声。"也许没事吧，"一个工人说。他们回到原处，车间里又充满了响声，但他们放慢了手里的活儿，好象在等待着什么。

一刻钟之后，巴莱斯泰进来了，放下外衣，一句话也没说，又从小门出去了。阳光斜了，照在大玻璃窗上。过了一会儿，在电锯还没有吃上木板的间歇中，响起了救护车的喑哑的叫声，由远而近，到了跟前就停止了。片刻之后，巴莱斯泰回来了，大家拥上前去。埃斯波西托切断马达的电源。巴莱斯泰说，那孩子在她房间里脱衣服，突然跌倒，好象有人推了一把似的。"啊，是这样！"马尔库说。巴莱斯泰摇摇头，朝车间作了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不过，他的神色惶乱不安。他们又听见了救护车的叫声。他们都在那儿，在静悄悄的车间里，在透过玻璃窗洒下的一股股黄色的阳光下，粗糙的、使不上劲儿的双手垂在沾满锯末的旧长裤两侧。

下午剩下的时间过得又慢又长。伊瓦尔只是感到疲倦，他

的心一直很难过。他真该说点什么，可是他无话可说，其他人也一样。在他们无言的脸上，只有悲哀和某种固执的表情。有时候，不幸这个词刚刚在他心中形成，转眼就消失了，象肥皂泡一样方生方死。他想回家，想见到费南德、孩子，还有那平台。正在这时，巴莱斯泰宣布收工。他们不慌不忙地熄火，收拾场地，然后一个个进了更衣室。赛义德扫尾，他要打扫场地，往尘土飞扬的地上洒水。伊瓦尔到更衣室时，埃斯波西托这个毛茸茸的大块头已经钻到喷头底下了。他背对着大家，擦肥皂弄出很大的响声。平时，大家都拿他的怕羞取笑，这头大熊的确总是固执地要遮住下体。而今天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埃斯波西托倒退着走出去。用一条毛巾象缠腰布一样地裹住臀部。轮到其他人洗了，马尔库使劲地抬着自己赤裸的腰部，这时大家听见了大门的铁轮缓缓移动，拉萨尔进来了。

他的穿着和他第一次来看望他们的时候一样，但头发有些散乱。他站在门口，凝视着没有人的宽敞的车间，走了几步，又停住了，朝更衣室望着。埃斯波西托一直围着缠腰布，朝他转过身。他精赤条条，很不自在，两只脚不知如何放才好。伊瓦尔想马尔库该说句话才是。可马尔库被水团团围住，谁也看不见他。埃斯波西托抓起衬衣，飞快地穿上，这时拉萨尔声音有些嘶哑地说了声“晚安”，就朝小门走去。伊瓦尔心想应该叫住他，但门已经关上了。

伊瓦尔不洗澡了，把衣服穿上，也说了声“晚安”，他可是实心实意说的，大伙儿也以同样的热情回答了他。他很快地走了，推出自行车，上车时又感到了腰酸背痛。天快黑了，他蹬着车穿过拥挤的城市。他骑得飞快，一心想看见那老屋和那平台。他要先在洗衣房里洗一洗，然后坐下，隔着林荫道上的栏杆，眺望那已经陪了他一路的、水色深过早晨的大海。然而，

那小姑娘也陪了他一路啊，他不能不想到她。

到家时，孩子已经放学，正在看画报。费南德问伊瓦尔一切是不是顺利。他没吭声，在洗衣房里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凳子上，背靠着平台的那堵小小的墙。带补丁的衣物晾在他的头上，天空变到透明；越过墙壁，可以看见黄昏中温柔的大海。费南德端来了茴香酒，两个杯子和盛满凉水的陶壶。她在丈夫旁边坐下。他握住她的手，就象他们刚结婚时那样，对她讲了那一切。他说完了，转向大海，一动不动，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晚霞从一端飞向另一端，迅速地消失了。“啊，全怪他！”他说。他真想变得年轻，费南德也变得年轻，那他们就要走了，到大海的那一边去。

来　客

小学教师达吕望着两个人朝山上走来，一个骑马，一个步行，学校建在半山腰上，他们还没有爬上门前的那段陡峭的斜坡。广阔的高原上一片荒凉，他们踏着雪，在乱石丛中艰难而缓慢地走着。看得出来，马不时地打滑。还听不见它的声音，但看得见它的鼻孔里喷出的热气。两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是熟悉这地方的。他们沿着小路走着，这条路已经被一层又白又脏的雪盖住几天了。达吕估计半小时之内他们上不了山。天气很冷，他回到学校去找件粗毛线衣穿。

他穿过空荡冰冷的教室。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着法国的四条大河，已经朝着它们的出海口流了三天了。干旱持续了八个月，滴雨未下，却在十月中突然下起雪来，散居在高原上各村庄里的二十来个学生都不来上课了。只好等着天气转晴。达吕只在教室旁自己住的屋子里生火，这屋子也朝着东面的高原。一扇窗户，和教室的窗户一样，向南开着。从这边看，几公里之外，高原开始向南倾斜。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一道紫色的山梁雄踞在天际，那儿是沙漠的门户。

达吕暖和了一些，又转回到他刚才看见那两个人的窗前。他们不见了，他们是在爬那个山坡。夜里雪停了，现在天色不那么阴沉。清晨到来的时候，光线暗淡，云层不断升高后仍未

见怎么明亮。直到下午两点钟，天仿佛才开始大亮。但这总比近三天来的天气好多了。那三天里，天色一直黑沉沉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变幻不定的狂风摇撼着教室的双重门。达吕只好长时间地枯坐在屋子里，只是到隔壁耳房喂鸡或取煤时才出去一下。幸亏北面邻近的塔吉德村有辆小卡车，在大雪前两天给他送来了给养。四十八小时之后，小卡车还要来。

不过，即使大雪封山，他也有东西对付，小屋里堆满了一袋袋的小麦，那是政府存放在他那里的，以便分给那些家庭遭受旱灾的学生。实际上，灾难落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因为他们都很穷。达吕每天把口粮分给孩子们。他很清楚，这几天气候恶劣，他们一定缺粮了。也许，晚上会有学生的父亲或兄长来，他就能把粮食分给他们了。反正要和下一个收获季节接上气。运小麦的船已经从法国开来了，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难以忘怀的是这场灾难，这群在阳光下流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们，那连续数月干得象烧过的石灰一样的高原，那渐渐蜷缩龟裂、真象焙烧过似的土地，那一块块噼啪作响、脚一踩便化作粉末的石头。羊只成千成千地死去，这里那里也有一些人咽气，但是无人问津。

在这场灾难中，他几乎象修道士一样地生活在这所偏僻的学校里，所求无多，安于淡泊艰苦的生活。他有粗施灰粉的四壁，有狭窄的沙发，有白木书架，有井，有每周粮水的供应，他已经觉得自己象个大老爷了。可是突然下起了这场大雪，既不事先通报一声，也不等等雨水的缓解。这地方就是这样，生活是严酷的，即使没有人也是如此，有了人也无济于事。然而，达吕生于斯，长于斯，到了别的地方，他就有流落之感。

他走出房门，来到学校前面的平地上。那两个人已经爬到了半山坡。他认出骑马的人是巴尔杜克西，一个他认识已久的

老警察。巴尔杜克西用绳子牵着一个阿拉伯人，此人跟在他后老，绑着手，低着头。警察举手打了个招呼，达吕没有理会，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个阿拉伯人。那人身着褪色的蓝长袍，足登凉鞋，但穿着米灰色粗羊毛袜，头上包着又窄又短的缠头。他们越走越近。巴尔杜克西稳住牲口，免得伤了阿拉伯人，两个人一起慢慢地往前走。

走到人语可闻的距离时，巴尔杜克西叫道："从艾拉莫尔到这儿才三公里，可整整走了一个钟头！"达吕没有应声。他穿着厚厚的毛衣，显得又矮又胖，正看着他们上山。那个阿拉伯人一直低着头。他们上了平地，达吕招呼道："好啊，进来暖和暖和吧。"巴尔杜克西费劲地下了马，手里还攥着绳子。他朝小学教师微微一笑，小胡子向上翘着。他的深色的小眼睛深嵌在晒黑的额头下面，嘴的四周满是皱纹，使他具有一种专心致志的神气。达吕接过辔头，把马牵到耳房，又回到来客那里，他们已在学校里等他了。他把他们让进自己的房间，说："我去教室里生火，我们在那儿舒服些。"当他回到房间里的时候，巴尔杜克西已经坐在沙发上了。他解开了拴阿拉伯人的绳子，此人正蹲在炉子旁边，朝窗户那边望着。他的手一直绑着，绳头已推到脑后。达吕先是看到了他的大嘴唇，饱满，光滑，几同黑人；但他的鼻子高直，目光阴沉，充满了焦急的神色。缠头下露出固执的额头，被太阳晒得黝黑，此时冻得有些发白，当他转过脸来，目光直直地看了达吕一眼时，那整个脸上又不安又倔强的表情使他大吃一惊。"到那边去吧，"达吕说，"我去准备薄荷茶。""谢谢，"巴尔杜克西说，"真是一桩苦差事！我真想退休了。"他一边又用阿拉伯语对犯人说："来吧，你。"阿拉伯人站了起来，双手绑在前面，慢慢走进教室里去。

达吕端来茶，还拿了把椅子。可是巴尔杜克西已经高高地

坐在第一张课桌上了，阿拉伯人背靠讲台蹲着，面对位于讲桌和窗户中间的火炉。达吕把茶杯递给犯人，看到他的手绑着，犹豫了一下："也许可以给他松绑了吧。""当然，"巴尔杜克西说，"那是为了路上押送才绑的。"他正要起来，只见达吕已经把茶杯放在地上，双膝跪在阿拉伯人身旁。此人一声不吭，目光焦急地看着他给自己松绑。松开之后，他两手来回地揉搓着勒肿的手腕，然后端起茶杯，小口小口地迅速吸着滚烫的茶水。

"好，"达吕说，"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巴尔杜克西从茶杯里撅出小胡子："就到这儿，孩子。"

"这样的学生可真怪！你们要在这儿过夜吗？"

"不。我要回艾拉莫尔。而你，你把这个伙计送到坦吉特去。那儿有人在混合区等你。"

巴尔杜克西望着达吕，亲切地微笑着。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达吕说，"你在嘲弄我吗？"

"不，孩子。这是命令。"

"命令？可我不是……"

达吕犹豫了，他不愿意让这位科西嘉老人难过。"反正，这不是我的事。"

"嘿！这是什么意思？打起仗来，什么都得干。"

"那好，我等着宣战。"

巴尔杜克西点点头。

"好。不过，命令在此，与你也有关。现在好象局势不大稳。大家都在说要发生暴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被动员了。"

达吕还是那副固执的样子。

"听着，孩子，"巴尔杜克西说，"你要明白，我很爱你。我们十几个人在艾拉莫尔，要在象一个小省那么大的地方上巡逻，

我得回去。他们让我把这个怪物托付给你，我就立刻回去。不能把他放在那边。他村里的人闹起来了，要把他抢回去。你得在明天白天把他送到坦吉特。你这么壮，二十来公里的路吓不倒你。然后就完事大吉。你又会见到你的学生们，过着安静的日子。”

墙外传来了马的喷鼻声和马蹄的踢踏声。达吕望望窗外。天确实转晴了，陆光普照着白雪皑皑的高原、一旦积雪融尽，太阳就会重抖威风，继续烧烤这片石头地。一连多少天，总是那样蓝的天空还会把干燥的阳光倾泻到这片阒无人踪的荒凉大地上。

“说来说去，他说着转向巴尔杜克西，“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等警察开口，他又问：

“他说法语吗？”

“不，一个字也不会。我们找了他一个月，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他杀了自己的表兄弟。”

“他反对我们吗？”

“我不认为。但谁能知道呢。”

“他为什么杀人？”

“我想是家庭纠纷吧。好象是一个欠了一个的粮。弄不清楚。反正是他一砍刀杀了他的表兄弟。你知道，象宰羊一样，嚓！……”

巴尔杜克西作了个用刀抹脖子的动作，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注意，不安地望着他。达吕突然感到怒火中烧，他厌恶这个人，厌恶所有的人，厌恶他们的卑鄙的恶意，厌恶他们无休无止的的仇恨，厌恶他们嗜血成性的疯狂。

茶壶在炉子上咝咝作响。他又给巴尔杜克西倒了一杯茶，迟疑了一下，也给阿拉伯人倒了一杯。他还是那么贪婪地喝着，

他的胳膊抬起来，掀开了长袍，小学教师看见他的胸脯瘦削，但是肌肉发达。

“谢谢，孩子，”巴尔杜克西说，“现在，我走了。”

他站起来，朝阿拉伯人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

“你干什么？”达吕冷冷地问。

巴尔杜克西怔住了，给他看绳子。

“没有必要。”

老警察犹豫不决。

“随你便。你当然是有武器啰？”

“我有猎枪。”

“在哪儿？”

“在箱子里。”

“你应该把它放在床边。”

“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你疯了，孩子。如果他们造反了，谁也逃不掉，我们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啊。”

“我会自卫的。就是看见他们来了，我也有时间准备好。”

巴尔杜克西笑了，然后，小胡子突然遮住了仍旧很白的牙齿。

“你有时间？好。我也是这么说来着。你总是有点冒冒失失的。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爱你，我的儿子原来也这样。”

同时，他掏出了手枪，放在桌子上。

“留下吧，从这儿到艾拉莫尔用不了两支枪。”

手枪在漆成黑色的桌面上闪闪发光。警察朝他转过身来，小学教师闻到了他身上的皮革味和马腥味。

“听着，巴尔杜克西，”达吕突然说，“这一切都叫我恶心，首

先是你那个家伙。但是，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打仗，可以，如果需要的话。但是这样不行。”

老警察站在他面前，严肃地望着他。

“你这是干蠢事，”他慢慢地说，“我也不喜欢干这种事。尽管这么多年了，用绳子捆人，我还是不习惯，甚至感到羞耻。但是，也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啊。”

“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达吕又说了一遍。

“这是命令，孩子。我再重复一遍。”

“我知道。跟他们说我对你说过的话：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

看得出来，巴尔杜克西在努力思索。他望着阿拉伯人和达吕。他终于下了决心。

“不，我什么也不对他们说。如果你要背弃我们，那随你的便，我不会揭发你的。我接到命令押送犯人，我执行了。你现现签字吧。”

“这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否认你把他送到我这里来的事。”

“别对我这么不好。我知道你会说真话的。你是本地人，你是个男子汉。但你得签字，这是规矩。”

达吕打开抽屉，拿出一小方瓶紫墨水，一支红色木杆的钢笔，上士牌的笔尖，这是他用来写示范字的。他签了字。警察小心地将公文折好，放进皮包，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送送你，”达吕说。

“不必，”巴尔杜克西说，“礼貌没有用。你让我下不来台。”

他看了看站在原地不动的阿拉伯人，愁眉苦脸地吸了吸鼻子，转身朝大门走去，说道：“再见，孩子。”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巴尔杜克西在窗前露了一下头，随即消失了。他的脚步声淹没在积雪中。马在墙外骚动，鸡群受惊。片刻之后，巴尔杜克

西牵着马，又重新打窗前走过。他没有回头，径直朝斜坡走去，不见了，马也跟着不见了。一块巨石缓缓地滚动，发出了响声。达吕朝犯人走去，那犯人没有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达吕用阿拉伯语说了句："等着，"就朝房间走去。在他跨过门槛的当儿，又改变了主意，回转身来，从桌上拿起手枪，装进口袋。然后，他没有掉头，进了房间。

他久久地躺在沙发上，望着暮色四合的天空，听着寂静无声的四周。正是这寂静，使他在战后初来此地时感到难受。起初，他要求在山梁脚下的小城里给他一个位置。那座山梁横亘在沙漠和高原之间，一道道石壁，北面是绿色和黑色的，南面是玫瑰色和淡紫色的，划出了永恒的夏天的边界。后来，他被任命到更北的地方，就在这高原之上。开始时，在这片只长石头的不毛之地，孤独和寂静使他感到痛苦。有时候，他看到地上有些沟垅，还以为有人种庄稼，其实那是为了找盖房子的石头才挖的。这里，耕耘只是为了收获石头。有时候，村民们也刮走一些土，堆在坑里，以后再上在贫瘠的菜园里。这地方就是如此，四分之三的土地上全是石头。城镇在这里诞生，繁荣，然后消失；人来到这里，彼此相爱或相互厮杀，然后死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客人，都无足轻重。然而，达吕知道，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和他都不能真正地生活下去。

他站起身来，教室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一阵真诚的喜悦涌上心头，他感到惊奇，因为他居然想到阿拉伯人可能已逃之夭夭，他又要幽居独处而无须下什么决心了。然而，犯人还在，只不过是直挺挺地躺在炉子和写字台中间了。他睁着两眼，望着天棚。这种姿势使他的厚嘴唇更显眼了，一副赌气的样子。"跟我来，"达吕说。阿拉伯人站起来，跟他进了房间。小学教师

指了指窗户底下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阿拉伯人坐了下来，眼眼一直盯着他。

“饿了吗？”

“嗯，”犯人说。

达吕摆上两副餐具。他拿来了面粉和油，在盘子里做了一张饼，点着了小煤气炉。饼在炉子上烤着，他又从耳房里拿来了奶酪、鸡蛋、椰枣和炼乳。饼烤好了，他把它放在窗台上晾着，又把炼乳兑上水加热，最后摊了几个鸡蛋。他在干这些活的时候，碰着了装在右边口袋里的手枪。他放下碗，走进教室，把手枪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当他回到房间的时候，天已黑了。他点上灯，给阿拉伯人端来饭。“吃吧，”他说。阿拉伯人拿起一块饼，很快放到嘴边，却又停住了。

“你呢？”他问。

“你先吃，我一会儿也吃。”

阿拉伯人微微张开厚嘴唇，迟疑了片刻，随即决然地大口吃起来。

阿拉伯人吃完了，望着小学教师。

“你是法官吗？”

“不是，我看守你到明天。”

“为什么你跟我一块儿吃饭？”

“因为我饿了。”

阿拉伯人不说话了。达吕起身出去，从耳房里拿来一张行军床，在桌子和炉子之间摆好，与他自己的床垂直。他还从立在墙角当书架用的大箱子里拉出两条被子，铺在行军床上。他停下来，觉得没什么可干的了，就在床上坐下来。的确没什么可干的了，也没什么可准备的了。应该好好看看这个人。于是，他端详起他来，试图想象出一张怒火中烧的脸。不成。他只看

到一种既阴沉又明亮的目光和一张兽性的嘴。

“你为什么杀了他?”他问，声音中的敌意使他自己都吃了一惊。

阿拉伯人掉开了目光。

“他逃跑。我在后面追。”

他抬眼望着达吕，目光中充满了一种痛苦的探询。

“现在，他们要把我怎么样呢?”

“你害怕了?”

阿拉伯人绷紧了脸，眼睛望着别处。

“你后悔了?”

阿拉伯人看了看他，张着嘴。显然，他不懂。达吕被激怒了。同时，他的圆滚滚的身体夹在两张床之间，他觉得自己既笨拙又做作。

“你睡在那儿，”他不耐烦地说，“那是你的床。”

阿拉伯人不动，他叫住达吕：

“喂！你说！”

小学教师看了看他。

“警察明天还来吗?”

“不知道。”

“你跟我们一起吗?”

“不知道。为什么?”

犯人站了起来，躺在被子上，两脚朝着窗户。电灯光直照着他的眼睛，他立刻就闭上了。

“为什么?”达吕站在床前，又问了一遍。

阿拉伯人顶着耀眼的灯光睁开眼睛，竭力不眨眼地望着他。

“跟我们一起吧，”他说。

夜半时分，达吕还没睡着。他早就脱光了衣服上了床，平

时他总是光着身子睡觉的。但他现在不穿衣服躺在房间里，却犹豫了。他觉得自己不堪一击，真想起来穿上衣服。随后，他耸了耸肩膀，他见过的多了，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把对手打成两截的。他躺在床上就能监视那个人。那人平躺着，始终一动不动，在强烈的灯光下闭着眼睛。达吕关了灯，黑夜仿佛顿时凝固了。渐渐地，黑夜又活动起来，窗外，没有星星的天空在轻轻地晃动。他很快就辨认出眼前躺着的那个躯体。阿拉伯人一直没有动，但此时他的眼睛好象睁开了。小学校周围，吹过一阵微风。它也许会驱散乌云，那么太阳就又会露面了。

夜里，风紧了。母鸡轻轻地骚动了一阵，随即平静下来。阿拉伯人侧过身子，背朝着达吕，达吕似乎听见他叹了口气。他观察他的呼吸，那呼吸更有力，更均匀了。他倾听着这近在咫尺的喘息声，睡不着觉，沉入遐想之中。近一年来，他都是一个人睡在这间房里，现在多了一个人，他感到别扭。而且还因为这个使他必然生出一种友爱之情，而这正是他在当前的情势中所不能有的，他很清楚：睡在一个房间里的人，士兵也好，囚徒也好，彼此间有着一种奇特的联系，每天晚上，他们脱去甲胄和衣服，彼此间的差别消除了，一起进入那古老的梦幻和疲劳之乡。但是，达吕翻了翻身，他不喜欢这类胡思乱想，该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阿拉伯人不易察觉地动了动。达吕还没有睡着。阿拉伯人又动了一下，达吕警觉起来。阿拉伯人几乎象梦游者一样，缓缓地抬起了胳膊。他在床上坐起来，不动，等了等，并未朝达吕转过头来，好象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达吕没有动，他刚刚想到手枪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最好是立即行动。不过，他仍在观察。阿拉伯人象刚才一样，悄无声息地把脚放在地上，等了等，然后慢慢直起身来。达吕正要叫住他，他已经走动了，这一次动作很自然，但是脚步非常轻。他朝着

通向耳房的门口走去，小心地拉开门闩，出去了，只带了一下门，并没有关上。达吕没有动，只是想："他逃了。这下可轻松了！"他竖起了耳朵。鸡没有动，这么说他已经出去了。一阵微弱的水声。阿拉伯人又回来了，仔细地关好门，悄悄地上了床。这时，达吕才恍然大悟。于是，他转过背去，睡着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在沉睡中听见学校周围有轻轻的脚步声。"我在作梦，我在作梦！"他心想。他又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一股清冽纯净的空气从没有关严的窗缝里钻了进来。阿拉伯人蜷缩在被窝里，张着嘴，睡得正香。达吕推了推他，他一惊，一骨碌爬起来，死盯着达吕，好象认不出来似的，其惊恐之状使达吕不由得退了一步。"别怕，是我，该吃饭了。"阿拉伯人点了点头，说："好。"他的脸上恢复了平静，但是表情仍然是茫然的，冷淡的。

咖啡已经煮好。他们俩双双坐在行军床上，喝着咖啡，啃着烤饼。然后，达吕把阿拉伯人领进耳房，指了指水龙头，让他洗脸。他自己回到房间，叠好被子和行军床，又整理了自己的床，收拾了房间。他穿过校园，来到平地上。太阳已经升上蓝天，温柔而明亮的阳光洒满了荒凉的高原。陡坡上，有些地方的积雪已经融化。石头又要露出来了。他蹲在高原边上，凝视着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他想到了巴尔杜克西。他伤了他的心，可以说是把他赶走了，好象他不愿意作一条船上的人似的。警察的告别还在他耳畔回响，不知为什么，他此时感到出奇地空虚和脆弱。这时，从学校的另一端传来了犯人的咳嗽声。达吕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听着，他生气了，愤愤地扔了一块石头，那石头在空中呼啸一声，钻进雪里。这个人的愚昧的罪行激怒了他，可是把他交出去，又有损荣誉，甚至连想一想，他都觉得是奇耻大辱。他咒骂自己的同胞，他们把这个阿拉伯人交给他，

他也咒骂这个人，他竟敢杀人，却不知道逃走。达吕站了起来，在平地上转来转去，又站住不动等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学校。

耳房里，阿拉伯人正弯腰对着水泥地，用两个手指头刷牙。达吕看了他一眼，说："跟我来。"他带着阿拉伯人进了屋。他在毛衣外套了一件猎装，穿上行军鞋。他站在那儿等着阿拉伯人戴上缠头，穿上凉鞋。他们走进校园。达吕指着大门对他的同伴说："走吧。"阿拉伯人不动。达吕又说："我一会儿就来。"阿拉伯人出去了。达吕回到房中，拿了些面包干、椰枣和糖，包成一包。在教室里，他临走时在写字台前犹豫了一下，随后跨过门槛，走出大门，把门关紧。"从那儿走，"他说。他朝东走去，犯人跟在后面。他又折回，察看了一下房子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阿拉伯人望着他，好象大惑不解。"走吧，"达吕说。

他们走了一小时，在一座石灰岩的尖峰旁停下休息。雪化得越来越快，太阳立即将一个个小水坑吸干，飞快地清扫着大地，高原渐渐变干，象空气一样颤动起来。他们重新上路的时候，土地已经在他们脚下咔咔作响了。前面远处，一只鸟劈开天空，发出一阵欢快的鸣叫。达吕深深地吸了口气，啜饮着清凉的阳光。蓝天如盖，到处是金黄的色调，面对这片亲切辽阔的大地，达吕心中兴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们沿着斜坡往南又走了一小时，来到一个岩石松脆的平坦高地上。高原从这儿开始倾斜，向东伸向一片低洼的平原，几株枯瘦的树木历历在目，向南伸向大片的岩石堆，使景色显得参差错落。

达吕朝这两个方向审视了一番。远处，只见天地相接，没有一个人影。他朝阿拉伯人转过身来，后者正茫然注视着他呢。达吕把包裹递他，说道："拿着吧，里面是椰枣、面包和糖。你可以坚持两天。这儿还有一千法郎。"阿拉伯人接过包裹和钱，双手捧在胸前，好象不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才好似的。"现在你

看，”达吕指着东方对他说，“那是去坦吉特的路。你走两个小时就到了。在坦吉特有政府和警察局，他们正等着你呢。”阿拉伯人望着东方，仍然把包裹和钱捧在胸前。达吕抓住他的胳膊，粗暴地拉着他转向南方。在他们所处的高地的脚下，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一条路。“那是穿过高原的路。从这儿走一天，你就可以找到牧场，开始见到游牧人了。根据他们的规矩，他们会接待你，保护你的。”阿拉伯人转向达吕，脸上透出某种恐惧的表情。“听我说，”他说。达吕摇了摇头：“不，别说了。现在，随你吧。”他转身朝学校的方向跨了两大步，以一种犹豫不决的神情看了看呆立不动的阿拉伯人，走了。有好几分钟，他只听见自己踏在冰冷的土地上的脚步声，很响亮，他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回头看了看。阿拉伯人还站在高地边上，胳膊已经放下，他在望着小学教师。达吕觉得喉咙一紧。他烦躁地骂了一句，用力挥了挥手，又走了。他走出很远之后，又停下看了看。小山上已空无一人。

太阳已经相当高了，晒得他的前额火辣辣的。他犹豫了片刻，又转身往回走了。开始时步履迟疑，随即变得坚定。他走近小山，汗流浃背。他奋力攀登，上得山顶，已是气喘吁吁了。南面，蓝天下一片山石赫然在目，东面平原上却已升起一片热腾腾的水气。在那片薄雾中，他发现阿拉伯人正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慢慢走着，他的心收紧了。

过了一会，小学教师伫立在教室的窗前，茫然地望着那一片从高空奔泻到整个高原上的灿烂阳光。在他身后的黑板上，他刚刚看到，曲曲弯弯的法国河流之间，有一行写得很笨拙的粉笔字：“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偿还这笔债。”达吕凝视着天空、高原和那一片一直伸向大海的看不见的土地。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

约　拿

——或工作中的艺术家

把我扔进大海吧……因为我知道，是我把这场大风暴引向了你们。

《旧约·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

吉尔贝·约拿是个画家，自认为福星高照。尽管他尊重别人的信仰，甚至怀有某种钦佩之情，却还是只相信自己的福分。既然他本人的信念在于模模糊糊地承认他会无功而受禄，那么，这信念就并非不是一种美德。所以，当他三十五岁左右，十几位批评家突然争夺起发现他的天才的光荣时，他丝毫不表惊讶。他的坦然，虽然有人归之于自满，却被圆满地解释为自信的谦逊。约拿所正确对待的，与其说是他的成就，不如说是他的时运。

然而当一位画商向他提出按月付款，使他摆脱一切后顾之忧的时候，他却有些愕然了。建筑师拉多，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约拿和他的运气，他白费唇舌地向约拿说明，这份月钱只能给他带来一种勉强过得去的生活，而那画商却无所破费。“凑合吧，”约拿说。拉多能够事事成功，全凭自己的艰苦努力，于是

严辞责备他的朋友："什么，凑合？应该讨讨价啊。"毫无用处。约拿暗暗感谢自己的时运。"随您的便吧，"他对画商说。他放弃了他在父亲的出版社中的职务，专事绘画。"这可是个运气！"他说。

实际上，他想的是："这是个长远的运气。"他在记忆中追溯得越久远，越觉得自己交上了好运。他对双亲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感激之情，首先是因为他们漫不经心地抚养了他，他才有工夫想入非非，其次是由于他们因男女关系问题而离异。这至少是父亲提出的理由，只是他忘了说清楚那是一种特殊的奸情：他的妻子真是世间一位女圣人，天真地献身于受苦受难的人们，他忍受不了妻子的善举。丈夫认为有权支配妻子的贞操。"我可受够了穷人的欺骗。"这位奥赛罗说。

这场误会使约拿获益匪浅。他的父母读过或听说过人们能举出的若干残忍的谋杀，其源盖出于父母的离异，因此竞相溺爱他，目的在于将如此恼人的演变扼杀在萌芽状态。他们认为孩子心灵上受到了打击。打击的后果越是不明显，他们就越是感到不安，因为最深的摧残往往是看不见的。只要约拿说对自己和自己的一天稍微感到满意，父母每日的不安就接近疯狂。他们于是加倍体贴，孩子从此不再有所希求。

约拿的所谓不幸终于使他在朋友拉多身上得到了一个忠实的兄弟。后者的父母同情这个小同学的厄运，常常邀请他。他们的怜悯的话语激起了精力充沛、爱好体育的儿子保护这孩子的愿望，他早就很赞赏他这位同窗无所用心而获得的那些成绩。约拿也象接受其它东西一样，以一种令人鼓舞的单纯接受了这种交织着钦佩和恩赐的友谊。

约拿没有经过特别的努力就结束了学业，又有幸进入父亲的出版社，找到了一个职位，并间接地发现了自己的绘画天赋。

约拿的父亲是法国最大的出版家，他认为，书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前途，而这又正是由于文化危机的缘故。“历史表明，”他说，“人们读书愈少，买书愈多。”因此，他很少阅读人家拿给他的手稿，仅仅根据作者其人或题材的现实性决定出版与否（根据这种观点，性是永远具有现实性的唯一题材，出版家最后专门出版此类书籍），仅仅忙于发现新奇的装帧款式和作毫无意义的广告。所以，约拿同整个阅稿部一样，有许多空闲时间要打发。这样，他就搞上了绘画。

他第一次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经久不懈的热情，很快就整日绘画，依然是不费力气就精于此道了。除此之外，他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几乎没能适时完婚，因为他一心扑在了绘画上。对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他只是报以善意的微笑，免得关心。幸亏有一次拉多开摩托，后面带着他，开得太猛出了事，他的右手缠上了绷带不能动，心里烦闷，这才对爱情发生了兴趣。这一点上，他认为这桩严重的事故是他走运的结果。否则，他是无暇看看值得一看的路易丝·布兰的。

然而，拉多认为路易丝不值一看。他自己身材矮小，膀阔腰圆，却喜欢高大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在这只蚂蚁身上看到了什么。”他说。的确，路易丝生得娇小，黑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然而身段苗条，模样俊俏。约拿高大结实，对这只小蚂蚁有了感情，更何况她心灵手巧呢。路易丝天性好动。这样的天赋与约拿性喜懈怠十分相合，并且十分有利。路易丝首先献身于文学，她起码以为约拿对出版感兴趣。她什么都读，杂乱无章，不多几个星期之后，她就什么都能谈了。约拿佩服她。既然路易丝告诉他足够的东西，使他知晓当代新发现的大概，他就认为自己完全不必读书了。路易丝宣称：“不应该再说某人坏或丑，而应该说他想坏或想丑。”这细微的差别很重要，不然的

话，如同拉多指出的那样，就有导致谴责人类之虞。路易丝断言，这个真理同时为爱情杂志和哲学杂志所支持，是普遍的，不容置辩的。“随你们的便，”约拿说，然而立刻忘掉这一残忍的发现，沉入到对他的时运的冥想中去了。

路易丝一旦明白了约拿只对绘画感兴趣，就立刻放弃了文学，热中于造型艺术，拖着约拿跑美术馆和画展。约拿是个淳朴的艺术家，不大懂当代人画的东西，因而感到窘迫。可他知道了这么多涉及他的艺术的东西，感到很高兴。不过，他第二天就把刚看过的作品的作者姓名忘得一干二净，这倒也是真的。然而，路易丝有理由断然提醒他注意她从事文学时期保持的一种信念，这就是：事实上人们从来不会遗忘。无论如何，时运保佑约拿，他可以坦然地兼享记忆之可靠和健忘之便利。

但是，路易丝所奉献的牺牲精神的珍宝在约拿的日常生活中闪耀出最美丽的光辉。这善良的天使使他不必去买鞋子、衣服和衬衣，对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买这些东西便缩短了本来就如此短暂的生命。她毅然决然地承受起消磨时间的机器的千百种发明，从晦涩难懂的社会保险单直到不断改变的纳税方法。“是的，这当然，”拉多说，“可是她不能替你去看牙。”她是不去，可她打电话，选择最好的约会时间；她负责清扫汽车，在假期旅馆中租房间，买煤；她亲自去买约拿打算馈赠的礼物，选择和分发他送人的鲜花，有时晚上还找出时间，趁他不在的时候，到他房间里去收拾床铺，那天夜里，他上床之前就用不着打开被子了。

她怀着同样的热情上了那张床，然后安排与区长见面，把约拿领去，组织一次遍游所有的美术馆的新婚旅行，两年后他的天才终于得到承认。虽然那个时期住房紧张，她却事先找好一套三间的房子，回来时安了家。然后，几乎一个接一个地制

造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她的计划是三个，这个计划在约拿离开出版社专事绘画后不久就完成了。

路易丝自从生了孩子，就把心思全用在他们身上了，先是一个，后来是几个。她还试图帮助丈夫，然而时间不够了。毫无疑问，她对冷落约拿感到内疚，但她的性格使她不在这些憾事上纠缠。“活该，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台。”她说。约拿对这个说法很高兴，因为他象当时的艺术家一样，希望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匠。工匠因此而稍受冷落，只好自己去买鞋。这本是情理中的事，但是，除此之外，约拿却还想引为幸事。无疑，他得作出努力去跑商店，这努力的奖赏是一小时的孤独，这使夫妇之乐增加了多少价值啊。

然而，生存空间的问题远远地超过了所有其它的家务问题，因为在他们周围，时间和空间一致地缩短和缩小。孩子们的出生，约拿的新营生，狭小的房间，月钱的菲薄不容他购买一套更大的房子，这一切只留下一片狭小的地方供路易丝和约拿两人活动。他们的房子在首都老城中一栋十八世纪住宅的第二层。遵循艺术的创新要在陈旧的环境中进行这一法则，许多艺术家都住在这一区。约拿对此深信不疑，很高兴住在那里。

要说陈旧，他的房子无论如何是够陈旧的了。但是几项很现代化的布置使其显得有独特之处，主要是在狭小的面积上给人提供大量的空气。房间特别的高，开有华丽的大窗户，如果根据其巨大的尺寸判断，肯定曾用于接待宾客和举行宴会。城市住房拥挤，房地产租金的提高，迫使一个个房主用隔板把太大的房间隔开来，成倍地增加单间，以高昂的租金租给成群的房客。他们的所谓“空气容量大”也没有少算钱。好处是否认不了的。这只是由于房主竖着隔开房间已不可能。不然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必要的牺牲，给当时正在成长的一代提供

一些安身之处的，这一代那个时候结婚的特别多，繁殖亦极盛。不过，空气的容量并不单单有好处。不便之处是冬天难以使房间暖和起来，这倒是迫使房主提高了取暖补贴。夏天，由于玻璃覆盖面积大，房间里阳光充足，因为没有百叶窗。房主疏忽了安装，无疑是窗户的高度和木工的费用使他们望而却步。反正厚窗帘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既然是由房客负担，也就没有成本费的问题了。不过，房主并不拒绝帮助房客，以不能再低的价钱提供来自他们自己店里的窗帘，房地产慈善事业实际上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平日里，这些新贵们卖布匹呢绒。

约拿对房子的好处赞叹不已，顺利地接受了不便之处。关于取暖补贴，他对房主说："随您的便。"至于窗帘，他赞同路易丝，她觉得其它窗户仍旧光着，只把卧室的窗户挂上窗帘就够了。"我们没有什么要遮遮掩掩的，"这个心地纯洁的人说。约拿对最大的房间尤其着迷，顶棚那么高，安置照明设备不成问题。房间没有台阶，由一狭窄的过道与其余两间小得多的、串在一起的房间相连。房子的尽头，厨房与厕所相邻，旁边还有极小的一间，美其名曰"淋浴室"。只要在里面竖着装一个设备，你肯一动不动地接受那有益的、喷射下来的水流，也可以算作洗淋浴吧。

顶棚确实高得异乎寻常，房间又狭小，使这套房子成为一个几乎全部镶嵌着玻璃的平行六面体，到处是门窗，家具找不到依靠，人被淹没在一片强烈的白光中，犹如立式鱼缸中的一些浮沉子。还有，所有的窗户都朝着天井，也就是说，距离不远地朝着其它同一款式的窗户，后面，几乎立刻就看得见新的一排高窗，朝向第二个天井。"这是玻璃陈列室，"心花怒放的约拿说。他们根据拉多的建议，决定把夫妇的卧室安在小房间里，另一小房间给已经在娘肚子里的孩子。大房间白天作约拿的画

室，晚上和吃饭的时候共用。当然，严格地说，他们可以在厨房里吃饭，只要约拿或路易丝愿意站着。拉多呢，他搞了大量精巧的设施。靠着活动门，可拆卸的书架，折叠桌，他竟弥补了家具的稀少，却也使这套独特的房子更象一个魔术盒子了。

可是，当那些房间里充塞着画和孩子的时候，就该立刻考虑新的设施了。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前，约拿确是在大房间里作画，路易丝在小房间里织毛衣，两个孩子占着第三个房间，过得舒舒服服，他们还可以在整套房子里乱滚。他们决定把新生儿安置在画室里，约拿用画布隔出了一个角落，如同一道屏风，好处是可以听见孩子的动静，能够回答他的呼唤。不过，约拿从不需要动一动；因为路易丝总是抢先而至。她不等孩子喊起来就进去了，百般小心，总是蹑手蹑脚。这种谨慎使约拿大为感动，一天，他请她放心，他不是那么敏感，他完全可以在她的脚步声中作画。路易丝回答说那也是为了不吵醒孩子。约拿对她这样流露出一颗母亲的心十分钦佩，对自己的误解开心地笑了。他一时不敢说路易丝小心翼翼地进来比径直闯人更碍事。所以更碍事，首先是因为持续的时间更长，其次是她进来时的哑剧式的姿态不能不引人注意：两臂大张，上体稍向后仰，腿抬得很高。这种作法有时违背了路易丝的初衷，因为她随时都有可能把画室里摆满了的画勾下一幅来。于是孩子闻声而醒，用相当有力的方式表示不满。儿子的肺活量使父亲大为高兴，他跑过去爱抚一番，随即又有妻子接替上去。于是，约拿挟起画布，然后手里拿着画笔，着了迷似地听着儿子持久的、威严的嗓音。

那也是约拿的成功使他广交朋友的时候。这些朋友在电话里出现，或是猝然来访。经过反复考虑，电话安在画室，经常响铃，总是破坏孩子的睡眠，哭声与急切的铃声响成一片。如

果碰上路易丝正在照顾其余的孩子，她就带着他们跑过来，多半是发现约拿一边弄着孩子，一边拿着画笔和听筒，电话里人家热情地约他午餐。人们愿意和他一块儿吃中饭。闲聊聊，约拿是又惊又喜，但他更喜欢晚上出去，以便有一个完整的工作日。可惜，大部分时间，朋友只是请吃午饭，而这一次，他的朋友又是只有请吃午饭的空闲；他一定要请亲爱的约拿吃这顿午饭。亲爱的约拿接受了，"随您的便！"挂了电话："此君真好！"把孩子交给路易丝。然后，他继续工作，很快又被午饭或晚饭打断了。他得移开画布，打开改进了的折叠桌，同孩子们一起坐下。吃饭时，约拿还一只眼睛盯着未完成的画，至少是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发现孩子们嚼得、咽得有点儿慢，吃饭的时间拖得过长。但是，他在报上看到，要消化得好，应该细嚼慢咽，从此，他就在每顿饭中找出理由来长时间地高兴。

有时候，他的新朋友们来访。拉多只是晚饭后才来。白天他在办公室，再说，他知道画家借助阳光来工作。但是，约拿的新朋友几乎都是艺术家或批评家之类。有些人画过了，有些人将要画，其他的则致力于已经画成的或将要画成的东西。当然，他们都把艺术工作看得很高，抱怨现代世界的组织使进行上述工作和进行沉思变得如此困难，而这些对艺术家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整整几个下午都在抱怨，一边请求约拿继续工作，如同他们并不在那儿一样，随便对待他们好了，他们并非资产者，知道艺术家的时间的价值。有这样能接受别人当面工作的朋友，约拿很高兴，就回到他的画前，不断回答人家向他提出的问题或对人家跟他讲的故事发笑。

这样的性格使朋友们越来越随便。他们的好兴致如此实在，竟连吃饭的时间都忘了。孩子们的记性却更好一些。他们跑着，加入人群，喊着，在照看他们的客人的膝上跳来跳去。从天井

露出的一方青天上撒下的光线终于西斜了，约拿放下了画笔。他只须请朋友们随便吃点，继续谈至深夜，当然是谈艺术，但特别是谈那些没有天分的画家、剽窃者或追名逐利者，他们都不在场。约拿喜欢早起，好利用早晨的光线。他知道这不容易，早饭往往不能按时准备好，自己也很疲倦。但是，他也很高兴一个晚上知道那么多东西，虽然看不出来，却也不会不对他的艺术有所裨益。“在艺术上，如同在自然界里，什么都不白丢，”他说，“这是时运的结果。”

有时候，朋友中还加上弟子，因为约拿现在自成一派。他先是感到惊讶，看不出人家能从他那儿学习什么，他自己还一切有待发现呢。他作为艺术家是在黑暗中行进，如何能指出正确的道路呢？但是，他明白得相当快，一个弟子并非一定是某个想学习什么东西的人。相反，更为经常的是，人们作弟子，是出于教导先生的无私的乐趣。从此，他可以谦卑地接受这份额外的荣幸。约拿的弟子向他长时间地解释他所画的东西及其缘由。这样，约拿在他的作品里发现了许多自己都有些惊讶的意图和许多他没有画进去的东西。他自觉贫乏，幸亏这些弟子，他才一下子丰富起来。有时候，面对如许迄今未曾发现的财富，一丝骄傲之感掠过心头。“这毕竟是真的，”他心里说，“背景上的这张面孔，最为引人注目。我不大明白他们说的间接人道化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了这效果，我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然而，很快地，他把这使他不便的师傅身分归于时运。“这是走了运，我啊，我还是在路易丝和孩子们身边。”他说。

弟子们还有另外的用处：他们强迫约拿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们在言谈中把他看得很高，特别是他工作上的认真和能力，因此，任何嗜好对他来说都是不允许的。所以，他改正了在解决一个难点和重新投入工作之间啃几口糖或巧克力的老习惯。

尽管如此，在一人时，他还是偷偷地向这嗜好屈服一下。但是，弟子和朋友几乎无时不在，这帮了他的忙，当着他们的面，他为嚼巧克力而难为情，何况，他也不能为这点小小的嗜好而中断有趣的谈话啊。

还有，弟子们要求他忠于他的美学。约拿对于自己的美学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他竭力想获得一线光明，一闪之下，真相在一片白光中出现在他的眼前，可是这光明却是愈来愈远。他的弟子们则不然，有好几种想法，既矛盾又坚决；这方面他们是不开玩笑的。有时约拿喜欢随心所欲，这是艺术家谦卑的朋友。但是，弟子们在几幅和他们观点不符的画前皱眉头，迫使他更多地考虑考虑他的艺术，而这才是有益的。

最后，弟子们以另一种方式帮助约拿，即强迫他对他们自己的作品提出看法。事实上，每天他们都拿来几幅草图，放在约拿和他的正在进行的画中间，以便让草图享受最好的光线。必须发表意见。直到那时为止，约拿总是暗自羞愧，他没有高深的见解来判断一件艺术品。除了几幅激动他的画和那些明显的涂鸦之作外，一切他都觉得既有趣又无所谓。因此，他必须建立起一个评语的武器库，还得五花八门，因为这些弟子，如同首都的所有艺术家一样，都多少有些才能，当着他们的面，他得表示出足够的细微差别，以使每个人都满意。这种幸福的义务迫使他具备一套词汇和对自己的艺术有一定看法。不过，他天生的善良并未因此而变得尖酸刻薄。他很快就明白了，弟子们要求于他的并不是批评，那对他们没有用，他们只要鼓励，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赞扬。只是赞扬要因人而异。约拿不再满足于惯常的可亲。他还要做到亲切巧妙。

光阴流逝，约拿就这样在朋友和弟子中间作画，他们坐在以画架为中心而安置的椅子上。经常也有邻居出现在正面的窗

前，加入到他的观众中间，他和人们讨论着，交换着看法，观摩着交给他的画，对走过的路易丝笑笑，安慰安慰孩子，热情地接电话，永远也不放下画笔，不时地在已经开始的画上抹上一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生活很充实，所有的时间都被用上，他感谢命运，它使他免除烦恼。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要画满一幅画需要许多笔，他有时想，烦恼也有好处，既然它使人们努力工作来加以逃避。可是，他的朋友愈是变得有趣，他的作品反而愈见其少。即便在他全然一人的极少时刻里，他也感到疲倦，工作进度不快。在这种时候，他只能幻想一种新的安排，将友谊的乐趣和烦恼的好处调和起来。

他对路易丝吐露了心事，路易丝则因头两个孩子长大了，他们的房子越来越狭窄而不安。她建议把他们安置在大房间里，用一道屏风遮住床，把小的搬到小房间去，他也就不会被电话吵醒了。由于婴儿不占地方，约拿可以把小房间当作画室。大房间白天作为接待客人之用，约拿可以来来去去，看朋友或作画，确信他需要独自一人会得到谅解。还有安排大孩子睡觉也可以缩短晚会的时间。“妙极，”约拿考虑之后说。“还有，”路易丝说，“如果你的朋友走得早，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呆一会儿。”约拿望着她。路易丝的脸上掠过一丝悲哀。他感动了，拥抱着她，满怀柔情地吻了她，她如醉如痴，他们一时幸福得如同新婚的日子里一样。可她又犹豫了：房间也许对约拿来说是太小了。路易丝抓起一把卷尺，他们发现，由于房间里摆满了他的画和多得多的弟子们的画，他平时工作的地方几乎不比今后单独给他的地方大。约拿立刻开始挪地方。

由于运气，他愈是画得少，名气愈是大。人们等待着他的每一次画展，事先就表示祝贺。也真有少数批评家，其中两位是他的画室的常客，以某种保留减弱了他们评述的热情。但是，

弟子们的愤怒弥补了这小小的不幸。当然，他们强调指出，他们把第一阶段的作品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但是目前的探索准备着一场新的革命。约拿责备自己每当人家颂扬他初期作品时所感到的轻微不快，真正诚心诚意地感谢他们。只有拉多埋怨说："这些家伙真奇怪……他们喜欢您象座雕像，一动不动。依了他们，就不用活了！"但是，约拿为弟子们辩护："你不能理解，"他对拉多说，"你呀，我画什么你都喜欢。"拉多笑了："见鬼。我喜欢的不是你的画。是你的绘画艺术。"

无论如何，这些画继续受到喜爱，在一次受到热烈欢迎的画展之后，画商主动提出增加月钱。约拿接受了，并表白了他的感激之情。"听您这样说，"画商说，"人们会以为您重视金钱呢。"如此的善良征服了画家的心。然而，他请求画商允许他把一幅画作一次义卖时，后者表示不安，想知道那是否是一次"赢利"的义卖。约拿不知道。画商于是建议老老实实地遵守合同，合同赋予他以卖画的独家特权。"合同就是合同。"他说。合同中没有规定义卖。"随您的便，"画家说。

新的安排使约拿十分满意。事实上，他可以相当经常地独自一人，以便回答他收到的大量信件，他的礼貌使他不能不答复。有些是关于他的艺术的，另一些要多得多，是关于通信人个人的，或是想在自己的画家的志愿方面得到他的鼓励，或是要求金钱方面的主意或帮助。随着约拿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杂志中，他也被要求，象所有的人一样，参予揭露令人愤怒的不公正的事情。约拿复信，写关于艺术的文章，表示谢意，出主意，在人家给他的正义的抗议书上签字。"你现在搞政治了？让作家和丑姑娘们干吧！"拉多说。不，他只在那些声明与党派观点无涉的抗议书上签字。然而，所有的抗议书都宣称具有响哨哨的独立性。约拿一星期一星期地拖着装满信件的衣袋，信

件不断地被疏忽，不断地更新。他回答最紧迫的，它们一般来自陌生人，那些需要从容回答的信，就是说，朋友们的信，他就留到更合适的时候。无论如何，这么多的义务，不容他延宕和无忧无虑。他总是感到误了时，犯了罪，甚至他作画时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不时发生。

路易丝越来越为孩子所累，过去由约拿做的家务事现在都由她做了，弄得她精疲力尽。约拿感到难过。不管怎么说，他工作是为了乐趣，而她则承担了最坏的部分。当她跑来跑去的时候，他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电话！”大儿子喊，约拿撂下画，回来的时候放了心，电话里提醒他一次约会。“煤气！”一个办事员在门口大叫。“来了，来了！”当约拿放下电话或从门口回来时，一个朋友或一个弟子，有时是两者一起，为了结束一场开了头的谈话，一直跟着他到小房间。逐渐地，大家都成了走廊上的常客了。他们呆在那儿，闲谈，远远地招呼约拿作证，或者闯入小房间。他们一边进门一边喊：“在这儿，我们至少可以看看您，随意看看您。”约拿大为感动，他说：“真的。大家不大见面了。”他也深感自己使那些不见面的人失望，因此心里难过。那些人常常是一些他愿意碰面的朋友。但是，时间不够用，他不能什么都接受。这样，他的名誉受到了影响。“自从成功以后，他骄傲了，”人们说。“他什么人也不见了。”或者：“他除了自己谁也不爱。”不，他爱绘画，爱路易丝，孩子，拉多，还有几个人，他对一切人都有感情。然而生命短促，光阴飞逝，他的精力也有限度。难的是既要描绘世界和人，又要同时和他们一起生活。从另一方面说，他不能抱怨，也不能解释他所遇到的障碍。因为人家拍着他的肩膀说：“有福气的家伙！这是荣誉的代价啊！”

于是，信件越积越多，而弟子们对任何松懈都不宽容，上

流社会的人现在也纷至沓来，约拿认为，既然他们象众人一样能够热衷于英国王室和无休止的飨宴，也能对绘画感兴趣。事实上，那主要是些太太们，不过，她们的举止倒是十分坦率。她们自己不买画，只是把朋友带到画家家里，希望他们替她们买，然而经常失望。她们帮助路易丝，特别是帮她为客人们准备茶水。茶杯经过一只手又一只手，穿越走廊，从厨房到大房间，最后折回，停留在画室，约拿正在几个把画室塞得满满的朋友和弟子中间作画，他放下画笔，感激地接过一位迷人的女客特意为他斟满的一杯茶。

他喝了茶，看看一个弟子刚放在架上的草图，与朋友们笑着，突然停住，求一个朋友为他寄出夜里写就的一包信，扶起跌在他腿间的二儿子①，摆好姿势照相，然后："约拿，电话！"他摇晃着杯子，一边道歉，一边穿过走廊上的人群，然后回来，在画的一角添上几笔，停下来回答那迷人的女客，当然，他要为她画一幅肖像，又回到画架前。他继续作画，然而："约拿，签名！""是什么，邮差吗？"他问。"不，是克什米尔的苦役犯。""来了，来了！"他随即跑到门口，迎接一位年轻朋友和他的抗议书，关切地打听是否涉及政治，在完全放心和因艺术家的特权造成的义务而受到责备之后，他签了名，随后又出来，人家向他介绍一位刚刚获胜的、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拳击家，或是某一国的一位最大的剧作家。剧作家看了他五分钟，用感动的目光表达因不懂法语而不能说得更清楚的东西，而约拿怀着真挚的好感频频点头。幸亏这收拾不了的局面因一位最迷人的讲道者闯入而收场，他想被介绍给大画家。约拿非常高兴，说就是他本人。他摸着口袋里的信，抓起画笔准备再画，但是先得

① 原文如此。文中三个孩子的性别有些混乱。

感谢那当儿人家送给他的一对塞特种猎狗，他把它们放在卧室里，回来接受馈赠者的共进午餐的邀请，当听见路易丝大叫时又出来，确实认识到塞特种猎狗不可能在公寓里饲养，就把它们关进浴室，它们在里面狂吠不已，直叫得大家都只好充耳不闻。越过众人的脑袋，约拿看见了路易丝的目光，他觉得这目光是忧郁的。白天终于过去了，一些客人告辞，另一些还滞留在大房间里，感动地看着路易丝打发孩子睡觉，有一个戴帽子的、仪态高贵的女人帮助她，那女人表示歉意，一会儿不得不回她的府邸去，那里生活分散在两层，远不如约拿家亲切和热闹。

一个星期六下午，拉多给路易丝带来一台精巧的衣物干燥器，可以挂在厨房的顶棚上。他发现房子里挤满了人，在小房间里，约拿被一群行家围着，正在画送狗的女人，而他自己也被一个官方艺术家画着。据路易丝说，那人根据一项国家的订货在作画。“这将是《工作中的艺术家》。”拉多缩在房间的一角看着他的朋友，看得出来，他的朋友正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一个从未和拉多见过面的行家俯身向他说：“嘿，他气色真好！”拉多不回答。“您画画，”那人继续说，“我也画。哼，相信我，他退步了。”“已经？”拉多问。“是的，这是由于成功啊，人们抵抗不了成功。他完了。”“他是退步了还是完了？”“一个艺术家退步了就是完了。看，他没什么可画的了。人家画他本人，将把他挂在墙上。”

稍后，午夜，在夫妇俩的卧室里，约拿站着，路易丝和拉多坐在床的一角，都不说话。孩子们都睡了，两只狗寄养在乡下，约拿和拉多揩干了路易丝刚刚洗过的餐具，疲倦让人感到舒服。“雇一个佣人吧，”拉多望着一堆餐具说。路易丝神情忧郁地说：“我们让她住在哪儿呢？”于是，他们就都沉默了。“你满意吗？”拉多突然问。约拿微微一笑，但是神色倦怠。“是的，大家

都对我好。”“不，”拉多说，“别相信他们。他们不都好。”“谁？”“你的画家朋友，比方说。”“我知道，”约拿说，“但是，许多艺术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生存没有信心，甚至包括最伟大的艺术家。于是，他们就寻找证据，就评判，就谴责。这样做能给他们力量，这是生存的开始。他们孤独！”拉多摇头。“相信我，”约拿说，“我了解他们。应该爱他们。”“而你呢，”拉多说，“你存在吗？你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约拿笑了：“啊！我经常想坏话，只不过我随后就忘了。”他严肃起来：“不，对我的存在我不肯定。但我将会存在，这我有把握。”

拉多问路易丝的想法。她振作了一下，回答说约拿是对的：他们的客人的看法无关紧要。只有约拿的工作才重要。她深感孩子妨碍了他。他们长大了，应该买一个长沙发，可是那会占许多地方。除了等着找到一套更大的房子时，又有什么办法！约拿看了看卧室。当然，这不理想，床太宽了。但是，白天里房间是空的。他对沉思中的路易丝说了。至少在卧室里，约拿不会受到干扰，人们毕竟还不敢躺在他们的床上。“您觉得怎么样？”她又问拉多。拉多看了看约拿。约拿正出神地望着前面的窗户。然后，他抬眼望着没有星星的天空，过去拉上窗帘。回来时，他对拉多微微一笑，挨着她坐在床上，什么也没说。路易丝显然疲倦不堪，说要去洗澡。只剩下他们俩了，约拿感到拉多的肩膀碰着他的肩膀。他没有看他，说：“我喜欢画画。我愿意画出我的全部生活，日以继夜。这不是一种运气吗？”拉多温柔地望着他：“是的，这是一种运气。”

孩子们一天天大了，约拿看到他们快活强壮，感到幸福。他们上学了，下午四点钟回家。约拿还可利用星期六下午，星期四，也可利用多而长的假期的整个白天。他们还没有大到可以安静地玩耍的年纪，但他们相当健壮，足以使房间里充满着

吵闹声和笑声。得让他们安静，吓唬他们，有时得装作要打他们的样子。衣服要保持整洁，纽扣要钉，路易丝一个人不够了。既然他们没有地方给佣人住，也不能让一个外人插进他们亲密的生活中去，约拿就提议请路易丝的姐姐罗兹来帮忙，她正守寡，一个女儿也大了。“是啊，”路易丝说，“罗兹并不妨碍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打发她走。”约拿十分高兴，这个解决方法既可减轻路易丝的负担，又减轻了他面对妻子的劳累所感到的良心不安。尤其是路易丝的姐姐常带女儿来帮忙，他更感到莫大的慰藉。母女二人的心肠是世上最好的：德行和无私在她们正直的天性中发出灿烂的光辉。她们千方百计帮助做家务，不吝惜时间。她们自己的寂寞生活和在路易丝家发现的自在的乐趣帮了她们的忙。如所预料，谁也不觉得拘束，两位亲戚从第一天起就真正感到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大房间成了公共的，既是饭厅，又是洗衣房，又是育婴室。最小的儿子住的那间小房间放画，又摆了一张行军床，罗兹不带女儿来时就睡在那上面。

约拿占了卧室，在床与窗户间的空地上作画。只不过他要等孩子们的房间收拾好之后，才收拾卧室。然后，就没有人来打扰他了，除非来找衬衣，因为家里唯一的衣柜在这间房里。客人比先前稍微少了些，他们养成了习惯，不顾路易丝的意愿，为了更好地同约拿说话，竟毫不犹豫地躺在床上。孩子们也来拥抱父亲。“让他们看看画儿。”约拿给他们看他画的画，温柔地拥抱他们，打发他们走的时候，他感到他们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占据了他整个的心。没有了他们，他只会发现空虚和孤独。他象爱画一样地爱他们，因为世界上只有他们才同绘画一样生机勃勃。

但是，约拿画得少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那样勤

奋，但他现在甚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画画也有了困难。这些时刻，他是望着天空度过的。他总是精神涣散，疲惫不堪，想入非非。他想绘画，想他的天职，就是不想画。“我喜欢绘画，”他还这样自言自语，拿着画笔的手却垂在身旁，听着远处的广播。

同时，他的名声跌落了。人们给他拿来有保留的文章，有些还说坏话，有几篇措辞之恶毒令他心碎。但是，他心里想，从这些攻击中也可获益，会促使他工作得更好。还继续上门的那些人对他也不那么崇敬了，象老朋友一样，他们无拘无束。当他想画画的时候，他们说：“咳！你有的是时间！”约拿觉得，他们已经以某种方式把他归入他们自己的失败中去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的一致也有好的东西。拉多耸耸肩膀：“你太傻了。他们不怎么爱你。”“他们现在爱我一点儿了。”约拿回答说，“一点儿爱，这已是很多了。如何得到它又有什么关系！”因此，他还尽可能地说话，写信，画画。渐渐地，他真的画了，特别是星期天下午，孩子们跟着路易丝和罗兹出去的时候。晚上，画有些进展，他很高兴。这段时间，他画天空。

一天，画商告诉他，鉴于出售明显地减少，他不得不遗憾地减少月钱，约拿同意了，但是，路易丝表示担心。时值九月，该给孩子们准备开学穿的衣服了。她自己开始作活，象往常一样勇气十足，但很快就累倒了。罗兹可以钉纽扣，可不会缝衣服。不过，她丈夫的表妹会，她来帮助路易丝。渐渐地，她在约拿的房间里呆下了，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沉默寡言，安安静静。她甚至安静到那种程度，以至于路易丝建议约拿画一幅《女工》。“好主意，”约拿说。他试了试，废了两块画布，然后就又回到已经开始了的天空上去了。第二天，他长时间地在房间里徘徊，不作画，只是沉思默想。一个弟子怒气冲冲地来

给他看一篇长文，否则他是不会看的。他看到说他的画被过高地评价了，已经过时了。画商也给他打电话，说他对销路下降感到担心。但是，他还继续幻想和沉思。他对弟子说文章中有对的地方，但是他，约拿，还寄希望于许多年的工作。对画商，他回答说他的担心他懂得，但他并不同意。他有一幅真正新颖的巨画要画，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说的时候，觉得他讲的是实话，他的运气还在那儿。好好地安排一下就行了。

此后的几天里，他试图在走廊里作画，第二天又在浴室里，利用灯光来画，第三天又在厨房里。然而，他第一次感到他到处都碰到的人妨碍了他，他不怎么认识的人妨碍了他，他的亲人、他爱的人妨碍了他。有一段时间，他停止了工作，陷入沉思。如果季节合适的话，他会对着实物画的。不幸的是，快入冬了，开春之前画风景是困难的。他还是试了试，随即放弃了，严寒直透到他心里。他一连几天呆在画布旁，经常是坐在旁边，或停立在窗前；他不画了。他那时养成了早晨出门的习惯。他计划画一静物速写，一株树，一幢歪斜的房屋，随意瞥到的一个侧影。一天过去了，他什么也没有画。相反，最微不足道的诱惑，如报纸，一次邂逅，橱窗，一杯咖啡的热气，却吸引住他。每天晚上，他都感到良心不安，摆脱不了，却又自己原谅自己。他要画，这是肯定的，经过这一段表面上的空虚之后，还要更好地画。他是在内心里工作，如此而已，福星会走出这晦暗的迷雾，焕然一新，灿烂辉煌。在等待中，他泡在咖啡馆里。他发现酒精使他兴奋，如同他在那些大力工作的日子里一模一样，那当儿，他想到他的画，心头涌起唯独在孩子面前他才感到的那种温柔热烈的感情。喝到第二杯白兰地时，他重新在自己身上发现了那种令人痛苦的激动，使他同时成为世界的主人和仆人。只不过他是在虚无中享受着它，闲着双手，没有

把它放进一幅作品中去。然而，正是这一点最接近他为之生活的欢乐，他现在坐着，想入非非，在烟气腾腾、声音嘈纷的地方消磨时日。

他躲着艺术家们常去的场所和地区。当他遇见的熟人谈起他的画时，他就惊惶失措。他想逃，这看得出来，于是他就逃了。他知道人们在他背后说什么："他自以为是伦勃朗，"他的苦恼更其加深。无论如何，他不再微笑了，他的老朋友从中得出一个奇特的、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如果他不再微笑了，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很满意。"他知道之后，越发见人即逃，满腹狐疑。他走进咖啡馆，只要感到座中有一个熟人，心中就立即阴沉下来。他呆立在那儿，浑身无力，心中充满一种奇特的悲哀，脸色阴沉，掩饰着慌乱，也掩饰着一种贪婪的、突然的对友情的渴望。他想起了拉多的善良的目光，突然转身出去。"这家伙真古怪！"有一天，正在他出去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人说。

他从此只到郊区去了，那些地方没有人认识他。在那儿，他可以说话，微笑，他的好心又苏醒了，人们什么也不问他。他交了几个不那么苛求的朋友。他特别喜欢跟其中的一个作伴，那人在他常去的车站餐厅当堂倌。这堂倌问他"平日里干些什么"。"画画，"约拿回答说。"油漆匠还是画家？"① "画家。""嗬！那很难啊。"堂倌说。然后，他们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是的，那很难，但是约拿会摆脱困难的，只要他找到如何安排工作的办法。

光阴荏苒，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又遇到了其他一些人，女人帮了他的忙。他可以在谈情说爱之前或之后跟她们聊聊，

① 法文中，绘画一词兼有涂油漆的意思，画家与油漆匠亦是同一个词故有此问题。

尤其是可以吹吹，她们理解他，即使并不信服。有时候，他觉得又恢复了力量。一天，他受到一个女友的鼓励，下了决心。他回到家里，女裁缝不在，他试图重新在房间里作画。可是，一个钟头过去了，他安置好画布，对着视而未见的路易丝笑笑，又出去了。他喝了一天，在女友家过夜，其实并没有欲望。早晨，路易丝看到他形容大变，痛不欲生。她想知道他是否占有了那女人。约拿说没有，他醉了，但是以前他曾占有过别的女人。看到路易丝的脸犹如一副突然遭到极度痛苦的溺者的面孔，他生平第一次心碎了。他这才发觉，他这一阵没有想到路易丝，他感到羞愧。他求她原谅，到此为止，明天一切将重新开始，一如先前。路易丝说不出话来，转身藏住自己的泪水。

第二天，约拿早早出去了。天下着雨，他回来的时候，浇得象个落汤鸡，扛着一捆木板。家里，有两个老朋友来探询消息，正在大房间喝咖啡。“约拿换了方式。他要在木头上画画了！”他们说。约拿微微一笑：“不是。不过，我开始画点新的。”他走到小走廊上去，走廊连着浴室、厕所和厨房。在两条走廊相接的直角处，他站住了，久久地打量着高高的，直伸到阴暗的顶棚的墙壁。需要一只梯子，他下楼到门房那儿去找。

他回来时，又多了几个人，他们很高兴又见到了他，他得与他们的友情和关于他的家庭的问话纠缠了一番，才到了走廊尽头。这时，他妻子从厨房里出来了。约拿放下梯子，紧紧地拥抱了她。路易丝望着他。“我求求你，”她说，“别再画了。”“不，”约拿说，“我要画。我得画。”不过，他象是在自言自语，目光望着别处。他干起来了。他在墙壁当中装了一块木板，好承受一个又高又深、但很狭窄的阁楼一类的东西。傍晚，一切都完工了。借助梯子，约拿吊在阁楼的木板上，作了几个引体向上，考验考验活计是否牢固。随后，他走进那些人中。看见他又如

此亲切，人人都很高兴。晚上，当房间里相对空些的时候，约拿端了一盏煤油灯，拿了一把椅子、一只凳子和一只画框。他把这些东西都搬上阁楼，三个女人和三个孩子惊讶不已地看着。“好了，”他在他的窝里说，“我将要画画而不妨碍任何人。”路易丝问他是否确信如此。“真的，”他说，“只需一点儿地方。我更自由了。有些大画家就是借助烛光来画画的，还有……”“木板结实吗？”木板是结实的。“放心呢，”约拿说，“这是个好办法。”然后，他下来了。

次日凌晨，他爬上阁楼，坐下，把画框放在凳子上，靠墙立好，等着，也不点灯。他直接听到的声音只来自厨房和厕所。其它的声音似乎从远处传来，来访，门铃，电话，往来，谈话，传到他这儿都象压低了一半，仿佛从街上或另一个天井传来。还有，当房间里充满刺眼的光亮时，他那儿的阴暗是那么令人感到舒适。不时地有一朋友来访，趴在阁楼上。“你在那儿干什么，约拿？”“我画画呢。”“没有光？”“是，暂时没有。”他不画，但他思考。在黑暗中，在这半寂静状态中，与他迄今为止一直生活着的那种状态相比，这半寂静状态在他看来如同沙漠和坟墓一般，他倾听着自己的心跳。传到阁楼的声音，尽管是对他而发，却从此与他无关了。他象那些孤零零在家中死去的人一样，他们沉沉入睡，第二天早晨，在空无一人的房中，在一具永远听不见的躯体之上，电话铃声大作，急切而执着。然而他却活着，他在自己身上听着这寂静，他等着他的星辰，那星辰还隐藏着，却准备着在这些空虚的日子的一片混乱之上，重新升起，钻出云层，其光芒经久不衰。“闪光吧，闪光吧，”他说，“不要让我失去你的光辉。”它要重新发光的，他确信无疑。不过，既然运气终于使他独处而又不离开亲人，他还得思考更长的时间。他必须发现他尚未十分明白的东西，尽管他一直知道，尽管他

一直画着，仿佛他知道似地画着。他应该明白这秘密，那不仅仅是艺术的秘密，他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他不点灯的原因。

现在，约拿每天都爬上阁楼。来客更少了，路易丝忙忙碌碌，不大有心思闲谈。约拿吃饭时下来，吃完饭又上去。他整天在黑暗中呆着，一动不动。夜里，他回到已经睡下的妻子身边。过了数日，他求路易丝把饭送上去，她关心地照办了，约拿大为感动。为了不打扰她做事，他建议她准备些吃食，存放在阁楼里。渐渐地，他白天不下去了。但是，他几乎不动那些食品。

一天晚上，他叫路易丝，要些盖的："我在这儿过夜。"路易丝仰头望着他。她张了张嘴，但没有说话。她只是不安地、忧郁地打量着约拿；他突然看到路易丝老到了何种程度，他们生活的劳顿深深地磨损了她。他于是想到，他从未真正帮助过她。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路易丝微笑了，那股柔情揪住了约拿的心。"随你，亲爱的，"她说。

从此，他就在阁楼上过夜，几乎不下去了。一下子，房子里没有来客了，因为人们白天黑夜都看不见约拿。对一些人，家人说他到乡下去了，对另一些人，当家人厌于撒谎时，就说他又找了一间画室。只有拉多还照来不误。他爬上梯子，他那大脑袋伸过木板："怎么样？"他问。"再好不过。""你画画吗？""跟画画一样。""可你没有画布啊！""那我也在画。"梯子和阁楼间的对话难以继续下去。拉多摇了摇头，下去了，帮助路易丝装装保险丝或修修锁，然后，并不登上梯子就同约拿告别，约拿在黑暗中回答："再见，老弟。"一天晚上，约拿在告别中加了一句"谢谢"。"谢什么？""因为你爱我。""真新鲜！"拉多说，随后就走了。

一天晚上，约拿叫拉多，他急忙奔来。灯第一次点着了。

约拿俯下身子，探出阁楼，神色焦急，“递给我一块画布。”他说。“可你怎么了？你瘦了，活象个幽灵。”“我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这没什么，我得画画。”“先吃点东西。”“不，我不饿。”拉多拿出一块画布。约拿在缩回阁楼的时候，问他：“他们怎么样了？”“谁？”“路易丝和孩子们。”“他们很好。如果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更好了。”“我不离开他们。特别要跟他们说我不离开他们。”说完他就消失了。拉多跟路易丝说出他的担心。她对他说她已苦恼好几天了。“怎么办？啊！我要是能够替他画就好了！”她望着拉多，十分可怜。“没有他我活不了。”她说。她的脸重新变成她少女时的脸了，拉多大为惊异。他发觉她脸红了。

整整一夜和第二天上午，灯都亮着。拉多和路易丝来看他，他只是说：“别打搅我，我画画呢。”中午，他要煤油。熏黑了的灯重又发出明亮的光芒，直到晚上。拉多留下和路易丝及孩子们一道吃晚饭。半夜时分，他来与约拿告别。在一直亮着的阁楼前面，他等了片刻，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第二天早晨，路易丝起床了，灯还亮着。

晴朗的一天开始了，但约拿没有觉察。他把画布翻过来对着墙。他精疲力尽，他在等待，他坐着，手放在膝头上。他自言自语，他永不再画了，他感到幸福。他听见了孩子们的叽咕声、水声、餐具的碰撞声。路易丝在说话。大玻璃窗在街上卡车驶过的时候一闪。世界还在，年轻而可爱，约拿听着人们发出的嘈杂声，它离得那样远，不会阻挡他身上的这股快乐的力量，他的艺术，他的思想，这说不出来的、永远沉寂的思想，在一片自由的、有生命的空气中，将他置于万物之上。孩子们在房间里跑着，小女孩笑着，路易丝也在笑，他好久没有听见她的笑声了。他爱他们！他多么爱他们啊！他熄了灯，黑暗重新笼罩，他的福星不是永远在那里闪耀吗？是它，他认出它来了，

他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当他无声无息地倒下去的时候，他还在望着它。

“没什么，”片刻之后，请来的医生说，“他工作过度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会站起来的。”“他会好的，您有把握吗？”路易丝说，颜面大变。“他会好的。”在另一个房间里，拉多看着画布，上面空空如也，只是在当中，约拿写了两个非常小的字，可以看得出来，但不知道应该读作Solitaire还是Solidaire① 。

① 这两个词，一为“孤独的”，一为“友爱的”，所差仅一个字母，两个字又非常小，故不知该读作哪一个。

生长的石头

汽车笨重地拐了个弯，红土路变得泥泞不堪。突然，车灯照处，一座铺着铁皮的木板房出现在路旁，衬着黑夜，轮廓格外分明；接着，路的另一侧又出现了一座。这一座位于路的右侧，薄雾中可以看见旁边有一座用粗大的梁木建造的高塔。从高塔的顶上伸下来一根金属缆绳，靠近接头的地方看不见，穿过灯光的部分闪闪发亮，然后它越过道路的陡坡，消失了。汽车放慢了速度，停在离木板房几米远的地方。

坐在司机右边的那个人费力地挤出车门。他那巨人般宽大的身躯晃了晃，方才站定。他疲惫不堪，沉甸甸地伫立在车旁的黑影中，仿佛在倾听发动机微弱的响声。随后，他朝陡坡走去，在车灯射出的光束中走到坡顶，停下了，夜幕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背影。过了片刻，他转过身来。仪表板的上方露出了一张发亮的黑脸，司机在微笑。那个人挥了挥手，司机熄了火。路上，林中，顿时安静了，一股凉意袭来，耳畔只余一片涛声。

那个人望着下面的大河，只看见黑乎乎一片，汹涌澎湃，间或有粼粼的波光。远处，夜色更加浓重，象是凝固了，想必那儿就是对岸了。仔细望去，在那不动的岸边，隐约可见一点发黄的火光，仿佛远处的一盏油灯。这个庞然大物转身对着汽

车，点了点头。司机关上车灯，又打开，然后有规律地闪着。明灭之间，陡坡上的人或显或隐，身影变得越发高大了。突然，河对面，一只无形的手臂举起了一盏灯，在空中上下了好几次。那个人最后挥了挥手，司机关上车灯，不再打开了。汽车和人都消失在黑夜中。熄了灯之后，大河几乎看得清了，至少可以看见那明暗相间的长长的波浪。路的两侧，黑沉沉的森林在天空中显出了轮廓，仿佛近在咫尺。小雨下了一个钟头了，打湿了道路，还在温和的空气中飘着，使得这块原始森林中的大空地更加寂静，凝重。蒙上了水气的星星在黑色的天空中颤动。

从河对岸传来了铁链声和沉闷的汩汩声。那个人一直在等着，这时，他的右边，越过木板房的钢缆绷紧了。一阵低沉的吱吱嘎嘎的响声穿过钢缆，同时，大河上也响起了划破水面的声音，那声音宽广，然而微弱。吱吱嘎嘎的声音变得平和了，水声还在扩展，渐渐清晰，这时，那盏灯大了。现在，他们清楚地看见了环绕着它的一圈发黄的光晕。光晕逐渐变大，复又缩小，灯光穿透大雾，在它的上面和周围照出了一个用干棕叶编成的四方顶棚，四角用粗大的竹子支撑着，周围有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晃动。这个粗糙的棚子正朝着河岸徐徐前进。当它快到河中央的时候，他们看清楚了，昏黄的灯光中有三个小人儿，赤着背，近乎黑色，戴着尖顶的帽子。最后，他们看见一个大而粗糙的木筏露出黑乎乎的水面。河水猛烈冲击着木筏的一侧，为了对付强有力的偏航，那三个人站着不动，两腿稍稍叉开，赤裸的上身微向前倾。渡船靠得更近了，那个人看见，棚子后面，靠近船尾的地方，有两个高大的黑人，也戴着宽大的草帽，只穿着一条染过的布长裤。他们俩肩并着肩，用尽全身的力量，压住船篙。船篙朝着木筏的后面，慢慢地插入水中，

两个黑人也以同样缓慢的动作，朝着水面俯下身去，直到快要跌下去的程度。前面那三个混血儿依然不动，不说话，望着迎面而来的河岸，并不抬眼看看等着他们的那个人。

渡船猛地撞在什么东西上，震得那盏灯直晃，借着灯光，才看见那是一个伸进水中的小码头。大个子黑人不动了，双手举在头上，紧紧握住浅浅地插进水中的船篙的一端，筋肉紧绷着，瑟瑟地抖着，那颤抖就象是来自水中，来自水的压力。其他人抛出链条，缠在码头上的缆桩上，踏上跳板，放下一种粗糙的吊桥样的东西，一块斜面板盖住了木筏的前部。

那个人回到汽车旁，进去坐好，司机开动了发动机。汽车缓缓地爬上斜坡，车灯直指天空，又指向河面，开始下坡了。汽车的闸踩得很紧，泥泞中有些打滑，停停走走。它开上了码头，压得木板跳起来，吱吱作响。它到了木板的尽头，那几个混血儿一直不作声，站在两侧。汽车轻轻地开上木筏，前轮一上去，木筏的一端就扎进水里，随即又冒了出来，汽车开上去了。司机把车开到后面，停在挂着灯的方棚子前面。那几个混血儿立刻折起斜面板，只一跳就上了渡船，随即把船撑离泥泞的河岸。河水用力地支撑着木筏，把它举上水面。木筏连在一根长长的金属杆上，慢慢地漂移，那金属杆沿着钢缆在空中移动。这时，大个子黑人不那么用力了，拉回了船篙。那个人和司机出了汽车，面朝着上游，一动不动地站在木筏上。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那些人谁也没说话，现在，他们依然各就各位，不动，也不作声，只有一个大个子黑人在用粗糙的纸卷烟。

那个人望着这片巴西莽林的缺口，这条河就从那儿钻出来，朝着他们奔泻而下，流到这里宽达数百米，挤压着浑浊而光滑的水，撞击着木筏的一侧，在其两端散开，随即伸展开来，又

变成一条强大的水流，穿过昏暗的森林，向着大海和黑夜缓缓流去。从水里，或是从吸水的空中，飘出了一股淡淡的气味。沉重的河水在渡船底下哗哗作响，从两岸传来了牛蛙的稀疏的鸣声和鸟儿的奇特的叫声。那个大块头走近司机。司机又小又瘦，倚在一根竹柱上，两手插在口袋里，那件工作服原来是蓝色的，现在沾满了红色的尘土，那种红土，他们可是吃了一整天。他微笑着，脸皱成了一团，其实他还年轻。他茫然地望着暗淡的星星，还在湿润的天上游动的星星。

鸟叫声变得更加清晰，中间还混杂着一种没听见过的鼓噪声，几乎就在这时，钢缆吱吱叫了起来。大个子黑人把船篙插入水中，象瞎子一样摸索着，寻找河底。那个人转过身去，面向他们刚刚离去的河岸。河岸被黑夜及河水蒙住了，变得宽阔而荒蛮，就象那绵延数千公里的莽莽林海。在邻近的大洋和这片林海之间，这儿个人此时漂荡在一条荒凉的河上，仿佛迷了路一样，当木筏再次撞在码头上时，真好象是经过了多日骇人的航行，一下子割断所有的缆绳，于茫茫黑夜中登上一个小岛一样。

上了岸，他们终于听见了人声。司机付了钱，他们用葡萄牙语送汽车上路，在浓重的夜色里，那说话的声音显得出奇地快活。

“他们说到伊瓜贝有六十公里。走三个钟头就到了。苏格拉底很满意，”司机说。

那个人笑了，那爽朗的笑声粗犷而热烈，就象他本人一样。

“我也一样，苏格拉底，我也很满意。路上不轻啊。”

“太沉了，达拉斯特先生，你太沉了，”司机也笑了，笑个不停。

车子开得稍微快了些，穿行在树木和纠结在一起的植物所形成的高墙之间，空气中弥漫着软绵绵的、甜丝丝的气味。萤火虫上下翻飞，不时地掠过黝黑的森林，从远处飞来的红眼睛的鸟儿，有时突然撞到防风玻璃上，间或从黑夜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啸声，司机滑稽地转动眼珠，望着他身旁的那个人。

道路拐来拐去，沿途的小河上架着摇摇晃晃的木板桥。一个小时之后，雾开始变得浓厚了，下起了霏霏细雨，车灯的光也不那么亮了。颠簸中，达拉斯特竟也迷糊着了。他们走出了潮湿的森林，又上了拉塞拉公路，他们早晨离开圣保罗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红色的灰尘不断地腾起，在这片荒原上目力所及的地方，本来就稀疏的植物都被它遮住了，到现在，他们的嘴里还留有它的味道。闷热的太阳，苍白的、遍布沟谷的群山，在路上遇见的饥饿的瘤牛，唯一的旅伴，那疲倦的、衣衫褴褛的黑秃鹫，这穿越红色荒原的漫长的、漫长的旅行啊……他惊跳起来。车子停了。他们到了日本了；道路两侧有一些房屋，屋侧点缀着不牢固的饰物，屋内是倏忽来去的和服。司机跟一个日本人说了几句话，那人穿了一件肮脏的连裤工作服，戴着一顶巴西式草帽。随后，车子又开了。

“他说只有四十公里了。”

“刚才是什么地方？东京吗？”

“不，是雷吉斯托。到我们国家来的日本人都到那儿去。”

“为什么？”

“不知道。你知道，达拉斯特先生，他们是黄种人。”

森林稀疏了些，路虽然依旧很滑，到底不那么难走了。汽车在沙子上打滑。从车门钻进了一股潮湿的、温乎乎的、带点儿酸味的气息。

“你感觉到的，”司机带着一种贪吃的口吻说，“那就是大海

呀。很快就到伊瓜贝了。”

“要是汽油够的话，”达拉斯特说。

说罢，他平静地睡着了。

拂晓，达拉斯特一觉醒来，坐在床上，惊奇地打量着这间屋子。宽大的墙壁，下半截刚刚粉刷成棕色，上半截粉刷成白色，日子可是很久了，一块块发黄的灰片一直布满了屋顶。面对面地放了两排床，一排六张。达拉斯特只看见他那一排的头上有一张弄乱了的床，床上没有人。他听见左边有声音，就朝门口转过身去，苏格拉底站在门口，笑嘻嘻地，两只手各提了一瓶矿泉水。“幸福的回忆！”他说。达拉斯特振作起来了。噢，是了，市长昨天夜里给他们安排的这家医院就叫“幸福的回忆”。“可靠的回忆，”苏格拉底继续说，“他们跟我说，先搞医院，然后再搞水。这期间嘛，幸福的回忆，就拿这辣舌头的水洗洗脸吧。”他走了，边笑边唱，一点儿也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剧烈的喷嚏折腾了他一夜，搅得达拉斯特合不上眼。

此时，达拉斯特完全醒了。透过装有铁栅的窗户，他看见对面有一个小院子，红土地面浸透了雨水，雨水顺着一丛粗大的芦荟无声地流着。一个女人过去了，双手举过头顶，扯着一方黄色的头巾。达拉斯特又躺下了，立刻又坐起来，下了床，床弯了一下，被他压得吱吱直叫。就在这时，苏格拉底进来了：“找在哪，达拉斯特先生。市长在外面等着呢。”他看见达拉斯特那副模样，就又说：“放心吧，他可从来也不着急。”

达拉斯特用矿泉水刮了刮脸，走出门厅。市长身材很好，一张可爱的黄眼狼似的小脸上戴了副金丝眼镜。他满面愁容，仿佛正专心致志地望着雨。可是，他一瞥见达拉斯特，立刻容光焕发，脸上现出了迷人的微笑。他挺直了细小的身躯，快步

向前，想伸开双臂抱住“工程师先生”。这时，小小院墙的另一端，一辆汽车在他们面前踩了闸，在泥泞中滑了几步，歪歪斜斜地停住了。“这是法官！”市长说。法官和市长一样，也穿了一身海军蓝的衣服。但他远较市长年轻，至少是看起来如此，因为他身材优雅，面庞清秀，显出一副少年人吃惊时的样子。他穿过院子，朝他们走来，姿态优美地躲避着积水。距离达拉斯特几步远的时候，他就伸出了胳膊，对他表示欢迎。他说他对前来迎接工程师先生感到荣幸，工程师的到来是他们可怜的城市的光荣，即将修建的这座小水坝将使城市低洼地区免除周期性的水患，这是工程师先生对伊瓜贝的不可估量的贡献，他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管理水道，制服河流，啊，伟大的职业，肯定，伊瓜贝的可怜的居民们将记住工程师的名字，并在他们的祈祷中念叨许多年。如此的魅力和口才使达拉斯特折服，他表示感谢，不敢再想一个法官与一座水坝有何相干。最后，市长请他到俱乐部去，当地名流想在工程师先生察看低洼地区之前隆重地会见他。这些名流是些什么人呢？

“噢，”市长说，“我本人，市长，这位是卡瓦霍先生，港务监督长，其他几位就不这么重要啦。再说，您也不必费神，他们都不会说法语。”

达拉斯特叫来苏格拉底，说快到中午的时候再找他。

“好吧，”苏格拉底说，“我到泉水公园去。”

“去公园？”

“是啊，那地方是谁都知道的呀。别担心，达拉斯特先生。”

达拉斯特出门时才看到，医院就建在森林边上，繁茂的枝叶几乎遮住了整个屋顶。细雨密密实实地落在树丛上，浓密的森林无声地吮吸着，仿佛一块巨大的海绵。城市坐落在森林与河流之间，差不多有一百多幢房屋，铺着颜色暗淡的屋瓦。远

处森林与河流散发出的气息一直飘到了医院。汽车先在一些浸透了雨水的路上行驶，很快就进入一个长方形的广场。广场相当大，红土地上有不少处积水，其间残留着轮胎、铁皮车轮和木鞋的痕迹。周围的房子又低又矮，涂着五颜六色的泥巴，广场的后面，可以看见一座殖民地风格的、蓝白两色的教堂的两座圆塔。一股来自河口的盐味笼罩着这个光秃秃的地方。广场中间，有几个人在游荡，衣服都被打湿了。一些高丘人[①]，日本人，印第安混血儿，沿墙走着，迈着小步，动作迟缓，其中杂有几位仪态高雅的显贵，他们的深色西装显出一种异国情调。他们不慌不忙地让过汽车，然后停下来，目光随着汽车。汽车停在了广场上一幢房子前，一群浑身湿漉漉的高丘人不声不响地在车子周围围成一圈。

俱乐部的二层楼上，有一个类似酒吧的房间，内有一个竹制柜台，一些铁皮独脚圆桌。名流很多。市长手持酒杯，对达拉斯特表示欢迎，祝他万事如意，然后，大家为他喝甘蔗酒。正当达拉斯特在窗子旁边喝酒的时候，一个相貌丑恶的大个子，穿着马裤，打着裹腿，摇摇晃晃地朝他走来，对他说了一通话，说得又快又糊涂，工程师只听出了“护照”两个字。他犹豫了一下，随后掏出证件，那人一把夺了过去。大个子翻了翻护照，表示出明显的不悦。他又说了一通，在工程师的鼻子底下晃着那个小本本。工程师不动声色，冷眼看着这个怒气冲天的人。这时，法官微笑着过来问是怎么回事。醉汉打量了一会儿这个胆敢打断他的瘦家伙，摇晃得更厉害了，又在他的眼前晃着那本护照。达拉斯特十分镇静，在一张圆桌旁坐下了，等着。对话变得很激烈，突然，谁也没有想到，法官竟大声呵斥起来。出乎

① 南美潘帕斯高原上的居民.

意料，大个子一下败下阵来，那神情活象一个犯了过失的孩子最后，在法官的命令下，他象个受到惩罚的坏学生那样斜着身子朝门口走去，不见了。

法官立刻过来，声音又变得和谐悦耳了，向达拉斯特解释说，那个粗俗的家伙是警察局长，他竟敢声称护照不合格，他将因唐突而受到惩罚。接着，卡瓦霍先生向围成一圈的名流们说了话，似乎在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一阵简短的商议，法官郑重地向达拉斯特道歉，请求他原谅，因为只有酒醉方可解释这样的失礼和忘记伊瓜贝全城对他的感激之情，最后，请他务必亲自决定给予这匹害群之马以应有的惩罚。达拉斯特说他不愿惩罚，那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意外事故，还是赶快去看看河吧。市长说话了，他满怀着深切的善意宣称，惩罚确是不可少的，冒犯者要停职，他们大家都等待着他们尊贵的客人来决定他的命运。不管说什么，都不能使这种充满笑意的严厉后退，达拉斯特只好答应考虑考虑。于是，他们就决定去察看低洼的地区。

在低而滑的河岸上，河水已经漫上了一大片。他们走过伊瓜贝城的最后几幢房屋，来到了河与高高的陡坡之间，陡坡上落坐着一些柴泥茅屋。前方，在堤的尽头，森林仿佛直接伸到对面的河岸上。但是，河水很快又在树间变宽，由黄变灰，形成一条隐隐约约的直线，那就是大海了。达拉斯特不说话，朝高坡走去，坡上，洪水留下的不同水位的痕迹还很新鲜。有一条泥泞的小路通向茅屋。屋前站着一些黑人，他们不说话，望着这些新来的人。有几对夫妇手拉着手，在堤边，一排肚圆腿细的孩子站在大人前面，睁大了圆圆的眼睛。

达拉斯特走到茅屋前，挥了挥手，叫来港务监督长。港务监督长是一个笑嘻嘻的大胖子黑人，穿着一套白衣服。达拉斯

特用西班牙语问他是否可以参观一下茅屋。监督长说当然可以，他甚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工程师先生将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他指有达拉斯特和河水，跟黑人们说了许久。他说完了，可谁也不动一动。他叫了一个人，那人摇摇头。于是，监督长用命令的口吻说了几句话，那人就从人群中站了出来，面对着达拉斯特，然后，他摆了摆手，指了路。但是，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敌意。这个人年纪相当大，一头灰白色的卷毛，很短，一张瘦削而憔悴的脸，只是身体还显得年轻，肩膀上长满了老茧，干巴巴的，粗布长裤和破烂的衬衫下面露出了肌肉。他们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监督长和一大群黑人。他们又爬上一道更陡的斜坡。用泥土、白铁皮和芦苇造的小屋艰难地立在坡上，屋脚压着巨大的石头。他们碰到了一个下坡的女人，她光着脚，不时地打滑，头上顶着一只盛满了水的铁桶。他们到了一个象小广场似的地方，周围有三座小茅屋。那人朝其中的一座走去，推开竹门，门的绞链是用藤做的。他闪在一边，没有说话，目光麻木地望着里面。屋子里面，达拉斯特先只看见一堆快要熄灭的火，就在屋子中央的地上。随后，他看见里面的一角上摆着一张铜床，光秃秃的床绷已经塌陷了，另一角上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个陶杯，床与桌子之间有一个台子似的东西，上面放着一张画着圣徒乔治的彩色画片。其余的，门口右边，是一堆破布，顶棚上有几块五颜六色的缠腰布，正在火上烤着，达拉斯特站着不动，从地上冒出来的贫困和烟雾的气味使他喘不过气来。身后，监督长拍了拍手。工程师回过头去，背着阳光只看见门槛上一个黑人小姑娘的俏丽的身姿，她递给他一个什么东西。他接了过去，是一个杯子，他喝了里面的浓厚的蔗酒。小姑娘端着托盘，接过空杯，出去了，她的动作那么灵活，那么有生气，达拉斯特心头一动，想叫住她。

他跟着她出去，可是，茅屋周围聚集了一大群黑人和当地名流，他已经认不出她是哪一个了。他对老人表示感谢，老人鞠了一躬，没有说话。他随即走了。监督长跟在后面，又解释起来，询问里约法国公司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水坝能不能在雨季之前建好。达拉斯特不知道，实际上他的心思也不在那上面。他顶着毛毛雨，朝清凉的河水走去。他一直倾听着那巨大而空阔的声响，自从他到了这儿，他就不断地听见这种声音，也说不准是水与水摩擦还是树与树摩擦。他到了岸边，向远处望着大海的那条隐约的线，望着几千公里孤独的水面，望着非州，再望过去，就是他所来自的欧洲了。

“监督长，”他问，“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些人靠什么生活呢？”

“有人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干活，”监督长说，“我们很穷。”

“那些人是最穷的吗？”

“他们是最穷的。”

这时，法官过来了，他穿着一双精致的皮鞋，稍稍有些打滑，说他们已经喜欢上将给他们工作的工程师先生了。

“您知道，”他说，“他们天天跳舞唱歌呢。”

然后，他突然问达拉斯特是否考虑过惩罚了。

“什么惩罚？”

“哎呀，我们的警察局长呀。”

“不必管他了。”

法官说不行，必须惩罚。可是，达拉斯特已经朝伊瓜贝城走去了。

小小的泉水公园在濛濛细雨中显得神秘又温柔，里面，在香蕉树和露兜树之间连着长藤，上面挂满了一串串奇特的花朵。

小径相交的地方放着一堆堆湿漉漉的石头，一群穿戴得花花绿绿的人来往其间。一些混血儿，几个高丘人，正低声交谈，或慢步走上竹林中的小路，进入越来越密的小树林。紧接着小树林，就是大森林了。

达拉斯特正在找寻苏格拉底，却在背后发现了他。

“这儿过节呢，”苏格拉底笑着说，抓住达拉斯特高高的肩膀蹦起高来。

“是什么节？”

“嘿！”苏格拉底惊讶地说，他已经面对着达拉斯特了，“你不知道？是仁慈的耶稣节啊。每年，大家都带着锤子到山洞里去。”

苏格拉底并没有把山洞指给他看，而是指着似乎在公园一角等待着的一群人。

“你看！有一天，一尊耶稣塑像从海上逆着河水来到这里。渔民们发现了它。真美呀！真美！于是，他们把它洗干净放进山洞。现在，山洞里长了一块石头。每年，大家都来庆祝。你拿着锤子，砸呀，砸呀，为了得到祝福。你猜怎么着，石头老是长，你老是砸。真是奇迹。”

他们到了山洞前，越过等在那儿的人群，看见了低矮的入口。里面，几支蜡烛颤动的火光刺破了黑暗，一个人正蹲着用锤子在敲。那人是个瘦削的高丘人，留着长长的髭须，他站起身，出来了，掌心里放着一小片潮湿的石头，给大家看，过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合上手掌，走开了。于是，另一个人又弯着腰进去。

达拉斯特转过身去。在他的周围，朝圣者们等待着，并不看他，若无其事地站在细细的象帘子一样的从树上跌落下来的雨水中。他也在等待着，站在山洞前，冒着细雨，然而他不知

在等什么。实际上，一个月来自他来到这个国家，他一直在等待着。尽管他有他的任务，他要筑坝，他要开路，他一直在等待着，在那骄阳似火的潮湿的日子里，在那夜里密密麻麻的星光下，他在等待着一次奇遇，这场奇遇他是想不到的，但它在天涯海角耐心地等着他。他抖了抖身子，朝出口走去，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该到河边去，该工作了。

苏格拉底在门口等着他，正和一个人谈得起劲，那人又矮又胖又敦实，皮肤黑里透黄。他的脑袋剃得精光，更显得天庭饱满。而那张光滑的大脸上，却长了一把黑胡子，修成了方形。

“这家伙，真行！”苏格拉底说，这就算是介绍了。“明天，他要参加游行。”

那人穿了一身粗哔叽水手服，上装下面露出了带蓝白道的汗衫，他瞪着一双黝黑安详的眼睛，注意地打量着达拉斯特。他咧开丰满的油亮的大嘴笑了，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

“他说西班牙语，”苏格拉底说，然后又对那个人说：

“跟达拉斯特先生说说吧。”

他一边跳着，一边朝另一堆人那里走去了。那人不笑了，望着达拉斯特，毫不掩饰他的好奇。

“你觉得有趣吗，船长？”

“我不是船长，”达拉斯特说。

“这没关系。可你是老爷，苏格拉底跟我说了。”

“我嘛，我不是。我的祖父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父亲以上都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老爷了。”

“噢！”黑人笑着说，“我明白了，人人都是老爷。”

“不，不是这样。没有老爷，也没有平民。”

黑人想了想，说：

“谁也不干活，谁也不受苦？”

“不，还有几百万人要干活，在受苦。”

“那他们就是平民。”

“这样说的话，那是有平民，但他们的主人是警察或商人。”

这个黑白混血的人的温和的脸沉下来了。他骂了一句：

“呸！买和卖，嗯？多么肮脏！在警察那里，是狗发号施令。”

突然，他大笑起来。

“你呢，你不卖什么吧？”

“差不多，我造桥，修路。”

“好！我嘛，我在船上当厨子。你愿意的话，我给你做一盘我们拿手的黑豆菜。”

“我很愿意。”

厨子走近达拉斯特，拉住他的胳膊。

“听我说，我喜欢你说的话，我也跟你说说。你也许会喜欢的。”

他把他拉到入口附近，坐在竹丛旁的一张湿木凳上。

“我在一条小油船上，这条船沿海航行，向各港口供应物资。一天，我们正在伊瓜贝的海上航行，船起了火。怪我？哼！我可是个内行。不，那是运气不好。我们还来得及把小船放下去。夜里，海上起了浪，把船打翻，我落入水中。当我冒出水面时，我的头碰着了小船。我被冲走了。夜里漆黑一片，浪很大，我游泳又不行，我害怕了。突然，我看见远处有亮光，我认出那是伊瓜贝的耶稣教堂的圆顶。于是，我就对仁慈的耶稣说，如果他救了我，我就用头顶着一块五十公斤重的石头参加仪式游行。你不相信，可是大海平静了，我的心也平静了。我

慢慢地游着，我感到幸福，我游到了岸边。明天，我将履行我的诺言。”

他忽然用一种怀疑的神气望着达拉斯特。

“你没笑吧，嗯？”

“我没笑。说话就得算数。”

那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到我兄弟那儿去吧，就在河边。我给你煮黑豆。”

“不，”达拉斯特说，“我还有事。今天晚上吧。”

“好吧。可今天夜里，大家在大茅屋里跳舞，祷告。这是圣徒乔治节。”

达拉斯特问他是不是也跳舞。厨子的脸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眼神也第一次游移不定起来。

“不，不，我不跳舞。明天，我得顶石头。石头很沉。晚上，我去祝贺圣徒，然后我早早地走。”

“时间很长吗？”

“一整夜，直到早晨。”

他望着达拉斯特，神情中有一种隐约的羞愧。

“来跳舞吧，然后你就带我走。不然的话，我会留在那里，跳舞，我可能会忍不住的。”

“你喜欢跳舞吗？”

厨子的眼睛象是看到了好吃的东西，发亮了。

“啊！是的，我喜欢跳舞。再说，还有雪茄，圣徒，女人。大家什么都忘了，什么都不听了。”

“有女人？全城的女人？”

“没有城里的，都是茅屋里的。”

厨子又笑了。

“来吧，我听船长的。你将帮助我明天履行诺言。”

达拉斯特模模糊糊地感到恼火，这个荒谬的诺言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望着这张朝着他微笑的开朗而俊美的脸，这张脸上充满了信任，黝黑的面皮透着健康和生气。

“我会来的，”他说，“现在，我送送你吧。”

不知为什么，他这时又看见那个黑姑娘向他献礼表示欢迎了。

他们走出公园，穿过几条泥泞的小路，到了低洼的广场，周围的房屋很矮，使得广场显得更大了。尽管雨还是那么大，可粗糙的墙上已经淌水了。河水和树木的轰鸣声越过吸水的天空，滚滚而来，直传到他们的耳畔。他们并排走着，达拉斯特的步伐沉重，厨子的步伐有力。厨子不时地抬起头，朝他的同伴笑笑。他们朝教堂走去，他们望见了耸立在一片房屋之上的教堂。他们到了广场的边缘，又过了几条泥泞的小路，这时，已经有诱人的饭菜的香味飘出来了。不时地，有拿着盘子或一件炊具的女人从门口露出好奇的脸来，随即又消失了。他们从教堂前面走过，进入一个老区，两旁依旧是低矮的房屋。忽然，达拉斯特认出了前面就是茅屋区，从它后面传来的河水的声音更大了。

“好，你去吧。晚上见，”他说。

“好的，在教堂前面。”

然而，厨子这时又拉住了达拉斯特的手。他犹豫着，最后下了决心：

“你从来也没有呼救过，许过诺言吗？”

“不，我想有过一次。”

“是在船沉的时候吗？”

“这么说也可以。”

达拉斯特猛地抽回了手。可是正当他转身的时候，他看见

了厨子的目光。他犹豫了，接着微微一笑。

“我可以对你说，尽管那并不是什么大事。由于我的过错，一个人快要死了。我好象是呼喊过。”

“你许了愿吗？”

“没有。我本想许愿的。”

“很久以前？”

“来这里之前不久。”

厨子双手捋着胡子，眼睛炯然有光。

“你是个船长，”他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要帮助我履行诺言，也就跟你自己履行诺言一样。这也会帮你的忙的。”

达拉斯特笑了：

“我不信。”

“你骄傲，船长。”

“从前我骄傲，现在我孤独。可是你告诉我，你的仁慈的耶稣每次都回答你吗？”

“每次？不，船长！”

“那你？”

厨子大笑，笑得清脆、天真。

“他呀，”他说，“他是自由的，不是吗？”

在俱乐部里，达拉斯特和名流们一起用午餐，市长跟他说，他应该在市的留言薄上签名，以便他到伊瓜贝来这件大事至少有个证据。法官也找了两三句新辞令，来赞扬他们的客人除了德行和天才之外，还具有在他们中间代表那个他有幸属于的伟大国家的朴实。达拉斯特只说道，他有此荣幸，他相信这肯定是一种荣幸，而且他的公司还有幸获得这项长期工程的招标。面对着这样的谦逊，法官不由得啧啧称赞。“还有，”他说，“您想过我们该如何处置警察局长吗？”达拉斯特微笑着望了望他。“我

想出了主意。”他，达拉斯特，是多么高兴了解美丽的伊瓜贝及其慷慨的居民，为了使他在此地的逗留能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开始，如果他们愿意以他的名义原谅这个冒失鬼，他将把这看作是对他个人的厚意和特殊的恩惠。法官神情专注，满面笑容，点了点头。他象行家似地想了想如何措辞，然后，请在座的人为伟大的法兰西民族宽宏大量的传统鼓掌，他又转身朝向达拉斯特，说他十分满意。既然如此，”他最后说，“我们今晚与局长一道吃饭。”但是，达拉斯特说已经有朋友邀请他参加跳舞晚会，在茅屋区。“啊，是啊，”法官说，“我很高兴您去哪儿。您看，谁也不能不喜欢我们的人民。”

晚上，达拉斯特在他早晨看过的那座茅屋的中间，和厨子以及他的兄弟围着一堆已经熄灭的火坐着。厨子的兄弟对于再次见到他似乎并不感到惊讶。他几乎不能说西班牙语，大部分时间里只是点头。至于厨子，他对大教堂感兴趣，又长篇大论地谈着黑豆汤。天差不多黑了，达拉斯特还看得见厨子和他的兄弟，至于蹲在屋子里头又来服待他的老太太和年轻姑娘，他就只能看见个轮廓了。低处，单调的流水声清晰可闻。

厨子站了起来，说：“时候到了。”他们都站起来了，但女人们没有动。两个男人出门了。达拉斯特待犹豫了一下，随即跟上他们。天已经黑了，雨也停了。淡黑色的天空好象仍然有水流动。在那低低地压在地平线上的透明而昏暗的水中，星星开始闪亮了。这些星几乎立刻不亮了，一颗颗掉进了河里，仿佛天空讨厌这最后的光亮似的。浓重的空气中散发出河水和烟雾的气味。人们还听得见巨大的、不动的森林就在近处发出喧哗声。突然，远处响起了鼓声和歌声，开始低沉，渐渐清晰，声音越来越近，接着又停止了。很快，一队黑人姑娘出现了，她们穿

着粗丝白裙，裙口只到腰部很低的地方。一个高大的黑人跟在她们后面，他的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红色的外套，上面挂着一串五颜六色的牙齿。在他后面，乱哄哄地跟着一群穿着白色睡衣的人和拿着三角铁和又宽又短的鼓的乐师。厨子说应该跟上他们。

他们沿河而行，在距离最后一片茅屋几百公尺远的地方，到了一座茅屋。那座茅屋很大，没有人住，还算舒适，屋内的墙壁抹了粗灰。地是夯实的，中间有一根柱子支着茅草和芦苇的屋顶，墙上光秃秃的。屋子尽头，有一个覆盖着棕榈叶的小台子，插满了蜡烛，差不多照亮了半间屋子，台子上摆着一幅精美的彩色石印画片，上面画着圣徒乔治，一脸迷惑人的神情，还有带着一条长着小胡子的龙。台子底下，有一个小洞似的地方，用纸做成一座假山，在一支蜡烛和一盆水之间，荫护着一尊小泥像。泥像被涂成红色，表现的是一个长角的神。他面目凶恶，挥舞着一把硕大无朋的银纸做的刀。

厨子带领着达拉斯特，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背靠着墙站住了。“这样，”厨子小声说，“咱们走起来就方便了。”屋里已经挤满了人。男人和女人，一个挨一个。热气也上来了。乐师们分立在小台子的两侧。跳舞的人按男女分别围成两个圈，男人在里面。中央是那个穿红外套的黑人首领。达拉斯特两臂交叉，靠墙站着。

可是，首领穿过舞圈，朝他们走来，神态庄严地对厨子说了几句话。“放开胳膊，船长，”厨子说，“你这样紧抱着，圣徒的神灵就下不来了。”达拉斯特顺从地放下胳膊。他始终背靠着墙，他的胳膊、腿又长又重，大脸上也由于出汗而发亮，他自己现在就象一个野蛮的、使人放心的神了。大个子黑人看了看他，感到满意，就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立刻，他唱起了一支歌，

声若洪钟，大家都伴着鼓声跟着他唱起来。于是，两个舞圈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转起来，舞蹈沉重有力，更象是以脚跺地，再扭两下屁股稍稍予以加强。

屋子里更热了。然而，停顿渐渐短了，舞与舞的间隔越来越少，舞步加快了。跳舞的人的节奏并没有放慢，那大个子黑人一边跳舞，一边又重新穿过舞圈朝小台子走去。他端了一杯水，拿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回来，把蜡烛放在屋中央的地上。他把水洒在蜡烛周围，洒了两圈，然后，他直起腰，抬起一双发狂的眼睛，望着屋顶。他全身挺直，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圣乔治来了。看哪，看哪，”厨子小声说，两眼瞪得溜圆。

果然，有几个跳舞的人表现出了神灵附体的样子，呆若木鸡，两手放在腰部，脚步僵硬，目光呆滞。其他人加快了节奏，浑身颤抖，并开始发出含混不清的叫声。喊叫声越来越高，汇成了集体的嚎叫，这时，一直抬眼望着屋顶的首领也长长地吼了一声，盖过了众人的声音，说的还是那几个字，但却听不清。“你听，”厨子小声说，“他说他是神的战场。”达拉斯特感到十分惊讶，厨子说话的声音变了；他看了看他，只见他俯身向前，双拳紧握，目不转睛，在原地跟着那些人的节奏跺着脚。这时，他觉察到自己也摆动着沉重的身躯跳了一会了，不过脚还未离开原地。

突然，鼓声大作，穿红衣服的家伙发起疯来。他眼睛冒火，胳膊腿乱扭，弯着膝盖，一会儿用左腿站立，一会儿用右腿站立，最后，节奏快得似乎要散架似的。突然，在一片如雷的鼓声中，他猛地停住，望着周围的人，那神情又傲慢，又可怕。立刻，从昏暗的角落里冒出一个人来，跪下，递给他一把短剑。大个子黑人接过短剑，四处望着，就在头顶上舞起来。就在这时，达拉斯特发现厨子在人群中跳舞。工程师没看见他是什么

时候走开的。

在一片晃动不定的红光中，一团团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尘土从地上升起，使本来就让人感到发粘的空气变得更加浓厚。达拉斯特觉得累劲渐渐上来了，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他甚至没看见那些跳舞的人是如何搞到那种粗大的雪茄烟的，他们边抽边跳，一股怪味充满了茅屋，熏得他有些晕头晕脑的了。他只看见厨子来到跟前，他一直在跳，也抽着一支雪茄。“别抽了，”他说。厨子嘴里嘟囔着，两脚随着节奏不停地动，眼睛盯着中央那根柱子，神情活象个被打倒的拳击手，后脑勺长时间不停地颤动。他的身边，一个肥胖的黑女人左右摇摆着她那张野性毕现的脸，不住地嚎叫。然而，疯狂得最可怕的还是那些年轻的黑女人，她们两脚紧贴地面，从脚至头，一阵阵抽搐越来越猛烈，到了肩膀，抽搐也达到高峰。这时，她们的头前后晃动，真象是要离开那散了架的身体一样。就在这时，所有的人一齐不停地嚎叫起来，那叫声是混合的，单调的，仿佛没有换气，没有高低，仿佛全身，肌肉和神经，都扭作一团，作一次耗尽一切精力的发泄，把每个人的命运都交付给那个迄今为止一直默不声的人。人们不停地喊，女人们一个个倒在地上。首领跪在每个人的身旁，用他那黑筋暴突的大手迅速地、抽搐地捏着她们的太阳穴。于是，她们重新站起，摇摇晃晃地进入舞圈，发出喊叫声，起初微弱，继而越来越高，越快，再次跌倒，复又爬起，这样反复良久，直到大家的喊声变弱了，撕裂了，沙哑了，成了一种打嗝声为止。达拉斯特精疲力尽，他由于长时间在原地跳舞而感到筋肉扭结在一起，由于不出声而感到窒息。他也感到眩晕。热气，灰尘，雪茄烟，人的气味，这时空气已变得完全不能呼吸了。他用眼睛寻找厨子，找不见他。达拉斯特顺着墙蹲下，忍着不呕吐出来。

当他睁开眼睛时，空气依旧恶浊不堪，喧闹却没有了。只有鼓敲出通奏低音，屋子各个角落的，一群群的人穿着发白的衣衫，随着鼓声跺脚。房子中间的杯子和蜡烛已经撤掉，一群年轻的黑人姑娘处于半睡眠状态，缓缓地舞着，始终象是跟不上节拍似的。她们闭着眼睛，身子却是直的，轻轻地前后俯仰着，踮着脚，几乎就在原地。其中有两个胖姑娘，脸上蒙着用酒椰叶纤维织成的面纱。她们站在另一个化了装的姑娘的两侧，那个姑娘颀长苗条，达拉斯特突然认出她就是他去过的那家的女儿。她身着绿裙，头戴蓝纱女猎人帽，那帽子前端翘起，饰有火枪手那样的羽毛，手执黄绿相间的弓，还配有一支箭，箭头上穿着一只五彩的鸟儿。她那俊俏的头在纤细的身躯上轻轻摇晃，稍向后仰，睡着的脸上反映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忧郁。音乐中止期间，她摇摇晃晃，睡着了似的。只有鼓声的节奏加强，才给了她某种看不见的保护人，只见她轻舒柔臂，作出迎风展翅的姿势拥抱着他，直到与音乐声一齐中止，这时她作出快要跌倒的样子，发出奇特的鸟鸣声，尖利却悦耳动听。

达拉斯特被这种动作舒缓的舞蹈迷住了，他出神地望着这位黑色的狄安娜，这时，厨子在他面前冒了出来，平滑的脸完全变了样。他的眼睛中的仁慈消失了，闪烁着一种未曾见过的贪婪。他冷冰冰地说，就象对一个陌生人那样："时候不早了，船长。他们要跳个通宵，但他们不愿意你现在还在这儿。"达拉斯特头昏脑胀，他站起来，跟着厨子，顺着墙走到门口。在门口，厨子手拉着竹门，闪在一旁，达拉斯特出去了。他转回身，看见厨子并没有动。

"走吧。一会儿还要顶石头呢。"

"我不走，"厨子固执地说。

"那你的诺言呢？"

厨子没有回答，慢慢地推门，达拉斯特用手拉着门。他们这样相持了一会儿，达拉斯特让步了，耸耸肩。他走开了。

夜晚的空气中充满了新鲜的、芳香的气味。森林的上空，南半球的天上，稀疏的星星被看不见的薄雾遮掩着，发出微弱的光。潮湿的空气是沉重的。然而，达拉斯特走出茅屋，却感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清新。他爬上溜滑的陡坡，走近那一片茅屋，踉踉跄跄，就象一个喝醉了的人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路上。森林就在附近，发出轰轰的响声。河水声越来越大，整块土地沉入黑夜，达拉斯特感到一阵恶心。他觉得他该唾弃这个国家才是，唾弃笼罩在它巨大的土地上的忧愁，唾弃它的森林的青绿色的光亮，唾弃它的荒凉的河流在夜里发出的汩汩声。这片土地太大了，鲜血和四季在这里混合，时间也化为液体。这里的生活紧紧地贴着土地，为了投入其中，必须就在这泥泞或干燥的土地上睡上许多年才行。那边，在欧洲，是羞耻和愤怒。这里，却又是流放和孤独，在这些萎靡的、颤抖着的疯子中间，他们跳舞是为了死。然而，那睡美人发出的受伤的鸟儿的鸣声，依然穿过了湿润的，充满了植物的香气的夜空，传到了他的耳畔。

达拉斯特一夜没有睡好，头疼得厉害，他醒来的时候，城市和静静的森林正受着潮湿的热气炙烤。此时，他正站在医院的门洞里等着，他看了看表，表停了，也不知道几点了。他感到奇怪，大白天城里居然是静悄悄的。天空蓝得几乎没有云彩，紧贴着暗淡的屋顶。医院对面的房子上，有几只毛色发黄的黑秃鹫热得一动不动，正在睡觉。其中有一只突然抖了抖身子，张了张嘴，明显地摆出了要飞的架势，只见它拍了两下沾满尘土的翅膀，飞离屋顶几公分高，立刻又落下睡着了。

工程师朝城里走去。大广场上空无一人，象他刚刚走过的街道一样。远处，河的两岸，雾气低低地飘浮在森林上空。热气直落下来，达拉斯特找个有阴凉的地方躲了起来。这时，他看见一幢房子的挡雨披檐下有个人朝他作手势。走近些之后，他认出是苏格拉底。

“怎么样，达拉斯特先生，你喜欢那仪式吗？”

达拉斯特说茅屋里太热，他更喜欢天空和黑夜。

“是啊，”苏格拉底说，“在你们那儿，只有弥撒。没有人跳舞。”

他搓着手，用一只脚跳着，转着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呀。”

他好奇地看了看达拉斯特：

“你哪，你去望弥撒吗？”

“不。”

“那你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我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还在笑。

“不可能！一个老爷会没有宗教，会什么也没有！”

达拉斯特也笑了：

“是的，你看，我没有找到我的位置。这样，我就走了。”

“跟我们在一起吧，达拉斯特先生，我喜欢你。”

“我很愿意，苏格拉底，可是我不会跳舞。”

他们的笑声在荒凉的城里的寂静中回响着。

“噢，”苏格拉底说，“我忘了。市长要见你。他在俱乐部吃午饭。”他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朝医院走去。“你到哪儿去？”达拉斯特喊道。苏格拉底模仿了一下打呼噜的样子：“睡觉。一会儿该游行了。”他一边小跑着，一边打着呼噜。

市长只是为了想给达拉斯特一个贵宾的位置，让他观看游行。他让工程师与他分享一道能够神奇地治愈瘫痪病人的用肉和米做成的菜，对他解释说，他们先到法官家，站在阳台上，看游行队伍从对面的教堂里出来。然后，他们去市政厅，市政厅坐落在通往教堂广场的大街上，忏悔者要打那儿经过。市长要参加仪式，将由法官和警察局长陪同达拉斯特。警察局长也在俱乐部的大厅里，这时立刻朝着达拉斯特嘻开了嘴，露出不知疲倦的微笑，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虽说听不懂，但看得出来，是很友善的。达拉斯特下楼时，警察局长抢上一步，为他开路，在他前面打开大门。

这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太阳，穿过始终不见人的城市，朝法官家走去。寂静中，只有他们的脚步声。突然，一个爆竹在邻近的一条街上响了，在所有房上，脖子上没有毛的黑秃鹫都拖着又重又笨的身躯，飞了起来。立刻，几十个爆竹在四面八方响了起来，门开了，人们走出家门，塞满了狭窄的街道。

法官对达拉斯特说，能在他的寒舍中接待他，是他的一大骄傲，接着，他让他踏上涂成蓝色的巴罗克式漂亮楼梯，上到二层。在平台上，当达拉斯特经过的时候，大门洞开，露出几个小孩子的棕色的脑袋，他们随即忍住笑消失了。在结构精美的客厅里，只有几件藤制家具和大鸟笼，笼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叫声不绝于耳。他们上了阳台，正对着教堂前的小广场。广场上渐渐挤满了人，他们出奇地安静，热浪自天而降，仿佛看得见似的，他们竟纹丝不动。只有孩子们在广场周围跑动，突然停下点燃爆竹，响声接连不断。从阳台上望去，教堂显得更小了，它的墙上涂了粗灰，有十几级涂成蓝色的台阶和两个闪着蓝色和金色的塔。

突然，教堂内响起了管风琴声。人们转向教堂的大门，顺

着广场两侧站好。男人摘下帽子，女人跪在地上。远处的管风琴长时间地演奏着进行曲。一种昆虫摩擦翅膀的奇怪的声响从森林那边传来。一架翅膀透明、结构纤弱的小飞机，这年代不明的世界中的一个怪物，从树林上面钻了出来，朝着广场低飞，发出大木铃般的轰鸣声，掠过朝着它高高仰起的人头。飞机向河口方向拐去，飞远了。

然而，在教堂的阴影中，一阵不明不白的骚乱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管风琴声停了，紧接着，隐蔽在教堂门廊下的鼓号响成一片。忏悔者穿着宽大的黑袍，一个一个地走出教堂，聚集在小平台上，再走下台阶。他们后面。是一些白人忏悔者，都拿着红色和蓝色的会旗；跟着出来的是些装扮成天使的儿童，他们是圣母会的孩子，黝黑的小脸表情庄严；最后是由几个身着深色西装，热得汗流浃背的显贵抬着的彩色圣人遗骸盒，上面有耶稣像，他手持芦苇，头戴荆冠，面流鲜血，摇摇晃晃地从站在台阶上的人群之上走过。

圣人遗骸盒下完台阶之后，有一个停顿，这时，忏悔者们煞有介事地整了整队形。这当儿，达拉斯特看见了厨子。他刚刚走上平台。他光着膀子，满脸胡须，头上顶着一块软木板，板上放着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头。他步履稳健地走下台阶。他那双肌肉发达的短胳膊稳稳地扶住了石头。当他走到圣人遗骸盒后边时，游行的行列乱了。身着大红大绿的乐师们从门廊下冒了出来，使劲地吹着缠上了丝带的铜号。忏悔者们加快脚步，上了一条通往广场的街。接着，圣人遗骸盒也看不见了，只剩下厨子和一些乐师了。在一片爆竹声和铜号声中，那架飞机又回到人群上空，人群中顿时又乱了一阵。达拉斯特只盯着厨子这时他也在街上消失了。达拉斯特仿佛突然看到他的肩膀抖了一下，可是离得那么远，他看不清楚。

街上空无一人，商店和居民都关了门，法官、警察局长和达拉斯特来到市政厅。他们离鼓乐声和爆竹声越来越远，城市复归寂静，已经有几只黑秃鹫飞回屋顶，落在它们似乎呆了很久的地方。市政厅坐落在一条又狭又长的小街上①，这条街通向教堂广场外面的一个区。这时，街上空无一人。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远远望去，可以看见一条坑坑洼洼的马路，刚刚下过的那场雨留下了几处积水。太阳已经西斜，却依然很热，炙烤着对面房子的没有窗户的墙壁。

他们等了很久。达拉斯特看着对面墙上反射的阳光，看得他又感到了疲倦和眩晕。空空如也的街道，空空如也的房屋，既吸引着他，又令他作呕。他又想逃离这个地方了，他也想到了那块巨大的石头，他真希望这场考验快快结束。他正想说下去打听打听消息，教堂的钟声起劲地响起来了。同时，在他们左边，街道的尽头，人声鼎沸，出现了闹哄哄的一大群人。他们远远地望去，只见这群人聚集在圣人遗骸盒周围，朝圣者和忏悔者混作一团，在爆竹声和欢叫声中，沿着这条狭窄的街道蜂拥向前。几秒钟工夫，街道就被挤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朝市政厅走来，混乱之状不可言传，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不同服饰的人揽在一起，成了花花绿绿的一大团，到处是眼睛，到处是大叫大嚷的嘴巴，到处都象举着长枪似的手擎蜡烛，仿佛一支蜡烛大军，其光焰与炽热的日光化为一片。他们走近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仿佛缘墙而上，达拉斯特却看到厨子不在其中。

达拉斯特连个招呼也没有打，一阵风似地离开阳台和房间，奔下楼梯，来到街上，头顶上钟声和爆竹声惊雷似地响成一

① 原文如此。第766页第8行写的是，“市政厅坐落在通往教堂的一条大街上。”

片。他没有办法，只好在快乐的人群中，在拿蜡烛的人和不满的忏悔者中横冲直撞。他真是所向披靡，凭着他身强力壮，在人海中冲出一条路来。他的动作是那么狂暴，当他冲出人群，来到街的尽头时，他站都站不住了，差一点跌倒。他紧靠着灼人的墙，等着呼吸平稳下来。然后，他又往前走了。这时，另一群人出现在街上，前面的人往后退着。他看见人们围着的正是厨子。

显然，厨子已经精疲力尽了。他走走停停，被大石头压弯了腰，他跑了几步，脚步急速，象装卸工和苦力那样，这可怜的快速的小跑啊，整个脚掌敲打着地面。他一停下，那些浑身滴满蜡烛、沾满尘土的忏悔者就给他鼓劲。在他左边，他的兄弟或走或跑，一句话也不说。达拉斯特觉得，他们永远也跑不完那段把他们与他分隔开来的路程。快到他跟前的时候，厨子又停下了，朝四周望了望，那目光已经失去了光彩。他看见了达拉斯特，仿佛没有认出来，然而他站定了，朝他转过身来。他的脸色发灰，满是油亮肮脏的汗水，胡子上挂满了唾沫，一种棕色的、已经干了的沫子粘住了他的嘴唇。他试图笑一笑。但是，他在重负之下不能动，他浑身发抖，除了肩膀，那儿的肌肉显然已经在抽搐中拧成一团了。他的兄弟认出了达拉斯特，只说道："他已经跌倒过了。"苏格拉底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凑着他的耳朵说："他跳舞跳得太多了，达拉斯特先生，一整夜啊。他累了。"

厨子又一冲一冲地往前走了，不象是一个人要前进，倒象是要摆脱压在身上的重负，象是想要通过运动来减轻身上的重量。达拉斯特也不知怎么搞的，他站到了厨子的右边了。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厨子的背上，迈着又急又重的小步，在他身边走着。到了街的另一头了，圣人遗骸盒不见了，人群想必已塞满

了广场，似乎也不往前走了。有一阵，厨子身处他兄弟和达拉斯特之间，往前走了一截。很快，聚集在市政厅前等着看他过去的人群距离他就只有二十来公尺了。然而，他又停下了。达拉斯特的手使了使劲，说："走啊，厨子。再加把劲儿。"厨子浑身打颤，唾沫又从口中流了出来，而在他身上，汗水简直象喷出来一样。他喘了口气，他本想深深地吸一口，却刚一张嘴就断了。他还是动了，但走了三步就摇晃了。突然，石头滑下来了，在肩膀上划开了一个大口子，从前面落在地上，而厨子站立不稳，也侧着身子跌倒了。走在前面鼓劲的那些人大叫着往后退，其中一个抓起软木板，其余的人则抬起石头，又放在厨子的头上。

达拉斯特俯身用手替他拂去肩上的血和尘土，而他脸朝着地，呼哧呼哧地喘气。他什么也听不见了，一步也走不动了。每吸一口气，他的嘴就贪婪地张开，仿佛那就是最后一口似的。达拉斯特伸开胳膊抱住他，把他提起来，如同抱一个孩子似地不费力。他让他站好，紧贴着他。他俯下身，对着他的脸说了几句话，象是要把他自己的力气吹进去似的。过了一会儿，遍身血污的厨子离开他，脸上表现出惊恐不定的样子。他摇摇晃晃地又朝那块众人稍稍抬起的石头走去。可是，他走了几步停了，目光呆滞地看着那块石头，摇了摇头。然后，他垂下胳膊，朝达拉斯特走去。大滴大滴的眼泪在他那不成样子的脸上静静地流了下来。他想说话，他也是在说话，可他的嘴已不听使唤了。"我许下了诺言，"他说。然后，他又说："啊！船。啊！船长啊！"眼泪淹没了他的声音。他的兄弟走到他身后，抱住了他，厨子一边哭，一边就势倚在他身上，仰着脑袋。他败了。

达拉斯特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他朝人群转过身去，人群又在远处喊了起来。突然，他从一个人手中夺过软木板，朝

石头走去。他摆摆手，让那些人把石头抬起来。他几乎不费力地把石头放在自己头上。他顶着石头，背稍稍弯了弯，肩膀收紧，喘了喘气，看了看自己的脚，听见厨子还在抽泣。然后，他迈开有力的步伐走了，一口气走到街的尽头，来到人群前面。他果断地朝人群中走去，人们在他前面散开。他在一片钟声和爆竹声中走进广场，两旁观看的人们开始时吃惊地望着他，接着就静了下来。他往前走，步伐总是那么狂暴，人们在他面前闪出一条路，直到教堂。他的头顶和后脑勺开始感到石头的重压了，但他已经看见教堂和圣人的遗骸盒似乎正在平台上等着他。他朝它们走去，已经穿过广场中心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向左边拐，离开通往教堂的那条路，迎着朝圣者们走去。他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而他前面，到处是一张张大开的嘴巴。他似乎听出来那些不断朝他抛过来的话是葡萄牙语，可他不明白他们喊了些什么。突然，苏格拉底出现在他面前，转动着一双惊慌失措的眼睛，语无伦次地说着，一边朝他身后指着那条通往教堂的路。“去教堂啊，去教堂啊”，原来苏格拉底和那群人喊的是这个。然而，达拉斯特继续往前冲。苏格拉底闪开了，两臂很滑稽地伸向天空，人群也渐渐不出声了。他走上了第一条街，那条他同厨子一起走过的街，他知道它通往河边，在他身后，广场只剩下一片混乱的喧嚣了。

此时，石头压在他的头顶上，他感到疼痛了，他需要使出两只粗大的胳膊的全部力气来减轻它的压力。他走上靠近那个地区的街道了，下坡很滑，他的肩膀上已经鼓起了包块。他停下脚步，侧耳倾听。四周没有人。他把石头在软木板上放稳，小心翼翼地下坡了，步伐仍然是坚定的，直到茅屋区。他到了，却开始喘不过气了，扶着石头的胳膊也发抖了。他加快了步子，终于到了小广场，厨子的茅屋就在那儿。他朝茅屋跑过去，一

脚踢开门，一下子把石头扔在屋中央，砸在还冒着红光的火上。他站在那儿，挺直身子，突然高大无比，拼命地大口呼吸着他已不感到陌生的那种苦难和灰烬的气味，他听见他身上升起一股欢乐的暖流，这欢乐是模糊的，急切的，他说不出是什么。

屋子的主人们到了，他们发现达拉斯特在里面倚墙站着，双目紧闭。屋中央，在灶火的位置上，石头半陷进土中，沾满了灰烬和泥土。他们站在门口不动，默默地望着达拉斯特，仿佛在询问他。然而他不说话。于是，厨子由兄弟领着，走到石头旁，一屁股坐下。他兄弟也坐下了，向其他人示意。老太太过来了，昨夜的那个姑娘也过来了，但谁也不看一眼达拉斯特。他们在石头旁围了一圈，默不作声。惟有河水声穿过浓厚的空气，传了进来。达拉斯特在黑暗中站着，倾听着，什么也看不见。流水声使他的心头充满了纷乱的幸福之感。他闭着眼睛，愉快地欢呼他自己的力量，又一次欢呼生命重新开始。就在这时，一个爆竹响了，仿佛就在附近。厨子的兄弟稍稍挪了挪，朝达拉斯特半转过身去，没有看他，却对他指了指空出来的地方，说："坐下，跟我们在一起吧。"

·附　录·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
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林特**

郭宏安　译

法国文学已不再以它在欧洲的地理边界为限了。它在许多方面让人想到一种庭园植物，高贵而不可替代，即便栽培于本土之外也依然保持着独特的品性，尽管传统和变易不断地影响着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阿尔贝·加缪便是这种演化的一个例子。他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个小镇，后来他常常返回北非，在那里寻找他的童年和青年所受之决定性影响的源泉。即便是今天，加缪作为一个人仍不忘法兰西这片广阔的海外领土，而他作为一位作家则常常欣喜地提及这一事实。

加缪出身于半无产者家庭，他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闯生活；他做学生时一贫如洗，做过各种杂工来维持生计。这是一种艰苦的磨炼，但对于他后来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显然不是没有用的。他在阿尔及尔大学读书的时候，进入了一个知识分子圈，这个知识分子圈后来在北非抵抗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他最初的一些著作，是由阿尔及尔的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岁上，他作为新闻记者踏上了法国本土，很快就以第一流的作家而闻名首都，战争年代严酷而狂热的气氛使他早熟了。

即使在他最早的著作中，加缪也表现出一种精神上的态度，这态度产生于他内心中尖锐的冲突：他一方面执着于此世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摆脱不了死亡意识的纷缠。这已经不仅仅是典型的地中海宿命论了，这宿命论的根源，是认定这个世界的阳光虽然明媚，却是转瞬即逝，终归要被阴云遮蔽。加缪也代表着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这运动认为人在宇宙间的处境并无任何个体的意义，只不过是荒诞而已。“荒诞”这个词在加缪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简直可以说是他作品的主导主题了，这主题在自由、责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苦闷之上发展为种种合乎逻辑的道德后果。

在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顶，又滚下来，如此反复，永无休止。这西绪福斯在加缪的一篇论文中，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简洁的象征。但在加缪的解释中，西绪福斯内心深处是幸福的，因为这推石上山的愿望本身已经使他满足了。在加缪看来，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追问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须如何去活，其中包含着承受因生活而来的痛苦。

这一篇短短的介绍不允许我追溯加缪的总是令人神往的精神发展。我只能谈谈他的作品，他运用一种完整纯净的古典风格和高度的凝炼，把问题具体化为某种形式，人物和行动使他的观念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无须作者从旁议论。《局外人》（1942年）所以著名，原因即在于此。该书主人公，一个政府雇员，于一连串荒诞事件之后，杀了一个阿拉伯人；随后，他对自己的命运漠然置之，聆听死刑的宣判。然而，在最后一刻，他从近乎麻痹的消极之中觉醒。《鼠疫》（1947年）是一部

气魄宏大的象征小说，主人公是里厄医生和他的助手，他们对降临在那北非城市的鼠疫进行了英勇的搏斗。令人信服的写实的叙述以平静准确的客观性反映出抵抗运动中的生活经验，加缪赞扬了反抗，那种恶的侵入在那些极度灰心和失望的人们心中唤起的反抗。

不久以前，加缪给了我们一部极其出色的独白故事，这就是《堕落》（1956），这部作品也同样展示了说故事的艺术。一位法国律师在阿姆斯特丹一间水手酒吧里审视自己的良心，为自己画像，这是一面同代人都可以在其中认出自己的镜子。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依据法国古典文学所擅长的人心研究使伪君子和恨世者合而为一。作者酷爱真理，这辛辣的讽刺用在他手上，就成了反对普天下的虚伪的武器。当然，有些人会感到惊异，加缪如此强调克尔凯郭尔式的罪恶感（其无底深渊无处不在）究竟要冲向何处，不过总有人会感到，作者已然到了他们发展的转折点了。

就个人来说，加缪已远远地超越了虚无主义。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并且没有忘记在地中海岸蒂巴萨的夏日耀眼的阳光中呈现出的希腊美与均衡。

加缪是活跃的，具有高度的创造力，即便在法国之外，也处于文学界注意的中心。他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致力于探讨人生最基本的问题，这种热切的愿望无疑地符合诺贝尔奖为之而设立的理想主义目标。他不断地确认人类处境之荒诞，然而其背后却非荒芜的否定主义。在他那里，对于事物的这种看法得到一种强有力的命令的补充，即“但是”，一种将要反叛荒诞的意志，他因此而创造了一种价值。

受奖演说

〔法国〕阿尔贝·加缪
郭宏安　译

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接受你们的自由的科学院给予我的荣誉，尤其是我知道这一奖赏大大地超出了我个人的功绩。所有的人，特别是艺术家，都希望被承认。我也是如此。然而，在获悉你们的决定的时候，我不能不将其影响和实际的我做一比较。一个差不多还算得年轻① 的人，拥有的只是怀疑和尚待完成的事业，习惯于生活在工作的孤独或友情的荫护之中，在获悉一种突然间使他于一片刺眼的光明之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决定之际，怎能不处于某种惊惶失措的境地？在欧洲，一些最伟大的作家被迫沉默，他的故土② 正经受着一种无休止的苦难，此时此刻，他能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这种荣誉？

这种不安和这种内心的慌乱，我是有的。为了重新得到安宁，说到底我得和一种过于慷慨的命运来一次清算。既然我只

① 加缪此时44岁。

② 指阿尔及利亚。

能依靠我个人的功绩来和它相称，那么，我找到的能够帮助我的东西，只是在我一生中各种最矛盾的环境中支持着我的那种东西，即我对我的艺术和作家的作用所持有的看法。我只要求允许我怀着感激和友好的感情尽可能简单地向你们说一说这看法是什么。

就我个人来说，我没有我的艺术就不能生活。但是，我从未将这种艺术置于一切之上。相反，如果说它对我是不可或缺的，那是因为它并不与任何人相脱离，它允许我以我本来的面目和大家一样地生活。在我看来，艺术并不是一种独自的享乐。它是通过给予最大多数人以关于共同的苦乐的特殊的形象来使之受到感动的一种方式。因此，它迫使艺术家不离群索居，它使他听命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一个人常常因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才选择了艺术家的命运，但他很快就明白，他只有承认他与众人相象，才能给予他的艺术、他的不同之处以营养。正是在他与别人之间的不断的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脱离的集体的途中，艺术家成熟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艺术家什么都不蔑视，他们迫使自己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如果他们在这世界上有什么事业要支持的话，那只能是一种社会的事业，根据尼采的壮语，统治这个社会的不再是法官，而是创造者，不管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

这样，作家的作用就与某些困难的责任难解难分了。从定义来说，他今天不能为创造历史的那些人服务，因为他为之服务的是那些承受历史的人。不然的话，他就要孤立，失去了他的艺术。暴政的数百万军队也不能把他从孤独中拉出来，尤其是当他同意跟着他们亦步亦趋的时候。然而，世界的另一端的一个无名的、饱受屈辱的囚徒的沉默却足以使作家从流亡中走

出来，只要他在自由的特权中能够不忘记这种沉默，能够通过艺术的方式使之引起反响。

我们谁都没有伟大到足以完成这样的使命的程度。但是，作家在其一生的各种情势中，默默无闻或名噪一时，身处暴政的镣铐之中或暂时获得了言论的自由，却可以找到一种为他辩白的活生生的团体的感情，唯一的条件是他尽可能地接受造成他的职业的伟大的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和为自由服务。既然他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那么这种使命就不能将就谎言和奴役，而谎言和奴役在其占统治地位的任何地方都使孤独迅速地扩散。无论我们个人的缺陷如何，我们的职业的高尚将永远扎根在两种难于履行的承诺之中：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和抵抗压迫。

在一种荒唐的历史的二十多年中，我象所有的一切同龄人一样，孤零零地迷失在时代的动乱之中，支持我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即写作在今天是一种光荣，因为这一行动承担着义务，不仅仅写作而已。它特别迫使我按照我的本来面目并根据我的力量来和经历着同一历史的人们承受我们共有的痛苦和希望。这些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希特勒政权建立和最初的革命审判发生时是二十岁，随即面临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的天下以及酷刑和监狱的欧洲，并以此完成了他们的教育，今天，他们得在一个受到核毁灭的世界中教育他们的儿子和从事他们的事业。我想，谁也不能要求他们乐观。我甚至认为我们应当理解（同时也不断地与之进行斗争）那些人的错误，他们因日益加重的绝望而要求自轻自贱的权利，一窝蜂地奔向时代的虚无主义。然而，在我的祖国，在欧洲，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拒绝了这种虚无主义，并着手寻求一种正当性。我们得造就一种在灾难性时代过生活的艺术，以便获

得再生，然后公开地对正在我们的历史中起作用的死亡本能进行斗争。

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不过我这一代人知道它改造不了世界。但它的任务也许更伟大。这任务是阻止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了一段腐败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精疲力尽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躬屈节到为仇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因此，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其自身及周围从自我否定开始来恢复些许造就生与死之尊严的东西。面对着一个有着解体危险的、我们的伟大的审判者可能永久地建立起死亡之国的世界，这一代人知道它应该在一场刻不容缓的疯狂的奔跑中恢复民族之间的并非奴役的和平的和平，重新使劳动和文化协调一致以及与所有的人一起重造圣约柜。不能肯定它一定能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接受有关真理和自由的双重打赌，并且到时候知道为此而不怀仇恨地死去。它在所到之处都有资格受到欢呼和鼓励，尤其是在它牺牲自己的地方。无论如何，我愿意把你们刚刚给予我的荣誉转赠于它，我确信你们内心深处是同意的。

在说完写作这一职业的高尚之后，我同时就要把作家放回到他的真正的位置上去，他只有与战友共享的名义，他脆弱但也固执，他不公正却又醉心于正义，他在众目睽睽下既无羞愧又无骄傲地构筑他的作品，永远处在痛苦和美的分割之中，并且一心一意要从他的双重存在中提取他固执地试图在历史的破坏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作品。如此说来，谁能够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现成的解决办法和好听的道德教训？真理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总是需要争取的。自由是危险的，既难以承受又激动人

心。我们应当艰难然而坚决地朝着这两大目标前进，事先就确信我们会昏倒在一条如此漫长的道路上。此后还有哪一位作家敢于充当美德的宣扬者而心安理得？至于我，我得再次申明我与这些东西毫无干系。我从来也不能放弃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自由的生活。然而，尽管这种怀念解释了许多我的错误和过失，它无疑帮助了我理解我的职业，它还在帮助我站在那些沉默的人的身旁，他们在这世界上只是由于回忆或者重获短暂而自由的幸福才忍受了强加给他们的生活。

我这样地回到实际的我，回到我的局限，回到我的债务，回到我的困难的信仰，我才感到更自由地向你们展示你们刚刚给予我的荣誉的广度和慷慨，也更自由地向你们说我愿意把它作为向所有那些人表示的敬意来接受，他们分担了同样的战斗，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权，反而遭受了不幸和折磨。最后，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并且公开地作出那个古老的忠诚的许诺，以此表示我个人的感激之情，而这个许诺，每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每天都在无言中向自己作出的。

艺术家及其时代

——1957年12月14日的演说①

〔法国〕阿尔贝·加缪

郭宏安　译

一位东方的智者总是在他的祈祷中要求神明使他避开一个不甘寂寞的时代。我们不是智者，神明放不过我们，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不甘寂寞的时代，无论如何，它不允许我们对这个时代漠不关心。今日的作家知道这一点。如果他们说话，立刻就受到批评和攻击。如果他们变得谦虚而闭口不言，人们就将只跟他们谈论他们的沉默，吵吵嚷嚷地指责他们。

在这一片喧嚣之中，作家再也不能希望置身局外继续其心爱的沉思和想象了。到目前为止，弃权在历史上好歹总算还是可能的。但是今天一切都变了，沉默本身也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意义。从弃权本身被看作是一种选择那一刻起，为此而受到惩罚或称赞的艺术家就被卷入了，不管他愿意与否。在这里我认

① 这是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瑞典乌普萨尔大学作的一次演说。

为卷入比介入更恰当。实际上，对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在于一种自愿的介入，确切地说，是一种义务兵役。今天，每一个艺术家都登上了时代的帆桨战船。他必须顺从，尽管他认为这船有鱼腥味儿，苦役犯看守也的确太多了，更糟糕的是，航向选择得还不对。我们身处满潮的海上。艺术家得象其他人一样划桨，如果能的话就不要死，这就是说，要继续活着和创造。

说真的，这并非易事，我理解艺术家们怀念他们往日的舒适。变化是有些突然。的确，在历史的竞技场里总是有受难者和狮子。前者靠永恒的安慰来支撑，后者靠的是带血的历史食物。但是，前此艺术家一直是坐在座位上。他无目的地歌唱，为他自己，或者至多是为了鼓励受难者和稍许缓解狮子的饥肠。现在不同了，艺术家站到了竞技场中。他的声音肯定不是原来的了，远非那么自信了。

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变的义务使艺术失去的是什么。首先是悠然自如，还有莫扎特作品中洋溢着的那种神圣的自由。人们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的艺术品的惊慌而固执的神情、忧心忡忡的愁容及其突如其来的崩溃。人们明白了我们之间何以记者多于作家，画匠多于塞尚，明白了粉色图书和黑色小说何以取代了《战争与和平》和《巴马修道院》。当然，人们总是可以用人道主义的悲叹来与这种状况相对，成为《群魔》中 的斯切 潘·特罗菲莫维奇极力要成为的那种东西：谴责的化身。人们也可以象这个人物一样发泄一番国民的忧郁。然而，这种忧郁丝毫无改于现实。依我看，最好是加入这个时代，既然时代那么强烈地要求他加入，最好是坦然地承认，有着心爱的大师、戴茶花的艺术家和坐在安乐椅上的天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创造就是危险地创造。任何发表都是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会引起一个什么也不饶恕的时代的激烈的情绪。因此，问

题不在于知道这是否有损于艺术。对于一切没有艺术或没有艺术的含义就不能生活的人们来说，问题仅仅在于知道在如此多的意识形态（多么多的教堂，怎样的孤独啊！）的治安之中，创造的奇特的自由如何才是可能的。

就此只说艺术受到了国家政权的威胁是不够的。如此则实际上问题就简单了：艺术家或是战斗或是投降。然而一旦人们觉察到战斗就在艺术家内心中发起时，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也更为致命了。我们的社会不乏憎恨艺术的好例，这种憎恨今天所以有如此的效力，只是因为它受到了艺术家本人的维护。先前的艺术家的怀疑与他们自己的才能有关。今天的艺术家的怀疑却关系到他们的艺术的必要性，因此也关系到他们的存在本身。拉辛写了《贝蕾尼斯》而没有为保卫南特敕令进行斗争，在一九五七年就得请求原谅。

艺术家对艺术的这种怀疑有许多理由，我们只须记住其中最高尚的。这种怀疑可以由现代艺术家可能会有的一种印象来解释，即：假使他不考虑到历史的苦难的话，他就是在撒谎或者无病呻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群众及其悲惨处境突然涌现在现代的意识面前。现在人们知道群众是存在的，但以前却倾向于忘掉他们。而如果说现在人们知道这一点，那并不是因为杰出人物、艺术家或别种人变得更好了，不，请放心，而是因为群众变得更强大了，不允许人们忘记他们。

艺术家的这种失职还有其它理由，有些是不那么高尚的。但是，无论这些理由如何，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标：通过攻击其基本原则，即艺术家对自己的信念，来阻止自由的创造。爱默生精辟地说："一个人对自己的才能的服从，这是最好的信念。"十九世纪的另一位美国作家补充说："只要人忠于自己，一切就都顺乎自然，诸如政府，社会，太阳，月亮和星

辰。”今天，这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似乎已经死亡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自渐形秽，如果他有特权的话，则为他的特权感到羞愧。他首先应该回答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艺术是一种骗人的奢侈吗？

一

人们可以作出的第一个诚实的回答是：事实上艺术有时候是一种骗人的奢侈。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可以站在帆桨战船的艉楼上歌唱星辰，而苦役犯们正在底舱划桨，累得力竭精疲，人们总是可以记下竞技场观众席上进行的风雅的谈话，而牺牲品正在狮子的牙齿间喀嚓作响。人们很难提出什么来反对这种曾在过去取得巨大成功的艺术，除非说事情已有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苦役犯和受难者的数目在地球上不可思议地增加了。在如此众多的苦难面前，这种艺术如果还想继续是一种奢侈的话，那在今天就得承认同时也是一种谎言。

那么事实上它将要说些什么呢？如果它要符合我们的社会的大多数要求的话，它就将是没有意义的消遣。如果它闭上眼睛一味拒绝，如果艺术家决定幽居在他的梦幻之中，那么它将只表达一种拒绝而别无其它。这样，我们有的将是一种逗人开心者的作品或者形式的专家的作品，这两种作品都导致一种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的艺术。大约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一种社会里，这种社会甚至连金钱(金银可以引起有血有肉的情欲)社会都不是，而只是一种金钱的抽象象征的社会。商人社会可以定义为：事物为了符号的利益而消失的社会。当一个领导阶

级不再用地亩和金条而用与某种数量的交换活动确切相应的数字来衡量其财富的时候，它就同时把某种类型的神秘化置于它的经验和它的世界的中心了。一个建立在符号之上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人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有血有肉的真实被神秘化了。于是，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其原则徒具形式的道德作为它的宗教，既可在它的监狱又可在它的金融庙堂上写下自由和平等的字样，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然而，人是不能滥用词语而不受到惩罚的。今日最受诽谤的价值肯定是自由的价值。一些思想正统的人（我一直认为有两种智力，一种是聪明的智力，一种是愚蠢的智力）认为自由不过是真正的进步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已。如此庄严的蠢话能够被高声道出，是因为一百年来商品社会对自由进行了单方面的排它性的利用，把它视为一种权利而非一种义务，肆无忌惮地尽量把一种原则上的自由拿来为一种事实上的压迫服务。这样，这个社会不要求艺术成为解放的工具而只要求它成为没有多大后果的活动和仅仅成为一种消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整个上流社会，这个人们最关心的是钱、唯一的烦恼是感情的上流社会，就满足于它的风流小说家和最无聊的艺术，关于这种艺术，奥斯卡·王尔德在尝到铁窗风味之前，想到自己时曾经说过，最大的罪孽是肤浅。

资产阶级的欧洲的艺术匠们（我还没有说艺术家）在一九〇〇年前后就这样地接受了不承担责任，因为承担责任意味着一种与他们的社会之间的令人疲惫不堪的决裂（真正与之决裂的是韩波、尼采、斯特林堡，人们知道他们付出的代价）。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不过是要求这种不承担责任而已。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孤独的艺术家的消遣，恰恰是一个人工的、抽象的社会的艺术。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沙

龙艺术，或者纯粹形式的艺术，以矫揉造作和抽象空想为营养，最终将毁灭全部现实性。某些作品使某些人愉快，而许多粗俗的玩艺儿败坏了许多人。最后，艺术置身于社会之外，切断了自己的活的根子。渐渐地，甚至很受欢迎的艺术也变得孤独了，或者只有通过报刊或广播才为国人所知，而报刊和广播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方便的、简单化的概念。实际上，艺术越是专门化，庸俗化就越是必然。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以为知道当代的某位大艺术家了，因为他们通过报纸知道他养金丝雀或者他每次结婚从不超过六个月。今天，最大的名声在于不被阅读而受到赞赏或憎恶。任何一位想在我们的社会中出名的艺术家都应该知道，出名的不是他，而是顶着他的名字的某个人，最终将要摆脱他，也许有一天要在他身上除掉真正的艺术家。

这样，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商业的欧洲所创造出来的几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在文学上，都是反对当时的社会的，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直到临近法国革命的时候，活动着的文学大体上说是一种赞同的文学。从产生于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稳定下来的时候起，却发展起来一种反抗的文字。官方的价值被否定了，比方说在我们这里，或者被从浪漫派到兰波那样的革命价值的传播者否定，或者被贵族价值的保持者否定，维尼和巴尔扎克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平民和贵族是一切文明的两大源泉，他们都反对当时的虚假的社会。

然而，这种拒绝坚持得过于长久，僵化了，也变成虚假的了，导致了另一种贫乏。恶魔诗人这一主题产生于商业社会（《查铁敦》是最好的说明），它僵化为一种偏见，结果认为只有反对当时的社会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而不管是什么社会。当这一主题断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为金钱世界创作时，它是合理的，然而，当人们就此得出结论说，一个艺术家只有反对一

切才能成功，这时，这一原则就是错误的了。因此，我们有许多艺术家希望受人诅咒，否则就心中有愧，他们既盼望着掌声，又盼望着嘘声。当然，社会今天是累了或者是冷漠了，它只偶尔地鼓一下掌或喝一声倒采。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了使自己高大起来就不断地使自己更强硬。然而，由于拒绝一切，甚至拒绝他的艺术的传统，当代的艺术家幻想着创造自己的法则，最终以为自己就是上帝。同时，他也以为能够自己创造自己的现实。但是，远离社会，他只能创造出形式的或抽象的作品，作为经验来说是动人的，却缺乏真正的艺术所特有的丰富性，而真正的艺术的使命是团结。总之，当代的精微或抽象与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之间的差别，指望尚未看见的麦子来贴现的票据和布满犁沟的肥厚的土地之间的差别，这两者是一样的。

二

如此说来，艺术可以是一种骗人的奢侈。因此人们不必惊奇，有些人或艺术家想要倒退，返回到真实上面去。于是，他们不承认艺术家有权离群索居，他们向艺术家提议不要把自己的梦幻而要把众人经历过、承受过的现实作为主题。这些人确信为艺术而艺术从主题到风格都不能为群众所理解，或者根本不表达真实，他们希望艺术家以为了大多数人、描写大多数人为己任。他要用普通人的语言表达普通人的痛苦和幸福，这样他就会获得普遍的理解。作为绝对忠于现实的奖赏，他将获得人与人之间的全面的交流。

这种普遍交流的理想实际上是一切伟大的艺术家的理想。与流行的偏见相反，如果说某人无权离群索居，那恰恰是艺术家。艺术不能是一种独白。一个孤独的、不为人知的艺术家，当他诉诸后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重申他的深刻的使命罢了。当他认为与充耳不闻或心不在焉的同代人不可能对话时，他就寄望于和后世人有更多的对话。

但是，为了谈论一切人，诉诸一切人，就应该谈论众所周知的东西，谈论我们共有的现实。大海，雨，需要，欲望，与死亡的斗争，这些就是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的东西。我们在我们共同看见的东西之中、在我们共同承受的东西之中是彼此相象的。梦幻随人而异，但世界的现实是我们共有的祖国。所以，现实主义的抱负是合理的，因为它与艺术的冒险深深地联在一起。

那就成为现实主义者吧。更确切地说，努力成为现实主义者吧，只要现实主义是可能的。因为这个词是否有意义，并不是很可靠的；尽管现实主义是合乎愿望的，但它是否是可能的，却并不很可靠。首先我们要想一想艺术上的纯现实主义是不是可能。根据上世纪的自然主义者们的声明，现实主义是现实的准确复制。因此，它（指现实主义——译者）之于艺术就如同摄影之于绘画，但前者是复制，而后者却是选择。然而，摄影复制了什么？现实又是什么？无论如何，即便最好的摄影，其复制也不够忠实，也还不够现实主义。比方说，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生活更为现实呢？有什么能比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更能再现它呢？然而，在什么条件下这样一部电影才是可能的呢？在一些纯粹想象的条件下。事实上得假定有一架理想的摄影机日日夜夜对准这个人，不间断地记录下他的最细小的动作。其结果将是得到一部电影，放映它的时间和这个人

的生命一样长，观看它的只能是那些观众，他们肯牺牲自己的的活来专门关心另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即便在这种条件下，这样一部难以想象的影片也不是现实主义的。道理很简单，人的生活的现实并不单单存在于他所在的地方。它也存在于其它给予此人的生命以一种形式的生命之中，首先是所爱的人的生命，也得拍摄下来，还有其它不相识的人，有权有势的或悲惨可怜的，同胞，警察，教授，矿山和工地上的无形的伙伴，外交家或独裁者，宗教改革者，创造了一些对我们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神话的艺术家，还有控制着最有条理的生活的至高无上的偶然性所派出的那些卑微的代表。所以，只有一部可能的现实主义影片，就是用一部看不见的机器对着世界这银幕在我们面前不间断地放映的那部影片。唯一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将是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其余的艺术家肯定是不忠于现实的。

于是，拒绝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形式的艺术家、想要谈论现实并且只谈论现实的艺术家就处在一种痛苦的绝境之中。他们应该做一个现实主义者，然而却不能够。他们想使他们的艺术服从现实，却不进行选择就不能描写现实，而这种选择就使现实服从某种艺术的独特性。俄国革命初期的美丽而悲壮的作品就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这种痛苦。此时俄国的布洛克、伟大的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爱森斯坦以及最初一批描写水泥钢铁的小说家们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形式和主题的壮丽的实验室，一种内涵丰富的不安，一种探索的疯狂。不过应该做出结论了，应该说明人们如何成为现实主义者，虽然现实主义是不可能的。专制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是一针见血的：在它看来，现实主义首先是必要的，其次是可能的，条件是它愿意是社会主义的。这种命令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它坦率地承认，不进行选择就不能复制现实，它

拒绝了十九世纪所提出的那种现实主义理论。剩下的只是要找出一个选择的原则，而世界将据此组织起来。它找到了，但不是在我们知道的那种现实里，而是在未来的那种现实里。为了复制好现在，必须也描绘将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对象，恰恰是还不是现实的那种东西。

这矛盾相当妙。然而说到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表达方式本身就是矛盾的。事实上，现实并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能是可能的呢?比方说，过去的现实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在的也不完全是。回答很简单：人们在今日或昨日的现实中将选择出准备和有助于建立未来的理想国的东西。因此，一方面，人们执意否定、谴责现实中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则颂扬社会主义的或将要成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到宣传的艺术，包括其好坏两方面，要得到一种粉色的图书，它象形式的艺术一样，也脱离了复杂的、生动的现实。终于，这种艺术将是社会主义的，而恰恰不是现实主义的。

这种想要成为现实主义的美学于是成了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它跟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同样不结果实。现实被公然地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为了被消除得更干净。艺术被化为乌有。它为什么东西服务，因为服务而被奴役。唯有那些留心不去描绘现实的人才被称作现实主义者而受到称赞。其他人则在前者的掌声中受到指责。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出名就在于不被人阅读或被人不正确地阅读，而在极权的社会中，出名则在于阻止别人被人阅读。在这里，真正的艺术受到歪曲或钳制，正是那些最热情地希望普遍的交流的人反而使人变成不可能。

面对这样一种失败，最简单的是承认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与伟大的艺术毫无关涉，为了革命的利益，革命者应该寻求另一种美学。相反，人们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捍卫者们大声疾呼除此之外不可能有艺术。他们确是这样大声疾呼的。但是，我深信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们认为艺术的价值应该服从革命行动的价值。如果这些东西被明确地说了出来，讨论将变得更为容易。人们可以尊重一些人的这种伟大的弃绝，他们对于普通人的不幸和有时给予艺术家的命运的特权之间的对立感到太痛苦了，他们拒绝这种令人不能忍受的距离，即受到苦难压制的人们和其使命就是表达自己的那些人之间的距离。人们可以理解这些人，试着同他们对话，例如告诉他们取消创造的自由也许并不是战胜奴役的好办法，在等待着为一切人说话的时候放弃至少可以为某些人说话的权利是愚蠢的。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承认它的亲缘关系，应该承认它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孪生兄弟。它为了一种与艺术无关的目的牺牲了艺术，而艺术在价值的等级中是可以处在更高的位置上的。总之，它为了首先建立公正而暂时地取消了艺术，在一种还不清晰的未来中，有了公正，艺术就会复活的。这样，人们就在有关艺术的事情中实行了当代智慧的这种金科玉律，即不打破鸡蛋就做不了摊鸡蛋。然而，这种不可抗拒的理智骗不了我们。为了做一盘好的摊鸡蛋，不必打破成千上万个鸡蛋，我觉得不能根据碎蛋壳的数量来判定厨师的质量。我们时代的艺术厨师应该惟恐打翻了比他之所愿更多的鸡蛋篮子，惟恐摊鸡蛋再也做不出来以及艺术终于并不能复活。野蛮从来也不是暂时的。它是不可分的，它从艺术扩展到风俗也是正常的。于是，人们看到从人的不幸和鲜血中产生出毫无意义的文学、好名声的报刊、拍照的肖像和仇恨取代了宗教的教育戏剧。艺术在这里达到了强制的乐观主义的顶点，这恰恰是最坏的一种奢侈，最可笑的一

种谎言。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的痛苦是个高贵的主题，除非象济慈那样，据说他敏感到可能会用手去触摸痛苦本身的程度，否则是没有人能去碰这个主题的。当一种造命文学想要给这种痛苦以官方的安慰的时候，人们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谎言装作不知道恶，这样它就承担了责任。然而现实主义的谎言，如果说它有勇气承认人的现时的不幸的话，却因利用它颂扬一种未来的幸福而同样严重地背叛了这种不幸，谁都对那种幸福一无所知，所以它可以允许任何神秘化。

两种美学长期对立，一种要求全面拒绝现时，一种声称抛弃一切非现时的东西，最后是远离现实，在同一种谎言和对艺术的取消中汇合了。右的学院派不知道苦难，左的学院派则加以利用。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在艺术被否定的同时苦难都变得更为深重。

三

应该得出结论说这种谎言就是艺术的本质吗？我要指出，我上面说到的那两种态度所以是谎言，只是因为它们与艺术没有多大关系。那么究竟艺术是什么呢？一切都不那么简单，这是肯定的。而在那么多热中于把一切都简单化的人的喧嚣之中知道什么是艺术就更加困难了。一方面，人们希望天才既辉煌灿烂又离群索居，另一方面，人们又要求他与众人相象。可实际上更为复杂。巴尔扎克用这样一句话让人们感到这一点："天才象一切人，而没有人象他。"艺术就是这样，没有现实，它

就什么也不是，而没有艺术，现实也就微不足道了。事实上，艺术怎么能脱离现实，又怎么能服从现实呢？艺术家选择对象正如它被对象所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对世界中流逝和未完成的东西的一种反抗：它只是想要给予一种现实以另一种形式，而它又必须保持这种现实，因为这种现实是它的激动的源泉。从这一点看，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而又都不是，对现存的东西来说，艺术既不是完全的拒绝也不是完全的赞同。它同时是拒绝和赞同，这就是为什么艺术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分裂。艺术家总是处在这种模棱之中，既不能否认现实，又永远要批评它那永远是未完成的东西。为了画一幅静物画，画家和苹果要相互对立、相互修正。如果说没有光，形式就什么也不是，那么形式也为这光增添了些什么。真实的世界因其光辉而使形体和雕像得以产生，同时也从它们那里获得了固定住天空的光的第二种光。伟大的风格就这样处于艺术家和他的对象之间。

因此，问题不在于知道艺术应否脱离或服从现实，而仅仅在于知道作品应该准确地装有多少真实才不至于消失在九霄云外或者穿着铅底鞋蹒跚而行。每个艺术家都尽其所感与所能地解决这一问题。一个艺术家对世界的现实的反抗越是强烈，使他得到平衡的真实的重量就可能越大。然而这重量永远也不会窒息艺术家对孤独的要求。正如希腊悲剧、麦尔维尔、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最上乘的作品永远是那种使真实和人针对这真实而提出的拒绝获得平衡的作品，它们使对方在一种不断的喷涌中活跃起来，而这种喷涌正是快乐而痛苦的生活的喷涌。于是渐渐出现一个新世界，与日常的世界不同，却仍然是同一个世界，既特殊又普遍，充满了无邪的不安全感，它是由天才的力量和不满一时地产生出来的。是这样，又不是这样，

世界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这就是每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双重的、不断的呼声，这呼声使他站立，总是睁大双眼，渐渐地为那些处在沉睡的世界中心的人们唤醒一种现实的转眼即逝、瞬息万变的形象，这形象我们认识却从未遇见过。

同样，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地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个人。他不能摆脱这种暧昧状态。艺术家从历史中取得的是他可以在自己身上看到的东西，或者，他直接或间接地容忍严格意义上的现时以及现在活着的人，而不是这种现时和活着的艺术家不能预见的未来之间的关系。以尚未存在的人的名义评判当代的人，这是预言的角色。艺术家只能估量人们根据其对活着的人的影响向他提出的那些神话。宗教或政治的预言家可以绝对地进行评判，而人们知道他是免不了的。但是艺术家不能。如果他绝对地进行判断，他就将不分轩轾地把现实分为善与恶，他就将陷入情节剧之中。相反，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理解。由于理解得深刻，它有时也统治。然而，从未有过一部天才的作品是建立在仇恨和轻蔑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在其行进终了时总是宽恕而不是谴责。他不是法官，而是辩护者。他是活生生的创造物的永远的辩护人，因为创造物是活生生的。他真正地为爱邻人进行辩护，而不为那种对于远方的爱辩护，那种爱将当代的人道主义降为法庭上的信条。相反，伟大的作品终将使一切法官哑口无言。因此，艺术家既向最伟大的人物致敬，又在最卑劣的罪犯面前低下头去。王尔德在狱中写道："与我一起关在这悲惨的地方的不幸者中，没有一个不和人生

的秘密有着象征的关系。”是的，而这人生的秘密和艺术的秘密是相吻合的。

一百五十年间，商业社会的作家们除极少数例外，都认为可以生活在一种幸福的不承担责任之中。事实上，他们是在孤独中生，在孤独中死。我们二十世纪的作家，我们绝不会再孤独了。相反，我们应该躲避大家共同的苦难，而我们唯一的辩护，如果有的话，就是尽我们的能力为那些不能说话的人说话。然而我们实际上应该为所有那些人这样做，他们此时正因压迫着他们的政府和政党而感到痛苦，不管它们过去或将来是多么强大：对于艺术家来说，并没有什么拥有特权的刽子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政党服务；它只能在或遥远或邻近的日子里为人的痛苦和自由服务。唯一的介入艺术家是那种艺术家，他绝不拒绝战斗，但至少拒绝加入正规军，我指的是自由射手。他从美中得到的教训，如果这教训是正当地得出的话，就不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教训，而是一种艰难的博爱的教训。这样孕育出来的美从未奴役过任何人。相反，几千年来，它每时每刻都减轻了几百万人的奴役，有时甚至永远地解放了某些人。最后，也许是在美和痛苦、对人的爱和创造的疯狂，不堪忍受的孤独和使人疲乏不堪的人群、拒绝和赞同之间的这种永久的紧张状态之中，我们触及到了艺术的伟大。它在无聊和宣传这两大深渊之间行进。伟大的艺术家在这条山脊线上前进，每一步都是一种奇遇，都是一次极端的冒险。然而艺术的自由正是，也仅仅是处在这种冒险之中。这自由是艰难的吗？它更象是一种苦行的纪律吗？有哪一位艺术家会否认这一点呢？有哪一位艺术家敢自称胜任这一永无休止的任务呢？这自由意味着心灵和肉体的健康，意味着就象是灵魂的力量的一种风格，意味着耐心的冲突。它象一切自

由一样，是一种不断的冒险、令人疲惫的奇遇，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今日就象逃避苛求的自由一样逃避这种冒险，以便拥向各式各样的奴役，这至少可以获得灵魂的舒适。然而，假使艺术不是一种奇遇，那它又会是什么呢？它的理由何在呢？不，自由的艺术家和自由的人一样，不是舒适的人。自由的艺术家是那种非常困难地建立起自己的秩序的人。他要整理的东西越是杂乱无章，他的规则就越是严格，他就越是肯定了他的自由。纪德有一句话我一直是赞同的，尽管它可能引起误解："艺术以束缚为生，而死于自由。"确是如此。但是，不应该因此就认为艺术可以是被操纵的。艺术只是以它为自己规定的束缚为生：它死于其它的束缚。相反，假使它不受自己束缚，它就要胡说八道，成为影子的奴隶。因此，最自由的艺术，最富反抗的艺术，就是最古典的艺术；它将使最大的努力成功。只要一个社会及其艺术家不赞成这种最大的努力，只要他们追求消遣的舒适或因循的舒适、为艺术而艺术的把戏或现实主义的艺术的说教，它的艺术家们就将停留在虚无主义和贫乏之中。这样说，就是说今日之复兴取决于我们的勇气和我们的富有远见的意志。

是的，这种复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西方能否产生出一些反亚历山大者，这取决于我们，这些反亚历山大者应该重新联结上文明的戈耳迪之结，这个结曾被剑砍开①。为此我们必须承担自由的一切风险和工作。问题不在于知道我们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能否保持住自由。问题在于知道，没有自由我们将一事无成，既要丧失未来的正义，又要丧失已有的美。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摆脱孤独，而孤独只能飞翔在孤独的人们的头上。

① 据古希腊神话，戈耳迪所系之结，牢固难解，后为亚历山大用利剑斩开。

由于这种我试图加以确定的自由的本质，艺术在暴政使人分离的任何地方使人团结。因此，它成为任何压迫的公开的敌人，这有什么可令人惊奇的呢？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暴政（不管是右的还是左的）的首批牺牲品，又有什么可令人惊奇的呢？暴君知道艺术品中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只有对那些不崇拜艺术品的人，这种解放的力量才是神秘的。每一种伟大的作品都使人的面目更加令人赞叹，更加丰富，这就是它的全部秘密。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和监狱铁窗并不足以模糊这种令人震惊的尊严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为了准备一种新文化而哪怕是暂时地中止文化。人们不能中止人对其苦难和高贵的不间断的见证，人们不能中止呼吸。不存在一种没有遗产的文化，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拒绝我们的、即西方的遗产。无论未来的作品是什么样，它们都将包含着同一个秘密，由各时代各民族的成千上万个艺术家的勇气、自由和胆识造就的秘密。是的，当现代暴政问我们显示出，艺术家就是局限在其职业之内也是公众的敌人时，它是有道理的。然而，这样它也通过艺术家向人的一种形象表达了敬意，迄今为止，任何东西也未能粉碎这一形象。

我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历史的喧嚣和疯狂之中大声疾呼："让我们高兴吧！"的确，让我们因看到一个说谎的、舒适的欧洲死去、我们面对严酷的真理而感到高兴吧。让我们作为人而高兴吧，因为一个长期的神秘崩溃了，我们看清了威胁着我们的东西。让我们作为从昏睡和耳聋中解脱出来的，必须挺立在苦难、监狱、鲜血面前的艺术家而高兴吧。如果面对这种景象我们能够记住过去的岁月和人的面孔，如果面对世界的美我们能够不忘受屈辱的人们，那么，西方的艺术就会逐渐

重获它的力量和优势。可以肯定，艺术家面对这样严峻的问题，在历史上罕有其例。然而，恰恰是因为词句，哪怕是简单的词句要付出自由和鲜血的重价，艺术家才学会了有节制地使用它们。危险带来了经典性，总之，任何伟大的东西都植根在风险之中。

不承担责任的艺术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为了一些小小的幸福而怀念这个时代。然而我们也知道承认这一考验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获得自身的真实性，我们接受这种挑战。当艺术自由只意味着保证艺术家的舒适时，它是不那么珍贵的。为了使一种价值或一种品质在一个社会中扎根，应该不欺骗它，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地为它付出代价。如果自由变得危险，那末它就将不再被出卖了。例如，我不能同意有些人抱怨今日智慧正在衰退。从表面上看，他们言之成理。然而，智慧曾经是某些皓首穷经的人文学者的不担风险的快乐，实际上，它从未象这时这么衰退过。今天，它终于面对真正的危险了，相反，它却有了机会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获得尊敬。

人们说，尼采在和鲁·萨洛美决裂之后，陷入一种决定性的孤独之中，瞻望他得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完成的规模巨大的作品，既感到力不从心，又感到精神振奋，一天夜里，他在俯瞰热那亚湾的山中散步，点燃了一大堆树枝和树叶，眼看着它们慢慢燃尽。我时常梦见这大火，有时想把某些人和某些作品置于火前，让它们接受考验。那么，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堆大火，它的令人难以承受的火苗无疑将把许多作品化为灰烬！然而，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作品来说，它们的金属完好无损，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投入智力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快乐之中，这快乐名曰“赞叹”。

人们当然可以希望一种更温和的火，一种缓解，一种有利

于梦幻的停顿，我也希望如此。然而，对艺术家来说，也许除了一种处在最激烈的战斗之中的和平之外并没有其它的和平。爱默生说得好："凡墙都是门。"不要在我们的生活所对的墙之外寻找门和出路。相反，让我们在有缓解的地方寻找缓解吧，我的意思是说，就在战斗之中。有人说过，伟大的思想是附在鸽子脚上来到世间的。也许那时候，如果我们洗耳恭听的话，我们就会在帝国和民族的喧嚣声中听见生命和希望的温和的骚动声，仿佛轻微的羽翼声掠过。有人说这希望是由一个民族带来的，有人则说是由一个人带来的。我认为正相反，是成千上万孤独者激起、活跃、保持了这希望，他们的行动和作品每日都在否定历史的边界及其最粗俗的表象，以便让始终受到威胁的真理在一瞬间闪出光辉，而这真理是每个人为了大家树立在各自的痛苦和欢乐之上的。

加缪表年

1913年 11月17日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蒙多维镇。
其父吕西安·加缪是酒窖工人，其母卡特琳娜·散太斯是西班牙人，其兄名吕西安。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父应征，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不久即死于医院。
举家迁往阿尔及尔，住进贫民区。全家靠母亲作工生活，十分清苦。共同生活的还有外祖母，她严厉而专断；一叔叔有残疾，乃制桶匠人。

1918年—1923年 进镇小学，颇受老师路易·杰尔曼器重。

1923年—1930年 考取奖学金，进阿尔及尔中学。喜足球，曾任阿尔及尔拉星—大学足球队守门员。
第一次接触纪德的作品。

1930年 患肺结核。

1932年 进入阿尔及尔大学，主修哲学，受教于让·格勒尼埃门下。

在《南方》杂志发表文章。

1933年 希特勒上台，加缪很快就参加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创立的反法西斯运动。

1934年 于年底加入法国共产党，其任务是在穆斯林中进行宣传活动。

1935年 法共领导人拉瓦尔赴莫斯科访问，制订了延缓法共亲穆斯林的活动，加缪随即离开法共。

开始写作《反与正》等一系列散文。

靠信用贷款读书，还需干各种临时工作才能维持生活。

曾在气象台、船运公司、政府部门工作过，还卖过汽车零件。

1936年 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基督教玄学和新柏拉图主义》。

领导“文化之家”的活动，创建“劳动剧团”。

主持写作剧本《阿斯杜里起义》。

1936年—1937年 作为演员参加阿尔及尔电台剧团。

1937年 担任《阿尔及尔共和报》记者，尤其对政法事务报道感兴趣。

2月，在“文化之家”发表关于地中海文化的演说。

5月10日，出版散文集《反与正》。
写作《婚礼集》。
解散“劳动剧团”，创建“演员剧团”。

1938年 撰文评萨特的《恶心》，指出：“萨特先生笔下的主人公强调人身上使他厌恶的东西，而不把他失望的根由建立在人的某些高尚的东西之上，这样他就可能并没有提供他焦虑的真正意义。”
写作剧本《卡利古拉》。

1939年 创建《海岸》杂志，会见安德烈·马尔罗。撰文评萨特的《墙》，指出：“萨特先生的说教使人转向虚无，但也使人转向清醒。”
5月，出版《婚礼集》。
6月，赴卡比里地区采访，报道中说：“在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中有这样的苦难，这是最最令人绝望的景象。”
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加缪因身体原因未能入伍。

1940年 第二次结婚，娶奥兰市人弗朗西娜·富尔。
《阿尔及尔共和报》停办，由《共和晚报》接替，加缪任主编。后因不满新闻检查而转入《巴黎晚报》，该刊系右翼报纸，加缪只肯做编辑。
5月，完成《局外人》。
9月，开始写作《西绪福斯神话》。
12月，脱离《巴黎晚报》。

1941年 1月，返回奥兰，在一私立学校放书。
2月，完成《西绪福斯神话》。
准备写作《鼠疫》。
12月19日，法共党员加布里埃尔·贝里被枪杀，**暂居**里昂的加缪闻讯决定参加抵抗运动。

1942年 肺结核复发，咯血。
7月，《局外人》出版。
12月，《西绪福斯神话》出版。

1943年 完成剧本《误会》初稿。
加缪作为抵抗组织《战斗》的领导成员迁往巴黎。担任加利玛出版社阅稿人。

1944年 结识让-保尔·萨特。
成为《战斗报》主编之一。
《误会》首演，反映冷淡。

1945年 5月16日，加缪赴阿尔及利亚调查塞提夫屠杀事件。
《卡利古拉》首演，获巨大成功。

1946年 访美。
完成《鼠疫》。

1947年 马达加斯加爆发起义，加缪激烈反对政府的镇压。
6月，《鼠疫》出版。

1948年 返回阿尔及尔，旅行。
与让一路易·巴洛合作完成剧本《围困》，不成功。

1949年 6月至8月，访问南美。

1950年 出版《时文集Ⅰ》。

1951年 出版《反抗者》，争论延续一年之久。

1952年 返回阿尔及利亚，旅行。
8月，与萨特绝交。
陆续发表短篇小说。

1953年 出版《时文集Ⅱ》。
7月，就东柏林事件发表演说，称："无论在什么地方，当一个劳动者赤手空拳面对坦克，高喊他不是奴隶，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

1954年 11月赴意大利旅行。

1955年 5月赴希腊旅行。
6月，任《快报》记者。

1956年 返回阿尔及尔，1月23日呼吁双方和解。
出版《堕落》。

1957年 3月，出版《流放与王国》。

10月17日，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是：“因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1958年 3月，再版《反与正》，有重要序言。
6月，出版《时文集Ⅲ》。

1959年 完成《第一个人》部分章节。

1960年 1月4日，死于车祸，时年47岁。



ISBN 7-5407-0605-8/I·454

定价：平装 8.85 元